

龙岩被压迫阶级的现状及其出路*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在军阀、绅士、资本家共同宰割下的龙岩，捐派频仍，米珠薪贵，这一两年来，弄得民不聊生！不料正在水深火热之时，竟添加了两个压榨平民的利器：一个是腐败的保卫团（自然我不是反对保卫团成立），一个便是涨跌不定的“毛价”。

“上倚官厅，下结流氓”。这本是绅士先生们武断乡曲的秘诀，现在的保卫团，完全遵照袁世凯颁布的官制而组织，一面受官厅委任，一面地方上并无类似乡议会的监督机关。因此，这个保卫团，名义上是保卫治安，实际上却成了绅士们支配乡里的利器。他们有了这利器，与官厅勾结的机会，自然更正大堂皇起来；地方上更刁狡的流氓，也自然被召集在团勇里去了。今日委员来，明天早上，汝马上可以看见如狼似虎的团勇到汝家里去，把戏变了一套又一套，一班“老实”、“无援”的该死良民，怎样不引颈就戮？怎样不日即贫穷？

赚钱的法子，愈变而愈巧，绅士们的老辣，到底跟不上资本

* 这是邓子恢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写于赣南，发表于《岩声》一九二六年二月第三十二期的文章。一九二二年秋，邓子恢曾写信给陈独秀，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未获答复，因此，文中以国民党左派的面目，号召人民武装夺取政权。

家的聪明！劣币入境，只是今年来之事：他们以大洋一元，换来十八角的小洋，运动军队护送入境，竟以大洋每元十三角半用出。嗣后劣币充斥市面，他们怕收帐的劣币，原价倒回手里来，却又运动军队出示禁用；转由商会调和，作跌十六角收用。大家想想，他们这种勾通军队的手段，厉害不厉害？以十三角半用出，十六角收入的利益，是不是我们小百姓的总损失？漳潮广^{〔1〕}的货物，用这种十八角换大洋一元的小洋，扣算出来的昂贵的价格，是不是我们小百姓意外的吃亏？现在据报劣币又经县署出示一律通用了。将来的市面，势必完全充斥癸亥甲子的劣币，连八年^{〔2〕}土版和官局版，恐怕都会没有了。这样一来，那土版和官局版的余价，又只好落在一班聪明的资本家手里去发财，将来的结果，只有重演七月间跌价的把戏！准备牺牲的，又只有我们的小百姓的损失！

无论何人，在上述两个事实里，都很容易看出：它是压迫阶级对于被压迫阶级新增加的一种压迫的利器；这利器的总制造厂，更显然是那“万恶之藪”的驻防军队。因此，更可以看出：他们军阀、官僚、绅士、资本家，都是一样的站在同一阶级——压迫阶级上面，一样的向着我们——被压迫阶级头上，用他们不同的形式，榨取其目的物而已。固然他们中间也会互相吞噬，但双方利益交换的可能和机会，究比我们多，所以自然会彼此联合起来，上下勾结，交互为利。

比如私运劣币的巨商，他能搬三千块钱给军队，所以禁用的布告，马上出现；又如某保卫团替官厅办捐款，捐款办妥，保卫团额外收费，致被控告，官厅也当然会含糊了事；前年赣军迫种烟苗，事由新党包办，杨厚坤^{〔3〕}在小池大发虎威，驻防军队，居然听其调遣。可见他们中间各有利用，自然联为一气。

又如屡次借粮，县署岂不知叫“粮多田少”的中落户和贫民

出钱实在冤枉，可是想派特别捐来，那些特别户也着实“顽皮”，兼之大名鼎鼎的绅士们，又个个来讨情，事反难办。所以，只得听凭大绅士们的决议：“按照粮户摊派”。现在却索性连“借”字都去掉，改为“提征”了。“不管你们当衫还当裤，纵然卖妻鬻子，也得把钱来完粮”。到底这班中落户和贫民“老实”“无援”，结果粮房里成绩，确很不错。哈哈！真佩服我们的大绅士先生了！一面邀功县署；一面却好事恩富人；这个中间，不消说的自有他们相当的交换利益，成立彼此“互惠”的条件。

此外如食盐专卖，鸦片入境，公路舞弊，花会承包，种种过去和现在的事实，件件都可以看出军阀、官僚、绅士、资本家、土豪、流氓，上下勾结，交互为利的线索。被牺牲的，当然都是我们小百姓的“切肤之痛”！

唉！站在被压迫阶级上的可怜同胞呀！我们现在都一齐在恐怖中过活！我们的社会，都充满了恐怖的空气！看呀！敌人们的炮弹，已经向着我们的阵线上抛来！保卫团的“迫击炮”，资本家的“机关枪”，扫射着我们生活的壁垒，眼见支离破碎！我们现在不应该再不问世事了！应该大家觉悟起来，联合起来，共找一条出路去！

事实告诉我们，“政权是统治阶级的武器”，“武力是夺取政权的条件”。现在的政权，正落在我们的敌人——军阀、资本家、绅士之手；他们仗着他们军队的武装势力，正在拿政权来统治我们，来压迫我们；使我们不得不屈从他们的支配，不得不忍受他们的榨取。反过来：如果我们一齐觉悟起来，一齐武装起来，我们也很容易拿着政权，跑上统治地位，一面解除他们横暴的武装，一面改革他们作恶的制度，把我们的社会，渐渐朝着和平快乐的方向走去。在那时候，我们才渐渐忘记了恐怖为何物。

国民党^[4]的主张“三民主义”。“民生主义”，便是建设和平而快乐的社会最稳健的切实办法。它的“民权主义”，便是叫我们一齐站起来，从现在少数的压迫阶级手里，取回政权，交给民众，共同行使。它建国计划，第一期定为“军政时期”，入手的办法是“使武力与人民相结合”，“使武力为人民的武力”。它说：“要推倒武力，非倚赖有主义的武力不可”。又说：“国民党的基本势力建筑在有觉悟有组织的工农阶级上面”。这便是：指示我们自己建造武力的具体方案。它又说明：“民族主义”便是“民族自求解放”，而现在的世界，到处都带有“国际性”。因此，它的政纲，特别规定：“联络真能援助我的苏俄为友”。这便是“民族主义”的重要部分。

我现在在此郑重敬告龙岩人：中国国民党，是代表被压迫阶级利益唯一的政党，也是有主义、有计划、有组织、有实力的唯一革命党。我们这班正在军阀、绅士、资本家共同宰割下的龙岩被压迫阶级，现在唯一的出路，只有一齐加入国民党里头来！我们的工作——

第一步：各地方成立“区党部”，藉以团结社会上的觉悟分子，使我们散漫无归的民众势力，开始组织而集中。

第二步：集中各坊、社党代表，正式成立“县党部”指挥之组织。有训练、有主义的党员，依照党纲和政策，开始为“改良社会，政治运动”奋斗。

第三步：资助可靠的分子，派往党军学校准备训练工团农团军，造成革命的势力，把我们自己的阶级，武装起来，夺取政权，依照“三民主义”实行和平快乐的社会。

一般已经觉悟的知识界同志呵，改造龙岩，并不是他人之责！尤非少数人的努力能够有效的。我们如果不是站在反动阶级上面，

如果确切表同情于被压迫阶级，如果自己也感觉着生活的恐怖，那根本的救济办法，除了大家跑入国民党，确无第二条更大之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一般热血沸腾的同志们呀！提起脚跟，认清前路，大家一齐跑来罢！

注 释

- 〔1〕 漳潮广即福建的漳州、广东的潮州和广州。
- 〔2〕 八年指民国八年，即公元一九一九年。
- 〔3〕 杨厚坤是当时龙岩州西路烟草（鸦片烟）调查局局长。
- 〔4〕 国民党全称为中国国民党。这个时期，国民党具有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的性质。一九二七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变成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集团。

中共闽西第一次 代表大会之政治决议案*

(一九二九年七月)

一 闽西斗争的前途

(一)全国政治形势。

1、反革命政权向前崩溃。

自从蒋桂战争结束以来，表面上蒋系军阀战胜了桂系，征服了冯系，并拉拢奉系，以威胁阎系；资产阶级“打倒封建阶级势力”“实行和平统一”的口号仍在唱着；英、日、美三大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竞争，好像是美帝国主义，一时占了优势。但这些完全是表面的。实则军阀与军阀之间，资产阶级与买办地主阶级之间，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越发尖锐了，他们的冲突越发紧迫了。英国的旧工具桂系军阀，虽形式上解体，却马上找得新的工具；日本的工具奉系军阀表现得不很顺利，但冯阎却正是合用

* 这是由邓子恢起草、经毛泽东修改的《政治决议案》全文，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它总结了闽西革命的经验，并吸取了井冈山等地的革命经验，对巩固和发展闽西革命根据地起了重大作用。后来，这些经验还推广到其他革命根据地。

的；美国的工具蒋系军阀虽则始终尽忠于美国，却不能不兼受英、日的支配，这是帝国主义在中国斗争发展的新形势。资产阶级“打倒封建势力”的口号完全是假的，他不但不能打倒封建势力，且有屈服于封建势力的趋势。蒋系南京政府的日益右倾，即日益投降于帝国主义与地主阶级，汪陈派的活动因之猛进。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裂痕日益发展。“和平统一”的口号，只是垂死前的一片微弱的哀声，大小军阀彼此间对地盘的竞争，和每个军阀内部的冲突与分裂，越发成了普遍的现象。全国范围内大小战争的继续爆发是毫无疑义的趋势。这样的形势，都是表明全国范围内各个统治阶级各派军阀，都很迅速的向着崩溃的前途走去，全国的政局是一天一天更混乱更不统一，更无办法。

2、革命势力的发展。

统治阶级的混乱、不统一、无办法，给了革命势力发展的很好机会。数月以来，长江下游及北方产业区域，罢工潮流的高涨，南方各省农民游击战争的发展，与苏维埃区域的扩大，军阀士兵群众的怨恨加深与逃跑日多，土匪扰乱的遍于全国，商业小资产阶级，对于苛捐杂税剥削的愤怒，学生小资产阶级的日益革命化，都是表示革命潮流之逐渐发展，这种革命潮流发展的形势和统治阶级的混乱、不统一、无办法的形势相汇合，足以促进统治阶级崩溃的速度，而与工农阶级的革命政权，日益接近起来。

(二)闽西的环境。

1、福建反动统治是分割的，而且是向前崩溃的。

福建因经济地理和帝国主义侵略的原因，产生许多割据的小军阀。这种割据的形势，不到军阀的消灭那一天，是不会变更的。福建自国民党占领以来，分布的五个小军阀，到最近形成了三派鼎立。即代表福州、泉州、厦门一带买办地主阶级的海军为一派。

代表漳州龙岩一带资产阶级及地主的张贞、陈国辉为一派，和代表闽北闽西地主阶级的卢兴邦、卢新铭为一派。这五部三派反动小军阀，因地理的形势分割福建全省，各在其范围内剥削工农阶级，同时联合成一个同盟，以便分配赃物。福建岁入一千八百余万元的分配是：海军三百五十万，张贞一百六十万，卢兴邦一百八十万，陈国辉、卢新铭二百万，新豪绅——党务费五十万，贪官污吏——行政费、政务费、司法费、财务费，共五百万，教育费一百五十万，其他三百万。而联合同盟完全是表面的形式的。实际上三派对省行政权分量上分配的斗争（即对剥削分配的斗争），特别是张杨两派对省政领导权的斗争，是一天一天走向激烈。在全国各派各阶级之间的斗争达到最混乱、最激烈的时候，福建的小军阀是一定要爆发战争的。同时闽西一带工农暴动的发展，和红军的游击，汀龙两属统治势力，和卢陈两个小军阀，均受了极大的打击。闽西闽北的工农势力在全省全国工农势力影响之下，亦当逐渐的发展起来，这种革命势力的发展与统治阶级内部的冲突相汇合，福建统治阶级之向着崩溃的前途行进是完全没有疑义的。

2、东江⁽¹⁾、赣南的革命势力发展。

东江、赣南的红军和苏维埃区域的发展，使闽西打破了孤立的形势，于斗争的前途是有利的。

3、但不是统治阶级没有进攻闽西的可能。

全国和闽西四周的形势虽在大的倾向来说是反革命势力向下低落，但不是说统治阶级从此便完全无力向闽西进攻了。闽西的革命势力向前发展，则四周反革命势力一定要尽可能的调动他们的力量来进攻革命势力。特别是福建统治阶级，尤其是闽南的统治者，有随时派兵进攻的可能，这是不可忽略的。

（三）闽西政治经济情形。

1、土地的分配。

据龙岩、永定、上杭、连城、长汀、武平六县调查，田地平均百分之八十五在收租阶级手里，农民所有田地平均不过百分之十五。这可见农民要求土地之迫切，而两年来广大的农民斗争，目标完全在于土地。

2、剥削情形。

田租各县最低百分之六十，长汀百分之七十，连城南乡高至百分之八十。利息龙岩每月二分为最低，连城、武平、长汀均三分，上杭、永定均二分半，最高利息各县有到十二分的（惟不多）。税捐很重，除省政府中央政府的税项外，县政府、驻军、民团三者的捐税是十分厉害的。

3、农民成分。

六县除连城外，雇农都在百分之五以下，长汀少至百分之一，永定溪南等处甚至完全没有雇农，这是因为闽西没有资本主义的农业生产，几乎本体都是非经济的封建剥削的原故。富农平均不到百分之五，中农平均亦只有百分之十七，而贫农则占百分之七十五。这证明帝国主义地主阶级的双重压榨之下，农业之资本主义发展在闽西是不可能的。土地集中到收租地主，有地农民一天一天减少，无地农民一天一天增多，客观上土地斗争便必然要剧烈起来。

4、洋货之侵入与手工业之失败。

无论什么偏僻的乡村，都有许多种洋货侵入，对于手工业厉行袭击，特别是烟、纸两业的失败影响手工业，同时影响农业。巨额的收入减少，失业的人数增多，完全是受外国烟、纸的影响，这在闽西是一种重大的事变。

5、商业资本之发展。

闽西的商业即在扰乱的政局下仍然是发展的，特别是龙岩和永定之坎市，香港式房屋之建筑，表示新兴的商业资本的发展形势，这些城市商人到近年逐渐变成政治上的主人，和驻军与地主勾结起来，尽量压榨农民〔销出高价货物，收买廉价农产和手工业品（如烟、纸等），收买土地，征马路捐，修筑马路〕，这是一种新兴势力。

收租土地中城市商业资本占的成数极大，龙岩、连城及永定的丰田区均占到全额土地百分之五十，长汀百分之三十，上杭百分之二十五，武平百分之二十。商业资本土地有二种形式。一种是城市资本家赚了钱进乡购买土地。龙岩、连城、永定商资土地之多，就是因为除本县商家购买土地外，还有一大批往南洋经商的华侨发了财拿钱回来购买土地。一种是乡村地主的商人化。他们一面在乡村是地主，一面却把从农民剥削来的孽钱投入城市经商。这一种比较少。商业资本与乡村土地的关系，既如此密切，可知中国资产阶级在民权革命阶段中，是必然要和地主阶级联合，反对土地革命。而闽西土地革命的最大敌人，不是腐败的豪绅地主阶级，而是新兴的商业资产阶级，这一点是最可注意的了。

6、豪绅地主阶级的地位。

依据上面的分析及从斗争中所得的经验，我们可以估量闽西各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了。首先去看豪绅地主阶级，这个阶级虽是目前反动的中心，但他们是最腐败、最没有能力，他们的团结极松懈，他们办的民团极脆弱，在革命中完全表示他们招架不来的神气。他们是垂死了的阶级，每天在恐慌崩溃的途中。

7、商业资产阶级^[2]。

这个阶级是反动的主力，他们是城市中等以上商人，他们与洋货及土地有密切的关联，所以他们对于反封建势力、反帝国主

义的工农民权革命是一定要反对的。在事实上，龙岩、坎市、湖雷、金丰等处，过去及现在，与革命势力作死战的就是他们。他们所办的民团和商团比起地主的民团来强得多。他们和潮汕漳厦南洋等处的闽西籍商人，是剿共声中奔走呼号攀兵请将最努力的。这个阶级是有坚决的反革命性，是闽西革命势力的主要仇敌。

8、小资产阶级。

小资产阶级，农村的与城市的不能混为一谈。农村小资产阶级，其中的富农、小地主等⁽³⁾，除小地主中的破产部分有些革命性外，其余均是反革命的，他们在革命高潮中，投机混于革命队伍，白色恐怖一到，即表现其反革命性。这是因为在革命中及革命后他们是受损失的（贫农群众对他们剩余土地的没收和政治上的打击）。农村小资产阶级中，只有中农可以参加革命。城市小资产阶级，如国货小商人、小手工业等，在城市中占很大部分。只要革命中不出打击他们的错误政策（如以前一样），他们对革命是同情的，因为推翻帝国主义、地主阶级与军阀政府的革命，是于他们很有利益。龙岩、永定等处在我们保护商店的口号之下，取得了商人普遍的好感，是最近几个月来的证明。

9、工农阶级。

闽西革命主力是广大的乡村贫农（百分之七十五）和城市手工业工人，中农是可以帮助革命。

10、游民阶级。

半失业与完全失业的不同。半失业的，即使一面做匪，仍可以参加革命；完全失业的，在闽西或做匪，或当民团，或在卢新铭部下当兵，或在城乡靠赌钱过活，以前大半是附属于反革命势力的。这个阶级在闽西各地占当地人口百分之二十五，有不小的群众，对付他们是很要注意

11、军阀军队民团商团。

这些反动阶级压迫革命的工具中，陈、卢两部军队。陈部已驱逐去了，不能再为害。卢部釜底游魂，不是工农势力之敌。所以豪绅地主的民团，都是脆弱无用的。只有商业资产阶级所办民团及商团，以及和他们勾结的土匪刀匪，始终是工农群众的一个敌。他们是武装反革命很坚决，而且操习了相当的斗争力，他们是剿共军清乡搜山的向导，是最可恶的一个东西。

12、国民党。

闽西国民党在改良主义的改组派⁽⁴⁾把持中，组织很小，过去不是力量。在月前赤色斗争中，改良口号亦自然没有和我们争群众的可能。但旅外的闽西国民党人，在张贞、杨树庄庇荫之下者，都呼口号剿共颇为起劲。严防这些人派遣其走狗混来闽西工农组织中捣乱，却是要紧的。

（四）闽西斗争的前途和闽西党的总路线。

1、闽西有一个工农武装割据的前途。依据上述的分析，在下列各项主观的客观的条件之下，闽西工农武装割据的前途是确定了：

（1）有比较丰富的斗争经验。

（2）农民得了土地（红色区域田契已经烧完。夏收的谷又即可得到，田地的分配亦很快可以完成）。

（3）民众百分之八十，是贫苦工农，要求革命，而且十分积极。

（4）工农武装扩大。

（5）红色政权区域比前扩大，并且连成了一片。

（6）有红军第四军⁽⁵⁾帮助。

（7）经济条件不缺（粮食不成问题，外来日用品在我们正确

的经济政策之下，是可以继续维持的）。

(8) 邻近反动区域的群众，对我们已有相当的认识，不像以前之受反宣传蒙蔽坚决反对我们了。

(9) 对小资产阶级的政策正确，可以得到小资产阶级的同情。

(10) 有利于斗争的地势。

(11) 全国政局变动很快，敌军没有长期围剿的可能。

(12) 闽西统治阶级的经济破产，无法维持其统治势力（收不到租息税）。

(13) 反动武装削弱。

(14) 改良主义不能得群众，而且根本不能实现。

以上十四项都是有利的条件，但亦有六个缺点：

(1) 党的组织不普遍、不健全，干部人才缺乏，不足以领导广大群众。

(2) 新发展区域的群众，没有巩固的组织，没有斗争经验。

(3) 城市与中心区域的工作没有巩固的基础。

(4) 武装组织不健全，战斗力薄弱。

(5) 盲动主义的残余，过分打击农村小资产阶级，使农村小资产阶级有脱离革命之趋势。

(6) 赣南、东江的群众革命势力，还没有与闽西联络起来。

依上所述客观环境主观力量的估量，可以确定闽西是有一个工农武装割据的前途。虽然在主观力量方面还有好些缺点，但这些缺点是可以党的努力去弥补的。

2 闽西工农政权的意义：

闽西可以造成一个割据，但这个割据有什么意义呢？闽西的割据有两个重要的意义：

(1) 闽西痛苦的工农群众，为反抗反动政权的压迫，解除繁

重的剥削，起来实行武装斗争，推翻反动统治，建立自己的政权——这是闽西工农政权的本身意义。

(2) 为发展更广大的群众，扩大土地革命的影响，与赣南、东江及湘赣边界的革命势力取得联系，于远地建立红军的根据地，促进一般革命潮流的高涨，这样去和党的全国总任务争取群众，准备暴动，夺取政权联系起来——这是闽西工农政权的全国意义。

3. 党的总路线。

因此，闽西党的总路线是：“坚决的领导群众，为实现闽西工农政权的割据而奋斗”。

其主要任务是：(1) 巩固并扩大党的组织；(2) 发动并组织广大群众；(3) 实行土地革命；(4) 建立苏维埃政权；(5) 扩大工农武装。而实行土地革命使闽西广大的贫苦农民得到土地，建设斗争的坚实基础，尤其是闽西斗争的主要目标。

二 闽西过去斗争的经验

(一) 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的斗争。

闽西的斗争从一九二七年开始，而激烈的武装斗争则在一九二八年，兹分别述评于后：

1 永定溪南里^⑥

(1) 由日常斗争转变到武装暴动。

(2) 深入土地革命，扩大苏维埃区域。

以上是溪南里斗争最有意义的两点，最值得各地效法的。

(3) (一九二八年) 六月群众武装攻城是表现农民对地主阶级(溪南的大地主多住城内)及地主的保护者贪官污吏与军阀军队的愤怒的最高潮，是一个英勇的行动，虽然失败，但发动了闽西的

土地斗争，意义是很重大的。但此次斗争不在乡村发动直接夺取地主田地的斗争，及以后攻城口号不适当（没有分别城内穷人与富人），事先没有发动城内群众的准备，和攻城技术错误等，则是此次斗争的缺点。

（4）杀反动豪绅及其走狗，并烧毁反动头子房屋，这种群众的肃反行动，是十分对的，但烧了一些不应该烧的屋，杀了一些不必杀的人（如吃鸦片的及略有嫌疑的），焚烧商人帐簿，没收丰稔市的商店，则是犯了盲动主义的缺点。

（5）在暴动失败后，白色恐怖到来，群众中调和空气很浓厚。党在此时提出“杀尽一切调和妥协分子”的口号，并且毫无群众基础地想强迫把这一口号执行起来（实行杀人），这仍是盲动主义的错误，有脱离群众的极大危险。但党随即改变了政策，采取了退却的正当策略，取消杀尽一切调和妥协分子的口号，对群众说明地主的调和主张是骗人的，各种压迫会跟着到来，应准备持久的奋斗，才仍旧取得群众信任。后来我们所说皆验，群众乃谓到底共产党对。

2、永定金丰里⁽⁷⁾。

（1）去年金丰的斗争，扩大了武装数量。并且用继续不断的游击战术亦发展一些群众组织（虽然这些组织现在是消灭了）。但金丰里的斗争，犯了一个重大错误，就是偏重军事行动，这是与溪南斗争方式根本不同的。五月陈东坑武装暴动后不到一天即将赤卫队开往下洋，完全忽视了陈东坑群众工作（不发动群众，不建设政权），这是单纯军事行动的开始。以后历次向下洋古洋等地游击，不知发动当地的群众自己起来斗争，却由游击队代替包办一切，游击队做了一切的主体，失了帮助群众自发斗争的意义，以致环陈东坑各乡群众长久消沉，至今尚没有广大地起来，这个错

误是非常严重的。

(2) 陈东坑暴动后，县委采取埋枪政策，解散陈东坑正在斗争高潮的武装群众，失了发动全金丰群众的机会，犯了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

(3) 抢下洋商店、拉抢金丰商货，失了小资产阶级同情，使一般人认我们做土匪，这是流氓无产阶级意识领导的错误。

3 永定太平里⁽⁸⁾。

(1) 不注意从日常斗争，尤其是不用土地革命口号去发动群众，而欲用军事力量进攻政治经济中心之坎市，单纯的欲用这个方法去发动群众，这是偏重用军事力量去发动群众的错误。

(2) 暴动的条件既不具备，尤其是群众没有暴动的可能，欲强迫暴动，以蛟洋红军为主力去攻坎市，失败后群众受摧残埋怨我们，以致全里工作陷于长期的消沉，这是盲动主义的错误。

4 龙岩白土⁽⁹⁾。

白土的斗争，从前年减租，到去年一月平分猪肉、平糶、算帐，二月捉委员杀土豪的走狗、捆家长、缴枪，一步一步走到高潮，这个方法本是很对的。但在二月间不举行一次群众的暴动，斗争到了捉委员，杀土豪走狗，捆家长，同志们还有闯祸还不甚大，可免严重压迫的幻想。二月十三杀人缴枪，在客观上做的是暴动，同志们主观上却不承认是暴动，不于此时以赤色政权宣布地主的罪状，烧毁田契，发布土地政纲，取得党在全白土各乡广大群众的信仰。这种不把斗争范围扩大，而只求缩小的政策，实是犯了机会主义错误，至六月蛟洋红军攻城既不是群众的又不是有准备有目的的，只算是一种军事投机的举动。

5 上杭蛟洋⁽¹⁰⁾。

(1) 由日常斗争，发展到武装斗争，每次斗争有广大群众参

加。

(2) 由政治影响的扩大，发展了新区域。

(3) 有斗争的决心，始终不与反动派妥协，得了最后的胜利。

(4) 游击战术进步（敌进我退、敌驻我扰，在敌军四周出没无常，以此与敌军持久斗争）。

以上各点，是蛟洋斗争的优点。下面则是他的缺点：

(5) 去年四月群众斗争已到了高潮，党没有领导群众杀土豪、分田地、深入土地革命。九月对客观上环境观察不正确（悲观），不相信我们斗争有胜利可能，不下决心帮助白沙群众的斗争，失掉围捉大批反动领袖的机会。这些都是机会主义的错误。

(6) 二月杀土匪八人，招致土匪群众之反对是不对的。

（二）一九二九年的斗争。

1、盲动主义在今年闽西已经纠正了许多，但还有一些残余，如龙岩赤卫队不顾主客观力量一连三次攻城遭到失败。畚心在卢部到了之时没有发动经济斗争，而布置一个缴卢部枪械的计划。均显然表示盲动倾向。其余如蛟洋农民烧丘坊房子二百余家，白砂赤卫队烧茶地房子九十余家，这种盲动的大烧房子，更是非常错误的。

2、烧杀主义矫枉过正，变成了不杀不动的机会主义。如卢丰、华家亭、大池一些地方捉着土豪却放了生。

3、对小资产阶级政策不正确。

对小资产阶级政策及城市政策，过去有很多的错误，如没收商店、烧商家帐簿等。自五月四军来以后，这种错误纠正了好多。

但党的领导力量薄弱，在农村中过分打击富农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如派款、烧“一切”借约田契等。尤其是分谷子采取平分主义，因此引起农民的反感，以至有的同志为群众所杀者（东山

社^[11]之坑头)。新发展区域中，最普通的坏现象就是派款，好些地方是贫农派小资产阶级的款，有些地方农会为地主走狗所把持，或流氓地痞所把持的，则反向穷苦农民派起款来，简直是变相的地主剥削农民。至对城市商店以前所做的错误，近来大体上均改正过来了。

4、党的领导薄弱。

闽西党员数量太少，六县共计不上三千，当然是不足以领导百几十万新发展的群众。兼之党员质量亦不很好，政治水平太低，组织涣散，纪律废弛。去年斗争中干部损失太多，党的领导就削弱了，其中最大的缺陷，就是缺乏组织性，简直像一盘散沙。而各级党的指导机关很少用会议的集体的方法去指导工作、分配工作，乃是组织涣散的总原因。至党与群众关系不正确，党的秘密完全公开出来，还是缺点的较小者。

5、忽视团^[12]的工作。

党对团完全没有指导，而且把团员随便调动，有些更把团的活动分子调到党里来工作，客观上犯了取消主义错误。

6 地方主义。

如在分谷派款、分配枪枝、禁粮食出口等事上充分表现地方主义，不但群众如此，党员乃至党部均不能免。

7 士兵运动。

兵运仅长汀有点成绩。团丁和土匪运动简直没有注意。

8 职工运动。

不但乡村工人没有组织，即城市工人组织亦没有好的基础。过去对于城市工作一般的忽略，这个错误是很严重的。

9 对流氓阶级的政策不正确。

过去闽西一般的说都不注意土匪运动，大部分都是仇视土匪，

如蛟洋杀土匪等，尤其对城市流氓取仇视态度，这在客观上是把土匪流氓群众推与豪绅阶级，使之进攻我们。

10、政权组织的缺点。

组织方面：最大的缺点是政权机关组织不健全，各部分很难起作用，因此客观上等于个人包办。这种现象仅在过去有斗争地方，如溪南、东乡、蛟洋等处比较少些。再则已经建设苏维埃的地方，并没有建设真正的代表会议，仍然只是一个执行委员会。至于政权机关产生方法，大多数都由一哄而集的群众会选出，不是由代表会议选出。岩永临时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已二月，还没有召集全县的代表会议。上杭则至今无县政权机关。政府委员成份固然大多是贫农阶级，亦有些为流氓所把持。另有一二处为地主所霸占。

工作方面：过去有斗争地方对于肃反、发动群众及分配土地做得很好，但新发展区域大多数没有好成绩。宣传工作除永定有点成绩外，上杭龙岩都没有。

与党的关系：各县都很不好，政府委员党员占多数，成了党包办政权。

11、土地斗争。

闽西各处发动了斗争的地方，对于烧地主田契，分土豪谷子，向土豪派款、抗租等，做得很普遍，这是对的。但分田一事，只永定龙岩做了三分之一，其余大部分还没有做。分配土地这样缓慢，不能使起来了的群众迅速得到土地，使他们为自己土地的利益而战，忽视这个最主要的工作，是十分不对的。

12、武装。

最近几个月斗争中，赤卫队枪支，永定由五百条发展到一千二百余条，龙岩由几十条发展到六百条，上杭由三百余条发展到

一千余条，这样大的数量发展是这回的胜利。此外闽西红军第四纵队之成立尚不在内。但枪的质量不好，大多数还没有组织，战斗力薄弱，且有半数以上在非无产阶级领导之手，这是有被敌人夺去的危险的。所以要用很大的努力，才能成为革命的能斗争的武力。

三 党的任务

闽西党的总路线，是发动广大群众创造闽西工农政权割据。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依据过去的经验，及斗争的需要。规定今后党在闽西斗争中，各方面应该执行任务如次：

(一)党内工作问题。

- 1 从工人及贫农中创造党的无产阶级基础。
- 2 健全支部生活。
- 3 严密党的组织，洗刷原来无组织状态。同时要扩大党的组织，使党员数量和党的分布区域都发展起来。
- 4 党的指导工作集体化，废除从前不开会的不良习惯。
- 5 执行铁的纪律。
- 6 在城市及中心区域建立党的基础。
- 7 建立党的理论的基础，加紧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党员政治水平线。
- 8 训练干部人材。
- 9 消灭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的残余，洗刷非无产阶级意识，如地方主义、个人主义、极端民主化等。
- 10、扩大党的政治影响。

(二)土地问题。

1、群众起来建设了政权的乡村（不论农民协会或苏维埃），即须用政权机关宣布没收一切收租的田地山林（大小地主的祠堂、庙宇及团体的），并随即分配与贫农。

2、一切收租田地的契约烧毁。

3、自耕农的田地不没收，田契不烧毁，惟富农田地自食以外的多余部分在贫农群众要求没收时应该没收。

4、为求敏捷起见，田地以乡为单位，按男女老幼依原耕形势，将他们在本乡及邻乡田地总合起来抽多补少平均分配，在下种之后第一造的禾只归原种农民收获，分配的效力从第二造发生——农民按照分配的田地各自下种。

5、农民对地主债务宣布废除，债约烧毁。

6、为公共的用途及斗争需要征收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三十五的土地税，但须在经过宣传之后。

7、工人及雇农工资生活以物价为标准相当的提高。

（三）政权问题。

1、由下而上，建立苏维埃的群众政权组织。

2、扩大苏维埃区域。

3、严密政权机关的组织，各级政权机关的指导工作集体化，防止个人包办。

4、政权机关中确立工人贫农的领导权。

5、引进劳动的妇女及青年积极分子参加政权机关工作。

6、建立闽西统一的政权机关——闽西革命委员会到闽西苏维埃。

（四）武装问题。

1、严密武装组织洗刷涣散状态。

2、武装集中在忠实勇敢尤其是有战斗经验的贫农工人手里。

3、加紧政治训练以加强战斗力。

4、在武装组织中发展党的组织，加强党的领导，打破地方主义，尤其是新发展区域的武装要加注意。

5、县区乡均组织赤卫队，县区二级应有常备组织。

6、建立和扩大闽西红军，开办红军学校训练干部人才。

7、各级武装受各该级政权机关指挥，不得自由调动。

(五)职工运动。

1、从日常斗争中发展工会组织，在重要城市（各县城及重要市镇）及重要职业（店员、烟纸、运输）中建立工会基础。

2、在赤色区域农村中的雇农及手工工人应该组织工会，在白色区域农村工人可以加入农协，但工人人数多的地方应该有独立组织。

(六)农民运动。

1、在秘密状态之下的地方应尽量扩大农会组织。

2、在真正群众政权的苏维埃建立之后，农协可以不要，但在群众尚未完全发动起来，党无基础又已经建立苏维埃地方，则秘密农协还是必要的。

3、从日常斗争中发动广大农民去扩大农会组织。

4、在未暴动区域，尽量深入武装暴动、土地革命及苏维埃政权的宣传。

5、在公开农会之下要吸收勇敢忠实分子组织秘密农会，准备退却时起作用。

(七)游击问题。

1、在白色区域内群众有革命的要求，但因反动力量太大而不敢起来的地方，党应调遣其附近赤色区域的游击队前去游击，以削弱该地反动力量，发动该地群众建立和扩大该地党和群众的组

织，逐渐引起该地群众自己起来斗争。

2、在白色区域群众的斗争情绪已经涨到最高程度，非爆发公开斗争即不能领导他们时，党应坚决的领导群众，布置暴动局面，夺取反动武装、杀戮反动豪绅、分配地主土地、建立赤色政权。如尚无建立政权可能时，即就暴动群众组织武装游击队，在当地及附近一带用游击方式和反动派斗争以逐渐削弱反动势力，发展工农自己势力，达到建立政权的目地。

3、在游击队中主要应该注意的是：要发动当地群众自己起来斗争，游击队只是一个帮助的力量，一种启发的作用，不要代替当地群众办理一切，要使当地群众自己负责任去和豪绅直接斗争，才能免除群众不信任自己力量，单依赖游击队力量以及游击队去后当地的斗争立即消沉的弊病，同时须禁止盲目的烧杀致使群众脱离我们。

4、在游击队所到的地方，必须坚决号召群众自己起来打土豪、分谷子、烧田契等。并应把这些事尽可能的以群众与群众大会的形式表决去干，开群众大会应是游击队经常工作之一，游击队若不做这些工作那就是很坏的游击队。

（八）妇女问题。

1、闽西妇女在生产上占重要地位，发动妇女参加土地斗争，并引进他们的积极分子参加苏维埃政权指导机关，是保障闽西斗争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

2、党应提出适合妇女要求的口号，以取得妇女群众，但妇女不必有单独组织。

（九）青年问题。

1、青年工农群众在革命中有很力量，而且有特殊要求，发动广大青年群众参加革命是十分必要的。

2、组织少年先锋队及劳动童子团。

3、团是青年工农群众的先锋。我党应该坚决地纠正过去对于团的取消主义的错误，帮助团在闽西建立工作基础。

（十）士兵问题。

革命势力如得不到士兵参加，特别是闽西已在武装斗争时期中，如单靠和敌军硬打而不用很大努力做破坏敌军工作，则前途很是困难的。党应该坚决纠正过去忽视士兵运动的观念，在现在驻军及随时向我们进攻的军队中很艰苦地去建立士兵运动的基础。

（十一）党和政权及群众发展的方式。

有三点是要注意的。第一，建立中心工作区域。闽西范围内应有一地或相连属的数地为中心区域，在这个区域内建立深入工作基础，以为全闽西向前发展的根据地。一县之内亦应有中心工作区域，以为一县发展的根据地。第二，赤色区域的互相连属。要加紧赤色区域间空隙地带的工作使之打成一片，免去孤立的弊病。第三，波浪式的向外发展。依傍着已有工作的地方如波浪一样的向前推进，不要是不相关联的冒进。

（十二）对商业资产阶级政策。

1、这一阶级因为与华侨、洋行及土地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他必然成为一个反革命派。为巩固革命政权起见必然要剥夺他们的政权，而且没收他们的土地。

2、对大小商店应采取一般的保护政策（即不没收），对反动商人宁可杀人、罚款，不可没收商店，但压迫商人最厉害而为一般商人所深恶，没收后可以得到多数商人同情的，在宣传工作做好后才可以没收。

（十三）对小资产阶级政策。

1、在反帝、反军阀、反豪绅、取消苛捐杂税、保护商店口号之下，可以取得小资产阶级的同情。因此，对城乡小商人绝对不要没收商店、焚烧帐簿和废除帐目；对农村小地主主要没收其土地、废除其债务，但不要派款及其他过分打击；对富农在革命初期时间——向豪绅斗争最激烈时间，不没收其土地，并不派款，不烧契、不废除其债务；对自耕的中农不要予以任何的损失。这以上的政策都是取得小资产阶级对革命的一致或者中立的。

2、在革命向前发展，城市中店员对于店主、工人对于厂主的斗争已经起来的时候，党应帮助店员、工人达到他们的要求。在农村中贫农群众对于富农的斗争已经起来的时候，党应帮助贫农分配富农的土地，因为革命已经发展，广大群众已经起来，革命势力有了保障，这时候经济的进攻上层小资产阶级（店主富农）是必要的。但并不是抛弃小资产阶级，也不是要过分的打击他们，这是要注意的。

3、商人及小地主不应参加政权。富农凡亲自劳动者可以参加政权。但须防止他们在政权中的领导（不要使他们当选为政府及农会的委员。）

4、小资产阶级不要有单独组织。

（十四）对流氓无产阶级政策。

1、以抢劫为业，勾结豪绅资产阶级与革命为敌的土匪，党应坚决的解除他们的武装。

2、虽以抢劫为业，但与豪绅资产阶级有冲突，动摇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土匪，党应派人插入他们的队伍中，争取其群众反对其领袖（反动的不革命的），使之站在反豪绅资产阶级战线上来。

3、对半耕田、半抢劫的土匪，党应把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进攻地主阶级。

4、在赤色区域城市中的流氓分子，应分配他们以田地或强迫他们做工，不要胡乱打击他们，但如系显著反动的流氓领袖，应处以死刑。在白色区域中则应设法拉拢流氓分子，使之不为豪绅资产阶级利用。

(十五)对付敌军进剿

1、敌军进剿是不可避免的。党应有与敌人作长期斗争的决心，建立长期应敌计划，这是闽西党目前迫切的任务。闽西的割据就是从这样斗争中创造出来。

2、在党内通告各级党部，唤起党员群众依据过去斗争经验，明白埋枪和与敌人和平妥协的政策是自杀的政策，只有党的团结一致，领导广大群众与敌人作坚决的奋斗才有胜利的前途。

3、在党外对工农群众，应宣传我们只有继续团结，坚决与敌人奋斗才能保持已得的胜利，应使群众明了过去斗争经验，只有自己能够团结、有决心不和反动派妥协、又有很好的斗争方法，是一定能够战胜敌人、保护土地革命胜利成果的，虽有一时的失败是不要紧的。

4、应使群众明了反动派尚有藏在工农分子里头的，如不赶快肃清，一定会做敌人的向导危害我们的。有政权的地方应迅速肃清反动分子。

5、党应准备退却时的一切计划。最主要是建立党的秘密机关和工会农会及政权的秘密机关。

6、党应对敌军士兵作广大的宣传，提出适当的口号，用很好的方法打进敌军士兵中去。

7、加紧红军及赤卫队的训练，随时准备作战。党应规定最好的战术，通告各地应用战术，不打硬仗，多方扰敌，如夜间袭击、截击小队、破坏交通、断绝粮食、秘密肃反等。

（十六）对付国民党改组派。

国民党改组派改良口号虽根本得不到群众，但在农民受到白色恐怖的摧残，发生和平妥协观念的时候，是有一时受他欺骗的可能。党应在此时努力揭破改组派欺骗群众的黑幕，使群众知道只有团结自己力量、反对改良妥协，才有出路。

（十七）反帝反军阀问题。

1、反对军阀战争是现时党在全国范围内主要口号之一。闽西对于此一口号的宣传亦是非常之紧要的。但中国的军阀斗争，即是帝国主义世界战争的序幕，所以反对军阀战争同时即应反对帝国主义因争夺中国统治权，酿成不断的军阀战争的罪恶。

2、闽西的土地革命与苏维埃政权，自然是反帝反军阀最实际最具体的行动，但不是做了这些事就不要另外有反帝反军阀的宣传了，党应纠正过去闽西忽视反帝、反军阀宣传的错误，这一宣传于一般群众之间特别是新的军阀战争到来时候，更加要紧。

3、在赤色区域中取消教会学校并没收其财产。

（十八）与东江、赣南、湘赣边界之联系。

1、加紧长汀、武平工作，注意瑞金、会昌、寻邬、平远、蕉岭工作，特别是闽赣粤三省枢纽的长汀要加紧工作。

2、建立闽西、赣南、东江、湘赣边界四个区域的最高党部，指挥四区域的工作造成四省边界的赤色政权。

3、应与东江、赣南两地党部发生秘密关系。

注 释

〔1〕 东江指广东东部地区，即梅县、大浦、潮州、汕头等地。

〔2〕 商业资产阶级指带有买办性和封建性的商业资产阶级。

〔3〕 在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小资产阶级不包括富农和

小地主。这里把富农和小地主划为农村小资产阶级。

- 〔4〕 改组派是中国国民党的派别之一。一九二八年底，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等因不满蒋介石独揽大权，在上海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形成了国民党中的改组派。
- 〔5〕 红军第四军即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一九二八年四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起义的农军，到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胜利会师。五月四日，两支部队在江西宁冈砦市组成工农革命军第四军，随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
- 〔6〕 里相当于区。溪南里即现属永定县的金矿乡。
- 〔7〕 金丰里包括现属永定县的湖雷、陈东、下洋等乡镇。
- 〔8〕 太平里包括现属永定县的坎市、高陂等乡镇。
- 〔9〕 白土即现属龙岩市的东肖镇。
- 〔10〕 蛟洋即现属上杭县的蛟洋乡。
- 〔11〕 社相当于区。东山社即现属龙岩市曹溪镇。
- 〔12〕 团指共产主义青年团。

合 作 社 条 例 *

(一九三〇年五月)

闽西自去年暴动以来已建立了许多县区乡苏维埃政府，在苏维埃政权下的群众，解除了国民党军阀的政治压迫与苛捐杂税的剥削，但是，因为受军阀的经济封锁，商人的购买怠工以致物价高贵，金融停滞，群众痛苦尚不能彻底解除，因此，合作社的组织是目前闽西群众最急切的需要。兹将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公布如下，仰各级政府及全体群众一概知悉，并切实进行为要。

附合作社条例

- 1、有下列条件者始得称为合作社：
 - (甲)照社员付与合作社之利益比例分红，而非照股本分红者。
 - (乙)社员是自愿加入者。
- 2、在业商人可以加入，但不能办事。
- 3、合作社所得红利照如下分配：
 - (甲)百分之四十照股金分配，作为利息。
 - (乙)百分之十作为公积金。
 - (丙)百分之十抽与办事人花红。
 - (丁)百分之四十照社员付与合作社之利益比例分红。

* 这个《条例》是邓子恢为闽西苏维埃政府写的。

- 4、合作社办事人，由社员公选，政府不予干涉。
- 5、合作社不受工会法之支配。
- 6、合作社货物之运输，及帐目之追收，政府应予以保护及帮助。
- 7、合作社免向政府缴纳所得税。
- 8、合作社有向政府廉价承办没收来之工商业及农业之优先权。
- 9、合作社借贷买卖，及各种章程，分红办法，及办事人姓名报告政府登记。

闽西苏维埃政府工作报告大纲*

(一九三〇年九月二日)

这一报告是从“三·一八”政府成立后到现在五个月的工作概要，可以分为“政府策略路线与工作”及“政府组织与人员更动”两大段。

一、政府的策略路线与工作

闽西斗争在二年来长期奋斗中，到了“三·一八”政府成立时，已经有了八县的赤色区域、百万的赤色群众，反动势力大部消灭，武装有了七千多枪，红军成立了五团，人数三千多人。在这一环境之下，政府的策略路线，毫无疑问的是要向外扩大斗争，以推广赤色区域。但同时还要继续深入土地革命的斗争，以发动更广大的工农劳苦群众起来。这是政府工作总路线。兹分三个时期报告如下：

- * 这是邓子恢在闽西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大纲，当时他任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一九三〇年三月，闽西苏维埃政府成立以后，贯彻执行一九二九年七月在毛泽东亲自指导之下所召开的中共闽西“一大”所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绩。但由于李立三“左”倾路线的影响，闽西红十二军出击广东东江遭挫折，闽西人民革命曾受不少损失。

第一时期是向漳州发展时期——自“三·一八”到“五·一”。

A、这一时期国内的政治环境是：

(1) 蒋阎战争^[1]酝酿，福建张卢^[2]备战，闽西空虚，一般土劣灰心逃跑，闽西局面开展。

(2) CP 省委^[3]布置全省暴动。

(3) 闽西群众斗争情绪高涨。城市工人反商业资本斗争，青年妇女反封建的斗争，尤其是破迷信运动以及妇女争婚姻自由的斗争爆发于岩、杭、永、汀^[4]各县。

(4) 此时政府接受 CP 省委指示，确定向漳州发展路线。

B、这一时期工作是：

(1) 集中红军，统一指挥，向外发展（一、二团集中成立了二路军，打东方、打漳平、打永福得了胜利，突然扩大五团，集中向南靖边境进攻，四、五、六团成立三路军，向武北、杭西、汀西^[5]发展，也得了胜利）。

(2) 建立平和、漳平赤卫队。

(3) 整顿闽西医院，优待伤病兵。

(4) 进行周志群士兵运动。

(5) 实行劳工监督。

(6) 援助青年妇女争自由反迷信的斗争。

(7) 颁布土地法、山林法、借贷条例，开始反富农。

C、这一工作的结果是：岩东^[6]、永福、金丰反动势力削弱；红军壮大，漳州震动；汀杭连^[7]也有发展；反封建斗争及反商业资本斗争的确发动了工人青年妇女群众。

D、这一时期工作的缺点是：

(1) 扩大红军只靠打胜仗使群众高兴加入，少做宣传工作，而

且很多是指派；

(2) 扩大斗争口号没有宣传，没有打破群众的保守观念；

(3) 向漳州发展是站在冲破敌人经济封锁方面，而不是站在争取全国革命胜利观点上面，仍是变相的保守主义；

(4) 反富农口号没有宣传，没有发动贫农、雇农群众斗争，只凭政府法令自上而下地打击富农，结果促成富农的反攻；

(5) 工人监督资本的斗争只在龙岩进行，各县尚没有开始。

第二时期是向东江发展时期——自“五·一”到十二军在东江失败回来。

A、这一时期政治环境是：

(1) 蒋阎战争爆发，南方广西战争剧烈，东江空虚，福建战争开始。

(2) 全国革命高潮到了门前，CP中央^[8]布置夺取武汉广州政权，要闽西红军向东江发展，与两广群众夺取广州。

(3) 闽西红军相当扩大集中，士兵作战勇气提高。

(4) 群众受经济封锁表现消沉，农村富农动摇，开始活动，造谣中伤苏维埃。

(5) 商人怠工，商场冷落，工人失业。

(6) 下级政府多为富农把持，命令主义、腐化怠工，有脱离群众趋向。

B、这一时期的工作是：

(1) 接受 CP 中央指示调十二军全部入东江（先调二、三团，后调一团及四、五、六团）。

(2) 结束红军学校，加强十二军领导。

(3) 政府派巡视员及宣传队出发各县，深入扩大斗争的宣传，打破群众保守主义。

(4) 向商家筹款，并向工农募捐，援助全国工农斗争。

(5) 各县再成立红军二十军。

(6) 排除富农分子，整顿苏维埃。

(7) 取缔商人怠工，实行劳工监督，救济失业工人。

(8) 组织粮食调济局，向富农借款，调节米价，救济贫农。

C、这一时期工作结果是：

(1) 扩大斗争宣传普遍，群众保守主义相当打破，自动加入红军者日多，但尚有指派。

(2) 十二军全部入东江，但去得太慢，军事技术不好，遭了失败回来。

(3) 工农募捐援助全国斗争情绪热烈。

(4) 二十军成五纵队。

D、这一时期的缺点是：

(1) 到东江去不迅速，不先调主力军去，失了机会。

(2) 到东江去只是单纯军事行动，没有配合群众力量。

(3) 扩大红军少注意政治上教育与鼓动，使士兵自觉地加入，而侧重于优待士兵家属、改良生活及提高士兵地位等口号，促成士兵变相雇佣性与虚荣心的发展，种下了逃兵的主要原因。

(4) 十二军出发后，没有注意动员群众消灭团匪的斗争，致团匪乘虚扰乱赤区。

(5) 没有组织雇农工会，没有发动雇农贫农斗争，只提出反富农口号，反教富农准备向我们反攻。

(6) 粮食调济局原是救济贫民调济米价，但无雇农工会做中心，而且在雇农没有发动以前反使中农贫农受富农煽动而恐慌，有些调济局反为富农利用去打击中农贫农，破坏了农村阶级斗争的战线。

(7) 整理苏维埃排除富农分子，只凭调查，不从雇农工会着手，不从斗争中去使群众认识，自动起来开除他，结果是排不出去，而且越弄越糟。

(8) 救济失业工人只在经济上设法，没有领导失业工人参加斗争，提高政治水平，结果无法救济时反使工人失望。

第三时期是动员群众消灭团匪保护夏收，准备再入东江时期——自十二军回来到现在。

A、这一时期的政治环境是：

(1) 全国军阀混战延长扩大，由双方相持到了双方并倒的时期。

(2) 大城市工人斗争剧烈，农暴四起，红军扩大迭占名城。第一军团由汀城北上，逼近南昌，进攻武汉；三军团攻下长沙，包围武汉，快要夺取湘鄂赣政权，爆发全国革命高潮。

(3) 但在闽西却因为十二军在东江军事上失利，闽西反动势力走投无路，向我们作最后挣扎。张贞要参加军阀战争，因而采取以攻为守的计划，资助闽西团匪，组织两个五县民团向我们扰乱。

(4) 我们因为二十军组织不坚固，群众太平日久没有决死斗争精神，结果军事上受挫折，赤色区域受很大摧残，尤其是岩城失守，使我们政治上受很大损失。

(5) 富农越发厉害，在上把持政权威迫群众；在下活动造谣煽惑群众，使苏维埃更加脱离群众。

(6) 因为团匪摧残，商人怠工，物价高涨，同时水灾为祸，社会经济起了恐慌。

(7) 斗争不能扩大，红军给养浩大，政府财政日益困难，阻碍一切工作之进行。

(8) 群众怕当红军，情绪消沉，红军逃兵日益发展，扩大红军已经成了僵局。

B 这一时期的工作是：

(1) 动员群众与红军配合起来消灭团匪保护夏收，各区组织游击队暴动队，参加消灭团匪的斗争，在斗争中逐渐扩大红军，加强红军战斗力。

(2) 军事布置上要打下上杭城、适中，消灭主要敌人，提高群众勇气，再向漳州发展，准备大规模扩大红军，再入东江争取广州胜利。

(3) 组织雇农工会加深反富农斗争。

(4) 统一财政。

(5) 建立工农银行消灭高利贷，集中现金发展社会经济。

C 这一时期的缺点是：

(1) 消灭团匪的口号确已把群众动员起来，但只凭群众力量没有红军来配合，结果消灭团匪不了。

(2) 扩大红军口号使群众讨厌，客观上各处只是厉行指派或抽签，结果群众越发怕当红军，即使派来也是朝来夕去，闻枪就跑，养成娇兵，致有士兵威吓政府举动。

(3) 反富农变成打富农，没有发动雇农贫农为反富农的剥削而斗争，结果使群众误会以为苏维埃不容许人民有余钱存。

(4) 富农已积极动员向中农、贫农煽动，而雇农工会尚未组织起来；有些地方已经组织，却没有发动斗争。因此一般中农贫农受富农影响日益恐慌。

以上是政府五月来的工作与经验，以后应该如何，请大会根据目前环境与过去经验定出工作路线来。

二、政府组织与人员更动

A、政府组织是照第一次代表会决定的，现在增加一个劳动部，但粮食部已取消了。

B、政府主席因我最近担任军校工作改由张鼎丞同志负责，秘书长也改简祥明同志，其余财政部、裁判部、文化部、军事部等都因各同志另有工作数行更换。

C、政府人员工作最近比较组织化，但政府工作还觉得找不到中心，尤其是各部工作未有建立，政府尚不能成为领导群众斗争的政府，这是最大的缺陷。

D、最后希望代表会予以改选和纠正。

注 释

〔1〕 蒋阎战争指蒋介石与山西军阀阎锡山之间的军阀战争。

〔2〕 福建张卢指闽西军阀张贞与闽北军阀卢兴邦。

〔3〕 CP 省委指中共福建省委。

〔4〕 岩、杭、永、汀指龙岩、上杭、永定、长汀。

〔5〕 武北、杭西、汀西指武平以北、上杭以西、长汀以西。

〔6〕 岩东指龙岩以东。

〔7〕 汀杭连指长汀、上杭、连城。

〔8〕 CP 中央指中共中央。

发展粮食合作社，巩固苏区经济*

（一九三二年八月三十日）

一、粮食跌价与苏区经济

收获时米价大跌特跌，是两三年来苏区内的普遍现象，最厉害的是那些出米之地，如江西之赣县、万太、公略、永丰等县。现时每担谷子跌到二吊钱以下，折大洋还不够一块钱。福建永定之虎冈与龙岩之大、小池等地也跌到每块钱三斗零，折算大洋每担谷子，只得一块多钱。这种惊人的跌价，实在对苏区经济有很大的妨害。

第一，就是使雇农、贫农的生活恶化。据一般的估计，每担谷子并肥料要做七天人工。就照公略来说，以每天一毛钱工钱一毛钱伙食计算，每担谷子要一元四毛钱成本。而现在米出价还不够一块钱，农民每担谷子要蚀本五六毛钱；而到了青黄不接之秋，却又吃了贵米之亏（普通却比收获时贵二三倍），这样农民自然要受很大的损失，同时也就要影响到整个苏区经济的发展。

* 这是邓子恢就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财政部长后，深入调查了苏区粮食跌价、谷贱伤农的问题，为《红色中华》一九三二年八月第三十一期写的文章。

第二，是促成荒田的生长。因为耕田要蚀本，有些地方工钱超过与米价的对比，农民耕田划算不过，倒不如出去找工做赚钱来余米更好些。比如，前年秋收时龙岩大池之米价一块钱四斗，而工钱却每天高到一块钱，因此农民做十天工夫可余四十斗米，便已够一年粮食，这样农民当然不愿意多耕田，结果便促成荒田现象之发展。今年江西荒田之增长，虽然是受战争影响，劳动力与耕牛、农具之缺乏，但米谷跌价也确是主要原因之一。

第三，再一个现象便是青黄不接时发生粮食缺乏，米价飞涨。这个现象以今年为最，原因是：

（一）战争影响，白色恐怖的摧残，把谷子烧了好多，搬了好多。

（二）收获时米价大跌，不免输运出境，把苏区粮食扯不够了。

（三）商人、富农在收获时廉价收囤粮食，到了青黄不接之秋便来操纵市价。这个现象现时虽不很厉害，但将来一定要发展，特别是新生长的富农更敢大胆干此投机生意。如果我们没有法子调节米价，那么长此下去，将来苏区粮食的恐慌比去年还要更厉害。

第四，因此便影响到苏维埃的财政。因为农村生产减低，荒田增加，自然会减少税额收入。同时就谷价来说，如果一切税收谷子都照现时价格，那么收入至少要减到一半以上。如果再让他继续下去，便又影响到苏区整个经济与国家租税之收入，这样使政府财政感受极大的困难。

第五，但在另一方面却促成商人、富农的私人资本发展。他们不单收便宜谷祟贵米，得了很大利益，而且利用雇农、贫农的经济困难，仍然会用买贱卖贵的形式，操纵一切农产市场，从中剥削利润，使资本更加集中到私人手里，受其支配，这是使苏区在经济发展上最不利的。

二、粮食跌价的原因

我们看了上述五个现象，便可以说粮食跌价，是给予革命很大的不利，妨害了苏维埃运动的巩固与发展。调节苏区粮食价格，相当减少剪刀差现象的发展，是目前巩固与发展苏区的一个紧要工作。但是怎样调节这个现象呢？这首先就要了解粮食跌价的原因，固然在土地彻底分配以后余米的人大大减少了。有米出粜的却占百分之六七十，这是米谷跌价的原因，但这还是次要的。最主要的还是农民没有钱，在收获时农民要开发工钱，要买油，买盐，买菜，以至于买布做衣裳，项项要钱用。但是自己手里却没有钱，借又借不到，因此没有法子，只得把米谷忍痛出粜，再吃亏也顾不得了。个个农民如此，结果米谷市场上便供给超过需要，而形成价格之大跌特跌。

为什么农民没有钱呢？原因是：（一）土产销不出去，纸木停滞，农民只靠米谷生产，无别路可以赚钱；（二）地主、富农、商人把钱带走了，或私运出境，不走的埋藏起来，不肯拿出来流通；（三）农民中有些存款也各自保藏，没有借贷，因此资金分散了，不能集中起来，在社会上流通；（四）整个苏区入货多出货少，商人向外办货须带现金出境，因此现金日见减少，流通困难。

三、怎样救济这个现象

明了上述原因，我们便知道要调节苏区粮食价格，消灭剪刀差现象，根本办法是要向外发展苏维埃区域，争取工业中心城市，使工业品与农产品得以调节，现金得以流通。只有这样才能够使农民有工做，有钱用，而不至于便宜出粜米谷，这样才能解决粮食价格之特起特落。但在另一方面，对于目前救济的办法就当然

不是用苏维埃的命令限制米价可以办得到，相反的只有使米价越发狂跌（前年龙岩县苏限制米价不得跌到二斗以下，结果粃米者暗中私约，象卖膏药一样，卖二斗送二斗，竟跌到四斗以下）。这是因为限制米价并没有解决农民的用钱问题，只有使农民更加恐慌。同样的，公仓积谷的办法，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而不能起调节价格的作用。

过去闽西粮食调济局的办法，是由政府向富农筹一笔款子，用高价向贫农雇农籴谷，收谷子存储起来，到明年原价粃回农民。这个办法在当时有些地方是起了相当的调节作用，但其中有很多错误与缺点：（一）向新旧富农强迫借款，不仅所收无几，而且侵犯中农致引起中农恐慌；（二）只向贫农雇农籴谷，脱离了中农；（三）存储谷子，原价粃换农民，不能使资本积累，难于持久；（四）不是群众的力量来组织，只是由政府包办；（五）当时区乡政权多为富农所把持，富农却利用调剂局向中农借款，甚至借到贫农身上。因为有这些错误与缺点，所以闽西调剂局之设立，结果反引起群众之恐慌。但对于调节米价，当时办得好的地方，的确起了相当作用。

四、粮食合作社的作用

根据过去这些经验，我们现在想出一个办法，便是粮食合作社的办法。这个合作社是群众的经济组织，由中农、贫农、雇农群众自动入股，集中股本。向社员收买谷子，谷价要比市价高一些，收买来的谷子，存储到明年，又比市价便宜一点粃给社员，多余的则运往米价高的地方去卖，结算后赚得的钱，除留存公积金外，其余按照各社员所粃谷子多少为比例分配。这个办法有几点作用：

(一) 使社员谷子不到市场出粜，可以相当减少米价之跌落。
(二) 把谷子存储起来，可以维持苏区粮食，不致发生恐慌。
(三) 青黄不接之时，合作社低价粜米，可以相当限制米市之飞涨。

(四) 各社员便宜粜出贵价买入中，给合作社赚去的钱，可以分回来，便不致吃商人富农操纵之亏，而减少损失。

(五) 限制商人、富农商业资本之剥削与发展。

(六) 谷价提高了，增加政府税款之收入。

(七) 各乡有了合作社组织，随时有谷子储藏，遇到军事上需要，可以马上供给红军，不致军粮恐慌，影响战争。

从上述各种作用看来，粮食合作社在目前确是中农、贫农、雇农阶级抵抗商人、富农等商业资本剥削的经济组织，是土地革命斗争的深入与继续，是巩固与发展苏区的经济动员，在革命发展前途上说，是准备将来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一个基础，因此组织粮食合作社确是目前苏区革命群众的紧急任务。

五、怎样集中资金

组织粮食合作社的先决问题，就是怎样去集中资本。粮食合作社已是阶级斗争的经济组织，自然不容许商人、富农剥削分子加入，而粮食合作社比别种合作社又需要更大资本，但又不能向富农派借，那么便会有人怀疑：中农、贫农、雇农哪里来许多资本？这个问题确是严重问题。如果我们一下就想集中很多资本，来担任调节粮食的任务，那确是没有办法的，但是我们可以从长远一点来计划，不要一下子就要集中很多资本，而可以采取分期的办法。假如我们规定每股股金为大洋一元，第一期招募一百股，收款一百元，太少了不够，那么我们再计划第二期，不够又计划第

三期，如此一直到四、五期，六、七期以致十几期。假定每期相隔二个月，那么一年之间，我们可以招募到六期，两年可以招募到十二期，把这十几期合算起来，资本就不少了，所以我们总要继续努力，那么一年之后，各乡粮食合作社便有很大的资本，可以操纵粮食的市场，形成农村中极大的经济势力。

还有一点，合作社如果募集有相当资本，处理得好，信用昭著，那么还可以吸收零星的私人资本，把泛散的资本集中起来。国家银行有这些合作社做基础，也可以拿出一批放款借给合作社，这样便更增加合作社的活动。这里要注意的，就是合作社是一种阶级斗争的经济组织，所以一定要形成一种运动，绝对不可有丝毫的命令、强迫的行为，主要是从宣传鼓动工作去动员群众自动来入股，要使每个群众都彻底了解米谷跌价的吃亏，跌价的原因，粮食合作社的作用与必要，只有使革命阶级的群众彻底了解，发动了群众的热情与兴趣，那么再大的资本都不难集中。我们只看苏联五年计划八百万万的资本，不到四年就集中起来，便可看出群众的力量是如何伟大而惊人！

六、怎样动员群众

因此怎样动员群众，成了我们组织合作社的中心问题。我们必须整个动员到群众中去，由上而下一级一级地推动下去，自县主席联席会、区联席会、乡代表会以致雇农工会、贫农团大会，一直到选民大会到处都派人做报告，发展他们的讨论。其他工会、党团、少先队等，也同样自上而下的去动员，要使整个苏区造成一种浓厚的空气，造成一种“凡是一个革命同志都要加入合作社”的空气，在这种空气中，我们便发起组织合作社，选出筹备人员来征求社员，然后再由社员开会，选举办事人来收集股金，开始营

业。这里要注意的是办事人，一定要选择忠实可靠活动分子，合作社帐目一定要清白，要使群众加入合作社，的确得到利益，才能更加鼓起群众的信心与兴趣而促成合作社的发展。

同志们！一致动员起来！普遍发展粮食合作社的组织！维持后方粮食，从经济上加强苏区之巩固与发展！抵制商人富农之投机与剥削！为争取全中国苏维埃革命胜利与工农阶级的彻底解放而斗争！

目前各级财政部门的中心工作*

(一九三二年九月十三日)

财政是国家的命脉，财政工作不好，直接影响到军事与行政，间接则影响到整个社会经济与整个阶级政权。过去各级政府一般忽视财政工作，收支没有预算，税收制度没有建立，各处乱打土豪，贪污浪费，会计糊涂。特别是财政部本身工作没有建立，财政部长日常只做些管帐管钱的会计工作，因此一般政府财政不能独立，只依靠打土豪，依靠红军筹款过活。这些财政上坏的现象，充分证明各级政府不了解财政工作，在阶级政权上的重要作用。

目前全国革命急剧发展，国民党统治日益崩溃，中央政府正在动员一切力量，执行全线进攻，以粉碎敌人四次“围剿”，争取江西革命首先胜利。在这个时候加紧财政工作，转变过去依靠红军筹款的路线，做到政府供给红军战费，使前方部队解除筹款任务，迅速进攻敌人，更快争取中心城市，以发展革命新的局面，是目前财政工作的总的任务。谁仍然忽视财政工作，仍然不转变过去的错误的路线，客观上便是妨害了革命战争之发展，便是帮助了革命的敌人。

* 这是邓子恢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财政部部长身份发布的《中央财政委员会训令第六号》。

怎样转变这一路线，来实现政府供给红军战费，以发展革命战争呢？这首先就要统一财政收支，建立财政系统。过去各级政府各自为政，私打土豪，私自开支，有些地方区政府一个月用到一万元，乡政府用到几千元之多。下级埋伏短报，上级提款不动，各地财政收支也不照系统，少先队，独立团，游击队，以及过境红军都可以自由向当地政府提款，政府也不拒绝。这样必然就会发生贪污浪费的现象，把政府财政大部分用到无用之地，而红军军费反而无着，需要自己筹款，因而影响到战争。这完全是财政不统一的结果，所以现在要做到政府供给红军，首先就要把财政统一起来，各级政府必须按照中央颁布之财政条例，坚决执行。不按照财政系统，依照财政手续，无论任何机关，都不准给一个钱。对于随便提款及随便付款者必须予以严厉处分，并令其立刻交割清楚。各级政府以后必须采用新式簿记，实行预算决算，并须每月审查帐目，对于下级存款必须随时清查提取，随时检查贪污浪费。只有把这些现象办清，财政才能统一起来，由中央有计划地作整个支配，这样才能把一切不必用的用费节省起来，抽出大批款子供给红军作战，这是目前财政部第一个中心工作。

第二就要建立和整顿税收制度。过去各地政府一般只征收土地税，至于商业税工业税一般都没有提起，特别是江西各县连土地税都没有开征。这样政府财政没有经常收入，必然只有靠打土豪过活，结果那些老区域土豪打光了的便到商人中农人身来，致破坏国家经济政策，这简直是自杀的财政政策。这种错误观念的来源，是由于不了解税收在财政上的经常作用。因此，一直到了现在，各级政府还普遍地忽视税收工作，这便使政府财政收入感到极大困难。这种现象现在无论如何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各级财政部必须从今天起把各种租税，如土地税、商业税、店租、矿产

租金，及以后中央所颁布的各种租税等限期整理，按月征收，将款报解中央，以裕国库收入。特别要注意到的就是怎样使租税额增收快缴，怎样消灭减报漏税舞弊现象，怎样开发新的租税来源，怎样取得工农群众的拥护与帮助。各级财政部长必须经常有计划地去调查各地实际情形，督促和指导各种税收人员工作，这样才能实际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

第三个中心工作是要积极进行打土豪筹款工作，在目前苏区还停留在农村未取得工业中心城市以前，租税收入不足供应开支，打土豪筹款还是目前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我们在老苏区固然不能靠打土豪过活，而忽视税收，但又不能籍口税收而放弃筹款工作。特别是目前苏区工业品输入与农产品输出价值不能相抵，大量现金流出，影响市面交易极大。在这种经济状况之下，我们必须组织游击队向外发展新苏区，吸收大批现款，以弥补苏区现金流出现象，使社会经济不致停滞，而影响到整个财政收入。另一方面，在工作不好的苏区，一般地主土豪还逍遥自在，我们必须重新发动群众斗争，向这些土豪进攻，筹得一笔大款，以增加政府财政收入。

第四个中心工作是要领导群众进行节省运动。这在财政上有很重大意义。就以政府机关及各军队各团体人数，假定十万人来说：每人每天最少节省一个铜板，那么每天就可节省十万个，一个月可节省三百万，折大洋可得一万元。如果将这个运动扩大到整个苏区群众中去，“每人每天至少节省一个铜板帮助红军作战”，那么以中央区三百万群众计算，一个月所得就有三十万元，这个数目厉害不厉害？各级政府必须了解这个意义，领导群众发展节省运动，特别在各机关各部队中，一切用费如洋油、洋火、纸张，及一切日常用品，必须有计划地减少用途，节省用量。对于滥用浪

费分子，须给以严厉的打击。这些工作主要是要领导士兵及工作人员自动节省，必须使他们了解节省意义，这一工作才能作得好。

第五个中心工作是要建立和发展合作社组织。目前苏区的农民虽然普遍分得了土地，彻底取消了田租高利贷等半封建剥削，但因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恐慌，国民党、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致农产品跌价，外来工业品涨价，形成极严重的剪刀差现象。这样农民仍然受了很大的剥削，而过着贫苦的生活，因此农村中便仍然免不了高利贷的潜滋暗长，特别是商业资本操纵农产品市场，买贱卖贵，利市数倍，实质上仍然带着高利贷性质。这种结果，便日益促成商人富农私人资本之发展，使资本日益集中到他们手里，受其支配。这便给予苏区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以极大不利，而其结果更必然影响到整个政府财政。合作社是工农阶级抵抗私人资本剥削的经济组织，是目前相当调节剪刀差现象的有力工具，是银行发展营业的阶级经济基础。各级财政部必须尽量指导和帮助各种合作社组织，目前特别要帮助粮食、消费、生产等合作社之建立与发展，合作社普遍发展了，相当调剂了剪刀差现象，减少了群众的贫困，政府税收以及整个财政之调节，自然要日益处于有利地位。

第六个中心工作是要正确执行国家经济政策。各级财政部必须严厉执行经济政策，目前首先就要检查一般商人以及作坊工厂主有无怠工，高抬市价，及破坏国币⁽¹⁾等行动。但同时也须注意检查各地政府有无破坏经济政策的行为，如胡乱没收商店，乱打土豪，限制市价，随便禁止出口等。如发现这些行为，必须予以严厉纠正或处分。在目前经济封锁日益厉害的时候，财政部要经常注意鼓动合作社和当地商人设法贩运日用必需品，如洋油，食盐，洋火，棉花，布疋，药材等之输入，与内地农产品，如纸，木，烟，茶油，钨沙，煤炭等之输出，以维持苏区的社会经济。再则

关于货币之流通，各地铜元价格起跌之规定等，亦须随时注意。特别是国家银行所发行的钞票与银币必须鼓动群众使用，禁止奸商破坏，使它在市面上迅速建立巩固的信用基础。这样使银行货币，逐渐代替了旧时货币，把旧时不统一的货币，驱逐出去，使苏区货币在国家银行货币之下统一起来，到处流通，一方面资助商业买卖之发展，另一方面则防止苏区现金之流出（因为国币在白区不通用）。此外尚须帮助银行营业，鼓动群众合作社向银行存款，使银行资本浩大起来，转来帮助整个社会经济与财政发展。

第七个中心工作是要健全各级财政部组织，建立财政部本身工作。要执行上述各种工作，必须各级财政部有健全的组织与科学的分工，各级政府必须依照中央颁布财政部组织纲要，调足人员，健全财政部组织，实行分工，这样一切工作才能分头进行，财政出入也不致于发生舞弊，这是先决问题，各级政府必须纠正过去无人可调无办法的消极观念，要站在整个立场上坚决向下级调人，并应多方吸收失业工人店员，并可引用写算俱佳的产业商人、知识分子及女同志等专门技术人才。只有坚决调足人员，才能建立财政部本身工作。特别是县苏维埃这一级必须马上健全起来，纠正过去财政部长自己管帐的现象，各级财政部长必须将技术工作分给各科去做，自己要注意到财政全部一般中心工作之执行。财政部工作会议要按时开会，要在会议上来推动一切工作，检查一切工作，改进一切工作。只有在健全组织和集体分工的财政部之下，财政工作才能建立起来。

第八个中心工作便是培养干部，创造财政人才，不但要找一批人才补充现各级财政部，而且要搜集大批人才，准备占领大城市时去建立财政工作。这并不是将来的，而是摆在我们眼前的事，如果我们不马上准备，那么到了大城市时，我们简直没有办法应

付。因此除中央经常开办各种财政训练班外，各省县政府也须自己训练人才，最好是调来实习，虽然教不出十分的人才，但总聊胜于无，特别是各级财政部各科负责人员，必须时刻找到替人，准备上级调动，不能找得个好角，便自满自足，不再准备替人，致上级调动时，籍口工作关系，拒绝命令。

同志们：红军飞快的进展，财政开支日益浩大，我们必须跟着这一发展来加紧我们的财政工作，我们要用很大力量，来执行上述各项中心工作，才能使国家财政收入，供应日益浩大的开支，使军事行动更迅速更顺利的向前发展，来实现江西首先胜利的局面。重大的责任放在我们肩上，望一切财政工作同志以及一切政府工作人员，一致动员起来，为实现财政部目前中心工作而奋斗！

注 释

〔1〕 国币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行的货币。

在统一战线中 闽西南党内的几个错误倾向*

(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日)

闽西南党在接到中央指示^{〔1〕}之后，大胆的运用抗日讨蒋的统一战线策略，提出了争取白军部队为现成的抗日讨蒋的武装，争取民团、壮丁队、土匪为现成的抗日讨蒋游击队，争取白色堡垒，争取保甲长为我们的保甲长等口号，具体的指示党在白军、土匪、壮丁队及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中的工作方针和工作方法。这几个月来，由于各地方各部队党灵活的运用学习，不论在争取土匪，争取民团壮丁队，争取保甲长，联络生产党^{〔2〕}各种工作都得到了不少成绩，就在白军中工作也开始得到部分胜利，正因为如此，党便能争取闽西南新的革命力量，配合红军抗日讨蒋军的胜利，更大的创造闽西南目前新的开展局面。这些事实就完全证明中央对于中国革命新的阶级变动新的革命力量估计的正确，无疑的闽西南党有了这些初步经验以后，如果能够更大胆的组织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来使用一切新的力量，那么，闽西南更伟大的胜利局面，马上就要跟着全国抗日反蒋战争新的开展而开展起来。

虽然如此，各地方各部队党在运用统一战线策略中，还是发

* 这是邓子恢为《红旗》一九三六年六月第二期写的文章。

现了不少错误倾向。这些错误都是基本的错误，如不立刻纠正过来，结果不仅障碍了统一战线的进行，而且会使党的统一战线走入严重的失败。详细指出这些错误倾向，给予及时的纠正，是开展闽西南抗日讨蒋战争的重要条件。这些错误倾向表现在哪里呢？

（一）首先是狭隘的关门主义。有些同志还不了解在目前中国的民族危机与经济毁灭的条件下，“中国阶级力量已起了新的变动”，“中国革命的基础已大大扩展了”，不了解今天“在抗日反蒋的革命洪流中参加者不仅有工农群众，而且有广大的小资产阶级、学生、商人、知识分子，甚至一部分地主资产阶级来参加”。正因为如此，所以他们对这些新的力量还存在着害怕心理。如抚市黄豺狗^[3]去年被蒋介石打击，把他家产没收，全家杀光了，他带着几十个人出来拚山子，几次派人找红军。此次找到了抚市工作团，要我们派人去指导，当时抚市工作团及永东县委马发贤同志都不敢前去，硬怕他反复无常为他所诱。结果我们一个交通同志，自告奋勇，代表红军前去接头，竟受了黄豺狗无任的欢迎，建立了彼此的联系，这就证明狭隘的关门主义者估计的破产。

关门主义特别表现于白军工作，一般同志还存在着害怕白军的心理，因而不敢去接近白军，停止白军工作的进行。其实目前的白军官兵对抗日反蒋情绪是普遍的高涨着，我们单看卅七旅就知道，前次象山堡垒一班人，几次派人来找红军，最后一次找到了，与我们同志结拜兄弟，那天晚上便立刻要我们去缴枪，结果他们举行暴动杀死了排长，把六条步枪，一条驳壳、八个手榴弹搬出来，四个人投到红军中来。这些过来的士兵对我们说，卅七旅士兵一半是过去十九路军参加过上海抗日战争^[4]，后被蒋介石强迫编来的，有三分之一是参加闽东红军，分过了田，后被强迫编入壮丁队，强迫收编去的。他们现在已经四个月没有关饷，五

十天无伙食钱分，每天只吃两餐饭一盆菜，官长连长以上多是法西斯蒂派去的，束缚非常厉害。所以他们不过来当红军，就要开小差。这些事实就证明白军官兵中如何增长着革命情绪，他们如何迫切要求革命。不打破关门主义，忽视白军工作，不仅是错误而且是罪过。

关门主义的另一表现，便是不了解在抗日反蒋反法西斯蒂反捐税等口号之下去与一切阶级一切党派一切团体和个人建立联合战线，这样来推动群众斗争与游击战争更大的开展。这里特别在白军工作中表现得明显。今天我们在白军中的工作，还只限于“争取白军士兵到红军中来”的口号，而没有更宽广的提出抗日反蒋反法西斯蒂的口号去争取白军士兵和中下级官长，举行抗日反蒋哗变，进行抗日救国工作或与红军联合抗日反蒋等，这同样是狭隘的关门主义。固然在目前我们争取白军“到红军中来”的口号，是有着伟大的意义而且可能，但我们必须了解在今天争取整个白军来抗日反蒋，比“争取白军到红军中来”的口号便能更顺利地去争取更广大更多的白军官兵到革命方面来，这些抗日反蒋的白军将来极大部分也要走上红军的道路。正因为我们同志不了解这一口号，所以我们便不能更广大的去得到统一战线的收获。

（二）在进行统一战线中第二个错误倾向，就是不了解我们统一战线的任务，是要把一切新的力量使用到抗日反蒋革命方面来，这样来配合红军配合群众斗争，使我们更快的来粉碎日本走狗的清剿，创造对日作战根据地，实行直接抗日作战，以完成武装保卫福建的历史任务。我们统一战线的目的就在这里。但我们有些同志却不懂得使用这个力量，如南漳县和溪区委对营浦的自卫军不去使用他来打击民团收捐队，也不使用他配合群众分粮斗争，却专门去教他如何打土豪，如何不抢工农群众，如何去造信仰，甚

至于想替他发宣言，想把他变成当地真正有群众信仰的领袖，这完全是忘记了自己的目的。当然，为了要使我们的友军发挥其才能智力，我们需要有友谊的批评态度，帮助友军进步，但我们决不能忘记自己的目的。

（三）在进行统一战线中第三个错误倾向，是对生产党的发展表现害怕，如永东党看到生产党武装发展很快，便发生这样的疑问，“如果生产党武装再发展下去，他的力量要超过我们，那时候怎么办？”由这个疑问便产生不敢联络生产党的结论。这种观点的产生，第一，是由于没有看清楚在目前抗日反蒋的阶段上，生产党为了抗日反蒋，而他的力量马上就要解体。第二，他们没有看清楚在整个革命发展之下，生产党武装的发展决不会超过我们的发展，而且就在生产党所领导的群众，只要我们坚决领导抗日战争，领导土地革命，将来一定更便利于我们的争取，争取他们到彻底抗日反蒋的红军苏维埃的道路上来。因此目前生产党武装的发展不是妨害革命乃是有利于革命。我们不要害怕他的发展而怕去联络他，相反的，我们正要帮助他保存有生力量，来加强抗日反蒋战线上的力量。当然，这里我们自己的扩大与发展更是我们工作的第一位。

（四）统一战线中第四个错误倾向，是投降政策。这种投降政策不是站在工农基本群众的利益去与一切友军联合战线，反是牺牲了工农阶级的利益去与其他阶级妥协。如南漳县岭下区委认为要与小地主小富农联络，便不敢发动分粮斗争，反而怪骂南福区委到他那里去打土豪；又如永东龙潭区工作团减少土豪罚款，表示与土豪联合战线；再如杭代县委^[5]与某区联络后，该区长抓了我们的游击组组长当土匪办，杭代县委也表示同意。虽然这个组员据说被捕后招出了许多人，但这只可要他释放后当叛徒办，而不

能让他当土匪办，因为这样是打击了我们游击组的发展。这里没有看到杭代县委对他们提出任何抗议，反而认为他以前做了土匪，而同意他拿去枪毙，这完全是露骨的投降政策。投降政策的另一表现，便是只顾与对方联络，而不注意在联络成功后环境更好底下来进行我们的工作，来发动群众的斗争，从斗争中把群众争取到我们方面来。如龙岩有许多地方在联络成功之后，反而没有斗争，没有开展工作。这完全是离开了工农基本群众的利益，去向敌人投降。这种投降政策不改变，不仅不能开展统一战线来加强革命力量，结果反而要破坏统一战线，断送革命。

（五）在与土匪进行统一战线中，我们要坚决站在争取工农群众的观点上，但也不能走到另一偏向，放弃对土匪群众的争取，因为在目前争取土匪来参加抗日反蒋，正是为着工农群众更远大的利益。此次龙岩独立营为了争取岩东群众，消灭岩东抢劫民众勾结民团的反革命土匪江根秀，得到了龙岩东北方广大群众的拥护，这是绝对正确的，这正表现龙岩独立营真正为着工农群众利益而奋斗的精神。但是消灭这一反革命土匪之后，很久没有出布告宣布罪状，致使部分土匪发生恐慌，这就是只顾争取基本群众，而忽视土匪群众的争取，这还是不懂得统一战线在目前抗日反蒋中的重要意义。

（六）最后在统一战线中还表现出缺乏高度的阶级警觉性。认为经过联合战线的友军就是同志了，因此，放松了自己的防备，甚至将自己组织泄漏给他，这是由于没有懂得我们与一切阶级政党团体统一战线，只是在抗日反蒋口号之下。然而我们是不会放弃土地革命的，在阶级斗争深入的时候，与我们统一战线的友军便有可能转变成为我们的敌人。列宁说：我们提防友军要如提防敌人一样。如果在统一战线中我们毫无警觉，那么将来会使我们受

到危险。这里杭代党对钟少奎^{〔6〕}的幻想,企图拉拢钟少奎,这同样不了解钟少奎是杭代的统治者。我们要争取代英与新汀杭苏区首先恢复,首先就与钟少奎发生利害冲突,因此,钟少奎部下可以争取,钟少奎决不能争取,这是很明显的,杭代党必须放去这一幻想,才能真正开展在钟少奎部队中统一战线的进行。

注 释

- 〔1〕 中央指示指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在陕西省安定县瓦窑堡开始举行政治局会议。二十五日,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会后,毛泽东于二十七日在党的活动分子会上又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地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
- 〔2〕 生产党全称为生产人民党,是三十年代初期主要由国民党内反蒋的爱国将领和民主人士组成的反蒋抗日的政党,主要领导人有陈铭枢、李济深、蔡廷锴等。该党在政治上要求反帝反封建,打倒军阀,推翻国民党统治,给人民以自由;经济上主张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发展民族经济。
- 〔3〕 黄豺狗即黄太胜,是永定县抚市乡的土匪头目,其部队后接受改编为闽西南抗日讨蒋军二十三大队。
- 〔4〕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当时驻防上海一带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的抗日高潮的推动下奋起抗战。
- 〔5〕 杭代县委系一九三五年六月由上杭南路的代英县军政委员会与上杭县军政委员会合并而成。
- 〔6〕 钟少奎即钟绍葵,是武平县的土匪头目,其部队于一九三四年被收编为国民党福建省保安十四团,一九三五年二月间,在长汀县水口镇包围袭击我福建省委武装护送队,致何叔衡牺牲,瞿秋白被捕,后牺牲。

新四军怎样做政治工作*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

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和它的目的

项英副军长及各位要我报告新四军的政治工作，因为袁国平主任到了江南前线去，我只作一个简短的报告。

首先说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我们认为，政治工作是军队的生命线，没有它不仅部队不能胜利，而且不能生存，尤其在目前的抗日战争中，政治工作更加重要。因为“战争的胜负不仅决定于武器的优劣，而主要的是决定于人的因素”，所以政治工作就是要用宣传鼓动、教育、说服推动的方法，来动员一切人力，有决心、有信心地去进行战争，克服一切困难以达到最后的胜利。在目前抗日战争中，我们武器不如人，我们要能够战胜敌人，取得最后胜利，这就需要官兵团结、军民团结一致奋斗的人的条件。同时要能促成敌人的兵心动摇，厌战，反战。这就需要有充分的政治工作。

* 这是邓子恢在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欢迎上海民众慰劳团座谈会上的报告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七部分。

我们政治工作的总的目的，就是要从政治上来保证战争的胜利与军事任务的完成。如果把它分开来说，就是：一、巩固部队，加强部队战斗力，保证每一战斗的胜利；二、团结广大的民众来帮助和配合部队的作战，使敌人孤立；三、从政治上瓦解敌军，减弱其战斗力，以便利我军事上获取更多的胜利，同时减少我们的伤亡。一切部队政治工作的目的就是如此。新四军的政治工作目的也是如此。现在我分做几点来说我们新四军的政治工作。

这里我们很抱愧，直到现在我们的政治工作还是未能达到应有的要求。这也有其客观原因，正如刚才项英副军长所说，我们的部队是南方八省游击队编成的，在过去三年间，因为散处各地，政治工作不能得到总的领导。今年四月间在岩寺^{〔1〕}集中后，军政治部及全军的政工组织系统刚刚成立，但不久又开往前线，一直到现在还是小部队分散游击，我们政治干部工作能力又比较差，这是本军政治工作未能达到应有要求的原因。虽然如此，但我们可以告诉各位，我们的政治工作现在已经建立起一般的规模而且有了相当坚固的基础。这是因为本军存在着与其他军队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是：一、本军一切指战员都不是勉强强迫，而是自愿来的。大家都是为着抗日救国救自己，而不是为着几块钱“薪饷”。二、本军战士大部分经过长期斗争，干部一般都是老干部，大家在过去都经过政治工作的生活，对于政治工作重要性，都能认识，对于政工人员都知道尊重。有此两个特点，就便于我们政治工作的进行和工作成绩的获得。

新四军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

这个任务是根据政治上的目的而来的，就是说我们在部队中

一切政治工作是为了“巩固部队和加强部队战斗力，保证每一战斗的胜利与上级赋予我军任务的完成”。因此，我们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就是：

一、保持和发扬我军固有的优点，这是巩固部队加强部队战斗力以取得胜利的基本条件。所谓优点是：（一）官兵平等上下亲爱团结；（二）有顽强不屈、果敢牺牲的精神；（三）全体指战员吃得苦耐得劳；（四）灵活的游击战术；（五）尊重政治工作制度；（六）能爱护民众与民众打成一片。上述各点，就是本军在长期斗争中所养成的优良传统，本军过去在最困难的环境中能保存到现在，就是依靠这些传统，现在江南游击能得此初步胜利也正是依靠这些传统，今后更要把它发扬起来，使它成为全军一致遵守的优良作风。

二、深入政治教育。（一）加强部队的民族意识，激发抗敌情绪，坚定抗敌意志。（二）认清持久战的意义，提高胜利的信心，准备迎接困难，克服困难。（三）加强统一战线教育，提高拥护政府，拥护蒋委员长的热诚与各党派各友军各阶层坚固团结，克服过去内战时代的狭隘观点。这是我们进行政治教育的几个基本方针。这一教育进行的结果，使我们部队更加具有抗日的决心，团结的意志，胜利的信心。

三、不断进行文化娱乐工作，提高部队文化水准，消灭文盲帮助政治教育更顺利进行。同时从识字运动中，从各种活泼的娱乐中来消灭战士的疲劳，提高战士的情绪，并从这些运动中灌输政治教育，达到政治水准的提高。这一点，在我们部队中也获得了相当成绩。比如识字运动，现在我们已经没有一个人不识字的，识字五十个至一百个以上的，占百分之七十以上。此外打球、爬山等活动更是每天进行。

四、保证每一军事计划、工作计划与战斗任务之完成。上面所说的政治教育与文化教育等，是比较长期性的基本的政治工作。而要完成部队中当前的军事计划与工作计划、战斗任务，这还需要临时性的、应急性的、宣传鼓动性的政治工作。比如在作战以前，政治工作人员就要向战士们说明这一战斗的意义，敌人的数量和他们的优点缺点，我们胜利的条件，战斗中应该注意的哪几点等。要这样在部队中进行解释，鼓动提高战斗情绪，克服个别动摇，才能保证战斗之胜利。又如此次我们为了学习上海同胞的奋斗精神，为了准备日后更困难的战争环境，我们发起一个全军节约运动。除了军部用命令规定各种用费制度以外，我们就从各方面来进行政治工作。比如我们先请项英副军长做了一篇号召节约运动的文章，在《抗敌报》上发表，由军政治部发了一个训令，召集了军一级各部首长及指导员会议，讨论如何来执行军部这个命令。各部首长和指导员回去后又分别召集部务会议，科务会议，更具体讨论，并经各级俱乐部救亡室等系统，召集了直属部队的节约晚会及各个单位的救亡室军人大会，进行宣传解释，发动全体指战员响应这一运动。此外，还在《抗敌报》及各个救亡室的墙报上发动大家做文章，登载各单位关于节省办法、具体决定，和某些浪费现象的应该改正，某单位的工作精神可为全军模范、大家应该向它学习等。经过这些动员，现在军一级的节约运动已经开展起来了，各种用费大大地节约下来，减低零用费，大家都喜欢情愿。并且有些自动要求减少特别津贴的，如服务团员，就全体通过从每月津贴五元减少到三元。此外还有很多要求减津贴的。现在还要定期俭约，求得节约运动更加开展并扩大到全军大众。从这里就可以看到，政治工作对于某一工作、某一战斗任务之完成，具有何等重要的作用。

五、克服不正确的倾向。政治工作还要不断与部队中一切不正确倾向作斗争。我们知道每一种错误行动以至罪恶行为，开始都是由于认识不正确。这种不正确观点开始只是一种倾向，如不加以纠正，以后便要逐渐变成一种错误和罪恶行为，给部队以或多或少的危害。政治工作就要在这种不正确倾向开始发现时，就估计其产生根源及危险性，能够见微知几，而随时加以克服和纠正，免使部队将来受到危害。比如我们的部队在开始接受三战区司令长官⁽²⁾给我们任务开赴江南前线时，曾有个别干部表现对敌人飞机大炮、坦克车之害怕，表现对平地战及湖沼地区作战无把握。这种观点当时只是个别干部表现出来，但我们估计到这是一个严重的危险倾向，不克服这个倾向，我们部队不但不能胜利，而且很危险。因此，我们就着重解释这个问题，在干部中在一般战士中讨论这个问题，答复他们的怀疑。并把这些解释写成训令，在报纸上、墙报上做文章，提出“打破害怕敌人的怯弱心理”、“学习打平地战经验”、“坚定胜利信心”、“让敌人的飞机、大炮在我们面前失其作用”等口号。经过这种工作，克服了这一个倾向，我们的部队便勇敢地开往前线，而且取得了不断的胜利。但是过了一个时期，由于胜利，部队又产生一种大意和轻敌的观念，这同样是很危险的。因此，我们又与这种倾向作斗争，把它克服过来。所以这种反倾向斗争，是保证政治工作实施，保证部队巩固和胜利的重要条件。

怎样实现政治工作的任务

上述五点是在部队中政治工作的任务，现在要谈实现这些任务的工作方法和方式。

一、我们在部队中进行政治工作最基本的方法是上政治课，除了行军、作战、星期日及特殊情况以外，一般战士都是以连为单位上政治课，教材由军政治部编好印发。这些教材有的是按照部队基本教育需要编好的读本，有的是依据临时发生的事件，如武汉失陷后的抗战形势及蒋委员长告国民书^{〔3〕}等编成教材。

二、进行会议教育，如活动分子会议、军人大会、小组讨论会等，由首长作报告或进行分组讨论。

三、上识字课，以连为单位，按照战士识字程度分为两班或三班每日进行。

四、救亡室活动。救亡室每一个伙食单位都有一个，由指战员参加，并用选举方式选出救亡室委员会。下分读报组、墙报组、识字组、军事或政治研究组、打球队等，可以说是部队中的学校。救亡室每个礼拜六都要举行晚会，进行政治问答，演讲比赛或演剧等。

五、集体游戏。以连为单位，于每天晚饭后，由连长、指导员率领全体战士进行各种游戏。

六、剧团活动。除军服务团有一个剧团外，团、营也有剧团组织，表演与部队有关的戏剧和歌舞等。

七、报纸。军政治部印行《抗敌报》，登载抗战消息及反映部队情形，供给全军阅读。

八、文件指示。如训令，指令，小册子及指示信等。

九、早晚点名讲话。由连指导员每晚于点名时进行，传达一般日常生活事情，指出当天工作优缺点和倾向等。

十、在每次行军、战斗或某一工作计划进行后，分组检查，得出经验教训，由首长作总结。这是最实际最有效的教育方法。

十一、政治工作人员除了运用上述各种方式来进行政治工作

以外，尤须自身以身作则，身先士卒，与士兵同甘苦，用自己的模范行动来影响全体指战员，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如果政治工作人员只能说而不能行，那末大家一定笑你是“卖假膏药”的，这样便不能收到好的效果。

十二、此外，政治工作常常利用执行纪律的机会来进行教育。对于那些犯严重错误或者犯了错误而不肯纠正的分子，只有以纪律来制裁。但我们在执行纪律时，不是简单的给予处罚就算完事，而且要利用这些机会来召集一个军人大会或举行公审，把他的错误或罪状宣布，让大家发表意见，来批评他，指斥他，与他斗争，最后由首长做结论。这样一方面给犯错误者以猛省，另一方面就教育了大家，使以后不会发生同样的错误。这也是最好的教育方法，常常一个斗争会议比几次首长报告的收效还要大些。

新四军的政治纪律和经济制度

这里我要附带报告一下本军三种纪律的内容：

第一种是三大纪律，即政治纪律。内容是：（一）坚决抗日救国，（二）服从命令听指挥，（三）爱护老百姓。

第二种是六大要求，即营内纪律。内容是：（一）保护武器，（二）爱惜公物，（三）遵守时间，（四）动作迅速，（五）整齐清洁，（六）讲究礼节。

第三种是十项注意，即民众纪律。内容是：（一）上门板捆稻草（在民家借宿时用），（二）地下扫净，（三）说话要和气，（四）买卖要公平，（五）借物要送还，（六）损失要赔偿，（七）大小便要上厕所，（八）洗澡要避开女人，（九）进出要宣传，（十）不杀害俘虏兵。

这些纪律的实施，不是依靠惩办与处罚，而主要是依靠于政治上的宣传说服教育工作，使大家知道为什么应当遵守这些纪律，守纪律有什么好处，如何来执行等。这样使大家自愿自觉的来遵守纪律，不但自己遵守，还要去规劝别人遵守。所以在我们队伍中根本不需要打屁股打军棍的肉刑，而且连打骂都在禁止之列。因为我们无论官兵都是自愿来抗日的，大家都是同志，政治上一律平等，彼此都应互相尊重其人格，不应打骂人，侮辱人。在我们队伍中如果哪个首长发生打人骂人的事，那么立刻要发生重大的问题。间或有些连长、指导员甚至营一级的干部，犯打人、骂人的错误，但军部则不留情的予以纠正，甚至施行撤职的处分。

本军的经济制度，也附带向诸位说一说。刚才项英副军长已说过，因为本军的经费不多，同时大家也愿意维持过去的制度，本军一切指战员都不发薪饷。全军指战员，一律每月只发零用费，至多四元，至少二元，每人每天只发一角菜钱，一斤八两米^④。但这些米、菜钱，部队发给后，就完全交给各连指导员去处理，负责的当然是事务长，但权限却操在各连的伙食委员会（又称为经济协助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救亡室大会选举出来，有权改良伙食、清查伙食帐、检查贪污，每五天结算一次，帐目公布。因为有此民主的监察制度，本军的事务长就很难措油，所以虽然菜钱不多，但每天的伙食却并不坏。

新四军的政治工作机关

最后，我要说到新四军政治工作的组织。军政治部分宣传教育、组织、民运、敌军工作四部，分工是：（一）宣传教育部管理宣传教育文化娱乐事宜，（二）组织部管理干部之审查分配事宜，

（三）民运部管理动员民众组织民众等事宜，（四）敌工部管理对敌军之宣传等项事宜。这是新四军政治工作所依以进行的机构。但要求得政治工作的彻底执行，还须依靠全体指战员，尤其依靠于部队中的先进分子，在政治机关领导之下来协同进行，并以身作则在一般指战员中起模范作用。只有把政治工作变成一种群众运动，变成全体指战员共同努力的事业，才能彻底保证每一战斗任务之完成，才能取得抗日战争之最后胜利。

注 释

- 〔1〕 岩寺是皖南歙县的一个集镇。
- 〔2〕 指国民党将领顾祝同。三战区包括浙江、福建、苏南、皖南、赣东。
- 〔3〕 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当时蒋介石曾发表告国民书，表示要继续抗日，但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对国民党采取了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国民党也随之转向消极抗日，积极反共。
- 〔4〕 旧制一斤为十六两。一斤八两即一斤半，等于七百五十克。

津浦路东地区⁽¹⁾的环境和 我们的任务与方针*

(一九四一年一月十四日)

津浦路东地区所处的环境

津浦路东地区所处的环境，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津浦路东是处在华中敌后的重要地区，居于南京背后，津浦路南段之左侧，又在江淮之间，有丰富的资源（粮食、牲畜、棉、麻）与广大的人口（三百万）。它的战略地位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这里建立根据地，就等于在敌人背后打下了一个桩子。在今天可以起着牵制敌人的重要作用，而且消耗敌人，破坏其“以战养战”政策，同时兴奋了敌后广大民众及全国抗战军民，将来反攻时，又成为收复南京、上海的最前进阵地。而对于我军，今天又是苏北与华中各抗日据点联系的枢纽。所以路东根据地便成为敌人汉奸及亲日派的眼中钉，而为敌我必争之地，这是路东地区的第一个特点。

* 这是邓子恢在津浦路东临时参议会上代表苏皖边区抗日民主政府所作《一年来施政工作总报告》的第一部分（节录）和第三部分。

第二，一年来路东是处在敌伪不断军事“扫荡”与各方面进攻的环境中。

(1) 敌人在军事上是采取增筑据点，步步为营的渐进办法，与大举“扫荡”相配合（如去年九月的七路“扫荡”⁽²⁾），企图占领路东地区，摧毁我根据地。

(2) 在政治上则采取分化政策，在“反共”的口号下实行“以华制华”，利用汪逆⁽³⁾组织和平救国军⁽⁴⁾，并利用地方自卫团、反共青年团、维持会等方式建立伪军、伪组织，利用青红帮、会门组织大民会⁽⁵⁾。而且于军事“扫荡”时带着敌占区民众到我根据地来抢东西，企图造成敌占区民众与我区民众的对立。策动土匪来骚扰抗日民众与危害行政人员，他却假剿匪之名，来收买民心。并利用顽固分子（如来安的梁竹荪、嘉山的胡明玉等⁽⁶⁾）来进行破坏。敌人在传单上大肆进行“反共”宣传，到处宣传只打新四军、共产党，不打老百姓，企图破坏我军民合作，孤立我军，以达到其各个击破之目的。总之，敌人在政治上所采取的政策，是挑拨离间，实行分化我内部的团结，分散我力量，以达其“以华制华”之目的。

(3) 在经济上敌人以前是吸引我资源，高价收买我粮食，推销日本货。后来则对我实行经济封锁，禁止布匹药材入境，并于“扫荡”时大烧大抢，企图摧毁我农村经济，同时破坏我法币⁽⁷⁾，推行敌伪币，企图扰乱我金融。

(4) 在文化上则实行奴化政策，散布“和平反共救国”、“共存共荣”的荒谬言论，并宣传伪造的三民主义⁽⁸⁾，企图造成顺民心理，消灭我民族意识。在敌占区，更进行奴化教育。同时肆行其毒化政策，推销鸦片、海洛因，设赌兴娼。凡一切足以消磨我人民族意识，使其萎靡不振者，无所不用其极。很明显的，这一

切都是为了奴化路东，造成顺民条件。

(5) 敌人不仅公开的向我军事进攻，而且还秘密的实行奸细政策，不断派遣男女侦探、奸细、特务工作人员混入我军政机关、民众团体、地方，来进行其刺探军情、造谣惑众、带路、放毒在饮水里、指示飞机轰炸目标等。同时还有所谓干探政策，这是指比较有教养，受过训练的敌探，混入我军政机关，长期埋伏着，进行挑拨离间、分化、破坏及组织部队叛变、盗窃机密等阴谋活动。

上述这一切都是敌人一年来所不断采用来向我进攻的方法。有人说，因为新四军在这里，所以敌人来进攻、烧杀，假使新四军开走了，便可以太平了。这话是不对的，因为这是敌人在相持阶段中加紧对敌后“扫荡”，企图巩固其占领区的既定政策，并不是新四军引起来的。

敌伪不断的“扫荡”，用各种方式向我进攻，这是路东地区的第二个特点。

第三，一年来，路东又是处在顽固派⁽⁹⁾多方压迫与反共军不断的武装进攻中，且看一年来顽固派在津浦路东西所做的罪行。

(1) 对抗日怠工。两年来他们未打过敌人，与敌人保持休战状态，这不是他们军队打不得仗，而是由于韩德勤、李品仙等⁽¹⁰⁾高级将领，同时也是国民党当局对抗战动摇，把中心放在反共事业上，怀着恐日病，一味保存实力，自私自利，不打敌人。

(2) 武装走私，运粮资敌。不论韩德勤、李本一、秦庆林⁽¹¹⁾等部队都是如此，这是公开的秘密，尽人皆知的事，因此造成去年的严重灾荒。

(3) 纵兵扰民，苛捐杂税，层层剥削，摊派频仍，而且迫种烟苗（路西李本一迫民众种烟苗），贪污中饱，造成民穷财尽。

(4) 自己不抗日，反而禁止民众抗日（特别是六合的洪家驷

和杨月波^[12]，竹镇至今还传说所谓洪、杨之乱），取消抗日团体，捕杀抗日青年，甚至捆绑女同志裸体游行（如李本一在古河之所为）。

(5) 公开反共，反新四军、八路军。禁止民众售粮给抗战部队（如李本一在路西对新四军实行经济封锁），逮捕抗属（连新四军江北指挥张云逸同志的夫人与公子都被其逮去），造谣诬蔑新四军为“土匪”，为“游而不击”等等，不惜制造一切流言，作为进攻新四军的借口。

(6) 公开武装进攻新四军，屠杀抗日民众。去年三月以来不断的武装磨擦，^[13]都是这些顽固派得意的杰作。不仅进攻新四军，而且骚扰民众，军行所至，奸淫烧杀，无所不为，甚至不惜配合敌伪实行夹攻，丧尽天良，言之痛心。

(7) 密布特务机关，不对外而对内。组织反革命暴动与部队逃亡（如去年七月一日至七日路东各地的暴动^[14]当时秦庆林、胡明玉等并同时前来进攻），造谣破坏，卑鄙齷齪，甚至利用土匪骚扰，企图以此来破坏抗日民主政权。

(8) 实行经济封锁。李本一在路西禁粮出口，置民众因灾荒绝粮于不顾，把抗日区域当做“匪”区。

上述这些罪行，不管顽固派主观如何，但实际上则便利敌人“扫荡”，为敌人伪化皖东扫清道路，其中有些已经公开投敌，如滁县樊公纯^[15]嘉山胡明玉、来安之梁竹荪等顽固分子出入于滁城^[16]、来安之间，认贼作父，恬不为怪。顽固派多方压迫与反共军不断的武装进攻，这是一年来津浦路东地区的第三个特点。

第四，一年来路东虽然处在敌伪“扫荡”与顽固派武装进攻的严重环境中，这是路东困难的特点，但另一方面路东却有另一个特点，就是路东有了进步的、抗日的、民主的力量，依靠这些

力量，路东民众进行了胜利的斗争，这是些什么力量呢？

(1) 首先是有了进步的军队——新四军与地方抗日武装。它不仅坚决抗日，而且坚强有力，能击溃任何敌人的进攻，而不为敌人所消灭。它不仅抗日，而且赞助民主，爱护人民，与人民打成一片。这些进步武装正在一天天发展而壮大起来，成为坚持路东抗战的骨干。

(2) 有了进步的党派——共产党。尤其有了中共中央的正确路线与中共中央的代表胡服⁽¹⁷⁾同志在这里指导，他告诉我们如何去分析环境，如何去与敌人斗争，如何去领导民众，使我们有了方针，能不断的进行工作，获得了胜利。在一年来的斗争中，路东共产党已逐渐壮大起来了。

(3) 有了抗日民主政权。路东地区以前是伪组织充斥，以后又恢复顽固派一党专政，而现在则是抗日民主政权。这个政权与伪组织不同，与顽固派一党专政的政权也不同，它是抗日各阶层的统一战线的政权，是坚决抗日的，是进步的，而且是民众自己的，为民众谋利益的政权。虽然我们的工作还未做得尽善尽美，但这个政权是抗日的、民主的、进步的，是有目共睹的了。只有这个政权才能动员广大人民去与敌伪及一切反动势力作斗争。很明显的事实，在去年九月敌人“扫荡”时，如果仍是顽固派的一党专政的政权，那末要动员广大群众来配合新四军粉碎敌人“扫荡”，就是不可能的了。

(4) 津浦路东有三百万民众，有足够的资源，有大量的武器，有广阔的原野与有利的地形。这些人力、物力、武力，以前虽在敌伪与顽固派的压迫欺骗之下而未能发扬，但在抗日民主政权建立以后，在反扫荡与反磨擦的不断的胜利斗争中，现在已经大部分动员起来了，他们已经表现了自己抗日的意志与抗日的力量。

(5)因此津浦路东现在已成为华中敌后一个不小的抗日力量，予敌伪更重大的打击，缩小敌占区，兴奋华中敌后广大群众与全国军民，直接威胁南京，牵制敌人的更多兵力，以配合全国抗战的坚持。

(6)津浦路东虽处在敌后，但与华中各抗日据点，路西、淮泗、皖北、苏北、江南等地区相连接，与全国相呼应，我们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配合的。

这便是津浦路东的第四个特点。

一年来我们的任务与工作总方针

第一，根据国内外形势与路东环境的特点，我们的任务是建立路东抗日民主根据地，以便长期坚持路东敌后抗战。坚持路东为的是在此牵制敌人、消耗敌人，破坏敌人“以战养战”的计划，同时生长抗日民主力量，以配合全国抗战，阻止亲日派、反共派投降妥协阴谋，以挽救时局危机，争取最后胜利。为什么要长期坚持呢？这是因为路东是敌后重地，处在敌、伪、顽三方夹击中，路东有了进步力量，但还不够壮大，而全国反攻又不是马上到来，所以不是一下子能获得最后胜利，而须要长期坚持，一切都要作长期打算。这就是我们一年来一切工作的总方针。

第二，正因为要长期坚持路东敌后抗战，而又要能够粉碎敌人的军事“扫荡”与政治分化阴谋，所以我们的根据地不仅要抗日的，而且要是民主的。只有团结各阶层、各党派来共同抗战，才能长期坚持这个地区。因此，我们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政权不仅要抗日的，而且要是民主的，不是一党专政，不是少数人包办，而是实行“三三制”⁽¹⁸⁾，资产阶级与开明地主、小资产

阶级、无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在政权里各占三分之一。要民选行政首长，要有民意机关，要保护一切抗日民众的民主自由，要吸引广大人民来参加政府工作。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内部团结一致，才能动员最广大人力、财力、武力来长期的与敌伪及亲日派、顽固派作坚决持久的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

第三，因为要民主，要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所以我们的施政方针便要依据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纲领^{〔19〕}，而不能超过这些原则和纲领。但也不能徒托空谈，像顽固派那样的挂羊头卖狗肉，而是要使之彻底实行，实事求是。从我们的临时施政纲领草案看来，便可知我们是没有超过上述这些原则和纲领的，我们并没有如象那些别有用心之徒所说的这里“赤化”了，实行“共产”了。更没有所谓“违法”，或者破坏“行政系统”。因为我们所执行的是国家的基本法则三民主义，与当前全国所遵循的抗战建国纲领，我们所破坏的是敌伪政权，所摧毁的是伪组织，而不是中国政权。我们所建立的是抗日政权，是孙总理民权主义中所指示的民权主义的政权，是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所说的县自治的政权，而不是工农专政或者无产阶级专政。我们与顽固派政权所不同的地方，只是他们是一党专政，是违反民权主义的，而我们是各党派、各阶级联合的民主政权，是合乎民权主义的。对三民主义他们是说而不行，挂羊头卖狗肉，而我们是说了执行，言行一致，实事求是。那些说我们不合法的、破坏“行政系统”的这些话，只证明他们的无耻造谣，别有用心，否则便是他们的无知。

第四，为了坚持敌后抗战，就不能不与破坏团结、破坏抗战、破坏民主的亲日派、反共派作斗争。不管他们主观上如何，他们实际上是帮助着敌人，替敌人伪化路东扫清道路。尤其当此敌人

“扫荡”加紧与灾荒严重的敌后环境中，更不容许这些别有用心之徒前来破坏。目前亲日派、反共派策动反共内战尤为丧心病狂，我们须动员一切力量来反对这种祸国殃民的反共内战，不制止这种反共内战，要坚持敌后抗战是不可能的。目前路西抗日民主地区的缩小与敌占区之扩大，完全说明了这一点。

上述几点，就是一年来我们施政的总方针，这是为了什么呢？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建立和巩固津浦路东抗日民主根据地，以便在此长期坚持抗战，直到最后胜利，而不是别的，这就是我们一年来工作的总目标。

我们今后的努力方向

现在，我来报告联防办事处^[20]今后的工作方向。我只提出几点大纲，对不对？望大会讨论和公决。

我们认为，路东军民当前奋斗的总目标，是巩固和扩大路东抗日民主根据地，以便更有力地长期坚持路东敌后抗战，达到牵制敌人、消耗敌人、同时继续生长新的抗日民主力量，来配合全国军民坚持团结抗战，制止投降分裂危机，准备反攻力量。争取最后胜利之到来。为达到此目标，我们必须更加团结，更加民主化，更加彻底去实行三民主义与抗建纲领，以便动员更广大人力、物力、财力、武力、智力，配合新四军，粉碎敌人“扫荡”，制止反共军进攻，以巩固和扩大路东的抗日民主根据地。

路东根据地巩固的可能条件：

第一，我们有了久经战斗的新四军。在不断战斗中，新四军已经生长成为华中抗日主力。它是要永远在此坚持，不论日寇、汉奸及顽固分子如何痛恨它，企图“扫荡”它、驱逐它、消灭它，但

历史告诉我们，新四军是被人消灭不了、驱逐不了的。它不仅要在
此坚持抗日，而且要在
此保卫民主政权，在此保卫根据地。

第二，我们有了相当数量的地方武装——独立团、营及区乡
模范队、青年队等。这些武装已逐渐壮大，有了战斗力，能够在
各地区独立自主地坚持游击战，而且获得了胜利。

第三，我们有了抗日民主政权。这个政权是民众自己的，是
为
广大军民所拥护所爱戴的，它已有了广大的群众基础，而为敌人
所摧毁不了的了。

第四，三百万万民众已逐渐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
政治上日益觉悟，生活上日益改善，内部团结日益巩固，而为日
寇汉奸及顽固派所难于镇压和欺骗的了。

第五，我们路东有了共产党的领导机关在此指导，又有了共
产党的地方组织。这个党是为中国民族解放、民主、自由而坚持
奋斗的，是代表人民大众利益的，是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有
了这个党，路东民众便有了正确的领导，而能坚持着胜利的斗争。

第六，我们有相当有利的地形和足以供给的物质资财。只要
加上“人”的条件，把地形再加以适当的改造，农产品增加，工
商业发展，我们是
可以自给的。

第七，我们有互相联系、互相配合的华中各个抗日民主根据
地，与华北根据地也都联系着。还和全国抗战军队，以及大后方
要求抗战、要求民主的民众，和敌伪区民众的抗日斗争相配合、
相呼应。

第八，而敌人方面却是日益处于兵力不够，兵心动摇，战斗
力削弱，物资缺乏，国内不安，国际孤立的困境。反共军方面，亦
是纪律日坏，财政困难，战斗力日弱，而且多数不愿反共，内部
矛盾重重。而敌后环境大军无法前进，更使我们能够自卫，一方

面粉碎敌之“扫荡”，一方面又能击退反共军之进攻，而取得根据地之巩固与发展。

今后施政方针。

以上各点，足以证明路东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是有胜利把握的。我们要坚定胜利的信心，勿为一时的困难环境所动摇。当然，这只是一种可能，把胜利可能变成胜利的实际，这需要我们大家的努力，需要长期的曲折的艰苦的斗争，特别要有正确政策的执行。因此，我们今后的施政方针便应努力于下列各点：

一、在军事上。

（一）迅速完成扩军任务，经过行政动员与民运工作来进行扩军，充实主力；

（二）加强参战组织，健全盘查哨、运输队、担架队、情报网、递步哨等组织；

（三）充实模范队、青年队组织，加强整训，使能独立自主在各地坚持游击，实行抗日、防匪、锄奸、防顽四大任务；

（四）各级政府加强对地方武装与民众武装斗争之领导，争取主动进攻，打破依赖主力及分兵把口的单纯防御路线，反对退却逃跑；

（五）大批提拔与培养地方武装干部，继续办训练班，奖励与提拔勇敢分子，惩处怕死动摇分子，鼓励最好的青年到武装中去；

（六）切实优待抗属，抚恤伤亡，安置残废，救济灾民、难民。

二、在经济建设上。

（一）彻底禁粮出口，健全货检处组织，发动民众缉私，以保证军食、民食之充分供给；

（二）发动春耕、夏收、秋收、冬耕的生产运动，号召民众深耕多耨，挖塘筑坝，开垦荒地，多种杂粮、蔬菜，多喂鸡、鸭、猪、

羊，多种棉、麻，购买稻种，提倡勤劳精神，反对好吃懒做，禁绝赌博，以提高农村生产力；

（三）保护工商业发展，保证商业自由、商旅安全，奖励工业、手工业发展，政府尽可能帮助逃亡敌区地主回家，尤其欢迎敌区资本家前来投资经营，政府决予保护和各种方便；

（四）开展合作运动，以打破敌人封锁政策，并与商业高利贷资本之垄断居奇作斗争；

（五）举办借贷所，实行低利借贷，由借贷所包借包还，以调剂农村金融，调解农村借贷纠纷，以便利农村生产；

（六）保证各阶层人民所有权与合法权益，纠正过左行动；

（七）继续改善民生，但要有一定限度，调节各阶层生活，以求得国民经济之继续向前发展，而做到自给自足。

三、在财政工作上。

（一）完成田亩普查登记，使今年田赋减轻，公粮收足；

（二）严整税收，定期完纳田赋，禁绝额外需索，改订田赋新税则，以期合理化；

（三）建立严格的预决算制度，健全金库组织，建立审计制度，确立财政上四大系统——收入、支出、保管、审查之相互作用；

（四）杜绝贪污中饱，防止浪费，实行节约；

（五）加强公粮之征收与保管，保证军食充裕，与民食之调剂。

（六）准备举办银行，发行小票，实行低利借贷，取缔伪币，以稳定金融。

四、文化教育工作方针是提高人民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提高民众的政治文化水平，培养干部人才，以树立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基础。今后工作应该：

（一）继续扩大联合中学，普遍建立各乡、保小学，开办夜学、

半日学、识字班及短期训练班，大批培养干部；

（二）加紧社会教育，各保建立俱乐部；

（三）各县、区设流动图书馆，开办书店，扩大印刷所，改良造纸业，以增加文化食粮；

（四）发展戏剧歌咏运动，使之普遍于农村，各县、区、乡逐渐举办宣教团，改良旧剧、小调、大鼓，提倡木刻图画，利用旧形式、改进新内容、使之大众化、民族化；

（五）加强《新路东报》，恢复县报，各乡、保逐渐创办壁报；

（六）组织文化团体，改善小学教师待遇，优待文化人，大量提拔当地文化干部，吸收外来知识青年与文化人参加路东文化教育事业。

五、加紧锄奸工作，继续发动民众锄奸，健全锄奸组织，彻底扑灭敌人暗探特务机关，肃清汉奸、争取胁从，建立司法机关，建立严格的革命秩序、保障人权，争取逃亡地主回家及以前游击队叛变分子回头、将功赎罪、不咎既往。

六、禁烟、禁毒工作依照原定计划进行，加紧宣传民众戒烟，完成二年禁绝计划，并严禁赌博。

七、在民运工作上，政府更应有力地协助各民众团体之普遍建立，各自成立系统，使成为政府之有力支柱。

八、加紧瓦解敌伪军工作，动摇敌军，争取伪军两面派，以孤立敌人及甘心附敌之汉奸，并加强对敌占区民众宣传，建立敌占区工作，团结敌占区抗日人民，使之隐蔽活动，在敌人心腹里埋下炸弹，储蓄力量，等待反攻局面之到来。

九、在政权建设上，应迅速建立各县参议会与区、乡、保人民代表会议，实行民选行政首长，健全行政委员会组织与工作，建立三三制。政府应代表各阶层利益，调剂各阶层利益，更进一步

建立民主的、公正的、廉洁的工作作风，但须提高政府威信，加强行政效能，严格政令施行。对公务人员实行增加特别津贴，改善其生活。

这就是我对今后工作的几点大概意见，是否有当，望各位参议员发表伟见，共抒宏论，确定更具体、更明确的施政方针，以便政府今后有所遵循，是为至盼。

注 释

- 〔1〕 津浦路东地区即津浦铁路南段以东，苏皖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
- 〔2〕 七路“扫荡”，是从一九四〇年八月二十七日开始，日、伪军万余人（其中日军七千人），以来安、六合、天长、高邮、明光、五河、张八岭等七个据点为依托，分七路向我津浦路东抗日民主根据地大肆“扫荡”，历时二十二天。经我路东根据地军民英勇抗击，日、伪军毙伤六百多人，“扫荡”以失败告终。
- 〔3〕 汪即汪精卫。
- 〔4〕 和平救国军是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利用汉奸和国民党投降部队所组织的伪军之一种。这类伪军有各种牌号，如治安军、皇协军、和平军、忠义救国军等，总数达八十万人左右。
- 〔5〕 大民会原名兴亚会，总部设在南京，系日本特务机关操纵下的汉奸组织。汪伪政府监察院长梁鸿志、司法院长温宗尧分别任总裁、副总裁，骨干多为帮会和道会门分子，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工具。
- 〔6〕 梁竹荪当时任国民党安徽省来安县县长；胡明玉当时任国民党安徽省嘉山县县长。
- 〔7〕 法币，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国民党政府规定由官僚资本控制的中央、中国、交通银行（后来又加上农民银行）所发行的纸币为法定的全国统一流通的货币，通称法币。
- 〔8〕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对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提出的民族、民权、

民生三个问题的原则和纲领。汪精卫投降日本后也打着实行三民主主义的旗号，但对三民主义作歪曲宣传解释，使之为其卖国行径辩护。

- 〔9〕 顽固派指抗日战争期间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动派。他们仇视共产党和人民力量，提出所谓“宁亡于日，不亡于共”的反动卖国主张，采取所谓“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政策，进行反共卖国活动。
- 〔10〕 韩德勤当时任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兼苏鲁战区副司令；李品仙当时任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兼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
- 〔11〕 李本一当时任国民党安徽省第五行政区专员兼第十游击队司令；秦庆林当时任国民党安徽省盱眙县县长兼常备旅旅长。
- 〔12〕 洪家骧当时任国民党江苏省六合县县长；杨月波当时任国民党江苏省政府调查统计室上校特派员兼六合县“锄奸队”队长。
- 〔13〕 武装磨擦是抗日战争期间，以蒋介石为代表的顽固派在所谓“军令统一、政令统一”的口号下，多次向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抗日民主根据地进攻，制造武装磨擦，妄图达到他们取消共产党，取消八路军、新四军，取消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目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了多次的反磨擦斗争，粉碎了顽固派的阴谋。
- 〔14〕 一九四〇年三月，李品仙、韩德勤在津浦路西、路东大规模制造磨擦，企图消灭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的阴谋破产之后，积极策划发动了这次反革命武装暴乱。一九四〇年七月初，来安县屯仓区反动地主首先打出黑旗，杀害我抗日民主政府区长以下二十余名基层干部。接着，反动地主、反动刀会残杀我共产党员、开明士绅、基层干部的暴乱，迅速蔓延到天长、嘉山、盱眙、仪征、六合等县。韩德勤派出两个团，伙同国民党特务武装忠义救国军和桂系特务武装策应暴乱。新四军第五支队遵照中原局和江北指挥部的指示精神，集中相应的兵力，与地方武装、保安部门相配合，击退了顽军的进攻，消灭了武装特务，镇压了一批首恶分子，辅之以政治争取，余众顿时土崩瓦解。暴乱开始到高潮，约一个星期。平息暴乱也是一个星期。

- [15] 樊公纯当时任国民党滁县县长。
- [16] 滁城即滁县县城。
- [17] 胡服是刘少奇的化名。
- [18] “三三制”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政策。根据这一政策，抗日民主政权中人员的分配，共产党员大体占三分之一，左派进步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
- [19] 抗战建国纲领是国民党在抗日战争初期制定的指导抗日的纲领性文件。纲领提出了“抗战建国”的总口号，并且规定了一些具体政策，一方面表明国民党不得不举起抗日的旗帜，不得不给人民以某些自由和民主权利；另一方面对发动人民群众抗战加以种种限制，害怕人民力量在抗战中发展壮大，集中反映了国民党实行的片面抗战的指导路线。
- [20] 联防办事处指津浦路各县联防办事处，成立于一九四〇年四月十八日，管辖天长、来安、嘉山、盱眙、六合、仪征、高邮、宝应等八个县，实际上是一级抗日民主政府。

克服民运工作中的过左现象*

(一九四一年九月五日)

自从瑞龙同志^[1]回来，传达华中局对争取敌后人民大多数的指示，并指出应纠正过去皖东北^[2]右的倾向以后，我们淮北苏皖边区的民运工作，确是有了突飞猛进的开展。三个月来，各地工作同志都能有更明确的阶级立场，更加认识了发动基本群众的重要性。了解到要改善民生才能广泛发动群众，要从群众切身利益的斗争中，才能真正去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发现干部，发展党，才能真正使政权民主化，使汉奸土匪反动势力彻底肃清。在三个月过程中，许多同志适当地抓住群众的经济要求与政治要求，正确地提出口号，灵活地组织了胜利的群众斗争，在斗争中组织了几百个保的工救农救^[3]，有五万人以上的工农救会员，有几千个以工农为骨干的自卫队员，成立了独立团及各县保安大队，改造了不稳武装，发展了二千个共产党员，发现与培养了几百个斗争坚决、为群众所信赖的下层地方干部，协助保安处破获了好几十起汉奸匪探、特务机关、暗杀团等案件，个别改造了下层政权中的贪污危害分子。这些伟大的成绩，配合着三个月来我们在苏皖边区各方面的军事胜利，就使淮北苏皖边区根据地初步打下了巩固的基

* 这是邓子恢为《人民通讯》一九四一年九月第十期写的文章。

础，而且向前发展着。这就使我们能更有力地去准备粉碎敌人的扫荡，使亲日派挑动的反共军不敢放手东进^[4]，而造成目前苏皖边区大踏步向前开展的新局面。这证明了华中局党的路线的正确，区党委领导的坚强。同时，也证明同志们工作的努力与进步。

在三个月的斗争中，民运工作虽然有了上述的成绩与进步，右倾路线可以说基本上已经转变过来了，但是今天检查起来，我们在民运工作中却发生了另外一个严重现象，这现象不是右倾的，而是过左的。这种过左现象，如不迅速克服，同样会使我们脱离群众，使工作受挫折，使斗争失败，以致多树敌人，孤立自己，影响到根据地之巩固与发展、抗战之坚持。因此，这种“左”倾与右倾同样危险同样有害。从什么地方看出这种过左现象呢？一般的情形，我不大熟悉，我只就《人民通讯》上所发表的几篇通讯及其他报告中看出这种现象。虽然这仅仅只是几个地方的现象，但从此可以反映到其他地方的一般情形。

首先，这种过左现象表现在提出的口号上，这里最标准的例子是泗五灵凤^[5]的盐行斗争。同志们提出：“穷人团结起来”，“盐行交给农救会”，“反对互相竞争，捣乱市场秩序”……这些口号就是违反统一战线政策的过左口号。当然，同志们想用这些口号来发动工农基本群众，代表了群众的利益，这是好的。但没有估计到这些口号是禁止商业的自由、取消私人盐行的口号。这与我们现行的经济政策不合，这不仅可能使商人变成我们的敌人，而且也行不通。这个斗争的正确办法应该由当地民众团体与盐行老板商量合办盐行，或自己办盐业合作社，减轻行佣^[6]，抑低盐价，用经济的办法来与垄断居奇者作斗争。必要时加以政府的帮助，这样才能使民众实际得到利益，而又不致失掉商人之支持。

其次，表现在斗争方式上。固然改善群众生活，主要依靠群

众与群众自己组织的力量起来斗争，依靠于斗争力量的对比来决定斗争的胜负与要求口号的高低，这是主要的。但必须知道今天是统一战线的时代，我们是处在敌后环境。而且这里是民主政权的区域，有政权的力量可以帮助群众合理要求的实现。因此，在群众改善生活的斗争中，固然依靠于群众自己的斗争力量，但我们也应去说服解劝地主与东家，并鼓励他们中之开明分子，自动减租减息，我们则加以赞扬，使他们在经济利益上受到损失，而在面子上得到安慰。这样来减少他们的不满情绪与对我们的仇恨，减少其为敌人利用之危险性，而巩固我们内部之团结，以保证斗争之胜利。群众已经起来，又有政权帮助，这种比较和平的一面斗争一面说服解劝的斗争方式，是完全可以得到胜利的。只有对那些损人利己、一毛不拔的顽固分子，才与之作坚决的斗争。但也应先尽我们解劝说服的责任，必要时还应让一些步，表示我们诚恳厚道、仁至义尽，暴露他们的贪婪无厌、不可理喻，群众忍无可忍，然后才采取比较剧烈的斗争方式，以至政权出面制裁。越表现我们宽宏大量仁至义尽，就越能暴露他们的顽固可恶，就越能争取群众的大多数，而使他们孤立，使斗争胜利。所谓“先礼后兵”，是中华民族旧道德，是一般民众所赞许的旧习惯。谁违反这种道德与习惯，表示自己的过分刻薄、狭隘、多事、借题发挥、寻仇报复，谁就会脱离群众。不仅引起上层分子反对，而且也会得不到农民的同情，而使自己陷于孤立，使斗争走向失败。根据这点来检查与泗五灵凤盐行斗争的斗争方式，就表现着同志们的过左行为。

在青阳^①斗争中，工人季兴隆被老板袁学敏诬为偷布，企图开除其工作，工会的同志为了帮助工人季兴隆，发动这个斗争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同志们抓到这一点来发动斗争，保护了工人

利益，这是很好的。但在斗争方式上，我想应该事先由工会派代表去向袁老板交涉，要他认错，不准开除季兴隆。如袁老板不接受要求，则召集工人大会与之论理，并要他向工会道歉。如再不承认，还可以托商会、士绅以及政权机关出面调解。只有在政权机关、商会袒护老板，而袁老板顽强压迫时，才需要举行游行示威，以至最后不得已举行罢工。但青阳斗争却一开始就组织游行示威和罢工，不经过代表磋商，也不经政府与商会调解。虽然斗争是胜利了，但我总觉得这种斗争未免小题大做，“杀鸡焉用牛刀”。而且这样的斗争方式会产生几种恶果：一、使各地商人害怕不满；二、使农民及落后工人不同情，认为我们多事、过分；三、罢工了两天工，使根据地经济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在泗五灵凤盐行斗争中除了口号过左外，方式也过左。事前不派代表与盐行磋商，也不经过政府调解，便于六月三十日突然集合各保农民武装游行示威，张贴标语，高呼“打倒劣绅某某”等口号，而几乎与盐行冲突起来。弄得盐行老板莫名其妙，“为什么早不来我这里商量”；“如果要分地我完全同意”，“我们很害怕，没有保证”。这种斗争方式，我想也是不合乎人情的脱离群众的举动，不仅不能得到上层分子之同情，而且也不会得到农民的同情的。这种斗争不仅要失掉商人与上层分子，引起上层分子的不安，而且还会影响到落后群众情绪之降低，使他们感觉到我们太厉害、太无情，而怕与我们接近，逐渐离开我们，只表面上与我们敷衍，不敢对我们说知心话。

为什么同志们要采取这种过左方式呢？我想原因有三：一是斗争主义，以为只要斗争起来、轰轰烈烈，就能发动群众、扩大影响，而不了解群众之发动并不是为了赶热闹、出风头，而是为了实际的利益。如果用比较和平的方式可以得到利益，那么他们

是会起来的，并不需小题大做。二是不了解在统一战线环境中既要照顾基本群众，也要照顾中间分子。如只争取了基本群众，而失掉了中间分子，我们是要失败的。这里过去是过于照顾中间分子，而忽视发动基本群众，今天恰恰反过来了，对地主资产阶级只有斗争、没有联合，只有打击、没有说服，这是不对的。三是没有真正深入群众去倾听群众的呼声，摸清群众的心理。只看到少数进步群众的情绪，而没有了解大多数群众的情绪；不是去领导广大群众，而是跟着少数群众跑。四是没有真正了解群众组织的力量，没有了解到只有真正代表大多数群众的要求，把握着群众的情绪，恰如其分地提出口号，定出斗争的方式，使群众真正自愿自觉的参加斗争，而不是勉强附和。只有这样的群众，才能在工农会领导下形成一种坚实的组织力量，才能坚持耐久，经得起风浪，受得起挫折，而保证自己的胜利。我们的同志正是缺乏这种耐烦细心的精神去组织群众的力量，来坚持斗争，而只想轰一下，显一显威风。这还是表示着有政权为依据，而不是真正相信群众自己的组织力量。

第三，过左现象还表现在：不少地方工救农救的自由罚款、捉人、游街等等，这表现工救农救代替了政权机关。一方面会减低政府威信，混乱革命秩序，另一方面将使一般上层分子感觉到今天的民主政权不是他们的，而是工农政权。这就引起了他们恐慌不满，以致于另找出路。出路在哪里呢？泗县城、南京、路西王光夏^{〔8〕}……这就要使我们多树敌人，内部不安。

第四，表现在扩大地方武装方面，不是细心说服，从政治上鼓励青年来参加，而是采取抽壮丁、买壮丁，以至强迫当兵等严重现象。对公粮征收，许多地方未经好好宣传解释，公平分配，而对富有者征收率过大，超过他们所能负担的一定限度。如淮泗^{〔9〕}

公粮征收率高到按实际收获量百分之三十、四十，以至百分之六十多。这种惊人的税率，还有什么法子去发动群众，又有什么法子去维持我们的政权！

第五，表现在锄奸政策方面，还存在着乱抓、乱罚、乱杀现象。如泗南^{〔10〕}七区区长及大队副竟可以擅自枪杀两人，不得到上级批准。有人反映淮泗某保保长不好，我们的同志就在会中提议枪杀之。结果群众不作声，使我们完全失败。这种不问罪状大小，不顾群众情绪的随便提议，也不经过上级组织批准，只有帮助汉奸、亲日分子、反共派造谣破坏，而使自己陷于孤立。

第六，在过左现象中有没有过右的现象呢？仍然还有，如淮泗党对反革命熟视无睹，麻木不仁。盱凤嘉^{〔11〕}亦是如此，工救农救为地主所操纵，所以至今还不能发动基本群众起来；对群众力量估计不足，对障碍群众发动的坏分子不敢打击他。在斗争中遇必要时不懂得利用政权力量，来帮助群众斗争的胜利。如单圩子斗争没有完全胜利，就是如此。个别党组织为地主、流氓所把持（如淮泗某些支部）。这都表现在左倾中还存在着右倾现象，不过目前主要危险是左倾罢了。

迅速克服这些过左现象，同时要肃清右倾残余，这是淮北苏皖边区民运工作当前的重要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正确运用党的政策，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把已经组织好的群众团体与民众武装更进一步的发展与巩固起来，成为苏皖边根据地的基本支柱。

注 释

〔1〕 瑞龙即刘瑞龙。他从华中局开会回来时任皖东北区党委副书记，本文发表时已改任中共淮北区党委委员、淮北军区党委会委员、淮北苏皖边

区行政公署主任。

- 〔2〕 皖东北自一九四〇年二月国民党安徽省第六行政区专员盛子瑾出走，即成为抗日民主根据地，但有一段时间领导思想右倾，工作困难很大。一九四一年五月刘少奇路过皖东北，对如何开展工作作了指示。同年六月，皖东北区党委召开第一次党活动分子会议，会上邓子恢传达了刘少奇和华中局对皖东北群众工作的指示。此后，皖东北即迅速打开局面。
- 〔3〕 工救农救即工人抗日救国会和农民抗日救国会。
- 〔4〕 指国民党当局于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二日制定《剿办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东段以南附近地区非法活动的异党指导方案》，一九四一年一月又发出限期肃清淮南、淮北、鄂中“匪军”并避免与日军作战之《密令》，盘踞在豫东、皖西之国民党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多次率军企图东进摧毁两淮及苏北抗日根据地，均未得逞。
- 〔5〕 泗五灵凤指安徽省的泗县、五河、灵璧、凤阳四个县边区结合部，当时划为泗五灵凤县。
- 〔6〕 行佣即佣金亦称“中佣”。中间人、代理商、经纪人介绍买卖所取得的收入。
- 〔7〕 青阳当时系泗县大镇，现属江苏省泗洪县。
- 〔8〕 泗县县城、南京当时均由日伪盘踞；路西指津浦铁路以西，当时大部为国民党顽军占领；王光夏系当时著名顽固军江苏省保安第七旅旅长兼第三纵队司令。此句意为：不是投奔日伪区，便是投奔顽占区。
- 〔9〕 淮泗即江苏省淮阴和泗阳两县边区结合部，当时划为淮泗县。
- 〔10〕 泗南即安徽省泗县南部一带，当时划为泗南县。
- 〔11〕 盱凤嘉即安徽省盱眙、凤阳、嘉山三县边区结合部，当时划为盱凤嘉县。

淮北区党委今后斗争的具体任务*

（一九四三年六月一日）

我们听了陈毅军长的报告，认为党中央与华中局指出敌后党三个基本任务是战争、生产与学习，而此三者之中尤以战争为中心，这是非常正确的。因为敌后党的总方针是咬紧牙关坚持今后艰苦困难的两年。而今天敌后环境的特点，则是敌人扫荡、蚕食与清乡，我们这里还时有反共军东进之威胁。因此，我们坚持今后两年的先决条件，就是准备好一切，以争取战争胜利。战争胜利则一切开展，一切问题不难迎刃而解，战争失败则一切改变，困难也就难于解决。这是在敌后斗争的同志应该深切认识到的。如果陕甘宁边区的中心一环是建设，那么我们这里的中心一环便是战争。一切服从于战争的利益，一切围绕着战争，一切应适合于战争需要与战争环境。离开战争去谈生产学习，就要犯大错误。我们过去有些同志就犯了这个毛病，忘记了自己的环境，放松了对于武装的领导，忽视了把自己的工作去配合战争的需要，而把他分裂开来，孤立起来，使工作与战争脱节，工作不适合于战争环境。从去年扫荡以来，同志们在亲身体会中这种错误认识已有了

* 这是邓子恢在淮北高级干部会上的发言第一部分，原题为《对党总任务的认识和淮北党今后斗争的具体任务》。

大的改变，但仍有某些同志还未真正把握着一切为着战争这个中心。今天仍有不少同志忽视与放松对武装的领导，不积极去参加武装斗争，学习军事，各地地方武装仍未能得到各级党委应有的重视与领导，部队中地方干部之提拔与调送还很少。这是什么原因呢？当然工作很忙，地方干部不多是一个原因，但主要根源还是认识问题。如果真正认识了自己的环境，认识到战争是我们的日常生活，认识别的工作搞不好还不至于立即置我于死地，武装工作搞不好，我们将不能生存；那么我想对武装工作就绝不会放松了，不会与其他工作平均看待了，这是很明显的道理。因此，大家要真正体会这个真理，一切围绕着战争这个中心任务来进行，一切应是为了战争的胜利。应在一切工作中教育群众认识战争对他们的关系，吸引他们到战争上来，要时刻防止因环境的暂时安定而又重复发生太平观念。

但是应该知道，战争是靠人来进行的，是人力物力财力的总决赛。战争的主要工具当然是军队。但今天我们的军队在技术上组织上装备上都落后于敌人。因此，要取得战争胜利，要完成坚持今后两年的任务，就必须更进一步依靠于广大人力财力物力的动员与增长。而要发动群众，取得群众人力财力物力的帮助，就必须改善群众生活与随时解决群众生活上的困难问题。在今天已经实行过减租减息的根据地，群众生活的改善与财力物力的增长就在于生产之增加与改进，只有生产之增进才能更进一步改善民生，同时也才能增强抗战资源。因此，生产运动就成为一切工作的基础。一切工作，只有从生产运动出发，与改善群众生活联系起来，使群众认为是为自己而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与积极参加，而完成其任务。如果离开生产，离开群众生活利益，把工作孤立起来去进行，则群众必袖手旁观，不积极来

参加，或者是被动的来参加，如此则工作必因脱离群众而不能完成。我们现在有很多工作，下面做不通，就是这个原因。比如组织民兵，原是为了抗敌防匪保家乡，是为了群众的利益。这在边区或扫荡时群众是容易懂得的，因此，也就热心参加，民兵所需给养与弹药，大家也愿意筹供，因为这是为了他们切身的利益，是他们自己的事。但是在中心区或在敌情不紧的时候，群众对民兵的认识就不同，他就不是那样热心。因此，组织民兵就必须与保卫春耕夏收、借粮救荒等工作联系起来。民兵不仅不应该做妨碍生产的不必要的勤务（如打更放哨等），而且还应在参加生产救荒中起模范作用。如果这样做，群众是会赞成的，民兵工作也一定做得好，一定有作用。但如果我们把民兵工作与目前群众生活需要脱离，群众正渡着饥荒、没饭吃，我们不领导群众去解决借粮救荒问题，而却丢开救荒工作去专谈民兵，反而要群众饿着肚子来开会、编队，甚至要他们做目前某些地区并不需要的打更放哨工作，这样就一定要脱离群众，一定使群众感觉到民兵不是为自己需要，而是上级给他们的一种负担，因而观望不前。结果只有靠命令强迫，而形成与群众对立，这样民兵还组织得起来吗？就算勉强组织起来又有什么用呢？又如泗五灵凤的乡选，不在乡选会上来讨论借贷救荒斗争，而却离开救荒来谈乡选，要群众饿着肚子来开一天大会，还说是具有重大政治意义，这就是离开生产离开群众生活的做法。这样，试问有什么法子来动员群众呢？又有什么法子使工作做得通呢？为什么我们同志如此呢？原因就在于没有真正了解群众是一切力量的源泉，没有了解我们一切依靠于群众，依靠于争取群众大多数（所谓群众路线），没有真正了解解决群众生活问题，与群众生活密切联系，是发动群众完成各种工作的基本关键。这是我党决定策略两个最基本的原则。那些犯错

误的同志，就在于不懂得这两个最普遍而又最基本的原则。因此，我要重复一句，我们一切工作应以战争为中心，但应以生产为基础，一切工作应从生产出发，从改善人民的经济生活出发。

至于学习，则应在战争过程中学习，在生产过程中学习。就是说，学习应与实际工作联系起来，整风应与业务联系起来。只有这样，学习才不至成为教条主义；同时也只有这样，才能在学习中提高干部对于战争对于生产的工作效能，以完成战斗任务与生产任务。不仅干部教育如此，即国民教育亦应如此。应该使之成为战争服务，为生产服务，而不应该使教育与战争、生产脱节。

这就是我们对党目前所提三大任务及其相互关系之认识，把这些任务应用于淮北目前环境，使之具体化，便是反扫荡、反蚕食与敌伪区工作（对敌斗争）；便是统一战线与反磨擦（对顽斗争）；便是春耕夏收的生产运动（改造自然）；便是整风学习（改造思想）。这些问题，陈毅军长都有很明确而有系统的指示。区党委完全同意，并决定即以陈军长之指示作为淮北党今后斗争之方针。现在我只根据淮北情况加以说明和补充，并提出一些具体意见分述于后。

一 关于反扫荡与反蚕食斗争

我们完全同意陈军长对敌人扫荡之估计及我反扫荡之方针与战术。经过陈军长这一明确的指示，使我们今后在反扫荡与反蚕食斗争中更有把握了。现在我对这个问题只着重说明下列几点：

首先，关于反扫荡战术原则。陈军长指出：华中三种不同情形，运用三种不同的战术，我们淮北大部分地区是属于第一种，即扫荡初期我采取阻拦与分散突围，中期到处打、与之纠缠，末期

则集中力量突击以击退敌人。这是非常正确的。我们去年冬季的反扫荡正是执行了这一原则，但在执行中某些部队还有缺点与不正确认识，我在《拂晓》杂志第二期上已做了文章说明，现在要特别说的就是在反扫荡初期，如何去阻拦敌人的前进。我们去年反扫荡初期，就只有分散突围与转移，而未执行阻拦战术。当然在敌人大兵包围或箝形扫荡中，主力部队分散突围、转移阵地，以脱离敌人包围，避免敌人合击，使敌人扑一个空，是完全必要的；但为了阻拦敌人前进，便利我之转移，延误敌人之扫荡时间，疲惫敌之兵力，地方武装与留下之一部分主力，必须尽一切可能给敌人进攻以必要打击，不要大家忙于转移突围，一枪不响，反而助长敌人锋焰，降低自己勇气。这种必要的打击在事实上也是可能的。以我地区之大，民族矛盾之深，敌人兵力之薄，伪军战斗力之差，敌人之空隙到处可寻，击敌之机会即随处可找。去年，三十二团一个连在泗南魏营子之对敌袭击，即其一例。即此次淮泗敌人分几十路进行箝形扫荡，实际上在黄昏之后也到处有击敌之机会，这即是陈军长所谓“敌在集中时占有强大优势，但在分散中则我占优势了”。我们不要为敌人的集中优势所吓倒，不要以为在敌人扫荡中到处是天罗地网，我们枪一响就无处可逃。当然这要看当时情况灵活运用，不是无条件的打，致被围歼。

其次，是关于反蚕食斗争。这在淮北目前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在两个扫荡之间敌人对我的主要办法就是局部蚕食。事实上从去年扫荡结束之后，敌人依靠着泗宿公路^{〔1〕}，时时在进行对我蚕食。前有潘山闸塘之紧张，现则刘圩马厂告急。今天顽我磨擦中，敌人必更加紧对我乘机蚕食。最近淮泗之东陈集，邳睢铜^{〔2〕}之叶场，都是这样被敌人占据的。因此，我们必须以最大的警惕来把握反蚕食斗争。除了陈军长报告及区党委关于反蚕食指示外，我

们在军事上必须把地方部队的就地纠缠（不让他前进），主力的机动突击（打击其跃进部队）与便衣武装的深入敌后或围敌据点（使其寝食不安自顾不暇）三者配合起来。在政治上则需团结自己（各阶层团结，党政军民团结与党内团结，勿予敌人以间隙），肃清内奸，瓦解敌人三者并重。因此，有些同志说反蚕食以地方武装为主，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第三，是关于敌占区工作。这是淮北党最弱的一环，很多地方尚未开始，甚至连脑子里想都未想到，而今天恰恰又是极其重要的工作。无论在反扫荡（便于我之转移），反蚕食（以蚕食对蚕食），反清乡（使敌人清不胜清），与对顽斗争（使顽无地容身）及储蓄力量准备反攻，敌占区工作的建立，都有其极重大的作用。因此，我们今天必须以最大的注意来建立周围的敌占区工作，尤其是农村工作。区党委已指定专人负责设立敌区工作部，各县必须指定专人（即使有一个人也好）来研究与了解敌占区情形，找到线索与社会关系来建立敌占区组织。尤其是新沦陷区域，敌人据点又已经站稳地区，更须抓紧与敌人斗争，来阻止敌人向外蚕食。这就须要正确把握三种方针，即是发动群众的合法斗争，掌握对伪军的两面政策，加上灵活隐蔽的武装斗争。这三者能够适当的配合起来，敌占区工作才能大大的发展。当然这是指淮北周围被敌占领之农村及敌人新占领区而言，至于敌占城市及主要交通线工作，则是采取长期埋伏的政策（组织上的短小精干，伪组织中的两面态度），而不能轻易去发动合法斗争（不是不能发动），尤不宜进行武装斗争。现在我来说明在敌占区农村中如何运用这三种方针：

甲、如何发动敌占区群众的合法斗争。这要从减少敌占区人民的痛苦出发。敌占区人民要完全避免敌伪压迫与榨取是不可能

的，但如果能适当采取合法斗争的方式（如告状，派代表哀求请愿，以至怠工，造假报告等，要求其减轻派捐或延缓兵役工役期限）与敌伪作斗争，是可以减轻其压迫及榨取程度的。即使达不到减少痛苦的目的，也可以从此揭发敌伪之欺骗面目，以增长敌占区人民对敌仇恨，增强其斗争勇气，造成敌伪之困难。但要达此目的，我们的口号，必须是当地广大群众当前的迫切要求，才能发动广大群众起来参加这一斗争；要有广大群众的一致行动，而又采取了敌人可以允许的合法方式，合法斗争才能发生效果。同时由于敌人企图采取怀柔政策以收买人心，敌人对中国国情并不十分清楚，而敌伪、伪伪间又矛盾重重，我们只要真正动员了广大群众的一致行动，而又采取了合法方式与妥善可行的办法，合法斗争是可以收效的。过去××反对上青苗税的斗争，及××区抵制交公粮的斗争，都是这样得到胜利的。目前敌人在敌伪区抽壮丁当兵，筑堡挖沟，统制食盐食粮，夏收时强买小麦等，都是敌占区民众所最感痛苦的。我们如能针对这些痛苦提出办法，领导他们进行合法斗争，敌占区工作是不难开展的。合法斗争的结果，群众必然要求武装配合，同时也就产生一种力量，给予伪军伪组织以很大威胁，而更加强两面化。因此，合法斗争的开展就创造了武装斗争的前提与增强对两面派的控制。

乙、在敌占区农村中组织武装进行武装斗争。这是开展敌占区工作不可少的一环，尤其我们要在敌人新占领地区坚持斗争以及要把敌占区转成游击区，达到以蚕食对蚕食之目的，没有武装的建立与坚持是不可能的。过去泗宿潘山区之严重局面以及今天刘圩区之变化，基本原因就是由于没有地方武装与武装不强之缘故。刘圩区干部在区队调走后总想以单纯隐蔽方式及利用伪军两面派以达到坚持目的，而不从建立武装方面着想，结果是藏枪被

搜缴，人员被捕杀，伪军、伪组织中之两面派变成了一面派，这是何等痛苦的教训。这些地方干部常常把武装斗争的希望单纯寄托于主力之突击，而不自己下决心去创造当地武装，自己去掌握武装，这是错误的。当然为了便于沦陷区斗争之坚持，便于敌占区工作之开展，主力部队与边区地方武装应有计划地派部队深入敌后，迫近敌人据点，给敌伪以打击和威胁，这是必要的。各分区及总队部对此行动不应是消极的应付，而应作积极的布置。但应该知道，这只是给开展敌占区工作以有利条件，而沦陷区之坚持与敌占区工作之开展，主要还依靠于当地武装之建立与培养。因此，敌占区武装开始可由部队中派出，以后就应在当地群众中，发动斗争坚决、觉悟较高的工农与知识青年组织武装，数量不必求多，质量必须纯洁，甚至采用不脱离生产的游击小组方式亦可，晚上集中活动，白天仍分散做活，以后逐渐扩大逐渐走上脱离生产。但不论何种武装，必须化装便衣，隐蔽活动，并以新四军面目出现，不要以当地武装出现，以免一开始就引起敌人在群众中搜索摧残。

丙、如何运用两面政策。这对敌占区工作的建立与开展是有决定的意义。我们的两面政策有三：第一种是我们派出的内线工作，以两面手腕取得敌人信任，而实际是做我们的工作，这叫做革命的两面派；第二种是伪军、伪组织中之同情爱国分子，表面与敌人敷衍，暗中同情帮助我们，这种同情分子我们应该爱护之，替他守秘密，一般情报与采买工作不要他做，以免被敌人发觉而受危害；第三种是纯粹两面派，或三面派，对敌人敷衍，对我也敷衍，对顽也敷衍。但这种两面派是会变化的。他变好变坏不是靠他的良心，而是看我们对他的政策如何与力量大小来决定。如果我们对他们一律采取消灭打击政策，不采取争取政策（像抗战

初期那样），不容许两面派存在（如在我根据地内），则他是不会做两面派的，两面派也不能存在。如果我们容许他做两面派，但我们力量不大，不能威胁他，那么他亦不会做两面派，而会甘心附敌或附顽。我们对这种两面派是采取控制政策，使他不敢反我，而长期保持其中立地位。如果他态度变化，企图反我时，我们有办法制服他，或者消灭他，使他不敢作坏事。因此，就要我们有控制他的力量。这种力量指什么呢？第一就是自己的军事力量，第二就是当地群众力量，要能与之作合法斗争，第三就是要懂得利用敌伪、伪伪、顽伪之间的矛盾，懂得使用这种“间接后备军”的力量。在宿东^[3]与肖铜^[4]那种敌我力量悬殊的严重环境下，我们之所以能始终坚持，能控制两面派者，就是具备了这三种力量，而又懂得使用这三种力量的缘故。从此也就可以知道武装斗争、合法斗争与两面政策是三位一体的，不可分开的。除了政策上容许两面派的存在，力量上能够控制他之外，还要组织上能够掌握他。这就要调查研究，了解对象之具体特点、他的为人如何、他有什么力量、他中心要求何在、他与敌伪有什么矛盾、谁人能够制服他、谁人才能接近他等。要有具体的组织工作，我们才能达到组织上掌握两面派的目的。

二 关于交朋友工作与反顽斗争

这个问题，陈军长作了一个有系统的指示，使我们明了整个国共关系与我党斗争方针。现在我要特别说明的是对土顽^[5]政策问题。历来我们对土顽的方针，是根据反共军东进与否来决定拉或打的政策，因为他们与反共军是一个系统，常常反共军东进之前，土顽即积极活动，以为配合，因此，打击土顽便成为阻止反

共军东进的首要步骤；同时，争取与土顽团结，又成为解消反共军对我仇恨的桥梁。因此，我们对土顽的拉与打都是为了巩固国内团结抗战局面，为了减少与停止友我之间的磨擦事件。过去陈道口、张小圩子战斗^[6]是根据这个方针，去年释放许、徐、赵^[7]等也是根据这个方针，今年山子头事件^[8]及在灵北解决雷杰三^[9]也同样是根据这个方针。但我们应该知道，在军事上完全消灭土顽是不可能的。今后我们对土顽：（一）仍应本团结宽大方针，在团结过程中中立其一部分，争取其一部分，而使其中最顽固者孤立而趋于消灭。（二）在没有反共军东进威胁之时，我们与土顽可实行分疆而治，但不要自己吃亏太大。（三）在团结中向我进攻者，不问任何人，我应采取坚决的自卫立场，但应先礼后兵，经过责问、抗议等手续，以尽我之情义，如此次我对灵北土顽之还击便是如此。（四）在还击时应查明具体对象，分别拉打，分别今天打与明天打，而不可一打就一切都打，全盘翻脸，这种打法是会使自己孤立的。此次我虽对灵北用兵，但只打雷杰三、唐广金与朱大同^[10]等，而对赵觉民、刘天展^[11]等我们还保持友好关系。当然，他们配合向我进攻时，我们只能自卫。（五）要以土共^[12]对土顽，以据点对据点，这即是说，要在建立我们的武装与政权之后以我们的政治设施与土顽对抗，才能使群众脱离土顽而让土顽自趋于消灭。去年张小圩子战斗后正是没有实行这一着，所以今天还有灵北之役。（六）对友方回乡人员仍照以前师部及行署命令执行，以稳定这些人员，扩大我之影响，消除其反共成见。

三 关于生产运动

此问题我想补充三点

（一）如何完成春耕生产运动？

今年我们的春耕生产有很大成绩，水利建设大体完成，春耕播种大部完毕，垦荒正在进行，植棉种树各地也有成效。现在是接近夏收，但在完成春耕生产上目前尚应注意解决下列几个问题：

第一是垦荒问题。这是兴修水利后的大问题，也是兴修水利的果实。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使这个果实真正落到直接生产的基本群众手里，以大大增进边区的农业生产，并解决一部分农民无土地及土地缺少的问题。各地党要保证行署垦荒条例之正确执行，很好的去分配荒地，组织劳动互助，发放垦荒贷款，发动和帮助群众垦荒，以完成今年垦荒计划。一定要防止以前安河疏浚后荒地落到少数大地主手里的现象。

第二是救荒问题。这是今年边区很严重的一个问题。泗五灵凤、盱凤嘉、泗南等严重之灾荒现象（灾民吃草饿死人），普遍飞涨的粮价（两周内飞涨一倍），这给基本群众以极大打击，给边区生产以极大损害。各地党与政府（尤其灾区的）必须以极负责的态度来迅速处理这个问题，必须保证不致饿死人，行署已决定拿出一千石小秫秫，四十万斤豆饼在泗五灵凤办理无利借贷，并拨粮款救济，这是很必要的，望迅速办理。

第三是发动私人借贷问题。这是解决春荒完成春耕生产的最有效办法。只有广泛发动私人借贷，才能解决贫苦民众的需要，政府今年虽尽了最大力量实行贷粮贷款，帐灾平粜，但还是杯水车薪，难于解决问题，这里就需要克服各地党对借贷问题之消极态度，同时又要防止重复去年之集体强借现象。要把救济与借贷区别开来，借贷与平粜区别开来，以解决今年的春荒与春耕问题。对银行二百万边币^{〔13〕}贷款及五百担熟铁，需保证借到贫苦的生产群众手里，并以此来提高农救会之威信与作用。

第四是粮食问题。要采取有效办法降低日益飞涨之粮价。目前急需进行的是以乡为单位禁粮出口，以区为单位统筹调剂，同时拿出一部分公粮办理平糶，以期抑平粮价。政府必须尽一切办法达到降低粮价之目的。这是目前贫苦工农群众最迫切的要求，也是增进生产的基本关键，党政机关与群众团体必须迅速有效的解决这一问题。

（二）准备夏收。

夏收转瞬即至，今年夏收中应特别注意解决下列问题：

第一是武装保卫麦收。主力军地方军与民兵应密切配合，防止敌伪抢粮、蚕食，掩护群众收割，以此来动员群众进行反蚕食斗争。

第二是组织与调剂劳动力问题。如何动员所有人力参加麦收，如何保持粮食工资，如何有组织的使用劳动力，研究劳动互助、换工、集体劳动等办法，以提高劳动热情与效率。各县区工会应设劳动介绍所，介绍失业工人，以提高工会威信。

第三是检查减租减息法令之执行，彻底消灭明减暗不减现象。去年未减者，今年要坚决退租。边区新地区（如泗灵睢^{〔14〕}）也应普遍减租（不一定三五六五分），注意协商求让方式，但总要减，不能认为边区新地区不要减租。灾情严重地区春荒时所借粮食，利息太高者，应予特别减轻，由各阶层协商方式，给以适当规定，以免灾民因今年灾荒打击，数年不能恢复元气，而影响社会生产。

第四是调剂粮价，防止谷贱伤农。各地应组织粮食合作社，政府应成立粮食调剂机关，必要时以部分粮食有计划出口，以资调剂。

（三）机关部队的生产节约。

陈军长很明确的指示我们生产不仅是今后财政给养与改善生

活的主要来源，而且是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团结中间阶层，锻炼思想意识，创造建设工作干部的基本要素。因此各部队各机关必须切实开展生产运动，完成师政及行署所订的生产计划。这就需要：

第一，打破在战争和整训中不能生产的不正确观点，要从积极方面去研究在战斗环境与整训中如何进行生产、保持生产，研究新的方法方式。

第二，集体生产，专人管理，是部队生产的胜利经验，各级应有组织的去执行生产运动。

第三，种菜、养猪、垦荒种粮是生产中心，各部门应集中力量经营，并研究改进生产方法（如选种、施肥、改进播种方法等），提高生产效率，以推动当地群众生产力之提高。

第四，厉行节约，反对贪污浪费。克服目前严重的贪污浪费现象与随之而来的干部腐化与逃亡叛变，这是目前急不容缓的要图，这不仅是财政经济问题，而是与整个政治密切相关。各级党政机关必须纠正不可容许的对贪污浪费的漠视态度与放任政策。必须建立严格的审查制度与审计机关，确立会计制度，开展反贪污浪费斗争，严厉执行经济纪律，对贪污分子予以严惩，直至枪决。

四 关于整风学习

整风是改造自己，改造党，使党布尔什维克化的基本办法，是保证中国革命胜利的基本条件。淮北与四师党自去年六、七月间开始整风以来，已获得了初步成绩。一般干部对整风认识学习情绪之提高，党性与组织观念之加强，粗枝大叶作风之开始转变，实

事求是精神之开始实行，这就推动了工作之进展。但今天说来，我们的整风运动基本上还停顿于阅读文件阶段，只起了思想上的启蒙作用，至于歪风之真正整顿，干部思想意识与思想方法之改造，则尚相差甚远，这是我们的最大缺点。为什么如此呢？主要原因是由于负责人推动不够督促不严，只把责任交之宣教机关，因之上层干部学习差于下层。这里我个人是首先要负责的。但整风方法只停顿于阅读文件阶段，未与业务工作的检讨联系起来，未从自己的反省与自我批评来整自己的歪风，未从调查研究工作的建立来断绝歪风的根源，整风本身就是主观主义的形式主义的。因此，今后的整风学习：

第一，应该着重于高级干部之整风，整风重心在师、旅区党委、地委两级，其次是团级县级干部，其次及于一般干部。区党委整风轮训班继续办。

第二，健全各级学委会组织，从上而下的推动，各级负责人应以身作则。

第三，整风应与业务学习联系。要从检讨与改进各部门的业务工作中来检讨干部的歪风所在，歪风之是否改正，也应看其所担负的业务是否改进来表现。

第四，整风应与自己反省联系起来。应从自己的全部斗争史、思想变化之全过程，来检讨自己的歪风与歪风的根源，对自己来一个彻底检讨。陈军长说：“整风不是从外来整，主要从自己内心来整，自力更生。”这是很对的，应该反对整风之形式主义，敷衍了事。

第五，整风的基本方法是加强调查研究。因为一切歪风都从主观主义缺乏调查研究而来的。没有调查研究精神固然形成主观主义，但即使有此精神，而没有调查研究工作，则仍然要犯主观

主义。因此，要根本把风整好，必须培养调查研究精神与建立调查研究工作。其办法有三：一是经过各个系统，各自调查统计，即业务调查；二是负责干部亲自下手，各人调查一个典型东西，以求精通；三是区党委仍设调查研究室，收集各种材料，或指定某部门某同志供给材料，加以统计，加以研究。

第六，至于各级干部的业务学习，应建立越级训练制，即边区各部门训练县级干部，地委分区训练区级干部，县各机关训练乡级干部。

注 释

- 〔1〕 泗宿公路指泗县至宿县的公路。
- 〔2〕 邳睢铜指邳睢铜地区，当时包括苏皖交界的邳南、睢宁、铜山、灵璧等县。
- 〔3〕 宿东指宿东地区，当时包括安徽宿县东部、灵璧县北部和苏皖交界的肖县、铜山县。
- 〔4〕 肖铜指安徽省肖县和江苏省铜山两个县边区结合部，当时划为肖铜县。
- 〔5〕 上顽指当地的反共顽固派。
- 〔6〕 陈道口、张小圩子战斗，（一）陈道口在江苏省泗阳县西北，一九四一年七月，韩德勤为接应汤恩伯集团东进，命所部国民党江苏省保安第七旅旅长兼第三纵队司令王光夏率两个团侵占了陈道口。同年十月十五日新四军发起陈道口战役，在陈毅代军长亲临前线部署和指挥下，经七天战斗，攻克陈道口，生俘国民党官兵一千二百余人。从此，淮南、淮北、淮海、盐阜四块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二）张小圩子在安徽省灵璧县北部，是汤恩伯集团东进的跳板。一九四二年三月六日，新四军第四师第九旅旅长韦国清率部攻克张小圩子，生俘国民党反共地方武装第十七纵队司令许志远、灵璧县县长赵觉民以下官兵三百七十余人。

- 〔7〕 许、徐、赵即许志远、赵觉民、徐合璧（国民党泗县县长），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七日我九旅二十五团攻克顽军盘踞之南三集时被俘。
- 〔8〕 山子头事件指一九四二年三月十四日，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亲率第八十九军、独立第六旅、保安第三纵队等部侵占我淮北抗日根据地中心区金锁镇、山子头一带。三月十七日夜，彭雪枫率第四师第九旅和第十一旅，在第二师第五旅、第三师第七旅一部的配合下，对盘踞在山子头地区的韩德勤部实行自卫还击，至十八日上午胜利结束战斗，全歼韩德勤总部、独立第六旅、保安第三纵队，生俘韩德勤以下官兵一千余人，击毙独立第六旅旅长李仲寰、保安第三纵队司令王光夏。后新四军以团结抗日为重，将韩释放，并发还部分人枪，促其觉悟，共同抗日。
- 〔9〕 雷杰三系盘踞灵璧北部一带地方反共武装头目，当时任伪安徽省保安区司令。
- 〔10〕 唐广金系盘踞灵北一带伪军头目；朱大同当时任国民党肖县县长。
- 〔11〕 刘天展当时任国民党睢宁县县长兼常备旅旅长。
- 〔12〕 土共指共产党领导下的当地武装力量。
- 〔13〕 边币是中共淮北区委为与日伪进行金融斗争，于一九四一年底决定成立淮北地方银行，发行一角、二角、五角、一元、二元、五元、十元、二十元票面的纸币，称边币（又称抗币），它同陕甘宁边区银行发行的纸币（也称边币）不是一种货币。
- 〔14〕 泗灵睢是安徽省的泗县、灵璧和江苏省的睢宁三个县边区结合部，当时划为泗灵睢县。

典型的主观主义与痛苦的教训*

(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我已把此次泗阳案件破获经过与审查情形叙述过了，这就无情的暴露了泗阳县委标准的主观主义，也给我们区党委同志以很大的警觉。在这个案件初期，我们也带了一些主观主义成分。关于泗阳县委的主观主义，我前次在谈话中已经指出过，现再补充几句。泗阳县委的主观主义：

首先表现于他们对这个案情的看法是唯心论的，是不从实际出发，而从自己的想象出发；不从客观事实中去找根据，找人证物证，而是从极不可靠的口供中，从道听途说的材料中去找根据；不是实事求是，而是自以为是；不是把可能与实际区别开来，而是把可能当作实际。总而言之，他们对人对事对物的看法是唯心论的观点，而不是唯物论的观点。一直到现在，经过了区党委会议的审查，经过了人证、物证及几个主要分子的会审，而又经过刘主任^{〔1〕}在泗阳召集区以上干部会议反映出更多离奇材料之后，朱鸿翔同志^{〔2〕}还未彻底转变。据说他还这样说：“我的错误就在没有把这些材料收集起来，供给区党委作为审查判案的根据，至于

* 这是邓子恢在淮北区党委会议上所作的《泗阳案件审查情形与经验教训》的报告第五部分。

这些人，我总认为是不假。”这是一种什么观点？是怎样想法呢？无疑的这是唯心论的观点。他们既知主要错误在事前没有收集材料，那末今天为什么不去收集呢？既然事前没有把材料收集齐全，那么过去凭什么理由确定人家是特务？今天又凭什么理由仍然说这些人不会假呢？谢骥同志^{〔3〕}在区党委作了初步总结以后说：“现在我无话说，但过了两年之后你看这些人是不是？”这同样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想法，这就说明他们判断这些人是特务，不是凭事实，而是凭自己脑子的想象，既然人家今天不是，过了两年为什么一定又是？当然人是会变的，今天不是，过了两年个别分子可能会真是，但究竟哪一个真，还需要根据将来具体材料来决定，谢同志不根据材料，甚至两年以后的材料他可以预先知道，而在今天就武断的确定人家两年后是特务，这不是只凭想象不凭实际的具体反证吗？这不是主观主义的典型例子吗？

其次表现于他们对人对事对材料的分析，是只看表面不求本质，只看形式不问内容，只看片面不看全部，只估计一种可能，不估计另一种可能，只把各种现象凑合起来，而不研究其时间空间是否符合。这里最标准的例子，是对那几个人证物证的提出。如尹熙那个本子，裴昌士的本子，王佑昌、羌广俊从狱中写出来的信，就是只看形式而不追究其内容；对何明取款收条与三青团法规，就是只看表面，而不考察其本质，不追究其来源；对羌广俊写给许乃平那封信，不仅信的内容是道听途说，就是信的寄法也不研究（如果有政治问题就不会经过区署），甚至把尹熙泄露秘密的事情凑上去，更是离开时间空间的乱凑；对田、高破坏河堤破坏灭蝗的材料及对他们历史出身的看法，则是只估计一个可能不估计另一个可能；对何明、李黎、李辛及许多干部的看法，对泗阳环境及陕甘宁事件爆发后时局的分析，都是只看片面不看全部，

侧重一面，而忽视其另外一面。县委对此次案件中，因对某些分子抱肯定的态度，便因此联想到既然你是的那么他也是的：既然田、高是特务，那么龙集区特务就很多；既然地方这样多，那么七大队也一定有（县委估计）；既然张继良是，那么二连连部还能没有组织吗（谢问张继良语）；既然何明、李黎是的，那么与何、李很好的王子英还能不是吗（这是县委积极追究王子英的出发点）；既然县委秘书是，那么文书还能不是吗：既然老婆是那么老公参加特务你能不知道吗（××这样向李辛追问孟星野）。泗阳县委就运用了这一套的三段式的论理学，运用这样一套所谓辩证法的联系，把泗阳特务案子一个联一个，一处联一处，一个单位联到另一个单位，而在脑子里从来就不去追究这些联系中间还要具备什么具体条件。因此，就把泗阳案件扩大到了全县，扩大到了每一个单位，如让他这样无止境的联系下去，那也会如勒东乡老百姓所说：“如果王股长再住几天，我们勒东乡就一个好人也会没有了”。这就是泗阳县委主观主义的另一个表现。

第三个表现是先入为主，自以为是。饶政委^{〔4〕}说：“主观主义者并不是完全不调查，但是他们的调查是为了自圆其说，而不是就事论事”。他说“任何一个主观主义者不是完全没有材料的”。这几句话正是泗阳县委对此次案情的具体写照，泗阳县委对此次案情某些人，是找到一些材料的，但这些材料是真是假？是疑似还是铁证？是一重性的还是两重性的？这些问题他们就不愿意去研究，对反面材料就更不愿意去考虑。他们对材料的态度是粗枝大叶，马马虎虎，一知半解，道听途说，只管调查，不加研究。为什么如此呢？因为他们的调查研究不是采取实事求是就事论事的负责态度，而是为了自圆其说，拉来凑数的。是为了证明他们先入为主的主观成见的。很显然的，他们所收集的材料已一个个破

产了。这些材料难道他们事前一点不感觉其假吗？问题在于他们的先入为主，自己先在脑子里确定了这些人是特务，因此就不问材料真假，不愿加以研究，只要有材料，只要可以附会得上，都一起拿来凑数，拿来证明自己的见解不会错。这里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他们第一次逮捕十三个党政干部的主要根据，是那两封从监狱里偷传出来的信，但这样重要的信，依据以逮捕党政干部的信，他们主要负责人朱、谢两同志却不愿意去看。曹局长⁽⁵⁾则亲眼看过，知道这个信的内容不能作为判罪的根据，但他却把这个信丢掉，不交给朱、谢两人看，不拿出来研究研究，而却根据这两封信去逮人（假如当时县委对这两封信亲自拿去看看，拿来研究研究，那么当时可能不会如此轻举妄动）。这是什么道理呢？这就是先入为主，心存成见，所以一听到材料，就再不愿加以调查，更不愿加以研究，而即当作材料，拿来自圆其说。正由于县委这种先入为主，心存成见的主观主义，因此，就影响到他们的立场。现在事实上他们是表现对革命对人民大众不负责，对党不负责，对上级不负责。不管他们主观上怎样说：“我对党负责”，但这种主观上的负责又有什么用呢？我们并不需要这样的负责。也正由于这种先入为主心存成见，因此，也就客观上形成他们的宗派主义。这种宗派主义不仅表现在对党外人士一般表示不信任、不尊重，任意打击，任意糟蹋，即在党内也显有偏心。县委对田照林、高有林、张继良、李黎等之肯定态度，还可以说是因为这些人历史表现不很好。但对县委秘书王子英同志一贯表现好，为什么也如此肯定，非逼到人家承认不可？同是一个犯人口里供出来的人，又同样没有材料，而县委对某些人是特务则深信不疑，对另一些人则不肯相信，说人家胡扯，这是什么道理呢？这除了宗派主义还有什么理由可以解释？

这是泗阳县委主观主义的具体表现。关于区党委在泗案初期，因为没有亲自动手，对案情严重性不了解，但却过于信任泗阳县委与唐劲实同志^⑥，在田、高等未捕前虽去函严厉阻止，但已捕之后，却未及时警觉，一直到二月底区党委会议，我们还是比较相信泗阳县委与劲实同志，对泗阳案件怀疑不大（虽然当时只知三四百人），这里就显然有主观主义成分。主观主义表现在哪里呢？表现在对事情没有亲自动手，没有弄清楚，便过于相信泗阳县委，甚至易林同志来区党委伸冤，对泗阳案情严重已有些知道，而仍然信任泗阳县委之报告，把易林同志监视起来，这也是缺乏实事求是，过分相信组织的原故。当然，问题的发现与了解是辩证法的发展的过程。此次区党委对泗阳案情之了解，是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开始是不容易知道的，因为案情大、复杂，一直到最后做初步总结时，还异常慎重。这种态度是对的，但过去未经过调查而过分相信泗阳县委则是不正确的，是带有主观主义成分的。这点，给我们区党委同志是极大的教训。

我们得到了什么教训呢？总结起来有几点：

（一）一定要调查，要从实际出发。在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以前，千万不要随便说话，不要轻易做结论（宁可迟一点不要紧），也不可以轻易相信人家，相信下级报告，尤其对那些未经过详细考查了解清楚的人更不可轻信。这里，要把对事与对人分别开来，要从对事的了解中，去了解人，特别是对重大事情与中心工作一定要详细调查清楚。否则，就要吃大亏。这次泗阳案件当然是一个重大案件，是一个新问题，而我们很久未注意去调查，而又轻信县委与公安局的报告，因此损失太大！这是第一个教训。

（二）调查一定要是就事论事的客观态度。事前要毫无成见，不可先入为主，不管对哪个人，哪个阶级，即使他是大地主、反

动派，以至明知是特务，我们对收集材料分析材料时，也应该毫无成见，完全客观，极端冷静。只有这样的态度，才能把这个人这个事弄清楚，才能使党处理这个人这个事不会弄错，这才是对党对革命负责的态度。否则，即使有调查也要犯主观主义。此次泗阳县委就是先入为主，心存成见，所以不去找材料；就在找材料时，也是带着有色眼镜，合乎自己口味的就要，反面材料就不要。因此，把案情弄到如此之糟。“处理问题要有一定立场，一定主观见解；分析问题，了解问题就要完全客观，毫无成见”。这句话，在这次泗阳案件中就可以真正理解了，这就是第二个教训。

（三）要全面调查。调查时，要将全部有关材料收集齐全，再从其中研究其重要关节所在，然后才能做结论。因此，调查时，自己就要耐烦细心，再琐碎、再细小的材料，甚至三言两语，片纸只字，都要珍惜重视，耐心收集（常常重要材料，就在片纸只字与琐碎事情中）。不仅收集正面材料，还要收集反面材料。此次区委对泗阳案情之审查，就是从各方面来搜集材料，既调查全案破获过程，又调查某一阶段与个别分子；既调查人证物证，又调查口供；既凭案卷与书面材料，又找案犯谈话；既从上层了解，又从下面调查；既收集正面材料，又收集反面材料。因此，才把这个牵连一千多人的大案件了解个大概，而做出了初步总结。此时不仅要细心耐烦，尤要客观冷静，不能急躁粗心，对任何材料不能表示厌恶，也不要表示欢喜，致给人家察言观色，投你之所好。此次泗阳县委之所以犯错误，也就在此。他只重视材料之一面（口供），而放弃材料之更重要一面（证据）；他只收集正面材料，而不收集反面材料。对正面材料，他表示非常欢喜，而对反面材料则深恶痛绝，听也不听。这不仅对自己的工作干部如此表现（如田古同志反映界集情形就是如此），而且在犯人面前也真情毕

露，致给犯人以“望闻问切”，就迎合他的心理，乱串乱供。这就是第三个教训。

（四）既调查，还要研究。光调查而不研究，则收集材料不能解决问题；只一般研究，而不深入研究，也会一知半解，把问题弄错。此次泗阳县委之所以犯主观主义，不仅不注意调查材料，而尤在于不研究材料与研究不深入。上述许多人证物证之所以破产，就是由于他们对这些材料不去研究，或者马马虎虎研究一下，便拿来凑数。对犯人口供也自满于人家承认了便以为胜利，而不去加以研究，究竟这些口供是真是假，有何作用，这些问题在他们脑子里是不加以考虑的。区党委此次对泗阳案情之发现，不仅依靠于收集了各方面材料，而尤其依靠于对这些材料之研究与审查；不仅靠几个人之了解，而且集中了各方面干部来研讨。因此，才最后确定了这些材料，而做出了初步结论。有些材料，如几个本子，几封信，某些破坏行为，在开始我们听到这些材料，未加以研究的时候，在自己主观上也以为这大概不假。但后来下手研究，便一个个变了，特别是羌广俊致许乃平信的内容及尹熙泄露秘密的事最为明显。这种情形骤然看来，谁也会信以为真，以为是三青团铁证，但随后加以追究，却大失所望。这就告诉我们，既调查，还要研究。不仅要一般研究，而且还要深究，要从各方面去研究；要从表面到本质，从形式到内容，从片面到全面，从静的到动的，从空间到时间，从过去到现在，从现在到过去，要这样精深研究，才能把问题弄清楚，否则就要犯主观主义。这是第四个教训。

（五）要亲自动手突破一点。此次泗阳案情如此严重，拖延如此之久，就是我们自己不动手，而光靠劲实同志去干。因此，下面闹翻了，我们还不知道。就在二月底会议以后，虽然决定了审

查清理，但开始还是交给梁部长⁽⁷⁾个人去办理。在此次案件发现中，梁部长费了最大力气，起了极大作用，有了很大成绩。没有梁部长专人负责，那案情发现可能还要迟一些。但如果只有梁部长负责，而我们自己不动手，那区党委对这个案情之了解，也可能不会这样快，不会这样清楚。我记得在三月初梁部长询问泗阳案情时，问一个翻一个，当时梁部长已感到案情可疑，但我当时还感觉不大，直到后来我亲自动手，审查物证，亲自找几个人谈话以后，我的感觉就与初时大不相同。特别是谢培高那个本子给我教训太大了。那样负责的同志，那样详细的追问，那样明确的回答，而事后都是完全相反，这就使我深深感到：如果不亲自动手，而只听别人报告，那事情是会弄糟的。就是梁部长这样的干部，他的经验很丰富，对党很负责，似乎他去负责就够了，自己可以不必动手，但此次事实告诉了我，自己不动手还是不行的。因为梁部长究竟还是梁部长，他的了解，还只是他的了解，而不是我的了解，有些问题各人有各人的看法，自己不动手，光听人报告，问题是发觉不了的，就别人发觉了来报告，自己感觉也不会那样深刻，因而问题解决也就不会那样恰当。因此，如果要把问题弄清楚，那么一定非亲自动手不可，这就是实践对于理论的根源性。但事情这样多，样样要亲自动手，哪里办得到呢？这就要采取突破一点的办法。要样样都自己动手，不可能也不需要，只要能自己动手突破一点，突破最重要的一点，那么你对问题的全部轮廓就可了解其大概。而要使一点突破，必须就这一点彻底弄清楚才行。如果连这一点都一知半解，那么你对全面认识一定很模糊，结果一定要犯主观主义。此次泗阳案情，一般的是依靠梁部长与其他同志，我就抓住几个人证物证，与几个主要分子自己动手调查研究，从找材料，分析材料，看报告，听报告，与县委

同志谈话，与主要分子谈话等，把这些材料这些人弄明白后，我对泗阳全案的了解，就有一个大概。因此，不待全案查完，我们就可以做初步总结，可以提出处理方针。亲自动手，突破一点，这就是我们在泗案审查中所得到的第五个教训。

泗阳案情太严重，损失太大了，但给我个人、给区党委、给全边区党的教训也太宝贵了。这个教训是什么呢？就是长期牢固地潜存于我们干部中的主观主义，此次开始被我们发掘出来了，找到了典型。过去有许多同志总以为我没有主观主义，主观主义要上层领导机关才有，要负领导责任的同志才有，我们下层机关，工作人员、技术人员、事务人员是不会有的，此次泗阳案件的审查中把这个错误观念打破了。此次，泗阳犯主观主义的，不仅限于县委几个同志，而且公安人员也有；不仅县级机关有，而且区、乡干部中也有；不仅领导同志有，而且工作人员、技术人员中也有。某些同志听了我的报告之后，心里想锄奸部门为什么如此主观，好象别的部门就不会犯主观主义。我要告诉他们，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如果你犯了主观主义，不仅做锄奸工作会犯错误，做别的工作同样要犯错误。在春耕生产中，在订立兴家计划中，在组织群众的劳动互助中，某些同志不是同样有主观主义吗？不是同样使工作受损失吗？如果军队工作同志犯主观主义，那危害就更大。有些同志不仅对人、对事、对物的了解是主观主义的，即对自己的了解也是主观主义，只了解自己的片面，而缺乏全面了解。那些有英雄主义思想自高自大的同志，即是只了解自己的长处，而没有了解自己的短处。有权位观念的同志也是如此，结果是自己害死自己。有些同志以为泗阳县委真要命，这样主观，好象自己就不会这样主观，这种想法也是错的。从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干部，从旧社会里生长出来的干部，未经过党的教育与长期斗争的锻炼，

未经过切实整风，你要想没有主观主义是不可能的。泗阳县委几个同志以前自己何尝想到会有这样的主观主义，朱鸿翔同志以前大家都说他很稳重，很实际，但这一次却犯了这样大的毛病，这就要警觉我们全边区党的干部，大家好好来整风，好好来检讨自己的思想方法。问题不在于自己有无主观主义，或主观主义有多少，而在于自己了解主观主义是什么，了解自己的主观主义在哪里，有哪些具体事实，它给了工作以什么危害，给自己什么危害，如何来克服自己的主观主义。全边区的党应该拿泗阳这个典型例子来警惕自己，并作为一面镜子来照出自己的主观主义而彻底克服之，这就是在泗阳案件的审查中我们的最大希望。

注 释

- 〔1〕 刘主任即刘瑞龙，当时任淮北苏皖边区行署主任。
- 〔2〕 朱鸿翔，当时任中共泗阳县委书记。
- 〔3〕 谢骥，当时任泗阳县长。
- 〔4〕 饶政委即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治委员。
- 〔5〕 曹局长即曹玉林，当时任泗阳县公安局副局长。
- 〔6〕 唐劲实，当时任淮北苏皖边区行署公安局副局长。
- 〔7〕 梁部长即梁国斌，当时任新四军锄奸部副部长。

在淮北苏皖边区 第一次城市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

(一九四五年一月)

此次苏皖边区城市工作会议^{〔1〕},历时半月,讨论了中央与华中局指示,交换了各地新老经验,确定了今后工作方针与工作方法,虽然会议还是第一次,大家经验不多,有些同志对此工作毫无头绪,但在深入讨论中,使同志们对城市工作,在思想上有了一致的认识与重视,确立了同志们城市工作的决心与信心,同时初步了解了城市工作的方针与方法,交换了各地经验。这是此次会议极大的收获,关于今后具体工作计划另由吴、姚^{〔2〕}两部长来定。在会议中同志们所谈的许多经验与工作方法,亦由城市工作部以后整理成文,分别刊登城市工作通讯。我现在只就几个基本问题,来加以说明,倘有不尽适合之处,仍望同志们加以检讨。我现在分四个问题来讲:

一 城市工作在目前的重要地位

大家都知道今天的城市工作已提到与根据地工作同等重要的

* 此文原载《拂晓》第十六期。

地位，在目前来说，还超过了根据地。因为反攻形势日益接近，根据地党政军民工作已有了相当基础，而城市工作一般说来还在开始阶段，这就要求我们要以更大的力量来突击这一工作。如果说过去我们是以巩固根据地为中心，城市工作是以配合根据地巩固的意义来进行，是为根据地工作服务，那末今天就应利用根据地现有党政军民力量来突击城市工作。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根据地工作应为城市工作服务。为什么党中央如此重视城市工作呢？可分两方面来看：

（一）先从整个革命过程来看，非把大城市与交通要道工作做好，则革命的成功将是不可能的。因为：

第一，大城市是工人无产阶级的堡垒，那里是近代产业工人的集中地。中国城市工人虽然为数不多，特别在抗战以后，工人因失业而分散流浪，但产业工人总是集中于城市与交通要道，总是掌握着最先进的生产事业，工人总是人类中最革命最先进最有组织性的阶级。我们如不把广大工人阶级组织到革命战线上来，使他们成为革命的核心与领导者，则中国新民主主义的最后成功是不可能的，将来转到新的革命阶段将更无希望。

第二，大城市又是反革命势力的堡垒，不论中国反动势力与外国反动势力都集中于大城市，依靠大城市来统治农村，对付革命。因此我们如不能夺取大城市与交通要道，则不能最后消灭反动势力，不能取得革命的最后胜利。

第三，大城市是全国人民经济生活的中心，反革命阶级依靠着大城市的经济优势来支配农村，剥削农村。虽然中国城市对农村的支配作用，比之欧美要弱得多，但城市经济支配农村经济是显然的。我们今天的敌后根据地在农业生产上虽然可以自给，可以独立生存，但在工业品的供应则受着不等价交换的极大剥削，如

今天布价与粮价对比，差不多要十担粮食才换得一匹洋布，试问十担粮食需要多少劳动力，这种不等价交换中间要受多少剥削。如果我们不夺取大城市与交通要道，则这种剥削很难避免（当然我们可以在农村建设手工业，但发展是很慢的），而我之经济发展，就要受着很大阻碍。因此，我们必须夺取大城市与交通要道，才能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体系，使农村农业经济与城市工业经济联系起来，才能取得新民主主义经济更大的发展。

从此可见，城市工作与整个革命过程是不可分离的，中国革命可以首先在农村胜利发展，但最后必须取得大城市与交通要道，才能争取最后胜利，否则革命最后的成功是不可能的。过去的教条主义者重视城市工作是对的，他的错误不在于重视城市工作，而在于忽视了农村工作。在于先后倒置，不区别今天与明天，不懂得先在农村发展，而后再夺取城市。

（二）从抗战过程来看，夺取大城市与交通要道，从城市里消灭日寇收复失地，是我们反攻的主要目标。因此，城市工作之开展是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基本关键。这个道理很明显，因为：

第一，如果城市工作不开展，那末反攻时只有外攻，而无内应，则我们将无法攻下大城市，反攻胜利将不可能。

第二，我们攻下城市之后，是要使之巩固起来。如果城市人民事前没有组织，没有我们的核心与骨干，那末即使攻下之后，也难迅速建立革命秩序，难于巩固，有时甚至站不住脚，而被迫撤退。去年我们占领了大李集^③就是如此，因为事前没有工作，占领之后长期陷于混乱状态而难于巩固。大李集尚且如此，将来占领淮阴、徐州、蚌埠，更不必说了。

第三，如果今天不建立我们党在城市中的领导，则反攻时还有另一种可能：就是城市群众被国民党反动派欺骗来与我对立，或

利用群众情绪，过早发动武装起义，以出卖革命群众。这种情形已见之于波兰之华沙，结果是把华沙的革命群众送给法西斯去屠杀。

从上述两方面来看，就可以知道城市工作在整个革命过程与快要到来的反攻局面，具有如何重大的意义。因此，各级党委必须把城市工作提高到与根据地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改变过去不重视或不大重视城市工作的观点，以便迎头赶上，求得在今年上半年至少今年一年能收到显著成绩。准备配合世界大事变，在时机成熟时，夺取所有在我强大军队与强大根据地附近的一切敌占城市与交通要道，这是在我们反攻前一件极端重要又极端艰苦的紧急任务。

二 里应外合的战略思想

本来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建立革命政权的战略方针，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劳动人民在中心城市进行武装起义，以此来摧毁反革命堡垒，建立革命政权，这是马列主义的基本战略方针。为什么我们中国革命却采取这种里应外合的战略方针，这在形式上好象不同于马列主义，而实际上则是马列主义战略思想的发展，是马列主义革命战略在中国的实际运用。为什么如此，因为：

（一）马列主义组织工人武装起义的方针是指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国家而言。在欧洲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国家里，城市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中心，在那里农村经济完全打破了过去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完全成为城市经济的附庸，许多农村变成整块的农场、牧场，而附属于城市工业，因此，农村经济完全丧失了独立性。在这种国度里，农村离开城市就不能生存，因此，革

命如果不能在城市胜利，不能控制城市，而退到农村就不能生存立足，因为它没有足以生存的物质条件。如此次法国在城市与交通要道被德军占领之后，革命游击队就只能变成地下军，而不能有中国式或南斯拉夫式的革命根据地与游击区，就是这个缘故。所以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国家，那里的革命阶级要取得政权，取得胜利，就只有依靠工人阶级在大城市武装起义的方针，除此之外是不能取得最后胜利的。

（二）但在中国则恰恰相反。中国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因此它有两个特点：一是中国农村在经济上还是半自然经济，有极大的独立性，在政治上又是统治力量最薄弱的地方。中国统治者虽然依靠城市来统治农村，但不能绝对统治。相反的，农村倒过来可以包围封锁城市，像今天我们根据地封锁着敌占城市，在经济上给敌人以极大威胁。由于这个特点，中国革命便可以先在农村生存、发展与壮大。二是中国城市里反动势力太大，不仅外国在中国的反动势力集中于城市，就是中国国内反动势力也集中于城市。而中外反动势力在城市里又互相勾结着，因此形成反动势力在城市，特别在大城市占绝对优势，革命势力处于绝对劣势。这就使中国革命不能单靠无产阶级在城市里单独的武装起义，而必须采取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革命战略。这就是要使革命先在农村胜利发展，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一方面逐渐削弱反动势力，另一方面在斗争中磨炼自己，积蓄力量，造成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势，然后再与城市人民的武装起义里应外合，来夺取城市，以取得最后胜利。单靠城市工人斗争不能完成革命任务，单靠农村游击战争，也不能最后解决问题，而必须两者配合起来，必须先在农村胜利而后进攻城市，这种里应外合的战略方针就是完成中国革命的具体道路。这是我党领袖毛泽东同

志一贯的战略思想。还在井冈山时代，毛泽东同志就确立了这种思想，指出革命要先在经济落后地方与反动势力薄弱地方，特别是帝国主义统治薄弱的地方发展与建立政权，以后再作有阵地的向前发展。十八年来，中国革命发展的历史，正是依照着毛泽东同志这种方针进行的。今天我们的力量已经强大了，我们有中国农村将近四分之一的广大地区，拥有一亿人口。我们已经完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势，因此，我们今天必须进一步夺取大城市与交通要道，以求得最后消灭敌人，完成革命与抗战任务；因此就必须开展城市工作，必须采取里应外合的方针。如果我们满足于今天的农村胜利，而不进一步夺取城市，那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不采取里应外合的方针，那以我们今天的力量，想去夺取城市也是不可能的。盲动主义的李立三路线在一九三〇年就想组织全国总暴动，就想以当时的工人力量与红军进攻来夺取武汉，夺取南京、上海。这种小资产阶级的发狂思想，正是由于他们不懂得中国社会的特点，与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而机械的搬用马列主义的教条所致。只有毛泽东同志这种先农村而后城市的里应外合的战略思想，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才是马列主义的中国化。

（三）里应外合的方针虽然是正确的，但今天是否有此条件呢？这应研究清楚。关于这点中央明白指出：“在目前为了里应外合这个目标去进行城市工作是切合时宜的”。因为：

第一，中国资产阶级势力在城市里的统治力量，在八年抗战过程中已大大削弱了，分裂了。首先是中国资本与外国资本的对抗，其次是中国资产阶级本身分裂为抗日派与投降派而互相对抗，抗日派投降派中又各自分裂为无数派，互相冲突。为此，资产阶级在城市的统治力量就大大削弱了。

第二，外国侵略者对中国城市的统治势力也由于各种对抗而削弱，在过去外国侵略者对中国是比较一致的，但自抗战以来，特别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这种一致就变为战争。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大城市虽然成了独占，形式上统治力量加强，但实际上由于与英美对抗，又与中国统治者对抗，而形成它在城市统治的显著薄弱。今天伪政权统治的紊乱，与沦陷区人民生活之不可终日，就是敌人无法统治中国的明证。

第三，城市工人阶级与广大劳动人民，由于生活空前痛苦与民族压迫，都有着空前的觉悟与团结。同时在抗日口号下更便于工人阶级去团结各阶层人民，形成强大的革命力量。

第四，城市周围有着强大的革命军队与强大的革命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势，基本上已经完成，特别在华北、华中各个大中小城市与交通要道，都在我们包围之中。

从这四点看来，就使城市里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的对比，起了基本的变化，使过去反革命占绝对优越的形势，改变到相对优势，有些城市则日趋于平衡。因此，在目前以武装起义里应外合的新目标去进行城市工作是切合时宜的。如果说过去我们城市工作方针是长期隐蔽，积蓄力量，那么今天就应大胆的提出武装起义里应外合的新方针，一切工作应围绕着这个方针去进行。如果今天我们仍然墨守成规，仍然沿用旧口号，那么我们就要犯大错误，就要使抗战与革命将来遭受大损失。因为形势已变化，昨天认为正确的东西，今天已不正确了。我们一定要跟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前进，不能落在形势发展之后。

（四）但是，我们应该知道，以武装起义、里应外合的新目标去进行城市工作，是要我们向着这个目标去准备群众，去充实条件，去创造时机，而不是说今天在一切城市里马上就可以武装起

义，马上就可以大举进攻。如果这样想法，那是盲动主义，是一定要失败的。因为：

第一，今天希特勒尚未最后覆灭，英美对日寇大举反攻时机尚未到来。

第二，敌人还未到东西受夹击，困守孤城，首尾不能相顾的时候，敌人今天还有力量向我进攻，伪军还未到最后动摇与大批反正。

第三，城市工人与广大群众尚未到不能活下去，非干不可，而且有了干的决心与信心的时候。

第四，农村力量尚未发展到足够反攻的程度。

在此种情形下，我们如果轻举妄动，过早进行武装起义与反攻，那只有把自己力量送给敌人去摧残，这正是破坏反攻，帮助敌人，葬送革命。因此，今天我们应提出这个新方针去进行城市工作，去组织群众，准备力量，等待时机。在军事上也仍应有计划有步骤对敌进行攻势，不仅大城市如此，就是中小城市，以至完全在我根据地包围中之小城市与重点据点，也应小心谨慎，不应轻举妄动，不可过早暴露自己，过分刺激敌人。这是我们应该深切了解与切实掌握的。

三 关于城市工作的优越条件与困难

（一）在这次讨论中许多同志对开展城市工作，缺乏信心，其理由总括起来有下列几点：

第一，以为城市里多是公子少爷，工作极难进行。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城市里是有一部分上层分子与富有子弟，要靠这些人武装起义，当然是不可能的。但应知城市里大多数人民是工人苦

力与贫民小资产者，所谓公子少爷是极少数的，而且这些人在抗日反攻中也要起一定的作用。

第二，以为城市中敌人力量强大，特务多，工作无法进行，这种观点也是片面的。今天敌人力量虽然还大，统治者虽很狡猾，但由于民族矛盾，敌人的统治实际上非常薄弱，只要我们接近群众，注意秘密的工作方式与工作方法，工作是可以开展的。

第三，认为我们在城市中社会关系不多，工作不易进行，这也不然。我们有许多干部都在城市生长或城市里生活过，根据地中广大人民士绅与城市群众更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只要我们善于动员这些关系，我们的工作容易进行的。

第四，有些同志认为自己没有城市工作经验，因此感到工作无办法。这在某些同志说来确是如此，但经验是可以积累的，今天无经验，明天就会有经验。就我们全党来说，则我们已有不少的经验，如这次会上许多同志发言都有了很好的经验；我们有许多边区与游击区同志，更有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这些经验将成为全党的宝贵财产，而传播到各个同志中去，以便利工作之开展。

第五，又有些同志以为自己太红了，不适合做城市工作，这也是事实。但这些同志可以不一定要住到城市里或据点中去，我们今天已有了根据地与游击区做我们的工作出发地（仅仅是出发地，城市工作始终要建立在城内）。今天不比内战时代了，而且情况日益好转，抗日情绪日益增高的条件下，只要我们注意秘密，善于接近群众，那么即使红色干部，也并不见得完全不能到城里去。

（二）由此可见，以为城市工作无法进行，或者无法开展的观点是无根据的。相反的，我们应该认识今天来开展城市工作是具备着很多的优越条件，这种条件自我党产生以来所未曾有过的。有哪些优越条件呢？

首先是，今天我们是反对民族敌人，不是反对国内敌人，而又在里应外合准备反攻的新目标之下，这与内战时期就大不相同。而今天在沦陷区广大人民中是普遍增长着反日情绪与民族仇恨，这是使我们开展工作有最广泛的社会基础。

其次，今天城市人民生活，已经到了无法维持下去的地步，不仅劳苦群众无法生活，就连小资产者甚至中产阶级都很难支持。这是城市中从未有过的情形，也说明敌人无法统治中国。因为人是要活的，到了不能活下去的时候，无论何人都是要找出路的，这就极端便利于我们去进行工作。

第三，今天国际形势已起了基本变化，欧洲反希特勒战争快要结束，东方反攻日本已不在远。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形势已甚明显，谁也不愿跟着日本人去走死路。

第四，国民党损兵折将，丧师失地，国土日蹙百里。一般沦陷区人民包括上层资产阶级在内，对国民党都大失所望，过去倾向国民党的今天都改变了观念。

第五，我党我军在敌后人民中威望空前提高，不仅我有正确的政策，而且在城市周围，有我们的强大军队与巩固的根据地。这就使基本群众无限兴奋，中间分子更加倾向我们，过去对我有成见的，今天也逐渐了解我之政策，某些坏分子也得考虑他的前途，而不得不改变对我的态度。因为有根据地与军队作依靠，对找关系、筹经费、控制两面派、对付破坏分子都更有办法了。这就使城市工作开展，有了极大便利。

以上是客观有利条件，在主观上也具备了优越条件。如：

第六，干部问题。大家以为很困难，其实我们有许多做过秘密工作的干部，有许多干部生长于城市中，与城市有很多社会关系的，我根据地往沦陷区谋生者都很多，从这些人当中可以找到

很多的干部。我边区与游击区长期对敌斗争的干部，更是城市工作干部的最好对象。

第七，工作经验问题。我们虽然才开始做城市工作，经验积累不多，但过去白区党工作的干部，及抗战以来在边区游击区人民对敌斗争的丰富经验，以及几年来我们敌伪军工作的同志，都积累了不少的经验。只要我们善于着手总结这些经验，传播这些经验，我们是开展城市工作的。

（三）虽然我们开展城市工作有许多优越条件，但目前进行城市工作还是有许多困难之处：

第一，是敌人有强大的武装与强大的统治机构，它有丰富的统治经验，与狡猾阴险的特务工作。

第二，顽伪合流，顽特与日特互相勾结来共同对付我们。

第三，我们根据地在某些政策执行中尚有偏差，如反贪污、反特、俘虏政策，未能尽善执行等，这对沦陷区起了坏的影响。

第四，有不少叛徒被敌人利用来破坏我们，这些叛徒常是敌人最坚决的走狗。

第五，我们干部的工作经验还不够丰富，不大熟练。

这些困难就给城市工作开展以阻碍，我们不要被这些困难所吓倒，但也不能忽视这些困难，而粗心大意。我们要认识这些困难，克服这些困难，才能更有力地开展城市工作。

四 工作方向问题

由于我们的工作目标是反对民族敌人，是为了准备武装起义，目前大局有利于我，在城市要道周围，我们又有强大的军队与根据地作依托，这就确定了我们的工作方向有最广泛的社会基础。因

此：

（一）我们的工作对象是包括城市一切群众中的各界人民，“在伪军伪警中，在工人苦力中，在伪政界、经济界、文化界中，在青年学生儿童妇女中，甚至各种秘密结社及流氓组织中，都要进行工作。”除开极少数死心踏地的汉奸与顽固反共分子，不能要他们参加外，其余什么人都在我们争取之列。

（二）虽然如此，但我们的工作重心及主要注意力，应放在几十万伪军伪警和几百万工人苦力身上，而这些工作应与上层统一战线活动分开进行。上层活动一般应是为了掩护与协助下层群众中的活动。为什么把重心放在这些下层群众身上，这就是因为：

第一，我们一切是为了武装起义，而这些人正是武装起义的决定力量，如把希望寄托于上层分子，则到了武装起义时，他们常常因为自己的地位、财产，顾虑多，容易动摇犹豫，耽误大事。

第二，我们夺取城市后还要使之巩固起来，成为新民主主义的坚固堡垒，而这些人正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动力，不动员这些人作我们在城市中的社会基础，而把希望寄托于剥削阶级与上层分子，则反攻胜利后，新民主主义还是难于真正实现，城市巩固在我们手中，也将是不可能。我们城市工作同志应有明确的群众观念与阶级观念，这是任何马列主义者所不应忘记的。

（三）在工人苦力中应特别注意两种人：一种是产业工人。如军火工人，市政工人，大工厂工人及交通工人，把产业工人工作做好，在反攻时就能更有力地破坏敌人，便于里应外合。同时，占据了工厂，又可以作为对敌进行巷战的堡垒。另一种则是苦力工人与失业工人。这些人是我们组织地下军的主要基础。这两种人配合起来，又成为在城市武装起义本身中里应外合的两种力量（苦力与失业工人地下军为外攻，工厂工人为内应）。

（四）是青年学生、店员、职工与机关下层小职员。这也是城市工作的重要对象。这些人民族意识比较强，文化程度比较高，感觉比较敏锐，而目前生活之困苦与不自由，有时比之一般工人还更苦更无保证。因此，在这些人中进行工作，有许多便利条件。争取了这些人就可以使我们的城市工作得到广泛的桥梁，通过这些桥梁，更可以在下层群众与上层分子中开展更大的工作，而我占领城市后，这些人会很快成为我们城市各种建设工作的干部。

（五）在伪军伪警中我们工作方针。过去是上层与下层并重，这个方针有没有错呢？没有错，今天还应该如此，但过细来检讨这个口号，是比较模糊的。我们的新口号应该是“紧紧依靠下层，同时不放松一切可能去争取上层，而上下层工作应该严格分开，又应该互相联系着”，这就是我们的新方向。

（六）关于青红帮工作，这也是城市工作的工作对象之一。

第一，在敌伪统治地区，政治经济紊乱，人权、财权毫无保证，青红帮这种封建性的组织大大发展，将来还要发展。因为这是一个群众性的组织，我们当然要注意这个工作，在其中团结一批人为反攻服务。

第二，这个组织带有半合法性，他在各机关、各团体、各部队中都有人。如争取了这些人，有许多事情可以委托他们做，如情报、联络、交通、走私等。如真正争取了他们，是有很大作用的。

第三，有些同志以为这是流氓组织，我们无法争取。其实不然，流氓固然不可靠，但他对社会现状也是不满的。只要我们善于使用他，晓之以大义，导之以大势，结之以感情，辅之以金钱，是可以起一定作用的。如过去泗灵睢之开辟，三番子⁽⁴⁾工作是起了相当作用的；泗阳、淮泗，这一工作没有做好，是因为用人失当，

不是三番子无作用。

第四，对三番子组织，应很好研究，过去苏南所采取的办法一般可用。其办法有二：一方面把三番子变成带革命性的组织，凡拜我们为师的，要他发誓三点：一不为日本人做事，二不反对新四军，三不反对共产党；另一方面改变三番头子个人独裁形式为民主集中制，即在每县每区三番头子中加上党委指派一二人，成立三人委员会，一切收徒弟使用徒弟等，都经过此三人委员会商讨决定。这些办法望大家研究运用。

（七）此外还要在城市近郊的农民中进行工作，配合武工队的活动，逐渐把近郊变成隐蔽游击区。一方面可为推动城市工作之基地，另一方面可在此吸引城市工人、学生出来接头受训，参加武工队，以便替武装起义时准备一批骨干。

注 释

- 〔1〕 这次会议召开的日期一些文章说是一九四五年六月，但本文讲到“各级党委必须把城市工作提高到与根据地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求得在今年上半年至少今年一年能收到显著成绩。……今天希特勒尚未最后覆灭，英美对日寇大举反攻时机尚未到来”。六月开会之说，显然有误。现据当时中共淮北区城市工作部部长王子光和张文华的回忆文章（见中共安徽省委党史工委编《淮北抗日根据地》），参照淮北区党委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三日《关于城市工作的补充指示》，判定这次会议是在一九四五年一月召开的。
- 〔2〕 吴、姚指吴宪和姚克，当时均为中共淮北区城市工作委员会委员、城市工作部副部长。
- 〔3〕 大李集即大李集镇，当时属泗灵睢县，现属江苏省睢宁县。
- 〔4〕 三番子是流氓组织中的一种组织名称。

群众工作的几个基本原则*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四日）

同志们，今天我们召集了全华中几百个县以上的群众工作干部来开这个会议，为的是要把群众工作做得更好，来贯彻“七大”^{〔1〕}放手发动群众的路线。这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会议，是与华中解放区巩固与不巩固，繁荣与不繁荣的前途有密切关系，与巩固国内和平及实现国家民主化有密切关系的。因此大家要聚精会神来检讨过去，规划将来，交换意见，交换经验，把这个会议开好。在同志们检讨以前，我先向大会提供几点意见，谈谈关于群众工作的几个基本原则问题，作为同志们讨论之参考。

一 为什么要放手发动群众

为什么要做群众工作，为什么要发动群众，又为什么要放手发动群众，这似乎是一个老问题，同志们会说，“我做了七八年群众工作，难道这个道理还不懂吗？”话虽是如此说，但大家应该知道，这是革命的最基本问题，如果这个问题没有彻底弄通，工作是做不好的，革命也不会成功。

* 这是邓子恢在华中群众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一部分，略有删节。

为什么要做群众工作？有些同志说：是为了抗战，是为了配合军队作战，取得战争胜利；有些同志说：是为了建立民主政权，为了减租减息。这样说对不对呢？对的，但这只道破了问题的一面，而没有说出问题的全面。我们应该说，放手发动群众，是我党领导革命的基本路线，是群众争取革命胜利自求解放的唯一方法。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方法。同志们大家知道我们革命是为了人民利益，我们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每个共产党员每个革命者应具备的群众观点，这种群众观点就是党性的基本内容。但同志们必须进一步来了解“一切为了群众”，还必须加上一句“一切依靠群众”。我们革命是为了人民解放，但人民怎样才能解放呢？不是依靠神仙，不是依靠什么英雄豪杰，也不是单纯依靠军队打天下去解放人民，不是依靠政府出布告就可以万事大吉，更不是依靠我们共产党员的好心，大发慈悲，救苦救难，去替群众谋福利。最主要的办法是依靠群众，自己起来救自己。我们共产党的责任就在发动群众起来，领导他们自己解放自己，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依靠群众自己觉醒自己动手。这就是“群众路线”，就是我们党领导革命完成革命任务的基本方针，这就是我党七次代表大会所确立的总路线。同志们，这就是共产党人与其他任何党派在革命方法上的基本分界线。联共党^②一开始就与民粹派^③作斗争，民粹派主张革命要依靠英雄杰出人物，要以个人恐怖行动，以手枪炸弹暗杀来代替广大群众的革命斗争，而联共党则反对个人英雄主义，反对个人恐怖政策，主张革命不是依靠英雄豪杰，而是依靠于广大群众自己起来斗争。我们中国党与孙中山先生不同之点，也在于此。孙先生奋斗四十年革命尚未成功，他晚年检讨说是方法不对，这个方法就是不懂得依靠群众，而只是依靠上层，依靠个人恐怖政策，依靠军事投机。孙先生晚年，接受了我党的群众

路线，确定了联俄联共联合工农的三大政策，才有第一次大革命的胜利。

同志们，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之所以有成绩，所以迅速壮大，其原因不仅在于有适合中国人民要求的正确纲领，而且在于能坚持依靠人民自己救自己的群众路线，还在五四时代我党的前身——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就主张到工厂中去到农村中去，与当时的另一派资产阶级学者闭户读书的主张相冲突。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就决定每个党员要做工人运动，第三次代表大会，就决定做农民运动，以后党就一直与广大群众建立密切联系，这就是我党之所以能由开始的几十个手无寸铁的知识青年而发展成为今天拥有一百二十万军队、一亿三千万人口的解放区，一百二十余万党员的大政党的基本原因。也是中国革命由屡次失败而达到今天民族走向独立，国内和平实现，国家开始民主化的基本原因。同志们，假如我们党不做群众工作，不依靠人民，不采取群众路线，而与其他政党一样，只走上层路线，只靠个人蛮干，或者只坐在房子里写文章，研究教条，那么同志们，想想我们党有今天吗？中国革命有今天这种胜利吗？很明显的那是不可想象的。

所以我们做群众工作，放手发动群众，不是为做群众工作而做群众工作，不是仅仅为配合作战、建立政权而来发动群众，而是人民大众翻身解放，争取革命胜利的唯一方法，是我党领导革命完成革命任务的基本方针，是我党与其他任何政党所不同的地方。

为什么其他政党不走群众路线，不发动群众，而我党就非如此不可呢？理由很简单，就是资产阶级政党怕群众发动起来连他自己也要被推翻，而他们自己在经济上已有相当力量也不需要完全依靠群众。小资产阶级政党则因自己的唯心论，看不到群众力

量的伟大，因此，他们不走群众路线，而走上层路线，重视个人力量。我们是无产阶级政党，是代表劳动人民利益的，我们都是赤手空拳，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没有地位，没有力量，如果不发动群众不依靠群众，我们就毫无力量可言。今天我们虽然有了一百二十万军队，有广大的解放区政权，而且要在全国范围内参政，但这些力量与地主资产阶级对比还未占优势，如加上与帝国主义对比则更弱，因此，我们不能以此自满自足，而必须更进一步在全国范围内把四亿五千万群众发动起来，才能战胜国内外反动势力，而达到革命最后胜利与人民的彻底解放。我们一切工作都应围绕着这一基本方针。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军队作战主要就是为了扫除发动群众的障碍；我们建立民主政权，与颁布法令，是为了创造便于发动群众的法律根据与有利条件；我们与士绅进行统一战线工作，不是为统战而统战，而应该是为了打开发动群众的方便门路，减少发动群众的阻力。如果因为统战工作反而约束群众的发动，这种统战工作就可以不做。我们参加国民党政权，我们的议会斗争，其目的也在于给群众运动以各种便利（如借议会作我之宣传场所，在议会中通过一些有利于群众发动的法令条文等），我们锄奸中的宽大政策与镇压政策以及宽大之尺度，也应该适合于群众的发动，所谓“国人皆曰可杀而后杀之”，就是为了争取群众大多数，为了适合于群众情绪与群众要求。总而言之，一切应该适合于发动群众的总方针，违背了这一点就是错误的。

二 要发动哪些群众

民运工作者在弄清“为什么要发动群众”以后就要进一步弄清楚“要发动哪些群众”，这就是我们的阶级路线与阶级立场问题。

如果只有含糊的群众观点，而缺乏明确的阶级立场，那无论他工作如何积极、如何革命，也永远不能成为老练的革命家。斯大林在论战略书中提出三个要项：

第一是要规定革命主要与次要打击方针，即谁是敌人。

第二要规定主要与次要的后备军，即谁是朋友。

第三要规定战略的指导方针，即如何打败敌人。

这三个问题就是革命的基本问题，作为一个阶级自觉的共产党员必须首先弄清楚这三个问题，否则他就是不自觉的糊涂的革命者。

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敌人是谁？我党早已指出是国际帝国主义，与国内封建势力。这个封建势力就是地主阶级，但其中主要敌人是大地主、大买办与大银行资本，国民党反动派就是这些人的集团。因此，我们的政策，是孤立大地主与大资产阶级（所谓反动势力），中立中小地主、中产阶级与一部分代表大地主、大买办而与反动派有矛盾之地方实力派（所谓中间势力），这就是我们今天对付敌人的方针。

那么，我们的朋友是谁呢？靠什么力量去与敌人斗争呢？这就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与一定时期内的民族资产阶级，而其中最主要的是农民，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毛泽东同志指出，只有农民才是无产阶级的最好同盟者，因为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人口最多，受剥削最重，生活最苦，革命最坚决，特别是其中的贫农雇农，因此无产阶级必须把农民当做自己最可靠最好的朋友。毛泽东同志指出：要有农民，我们才有军队，有农民才有粮食，有农民才有民主政权，有农民才有工业，有农民才有文化，有农民才有一切，没有农民就没有一切，没有农民革命就不能成功。中国民主革命主要是农民革命，中国抗

战主要是农民战争，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不懂得中国革命^[4]。

农民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如此重要，但我们党内许多同志却常常忽视这一点，常常摇摆于地主与农民之间，究竟是依靠农民还是依靠地主，依靠工人还是依靠资本家，这个问题常常摇摆于我们同志的脑海中，一遇到环境变化他们就动摇起来。我们党内犯了许多次大的错误，如陈独秀主义皖南路线^[5]，实质上就是不要农民，李立三路线的左倾盲动主义，实际也是看不起农民力量，忽视农村，过早强调夺取大城市方针。这与毛泽东同志先在农村发展壮大，而后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方针是完全相反的。今天我们有些同志在新解放区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敢彻底减租减息增加工资，在老解放区坐视地主反攻而不敢还手，同样也是对工农劳动者认识不清所致。

确定依靠农民，把农民当做我们最好的朋友，这是我们阶级路线的一方面。另一方面，还必须认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农民虽然是我们的最好的同盟军，但农民不能当我们的指挥官，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领导中国革命，这是历史决定了的。中国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产生历史虽不长，但是在中国各阶层中他是最先进，革命最坚决，最有组织性的阶级，而且是日益发展着不是日益分化瓦解的阶级。中国革命如没有无产阶级领导，不仅社会主义革命不能到来，即使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也不能成功。就我们这里的群众斗争来看，城市工人斗争比农民要来得坚决来得彻底。在农民中雇农比贫农彻底，贫农又比中农坚决。各地事实证明，我们的农村支部与农会团体，如果是贫农雇农领导，那么斗争常常是坚决的彻底的。如果是中农领导，如果支部中中农党员占多数，则那个支部常常是不敢斗争的，和平的，群众也就难于发动。如果是富农领导了农会与支部，则情况还更坏。因此，我们除了紧紧

依靠农民以外，必须在群众运动与群众组织中确立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权，必须争取雇农贫农对中农富农的领导权，但必须与中农合作，而不是排除中农，这是我们在农村中的阶级政策，这个政策今天并没有变。

在城市中我们依靠谁人？主要是依靠工人苦力，可靠的同盟者是贫民小贩与青年学生，其次才是中小商人。如果在城市中我们把工人苦力组织起来了，贫民小贩发动了，青年知识分子发动起来，再加上争取了中小商人，那我们在城市中便有广大的社会基础。依靠这个基础再进一步去中立中小地主，孤立大地主与大商人，我们在城市中的统治便可以巩固起来。这就是我们在城市中的阶级政策。

关于青年与妇女问题，我们也要有阶级观点。如农妇与富家妇女，是有区别的，工农青年与地主子弟也有其不同点。这方面我们不能以超阶级的观点来看问题。我们在妇女工作中主要对象是女工、农妇，在青年中应大胆用少年先锋队方式去组织广泛的工农青年，不应把青年工作停留在知识青年的狭隘圈子里，这是这次会议应该注意的。但我们应该知道，中国妇女一般是没有继承权的，在家庭中社会中妇女是被压迫者，青年在旧社会中一般没有地位，在家庭中没有财产支配权。同时，青年思想一般比较纯洁比较有进取心，因此，我们对地主资产阶级的子女与儿媳妇，不应当同他们的爸爸、丈夫一样看待。我们应大胆去争取地主青年，教育与改造他们，使他们确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成为革命的知识青年。对地主、资本家的青年妇女，亦应吸收他们参加妇女组织，成为革命妇女。过分害怕与歧视他们，便会走上关门主义，去替敌人制造群众，这对革命是不利的、愚蠢的。

三 群众发动起来干什么

群众发动起来，干些什么事情，当然是干革命。革命又为了什么？不是为别的，而是为了改善群众的经济生活，使群众没有饭吃的有饭吃，没有衣穿的有衣穿，没有事做的有事做。为达到此目的，必须分做两个步骤：今天先限制以至取消封建剥削，减轻资本主义剥削，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将来进一步取消资本主义剥削，使人民在经济上完全解放，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群众发动起来，其主要目的就在于此，一切斗争离开群众经济生活的联系，那发动群众就不可能，而且也没有意义。

如何才能达到群众生活的改善，这就不是靠地主资本家发善心，也不是单靠军队打胜仗与政府出布告。军队打胜仗与政府出布告，只是给改善民生以便利条件。要改善民生，主要还是群众自己起来，用革命强力，把原来统治阶级的政治优势打下去，而确立基本群众的政治优势，以至基本群众自己掌握政权。要有这种政治优势，才能达到经济生活改善的目的。不把地主阶级的政治优势打下去，农民的政治优势未确立，要想达到减租减息，便是一句空话。没有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便没有新民主主义的经济，这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也是解放区到处试验过的事实。

如何才算基本群众获得了政治优势？我们华中解放区的基本群众，是不是已经获得了优势呢？我想在总的范围内说来，我们是已经确立了政治优势，因为我们的军队是人民军队，政权是人民的政权，群众已经广泛发动，已经有了组织，有了强大的共产党，而且把解放区内反动统治打垮了，这个优势当然就是基本群众的政治优势，这是不可怀疑的事实。但是同志们，这是指整个

解放区范围来说的，是不是可以说有了这个大优势，便每个乡村每个角落的基本群众都获得了自己的优势呢？那就不然。我们现在有不少乡村，尽管我们在总的方面有了大优势，但在那个地方基本群众却仍然没有翻身，仍然不敢抬头，农民仍然听地主的话，地方上仍然是地主说话，政权仍然是地主及其走狗掌握着，即使乡长是农民也仍然要听从地主支配。因此，这样的乡村就仍然是地主占优势，仍然是地主的天下，基本群众的政治优势并未确立。因此，减租减息就是明减暗不减或者根本没有减，这就是所谓“白点”，所谓空白乡村。同志们，这种白点，在各个解放区今天还不少，此次时局有些动荡，许多地方农民都退租给地主，这是什么原因呢，难道我们整个优势没有了吗？难道我们的优势改变了吗？不是的，我们总的优势并没有改变，问题就在于那个村子的小优势没有确立。如果各个乡村都是如此，那么我们的大优势是不能巩固，甚至于不能保持，时局稍为变动，我们的大优势就不能保持，这是很危险的。相反地，如果各个乡村基本群众都确立了自己的政治优势，把当地的地主威风打下去，当地农民有办法对付当地的地主，任何环境变化，地主都不敢作怪，真正建立了农民自己管理自己的局面。如果每个乡村都做到了这一步，再加上总的大优势，那么同志们，就可以说我们的根据地已千稳万稳了，谁也摧毁不了。这样的地区就是某些时候我们军队打了一些败仗，局势变化了，这些地区农民仍然可以保持优势，仍然可以使地主不敢作怪，不敢反攻，这就叫做基本区。因此，同志们，我们要确立政治优势除了大范围内我们党政军保持优势以外，必须做到每个乡村每个角落，农民对地主，工人贫民对资本家，都普遍建立自己的政治优势。农民工人贫民起来，自己管理自己，把地主资本家的威风打下去，使他们不敢说话，说话不算数。工人

农民再不怕地主资本家绅士老爷了，自己可以说话，可以当家，可以作主了。在处理本乡本村问题时，工人农民不仅有发言权，有否决权还有决定权，地主只能有发言权但不能算数。不仅时局好的时候如此，时局变动时也能够如此，这样才算确立了基本群众的政治优势。我们群众发动要做到这一步才算成功，才能保证减租减息、增加工资的彻底实现，才能保证群众生活之真正改善。这就是我们发动群众的基本要求，就是我们发动群众要放手的原因。这就是说在群众未确立优势以前，我们就不应收手，只有在群众优势已经确实建立，地主优势确实打破之后，我们才能收手，而伸出手来拉地主一把，与地主谈统战，而达到农民与地主平等相处，使地主再不敢看轻和压迫农民，农民也再不受地主压迫了。

四 如何才能发动群众

这个问题，同志们经验很丰富，这次大会可以把各地经验教训，互相交流，并把它总结起来，作为今后工作的借镜。我这里只提出几点原则，作为同志们检讨研究的参考。

首先，要从群众的切身利益出发，从群众眼前立即要解决可能解决的切身利益问题，逐渐引导到更远大更长远的利益。为了解决自己的切身利益与困难问题，群众才能起来，才能参加运动加入组织。譬如农民加入农会，自然是为了减租减息，工人加入工会，也是为了增加工资，如果离开了这种经济利益，来谈发动群众，来组织工会农会那是不可能的，即使组织起来也是形式主义。所以群众运动须从改善生活的经济斗争开始，即使发动政治斗争也须与群众的经济生活有联系，否则这个政治斗争就发动不

起来，发动起来，也不能持久。比如惩办汉奸反恶霸斗争，虽然是政治斗争，但其中也含有经济意义，把恶霸打下去了，群众就可以避免被人敲诈勒索的痛苦。在惩办汉奸中不仅可以伸冤复仇，而且可以向汉奸清算敲诈粮款及没收汉奸财产罚款来救济难民，这些政治斗争都包含有经济意义的。如果我们的惩奸运动单纯停止于伸冤复仇，而不进行清算旧账没收财产，则惩奸运动必难于展开，过一时期群众会要消沉下去，这是必然的现象。我们有些同志在新解放区要发动群众，而又不敢减租减息、增加工资，只要群众组织起来，这是一种唯心论观点，必须克服。

其次，发动群众必须采取群众路线，必须根据群众的自觉自愿，以至自动。这就是说，必须从打通群众的思想着手，不能强迫命令。因为群众是人，不是石头，不是毛驴子，人是有思想的，人的行动是受自己的思想所支配的，他思想里未想通，便不愿来参加，再有好处他也不来。比如减租减息当然对农民是有好处的，但在未实现前，他还会被地主谣言所蒙蔽，对减租发生许多怀疑与误解，即使知道减租办法与减租好处，他还有许多顾虑。如果这个时候，你去命令他，或者强迫他，那么他会自甘落后，或者反而发生反感，害怕我们以至反对我们。这样，群众能够发动吗？当然你有权力，你是公家人，在你命令强迫之下，他可以被迫来参加，来上个名字，但这只是形式主义有名无实，又有什么用处呢？听说我们苏中^{〔6〕}有些地方办了合作社，这本来是好事，但群众却不高兴，把它叫做“合作怪”，这是什么原因呢？当然是强迫命令摊派股金的恶果。因此要群众发动必须使群众自觉自愿，任何强迫命令勉强都是有害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必须是群众自动，光是群众赞成愿意而群众还不敢或不愿自己动手，而由我们党政机关或少数地方干部代替包办，群众只站在旁边参观，这

还是不行的。因为群众要改善生活，便要与地主作斗争，要冲破地主的抵抗与破坏，要把地主优势打下去，这才有可能。要达到这一点，就必须当地群众自己起来，依靠自己的力量，与地主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撕破了脸皮，压服了地主，必须每个乡每个村庄每个角落的群众都能够如此，都能够自己压服自己的反对者，而自己取得了优势，这样斗争才能胜利，生活才能改善，群众运动才能真正开展与巩固。如果群众自己不动手，旁观而自己不当事、不出面、不做主，而由少数干部党政机关或别村群众来代替包办，那么你在那里的时候或者可以用权力来压迫地主减租退租，但到了你离开那里的时候，地主就仍然会作威作福，仍然要农民把租送还他，农民也会自己送还他。因为这只是你的威力压服了地主，而不是当地农民自己的威力压服了地主。因此，地主只怕你，而不怕当地农民，当地农民也只看到党政机关及我们干部的威力，而不相信自己的力量足以压服地主，因此仍然害怕地主，仍然胆子不大，一到干部离开或者时局稍有变动，或者听到地主一些谣言与威吓，就自然而然害怕起来，把减到的租粮送还地主。

第三，要发动群众必须要有核心，即是要有群众自己的领袖起带头作用与骨干作用，这是很重要的一点。群众中大多数是比较落后的（这是指与我们对比来说的），散漫的，而我们共产党是群众中最先进的队伍。因此，我们的见解，我们的主张，常常与群众有距离，许多问题在我们脑子里早已解决了的，认为无问题的，而在群众看来还是一个新问题。因此，我们每一个主张与口号的提出，首先必须经过一个时期的宣传解释、局部试验以后，才进到实际行动。而在宣传过程中首先接受我们主张的常常只有少数进步分子与积极分子。我们就经过这些进步分子积极分子的宣传鼓动及实际行动，再去影响其他群众，团结其他群众。如此逐

渐由一人而数人，而数十人，而数千百人，以至广大群众都接受了我们的主张，而行动起来。而这些进步分子积极分子，以自己的进步言论与行动，逐渐为群众所信仰爱戴，便成为群众自己的领袖，成为群众运动的带头者和坚持者（骨干），而形成群众坚固的团结，形成伟大的力量。这些积极分子、群众领袖是群众运动的核心，是党与群众联系的桥梁，没有他们群众发动就不可能。这些核心分子，如果不是进步的，而是投机分子和反动人物，那么这个群众运动就可能被引导到反动方面去，而最后走向失败。因此在群众运动中发现与培养积极分子，培养群众领袖，必须十分注意，而且要十分慎重。这些积极分子与群众领袖不是什么人封他的、指定的、拔苗助长的，而是要在群众斗争中经过群众自己的考验与选择，真正为群众所信仰所爱戴的人，才是真正的领袖。一切地区一切群众组织如果有了这样的大小领袖，则这个地区这个组织便有很好的基础，什么人都打不垮他，即使群众组织形式已经取消，他实际上还有组织之实，因为群众仍然团结在其大小领袖之下，仍然取得行动上的一致。从这个原则出发，则干部地方化，便成为群众发动的基本环节。华中在这方面过去有许多地方注意得不够，因此有威望的地方领袖也就不很多，这是要今后特别注意的。

第四，要在群众斗争中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使群众运动巩固起来与更加开展，成为伟大的政治力量，以推动革命前进。照一般情形，群众参加斗争，常常是为了眼前的经济利益，而看不到将来的远大前途，这样在斗争已经胜利、利益已经得到之后，常常就容易松懈自满，力量涣散，政治积极性不能提高，这对革命是有妨碍的。因之我们的任务就要在群众斗争过程中用实际的事实和经验教训去教育群众，使群众知道斗争是怎样胜利的，知道

压迫者是如何可恶狡猾与自己贫苦的来源，知道如何与压迫者斗争，知道团结就是力量，知道政权与武装的作用。只有在斗争中来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使之由自在阶级变成自为阶级，而团结在我党之下，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这样才能使斗争得到更大胜利。过去各地斗争，对这一工作是做得不够的，这就是斗争之后群众涣散，地主反攻，以及农民经济主义与工人行会主义产生的思想根源。这种缺点今后必须纠正。

第五，要开展群众运动必须懂得全套斗争策略，不仅干部懂得而且要使群众懂得。这些策略是什么呢？

首先，要善于选择斗争对象，懂得“利用矛盾，争取多数，打击少数，各个击破”的方针，以达到团结自己分化敌人，强大自己孤立敌人的目的。这个方针过去与日本人斗争适用，今天在全国范围内与反动派斗争适用，在一个乡村一个城镇一个工厂作坊与地主资本家斗争也适用。

其次，要善于掌握斗争方针，懂得“有理、有利、有节”三个原则。这就是与敌人斗争，要有理由，要师出有名，要自己理直气壮，敌人理屈词穷，群众大多数同情我们。为此，必须先礼后兵，以退为进，自己站稳脚跟，这是一。斗争要有胜利把握，要正确估计敌人力量，充分准备自己力量，争取同情者，中立可以中立的人，以求斗争必胜，这是二。斗争胜利之后要适可而止，相机结束，以便抽出时间来总结经验，教育群众，提拔干部，整顿组织，以便准备新的斗争，不可连续斗争，拖泥带水，或者节外生枝，因小失大，这是三。

再次，要善于选择斗争口号。这需要根据三个条件：一是口号的“群众性”，要使口号适合于大多数群众的共同要求，以便争取群众大多数来参加斗争；二是口号的“时间性”，要恰好是当地

群众当前最迫切的要求，不是明日黄花（过迟），也不是无的放矢（过早）；三是口号的“可能性”，要是当时能够办到的，不要大而不当，使群众感到我们说大话，吹牛皮。

最后，要善于选择斗争方式。斗争方式是千变万化的，多种多样的，要根据当时当地环境、斗争对象及群众情绪来灵活运用，不能公式化的呆板规定。但无论如何变化，有一个原则是不变的，这就是要能够取得大多数群众的同情、拥护与参加。如果所采取的方式，群众认为过分，或者认为太软，而不同情、不喜欢，甚至不满我们，那无论这个方式如何讲究，结果还是失败的。斗争方式之价值不决定于方式本身，而决定于争取群众之效果如何，这里丝毫的主观主义都是不许可的。要掌握斗争的同志，能够根据当时情况与群众情绪的变化而随机应变，灵活运用。有时候情况变了，则原来的方式就要改变，这是要同志们大家来研究的。照今天一般情况来说，解放区的群众斗争方式应以合法斗争为主。如工会决定增加工资，农会决定减租减息，一般可发通知、打铜锣，派代表与地主、资方谈判，对抵抗与破坏者开会说理斗争或者包围威胁，以至游行示威，请愿告状等，一般应做到群众团体不打人，不侮辱对方，不擅自逮捕人，以符合民主政治的秩序。至于工人罢工，农民不合作运动，原是工农斗争最有力的工具，也是民主法律所能允许的，但这种方式在解放区非至万不得已，一般以不进行为好，因为这对生产是有妨碍的。

五 为什么群众要组织，怎样才能组织好

为什么群众要组织，组织作用在哪里？这个问题也有些同志没有弄清楚，他去组织群众不是为了群众需要，而是为了完成上级任

务，这种观点是不对的。群众为什么要组织呢？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达到其经济上的共同要求，减少自己的痛苦，改善自己的生活。因此，需要把利害相关、要求相同的人组织起来，取得一致行动，去与敌人作斗争，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免除自己的痛苦。比如农民一般都受地主重租、高利及各种封建剥削，弄得自己破产穷困，因此，需要组织农民联合会，同心协力，来与地主作斗争，达到减租减息、废除各种封建陋规，以改善自己的生活。而其中受剥削更利害的佃农，则应在农会中成立佃户小组，以便有力的与业主斗争，来保护自己的利益；欠债户亦可另立小组，来与高利贷作斗争；农民中的雇农则除了参加农会外，自己应组织雇农工会，加入到工会系统中来。这就是说，群众组织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共同利益，为了共同与敌人斗争上的需要，离开了经济上共同利益，离开了斗争上的共同需要，则一切组织便是多余的。因此，每个群众团体，必须有共同的要求纲领，在这个共同纲领之下去组织群众，团结群众，共斗同争。如把两种利害相反而无相同之人拉在一起来组织，这种组织一定搞不好，一定没有用，而且一定有害处。这就是我们与国民党的基本不同点，国民党把地主与农民混在一起组织农会，把资本家与工人混在一起组织工会，目的是在便利于地主控制农民、资本家去控制工人，这对工人农民是有百害无一利的。因此，这种组织是反动的，而且也一定组织不好的。

为什么群众组织起来就可以战胜对方而保护自己的利益呢？这是因为群众经过组织之后，在行动上就可以取得一致：大家要干就干，不干就不干，要减租就大家一齐减，减多少就一致减多少，要罢工就大家一齐罢。这种一致行动，千万人一条心，就产生了伟大的力量，给对方以极大威胁，使对方不得不接受他们的要求，所谓组织就是力量，这就是群众团体的作用所在。工农劳

动者在社会中本来占绝对大多数，但几千年来都受人压迫剥削，其原因固然由于自己没有政权没有武装，思想上受人麻痹，但更重要的原因是由于自己没有组织，彼此行动不一致，因此力量分散瓦解，被人各个击破，而不得不屈服于人下，忍受人家的压迫与剥削。这个道理地主资本家懂得很清楚，因此他们最害怕工农组织起来，最怕他们齐心一致，所以他们要用尽一切办法来破坏与阻挠工农组织，使他们行动不一致，涣散无力，无法与地主们斗争，一切秘诀就在于此。

群众团体的主要作用既然在于取得会员在行动上一致，因此要把群众团体组织好，真正取得行动一致的作用，而使之巩固起来，成为有力的组织，就必须具备下列几个条件：

第一，必须这个团体时时刻刻为群众兴利除弊，时时刻刻代表群众要求，为群众每一个利益而斗争。如工会要办好就必须领导工人加工资，改善待遇。这个目的达到之后，还须领导工人办合作社，办职业介绍所，办夜校，办医务所。农会、青年、妇女团体也应如此。

第二，群众团体要起行动一致的作用，而能自觉执行，尤其需要有群众领袖与积极分子作为这个团体的核心，以他们为中心去团结广大会员。

第三，要群众团体真正起作用就要贯彻民主集中制，就要保证群众团体在组织上的独立性，使群众团体负责人认识自己是为群众服务的团体，使该团体会员认识到这是他们自己的团体。这就需要：（一）群众团体有自己的纲领、章程，并且是经过会员民主讨论表决通过的。（二）群众团体的决议、行动、工作计划等，也须经过大会民主讨论表决通过。（三）群众团体的各级领导人以至小组长代表等，必须经过会员的选举与罢免。（四）群众团体干

部的调动必须经过一定手续，向群众团体辞职，经其许可，并要办清交代手续。（五）群众团体要有自己的经费基金与收支帐目，这些经费基金的支配与动用，必须经过群众团体一定的会议去处理，所有帐目必须定期公布，并交群众团体所指定的人员审查。

（六）必须与党政机关分开，单独成立系统，不得混淆，党政机关不得越权干涉其内部组织事情。要具备上述六点，保证了群众团体在组织上的独立性，群众团体才能成为群众自己的团体，为群众所拥护而日臻巩固起来。

第四，建立党与群众团体的正确关系。我们党与群众团体的关系，首先必须保证群众团体在组织上的独立性。应该通过自己的党团与支部去实行党的领导，就是说党要通过自己的党团，把党的主张与决议变成群众团体自己的决议。

注 释

- 〔1〕 “七大”指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 〔2〕 联共党即苏联共产党。
- 〔3〕 民粹派是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初俄国革命运动中的一个小资产阶级派别。
- 〔4〕 参见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二版。
- 〔5〕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抗日战争时期，项英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兼新四军副军长、政委，在与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也犯了类似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以致一九四一年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使新四军蒙受惨重损失。
- 〔6〕 苏中指苏中抗日根据地，位于江苏省盐城、宝应一线以南，长江以北，黄海以西，运河以东。全区约五十平方公里。

从鹅钱乡斗争 来研究目前的土地改革^[1]运动*

（一九四六年七月一日）

淮安石塘区鹅钱乡的土地改革运动，是华中分局第一个实验乡，是分局工作组在李坚真、王文长^[2]同志领导下协助当地党进行的。在我们所了解的土改地区，鹅钱乡是比较正确的。它根据党目前土地政策及当地具体情况创造了华中土地改革第一个典型范例。因此特将李、王同志在鹅钱乡之总结报告刊登《华中通讯》，介绍给各地党作为参考，并提出几点意见以资研究。

首先，从鹅钱乡过去的土地状况（土地所有关系，土地使用关系与封建剥削制度）看来，可以看出中国的土地，是如何的集中，而土地经营又是如何的分散；可以看出地主是如何残酷的剥削农民，与农民之破产困难是从何而来；可以看出中国土地生产为什么如此衰落，农村破产为什么如此急剧，农村过剩人口为什么如此众多；从此也就可以看出中国的封建势力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可以看出这些封建势力，为什么要与外国侵略者及国内反动派密切勾结着（其中心是为了保护土地剥削制度）。从这一幅

* 这是邓子恢为介绍《鹅钱乡土改实验总结报告》而给《华中通讯》一九四六年七月第五期写的文章

中国的缩影——鹅钱乡看来，就使我们深刻理解到一个真理。这个真理，就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内容，是要解决土地问题，是要实现耕者有其田。这个基本政策，只有彻底实行土地改革，只有达到耕者有其田，使农民个个有田耕，有衣穿，有饭吃，不致货弃于地，才能使中国土地生产大大增长，农村购买力大大提高，工业市场大大扩张。只有如此，才能扫清中国封建残余势力，才能铲除外国侵略者统治中国的下层基础，也才能切断国民党反动派向解放区进攻的内奸助手。因此，土地改革是完成反帝反封建这两个革命任务的中心环节，是中国社会从半殖民地半封建，走向新民主主义发展的主要关键。谁不赞成土地改革，或者对土地改革运动消极怠工，甚至阻挠破坏，他就是违背新民主主义革命利益，就是阻碍中国走向独立、自由、和平、民主的大道，就是革命的罪人。

其次，从鹅钱乡各方面工作成绩来看，在此次土地改革中：

1、充分发动了群众（百分之九十九参加），发动了农村中革命的主力雇农、贫农，广大群众起来，不仅敢于与地主恶霸作斗争，而且敢于与富农面对面的斗争。在此次斗争中，雇贫农已建立了自己的优势地位，建立了自己的领导。

2、由于雇贫农自己起来，因此使全乡农民从地主手里收回了土地，每人得到二亩至二亩多地，使贫苦农民真正从经济上翻过身来，保证了今后的“饭碗根”，使该乡面貌焕然一新。

3、正由于农民得到了土地，因此也就初步发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动员妇女、小孩栽秧、刈麦，而且开始组织了八个互助组。该乡农民说：“只要二年一收，家家户户就要发财了。”这话并不夸大。

4、在土地改革中，把农民组织起来了。农会、妇女会、儿童

团，都建立了，扩大了，并经过了整理。特别在这次斗争中，产生了积极分子，有了组织核心，重新改造了领导机关，而不是形式主义。

5、在土地改革当中，把农民武装起来，为了保卫自己的土地，自卫队、基干队都很快组织好，积极进行查岗放哨。有些青年并自愿脱离生产，有十一人参加了区乡队。

6、在土地改革中改造了党的支部。支部党员经过了考验，谁是积极的，谁是消极的，看得很清楚。在斗争中吸收了大批新的积极分子与群众有联系者入党。改造了支委会，加强了党的无产阶级基础（无产者与半无产者占绝大多数）。

7、在此次斗争中解决了拥军优抗问题，所有抗属、荣誉军人、复员军人都得到了土地；而且得到了较好的分地。以后发动农民代耕也更容易了。

8、最后，在土地改革中大大教育了群众，提高了群众的阶级觉悟、斗争情绪、胜利信心与策略观点。在此次斗争中，使农民看穿了地主是纸老虎，看出了中农的妥协性，富农的自私自利；使雇贫农民认识了自己的力量，认识了团结的重要，认识了共产党、民主政府与新四军是自家人。

这就是此次鹅钱乡在土地改革中所获得的成绩。因此可以知道，只要抓住了土地改革这一个中心环节，只要真正解决了农民土地问题，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真正使无地、少地的雇贫农得到好处，那末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一切工作都可以做好。许多地方，看到工作任务一大堆，便吓倒了；有些地方，因为战争动员要紧，便把土地改革工作停顿下来，以为把战争动员做好以后，再来解决土地问题。这种机械的阶段论，是极端错误的，是不懂得群众心理的。鹅钱乡的经验告诉大家，只要解决了

土地问题，一切工作、一切任务，都可以不费大力的顺利完成。而那些把土地问题抛开，机械的去划分阶段进行工作者，反而取得相反的结果。

第三，从鹅钱乡的土地改革中，可以深刻体会到党的正确的阶级政策。此次鹅钱乡的土地改革运动：第一步是向地主清算，从地主手里收回土地；第二步是把清算出来的土地进行分配。无论哪一步骤，都可以看出雇贫农是土地改革的主力军，中农是参加附和守中立，而富农则是投机取巧，企图独吞斗争果实。鹅钱乡的贫农控告富农说：“与主人算帐，大人不去，叫伢子去；回来分田，就大人出来啦，愈富愈奸”。“光说我的我的，这是大家算出来的，不是你的”。“没有我们算帐你吃屁”。中农说：“有多拿出来，差不多不动”。“我七亩地三口人，刚刚好；不要人家田，也不把田给人家”。富农说：“地多多分，地少少分，牲口也要当人分”。从这些对话里，可以看出雇贫农在此次斗争中，是如何的冲锋陷阵，而富农则是如何的自私自利，尖头狡猾，中农又是如何的守本分，不愿得罪人。对所谓变天思想，该乡贫农说：“怕屁，莫说（汉奸）回不来；即回来，也杀不了我的头，我先杀他头”。从此我们可以理解到党在农村斗争中，是依靠农民，而不是依靠地主，是依靠雇贫农，而不是依靠富农，也不能依靠中农（当然要团结中农）。这不仅由于雇贫农占农村人口绝对大多数；而且由于雇贫农最穷苦，最受罪，最需要土地，最不怕损失。因此在斗争中，也是最坚决、最积极、最彻底的主力军。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在土地改革中，如果我们不依靠雇贫农，而去依靠富农，那包你土地改革不起来，包你革命要失败。在你有势力时，富农可以投机来垄断斗争果实；在你失势时，富农便会变卦向后跑。如果我们仅仅依靠中农，而不去依靠雇贫农，如果我们的农村支部

与领导骨干是建立在中农的基础之上，那么就包管你这个支部是妥协的，不敢斗争，不敢进行土地改革，或来一套假分田。到了时局变动时，中农就会动摇害怕。所谓变天思想，就是中农动摇的典型表现。富农在某种程度上是希望变天的，雇贫农一般是不怕变天的（因为土地不改革他们的日子是过不下去的），只有中农怕变天。鹅钱乡的党正是建立在雇贫农身上，此次斗争，正是依靠雇贫农的出力，所以才达到了胜利；否则即使把地主土地算回来，其果实也会落到中富农手上，而雇贫农得不到好处。正由于雇贫农的发动，由于领导鹅钱乡斗争的李、王两同志掌握了依靠雇贫农的政策，所以才赞助雇贫农平分土地的主张，使雇贫农得到与地主富农一样的土地，而提高了雇贫农的积极性，通过雇贫农去团结中农，对富农进行又斗争又联合的政策，对地主采取分化改造政策。因此也就巩固了农村反封建的民主统一战线，这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有些地方党强调照顾地主富农，要给他多留土地，要保证地主过富农生活等等，这种片面照顾的观点，是不符合党的阶级政策的。要不要适当照顾地主富农呢？需要的，但必须首先照顾了雇贫农与中农，保证雇贫农得到应得的土地，保证雇贫农有饭吃，有衣穿；同时保证中农利益不被侵犯，只有在这个条件之下去适当照顾地主富农才是正确的。因为地主富农与雇贫农的利益是相反的。为强调照顾地主富农，多留地，留好地给他，其结果则是雇贫农分不到地或分地不多，而积极不起来（鹅钱乡余庄村、黄庄村开始规定每人留三亩，雇贫农因分地不多而情绪不高，就是一例）。这样的土地改革，只能是形式主义的，有名无实的。土地改革的目的是使广大雇贫农得到土地，中农土地不动，因此必须把地主土地拿出来，富农多余土地也拿出来，这样才能达到目的。鹅钱乡土地改革，基本上是平分土地，正

合乎这个原则。当然鹅钱乡土地分配中，大人比小孩多一亩或半亩，这种办法还值得研究，据说是贫农要求，说是富农地主小孩多，贫农小孩少，所以这样分，但实际上贫农小孩多的也不少。因此各地分配土地时还是男女老少平分为好。

第四，从鹅钱乡土地改革中可以看出：发现与争取当地积极分子，成为运动的核心，是开展运动的中心一环，而在运动中继续发现积极分子，团结积极分子，大胆提拔积极分子，形成新的组织核心，并以此来改造旧组织，或加强旧组织，又成为巩固运动胜利的基本条件。据李坚真同志口头报告，当他们初到鹅钱乡时，支部书记对土地改革是无所谓的，行动上吊儿郎当的。乡长（是中农，其父与上层分子有联系）对土地改革是不积极的，守中立的，有三个村长也是如此。当时发现了乡农会主任与好几个村农会主任和一部分党员，是贫农积极分子，坚决要求土地改革。因此就抓住了这些积极分子做核心，去推动其他积极分子，推动各村群众起来，一切宣传鼓动，一切清算斗争，土地调查，分配土地等工作，都靠这些积极分子领导群众自己去做，我们工作组同志，只是从旁协助。在土地改革过程中，这些积极分子，就成为群众领袖。因此，在土地改革中调整组织时，群众就把原来三个村长撤换了，而选出土地改革中最坚决、最积极、最公平，为群众所信赖的人来当村长、民兵中队长。改选乡政府委员会，并改选支委与支部书记，洗刷了一批表现不好的党员，吸收了一批新党员。因此，在土地改革中，就联系到该乡整个党政军民组织的改造，使该乡党政军民的领导机关，真正为雇贫农中的优秀分子所掌握，而成为雇贫中农基本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的武器。这就巩固了此次土地改革中基本群众所既得的果实，也就巩固了基本群众占优势的统治，这是很对的。如果当时李同志等不抓住这批

积极分子做核心，去推动群众起来斗争，而只是靠工作组同志代替包办；如果李同志当时所发现的积极分子，不是当地贫农雇农中真正有群众联系的积极分子，而是中农以上甚至地主富农中的假积极分子、投机分子，那么鹅钱乡的土地改革运动就发动不起来。即使勉强发动，也只能是形式主义的假算帐、假分田；即使真分了田，群众得到利益，也只是恩赐的，群众不会自己相信自己的力量，也不会产生自己的干部，改造自己的干部。如此，我们工作团一走，或者时局稍为动荡一下，群众又会把田送还地主，这是可以断言的。我们有许多同志工作做不好，群众发动不起来，或者是形式主义，其原因就在于不懂得抓紧本乡本土的积极分子，不相信本乡本村都有积极分子，看不起这些土头土脑的积极分子，不耐心去教育他们，培养他们，不重视他们的意见，而常常采取自以为是代替包办的方式，把本地积极分子放在一边。这些同志以为自己本事比他们高强，而不知道尽管你本事高强（其实并不一定，如对土地分配等），但本地干部在本乡土生土长，住了几十年，无论如何，他总比你更了解情况，更熟悉当地情形，熟悉哪些人地多，哪些人地不够，哪些人忠实可靠，哪些人刁狡滑头。这些情况，外来干部无论本事怎样高，总不如本地干部。如果外来干部不重视本地干部，不尊重本地干部意见，不经过本地干部而自己去进行工作，那就一定要出岔子，一定要犯主观主义。另一方面，本地干部无论他能力怎样低，他与本地群众总有许多社会关系的，他容易团结群众，容易取得群众的信任；外来干部无论你本事多么高，你与当地群众一非亲、二非故，毫无社会联系，即使在当地做了相当长期工作，也比不上本地干部。因此，如果丢开本地干部，自己去包办代替，就很难得到群众的信任，很难发动群众起来。即使群众在你命令之下组织起来，而没有本地积极

分子做核心，这个组织亦只是形式的，有名无实的，这种组织用来向上级报帐还可以，要他实际去掌握群众就没有作用。不仅群众组织如此，就是党的组织，也是如此。如果党的区委、支委以至小组长，不是党员群众所信仰的核心人物，那么这个党的领导机关，除了使用党的组织权力与纪律而外，就无法真正去领导党员，团结党员。试问这种党委又有什么作用呢？现在有很多地方，党的地委委员、县委、市委、区委书记，还不是本地人，特别是新解放区，甚至市委委员中，没有一个本地干部，有些区委书记甚至支部书记，也不是本区本乡人，而是别乡别区派来的干部，这种现象，就是不懂得当地干部的作用，不懂得与群众联系是党挑选干部的两大基本标准之一（另一基本标准是为人民解放事业抱无限忠诚）。有些同志借口当地干部政治水平低，或者党龄浅，作为不提当地干部参加党委或党委负责人的理由，这也是不对的。当然，如果当地有党龄老、能力高的同志来参加党委或充任党委负责人，那当然最好；但如果没有具备这种条件的人，那就应该降低我们的条件，在新地区甚至新党员也可以担负支书或参加区委为委员，这要看当地具体条件来决定。但有一个原则，就是一定要吸收本地与群众有联系、有信仰的干部来参加当地党的领导机关，这是不能改变的。因为只有如此，党才能通过这些干部去与当地群众发生联系，通过他们去反映群众要求，通过他们去把党的决定传达到群众中去，变成群众的行动。照一般原则，群众中的积极分子都应吸收入党，成为党员。积极分子中比较优秀的领导人物，就应该吸收到党的领导机关中来（不要机械的以党龄加以限制）。这样的党才能与群众保持密切联系，才能有生气，才能时刻了解群众每一脉搏的跳动，才能保证党的每一决定能代表群众的要求，并变成群众的行动。只有这样的党，才是群众的政

党，才是颠扑不破的组织，这个原则是需要各级党委深刻体会而加以立即实现的。此次鹅钱乡土地改革中，改造了农会，改造了政权，也改造了党的支委会，这是很对的。但还有一个缺点，在这次运动中，还没有将鹅钱乡的群众领袖提拔到区委与区政府中来，这需要该区区委以后去完成这个工作。经过这样的土地改革运动中生长起来的鹅钱乡的优秀干部，无论如何是应该被提拔到区委、区政权中来（据说现在有某些同志说鹅钱乡的干部不好，变了，这不能怪干部，而应怪区委不去联系，不去提拔他，提他们参加区委，来团结他们教育他们）。此外，我们也有些同志注意发现与团结本地干部与积极分子，但他们却常常看错了人，把假积极分子，当做积极分子，把投机分子当做好干部，因而使工作受损失，斗争发动不起来。这是什么原故呢？除了有些同志缺乏社会经验，不懂人情世故外，主要原因，就是由于不采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去看人，不用阶级观点去看人，而用非阶级观点去看人。看人本是极难的事，因为人是有脑筋的，他会把真相隐蔽起来，而装出假相给你看。我们有些同志看错了人，就是只看他的假相。如果我们从阶级观点出发，从他的经济背景来看，他是革命的还是假革命？那就可以说，“虽不中亦不远矣”。此次鹅钱乡的土地改革，李同志所找到的积极分子，正是土地少的贫农，而不是土地多的中农，所以这个积极分子，就是真积极分子，而不是假积极分子。抓住这个土地少的贫农积极分子，由他再去发展的，当然也就是贫农雇农，而不会是中富农，更不会地主。因为社会中阶层划分是极其明显的，各阶层的来往，也是物以类聚，贫农与贫农来往，中农与中农，富农与富农来往，这是社会的规律。如果李同志此次找到的积极分子，不是贫农出身的农会主任，而是中农出身的乡长，那么鹅钱乡的土地改革，是不可想象的。我们

有许多同志的毛病，正是不从阶级看人，不注意找贫苦出身的积极分子，而只从表面上去看人，看他表现好，有活动能力（当然活动能力是要的），能完成任务（？）就看中他，而把他当为核心人物，由他去发展积极分子，当然也是物以类聚的中富农或者地主成分。这样的核心，这样的组织，要他担负土地改革任务，当然只有消极怠工，只有敷衍塞责，只有机会主义。我们有些同志，过分信任现有干部，信任党的支部，这在一般说来是对的，但如果我们某些地方现有的干部是中富农，甚至地主出身；我们的某些农村支部，是中富农占多数，或者中富农占领导地位，那么我们就不能无条件的信任他，而应该加以考察，看他们对土地改革的真实态度如何？看他们说些什么话，做些什么事？如果他们对土地改革并不积极，甚至直接间接阻碍土地改革的进行，那么我们对这些组织，除了一般加以说服教育之外，还必须另从党外或党的下层去找无地或少地的雇贫农积极分子，甚至另外成立新农会与新支部，一直到把原有组织改造，土地改革发动起来为止。而这个组织改造就要在土地改革过程之中，不应在改革之后。如果我们不采取这种办法，而仍然在现有组织现有干部中兜圈子，那么就要犯大错误。这是各级党的负责人应该十分警觉而加以深切注意的。

第五，从鹅钱乡土地改革中可以看出突破一点与推动全局的联系。据李坚真同志口头报告，当他们在鹅钱乡开始分配土地时，消息很快就传播出去，周围许多乡村农民都来找她，请她们到他乡里去帮他分田，甚至有的怪他们为什么厚此薄彼的。当时李同志等要他们稍等一时，等她在这乡分好后再去，因此便错过了机会，各乡分田未同时进行，一直等到以后区委从县委回去之后才进行。李同志等对这个工作未抓紧，是有缺点的。如果当时李同

志答复周围农民的，不是要他们等一等，而是马上答应他们派人去，留他们在当地商谈，就乘这个机会了解该乡土地情形、阶级关系，了解来人的成分与一般群众表现，而与他们商讨如何向地主算帐，算什么帐，如何分地，土地人口多少，每人大概可以分多少，多少人要分出，多少人可分进等。再从而讨论如何才能团结大众，才能对付地主富农，及如何鼓励团结积极分子，那些人可以带头，哪些人可以做积极分子，抓住了哪些人就可以推动全村等。如果当时李同志不失时机，把这些问题与来找的农民商讨了，那么李同志等自己本可以不必去，而只是要来找的人回去推动，约他们第二次再来。如此，第二次再来时，必有更多的积极分子来，再花一天半天工夫与他们谈清楚，就可以立即成立新农会，选举负责人，并发展党，作为土地改革之核心。如此再要他们回去宣传发展组织。如此来过两三次之后，该乡积极分子，就可以大部组织起来，到那时再派人到该乡去指导、帮助，该乡的土地改革，就可以搞起来。为了培养干部，在派人到该乡帮助时，还必须带鹅钱乡已分过地或正在分地的干部一同去，在该乡支部或农会上作报告。如此一来可以使该乡农民更清楚土地改革意义与如何进行，二来又可以给鹅钱乡干部以锻炼机会，这就叫做带徒弟方式。如此带他一两次之后，他就可以单独工作了，同时这些干部，到过两三个村之后，与各乡群众有联系以后，比较好的，就可以培养成为区级干部，这是一举两得的，可惜当时李同志错过了这个机会。因此鹅钱乡的土地改革，虽然完成了一点突破，但并没有及时地去推动全局（当然石塘区的土地改革，鹅钱乡是起了推动作用，只是不能及时罢了）。这是工作中一个很大的损失。我们有许多同志对这个问题了解不够，抓得不紧，他们常常借口没有干部，没有时间，因而只抓紧一个村一个乡，而放松邻村邻

乡，以至全区全县的推动。其实地方是互相衔接的，消息是互相通达的，只要你真正把一个乡一个村的工作搞好，做出成绩来，而这个成绩，是适合大多数人民要求的，那么依靠这个乡村已经做过的榜样，依靠这个乡村已经实验过的干部，就可以把邻村邻乡以至全区工作推动起来。群众是富有摹仿性和创造性的，只要一个乡村搞出了好的榜样，大家一定跟着起来照样子去做。这个时候，你只要稍为推动一下，指导一下，甚至不必你派人去，他就可以自动搞起来。而他们首先起来的积极分子，绝大部分都可以培养成为我们的干部。我们许多同志的毛病，就在于不敢放手，不敢大胆让群众去做，不相信群众中有人才，尤其不善于发现当地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与人才，而过分相信自己，相信现有的外来干部，深怕群众搞坏了，深怕新起来的积极分子做坏事，因而拒绝群众的自发性，甚至压制群众的自发性。这是什么观点呢？显然的，这是十足的机会主义与宗派主义。这种观点不克服，要群众发动，要推动全局是不可能的，要培养大批有群众信仰的干部，更不可能。结果一个地方斗争虽然胜利了，但斗争并不能扩大，最后连斗争已经胜利的乡村，群众情绪也无法巩固。鹅钱乡的斗争，这正是其缺点。当然，当时区委在县委开会，区里无人主持，鹅钱乡工作，得不到区委的支持与配合，也是主要原因。

注 释

- 〔1〕 土地改革，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农民土地所有制的革命。这种革命斗争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称土地革命，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称土地改革。
- 〔2〕 李坚真，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中分局民运部副部长、华中分局鹅钱乡土改工作组组长；王文长，当时任工作组副组长。

关于今后土改问题 给刘少奇⁽¹⁾的一封信*

(一九四七年七月三日)

少奇同志转中央：

此次中央土地会议⁽²⁾，我不能出席，深以为憾。兹乘李林同志⁽³⁾前来中央之便，对今后土改问题，提出下述意见，以供参考。

一、关于土改政策。我认为此次会议，应明确规定首先照顾雇贫农，使他们得到足够（不是指足够维持生活的土地，而是指在当地条件下得到足额的土地）的土地，并解决其牲口、农具、房屋、家具、口粮等问题；同时应照顾中农及劳动起家的新富农⁽⁴⁾之土地财产，不被侵犯。这是我们土改政策的基本方面。照顾了这个基本方面以后，再适当地去照顾地主、富农。过去有许多地方，恰恰与此相反，他们是首先照顾地主、富农，而对雇贫农反而照顾不周，或者无法照顾。因此，土改之后，地主、富农仍然留地很多，而雇贫农则得地很少、很坏，甚至根本不分。这在华中土改初期，是很普遍的，后经分局坚决反对，再三指示警告，才把这一精神改变过来。但一直到此次苏中、苏北复查，还有某些乡村，富农有地三、四亩以上，中农二亩至二亩半，而雇贫农平均

这是邓子恢在中共中央工委召开土地会议的前夕写给刘少奇的一封信。

只有地一亩多。在山东则华东局去年“九一指示”^{〔5〕}及省府土地法令，竟公开规定地主及干部留地可比中农多一倍。因此山东土改后，雇贫农普遍得地很少、很坏，甚至未得到；地主、富农及干部留地很多。此次滨海营县（山东群众基础较好地区）复查后，据地委报告，仍然是地主、富农平均有地三、四亩以上，中农二亩至二亩半，而雇贫农所有土地平均只一亩，有的只半亩地。我认为这种方针必须彻底改变。土改有无成绩，土改是否彻底，其主要标准，应以雇贫农是否得到足够土地为断。干部掌握政策是否正确，应看他是否首先照顾雇贫农，还是首先照顾地主、富农为断。因为土改基本目的是在经济上发展农村生产力，在政治上团结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壮大民主力量，去击破反革命的进攻。而在中国条件下，要发展农村生产力，不是靠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农场经营，也不是靠苏联式的集体农场经营，也不是靠中国式的富农经济；在目前阶段中，发展中国农村生产力的最普遍、最进步、最主要的生产方式是中农式的小农经济。旧中国农村生产力之所以不能发展，反而降低，正由于土地集中于地主阶级，而富有劳动力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的雇贫农没有土地或很少土地，使他们不能进行中农式的自耕自给、精耕细作，反而是广种薄收。因此，今天我们的土地改革，如果要求农村生产力发展，就要采取坚决的方针，首先满足雇贫农的土地要求，使他们得到足够的土地，并尽可能使他们得到够用的牲口、农具、房屋、家具及口粮等，使他们的劳动力能使用到自己的土地上面，大大提高其生产积极性，加工加肥，深耕细作，以达到改良土地增加生产的目的。这是目前条件下中国发展农村生产的主力军，这个强大的主力军得地越多，则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也就越快，他们的革命积极性与政治觉悟也就越高，民主力量也就越强，新民主主义革

命胜利也就越有保证，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我们必须保证中农土地财产及在民主政权下劳动起家的新富农的土地财产不被侵犯。只要这些人的土地财产不被侵犯，他们的生产力就不会削弱，生产情绪就不会降低，这是发展农村生产力仅次于雇贫农的劳动大军。因此，雇贫农要土地，只能引导他们向地主、富农要。决不能引导他们向中农及新富农要，这是土改中与满足雇贫农要求同样重要的基本政策。违反这个政策，就要降低中农的生产情绪，妨害农村生产力发展。同时，在政治上会使中农动摇，使雇贫农孤立，而使封建势力增强，这对革命是极端不利的。中央对这个政策的慎重态度与坚决态度是完全正确的。但也有些人单纯强调不侵犯中农而对满足雇贫农要求表示不关心不积极；或在不侵犯中农口号下掩盖其包庇地主、富农的错误。因此，必须把满足了雇贫农土地要求与不侵犯中农土地，两者同提并重，并提防干部在执行中的左右偏向。去年中央“五四”指示^⑥，对满足雇贫农土地要求这点提得不明确，我认为，此次会议应明确提出来。

至于对地主、富农的适当照顾，把中小地主与大地主区别开来，把恶霸与肉头地主^⑦区别开来，把一般地主与抗日地主区别开来，把地主与富农区别开来，这是完全必要的。但我认为，照顾这些人，必须在照顾雇贫农与保护中农之后。必须首先满足雇贫农对土地的要求而后才适当去照顾他们，不应本末倒置，敌我不分。同时，照顾他们可以从多方面注意，如对中小及抗日地主的工商业部分及某些动产，不要采取过去打土豪方式，房屋家具等也留一些给他们。在这些方面，应说服农民。但在土地、牲口、农具等问题上，我认为，不应让步，因为这是农民赖以生及发展农村生产力的主要手段。因此，我主张，一切地主应把他全部土地拿出来而与雇贫农一样平分土地（地少地方还可以少分些），无

论抗日地主或干部都应如此，在这方面不应丝毫让步。

对富农的土地问题：我认为，对新富农土地财产应坚决不动，但对旧富农土地，则不仅拿出其出租部分，且应拿出其自耕部分。原则上旧富农也与雇贫农平分土地，而且好坏搭平。富农自耕地一般比较好，如果让地主多留地、留好地，如果富农自耕地不动，结果是使雇贫农少分地、分坏地，这是两者不可得兼的东西。把富农自耕地拿出来后是否会妨碍农村生产力呢？我认为，不会的。当然富农的生产情绪，即使不动其自耕部分、只动其出租部分，也是会消极的。但上面说过，我们生产主力，主要靠雇、贫、中农，而不是靠富农。那么会不会影响中农动摇呢？我认为，也不会的。只要他自己利益不被侵犯，而新富农土地财产又不动，中农就一定放心。因此，我认为，中间不动两头平的方针，是此次土改的最好办法。这个方针，既公平合理，又简单明了具体，农民易懂易行（农民口号越简单越好）；既可防止被右倾分子富农路线所假借，又可防止幼稚者在分阶级不明确时吃了亏。这个方针，在晋冀鲁豫、华中都普遍实行过，并无坏处。因此，我希望此次会议，能把这个方针贯彻到各个解放区去。在新解放区，因为土地集中，中农土地往往少于当地总人口平均数以下，因此，以乡为单位，按全人口平分土地的原则，还是适用。但采用中间不动两头平的原则，亦无坏处。

对地主工商业部分，我认为，他们在农村和在小集镇的商行、店铺、作坊（如油槽磨坊）等可以由农民清算，禁止清算也不可能。一般地主在城市、特别大城市里的工商业，以保持为宜。这对解放区工商业发展有帮助，对全国工商界争取也有影响。但对豪绅恶霸为农民所痛恨的，其工商业则应让农民去清算。至于以工商业为主要收入兼收部分地租的工商业者的财产，则仍应保护。

二、关于群众路线问题。这是贯彻土改的基本关键。许多地方土改不彻底，主要是由于违反群众路线，不把大权交给农民，而采取包办代替、强迫命令的干部路线；加以上级机关规定地主多留地，富农地不动，更束缚了广大雇贫农不敢起来；起来亦因分不到多少地而不感兴趣，因而难于发动（如去年淮安石塘区某乡开始平分土地时，乡干提出三亩以下不动的口号，群众便消极，后经调查才知该乡地少，如三亩以内不动，则每人分地只几分，又要得罪人，所以群众不感兴趣）。山东土改没有反奸清算时热烈，主要根源是“九一指示”规定地主多留地的缘故。因此，正确的组织路线，必须在正确的政治路线之下，才有可能，这是一个真理。晋冀鲁豫的实际行动与少奇同志最近的指示，给各地以很大的启发。我觉得要充分执行群众路线，除了在思想上教育干部，在组织上大权交给农民与纠正富农路线之外，还须明确指出我们的群众路线是与阶级路线分不开的。即是说，我们的群众路线，是以雇贫农为中心再去团结中农，而不是以富农或中农为中心。所谓倾听群众呼声，也是倾听雇贫农、中农的呼声，而不是去倾听富农的呼声，或者专门倾听中农的呼声。犯富农路线错误的同志，除在主观上错误的阶级立场外，便是错听这种呼声之故。因此，农会必须以雇贫农为中心吸收中农参加，而不准富农参加。同时必须解决党的建设问题。

三、党的建设问题。过去山东、华中党的组织成分，中、富农占很大比重。各级党、特别县、区以上领导成分，中、富农更占绝对多数，这就大大妨碍了土改之贯彻，就是富农路线产生与官僚主义作风形成的社会根源。这种组织成分不改变，要土改贯彻，要新民主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将来要由新民主主义转到社会主义更不能设想。因此，目前党建，必须强调加强无产阶级基

农民运动的三个过程*

(一九四八年八月)

现在我专门来讲农民运动。根据过去大革命时期，苏维埃时期，及抗战时期各地农村的工作经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农民运动的一般规律，可以分做三个时期，兹概述如下：

(一)农民运动初期,主要斗争对象不是所有地主阶级,而是地主阶级的当权派,即直接掌握统治权的国民党县、区、乡长及乡村中的豪强恶霸。斗争口号在蒋管区主要是反三征(即反对征兵、征实、征借)反掠夺。在日本投降后的收复区就是反奸清算。现在我们在新解放区则是防匪自卫、合理负担、清算恶霸三者为主,这三个口号,清算恶霸,当然是打击当权派人物,即合理负担与防匪自卫,也是打击当权派。因为在他们当权时代,一切负担,他们是免出或少出,甚至还在征粮、征兵中贪污中饱、敲诈勒索,今天实行合理负担,他们便要按地亩、按收益出负担,而讨不到便宜了。这不仅在经济上打击他们,而且在政治上打落他们的威势,使他们不能独裁专断。在北方特别在河南,一般地主当权派都或明或暗与土匪有勾结,土匪依靠他们作护符,他们则利用土匪作爪牙,作统治工具。因此,农民配合我们剿匪而实行防匪自卫,肃

* 这是邓子恢在中原局华东南下干部培训班上所作《论群众运动》报告第四部分。

清了土匪，斩断了他们的爪牙，即是夺去了他们的作恶工具。这在实际上就是打击这些当权人物。这个时期，打击面最小，敌人社会基础最薄弱，特别在我们把蒋匪驱逐，把土顽消灭以后的解放区，这些人已失去靠山，而在群众中又仇怨最深，政治上完全孤立。对这些当权派作斗争，不仅有全体农民参加，而且有工商业者、手工业者参加，中小地主以及地主在野派也参加，甚至参加领导。因此，这个斗争最容易发动，也容易胜利。这个时期，雇贫农的积极性不一定能高度发挥，也不一定在领导上占重要地位。斗争的领导权，可能属于中、富农，甚至有地主在野派参加。这可以不必害怕（当然我们主观上要争取无产者与半无产者在斗争中的领导权），只要斗争真正发动起来，只要斗争取得了胜利，结果就是给了当权派以严重打击，使他们威风扫地，使地主阶级内部分化，同时也就给雇贫中农在思想上以初步启蒙，使他们亲眼看到了这些当权人物原来是一只纸老虎，亲身体验到群众团结起来就有力量。因此，在这个斗争中就初步发动了农民，提高了农民的斗争勇气，也初步发现了农民积极分子与领袖人物，甚至初步组成了农民协会，虽然这种组织可能很不纯洁，还可能有地主、富农在内。这些积极分子与领袖人物也不一定都很好；但这样就替农民运动打下了初步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就可以把农民运动进一步转入中期状态。

（二）农民运动中期，是农民与整个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打击对象不是某些地主，而是整个地主阶级，但不是消灭地主，而是在经济上削弱封建剥削，在政治上打落其统治地位，即打落其政治优势。这个时期，主要口号是减租减息，赎当地、借粮，以至发展到算旧帐运动。这个时期，整个地主阶级及旧式富农，是会用一切方法来抵抗、来破坏的。虽然在经济上只是削弱他，只是限制其剥削，但

他们知道这样一来，他们就要丧失了统治地位，以后他们就不能支配农民，不能任意剥削农民了，农村中不是他们当家，而会是农民当家了。因此，这个减租减息，虽然不是土改，不是消灭地主阶级，但同样是一个极其剧烈的阶级斗争。农民在这个斗争中，如想获得胜利，也必须把地主阶级的政治优势打垮，必须建立起自己的政治优势才有可能。在八年抗战中，各地的实际经验，都证明了双减运动并不是一个轻而易举的斗争，而是一个严重的政治斗争，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时期斗争的复杂性、曲折性、残酷性，并不亚于土地改革时期。因为这个时期，是要把整个地主阶级几千年的统治地位打下来。如果这个时期，真正发动了广大农民，真正打下了地主阶级的政治优势，真正建立了雇、贫、中农的政治优势，则下一阶段转入土改，反而并不十分困难了。我认为，农民与地主阶级斗争的胜负关键，主要就在这个时期。大家不要以为今天停止土改，改为减租减息，就以为很容易，而忘记了抗战时期各地农民运动三起三落的艰苦教训。但也不要以为地主阶级了不起，不要为地主阶级的力量所吓倒。地主阶级在农村虽占有经济优势与政治优势，但这个阶级究竟是没落的阶级，是农村人口的绝对少数，而且经过了解放战争，把地主武装解除了，政权摧垮了，又经过了农运初期斗争，把地主首脑人物打倒了，这就使他们丧失了领导，使他们的阶级内部起了分化，他们的力量已大大削弱了。另一方面，农民经过了防匪自卫、合理负担、清算恶霸等斗争，有了初步觉悟与发动，现在转入减租减息，赎当地，他们的积极性就会更高度发挥。虽然中小地主与旧式富农退出了斗争阵营，人数上减少了一些，但团结力量却加强起来。只要我们真正掌握了依靠雇贫，紧紧团结中农，争取新式富农的正确方针，确实团结了农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那斗争是一定要胜利的。这个时期，所谓打下地主优势，确立农民的政治

优势，就是要把地主所有武装转移到农民手里，组织民兵；把地主的组织瓦解（如国民党红枪会等），而把农民协会组织起来；乡村政权要完全掌握在农民手里；要打倒地主中的反动人物，而培植农民领袖，使农民有政权、有武装、有组织、有领导，而地主则四者皆空。这个政治优势的转移，是完成农运中期任务的基本关键，也是替下一阶段土改准备好顺利条件。

（三）农运终期，是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土地改革，就是要消灭地主之为阶级，并消灭旧式富农，这是地主与农民你死我活的阶级决斗，是农村中最残酷也是最艰巨的阶级斗争。因此，这个斗争，必须依靠雇贫，并紧紧团结中农，争取新式富农，要能够确实团结农村百分之九十的人民。同时还要善于分化地主阶级，把大地主与中小地主区别开来，把反动地主与开明地主区别开来，而加以不同的待遇与适当的照顾，绝不能黑白不分，打倒一切。在斗争步骤上，我以为仍可分为两个时期：土改初期以分配土地及没收大地主、恶霸地主之浮财为主，不要普遍去搞浮财。俟土地分配已经完毕，农民所得土地已经稳定，社会新秩序已经安定，农民进一步要求生产资本时，再进一步搞地主浮财。但就在这时，除了少数为群众所痛恨之坏分子外，对一般地主，也不应一律采取“扫地出门”办法，不要过分强调追底财，而以采取调整浮财（即取其多余部分，留其应得部份）及罚款办法为宜。对一般地主仍应照顾他能够继续生活，以便于他们转入生产，在劳动中改造他们。

这三个过程，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农民运动一般发展规律。这三个过程的时间长短，虽随各地主客观条件而有所不同，但一般都应经过这三个过程，使斗争一步步由浅入深，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由温和到剧烈，而不宜操之过急。抛去这些过程，而想一步登天，一次就完成土改，这种人为的主观主义

的作法、形式上好像很快，实际上欲速反慢，反而要走许多弯路。这种痛苦教训，不仅在中原地区得到证明，即在其他地区，想亦不会好得很多。这个道理很明显，就是要有步骤的去打击敌人，有步骤的去发动群众，同时也要有步骤的去培养干部。在农村中我们的敌人是在经济上、政治上、精神上都占绝对优势，而且有几千年统治经验的地主阶级，而我们所依靠的力量，则是经济贫困、政治落后、而又散漫无组织的农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敌人的打击，当然不可能一下子就打倒，而必须有步骤、有策略的先打击其当权派，而后再加以削弱，最后才可以采取消灭政策。我们对农民的发动也不可能一步登天，而须先给以初步启蒙与初步发动，而后进一步提高其觉悟，确立其优势，最后才可能使他们成为农村的统治者，而获得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的完全解放。我们对农村干部的培养，也须在过程中，在长期斗争中，加以考验加以锻炼，随着农民运动的发展与农民觉悟的提高，一步步使他们成为农民所信仰的领袖，成为与农民有密切联系，而真正为农民服务的干部。一般说来，这三个过程，头一个过程为时较短，中间这个过程，为时较长，如果自己不主观，不犯急性病，而能顺着这个自然规律做去，则到末期进行土改，就比较顺畅，土改时间也并不需很长。而其中主要关键就在中期的减租减息，这是打落地主统治地位，确立农民政治优势的转变关头，也就是农民与地主阶级进行斗争决定胜负的关键所在。所以这一个过程，时间是要比较长些，斗争也比较要复杂曲折得多，我们切不可把这个斗争看着轻而易举。但这个斗争，如果胜利了，则下一阶段转入土改，就要容易得多。

停止土改实行减租减息*

(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一日)

土地改革是我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的基本政策。只有彻底实行土地改革，真正达到耕者有其田，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才能解放，障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封建势力才能打倒，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社会基础才能铲除。如此中国农业生产才能大大发展，工商业才能繁荣，国家工业化的基础才能确立，民主自由才能有保证，独立富强自由统一的新中国才有前途。所以土地改革政策不仅我党我军应该坚决贯彻，凡是爱国党派与爱国军队都应该共同努力。不仅工人农民及一切劳动人民应该拥护，工商业家应该赞成，就是地主阶级也不应该反对。因为土地改革之实行，不仅解放了工农劳苦大众，而且解放了中华民族，同时也改造了地主阶级，使地主阶级由不劳而获的寄生生活，变为自力更生的工商业者或光荣的劳动人民，由无用之人变成有用之人，由腐化没落走向繁荣发展，这正是地主阶级再生之路。

土地改革如此重要，为什么我们中原新解放区，今天却又停止土改，而改为减租减息呢？这不是土改政策不正确，也不是中原地区不能实行土改，而是土改的准备工作在中原大部分地区尚

* 这是邓子恢为《豫西日报》写的社论。该报当时是中共豫西区党委的机关报。

未充分进行的缘故。我们在中原新解放区，以至将来在全国一切新解放区必须无例外的实行土改，这是我党、我军坚定不移的基本政策，我们对任何人都用不着隐瞒。但应该知道，要实行土改必须有适当的环境与充分的准备工作。这个准备工作主要是使农民在思想上有高度的政治觉悟与革命胜利的信心，在组织上真正形成雇贫中农自己的农会组织，并产生自己的核心领导人物，此外也还要使地主阶级在思想上、生活上有了相当准备。在土地改革后，地主阶级不能再靠收租、放高利贷为生，一般将转化为工商业者，或从事劳动（工业、农业或自由职业等）作一个光荣的劳动人民，这是地主阶级在土改后的出路。但土改以前需要给他们以必要的思想准备与技术准备，使在土改后不致骤失所依，难以为生。这也是我们具有改造人类这个光荣任务的共产党人所应尽之责。

那么，我们来检查在中原新解放区做好这些准备工作没有呢？很明显的没有做好。在中原一般的新解放区，不仅地主阶级在思想上、生活上未准备好，即绝大多数的农民，在思想上、组织上亦没有准备好。一般农民的政治觉悟尚未提高，革命信心尚未确立，他们虽然贫苦穷困，但穷苦究竟从何来，则缺乏清晰认识，虽然迫切需要土地，但土地回老家的道理，则缺乏深刻了解。他们热烈拥护人民解放军，但解放军是否站得长久，则将信将疑。他们极端痛恨蒋党统治与蒋匪压迫，但打倒蒋党统治及其基层势力，则顾虑尚多。在组织上，真正雇贫中农自己的农会尚未组织健全，当地群众真正爱戴、大公无私的核心干部尚未大量培养出来。因此，新区的土地改革，较好者亦只是少数积极分子起来斗争，广大群众还是徘徊观望，因而就不可免的产生强迫命令、包办代替，以至少数人贪污斗争果实等不良现象。有些地方甚至为流氓地痞、

投机分子所操纵，借端报复，乘机发财，因而乱打乱杀，乱没收，破坏政策，造成恐慌，而广大贫苦农民实际上很少得到实惠。这是中原新解放区土改的一般状况。当然个别村庄真正群众发动做好土改者也有，但一般情况则是明改暗不改、乱改或者根本未改。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共中央中原局才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决定，在中原新解放区停止土地改革而改为减租减息政策，一方面使农民减轻租息负担，生活得以改善，农业生产得以初步发展；另一方面地主在执行减租减息法令之后，仍可保障其地权财权，仍可靠租息为生，而逐渐转化为工商业者或从事劳动，以便将来实行土改时不致难以为生。这种逐渐改良的减租减息政策，正是将来彻底土改的准备步骤，因此，也正是中原广大农民群众目前最实际的阶级利益。不愿意停止土改，不满足于减租减息政策的观点，显然是不对的。中原全党必须正确认识中原局停止土改实行减租减息政策的正确性，而坚决执行，以便团结各阶层人民，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力量，中立一切可能中立的力量，减少不必要的阻力，以建立广泛的反美反蒋爱国统一战线，争取人民解放战争之彻底胜利。

但另一方面，必需保持农民既得利益。凡是在抗战时期，或在人民解放战争初期，经过减租减息反奸清算之老解放区，仍须继续进行土改。凡是去年大进军后的新解放区，则一般应停止土改，改为减租减息，但在这些新区经过土改之村庄，凡是已经分得土地之农民，政府应保证其土地所有权，禁止地主强迫农民退地，违反者应严加惩罚。其地主浮财已经分配了的，亦不得强迫农民退回，只有当农民确系自愿退回土地及浮财时，政府才不加干涉。至于不应没收之中农财产与地主、富农之工商业被没收者，则应退还原主，或另行设法补偿之。

在老解放区继续贯彻土改，在一般新解放区停止土改，实行减租减息，但须保持农民既得利益，这便是我党今后相当时期内在中原的基本政策。望全党同志与广大人民共体斯旨，力求贯彻，使五千万中原人民走上完全解放之坦途。

关于接管郑州开封的经验*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二日)

一、城市工作，在军管时期⁽¹⁾一般可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重心是接管机关、企业，安定人心，恢复秩序。时间大概一个月左右(郑、汴⁽²⁾都是一个半月)就可大体结束。第二阶段是恢复与发展生产，整顿与改造组织，彻底肃清匪特，确立人民统治。时间需要较长一些，主要靠群众特别是工人的发动、组织与觉悟程度来决定。目的是建立真正以工人劳动者为骨干的人民统治，即经过各界代表会议建立人民代表会议及其所选举之政府的统治。军管时间的长短，即以这一工作完成与否来决定。

(甲)接管机关、企业、资财，是头一阶段的主要工作。据郑、汴经验，接管这些机关(政权除外)，尤其是接管企业，以不破坏原机构，尽可能保持原机构为好。只要不破坏原机构，则一切机器、房屋、资财、文件、档案等，都可保存无损。否则就要紊乱散失，长期难于恢复。我们接管郑、汴时，因为干部少，懂得管理企业的人太少，对于平汉、陇海二路局及电讯局等只派几个人去，其中只有一二熟手，邮政局、博物馆、图书馆则无一人，因此，不得不用原来员工，也恰恰因此而保存了原建制，所以这些

* 这是邓子恢写给毛泽东的综合报告一部分。

企业保存的最好，工作恢复也很快。

此外，如旧政府中的档案、户口管理人员及警察中之交通、卫生、消防、户籍警等也应吸收，大量使用，以后逐渐改造。为了便于使用旧员工，对其中之较高级人员也应暂时使用，以便经过他们较易去争取所有员工（他们开始对我们还有怀疑隔阂），迅速恢复工作。

据郑、汴经验，对大的国家企业，如铁路、邮政、电信等，如我们有些人才，则由我们派局长，以原局长或处长等为副。如我们缺人才，则最好使用旧人为局长，我们只派军事代表。一切用人、行政、命令、委任，未经军事代表批准，不发生效力。郑州铁路局先组织管理委员会作为过渡的领导组织，查清旧人员之后再正式加委的方法更为妥善。如此，旧职员敢于放手工作，完成任务；我派去之人员，一面可掌握用人行政大权，一面可以从中学业务，接近群众，了解情况，了解好人坏人，以后再配合职工运动之发展，有步骤、有计划、有策略地从下而上提拔好人，分别洗刷调换坏分子。如此，既可保证现行任务之完成，又可逐步改造旧机构。我们认为，这是比较稳健的办法。但要任用旧职员，必须在生活上适当照顾他，业务、技术上尊重他，向他学习，政治上教育他，帮助他进步，逐渐地克服其缺点。而所谓生活上适当照顾他，主要是原职原薪，郑、汴办法是照国民党实行金圆券时所定之底薪，按九月份平均物价折成粮食发给。这种办法最简便。但国民党的薪资规定也确有许多不公平、不合理之处，因此，下级职员与一般工人不满。他们说：“共产党来了还是他们（指中上级职员）吃得开，我们该倒霉”。因此，我们必须向职工公开宣传，宣布原职原薪是过渡办法，指出国民党规定的底薪确有许多不公平不合理之处，我们将来要采取以几种生活必需品计分作为

薪资标准^[3]，并实行民主评定与行政批准相结合来评定等级，评定工资。铁路员工经过我们这种宣传后，不仅下级员工满意，即中、上级职工也觉得安心，因为他们也知道原职原薪是临时的过渡办法。

（乙）关于宣传教育工作。这是第一阶段安定人心，与第二阶段整顿组织、改造组织、建立人民统治的重要工作。郑、汴入城时，宣传工作做得尚好，收效亦大，但只停留于形势宣传及一般政策宣传，很快就不能满足群众要求，因群众要求对我们各种政策之具体的了解。因此，军管会及警备司令部、市政府布告及各种措施之具体解释，便成为入城后一时期的工作中心。在徐州解放后，一般形势宣传均落在形势发展之后，因此必须着重宣传战争性质、把战争进行到底，及加强支援战争、为战争服务的方针，宣传国际形势、克服急性病，更能切合时局。

郑、汴在宣传中，都缺乏对工人、贫民的宣传教育，这是对城市基本依靠无产阶级领导作用认识模糊的一种反映。至于学校教育，郑、汴解放以前，普遍不重视，不维持旧学校。但这一时期又发生另一倾向，即把所有旧学校都保持下来，单位很多也不予合并，私立的也想改为公办，公费生随意扩大，旧教员无条件吸收，一律原职原薪，而不估计我们的财力能否负担。各地都有此表现，而以开封为普遍。因此，我们确定教育的方针分三种：

第一种是短期训练班，如中大、军大、卫大^[4]、会计人员训练班等，都是二、三个月至五、六个月毕业，目的在吸收知识青年加以初步改造，即分配工作，在工作中再去改造他们。

第二种是办党校，办职工训练班。吸收地下党员及积极分子，加以提高，使之成为工运及建党核心。最近计划在郑、汴办在职工训练班，加以短期训练，即派到新城市、新企业中去配合接

收工作。我们拟在郑、汴合共招收五百人，财办吸收财经职员五百人，这是目前我们教育的中心所在。

除此以外，对旧有中小学校，则采取维持现状逐步改造方法。对旧教员、教育办法及教材等，一般照旧办理，个别予以更换及修改（如公民课等），以便提高学员文化科学常识，争取旧教员不使失散。对他们的改造，则是根据我们主观条件，先集中力量在各县办好一个中学以为榜样，其他人数不多的中学，则设法合并。公费生人数应严加限制，以节省开支。各校校长慎重任免，在未弄清底细以前，采取临时办法，如由教务长代理，或组织校委会之类，以为过渡。对私立中学，好者准其照旧办理，坏者改造之。河大^{〔5〕}目前只有一个医学院，其余员生由国民党送往苏州，正派人联络争取，将来复校亦照旧办理，略加改良，不学中大办法。

（丙）第一阶段中，安定民心之另一重要工作，是解决煤、粮与贷款问题。对旧法币与金圆券采取限期禁用、逐步压价、封包出口办法，较为妥善。但入城前，中州钞^{〔6〕}准备不够，是一缺点。对煤粮供应，则应取消封锁，畅通城乡交通，鼓励农民及私人资本运销煤、粮为主，公家协助如贷款、帮助煤粮运销公司等为辅。在入城初期，运煤、粮平糶亦应依照市价略加稳定，不可压价过低，反而妨碍商运。开封有一时期出售公粮，把粮价压低到比乡间还低，结果商运停止，乡粮不能入城，几天之后煤价粮价暴涨，这是主观主义的典型表现。城市经济斗争与财政工作正积极收集材料，研究对策，以后再行报告。治安维持，保甲利用，清除匪特，亦另行报告。

二、职工运动，是第二阶段整顿改造组织，确立人民统治的基本一环。在这些中等城市，不但有很大数量工人（如开封四万余，郑州三万余，商邱一万余），并有很多产业工人，如铁路、电讯、邮政、

电灯、面粉等工厂工人。这些职工都是无产阶级的基本成员。他们掌握着机器,工作积极,有组织才能,无地方观念,文化程度、科学常识也较高。但这些职工,现在还有不少一部分人失业(一部分是日寇投降后被重庆来的人挤掉的;一部分是革命战争及我们入城后因生产未恢复而失业的;另一部分则是在蒋匪军撤退时将机器、材料搬走而失业的);煤业工人因交通未顺畅,工商业未放手恢复,生活尚困苦(比蒋占时期好些)。在胜利形势影响下,职工情绪甚高,变天思想已没有。但尚有少数人受暗藏特务威胁,不敢与我们接近,不敢向我们说实话。对中上级职员国民党官僚主义作风不敢提,有些人过去还要向他们送礼,以求得升级与加薪。旧工会还存在,这些旧工会是国民党解散劳协⁽⁷⁾后由资本家领导下组成的,各业工会理事长多是各业较大的资本家或其代表人物。这些旧工会,过去对工人有许多剥削,捐款多至十几种,如月费、年费、底票费、福利费、慰劳费、牌照费等。工人每月所得,被剥夺百分之十到二十。他们并利用流氓组织,如稽查队,到处敲诈勒索,因此这些旧工会在工人中恶感甚深。但这些旧工会,过去也为工人办了些好事,如工人澡塘,工人子弟学校,工人剧院,工人理发馆,经过铁路无偿替工人运煤等。因此,也应估计到这些旧工会的某些人还可能在工人中有某些好影响。我们在工人中的工作,由于干部长期处在农村,长期依靠农民,进城后反而对自己的工人阶级冷淡生疏,并对工会工作过于谨慎。另一方面,工人中经过了国民党长期影响,也相当复杂(郑州开始组织铁路工会时,即被特务控制,后又解散),职员中国国民党思想与官僚作风相当浓厚,职工之间也有矛盾。因此,工会工作未被适当重视,干部不够坚强,经费不足,工会房屋不好。因此,工会工作至今还只在少数单位中找到些积极分子,初步建立了工会筹备处,郑州在铁路、电讯、澡塘、黄包车等单位建立

了筹备处,开封在电灯、邮政、黄包车等单位中有了联系,商邱只在三轮车中有些联系,了解了职工一般情况。工会工作同志,郑州用工会筹备处,开封用豫皖苏工联合会驻汴办事处名义出现,经过厂方或个人关系以采访名义去接近工人,有些则用交通局派员名义去接近工人。对积极分子的条件,规定有下列四条:甲、政治进步;乙、生产或工作积极;丙、出身纯洁,来历清楚;丁、与群众有联系。

工人的经济要求,一般还限于福利事业(如陇海工人要求恢复澡塘,火车无偿运煤等),取消无理剥削(如澡塘做下活的工人要求取消老板扣下活钱等),取消过年送礼,及反对老板无理开除等。开封工人现在要求清算旧工会帐目,要求他们把过去所收捐款及开支帐目公布。我们认为,清算旧工会帐目已成为工人政治斗争的第一个目标。一般工人对旧工会负责人恶感甚深,这些旧工会负责人直接间接与特务有关,有些本身就是特务。这种清算斗争,形式上是经济斗争,实质上则是从政治上打击旧工会,提高工人阶级觉悟的最好办法。因此,我们支持这种斗争。但由于我们在工人中基础不大,旧工会对工人的影响亦好坏不一,因此,我们发动这种清算是步骤、有策略的。拟先组织对原河南总工会理事长刘华堂之清算(刘是开封冶炼业最大资本家,本身可能是特务,工人对他仇恨最深,贪污最大,解放后还贪污舞弊,已被我扣留),以后再逐步清算各业旧工会。我们的方针是,所有的工会帐目必须清算,贪污多少必须弄清,贪污必须赔偿。但赔偿多少则看各理事长罪恶大小,资产多少及其对工人关系如何决定。为了更有系统、更大规模地开展工会工作,我们拟在郑、汴经过各工会筹备处联席会议或代表会,成立郑州、开封总工会筹备处,铁路亦成立工会筹备处,以后再由郑、汴、洛、丘、许^⑧等处及铁路、邮电工会的联席会议,成立中原总工会筹备处。

三、综合这一时期城市工作，一般干部思想上有几个主要偏向：

第一个偏向，是对城市不重视问题。开始各地普遍存在着重农村而轻城市的观点，不肯把大力量转到城市，不愿意调干部到城市工作，许多地方县委、县府不进城（如当时之临汝、禹县、许昌等），也不派警备部队，只派几个干部到城市办公。郑、汴解放后，我们指定各地调干部，并由我们自己派一批干部去工作，但各级党委对城市及交通要道沿线工作仍注意得很不够。如商邱十余万人口，又是陇海路重要车站（朱集）所在地，但所派去的大小干部全市共只有三十三个人。陇海平汉线的工作也极弱。这自然是由于各地干部太少，但主要原因是干部思想上仍停留于旧形势旧观点。他们还机械地保持着过去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单纯依靠农村，先农村而后城市，以农村包围城市旧观点。而没有看到今天的我强敌弱的新形势下，城市与交通要道已永远为人民所有；我们开展工作的步骤，应把过去二十年来先农村后城市之老道路，改变为先抓住城市与交通要道，来推动农村。这不仅在军事上有可能充分发挥城市与交通线的人力、物力来生产军需品，转运粮弹与伤员，以支援解放军作战（在这点上起作用比农村大得无比），而且在政治上应先控制城市以影响农村，在经济上亦须先掌握城市与交通要道来为农村建设服务。如果不注意城市与交通要道的工作，不仅在军事上妨碍战争，政治上影响不好，而且城市经济的损失，对农业生产的危害，尤将不堪设想。

经过不断解释，目前这种旧观点已逐渐改变过来。但在城市工作的个别干部中，又产生重城市而轻农村的偏向，以为农村无关重要，而不知我们步骤上先城市、后农村，并不是忽视农村，并不是不要依靠农村，不仅今天战争中的兵源、粮源依靠农村，即

在将来整个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农村生产的发展也正是国家工业化的前提条件。

第二个偏向，是对城市中我们的社会基础的认识问题。我们在城市中当然是基本依靠工人、独立劳动者、自由职业者、学生与贫民、小贩，而产业工人则是革命中的领导阶级。但这个思想在城市干部中还异常模糊。他们不仅忽视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而且把一般劳动人民与其他阶层混为一谈。郑、汴的工人、贫民批评我们进城后忘记了他们，宣传中没有一句提到贫民，说我们对知识分子与公教人员关心多，对工人、贫民关心少。只看到工商业者，没看到工人。对工运工作则普遍放松，有些可能办到的工人生活改善，也未有注意，工人被无理开除，工资被额外克扣，特务对工人亦肆无忌惮地威胁，也被容忍。这些固有其他原因，但基本原因是由于干部思想上没有分清敌我，没有弄清谁是基本依靠，谁是同路人。

第三个偏向，是把暂时利用的与争取改造的对象混淆起来。如阜阳、开封开办失业公教人员训练班，吸收了七八百人，其中上至专员、县长、警长，下至警察、员工、差役，就是最明显例子（现已决定提前结束了，分别去留）。对上层分子之使用，也是如此。如朱集，任用旧警长为我们公安局副局长，结果贪污舞弊，包庇特务，为害甚大（现已决定撤换）。开封不慎重地任用敌伪时期与我有关之旧人员担负政府重要工作。这些都是把暂时利用的人，当作争取改造的对象。

以上这些，说明了目前城市工作中主要偏向是右倾。这种右倾思想的根源，是阶级立场不明确，对革命发展形势估计不足，干部思想落后于形势之发展；当然这与开始进城时我们强调团结各阶层，强调安定人心，恢复秩序，强调对工运采取慎重态度也

有关系。我们对此事前缺乏指示，事后纠正不及时，这是我们应该负责的。另外，郑州军管会之随便取消，说明我们对军事管制的任务与作用认识模糊，而此次开封对付民主共进党^{〔9〕}之活动，则充分说明了中央关于军事管制的指示之正确。

注 释

- 〔1〕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根据解放战争胜利发展，大中小城市相继解放的形势，发出了《关于军事管制问题》的指示，规定城市解放后，要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实行一段时间的军事管制。军管的任务是：肃清反革命的残余势力；接收一切公共机关、产业和物资；恢复并维护社会秩序；收缴一切隐藏在民间的反动分子的武器及其他违禁品；解散一切反动党团组织；逮捕战争罪犯及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建立革命政权；建立可靠的群众组织；整理、建立党的组织。
- 〔2〕 郑、汴即郑州、开封。
- 〔3〕 解放初期物价不稳定，薪资发放按“折实单位”计算。每一“折实单位”包含一定数量的粮、油、布、盐、煤五种生活必需品。这些生活必需品的市场价格，每天由人民银行公布。
- 〔4〕 中大、军大、卫大即解放初期开办的中原大学、中原军政大学、中原卫生大学。
- 〔5〕 河大即河南大学。
- 〔6〕 解放战争时期有些解放区自己发行纸币。中州钞是当时流通于中原地区的地方性货币。
- 〔7〕 劳协即劳动者协会。
- 〔8〕 洛、丘、许即洛阳、商丘、许昌。
- 〔9〕 民主共进党是开封解放初期破获的反革命组织。

关于新区农村工作问题给 毛泽东主席的一封信*

（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一日）

毛主席：

会场^{〔1〕}上不少同志谈到新区农村工作，认为在大的胜利形势下，似乎可以不需要经过减租减息这个过程。我的意见，像平、津^{〔2〕}周围这样的地区，由于我们长期工作，已造成土改区包围非土改区的形势，而新解放农村又不很大，在这些地区可以不经过双减过程，一开始即进行反霸民主运动，以打击大地主及地主当权派。同时由政府宣布农民停止对地主交租交息，其已交者以后还可以清算退还。但分配土地还不宜立即进行，而宜在农民发动以后。至于在长江以南及陕甘等地新开辟之农村，则一般需要经过三个过程，此三个过程时间长短，当然应看主客观条件与群众发动程度如何来决定，但不能将双减过程取消。将来就是没有战争，我们仍以经过双减转入土改为好，哪怕双减过程只有一年或几个月时间也好。理由是：按照一般规律，广大农民群众的觉悟与农民干部的培养，必须依靠他们在与地主斗争中自己的亲身经验。列宁说过，作为党的建设来说，主要靠宣传教育，但广大群众的觉悟，

* 这是邓子恢在参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期间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

仅靠宣传教育是不够的，还要有群众自己的政治经验，这乃是一切大革命的根本规律（大意如此）。这句名言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完全证明了其正确性。农民经过反霸反地主当权派，只能算初步的启蒙与初步的发动，农民干部的初步发现。但反霸反地主当权派，并不等于农民与整个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因此，从反霸转入双减，还要打破农民的良心论与好人观点，打破农民依靠上级不相信自己的缺点（固然也有要求停租停息的，但这属于个别进步分子，大多数农民并不如此）。经过了再一阶段的斗争，才能使广大农民群众（而不是少数进步分子）真正觉悟起来，真正相信自己的团结力量，也才能真正涌现一批为群众所信赖的农民领袖出来，而形成党在农村的领导核心。

第一、我们农运目的是为了发展农村生产力，至少要保存现有生产水平，不使降低。不论双减也好、土改也好，如果不顺其自然、按照发展规律而人为地去缩短农运过程，用行政命令去分配土地、停租停息，当然也可以做到，但结果不是生产力发展，而往往是生产力降低，这对我们是极不利的。

第二、就打倒敌人来说，有几千年统治基础的地主阶级，要真正把他打倒，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就是国民党军被消灭，上层政权被摧毁，但他们在农村的力量仍是不可忽视的。没有各县各村农民群众的真正发动与觉悟，要打倒地主是不可能的。这点我们有许多同志往往估计不足。过去我们在闽西、闽南等地，许多地区农民运动由反对苛捐杂税，转入减租减息或借粮后，即迅速转入抗租抗债、暴动、分田。那是因为当时四周反动势力迅速向我们进攻，我们为了应付迅速到来的反革命进攻，不得不迅速转入土改，使农民得到土地后生长革命力量以资抵抗。但这种过早转变，也妨碍了四周农运的发展。当时许多边区与苏区的对立，

固然由于干部缺乏明确的阶级观点与充分的群众路线，但苏区过早土改，邻区农民赶不上，地主过早警觉、镇压，也是重要原因。当时傅柏翠^{〔3〕}不主张转入土改，固然由于他的阶级立场，由于他害怕斗争，由于他看不到当时只停于双减而不转入土改，也同样引起敌人进攻所致。但如当时环境允许，我们多搞一个时间双减，以便推广双减区，发展农运面，则慢一点转入土改，并不是不可能的。今天情况已基本改变，我们已有强大的军队，已能控制全省全国政权，并不需要依靠新区农民组织新武装来对付敌人进攻。因此我认为就是把双减时间拖长一点（当然也不是很长），慢一点转入土改，对我们并没有大坏处，而对农民觉悟与自信、干部培养与考验、地主分化与削弱则有更大便利。因此我们的意见在将要发展之新区必须照你之报告实行双减，而在双减以前，应有一相当准备时间，这是发展新区农运的决定一环。

此外，在农运中的群众路线问题是决定一切的。尽管政策正确，如果在组织群众上不走群众路线，而采取官僚主义的代替包办、命令主义的办法，结果群众运动只能是形式主义的。这样不仅不可能达到发展农村生产力、提高农民觉悟、培养干部、打倒地主的目地，而且往往适得其反。由于抗战以来我党有了军权、有了政权，而许多干部又多是地富出身，因此各地群众运动真正走群众路线者甚少，许多干部不懂得什么叫群众路线，不懂得争取群众大多数，不懂得依靠广大群众的自觉自愿行动，这是群运不能迅速开展的重要原因。望中央将来对农运指示中说到这点。因怕你事情忙，无时间谈话，所以写成此信，供你做结论时之参考。

注 释

〔1〕 会场指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会场。

〔2〕 平、津即北京（当时称北平）、天津。

〔3〕 傅柏翠（1895—1993），福建上杭人。192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6月领导蛟洋农民武装暴动。1929年任闽西红军五十九团团长、第四纵队司令员。1930年3月任闽西苏维埃政府执委、财经部长。1931年被开除党籍。此后，接受国民党委任为杭连岩边界地方保安队总队长、省保安十一团团长、永定县长等职务。1949年6月与李汉冲、练惕生等人领导闽西国民党军政人员举行起义，脱离国民党。1950年任福建省人民政府委员、高级法院院长。后曾任福建省文史馆馆长、福建省人大常务委员会副主任。1985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怎样走向经济繁荣的道路*

(一九四九年六月)

我今天很高兴来参加开封市最高人民代表机关会议。我想和各位谈一谈怎样使开封和整个河南走向经济繁荣的道路。这个问题是各位代表和全市人民所最关心的，也是我们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所最关心的。

河南十余年来，兵连祸结，历遭日寇的蹂躏，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统治及其所发动的空前规模的反人民战争的破坏，弄得交通阻塞，生产停滞，工商破产，市面萧条，人民所受痛苦极为深重。开封市就有十万人生活困难，商人无业可营，工人无工可作，并影响到各阶层人民的生活。

现在河南全境解放了，交通也逐渐恢复了，人民生活原该好些了，但是直到今天，工商业还是没有完全恢复，教育还是没有发展，各界人民的生活，还是没有显著改善。所以我们天天在研究考虑，如何改变这种情况。去年年底，我们曾提出生产与战争结合，生产为战争服务，保证军事供应，并使人民就业。因此，发动了大家做军鞋、缝军衣、造炸弹、运粮食等等。这样做的结果，解决了一部分群众的生活，又适应了战争的需要。现在战争打向

* 这是邓子恢在开封市各界代表会第五次会议上的讲话。

江南去了，建设任务的比重增加了。因此，今后的生产，就主要是为农民服务，与农村的需要结合。因为农民占总人口百分之九十，工商业如不为农民服务，就没有发展的可能。

三个月来，开封各界人民在市委与政府的领导下，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使面粉、榨油、电灯等大大小小的工业和手工业，都有很大的恢复，三万失业工人有了工做，工商业界也有了经营兴趣，运输工人，在政府贷盐贷款帮助下，组织起来搞运输，也赚了钱，这是很大的成绩。但是，失业或半失业的人还不少，生产的恢复还只是开头。今天，大家来开会，就是要进一步研究如何使开封的工商业恢复更快更好，全开封三十万人民都能就业，市面能很快繁荣起来。

搞好内外城乡关系

我以为，在目前情况下首先要做好商业工作与运输工作，搞好内外关系与城乡关系。河南与东北不同，东北工业占国民经济百分之四十七，河南则工业寥寥无几。河南的社会经济，具有半殖民地经济的典型特点。河南有许多特产，如烟叶、棉花、花生、小麦、鸡蛋、桐油等。这些特产，大部分是作为工业原料向外运销的。因此，河南农村经济对城市的依赖性很大。许多工业，如榨油厂、打蛋厂、面粉厂、打包厂等，都跟着这些特产的运销而发展。如果这些特产不能畅销外地，价格惨跌，结果不仅损害农民利益，使农民生活困难，购买力降低，而因此商业也就不能趋向繁荣，许多工业陷于停滞，城市工人、贫民、职员及一般市民的生活，也就要受到影响，整个社会经济就形成萧条衰落。各种特种农产品没有销路，这就是过去几年来河南社会经济不活跃不

发达的重要原因之一。而销路所以停滞，则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占据着城市，并进行反人民内战，造成了城乡关系内外关系完全断绝的结果。所以为农产品打开销路，使土产外销，货畅其流，是当前河南要恢复与发展工业的主要关键。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已接近最后胜利，南京、武汉、西安、上海等大城市都相继解放了，陇海、津浦、平汉三条铁路，大部分修通了，长江由汉口到上海的航运畅通了，而由白河、汉水、沙河、淮河通到长江的航运也通了，各公路干线，也四通八达了。上海、武汉、天津等工业城市，又都需要大批花生、棉花、烟叶等农产品。这些农产品大量出口的机会现在到来了。河南将来一定要成为工业区，这是我们建设新河南的基本方针。从今天起就应当着手。但是当前河南经济工作的中心关键确是畅通商业，运销特产品出口。如果畅通了进出口商业，运销大量农产品出口，这个问题解决了，加上农村土地问题得到适当解决，则工、商、农、牧、运输等就能逐渐发展，大家就有工做、有饭吃，政府财政收入也可增加，文化教育及其他社会事业也就可以逐步加强。

要搞好内外关系，使货物畅通：（一）首先要解决铁路货运问题。货运价格要减低，并要实行铁路联运制度，在沿途重要车站设立货栈，便利商人存放货物。还要经常与商人取得联系，帮助解决商人各种困难。（二）要恢复转运公司，专门负责转运货物。除建立公营转运公司外，私营转运公司也要迅速复业。农民、小商自己运货，只在短距离内才有可能，远道运输，只有由转运公司代运才方便得多。我建议：从开封开始，放手复业。请大家对转运事业提供意见，订出条例。（三）要正确处理牙行问题。如粮行、烟行、棉花行等。这些牙行固然带着封建性剥削，如行佣过高，无理加磅等，农村集镇中的牙行更带垄断性，所有货物买卖

非经过牙行不行。这些封建制度与封建性剥削，必须加以取缔。政府应颁布一个牙行条例，规定行佣最高额，禁止不合理剥削，禁止垄断买卖，保证客商交易自由平等。只要取缔了这些封建剥削与封建制度，则牙行在新民主主义社会里仍是有用的需要的。因为牙行代客买卖在性质上等于经纪人作用，是社会不可缺少的一种分工。我们许多同志只看到牙行封建性的一面，而否认了牙行经纪人作用的一面，因而反对牙行，甚至想把牙行取消，而代之以公办的交易所。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固然将来也应有国营交易所的设立，如华北农民服务社一类的东西，这是必要的。但决不能因此便废除了私人牙行。因为牙行对城市对农村同样有许多经济联系，人事熟悉，情况熟悉，并有信贷关系，而国营的则在很长期间也很难做到这一步。如废除了私人牙行，结果是妨害了商业流通，这是自己害死自己的愚蠢行为。（四）要解决电信交通问题。要使工商业界随时随地互通商情。（五）银行要办汇兑。汇兑率不要太高。私人银行钱庄准予复业，以流通资金及外汇。（六）要打破各区间的贸易限制。这些问题，一经解决，进出口贸易即可畅通，这些特种农产品便可活跃，城市工商业便可逐渐恢复与发展起来。

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也就是内外关系与城乡关系问题。

正确执行公私兼顾公私两利方针

其次，我要讲一讲公私关系问题。上面说的河南目前要以恢复商业，畅通土产外销，为当前经济工作的中心关键。这个工作靠谁来做呢？当然国营的贸易公司与银行、铁路，要负重要责任。贸易公司应有计划地向华北、华东、东北及各地贸易公司，订立

大批换货合同，大量运销农产品。还要建立公营的转运公司，专门负责转运任务。银行、铁路更应根据这个方针，来改善自己的工作，来为畅通货运恢复商业服务。只有这些公营企业日益壮大与健全起来，才能使经济工作做得更好更有计划性，更适合于人民的利益。公营工厂更是如此。

应该知道今天的公营企业，就其性质说来是国家企业，是新民主主义的领导核心。但就其在社会经济的比重说来，那还是渺乎其小。因此，不论在恢复与发展工业上、商业上、运输事业上，我们当前的急切工作，不仅要注意建立与发展公营企业，同时应同样的注意去恢复与发展私人工商业，应用各种办法去推动私人资本的积极性。这不仅政府工商局应该如此，就是贸易公司、运输公司，也应如此。应该经过自己的业务去与私人行商及私人转运公司，密切结合起来，并正确执行公私兼顾、公私两利的方针。譬如运棉花出口，贸易公司可与华北、华东贸总订立合同，出售大量棉花，分批进行交易。但贸易公司在采购棉花上就应与各地私人牙行结合，除自己采购外，应委托他们去收购棉花，与他们订立合同，规定采购数量、价格、交货交款日期，并取得货样，以后公司即按合同及货样取货，而牙行则取得佣金回扣。在棉花转运上，贸易公司亦可与私人转运公司结合，委托他们把棉花运到指定地点，而给以一定回扣。此外，还要鼓励私人进出口商行与沪汉等地商行进行棉花交易。这样公营与私营结合，通力合作，就能完成畅通货运的任务，而又达到公私两利的目的。这是两全其美的办法。过去我们有许多同志不采取这种公私兼顾、公私两利的方针，不通过牙行去采购土产，而单纯由贸易公司自己小手小脚的去采购土产，结果采购数量太小而私人行商又无事可做，无利可图。这是公私分离，公私不利的办法，今后必须改变。正由

于我们过去未很好执行这种公私兼顾、公私两利的方针，所以也增加许多私人工商业者的怀疑与顾虑。譬如有些人怕国营公司发展了，会将私营公司挤掉吞掉。这种想法，一方面由于不了解我党公私兼顾的政策，另一方面也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以中国之大，人口之多，物产之富，交易之广，不仅今天的国营公司挤不了，吞不下，就是将来国营公司再大几十倍，几百倍也万万挤不了，吞不下的，何况国营公司根本就不想吞，不想挤。可是采取公私兼顾、公私两利的方针呢？另有一些人怕财发大了，人民政府不予保证，怕群众斗他，没收他，害怕养胖了再杀。这种顾虑更属不必要。要知道新民主主义社会，不但要有国营经济，而且要有私人经济。没有国营经济不行，没有私人资本也不行。今天的中国，不是资本家太多，而是资本家太少。新民主主义社会里，资本家是有用的，他们不仅有资本、而且有各种管理人才与管理知识，他们与各地工农商业，有千丝万缕的经济联系，熟悉各地经济情况。因此，光有工人没有资本家，是不行的，光有国营经济没有私人经济也不行。我们党与人民政府之所以允许资本家存在，允许资本家发财致富，所以保证私人资本之营业自由与合法权益，正是由于新民主主义社会需要他们。因此，我们与资本家合作和公私兼顾的方针，并不是一时的策略利用，而是在新民主主义长期经济建设过程中不可动摇的基本政策。我们有些同志厌恶资本家剥削人，因而不愿意执行公私兼顾、公私两利方针，这是不对的。有些资本家怕发财，怕做大生意（养胖了被人宰杀）的想法也是不必要的。要知道新民主主义社会里，既然需要资本家存在，就要允许资本家在一定方式下的正当营利行为。这是一种合法权益，人民政府要予以保障。如果有人随便侵犯这种合法权益与正当财产，人民政府就应加以制裁。这不仅是为了资本家利

益，也正是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此外还有一些人怕共产，他们说：共产党总有一天要共其他的产，因而不愿积极做生意，马马虎虎，得过且过。这种想法也不对。不错，我们共产党人是要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制度，这是我们的最高理想与最终目标。但应该知道，这种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是要有高度工业化的物质基础。到了那时，国家工业化，一切用机器生产，生产力空前发展，产品非常之多，人们可以各尽所能，各取所值，再进一步做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到了这个时候，不仅工人、农民有工做、有饭吃、有衣穿、有书读、有房住，即一切人类都可以无忧无虑。我们共产党人所要建设的就是这种共产主义，不是在农业基础上的共的农业社会主义。正因为如此，所以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为时尚很长，起码也要几十年以后才有可能。今天我们共产党人所要实行的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更不是共产主义制度，而是新民主主义制度。因此，不仅今天不要害怕共产，就是将来实现共产时也不必害怕。那些害怕共产的人，未免杞人忧天，其实尽可不必。

实现劳资两利政策

再次，我要讲到劳资关系问题，我们共产党与人民政府的政策是劳资两利。这点有些资本家不相信，说共产党是代表工人的，今天的政府是工人当权，哪里会有什么劳资两利。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在今年的新民主主义社会里，工人与资本家是相互矛盾而又相互依存的两个阶级，没有工人固然资本家不能赚钱，不能存在，但没有资本家来经营管理企业，则工人亦将无工可做，而陷于失业。我们有许多同志以为生产只是依靠工人，没

有资本家，工人也可以生产，这种看法是不对的。今天的中国发展工商业生产，不仅要靠工人，而且也要靠资本家。我上面说过，他们不仅有资本，有管理才能与管理经验，而且有与各地密切的经济联系。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中，没有工人的积极生产固然不行，但没有资本家的积极性，也是建设不好的。因此，资本家需要工人，工人也需要资本家。劳资两利政策，照顾了资本家，也正是照顾了劳动者，使资本家有利可图，积极发展生产，正是使工人有工可做，这是很浅显的道理。工人对付敌人——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是斗争，是打倒，但对付自由资产阶级^{〔1〕}，则是团结与合作，而不是打倒，这个道理也是很明显的。如何实现劳资两利政策呢？这需要双方同时负责。在资方，应保障工人现有生活水准不准降低，不得压迫工人、虐待工人、无理开除工人，只有这样，工人生活有了保障，政治上平等待遇，才能保持工人生产积极性与劳动效能，以提高生产力。但在劳方，则应提高劳动热情，提高技术，节省原料，爱护机器，遵守厂规、店规、行规，以便资方顺利进行管理。因此，工厂应有厂规，店有店规，行有行规。我提议各行业由劳方资方及工会三方面举出代表组成委员会，协议一个适合于劳资双方的合理的新厂规、新店规、新行规，以便双方遵守，有利生产，有利营业。如此则资方可以放手管理，劳方也有所遵循。至于劳资之间不可免的纠纷，基本上应采取协议办法。由双方派代表协商解决。如双方协议不下，则由政府根据双方兼顾、公平合理原则，进行仲裁。在解决纠纷时，双方应本协商精神，但亦难免争执、争议、争辩。这种争辩、争议、争执，就是所谓斗争，不仅劳方可以如此，资方亦可以如此。这是合法的，双方平等的，决不是只许工人向资方斗争，而不许资方向工人斗争。当然这种斗争只限于争执、争议、争辩，以

至吵嘴，但有一个原则应该遵守，就是双方都不许打人、捆人、押人，所谓动嘴不动手，否则便是犯法，得控告政府加以制裁。

公平合理征营业税，工人职员加强团结

第四、我要讲到营业税征收问题。过去各地采取民主评议办法，小商人多，大商人少，因此大商人派得多一些，税款多少各季又不一定，使商人不好打算。这种临时过渡办法毛病甚大，今后急需加以改正。我们正拟颁布一个营业税征收条例，原则是工业税轻于商业税，必需品营业税轻于奢侈品。至于征收办法，原则是按照资金大小定等级，按照营利多少定税额，赢利多少则按各行业平均利润及商号营业总额推算，每年评定一次，按季或按月交税。此种条例正在研究中，望工商业界代表多提意见，以资参考。最好由代表中推举的几个人，组织一个营业税研究委员会，参加条例制定，使将来的营业税征取更公平更合理，一方面保证政府财源，另一方面便于商人营业。这也是根据公私兼顾的原则。

最后，讲到职工关系问题。职员是脑力劳动者，工人是体力劳动者，同是无产阶级，应该亲密团结，互相帮助，互相尊重。不能说职员是小资产阶级。只有职员没有工人不行，只有工人没有职员也不行，都重要。工人和职员本身是没有矛盾的，现在的矛盾是旧社会阶级矛盾的反映。旧社会中，职员出身不同，加上旧思想的沾染，因此一般都存在着轻视劳动，看不起工人的观点。另有些职员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学会了一套官僚主义作风，对上逢迎，对下欺压，这样就引起了工人的反感。今天职员首先要改变轻视劳动的错误观念，改变欺压工人的官僚主义作风，自觉的改造自己的思想、作风，工人则不要因为职员有些毛病而与之对立，不

要采取报复态度，而应帮助他们改造思想。否则就要妨碍团结，妨碍无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中的领导作用。

我提出的这些意见，希望各位代表研究，发动全市人民团结一致，为建设新开封、新河南、新中国而努力。

注 释

〔1〕 自由资产阶级指民族资产阶级。

湖北当前的基本任务*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湖北省全党当前的基本任务有两个，头一个任务是支援前线、支援友区、争取全国胜利；第二个任务是动员全党、动员群众、共同建设人民的新湖北，把湖北建设成为人民的天下。这两个任务是互相配合、互相联系、不可分解、不可短缺的，全党应该迎接并保证这两个任务的完成。

全国不胜利湖北也搞不好。湖南战争未结束，还在湘中、湘西一带进行。江西方面已占领赣南，向广东前进了，在两广可能有较大的战斗。今天国民党的力量是残余的了，我们最后胜利是确定的了。但肃清残余是很费劲的，而且时间不能拖长，故要用尽一切力量支援前线作战，使前线部队顺利地消灭敌人残余力量，使全国早日进入建设。现在，前方部队只占领了湘西、湘中的城市，乡村仍是人家的，武装未摆开，工作人员未下去，还住在城里，只有从我们这里送粮食。我们不送，前方就无饭吃。同时，前方的票子在贬值，也要靠我们运东西去支持。如不支持，前方无法作战，战事就不能胜利。尽一切力量支前，一直支持到两广敌人完全被消灭后，还要支持西北、云贵等地的解放。这可能要到

* 这是邓子恢在中共湖北省第一次代表会议上的讲话第一部分。

明年上半年才能完成。另外，还要支援友区。上海全国财政会议决定华中七、八、九三个月运给上海四千万斤粮、二千万斤棉花。上海六百万人口，需要大量粮食与棉花。我们湖北是全国第一个产棉区，我们不支持，上海物价就要涨。反过来就影响武汉物价的波动。我们这个时期人民币比较稳定，除我们自己努力外，如果中财委不帮助，各地的物价不稳定，我们是无法稳定的。今天我们支持上海就是支持自己，今年年底和明年上半年又要支持广东。广东是中国三大富庶区之一，那里有很多东西。但打下广东后也要背上一个大包袱，因为广东粮食不够，以前靠南洋，现在要靠湖北、湖南、江西来帮助解决。不解决粮食，广东人民就难于生活。广东需要煤八十万吨，但广东只能产煤十万吨，还差七十万吨。在广东票子也是大问题，我们这里只遇到银元，就使我们感到很大困难。广东有港币，这个敌人比银元更顽强。所以，今天支持上海，以后支持广东、广西，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湖北党应当从全国范围内看问题，如离开全国去单看湖北那是错误的。以前，各地分割能打胜仗，但今天不同了，今天各地区都已打成一片，一切问题要从全国利益出发。应办的，有困难也要办。局部服从全体，今天更明显了。全国打不好，湖北也不能建设好；全国经济不繁荣，湖北也不会繁荣。我想这是全党要首先完成的任务。

第二是建设湖北问题。把湖北建设成为名符其实的人民的湖北。现在我们还不es敢这样说，在总的方面是我们统治的，但下层是人家的，群众未发动，农民未起来，封建势力未打倒，土匪未肃清，因此，还不是彻头彻尾的人民的天下。要建设真正的人民天下，就是要保证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湖北。无论是城市，无论是乡村，都是如此。

把全国封建势力推翻、土匪消灭掉，这是共产党今天的基本任务。这个工作搞不好就不能支持前线，反而妨碍前线作战。如生产衰落、交通不便，人民政权建立不好，就不能完成支前任务。因此，必须把湖北变成人民的天下，才能很好地支持前线，支援友区，争取全国胜利。

如何把湖北改造为真正的人民的天下呢？方针已经有了，并且很明确。第一个时期接管城市；第二个时期到乡村去，搞好乡村并兼顾城市；然后第三个时期回到城市来。今天，没有革命的农村，就没有革命的城市。过去两三个月票子不稳定，主要是因为大部分乡村不是我们的，票子不能下乡。今天总的重心摆在乡村是正确的。在开封开会时^①，关于这个问题曾提过，但不明确。今天这样提出来就明确了。封建的乡村，绝不能把民主的城市搞好。农村生产不能发展、城市生产充其量只能维持现状。城市萧条就是因乡村生产没搞好。东北、华北是先农村后城市，我们是先城市后乡村，这个情况是不同的。政策也有了，剿匪反霸，发动群众。减租减息，是农民运动的应经过程，在目前情况下，可在间隙时间进行。我们既不能照旧交租交息，只有减租减息。如果出布告后群众又敢减，我们就要领导群众去减。经过这一步骤，我们就可顺利地过渡到土地改革。

方针政策靠谁来执行呢？这个问题不解决，什么好的方针，什么好的政策，都是空的。因此，目前就要搞好组织，提到阶级路线和组织路线的高度。先念同志曾说，下层机构里面成分太复杂，流氓、地痞什么都有。如果总是这样，不加改造就成大问题。这样的组织机构来执行我们的政策是凶多吉少的。这不仅是干部政策问题，而是革命靠谁的问题，是革命的基本原则问题。同志们参看联共党史第二章就能解决这个问题，这是列宁与民粹派当时

斗争的中心问题，当时联共党主张革命依靠无产阶级。在中国党中有人对这样重大的关键模糊。我们在城市是靠工人，在乡村就要依靠雇贫农，团结中农。这是我们的战略方针。同时，要尽可能地团结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开明士绅等。在这个问题上每个党员干部都不能模糊。在这个问题上马虎就会犯严重的错误。有的同志把雇、贫、中农混在一起，甚至以为依靠中农、团结雇贫，这是不对的。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前提出，在农村中应坚持“依靠雇贫、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打击地主”，这十六个字缺一不可。这是农村中的阶级路线，要很明确地认识清楚。因此，要有意识地有步骤地培养工人骨干，培养雇贫农骨干，培养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就是斗争，如敌我不分，靠谁给你斗争呢？

建军建党都要依靠这个路线。我们要很清醒，无论如何不培养流氓。农村中有的人以为共产党就是穷人的党，这是不对的。有穷人观点的同志，就会无意识地依靠流氓，因为流氓有时是很穷的。流氓可以利用，不要当作敌人去看，但我们不是依靠他们，因为他们不能执行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政策，革命是要依靠本阶级自己来解放自己的。要弄清哪个是领导者，该依靠谁的问题。这不仅是干部政策问题，而且是整个战略方针的问题。我们要培养农民干部作为领袖，在工作中要发现这样的干部来与群众联系。我们要把依靠问题弄清楚，就是依靠雇贫，团结中农，不是依靠中农。依靠忠实为人民服务的人，不是依靠口是心非的人。

我们是胜利的党，很多人投我们的票。今天介绍党员，培养干部，要慎重，要多考查。毛主席看人的方法，就是看历史，看斗争过程，看与群众联系，看经济背景，特别是看与本地的群众联系。从整个历史的全过程看人，不是割断历史来看。在农村里，首先要看他经济背景，我们同志中有个别是地主子弟，要看他是

不是长期地坚持革命斗争。中农容易动摇，做事不彻底，不干脆。工人天不怕地不怕，空着两只手，啥都没有，革命最坚决。这就是从阶级性看人。要看实际行动，言行一致。反之，则是靠不住的选择干部，选择积极分子就是从这里看，从阶级观点看，从实际行动看，从斗争的全过程看。不能局部看历史，过去肃反时，许多人冤枉死了，就是不从全历史看人的恶果。许多地方的党，因对这个问题搞不好，党就垮了，我们要以马列主义观点来培养干部，考查干部

我们要弄清楚依靠与利用不同。除依靠外，还要利用一切革命力量，使其使用到革命方面来。如果不会这样，就是很笨。哪怕这个力量是暂时的，不可靠的，甚至明天就叛变，但我们今天还是可以利用的。有利就用，无利就不用。今天我们应广泛利用旧保甲人员，如果谁不会利用或不敢利用，就是傻瓜。凡是我们没有政权的地方，要放手、大胆地利用保甲人员。自首叛变分子今天表现不坏的也可以利用，而不是依靠。利用是暂时的，今天有利就用之，明天无利就不用。要弄清在什么条件下可利用，在什么条件下不可利用。人家也利用我们，互相利用。在未有找到我们依靠的人以前，尽量利用。到了群众发动起来我们有了依靠时，就不利用了。利多害少就用，害多利少就不用。不可教育的流氓就不能利用，但他们不是敌人，要用劳动改造他们。

注 释

〔1〕 指一九四九年四月在开封举行的中原局党代表会议。

论 税 收 政 策 *

（一九四九年九月一日）

这次华中税务会议，反映了各省税收情况，讨论了税务方面许多大问题，提出了今后税收工作的任务与方针，为华中全区国家税收工作奠定了初步基础。这是一个重大的收获。

一 新民主主义国家税收的三大任务

大家都知道，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税收工作是国家财政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可能有人还不懂得，任何一个国家的税收，决不单纯只是为了财政收入，而是同时要在税收工作中达到其一定时期的经济目的与政治目的。这就是说，任何一个国家的税收，是服从于这个国家所代表的特定阶级的阶级利益，是这个阶级在其整个政治斗争中的一条战线。因此，新中国与旧中国的税收，人民政府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税收，在形式上虽有许多相同之处，但在本质上是根本不同的。新中国是代表中华民族和人民大众的利益，因之，新中国的税收就要担负起这样的任务：保护本国工商业的发展，促进农村经济的繁荣，提高

* 这是邓子恢在华中税务会议上的讲话。

全国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以保证胜利完成新民主主义建设，使中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将来并稳步地转入社会主义。旧中国是由国民党反动派所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个国家是代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它的税收是为了便利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与商品倾销，为了保护封建势力与官僚资本对全国人民进行大规模的强暴掠夺，保护四大家族之垄断居奇，投机操纵，以摧残中国的民族工商业，破坏农业生产，陷中国人民于破产、失业、饥饿、死亡的惨境。

我们革命的税收工作人员，必须懂得这个本质上的差别，必须认识自己所站的工作岗位，和其他工作岗位一样，担负着重大的光荣的任务。认为税收工作是“不重要”的工作，做这个工作是“降低了地位”的想法，是错误的。认为税收工作只是单纯为了财政收入，而不去了解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重大意义，也是错误的。

具体说来，新民主主义国家税收，有以下三方面的任务。

第一个任务，是要在税收工作中贯彻保护贸易政策，这就是实行保护关税制。依靠这个制度来保护本国工业、手工业和农业产品不再遭受帝国主义的束缚和摧残，避免帝国主义商品倾销的打击，使我们的民族经济能够得到独立自由发展，并能在物质交换的基础上对外进行平等互惠的贸易，特别是与苏联及其他新民主主义国家交易。在对外贸易方面实行保护税收政策，这是任何工业落后国家在经济上争取完全独立发展所必须实行的政策。不仅国外贸易如此，即在国内市场上，对各种不同的工业品与农产品，也须通过货物税奖励必需品的产销，限制非必需品的产销，以达到适当的调节。

第二个任务，是要在税收工作中贯彻节制资本政策。私人资

本主义，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体系中，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成份，是允许其存在与发展的。我们应该本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方针，“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四面八方政策，扶助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恢复与发展，发挥私人资本在新民主主义建设中的积极作用。但是，也正是为了更好地发挥私人资本的积极性，更完满地保护私人工商业的正当合法的经营，更有力地导使私人资本的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不能不实行节制资本政策，即不能不对私人资本的破坏性方面，对一切投机取巧行为，一切有害于国计民生的盲目经济活动，一切任其泛滥足以发展到操纵国计民生的可能前途，加以恰如其分的限制。必须知道，私人资本作为积极因素来说，对新民主主义建设，对提供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物资基础，是很重要的。而作为破坏因素来说，如果任其泛滥，不加限制，就要发展到有害于国计民生的前途。所以节制资本，这在新民主主义建设过程中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政策。而在税收政策中适当限制私人资本，则是节制资本的重要办法之一。当然，今天在华中以至全国对私人资本还不是强调整制，今天所要节制的，仅仅是取缔投机活动，取缔官僚资本残余势力的破坏活动，取缔特务奸商捣乱市场、破坏金融的活动。而对一般私人资本与正当的工商业者，今天的任务不是限制，而是大力扶助其恢复与发展，解除其思想上顾虑，推动其从事商业活动的积极性。

第三个任务，是要在税收工作中贯彻“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财政政策。国家在财政方面的任务，是要在今天支援大规模的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后进行巨大的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无论支援战争也好，或者进行建设也好，都要做到充裕国库，平衡收支，巩固币值，稳定物价，积累资本，增加外汇，保障人民生

活，促进生产的恢复与发展。而要达到这些目的，不外节流与开源二途。精简节约，是节流的主要办法，而税收就是开源的主要办法之一。虽然今天的税收在整个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很小，这是由于税收尚未整顿的缘故。我们的要求是大力整顿税收，逐渐增加税收比重，第一步达到税收与公粮收入相等，以后再求超过。目前华中因战费浩大而又十分迫切，财政上遭遇严重的困难，除了在全区开展精简节约运动，增加公粮收入，以求达到缩小赤字外，尤应大力开辟税源，增加税收来弥补目前财政上严重的赤字。因此，此次规定各地的税收任务，必须完成，只许超过，不许减少。但就这点上来说，我们也与国民党反动政府根本不同。我们的税款收入是为人民服务，“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全部收入都是为了拿来支援战争，发展生产，保障人民生活。而国民党的税收则是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服务，而且绝大部分收入都为四大家族所囊括而成为他们的私产。所以，每一个税收工作人员，特别是过去在国民党税收部门做事的人员，必须在思想上划清界限：为民族服务与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民族界限，为人民服务与为四大家族服务的阶级界限，为革命做事与为反革命做事的政治界限。

二 新民主主义国家的税收政策

我们的税收政策，是根据上述三大任务规定的，也就是为了完成上述任务，对不同性质的税目和征收对象，采取有分别有步骤的方针与办法。

在间接税（如进出口税、货物税等）方面，我们的方针和办法就是：

第一、必须促进军需民用物资的充分交流，以保障部队机关和广大人民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供应。凡有关人民生活必需品，如粮食、布匹、棉花、油、盐等物以及其他军需用品，本国不足的，采取低税或免税，奖励进口，奖励生产，重税限制出口政策。如本国有余的，则采取轻税奖励出口，重税限制进口政策。以此来调剂物资供求，稳定市场，平抑物价，不使暴涨暴跌，影响人民生活。

第二、必须保证生产资料的充分供应，以求达到促进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凡有关恢复与发展生产所必需的生产资料，如机器、原料、燃料等，本国不出产或生产不足而又必需者，采取轻税、免税，奖励生产，奖励进口，重税限制出口政策；本国有余者，则采取轻税出口，重税进口政策。某些特产，如茶叶、丝绸等，应以低税奖励出口，以换取外汇；但有关军工产品，如猪鬃及特种矿产，如钨、锰等则应由国家加以管理，以免流入帝国主义手里。

第三、必须保证社会财力物力，尽量用于恢复与发展生产，减少无益的消费。诸如奢侈品、迷信品、烟酒等物，完全属于消耗性质的物资，一般采取高税政策，以限制进口、限制生产、减少社会上的无益消费，变奢靡的旧风气为朴素的新风气。同时，吸引和积累社会资金，投入生产事业。

在直接税（如营业税、所得税、农业税、地产税等）方面，我们的方针与办法是：

第一、必须符合于发展工业生产之原则。一般的方针是：工业营业税轻于商业营业税，必需品工业营业税又轻于非必需品工业营业税，某些工业在国计民生中特别重要，还要采取免税及补助办法。只有这样，才能促使社会资金逐渐转入必需品的工业生产，并使其生产不断扩大，不断提高。

第二、必须符合扶助正当贸易之原则，使“城乡互助、内外交流”，以达到繁荣市场、平衡物价之目的。一般的方针是：商业税轻于地产税，经营必需品的商业税，应轻于经营迷信品、奢侈品的商业税。凡利于沟通城乡内外关系的正当商业经营，采取轻税政策，促使其发展；而一切操纵市场、捣乱金融、抬高物价的投机商业，则采取重税政策，或取缔其活动。有意识地保证前者的合法利润，而缩小后者的利润。此外，某些特种物品，将来还可考虑采取专卖或管理办法，以便使奸商不能利用来投机取巧，并限制消耗品的发展。至于所得税的轻重，则应以资本大小，利润多少为标准，采取合理累进的方针。

第三、农业税（即公粮、田赋）的收入是我们支援战争，保证供给，积累资本，支持货币的主要来源。在今天战争尚未结束的情况下，农业税较工业税和商业税都重，农民在今天确实负担了支援战争的最大责任。在战争结束，全国转入建设后，农民的负担必须适当减轻，以便促使农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因此，必须迅速整顿税收，增加税款收入，以弥补农业税之减收。

三 沿用旧税制与改订新税制

旧税制，就是国民党反动政府在其统治时期，就税目、税率、征收手续等所订立的制度，毫无疑问，这种旧税制必需废除，而代之以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新税制。大家必须肯定地明确地认清这一点，不要以为我们现在暂时沿用旧税制，就不需要改订新税制了。但是，同时又必须看到，改变一个税制并不是容易的事情。旧税制尽管它有许多不合理的地方，总是多年经验积累起来的東西，

而且人民按照旧税制纳税也已有多年的习惯，加之，我们在新解放地区、在缺乏充分的调查研究之前，对当地情况是不了解的，而我们每到一个新区，又不能听任税收停止，以致减少财政收入，并引起社会的不安，影响到社会生产与商业的进行。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要轻举妄动，随便废止旧税制。相反的，必须采取一切照旧逐步改进的方针，暂时沿用旧税制，并留用旧税收人员，继续进行税收工作。只是对其不合理的地方，加以适当的调整，对其既苛且杂的若干税目，加以取消。至于计税单位应由金元券^①和银元，按照当地实际情形折成实物价格，改为人民币，以便公私双方都不吃亏。总之，我们对旧税制的废除与改变，必须采取慎重态度，不可轻易改变。沿用旧税制，正是为了建立新税制作准备。对新税制的修订和试行，也要采取同样的慎重的负责的态度。必须在沿用和逐步改进旧税制的过程中，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把一切情况了解得清清楚楚，然后根据实际情况拟制草案，吸收纳税人参加意见，并在个别地区有重点有步骤地加以试行，取得经验，再根据试行结果加以修正，然后再行推广，逐渐建立较健全、较完整的新税制。总之，新税制的试行，要做到不引起纳税群众感觉不便和恐慌，不减少财政收入，而税收人员又有所适从。必须反对轻易改变旧税制，急于建立新税制的态度，又要反对沿用旧税制长期不加以合理改进，不进行调查研究，不去认真准备改行新税制的态度。这两种态度都是错误的。

四 征收制度

关于征收制度，只讲四个问题。

第一、征收手续。国民党反动政府统治时期的税收机关，在

征收手续上是既麻烦，又便于舞弊的官僚制度。越麻烦，就越好舞弊。这是国民党官僚机构的特点。我们在征收手续上必须改变这种官僚作风，必须采取利民便商政策。尤其对间接税，要简化手续。在这方面，应该提倡：一、制度要严格，手续要简单；二、人员要廉洁，纪律要严明；三、办事要认真，态度要和蔼。只有做到这些，才能真正贯彻利民便商的政策。

第二、稽查缉私工作，是税收工作的重要部分。稽查要严密，缉私要谨勤。但是，对于偷税者的处分，必须十分慎重，有理有节。要使这种处分是对于偷税者的一种政治教育，使他们明白，偷税行为损害到国家和人民利益，是违反法纪、不可允许的行为。同时，对偷税者的任何处分，必须有立场，有区别；要按照偷税者的阶级成份的不同，偷税动机的不同，累犯初犯的不同，偷税多少的不同等等，加以各种适当的不同的处分。这种处分，决不可过分，决不可单纯为了罚款。罚款是防止走私的一种手段，不是我们处分的目的。

第三、包税制^[2]。在税收干部缺乏的情形下，为控制税源，增加税收，减少征税人员，并达到负担均衡起见，一般直接税可以实行包税制。包税制做得好，公私两便；做得不好，也容易发生偏差。国民党反动政府实行包税制，就形成少数税棍所操纵，趁机渔利，流弊极大。我们实行包税制，一定要尽可能直接包给纳税人，避免中间剥削，由他们民主评议，分担税额，完成包税任务。间接税一般不采取包税制，直接税中如烟酒税、营业税、所得税、屠宰税、印花税、娱乐税等，都可试行包税制办法。

第四、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和群众商量，这是我们党在工作方法、工作作风上的基本路线，税收工作也要如此。不要认为税收工作光靠税务机关和税务人员就可以做好，必须与当地党

政及其他有关机关取得密切配合，必须联系和团结广大群众来帮助进行。特别是了解情况、进行缉私，没有群众帮助，就休想做出任何成绩来。为了鼓励税收人员、缉私人员以及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可以采取提奖制度，将罚款中提出一部分奖给有功人员和有功群众。

五 税收机构的建立

华中当前是一个大发展局面，但干部缺乏，机构不健全，工作赶不上形势发展。这是我们各种工作都遇到的困难，税收工作也是如此。但是，这个困难是可以而且应该克服的。税收任务很重大，我们就要在干部缺乏、机构不健全的情况下，努力工作，建立机构，克服困难，完成任务。因此首先要解决干部问题。我的意见：第一、要使现有干部安心做税收工作。要认识自己所担负的政治、经济、财政上的重大任务，要克服不愿做税收工作，认为做税收工作就是“党不重视我”的错误思想。还要很好的研究政策，学习业务，增强工作效能，提高自己政策思想与工作技术的水平，切不可骄傲自满，自以为是。第二、要吸收新干部，培养新干部。除税务总局开办训练班外，各省还可以自办训练班。训练的对象首先是知识分子，他们纯洁、热情，容易接受新事物；其次是店员及银行职员，他们成份好，又有专业知识；再次是荣誉军人，他们受过战场上的考验，对革命忠诚，可以做骨干。这几种人，自然也各有弱点，必须加强对他们的教育，帮助他们进步。第三、要使用旧人员，改造旧人员。这是一批很大的力量。他们熟悉业务，了解情况，只是染有旧社会官僚机构中一般的恶习和落后的思想。因此，需要在生活上照顾他们（原职原薪），在业务

方面尊重他们（向他们学习），采纳他们的意见，在政治上则加强对他们的教育，帮助他们改造思想，力求进步，以此发挥他们在工作上的积极性。对于少数屡教不改，仍执迷不悟，进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解放后尚犯贪污行为，且深为群众痛恨的贪污分子，以及一无所长，过去凭借权势窜进来只拿薪水不做事的冗杂分子，可以分别加以洗刷和遣散。

其次，要建立组织制度。按照行政组织，从税务总局、省局、分局、县局到税务所，这是一个垂直系统，在业务上（税目、税率、会计、票照、报解等）均须按级受税务系统的垂直领导。但是，在政策上工作上生活上则须受同级党政机关的领导和监督。这是双重的领导关系，既要按照垂直系统向上级负责，又要按照政治领导关系向同级的党政负责。对双方都不能闹独立性。

最后，要树立新作风。必须在所有税收人员中提倡：一、认真负责；二、廉洁奉公；三、利民便商；四、诚恳和蔼；五、研究政策；六、遵守纪律。这六项，可以作为税收人员的守则。做到这六项，就可以消除国民党税务机关遗留下来的极为恶劣的坏作风、坏习惯，而养成真正能为人民服务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税务人员的新作风、新风气。在这方面，解放区的老干部要首先做模范，带领新干部（他们是新鲜的血液），改造旧人员。

希望大家开完会回去，努力工作，完成任务！

注 释

〔1〕 金元券是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起国民党政府发行的一种纸币。

〔2〕 包税制即按照企业生产、营业规模确定一固定的纳税额，生产、营业超额不增加税额，未达到也不减少税额。

论 粮 食 工 作*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三日)

我今天讲四个问题。

一 粮食工作的三大任务

我们粮食局的同志担负什么任务呢？我想应该担负起三大任务：

第一个任务，是保障供给，即是保证人民解放军、人民政府与党群机关的粮食供应。在今天，这是粮食局的主要任务，也是最光荣最繁重的任务。“无粮不聚兵”，“大军未动粮草先行”，保证前方粮食源源供应，是争取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大家知道，历来我们的战争供应，不仅吃的粮食靠征收公粮，就是其他被服、药费等经费，也大部靠公粮变卖来维持。就目前华中来说，我们的财政收入，差不多百分之八十靠公粮、田赋之征收。其他税收，在目前财政上只占很小的比重（当然在税收整顿之后，这种畸形现象可以逐渐改变）。因此，粮食工作便成为目前财政上第一等重要的工作。如果粮食工作做得不好，或者征收不够，或

* 这是邓子恢在华中第一次粮食会议上的讲话。

者保管不好，其结果便要影响军队作战，影响整个供给计划与财政计划的完成。我们有些同志往往轻粮重财，忽视粮食工作，这是不从现实出发，不了解粮食征收在财政、供给上占如此重要位置的缘故。

第二个任务，是平衡粮价，即是要使这个地方与那个地方，使今年与明年的粮价不致悬殊太大。比如前一个时期武汉粮价太高，使劳动人民生活上受到很大威胁，如不加以适当调剂，其结果便要影响社会生产。但今天武汉粮价又太低，江西、湖南则更低。这种情况如不能改变，其结果与前此之粮价太高，要发生同样严重的影响。因为此时，出卖粮食者绝大部分是贫农，及一部分中农，他们今天低价卖掉了粮食，到了明年青黄不接之时，必然以几倍于今天的高价买进粮食。今天的粮价过低，打击了贫农及部分中农，明年的粮价过高，又打击了贫农和部分中农，而贫农和部分中农是今天农村的主要生产者，贫农、中农的贫穷破产，其结果是减低了农村生产力，促成了城市萧条。这对整个社会经济是极其不利的。过去国民党反动政府对此种现象不仅不加以调节，反而让官僚资本与地主、富农乘此机会，囤积居奇，投机操纵，致更加促成物价暴涨暴落。今天人民政府必须用大力来解决这种问题，必须用各种办法使粮价不致悬殊太大，而达到各个时期、各个地区的粮价比较均衡。这不仅是经济上的极端重要的措施，而且也是财政上极其重要的工作。

怎样才能达到平衡粮价呢？这不是像国民党那种限价政策所能收效，而主要靠政府有大批粮食在手。不仅自己食粮不要向市场采购，而且当粮价上涨时，还能有大批粮食发放薪资及廉价抛售。在粮价跌落时，政府则有以适当的价格大量收购，以提高粮价。如此才能达到平衡粮价的目的。当然，这种工作要商业

部门与贸易公司来做。但我们粮食部门，如果今天不把公粮征收起来，不征够一定数量，除了保证部队、机关食粮之需，还能拿出大量粮食供给贸易公司去调节市场，那么贸易公司又能有多大力量来完成这个任务呢？因此，保证完成公粮的征收任务与妥善保管不使其产生任何可能发生的损失，一方面是为了保证供给，另一方面则是为平衡粮价准备了唯一重要的物质条件。

第三个任务，是稳定金融。大家知道，我们的人民币有各种力量来支持，但主要的物质力量则是粮食。过去八年抗日战争是如此，三年解放战争也是如此，今天仍是如此。六七月间武汉币值波动很大，固然有各种原因，但当时我们没有足够粮食支持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后来铁路通车，我们有大批粮食运来支持人民币，也是造成近来币值稳定的因素之一。今天我们如把公粮征收得好，保管得好，使公家有大批粮食在手，可以减少我们的财政赤字，可以随时拿来支持货币，那么，我们的人民币便可以不致贬值。因此，稳定金融就成为粮食部门的光荣任务之一。

保证供给，平衡粮价，稳定金融，这三大任务是互相结合，互相联系，而又互为因果，缺一不可的。这是粮食部门同志们的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希望参加此次会议的同志清楚认识这个任务，勇敢担当这个任务。

二 粮食的征收工作

首先，要认识公粮的征收是粮食工作的主要环节。我上面所说的三大任务的完成，只有在粮食征收到一定数量之后才可能，否则一切都是空话。今天华中绝大部分还是新区，我们所有的物资与税收，比之老区要少得多，但兵额却比任何一个解放区要大，而

且战争尚在进行，战费殊为浩大。虽然有其他解放区的支持与援助，但并不能因此完全解决我们财政经济的困难。因此，在华中解决今后一年财政经济的困难，当然要靠各方面努力，但其中最重要的关键，是要各省、县乘此秋收季节，把公粮田赋一次收足（此外不得再有征借）。必须十足完成华中财委会所分配给各省的征收任务。这是一个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任务，各地必须争取完成，不许减少。当然，这个任务在新区人民负担来说，是相当重的。但应该知道，我们取之于民，是为了用之于民。我们要征足粮食才能达到保证供给、平衡粮价、稳定金融的目的，才能争取战争胜利，保障人民利益。如果我们不能完成此征收任务，那么，我们在财政经济上一切将处于被动，将来人民的损失还要更大。而且，我们今年的征粮数量，比之老区人民负担还是很轻的，因为我们公粮田赋两者的总征收量，平均只占人民全年实际收获量的百分之十六至十七，而老区则在百分之二十以上。如把我们的粮食征收数与国民党的征实征购征借及各种繁杂的捐派相比较，则更是轻得多。因此，片面的群众观点，只强调群众负担重，而不去实际核算比较，不积极去完成的态度，显然是错误的。有些同志说，我这里是新区，群众没有发动，因此无法完成。这种说法也是不对的。我们今天所分配的数目正是估计到新区群众还没有发动，主要依靠行政力量这种条件来决定的。今年夏征在湖南、湖北许多地区的征粮成绩，已经证明了完成这个数目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其次，在粮食征收方法上，目前只能采取按级分配制度。即是根据各地的土地多少、产量多少、人口多少、年成丰歉等情形，将各省所担负的征粮任务按级分配下去，一直分配到乡与村为止。本来人民政府在公粮征收是按照每人每年实际收获量，规定免征

点与起征点，采取按级累进的税制，这是最公平合理的农业税制。但在目前的新区，群众未发动，未实行土地呈报，各地区土地、人口、产量的实际数目无法调查，而国民党的田赋册与人口册又多不可靠。在许多地方连这种田赋册也没有。因此，要按照老区统一规定一个按每人实际收获量分级累进税制，在目前显然是不可能的。而目前公粮征收又刻不容缓。在这种情况下，最切实的应急办法，只能采取按级分配办法当然这种制度是容易出毛病的，如某些地区畸轻畸重等。这就要求各级政府在分配征粮任务时，应尽可能进行调查研究，并多多倾听与采纳下级干部与各界人民的意见，力求分配比较均平，减少轻重不平的毛病。在征收中或征收后，如发现畸轻畸重情形，应及时加以调整或改变，以求达到较公平较合理地步。但应该知道，要完全公平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应向干部及人民解释，在县与县、区与区、村与村之间，不要过于斤斤计较，大家应有竞赛精神，完成任务，以争取胜利与经济稳定。

再次，在一个村里如何征收？这是征粮工作好坏、政策正确与否最重要的关键。只把任务分配下去了，如果村里征收不起来，或者出了别的乱子，那还是要失败的。根据各地经验，村里公粮征收，应根据当地具体情况灵活运用。比如群众有基础的地方，可以按地亩或者按产量分级累进征收。群众无基础的地方，则只能采取比较简单的办法，如有些地方先把免征户除开，再把大户应征数确定，其他应征户则照此比例分派。又有些地方则以一部由全村田亩平均摊派，另一部则由村中富户摊派。

这些办法，都可以研究采用。但无论采取何种办法，必须经过行政分配（在民主村政府未建立的地方则利用保甲，但需加以控制和监督）、民主评议、帐目公开与上级检查相结合，这四者缺

一不可。而召开农民代表会议，则成为进行民主评议、分配公粮、监督保甲最适当的合法机关。通过行政召开农民代表会议，来进行民主评议，而不是把行政放在一旁；由农代会进行民主评议，不是听从少数人私自摊派；分配公粮应出榜公布，帐目公开，而不许秘密舞弊。此外，再加以上级派人检查，分配不公或营私舞弊者随时加以调整或处分。如此做法，公粮任务可以完成，负担也可以得到比较公平合理，群众也可以初步发动。夏征中湖北沔阳地委的综合报道（当然各地还有许多好例子）中，便有这些例子可供各地参考。此外，无论采取何种办法，必须遵守这样几个原则：

第一、田多多出，田少少出，无田不出；第二、贫农负担不得超过其收获量的百分之六，中农不得超过百分之十五，富农不得超过百分之二十五，地主不得超过百分之四十，最多不得超过百分之五十；第三、免征户不得少于总户口百分之二十，也不得多于百分之四十。

三 粮食的保管与调运

公粮征收完成之后，保管与调运，便成为粮食部门的主要工作。这一工作比之征收，在某种程度上说来，还更为麻烦更为繁杂，时间更为长久。关于这个工作，一般应注意下列几点：

首先，应在征收时就注意到缴纳公粮之晒干、风净，不准掺沙、掺土、掺水、掺粗糠。如有这种情形，应说服群众，重新晒干、风净，以保公粮不致遭受霉坏或其他损失。

其次，要解决仓库问题。可仿照河南小仓库、大仓库办法，即第一步把公粮集中于小仓库，第二步再转到大仓库。所谓小仓库，

即在一个村或几个村设立小仓库，以收集周围群众送来的公粮。这种小仓库有几种好处：（一）范围小，路程近，便于群众交纳公粮。（二）便于检查翻仓，减少潮湿、虫蚀、鼠吃、火灾等损失。

（三）仓库易找。一般可就地借用公仓及地主仓库，或就祠堂庙宇等加以修理应用，不必大建筑、大修理。所谓大仓库，是指公粮集中到小仓库以后，再按粮食不同用途，分别转到指定的大仓库储藏。我们的粮食不外三种用途：一是就地吃，就地卖，以调剂当地粮价与币值。这种粮食可以县为单位，由县粮食局根据具体需要决定大仓库之布置。其中大部分仍可保存于原来小仓库，需要时前往提用。二是供应主力部队及高级机关（如中央局一级、省级、专署一级）吃用。这种粮食可由省或专署粮食局按具体需要，在城市或驻军地点设置大仓库，分期将粮食集中，必要时加工制造，变成米面，以供吃用。三是出口或转运外省。此种粮食由华中及省粮食总局协同贸易公司及支前机关，根据出口计划及调剂计划，在沿江、沿河、沿铁路、公路两侧，选择交通方便、安全有保障的适当地点，布置大仓库，集中管理，分别转运。这种仓库可使用当地原有之公仓，部分借用私人仓库，必要时得将适当厂屋改造修理，原则上以便于集中储粮，不致损失为主。必要的修理费与建筑费是应该支付的。

第三，关于粮食运输。除群众直接送公粮到小仓库时，在一定限度内可动员群众无偿义运外（一般不超过三十里，特殊老区以不超过五十里为度），其余所有粮食转运无论是运售出口或供应军食，都应坚决实行给价包运制度，即是按照运粮之数量与里程计算运输费。此项运费，由各省府按各地具体情形分别规定。船运、车运及肩挑价格，一般原则应高于当地市价百分之十，最高不超过百分之二十为度。在这点上，绝不可任意增加群众义运里

程，企图减少公家运输费。只打小算盘，结果要在政治上、经济上遭受更大的损失。至于运费之支付，则应由取粮机关负责，向指定机关报销，以重责任，而免浪费。在粮食转运中的包装问题，应从实际出发，就地取材，有什么用什么，如麻袋、布袋、小布袋、草包，以及散仓等。应视当地具体情况来决定。

四 粮食机构之建立与健全问题

粮食机构之建立与健全，这是当前面临着的现实问题。粮食工作如此重要，任务如此繁重，但粮食机构却如此薄弱，组织机构与工作任务如此不相称，这对粮食工作是一个最大的困难。各省局同志回去后，必须要求省委、省府大力协助，限期建立各级粮食机构，一直建立到区为止。要有适当的组织机构，才能担当这种繁重的工作任务，否则一切都会徒托空言。结果，将完成不了任务，即使征收起来，也无法很好保管转运，无法建立收支制度。这是一个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再不能等闲视之。如何充实粮食管理机构，这便要配备必要的领导骨干，大批培养新干部，从下而上提拔新干部，并与大胆使用旧人才改造旧人才相结合，这三者是不可分离的。

论国家贸易部门的任务*

(一九四九年九月)

一 国家贸易部门的三大任务

国家贸易部门是新民主主义建设的重要部门，它应该担负什么任务呢？过去有许多同志都把它当作私人商店一样看待，以为只是一个赚钱的任务，这是错误的。我想我们的贸易部门，它的总目标应该同样是为人民服务。因此，应该担负起下列三个任务：

第一个任务是平衡物价，稳定金融。这在目前是特别重要的。如果物价不平衡，金融不稳定，其结果就要影响到工人农民一切劳动人民与机关部队的生活，影响到工业、农业、手工业的生产与正当商业之经营，影响到国家财政。譬如六七月间的粮价上涨，打击了谁呢？无疑的受打击的是工人、职员、公教人员、贫民、小贩与农村中粮不够吃的贫农和一部分中农。最近新粮上市，粮价惨跌，这又打击了谁呢？当然受打击的又是贫农及一部分中农。因为在这个时候出售粮食的决不是地主、富农，而是贫农及一部分中农。现在粮食价跌落是否对工人、贫民等有好处呢？就眼前说

* 这是邓子恢在华中首次工商贸易会议上的讲话。

可以吃便宜粮是有一些好处的。但应该知道，这些人是没有多大本钱来屯积粮食的，他们只能现买现吃。今年粮价越低，则明年春夏间粮价也就涨得越高，因为大部分贫农把所有余粮都卖光了，明年购粮者就越多。这就必然形成求过于供而促成粮价暴涨，到了那个时候岂不是工人、农民又要吃大亏吗？又如近来新棉上市，沙市棉价每斤只卖四百五十元^①，而汉口一尺布却要四百多元，一斗米也只八九百元，差不多形成斗米尺布、尺布斤棉的比价。这就是工业品价高，农产品价低所形成不等价交换的剪刀差额。在这剪刀差额下谁吃亏呢？无疑的吃亏仍是农民。他们支付很多劳动所生产的农产品，只换回很少劳动所生产的工业品。这种农民被剥削的结果，就要降低农民生产力与购买力，倒回来又要造成工业停滞、商业萧条与工人失业，最后影响到财政支出增加、税收减少，财政困难无法克服。同时，由于这种物价涨落不定，币值波动不稳的结果，又将更大的刺激市场游资转入囤积居奇、投机取巧以图厚利，而妨碍资金投入工业生产与正当商业方面。这对恢复与发展工业生产，是极端有害的。大家了解了这种物价不平衡、金融不稳定的害处，就可以明白国营贸易部门的头一个任务，应该保证物价之大体平衡与金融之大体稳定。这在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中，将起着头等重大的作用。所谓平衡物价，当然应从两方面来做，一方面要使工业品与农产品价格之间的剪刀差额尽量缩小，另一方面就要使同一宗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价格，在一年四季之间不致过于高低悬殊。如果贸易部门能用各种办法达到这个目的，使物价大体平衡，那么货币价格，自然也就可以随着大体稳定下来。这就是国家贸易部门第一个应做的任务。

第二个任务是保证供给，扶助生产。所谓保证供给，首先是保证人民解放军与革命机关必须的生活资料（如布棉等），作战器

材（如四大器材^②）与办公用品（如纸张笔墨等）的供应。其次是保证工人、职员、公教人员、城市贫民及广大农民必须的生活资料（如粮、油、盐、煤、布等）的供应。所谓扶助生产，首先是保证城市工业原料、燃料（如棉花、棉纱、小麦、油料、烟叶、煤炭、汽油等）之正常供应与成品之顺畅推销。其次是保证大宗农产品（如棉、粮、烟、茶、花生等）外销与农业器具（如农具等）之廉价供应。贸易部门在这方面如能有计划的调节供求，以利产销，则对战争胜利与发展生产要起莫大之功效。

第三个任务是要在完成上述两个基本任务的条件之下，从中赚一些钱，以增加财政收入，积累资金。但是，决不能撇开头两个任务不管，而专门去追逐利润，致物价波动，币值不稳，供应不上，生产降低。这样虽然在财政数字上增加一些收入，而在整个经济上要遭受极大损失。这种做法是得不偿失的。但也不能完全不担负财政任务，明明可以赚一些钱的也不打算。这两种偏向都要克服与防止。

这就是国家贸易部门的三大任务。

二 国家贸易部门的工作布置

如何完成这三大任务，这就需要抓住重点，有系统有计划的来布置我们的工作。这次上海会议陈云同志^③所作的部署就是我们的好榜样。上海会议有两种重点布置：一是货物重点，一是地区重点。

什么叫做货物重点？上海会议着重于掌握花、纱、布、盐、粮、煤、五金进口与土货出口几个专业布置，定出进出口与采购运销计划。的确，如果我们能把这几种主要货物调节供求，顺畅产销，

便可以基本上完成上述三大任务。由此告诉贸易部门同志，我们做生意不在多，而要抓住对人民生活与工农业生产有重要关系的几种主要物品，集中力量，把它搞好，其他无关重要的东西，即便搞不好，也不致影响国计民生。特别在今天，我之主观客观条件都不足的情况下，更应本此精神进行。不要什么生意都想做，结果一样都未做好，或者只做了次要的，而丢掉主要的，这就要影响基本任务的完成。

什么叫做地区重点？这次上海会议大部分贸易计划，是以上海为中心来定的，形式上好像只照顾上海一地，很少照顾其他地方，而实际上这种布置正是照顾了全局。因为上海是全国工商业中心，只要上海物价大体平稳，金融大体稳定，生产大体恢复，则全国各地便会跟着获得同样的良好结果。否则如果上海搞不好，只在各地各自为政，那么尽管你用了九牛二虎之力，亦将无补于大局。因为乡村服从城市，中小城市服从于大城市，这是经济上一般规律。交通畅顺、各地联成一片的今天，与过去被敌人分割的状况已起了基本变化。当然这不是说上海物价平稳，各地便可以让其自流，不必努力了。在某种供求情况下，就是上海物价平稳，别的地方也会引起物价波动，如果这种波动太大，波动地区太多了，同样也会倒回去影响上海。因此，这次上海会议所规定的各种贸易计划，我们必须坚决完成。我们这次会议就是讨论如何完成这种计划的办法。但同时我们华中地区，也应围绕着武汉这个中心来布置我们的贸易工作，制定我们的贸易计划。各省也应有自己的重点布置（如湖北之沙市、襄樊、黄冈，河南之郑州、开封、洛阳、许昌、漯河、信阳，江西之南昌、九江、吉安、赣州、抚州，湖南之长沙、常德、衡阳、宝庆等），根据整个计划来布置自己的工作与计划。今天一定要打破过去在被敌人分割情况下各

自为政的老观点、老办法，一定要在整个贸易方针与贸易计划之下，分头进行工作，完成任务。否则，要犯原则上的错误。

三 依靠什么力量来完成三大任务

任务定了，计划有了，现在要再研究的就是依靠什么力量来执行这个计划？就是说靠什么力量来把每一个时期所定的进口计划、出口计划、采购计划与运销计划实现呢？我想应该依靠三种力量：

第一种力量是国营贸易公司与公营商店。它与国营工厂、国家银行及国营轮船、火车等，同是新民主主义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份它是执行贸易计划以达到平衡物价、稳定金融、保证供给、扶助生产的主要力量，是人民国家与私人商业资本投机行为进行斗争的重要武器。没有普遍的健全的国家贸易机构，要实现贸易计划，完成贸易是不可能的。没有细密分工，没有自上而下的有系统的专业公司各司其事，分头进行贸易工作，要实现贸易计划也是不可能的。因此，这次会议必须讨论如何建立专业公司，如何建立各地的采购网、销售网与进出口机构；各专业公司如何分工，华中贸易机构与地方贸易机构如何分工，又如何配合，也要详细讨论，明确规定。而更重要的是要讨论如何去网罗人才，调集干部，充实国家贸易机构。这是一种全新的工作，过去虽有些公营商店，但是规模太小，业务简单，干部太弱太少，经营方法也与现在不同。现在要一下子就建立这样遍布各地的庞大机构，担负这样繁重的任务，确是极大的困难。但不这样做又不行，慢慢来也不行。因为这个工作太重要，任务太迫切，不容许我们慢慢来。那么如何来克服人才困难，我想只有三个出路。

（一）要有领导骨干。这就要求各级党委（省委、地委、县委）与各级人民政府（省府、专署、县府）从极端困难中忍痛抽出一批对人民事业忠诚，有一般经济常识，而又能大体掌握党的政策的干部，来作为各地专业公司与公营商店的领导骨干。这是非常需要的，各地必须下决心，投下这批本钱，我们人民国家的贸易工作，才能逐渐建立起来，才能逐渐达到稳定经济与发展经济的目的。如果这方面不下本钱，那么将来物价波动，经济长期不能稳定，使各方面工作受影响，我们就会长期陷于被动的极困难状态

（二）要大量培养新干部。吸收城市店员、知识分子及一般职员，加以训练后派到贸易部门中去。培养新的骨干成为新的后备。

（三）要大胆使用旧人员。这在目前是特别重要的。要知道我们的老骨干不多，新培养的干部也不易熟悉贸易工作。目前最重要的就是大胆使用原来在该企业工作的旧人员。这些人情况熟悉，业务熟悉，经验丰富，对各地有联系，正是我们建立贸易工作的重要依靠。当然这些旧人员中有许多人带有旧社会作风，政治水平不高。因此，我们有许多老干部对这些人总是七嫌八怕，不愿意用这些人，用了之后也是半理不理，不重视他们，不放手给他们工作，不肯与他们商量工作，不愿向他们学习；而以老革命自居，总认为人家是落后分子，这种观点是不对的。要知道这些人虽带有旧社会不良作风，政治水平不高，但一般来说，它们都属于靠薪资吃饭的无产阶级，不管他们出身如何。而且他们在业务上比我们熟练，经验上比我们丰富，我们今天正要依靠这些人来建立起人民国家的贸易工作。在这方面我们应虚心向他们学习，不应自以为是，骄傲自满。尽管我们政治水平比他们高，但在商业工作上，单靠政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我们正需要以高度的政治

自觉来团结他们，提高他们的积极性，同时自己加紧学习，把商业工作做好，这种政治才是我们所需要的。如果只摆政治架子，摆老资格，不善于团结他们，不善于提高他们的积极性，自己又不肯学习，不长进，以致商业工作搞不好，这种政治又有什么用呢？因此，今天我们要建立贸易系统，要发展商业工作，除了配备老骨干，培养新干部外，必须着重于大胆使用旧人员。

如何才能团结他们，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呢？这就需要生活上照顾他，业务上尊重他，政治上领导他，这三者是缺一不可的。所谓生活上照顾他，主要是要贯彻原职原薪的方针，使他们生活无忧，这是最重要一项。我们有不少同志对他们生活漠不关心，任意把人家薪资降低，看人家薪水高一些，就心里不舒服，甚至把拿薪资的人看做落后分子，说人家雇佣观念，这种态度给这些人很难堪。因此，我主张今后凡是企业部门一律实行薪金制度，连老干部在内也改为薪金制，以免给人以难堪。所谓业务上尊重他，就是遇事先与他商量，倾听与采取他们意见，并在工作中向他们学习。这点切不可自以为是，主观主义，致把事情弄坏。在这方面自己谦虚一点，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并不会降低自己的威信；相反地只有如此，才更便于争取他们团结他们。所谓政治上领导他，就是要在政治上帮助他们进步，使他们了解目前形势，了解革命道理，确立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帮助他们改变旧思想旧作风，这也是很重要的。如果只在生活上照顾他，业务上尊重他，而不能从政治上帮助他们进步，那要团结他们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也是不容易的。在这方面老同志应多负责任。但也应该知道，要使他们政治上进步，只有在生活上照顾他们，业务上尊重他们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同时帮助他们进步，是一个长期教育过程，不可要求过高，操之过急。否则不仅达不到目的，而

且会适得其反。

除了建立国营贸易公司与公营商店外，要把商业工作做好，第二种力量，就要发展合作社组织。在城市主要是工人、机关、学校的消费合作与手工业者的供销合作社或生产合作社；在农村则应组织一揽子的农民合作社，包括消费合作、信贷合作与供销合作三种性质在内。这种合作社是劳动人民集体经营、避免中间剥削的一种经济组织，是属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这种合作社是国营贸易公司、国家银行与公营商店的推销网、采购网与借贷网，国营贸易公司通过这些合作社来向农民收购农产品，推销工业品，向工人及一切劳动人民推销生活必需品，双方避免中间剥削。这正是国营贸易公司的基层细胞，是它的左右手。只有把合作社组织普遍推广起来，国营贸易公司才能更有效地来平衡物价，稳定金融，也才能更有效的来保证供给，扶助生产。因此，国营贸易公司应把推广合作社，扶助合作社，当作自己的重要任务。

国家贸易部门完成自己任务的第三种力量，是要与私人资本合作。这是国家贸易部门今天的工作重心所在。要知道今天我们的国营贸易公司力量还很小，无论资金、机构、经验、社会联系各方面，我们都处于劣势地位，而合作社又一下子不可能组织好。在这种条件下，国营贸易公司要完成这样巨大的任务，完成这样繁重的计划，单靠自己的力量是不能胜任的。因此，必须与私人资本合作，必须善于团结他们，推动他们的积极性，使他们在国营贸易部门领导下，共同来恢复商业完成贸易任务。而要达到这一点，必须保证他们的适当利润，因此，对他们必须采取合作政策，而不是排除政策；必须采取分利政策，而不是专利政策；必须采取团结政策，而不是打击政策。在交朋友上，需要与他们来

往，建立感情，互相研究，互相切磋，但又不要同流合污。在组织上，须与他们共同组织工商联合会，并从中领导他们。

建立国营贸易，发展合作社，与私人资本合作来实现贸易计划，完成三大任务，这就是我对于国家贸易工作所提供的意见。

注 释

- 〔1〕指一九四八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旧人民币。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发行新人民币代替旧人民币，新人民币一元等于旧人民币一万元。
- 〔2〕作战四大器材指燃料、被服、粮食、运输工具。
- 〔3〕一九四九年七月，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简称中财部）与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合并，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下，设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任主任。一九四九年七月，陈云到达上海，进行调查研究，八月初，在上海召开了有五个大区领导干部参加的财经工作会议，研究各大区的财政收支、物资调拨和货币发行问题，寻求支援战争与稳定沪汉经济的办法。

论华中城市建设新方针*

(一九四九年十月三十一日)

华中城市建设方针是一个重大问题，必须根据二中全会的基本路线与华中的实际情况结合，必须经过调查研究与慎重考虑，才能够作出关于这个方针的决定，否则就要犯严重的政治错误。

一 华中城市当前的经济情况

根据一般的了解，华中各地城市经济情况，有以下五个特点：

第一特点，是商业比重大大超过工业比重。除个别城镇，如株州、萍乡等工业地区外，其他一般城市，多为商业城市。如郑州、开封、长沙、衡阳、湘潭、南昌、九江、宜昌、沙市等，虽有一些现代工业，但工业在整个经济中所占比重太小。即以最大的武汉而论，据江汉关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进出口统计，在此三年中，每年出口货以农产品为大宗。仅棉花、烟叶、小麦、大米、黄豆、芝麻、桐油、猪鬃、茶叶、鸡鸭蛋等物品，就占出口总数百分之八十以上，而唯一的工业品面粉，则只占百分之八至百分之十二。进口货则大部分为工业品，其中仅汽油、煤油、纸

* 这是邓子恢在中共武汉市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张、乳粉等，竟占总数百分之八十五以上，金属品、化工原料等，则不到总数百分之十。这个统计充分说明，武汉基本上是一个商业城市。武汉本身不是农产品、工业原料的销纳市场，而是农产品转口市场。同时，武汉也不是本地工业品的制造地，而是外来（主要是外国）工业品的集散地。武汉的这种情况，正是典型的半殖民地经济的反映。在经济上依赖外国帝国主义，把农产品输往外国，再自外国输入工业品，这就是半殖民地经济的特点。武汉在今天，对帝国主义的依赖关系虽然被割断了，但它暂时还是一个商业城市这个特点，仍没有改变。武汉如此，其他城市更可想而知。

第二个特点，是私营经济大大超过公营经济。在工业方面，除炼钢外，诸如纺织、面粉、卷烟、皮革、榨油、化学等企业，绝大部分是私营。交通方面，除铁路、邮电外，航运大部分是私营。即以武汉航运为例，公营吨数不及百分之十，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私营。金融方面，除人民币发行权操在国家银行手中而外，无论资金、业务和分支行数目，私人银行与钱庄都超过公营银行。商业方面更不用说，除钨、锑等特种矿产及桐油、猪鬃等军用物资由国家统制经营出口外，其余各种产品与工业品的运销，绝大部分依靠私营。这就是说，无论工业、商业、金融、交通，私营经济力量都大大超过公营经济力量。不仅资本如此，即营业范围、社会联系与经营能力（包括干部才能和经营经验）各方面，都是公营经济暂时处于劣势地位，而私营经济则处于绝对优势。尤其在社会联系方面，公营经济比私营经济更是弱得多。合作社是公营经济的社会基础，但是合作社至今还没有建立起来。当然，我们不能忽视，公营经济虽然比重很小，但作用却很大。因为公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是新民主主义经济中的领导成分。就

在居于劣势的今天，国营经济仍然起了而且还要起着稳定金融、调剂市场、平衡物价、打击投机的巨大作用。

第三个特点，是今天私营经济虽然居于优势，但私人资本的积极性还没有发挥起来，工商业资本家的思想顾虑还没有完全消除，有些人还依然抱着消极观望态度。几个月来，经过我们各种事实表现和宣传解释，特别是各地相继召开各界代表会议以后，工商业资本家的顾虑是减少了，但还没有完全消除。不仅逃避到重庆、广州^{〔1〕}、香港等地的资金没有运回来，就是现在手头上拥有资金，也还没有完全用出来。这些都是事实。那么，他们有些什么顾虑呢？在政策方面，他们还不完全相信我们的保护工商业政策，他们还怕我们“只说不做”，怕贸易自由没有保障，怕工资加得太重，怕工人斗争，怕雇佣不自由，怕税收没有底，怕手续麻烦，怕支前差事影响私人运输，怕农村的反霸斗争牵连到他们身上，怕国营企业把他们“并吞”、“排挤”。此外，还怕将来共产，怕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不如我们所说那样长久。在国际形势方面，他们对美帝国主义还个别存在着畏惧心理和幻想。工商业资本家的这些疑虑，一方面是由于他们还不完全了解我们党关于新民主主义建设的全部政策，另一方面也由于我们政权机关与企业部门在实际行动上未能完全上下一致。比如，有些地方发生了同税重征以至额外加税的现象，有些地方则仍然滥用过去抗战时期统制出口的贸易政策，限制了私人采购自由；我们的支前机构常常不必要的控制船只，以至影响商运；这样就便利于特务造谣煽惑，增加了他们的轻信与疑虑。正因为如此，所以他们的积极性还不高，还不愿把资本拿出来，放心大胆做生意。

第四个特点，是城乡交易还没有恢复正常状态。因而形成农产品滞销、跌价，工业品却因来源不畅而涨价。如前一时期，湖

北之棉花、粮食，河南之茶叶等农产品，大跌特跌，而工业品如布匹、棉纱、食盐等，节节上涨。以至前一时期几乎要六担大米才换一疋布，而一疋布却可以买到一担半棉花。当时湖北之麻城，盐价竟涨到千余元一斤，真是所谓斤盐斗米。这种农产品与工业品之间不等价交换，极大的剪刀差额，就使农村生产力降低，农民购买力萎缩，农业生产不能维持原有水平。倒过来又造成城市经济萧条，造成城市生产恢复与发展的许多困难。大家知道，农村是工业的主要市场，农业是工业的基础。用自己的剩余生产物来换取布、盐等日常必需品，这是农民的最广大最普遍最迫切的利益。城乡交易的不正常，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形成，就在实际上影响到农民的日常生活，损害到农民的切身利益。此种情况如不加以改变，长此下去，就会在政治上使工农联盟丧失其物质基础，妨碍我们团结全体农民阶级，并造成发动农民进行社会改革的巨大困难。

第五个特点，是城市经济萧条与严重的失业现象。武汉现在是旺月，市场虽然繁荣一些，但据说还不如去年的今天。明年春天淡月来了，萧条现象可能还会严重一些。现在陷于失业和半失业状态的，单就武汉一地，工人就有十万左右。此外，还有大量的贫民、苦力、知识分子和公教人员失业。固然，这种严重的失业现象，是国民党匪帮长期反动统治遗留下来的恶果，但是我们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不能不负起责任来解决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如果我们对这样严重的失业现象采取熟视无睹、漠不关心的态度，不去多方设法，尽心尽力，有步骤有计划地来解决这一问题，那我们在城市中，就会削弱社会基础，就会遭遇着不可想象的困难。

二 工业与商业的关系问题

根据上述经济情况的分析，那末，我们对城市建设的基本方针是什么？当前的工作重点又是什么？无疑的，城市建设的基本方针应该是搞生产，是工业化，是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变商业城市为工业城市。这是党的二中全会明确规定了的，任何城市都应该照此方针去做。新武汉建设的基本方向，也应该是从今天的商业中心变为将来的工业中心，或者是商业中心、同时又是工业中心。

为什么工业化是城市建设的基本方针？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完成国家工业化的伟大计划；只有如此，才能使城市走向繁荣发展，最后解决失业问题；只有如此，才能廉价供应农民生活必需品，高价收购农产品，以提高农民生产力与购买力，才能按照工业方法改进农业，领导农民走向集体化，最后消除农民贫困的根源；也只有如此，今天才能建设巩固的国防，保证中华民族的真正独立，将来才能最后进入社会主义。因此，我们从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就要根据二中全会的精神，“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这个生产事业也应依照二中全会的指示，第一位是国营企业，第二位是私营企业，第三位才是手工业。按照今天华中的具体情况来说，我们对工业第一步是力求恢复。无论国营、私营，凡是能够恢复的应立即使之恢复，不能马上恢复的，应有步骤有计划地去使之恢复。第二步则是在现在基础上，增加产量。第三步才是计划再发展。无论恢复也好，发展也好，第一要看客观可能，第二要看主观条件。凡客观上有可能而主观条件又允许的，我们就要去搞，有一分搞一分，有五分

搞五分。在这方面我们要用大力，要在税收上、交通运输上、资金上、工资政策上、劳动条件上、法律保护上，给以各种便利条件，以促成工业的逐步恢复与发展。这是我们的基本方针，无论何时何地，绝对不许动摇。如果对这个方针动摇不定，“盲目的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就要犯严重的政治错误。

但是，应该知道，今天发展工业生产是有许多困难的：第一，在目前，无论机器、动力、技术、资金，公营私营都受到许多限制。第二，成品的推销和原料的采购，也有很大困难。比如，玻璃工业，天津耀华玻璃厂目前的成品只有四分之一的销路，因此，我们武昌玻璃厂便不敢开办。又如纺织业，一方面原料不足，全国棉花产量不够供应全国纺织业的需要；另一方面却是生产过剩，全国织布业现有的成品，每年还有六千万疋布销不出去。第三，运输更是极端困难。铁路尚未完全恢复，航运吨数不足，航空则完全停顿。这些困难之所以产生和存在，并且暂时还不能克服，主要是因为中国过去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长期压迫和剥削的结果。农村的生产力受到空前的破坏，农民陷于极度的贫困，购买力很低。在今天，全国实行土地改革的人口，只有一万万多一点，还有三万万以上人口依然受到封建主义的压迫与剥削。这种情况就产生当前经济生活中的矛盾，一方面是生产不足，另一方面又是生产过剩。上海目前的经济情况就是这一矛盾的具体表现。中央财委为改变上海的经济情况，曾拟工厂内迁，但最后又发现迁厂困难也很多，如厂址、动力、运输、时间和迁移中工人的生活问题等等，一时都难适当解决。由此说来，发展工业虽是我们的基本方针，但是，工业的恢复与发展，决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长期的建设过程，必须从长期来打算，有步骤有计划的来搞。如果不从实际出发，不估计当

前的客观困难，单凭主观愿望，说搞就搞，盲目乱碰，那么我们的工业不但不能发展，就是现有基础也会给搞垮台。

根据中国现代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只占百分之十左右，我们可以肯定的说，要实现国家工业化这个根本方针，决不是三五年或七八年可以达到，而是须要二三十年，甚至再多一点时间的长期建设，才能达到。我们中国由新民主主义转入社会主义，的的确确需要数十年的漫长时间。这决不是没有根据的说法。

工业的发展，不是短时期所能达到，但是，今天在城市中，我们却面临着几个十分迫切的问题，这些问题，必须及时加以解决，否则就要犯历史的错误。这些问题是：

第一，是失业问题。失业这笔帐固然不能算在我们头上，而要算在国民党反动派头上。但是我们不能不负起责任来解决这个问题。除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外，所有失业人员，我们都要尽一切可能设法安置。毛主席说，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着吃⁽²⁾，就是要大家本着风雨同舟的精神，共同度过这个暂时的困难。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靠工业还是靠商业呢？当然，基本上要靠工业。只有实现国家工业化，才能够最后消减失业现象。但这是将来的事情，不是今天所能办到。就今天来说，解决这问题不能靠工业，而是要靠商业。比如，今天的武汉，只要把城乡和内外交易打通，土产外销，货畅其流，市面就可以逐渐繁荣起来。土产越外销，行商生意就越大，来往客商就越多，船舶运输与搬运事业就越来越繁盛，跟着许多门市生意，直接为消费者服务的生意，也就越好做。这样，船夫、码头工、苦力、店员、贫民、小贩、知识分子，也就慢慢有事做了，失业现象就可以大大减少。开封就是最好例子。今年三四月间，开封市面萧条，失业严重，人心惶惶不安。起初，我们采取大力扶助面粉、榨油、做鞋等工业、手工业的办法，

解决了三万人的失业，成绩不能说小，但是市面仍是萧条，失业问题仍很严重。后来研究结果，懂得开封基本上是商业城市，是花生、棉花、茶叶、鸡蛋等农产品的集散市场，才转过来注意商业，恢复转运公司，实行铁路联运，办理银行汇兑，鼓励商人运销，大做生意。商业逐渐活跃起来，失业问题才大体上得到解决。

第二，是农民生活问题。农民过去在国民党反动派长期统治下，生活本来很贫困。现在，土地改革尚未实行，农民的生活固然还不可能根本改善。但是我们当前至少应保持农业生产现有水平不使下降，应该停止农村经济继续破产的过程，以保障农民最低生活，逐步恢复农民的生产力与购买力。要做到这点，就要尽量缩小或停止扩大工业品与农产品之间的剪刀差。农业品跌价，工业品涨价，严重地损害到农民的当前切身利益，破坏了农村生产力。如湖北的棉花产量占全国第二位，河南的烟叶占第一位。如棉花、烟叶滞销跌价，广大的棉农、烟农的生活便无法维护。所谓城市为农村服务，从经济上说，第一就是要使农产品畅销，因而适当提高农产品价格；第二就是要使工业品特别是布、盐等生活必需品日常供应，因而适当压低其价格。换句话说，就是缩小剪刀差。只有这样，才能维持农村现有生产水平，逐步恢复农民生产力与购买力，并在政治上巩固地团结农民。倒过来也才能发展和繁荣城市的经济，达到城乡互助的目的。那么用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当然基本上也是要靠工业。只有城市工业化，才能廉价供应农民工业品，而以适当价格收购农产品，将来再按照工业方法改造农业，消除农村贫困的根源。但是，这也是将来的事情，不是今天的事情。今天不是靠工业来解决，而是要靠商业来解决。今天，只要商业旺盛，土产畅销，城乡交易纳入正轨，剪刀差额就可逐渐缩小，农民当前困难就能适当解决。

第三，是财政困难问题。华中当前战争尚未结束，土地改革尚未实行，而国民党反动派所造成的城乡经济的破坏程度又极为严重，故华中财政的困难程度也是十分严重的。今天，华中要担负支援战争，同时进行生产建设的重大任务，如果财政困难不能解决，就无力支援战争，也无力进行生产建设事业。两者都要靠财政支持。但是怎样才能解决财政困难呢？除了精简节约、征足公粮之外，显然只有从增加税收方面着眼。必须在现有税率税目之下，整顿税政，消除偷漏，杜绝贪污，以达到增加税额的目的。但如果商业不发达，土产滞销，城乡内外物资不能正常交流，城市经济不是日趋繁荣而是日趋衰落，那么不仅税收不可能增加，反而要日益减少。所以要增加税收，来解决财政困难，在目前也是靠商业，而不是靠工业。

第四，是为工业发展作好准备问题。工业本身的发展，要具备若干先决条件：一要有市场；二要有原料；三要有资金积累。没有这三个条件，谈不到发展工业。这三个问题的解决靠什么？当然也是靠商业。不但成品的推销和原料的供应要靠商业，就是资金的积累，也有很大一部分要靠商业。要有商业的恢复与发展，才能为工业发展开辟道路，为工业发展准备好前提条件。

上述四个问题，是摆在华中城市工作面前的迫切问题，必须在今天求得解决，不能推迟到将来解决。今天不解决，困难会越多，将来也就更不易解决，就要犯严重的历史错误。必须知道，解决这四个问题，正是为了稳定城乡经济，稳定革命政权，正是为工业发展铺平道路。目前，我们把工作重心放在恢复与发展商业，正是实现城市工业化的具体步骤。不走这一步，就不能走上工业化的前途。所以今天我们在城市中以商业为重心，决不是违反二中全会决议。恰恰相反，正是为了贯彻二中全会的路线。不采取

这样的具体步骤，就不能达到工业化，其结果正是与二中全会的精神背道而驰。

当然，以商业为当前工作重心，并不是说，我们就可以不搞工业，可以暂时放松工业，这是不对的。发展工业既是基本方针，就是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该放松，只要客观可能，主观允许，我们就要经常去做。商业是为工业服务的，今天，以商业为工作重心，正是为工业发展准备条件，而不是拿商业来与工业对立起来，来与工业论先后，比轻重。在国家建设基本方针上，商业与工业是不能平列的，重商轻工的思想是不对的，工商并重的思想也是不对的。工业化这个基本方针，绝对不许动摇。但是今天的工作重心，必须是振兴商业，也不容怀疑。以为今天强调商业重心，就会妨碍工业的发展同样是不对的。资本家搞工商业，目的在追求利润，哪里利润大，资本就要向哪里流。如果工业利润高，资本家就会去搞工业。因此，我们就要在税收政策上，采取工业税轻于商业税的方针，保证工业利润高于商业利润，减轻商业税的主张也是不对的。

商业既是目前工作重心，那么怎样才能振兴商业呢？

第一、要稳定金融。金融不稳定，私营资金就要从事投机倒把活动，而不愿去经营正当的工商业。几个月以来，我们在稳定金融方面是有成绩的，但还不能盲目乐观，不能麻痹。为此，必须随时准备和投机资本作斗争，制止任何投机倒把破坏金融的非法行为。

第二、要搞好运输交通。这是目前畅通商业极端重要的工作，必须用一切力量恢复铁路、公路、航运，必须设法修理与打捞被白崇禧破坏与沉没之轮船、趸船，有计划的奖励造船，整顿船政，减轻运输事业的税收，增加运输事业的利润。必须保证私人轮船

汽车之自由行驶，必须限制军运，加强货运，保证商运，节约现有航运力量之使用，禁止任意征用车船、扣留车船，浪费运输力量。这类行为，在今天不仅是错误而且是罪过。在武汉还要做好码头工作，取消少数坏分子对码头工人的封建剥削，取消各种陋规。必须通过码头工会启发工人觉悟，同时要用行政力量、社会舆论，限制码头对工商业的各种无理阻挠。

第三、要加强资金周转。要商业发达主要看资金周转灵活。买卖多，周转快，利润就有保障。这方面公私银行应采取扶助商业流通的方针。首先要做好汇兑工作，同时建立贷款、储蓄、透支等业务往来，以便利商人运用资金。其次，举办保险事业，以便商人受意外损失后仍能取得资金、恢复营业。再次，银行对资金的投放，要做到有意识的在一定季节一定情况下提高或压低某些物品的价格。如目前就迫切需要对粮、棉、桐油等采购业投放大量贷款，以提高粮、棉价格，避免谷贱伤农。同时应对纺织业大批放款，增加纱布生产，降低纱布价格，以便利农民购买。对私人银行、钱庄应鼓励他们大胆经营汇兑、存放款、保险等业务，以增加市场资金周转。

第四、要发展商业中介活动。如牙行、信托、交易所、农民服务社等组织，是商业发展所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人民政府必须保证其合法经营与一定佣金。其佣金过高者应有所限制；进行投机与从中舞弊者，应严加取缔。

第五、要减少商业流通困难。各地税局、税卡和海关，必须简化验货、报关、征税的手续，严禁同税重征，额外附加，任意留难，籍端勒索等非法行为。如有此种行为者，允许商人向政府控告。城乡间有碍商人来往之路条、护照必须取消。

第六、要确实保证商业自由，公平买卖。除某种特产品如钨、

梯等由国家专业公司经营，及一般物资对国外出口须经国家贸易机关统一管理外，其余在国内市场上任何物品（如棉花、粮食、盐、布等）任何地区任何人员（公营与私营）都可以自由采购、自由运销，而不受任何限制。各地政府如有任意限制采购，阻碍运销的行为，都是不利于工商业之恢复与发展，都是违法行为。商人可据实向政府控告，政府必须严加惩处，以确保商业流通，交易自由。

第七、公营贸易机关应统筹全面，按时订立采购出口与运销计划，与华北、华东、东北以至苏联进行换货合同，并与私人资本合作，有重点有计划地去领导与推动整个华中地区的商业活动。

三 关于公营经济与私营经济问题

在这方面，我们的方针是发展公营，推广合作，扶助私营。无论工业、商业、金融、运输，都是如此。其中，基本方针是发展公营，推广合作，而当前工作重心则是扶助私营。

为什么发展公营，推广合作是基本方针呢？大家知道、新民主主义经济体系里面有五种经济类型，其中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成份，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成份。今天，不管国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比重上是如何的渺小，但它是我们国民经济的领导成份，它的重要性是不可置疑的。第一、只有发展公营并取得合作社的帮助，今天才能稳定物价，稳定金融，巩固币值，调节市场，以打击一切投机破坏活动，保护劳动人民的利益。这一点，已为最近几个月的武汉经济情况所完全证实。第二、只有发展公营并取得合作社的帮助，将来才能节制资本，从积极方面引导私人资本向有利于国计民生方面发展，消极方面则防止私

人资本泛滥到足以操纵国计民生。第三、只有发展公营并取得合作社的帮助，才能引导中国最后走向社会主义，而不是走向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建设的历史任务便是为社会主义创造物质条件。只有发展公营，并取得合作社的帮助，才能负担和完成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这就是为什么发展公营，推广合作是我们的基本方针的缘故。为此，从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就要尽一切可能去建立公营企业（包括工业、商业、金融、运输、交通等），和合作社事业（包括供销、消费、信用等）。而目前第一步，便应尽一切可能有步骤有计划的去恢复现有企业；第二步，在现有基础上，增加产量；第三步，根据实际可能与主观允许的条件下有步骤有计划的去加以扩大和发展。总而言之，我们对这个国家经济命脉所关的国营企业，必须时刻采取发展方针，有一点做一点，有一分做一分。必须投下大批人力财力，逐渐加强公营经济，并推广合作事业。我们的同志必须响应二中全会的号召，“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3〕}所有在公营经济及合作社做工作的同志必须懂得，你们从现在起就是做社会主义及半社会主义的工作。你们必须兢兢业业，虚心学习，积累经验，不怕困难，不怕失败。只有这样做去，才能使公营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而逐渐壮大起来。这个基本方针，不论何时何地是不可动摇的。否则也要犯严重的政治错误。

但是，同样必须知道，国营经济的发展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奏效。就华中来说，今天比重还很小，不能与东北、华北相比。因此，必须对公营经济的发展，树立长期建设的观点。而在今天，单靠公营经济，不能解决城市中当前的迫切问题，正如不能单靠工业来解决一样。在目前要解决这些迫切问题，中心一环，还是依靠扶助私人资本，发挥私人资本的积极性来发展工业、商业、金

融和运输事业。这就是说，在当前的情况下，除了必须尽一切可能恢复与发展公营企业外，我们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扶助私人资本上面。比如航运事业，私营吨数占百分之九十以上，没有私营轮船公司的积极性，便不能很好解决运输问题。又如金融事业，国营银行主要业务在于发行通货、稳定金融，至于举办投资和贷款的力量则不大。没有私营银行钱庄金融业务的开展，资金的周转就会发生困难。公营力量既小，私人资本如果又不积极，在这种情况下，目前所遇到的各种困难，便无法克服。只有扶助私营经济，解决当前有关全体人民生活的迫切问题，求得安定经济秩序，巩固革命政权，以度过目前困难，我们才能赢得时间，以逐渐壮大发展国营经济，这是完全符合全体人民利益，也是符合党的二中全会的方针的。怎样才能使私人资本的积极性提高呢？唯一的办法就是保证私人资本的适当利润。资本家经营工商业的目的在于追求利润，只要保证他们有利可图，他们就会积极经营。任何强迫办法都是不行的。这是推动私人资本的中心环节。为此，第一、人民政府要订立各种法规，确实保证工商业者的合法利益与营业自由，使他们有法可守。第二、要进一步解除资本家的各种顾虑，使资本家懂得我党“四面八方”^{〔4〕}的经济政策；懂得私人资本的存在与发展是新民主主义建设所不可缺少的，资本主义的经营在今天的中国是进步的允许的；懂得人民政府保障工商业保证私人资本合法权益的政策是真诚的；懂得新民主主义建设是长期的，私人资本还大有发展前途，即使将来实行社会主义，只要不顽抗不破坏，资本家也是有生活出路的。还要使他们懂得今天的国际形势，世界人民的力量，已大大超过世界帝国主义的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更要引起世界革命力量与反动力量对比的更深刻的变化。美帝国主义是“外强中干”的“纸老虎”，它的任

何侵略计划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第三、要有正确的工资政策和保持劳动纪律。资本家的利润是建立在工人的剩余劳动上面，如果工资过高，或者工人不遵守劳动纪律，就要降低资本家利润以至无利可图。因此，工资不能过高，工人不能任意加薪；工人要遵守厂规、店规、行规，保持劳动纪律。否则资本家无利可图，就要消极怠工，这对双方都不利。

第四，国营企业对私营企业要采取分工合作，扶助分利政策。首先，在营业范围方面，今天华中除铁路、邮电由国家专营，特种矿产由国家专卖，并由人民银行专有货币发行权而外，其他各种工商业与金融、运输事业一概允许私人资本经营，或公私合办。其次，国营企业对私人企业要采取分利政策，而不是专利政策，无论采购、运销、制造，要尽可能与私营工商业者合力进行。再次，对私人资本，应尽量采取代购、代销、合办、委托经营，及租让合作办法，实行国家资本主义。

第五、要吸收资本家参政。工人有组织工会之权，资本家也有组织自己的工商联会之权，国营企业可以参加进去，达到在组织上公私合作。各界代表会议和各级政府机构均应吸收工商业代表参加。共产党员在群众团体和政府机构内要与资本家合作，遇事商量，共同负责。如此，资本家的顾虑自然就减少了。此外，我们在政府和工商业工作的干部，应主动去接近和团结资本家，不要以为接近资本家就是立场不稳。民族资产阶级是今天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四大朋友^{〔5〕}之一，与资本家做朋友是允许的，必要的。只要不违背工人利益，不做尾巴主义，只要保持我们共产党人艰苦朴素的作风。

总而言之，今天我们对私人资本不是强调整制政策，而是要

强调放手政策。放手让资本家发展，让他们图利。这种放手政策，让资本家发财，对人民有没有好处呢？有好处的：第一，可以使工商业逐渐恢复与发展起来，增加社会财富，解决当前四大迫切问题。第二，可以使国营经济赢得时间，逐渐发展与壮大自己。第三，在政治上团结了民族资产阶级，就使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更加孤立，找不到“民主个人主义者”^{〔6〕}，他们的捣乱活动也就容易被我们镇压下去，人民民主专政也就更加巩固起来。因此，从全面上说，放手让私人资本发展，正是符合中国人民的政治经济利益的。

放手让私人资本发展，有没有危险呢？不会有的。不错，私人资本主义如果任其泛滥，就可以冲破新民主主义范围，而发展到操纵国计民生，以至走向垄断资本主义。但是在今天的中国，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因为第一，今天的国家是人民的国家，政权是人民的政权，国家和政权的领导者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第二，中国的经济命脉，如银行、铁路、邮电、矿山、大工业等过去是操在官僚资本主义手里，现在没收为国家所有，便是操在人民手里。第三，中国的工人阶级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和共产党结成了血肉不可分离的关系，工人阶级是跟着共产党走的。第四，农民和广大的小资产阶级也是跟着共产党走的。第五，国际形势是日益走向社会主义，帝国主义是处在崩溃没落的过程中。在这些条件下，中国私人资本的发展就决然没有可能超越新民主主义范围，而走上垄断资本主义的道路。

当然扶助私营，并不是不要国营，放松国营，或先私而后公，这种想法和做法都是错误的。发展国营是我党的基本方针，这是绝对不许动摇的。今天，强调扶助私营，正是为了解决当前最迫切的问题，以稳定经济，巩固政权，从而赢得时间来壮大与发展

公营经济。只有公营经济发展壮大起来，才能使我们有可能按照人民的利益来完成新民主主义建设，并稳步的转入社会主义。放手让私人资本发展，也不是对私人资本放任不管，相反的应该加强公营经济对私人资本的领导，对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即进行投机倒把的资本，今天就要进行坚决的斗争，就要加强限制和取缔。

四 关于依靠工人与团结资方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基本方针是依靠工人，但当前的工作重心，则应着重于稳定资方，争取资方，团结资方。

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包括工人与职员）的政党，依靠工人，是有关建党的根本性质的问题，是党纲党章中明确规定了的，应该不成为一个问题。但是由于我们党在二十多年以来长期脱离城市，脱离本阶级，长期处在农村中依靠农民进行革命战争，现在才从乡村回到城市，与本阶级队伍会师，就发生了新问题。许多同志对依靠工人这一点，思想上起了很大抵触。因此，这个老问题就需要来一个新解释。

为什么工人阶级是我们的基本依靠？这是因为：第一，在政治上工人阶级是历史上最先进的阶级，是革命最彻底最坚决的阶级，是最有组织性与纪律性的阶级，同时又是最没有地方观念、行会思想，而具有国际主义精神，最富于团结性的阶级。只有依靠工人阶级，才能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强敌，把最伟大而又最艰巨的中国革命进行到底。第二，在经济上工人阶级掌握着最先进的现代工业，只有依靠工人阶级，才能完成国家工业化的建设事业。第三，只有依靠工人阶级才能团结资方，而又能有效的执行节制资

本的政策，允许私人资本向有利于国计民生方面发展，而又不允许私人资本超越新民主主义经济范围。第四，只有依靠工人阶级，才能彻底帮助农民走上集体化的道路，从而巩固工农联盟，帮助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获得最后解放，共同进入社会主义。依靠任何别的阶级，是没有这种可能的。因为别的阶级都是私有者与小私有者，他们是反对社会主义或者不易接受社会主义的。只有工人阶级是无产者，而不是私有者，只有他们才容易拥护社会主义，把容易接受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理想。

工人阶级具有着这样多优越条件，但是我们却有许多同志对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缺乏真正了解，对依靠工人的观点没有明确确定，口头上常常自夸无产阶级立场，一遇到实际问题，却又思想上起了抵触。有许多同志从乡村进入城市以后，不去接近工人，而却首先去接近贫民；不去找工厂工人，却只去找码头苦力。他们认为，工人生活比农民贫民好，工人有流氓气，工人中有国民党、三青团分子，成份复杂。因此，在发展工会会员时，就提出要查成份，查思想，查三代；在提拔工人干部时，他们总认为工人历史太短，资格太浅，不配当干部。他们说，过去二十余年革命都是依靠农民取得胜利，而不是依靠工人，今天革命胜利了，为什么又要工人来领导。许多同志对工人抱着疏远态度，对工人的领导作用抱着怀疑不信任的思想。把职员从工人阶级中划分出去，把他们当作小资产阶级，否认他们是靠薪资吃饭的脑力劳动者。很明显的，这些观点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是从离开阶级性的含糊的“穷人”观点出发的结果。本来“穷人”两字，是我们同志在农村中拿来向农民解释无产阶级的通俗词句，久而久之，用惯了，却使自己的阶级思想也模糊起来了。另一方面，二十年来在农村工作，学会了农民的一套作风与习惯，感染了农民的思想与感情，因

而到了进入城市，接近思想作风不同的自己的工人兄弟，却在思想上感情上不知不觉的发生了抵触，以致抱着怀疑不信任态度，这是一种忘本思想，是一种极其错误的危险的思想。因此，今天就要求大家对这个依靠工人的基本观点，重新加以检讨，对工人阶级领导的作用，重新加以评价，加以认识。应该当作一个新问题来看待，而不应当作老问题而马虎过去。

我们确定了依靠工人阶级，但是工人阶级能不能给我们依靠呢？这是不一定的。工人阶级并不是天生成要跟共产党走的，也不是天生成要为共产党的社会依靠。工人阶级跟着资产阶级政党走，是不乏历史先例的。在今天的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也还可以看到这种情况。要使工人阶级成为我们可以依靠的力量，就要我们能够确实彻头彻尾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大的利益和小的利益，长远的利益和眼前的利益，整体的利益和局部的利益，最高的利益和最低的利益。在今天，保证工人生活，不致失业，保障工人的现有生活水平不使降低，这是工人阶级当前最迫切最普遍最实际的利益。为此，第一，必须慎重处理工资问题。我们不应随便去领导工人增加工资，但必须保持工人现有的实际工资不使降低。这是今天工人的起码要求，也是我们共产党人所必须保证的。但是今天，在国营企业中，却常常存在着对工人生活与工人工资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在精减运动中，某些企业把精简运动变为任意裁员，把个别“调整工资”当作“减薪运动”，这是不对的。第二，必须恢复和维持解放前原有的福利事业。随便取消过去已有的福利事业是不对的。这些同志动机可能是为了节省，但客观上却是对工人利益漠不关心。我们今天固然不能普遍提高工资（如有实际可能还是应提高），也不可能举办新的福利事业（如有实际可能也可以办），但维持工资原有水平与原有的福利事业则

是应该坚持的。第三，要坚决取消封建剥削与压迫。对资本主义剥削，可以采取协商让步态度，对封建剥削则必须坚决反对，加以取缔。以上这三点，是我们党要时刻注意的，我们党要坚决站在工人阶级利益方面，要时刻关心工人利益，这一点要抱着明确的、坚决的、敏锐的态度，要坚决反对任何企业部门任何机关有意无意或明或暗的违背工人阶级利益的行为。

但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又着重争取和团结资本家呢？这是因为：第一，今天资本家是我们的朋友，而不是敌人。我们与资本家合作，这是我们党长期的战略方针，而不是暂时的策略利用。应该当做革命的阵营内部的团结方针，而不能当做敌人阵营内部的矛盾利用。必须知道，今天中国在经济上还是一个落后的国家，无论巩固革命胜利也好，建设国家也好，单靠工人而没有资本家的积极性是不行的。第二，一般来说，团结工人阶级较之团结资本家要容易一些。目前，事实上也是如此，各地工人阶级的觉悟已相当提高，而资本家的思想顾虑则尚未完全解除。我们在工人中的工作已有相当基础，而争取资本家的工作则才在开始。第三，就维持现有生产水平来说，假如争取稳定了资本家，积极复工复业，而不是消极怠工，则现有生产水平便容易维持。相反的，如果只注意工人工作，而忽视对资方的争取，致资方对我们政策不了解，对工人害怕，因而对工人有求必应，而工人的政治觉悟又不是很高的话，那么结果便要影响到生产长期难以恢复，这对工人对大家都是不利的。

当然，把工作中心放在争取稳定和团结资方，并不是说只要资本家，不要工人，或者把资本家的地位抬高到工人阶级之上。我们任何时候都不应把资本家的地位抬高到工人阶级之上，因为资本家的地位和作用是不能和工人阶级相比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国体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这一点已经写上了中国人民政协的共同纲领。

怎样去争取和团结资本家呢？除了我在第三部分所说的办法以外，现在主要就是要协调劳资关系。这就要解决两个中心问题，一是要有适当的工资政策，一是保障雇佣自由。这两点，是劳资纠纷的中心关键，也正是在这两点上表明，劳资双方的利益是矛盾的。工资过高，资本家就无利可图，反之，工资过低，工人又不能维持生活。不实行雇佣自由，资本家的顾虑就很大，实行雇佣自由，工人又怕有失业威胁。但是，为了团结，必须在这两点上调解劳资两方的矛盾。所谓适当的工资政策，就是既要保证工人的现有生活水平，又要工资不致过高，以致资本家无利可图，影响资本家的积极性。所谓保障雇佣自由决不是允许资本家无理解雇，而是只根据劳动合同，给那些严重违反厂规店规行规，违反劳动纪律者以适当制裁，同时允许在其企业亏蚀确实无法维持现状时有裁减工人的权限。至于被解雇的工人，则可由工会另行介绍职业。这样做的好处，就是能够解除资本家顾虑，鼓励资本家发挥生产的积极性，去恢复与发展工商业。倒过来，又可以使工人得到就业的机会，工人的生活条件就可逐步改善。总而言之，争取和团结资本家，在今天，是符合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的，也是符合中国人民的全体利益的。

注 释

〔1〕 当时重庆、广州尚未解放。

〔2〕 参见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二版，第1512页。

〔3〕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二版，第 1428 页。

- 〔4〕 “四面八方”指毛泽东提出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
- 〔5〕 四大朋友指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
- 〔6〕 民主个人主义者即自由主义人士，或称旧民主主义分子。这些人同国民党反动分子和帝国主义分子有较多的联系，对他们存在幻想。

如何克服工商业的当前困难*

（一九五〇年五月七日）

此次代表会议中心议题是讨论如何克服工商业的当前困难，这是恰中肯要的。我想对此问题提供一些意见，作为大会参考。

我认为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大家要深刻认识到我们目前正是处在一个空前胜利的新形势，由于这个新形势，已基本上改变了我们国家百年来的旧面貌，使我们有可能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旧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的新中国，正如刘少奇同志在庆祝五一节大会上所说：使中国经济发展和工业发展的基本条件已经创造起来，或者正在创造中。这些基本条件是什么呢？据刘少奇同志的指示：

第一，我们的国家今天已经由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变成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再不受帝国主义的政治压迫与经济压迫了。大家知道，过去我们工商业之所以不能发展，而且日趋衰败，其基本原因，就是由于我们国家的经济命脉，都控制在帝国主义国家手里，因此给洋货倾销敞开了大门。但是现在情况已完全改变了，我们已取消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海关已完全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而且人民政府还采取了新的对外贸易政策，凡是

* 这是邓子恢在武汉市各界代表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

们自己有的东西，我们就采取重税政策限制进口，甚至干脆禁止进口；我们自己需要的原料就禁止出口；我们有余的东西就免税奖励出口；这样我们便有把握来保护自己的工商业，不致再受帝国主义廉价洋货倾销所排挤，工业原料也不致受人操纵了。这一年来，我们工商业虽然有很多困难，但今天还能够维持这种状态，就是因为我们掌握了海关与对外贸易政策，根绝了洋货倾销的结果。国家的真正独立，取消了帝国主义的特权，排除了民族工商业发展的主要障碍，这就是保证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第一个基本条件。

第二，人民解放战争已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除了西藏与台湾两个地方尚待解放外，我们的国家已经完全走上和平统一的坦途，这是四十年来空前未有的新局面。过去我们工商业之所以不能发展，除了国外因素外，就国内来说，最基本因素，就是内战连年不息，兵灾战祸，无处无之，抽丁拉夫，封车封船，弄得民不聊生，商旅受损，加以军阀割据，行政不统一，金融不一致，苛捐杂税，敲榨勒索，更造成全国民穷财尽，工业倒闭，商业萧条。但今天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中国大陆已经结束了战争，西藏之解放不是军事问题而是民族问题，台湾解放虽比较要困难一些，但不久总要解放，是不成问题的。今后国内将永远没有战争，永远和平，国家出现了空前未有的统一局面，再不会有封建割据了。从此，我们的工商业再不会受到国内战争的破坏与政令不统一的阻碍；另一方面，和平之后，军队逐渐复员，国家可以大大节省军费与战费支出，将资金投向工商业生产，使社会经济逐渐繁荣发展起来，这就是工商业发展的第二个基本条件。

第三，是农村实行土地改革，将大大增加农民生产力与购买力，而为工商业发展扩大了销路与原料来源。过去旧中国工业不

振商业凋敝的根本原因，就是市场萎缩。固然外货倾销夺去了市场，但最主要的还是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大部分削弱了购买力。近百年来中国农民在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与国内封建势力之残酷剥削，特别是国民党二十年来反动统治的压榨掠夺与战争破坏之下，农民穷困至极。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没有外货倾销，工商业一时也是发展不起来的。现在这种情况还没有完全改变过来，但是已经开始改变了，农民在翻身了，老解放区已经有一万万五千万以上人口完成了土改，这就是东北各城市与平津市场较武汉繁荣的基本原因。就中南区来说，河南正在进行土改，其他各省也将在今冬明春开始土改，现在则实行减租退租运动，据湘鄂赣三省初步统计，已退得租粮达十亿斤以上。虽然在这个运动中不免发生偏差，特别是退押金有很大毛病（现已停止），农民的退租退押也部分影响了工商业的资金。但应该承认，这个运动基本上解决了春荒问题，安定了前几个月来动荡不安的社会秩序，并解决了农民部分生产资本，因而得以进行春耕，为今年的夏收秋收打下了基础，同时又为将来的土改做了准备工作。等到今冬明春开始土改，明后年中南地区全部完成土改之后，农村面貌就会焕然一新。农民在解决了吃饭问题之后，必然就要进一步解决穿衣问题，医药问题，修建住房问题，以及其他日常生活之逐渐改善，因此随着农民生产力之提高，农民购买力也必然跟着日益提高，这是很自然的道理。不仅土改后如此，就在今天已退租地区，比之未退租地区也有显著不同，这就为工商业发展开辟了光明大道。

第四，十几年来一直处在上涨形态中的物价，开始稳定下来了。在物价高涨中，不仅工农大众生活痛苦，正当工商业者也吃了亏，照货币数字是赚了钱，从实物计算却亏了本，这是大家十

几年来的亲身体验。武汉自解放后，反复经过三次物价暴涨。第一次是我们刚进武汉的六七月间，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它压下去。第二次是去年十一十二月间由上海棉纱市场开始遍卷全国的涨风，经过中央领导全国才加以压平。但过了不久到今年一二月间，全国物价又掀起大涨风，中央财经委员会研究出基本原因是财政发行通货膨胀。当时就考虑，是继续增加通货，让物价上涨，使人民大众生活痛苦呢？还是紧缩发行，增加收入，来平抑物价，安定人民生活呢？研究的结果是采取了少发行多收入的政策，并下决心统一全国的财政与经济工作。这种政策执行的结果，就使得今年全国财政收支接近平衡，因而也就创造了十几年来所未曾有过的奇迹似的全国物价普遍下落与金融稳定。这对于全国人民大众来说，是安定了十几年来所不能安定的生活，从而也就停止了人民购买力的继续下降而逐渐回升。对于工商业来说，是使资金不致再流入投机市场，不致再为通货膨胀所耗蚀，从而开辟了一条稳步经营与发展的康庄大道。这里必须指出：这一新局面展现在我们眼前，是全国各方面响应了中央号召，踊跃购买公债，缴纳税款，挑起了沉重的担子的结果。现在财政情况的彻底好转已不太远，但还要一个相当时期的困难，因此还需要我们大家来再挑负一程，以后就会苦尽甘来。

第五，是处在空前有利的国际环境。这一点对我们的经济建设与工商业发展是有极大关系的。中国今天之所以出现此种胜利局面，正是这种有利国际环境的产物。当然中国的胜利又影响了国际环境走向更加有利。但一直到现在还有许多人害怕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因而不敢积极投资工商业，这是由于对当前国际形势缺乏认识所致。诚然，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国际反动势力，是在积极准备战争，鼓吹战争，处处与苏联找摩擦，积极扶助日本

与西德再起，在中国则仍然援助蒋匪，进行对新中国的各种阴谋破坏。这些说明什么呢？说明帝国主义者是在积极备战，梦想用战争来恢复其对弱小民族的侵略统治，来为其即要到来的经济危机找出路。在这点上，我们是要有高度的警惕性。但是应该知道，今天世界形势已经起了基本的变化，帝国主义者肆无忌惮为所欲为的世界形势已经是一去不复返了。二次大战的结果，是日、德、意三个法西斯国家的灭亡，法帝的溃败，英帝的伤残，现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只剩下了一个美国比较强大一点。世界帝国主义势力大大削弱了。而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阵营，却增加了七、八个新民主主义国家。加以中苏结盟和平民主阵营的力量，已大大超过了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这个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大大鼓舞了全世界爱好和平民主的人民，同时也警告了帝国主义者与战争贩子们，使他们在计划战争准备战争时不得不考虑一下战争的本身与战争的前途。所谓新的三次大战不是只决定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想不想打，而更重要的是决定于以苏联为首和平民主阵营有没有力量去制止他打。我们今天的努力方向不是希望人家不打，而是要自己有力量使人家不敢打。因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把中苏两大国七万万人民的力量团结成一个大铁拳，就加强了我们的制止战争保卫和平的力量，也就加强了我们的巩固胜利进行建设的保证。我们今天一方面受美蒋的封锁，但另一方面我们却与苏联及许多新民主主义国家建立了顺畅的贸易关系，在个别资本主义国家中也建立一定的贸易关系。今天，我们大宗出口货，如特种矿产、桐油、猪鬃、丝、茶、花生、黄豆等仍可源源不断出口，我们所需要的机器、汽油等仍可源源购进，有些产品，如丝、茶等，过去因受帝国主义商品倾销而停滞，今后还可能增加销路，恢复旧观，这对我们工商业发展是有极大帮

助的。这种有利的国际环境，就是我们发展工商业发展经济建设的第五个基本条件。

从以上五点，可以看出新中国的工商业与经济建设具备着如何良好的条件。尤其我们中南地区，有着一万万四千多万人口，有丰富的农产（如粮棉烟等）与矿藏（如铁钨锑锡等），有可供大规模水电建设的河流，有原料，有市场，有动力，交通方便（长江横贯东西，京汉、粤汉串通南北），加上现有相当数量的工业基础及正在计划中的工业建设（大冶钢铁业，武汉造船业、机器业等），中南的经济建设与武汉工商业发展的前途是不可限量的。我们必须认识这个伟大的胜利与光明的前途，不要为眼前的暂时困难所蒙蔽而感到悲观失望。

但是另一方面，还应该知道目前确有很大的困难。这个困难，就是物价稳定后严重的工商业萧条现象。过去物价上涨有困难，今天物价下跌也有困难。如就工商业来说，恐怕今天跌价中的困难，比之过去物价上涨的困难还要大些。如果长此下去，工商业支持不住，就要招致倒闭现象，从而就会增加职工失业，城乡贸易失调，并要影响国家财政与人民生活。因此我们应该正视这些困难，用大力来克服困难，尽管这些困难是好转中的困难，暂时的困难。但是如何才能克服困难呢？这首先就要研究困难从何而来，以后才能对症下药，定出克服困难的办法。我认为今天工商业之所以萧条，所以发生困难，其原因：

第一，应该归咎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毒害。过去很大一部分工商业是为帝国主义、封建阶级、官僚资本消费服务的。如金银首饰、绸缎业、参茸业、摄影业、迷信品、奢侈品以及庞大的茶楼酒馆等，这些营业在洋大人、地主老爷、官僚资本倒台的今天，倒闭是不可避免的。这些企业部门的倒闭，并不是坏现象而是好

现象。因此，对这些营业的萧条倒闭，不应加以维持，而应帮助其转业改行。

第二，应归咎于资本主义制度生产的无计划无政府状态。有许多企业生产已远远超过社会的实际需要，如中南卷烟业除手卷烟以外，单几个中大城市之机器卷烟，每月达五六万箱之多，而实际需要还不及半数。此外，尚有火柴、肥皂、玻璃、水泥等也是生产过剩，供过于求。这些企业之倒闭与缩小生产，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对这些企业应使之减产，有区别地加以维持，不可能维持者，也应助其转业，而不应无区别地一般地盲目地加以维持。新建公营企业应经过中央与中南财委批准，按需要来建设，不得盲目建厂，致增加生产过剩的困难。

第三，应归咎于过去国民党反动统治长期通货膨胀所造成的恶果。在十多年来通货膨胀物价暴涨的长期过程中，一般工商业都或多或少带有投机性，他们营业之所以维持与获利，很大部分是靠投机取巧囤积居奇得来的暴利，并不是由于改善经营与生产合理化而获致利润的。相反的，由于投机获利，这些企业也就日益腐败了，技术上管理上弱点很多。今天物价长期稳定下来，他们再无机可投了，因此这些不合理经营企业的弱点就完全暴露出来，不仅无利可图，而且要大大亏本。对这些企业必须告诉他们，不要再梦想发投机财了，而要老老实实克勤克俭来从事企业的整顿与改造，从降低成本中来获致利润，否则只有在自由竞争中垮台。

第四，是由于人民购买力太低。这种低下的购买力过去为物价暴涨所掩盖，看不大清楚，今天物价跌落就特别显得严重而惊人。虽然农村中在进行退租运动，但长期破产的农村购买力，再加严重春荒，是一时难于恢复的，而农村的退租退押反而部分影

响工商业资金的缩小。因此，必须迅速准备土改、彻底完成减退租，以帮助农民进行生产，但必须停止退押，在退租中亦须照顾工商业资金，使不致过分影响工商业。

第五，是公债税收任务相当繁重，又连续征收，致通货紧缩，影响工商业资金周转，也影响物价下跌。对工商业税征收办法，除查帐征收及定期定额包税制外，大部分采取民主评议办法，致大商人吃亏。同时民主评议时有些不依照营业额计算，而按资产大小计算，这样一方面违反了营业税规则，另一方面又使大资本顾虑，怀疑政府有意打击大资本，因而资金逃避，化整为零，也影响今天市面。因此，公债催收应适可而止，确有困难者应予减派或缓交。工商业税必须按营业额计算，并尽可能实行查帐征收与扩大定期定额的包税制，缩小民主评议办法。民主评议应与典型调查相结合。这种典型调查不要只查瞒报与可能交纳税款的单位，也要调查负担过重无法缴纳税款的单位，总之务求公平，减少畸轻畸重现象，以减少工商业的困难。税收机关闭着眼睛点钱，只顾完成任务，不顾政策，不研究实际情况的做法是错误的。

第六，是劳资关系未完全纳入正常状态。武汉一般薪资本不算很高，但如照目前一般营业状况，则确实无法维持，如此下去，将有许多厂商要陷于倒闭。因此，在此困难关头，劳资双方能互相谅解，互相协商，共同研究渡过难关的办法，如节省原料燃料，提高生产效率，按件计工者则酌量减产，其确实无法维持者，在劳资双方协商原则下，劳方酌量减低工资（不仅公营如此，私营亦应如此），或按原薪打折扣，以减少企业困难；资方则保留现有员工，减少失业，并改进管理整顿企业，以便减低成本，打开销路，共同渡过此难关，等待过一时期营业的好转，是克服当前困难的最好办法。对某些厂商人员过多，实在无法维持者，亦应准

资方裁减人员，而由政府另想别的办法以救济失业工人，也属必要。因为解雇问题是自今年春节以来劳资间久悬而未决的基本问题，这个问题适当加以解决，不仅劳资关系得以进一步改善，而且也是克服当前工商业困难的重要办法。总之，劳资双方是互相矛盾而又是互相依存的，今天的困难是劳资双方的困难，将来的发展也是劳资双方的福利。因此，双方应本劳资两利、劳资协商原则，共同研究渡过难关的办法，这是非常必要的。

第七，是公私关系问题未得到适当解决。这个时期公营企业，特别是公营贸易公司组织比以前普遍，资金比以前增大，因而控制市场平抑物价与投机商人作斗争的力量也就大大加强。近来之物价稳定，固然基本上是由于财政收支接近平衡，赤字减少的缘故，但贸易公司掌握雄厚物资及时抛出，大量回笼货币起了极大作用。这是不可否认的成绩。但由于贸易公司回笼任务太大，因此，在执行中就犯了急性病，不仅经营批发，而且经营零售。当然在物价暴涨时，某些主要物品的零售是必要的，但经营零售结果，却把大批中小商人挤倒了。此外，还有许多机关部队的合作社也乘此时机办起零售商店，甚至卖烧饼、开理发铺、拉架子车等都搞起来，不仅与中小商人争生意做，而且与贫民小贩争利，因而引起许多人不安与不满。部队之汽车运输与公营轮船公司装载货物，也与私营公司发生矛盾。这就是今天公私关系中的纠纷所在，也是增加工商业困难的原因之一。因此，今天要调整公私关系，首先要贸易公司停止经营零售。为保证人民主要生活，粮食公司可以保持一定数量之零售店。机关部队合作社所开办的零售店也应迅速结束，遵照军委命令禁止做生意。贸易公司则抓住几项主要商品专搞批发，以与私人资本分工。这是今天调整公私关系的重要环节，各贸易公司必须照此执行。此外，贸易公司尚应

采用各种办法，如委托加工、收购成品，委托采购、联合采购，委托代销等等，这样一方面可以帮助私资克服困难，另一方面又可大大增强国家贸易部门的经营力量，使贸易公司有更大力量去掌握物资运销出口，调整供求，平衡物价，这就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经济形态，是最便于公私兼顾而又公私两利的办法，各级贸易公司必须普遍提倡大胆进行。在银行方面，则应着重于扩大汇兑、简化汇兑手续，便利商人买货，降低利息，吸收存款，并适当贷款给私人工商业，以活跃市场资金。国营轮船公司应主动照顾私营轮船，适当分配国营货物之转运。部队汽车运输亦应有所限制，以免与民争利。总之，今天应该正确执行毛主席公私兼顾政策，不可顾公不顾私，亦不可先公而后私。大家知道中国最后是要走向社会主义的，这是已定的方向，是共同纲领中明文规定了的，但要知道走上社会主义要有一定的物质条件，这个条件就是国家工业化。要完成国家工业化这个艰巨任务，固然国营企业要起主要作用，但私人资本也有其一定地位，不仅建设初期是如此，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长期建设过程中，私人资本都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当然私人资本的发展也有其不好的一面，这就是投机活动。因此我们对这种投机行为及不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必须加以限制。但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及私人资本的正当经营，必须加以保护。国营企业对这些私人资本应采取兼顾政策，而不是打击政策；应采取合作政策，而不是排除政策；应采取分利政策，而不是专利政策。当他们遭遇困难时，国营企业还要加以适当帮助，使其有利可图，能够生存，能够发展。应该知道，今天私人资本的发展，对国家经济建设是有利的。反之，私人资本的萎缩与凋敝，不仅影响工人失业，影响城市治安，影响国家税收，而且也影响城乡关系与整个人民生活，这对今天的国家经济

与政治都是极其不利的。毛主席公私兼顾的政策正是根据整个国家现实利益出发的，并不是说来好听的。我们做国营企业工作与工会工作的同志，必须深刻体会毛主席的用意，详细研究这个政策，必须克服狭隘思想，具备远大眼光，坚决执行公私兼顾与分利政策，以达到团结私人资本。同时，私人资本也不要顾虑太多，应大家团结一致，在人民政府领导下发挥自己的积极性，来共同渡过目前困难，而取得将来的共同发展。

第八，是物价下跌。由于物价下跌，就保障了劳动人民的薪资所得不致吃亏；保障了正当工商业者不致亏本；保障了今年春荒得以安全渡过；也保障了国家财政不致长期动荡不定，入不敷出。因此，物价稳定本来是极好的现象，是为国家经济建设具备了最基本的条件。但是另一方面，却发生了坏的副作用。这就是由于物价下跌，形成目前的市场萧条，存货卖不出去，以至工商业倒闭，工人失业。这些现象固然种因不在今天，而在于过去长期种下的恶果，如人民购买力太低，生产过剩，企业本身腐败等，这些原因当然是长期形成的。但这些原因过去都为通货膨胀所掩盖，今天物价稳定，这些因素都一齐暴露出来。因此，物价下跌便成为目前工商业困难的最突出因素，从而我们克服目前困难的办法，也就主要是用一切办法来稳住物价，不使再跌，个别物价尚应适当提高，这在今天非常重要。我们的工商业经过长期摧残，正如害了一场大病的人，需要吃些补剂，再不能吃泻剂了。因此，国营贸易公司应遵照中央贸易部的正确方针，大量抛出货币，收购物资，并请示中贸部减少回笼任务。有计划地大批运销土产出口，增加内外交流。贸易部门同志必须具有远大眼光，克服狭隘思想与保本主义。过去物价涨时不敢大胆抛售物资，回笼货币，今天物价跌落又不敢大胆抛出货币，收购物资，这都是保本主义作

怪，其实这样并不能保本。这是只从小圈子本位主义出发，而没有从全国范围、从整个国民经济利益看问题，结果个别公司可能保本，也可能赚钱，但如不能把物价稳住，让物价继续下跌，因而增加了工商业困难，这对整个国民经济是要受到极大损害的。所以这种保本与本位主义，实际是一种无远见的庸俗的狭隘思想，贸易部门的领导同志必须克服这种狭隘思想，而迅速放大眼光，大量抛出货币收购物资，以达到稳住物价的任务。此外，银行降低利息，适当贷款，松动银根，税收机关通融收税时间，以便照顾工商困难，使得平安渡过此淡季，经过一个时期市场趋于活跃之后，就可望开始好转。

最后，我要谈一谈如何帮助不适合当前需要的工商业改行转业与救济失业工人问题。上面说过有许多为洋大人、地主、官僚消费服务的工商业，这些工商业除了改行转业，别无出路，这需要各行业老板看清前途，下定决心，从早转变，不要再固执旧观点，留恋旧行业，踌躇不决，自误误人。但是如何转业，转到哪里去呢？这也是一个困难问题。刘少奇同志已明白告诉我们：“凡适当地服务于人民的需要，特别是适当地服务于农民的需要，而国家现在又不能办，或者虽然办了但还很少的事业，是可以办的。交通运输事业以及服务于国家经济重点恢复部门的事业，医药事业，也是可以办的”。^①这个指示给转业者指出一个明确的方向，这就是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大众是工商业发展的基本对象，为广大农民的需要服务，这是一切转业者的总方向。遵照这个方向，就有着光明的前途；离开了这个方向，就会丧失前途。根据这个方向及中南区的具体情况，我认为，下列各种企业在武汉是最有前途的。首先是纺织业。武汉应成为全国纺织业中心之一，河南、湖北都是著名的棉产区，原料是充足的；中南区一亿

四千万人，再加上西南区共有两亿以上的人口，市场是广大的；武汉工人工资比上海低，又减省了上海来往的运费。在这样几个条件之下，武汉纺织业的前途是非常光明的。其次是面粉、榨油、造纸、麻纺织等工业也是大有前途的。再次是与公营企业将要发展的如炼钢铁业、造船业、机械业相结合的行业。此外，交通运输事业、医药业将来也是必然发展的。在商业方面，大商业比小商业有前途。过去有些地方干部提出一种争取中小商人，打击大商人的方针是极端错误的。但今天又有些干部，想在工业未发展以前，就采取经营零售办法，来排挤小商人，也是错误的。要知道大商人对于交流内外城乡物资的作用是比较小商人大得多，但今天小商人在数量上却占绝对大多数，因此，我们的方针是大中小商人都要争取。商业是整个生产行程中的分配行程，这在新民主主义的生产过程中是决不可少的一环，发展商业是发展工业的必要条件。今后，我们国家社会的情况是要完全改变了。现在正是在这一转变的过程中，工商界的人士要认识我们新民主主义国家建设的总方向，要以新思想、新观点、新方法来适应新形势、新社会，才不仅能生存，而且能发展。

至于救济失业工人问题，在今天更为重要。在今天困难情况下最困难的还是失业工人，而数量又很大。我们人民政府与工会，要把失业工人的救济当作当前最迫切的工作。对上面拨下的及本市筹措的救济粮，要迅速分配发放。要把失业工人兄弟的困难当作我们自己的困难一样来解决。大家知道，社会上只有劳动人民创造出价值，现在他们有了困难，我们是人民的政府，有责任来解决他们的困难。把这件工作做好，是克服当前困难的重要一环。我们今天调整工商业克服困难，一方面是为整个国民经济着想，同时也正为减少工人失业着想。

上述各点就是我对当前克服困难的具体意见，是否有当，望大家加以研究，而逐步付之实施，以完成新武汉新中南的建设。

注 释

〔1〕 见《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第 20—21页。

论 工 会 工 作^{*}

（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八日）

中南各省市的工会工作，由去年开始，一年多以来，是有很大成绩的。这主要表现在下面四点：

（一）发动了工人群众，支援了解放战争，配合政府顺利地接管了城市，保护厂矿，恢复生产，稳定金融物价，安定社会秩序。这些与工会工作的成绩是分不开的。

（二）依靠工人团结资方，维持生产，克服目前困难，为将来发展工商业，打下了初步基础。

（三）提高了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与政治觉悟，初步确立了主人翁思想；帮助工人同志们认识了人民政府，认识了党，从而拥护党和人民政府。

（四）各工厂、矿山，建立了工会组织，在全区建立了各级工会系统，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工人参加了工会。

从这四点成绩看来，我们可以说，党在中南工人中已建立了初步基础，这就成为我们今后城市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基本依靠。否则，城市建设和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的基本好转，是不可想像的。

但工会工作中有没有缺点呢？缺点是有的，主要表现在严重

* 这是邓子恢在中南总工会筹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脱离群众的现象。这应该引起同志们极大的警惕。为什么造成这种现象？我想首先是工会工作者缺乏明确的阶级立场；其次是工会工作同志未能及时反映与切实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再次在工作方法中，不是走群众路线，而是存在着相当严重的官僚主义与命令主义。这就是工会工作严重地脱离工人群众的主要原因。因此，今后工会工作就应该注意克服这些问题。我现在就对这三个问题提供一些意见。

一 关于工会工作的立场问题

工会应该站在什么立场？毫无疑问地工会不能有第二种立场，而应该明确地站在工人阶级利益的立场。工会工作者说话、办事、看问题、提问题、处理问题，都应该从这个立场出发。应该牢牢站稳这个立场，而不应该站在别的立场。

在私营企业中，工会工作者固然应该处处为工人利益作打算（如工商联为资方打算一样），绝不应代表资方，替资方说话；也不应站在劳资中间；有时需要照顾资方，向资方让步，也只应该从工人长远利益的需要出发。如无此需要，则不应该单方照顾，也不应该无原则让步。在资方已答应了工人的条件，工会无权取消。在公营企业中，工会工作同志的立场和态度，也不应与企业行政管理人员混同起来。虽然双方都是为了国家，同时双方也是为了工人自己的利益服务，基本立场是一致的；但应该认识彼此的岗位不同，任务不同，因而彼此的具体立场也应该有所不同。为了完成自己的生产任务，减轻生产成本，企业行政方面很容易从本位观点出发，过分降低工人的薪资福利，过分提高劳动条件，因而作出对工人不利的规定。如果有些企业管理者，犯了主观主义或

者根本是一个漠视工人利益的官僚主义者，那厂方作事，就更容易违背工人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工会工作同志盲目地跟着厂方走，对厂方不利于工人的各种设施，不加批评，不加反对，不加抗议，反而站在厂方去向工人解释，甚至压迫工人执行，这样工人利益当然就要受到损害，而无人替他说话，结果不仅造成工会脱离工人群众现象，而且给特务坏分子以破坏机会，他们很容易在左的口号掩盖下，煽动工人反对厂方，反对工会，因而造成工人队伍的分裂。这对工人、对生产、对国家都是极端不利的。从此可以看出工会工作者与企业管理者虽然基本立场是一致的，但在具体问题上必须各人站稳自己的立场。企业管理者代表厂方利益，而工会工作者则应该完全代表工人的利益。在厂方与工人利益完全一致的时候，当然彼此和谐合作。如果某些规定与某些措施对工人不利时，则工会工作者必须根据工人的意见，向厂方商量修改。如厂方犯主观主义或者官僚主义，不照顾工人利益，不接受工会意见，而此规定与措施又确实违反工人利益非修改不可者，则工会应代表工人向厂方提出抗议，向上级申诉，以至向法庭控告，以达到维护工人利益的目的。工会工作者这种作法，允许不允许呢？完全允许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确实保护工人的利益，才能提高工人生产积极性，才能使工会真正成为工人自己的团体，取得工人的真诚拥护。也只有这样，才能防止与克服企业领导中的主观主义与官僚主义，才能达到企业管理的改造与进步。也只有这样，才能最有效地杜绝特务坏分子的任何破坏活动的机会，而使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真正达到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为了团结工人，搞好生产，工会工作者与企业管理者这种不同立场不同态度的分工，是完全必要的，有利的。当然这种分工是为了合作，而不是为了对抗；是为了把生产搞好，而不是把生产搞坏，

这是应该严格遵守的。因此，在双方争议过程中，不应发展到罢工、怠工、破坏等对生产不利的行为，更不应形成工会与厂方不必要的对抗。

不仅在企业中工会与厂方可以如此分工，就是工会与政府关系上，也应该各有不同的立场和态度。照道理讲，今天的人民政府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政府每一法令、政令与措施，都与工人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因此，工会与政府人员立场基本上也是一致的。但应该估计到人民政府是代表四个阶级利益的，它不仅要照顾工人阶级的利益，同时还要照顾农民阶级、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在这中间，对某些问题的决定，难免照顾不能恰如其分。在施政上，有时也就难免有所偏差。同时，在政府人员中，不可避免地也要发生主观主义与官僚主义的毛病。因此，同样需要工会工作者站在工人阶级的阶级立场，完全从工人阶级的利益出发，来研究政府的法令、政令与措施。如发现某些地方、某些措施违背了工人利益，或者对工人利益照顾不周的时候，便应该向政府建议，设法加以修改或纠正。这里工会工作者的阶级立场与政府立场是一致的，但同时又应有所区别，这就是工会工作者与政府人员的分工与合作。这种分工，也是必要的，有利的。相反地，如果工会工作者与政府人员的立场态度完全一致而无所区别，对政府一切法令、政令与措施，不加研究盲目服从，甚至对工人不利者，也无条件服从，这同样要使工会脱离工人群众。同时，对政府中的官僚主义与主观主义，也就难以克服，这样对工人、对国家、对人民解放事业，都没有好处而有害处。

这就是工会工作的立场问题。工会工作者，应有明确的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立场。不仅不应代表资方，替资方说话，而且与国营企业的行政人员及政府人员的立场，也应有所不同。只有这

样，工会才为工人所需要，才有群众基础，才能有作用。根据这个标准来检讨我们中南的工会工作，应该承认是有缺点的。缺点就在于自己的立场不够明确。近来许多国营工厂工会，完全站在厂方立场，与厂方提同样的口号，说同样的话，做同样的事。工会与厂方，非常和谐，没有争议，或者很少争议。这不能解释为厂方所有措施，完全符合于工人利益，处处照顾了工人利益，完全没有主观主义与官僚主义；而是表现我们工会工作者缺乏明确的阶级立场，没有能够处处代表工人利益，这样工会就形成了厂方的附属品，成为工人所不大需要的东西，成为可有可无的组织。有些工人骂国营工会为“工厂尾巴”，骂工会“把太阳挡住”，并不是无因的。在私营企业中的工会工作者，当解放初期，多与资方对立，缺乏主动团结资方的精神；但后来又产生另一偏向，在降低成本维持生产的方针下，无原则地迁就资方，单纯替资方说话，要工人降低待遇，有些不需要降低的也降低了，有些厂店资方已答应了工人的条件，工会却替资方说服工人把它取消，因而引起工人不满，骂工会为资方走狗，甚至大冶源华煤矿公司的工人，把工会主任撤职的消息，当做比打下台湾、发放薪资的消息还要好。这是我们工会工作的最大耻辱，也是工会工作的严重危机，应该引起我们的极大警惕。

我想这些同志主观上并不一定是离开工人阶级去代表资产阶级的，而是由于自己立场不明确，态度不适当，因而引起工人误会。这不能怪工人，而只能自己在这方面加以检讨，来改正自己的立场与态度。

二 关于代表工人利益问题

这是工会工作的基本问题。工会之所以需要，主要就是为了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否则工会就成为多余了。工人利益有多种，有经济利益，又有政治、文化的利益；有当前利益，又有长远利益；有局部利益，又有整体利益。工会工作者的任务，就是既要能够代表工人阶级的经济利益，又要能够代表它的政治、文化利益；既要能够代表它的当前利益，又要能够照顾到长远利益；既要能够代表它的局部利益，又要能够照顾到整体利益。但是，这些利益是互相关联而又互相矛盾的。比如工人的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就是如此。解决工人眼前生活困难，必须适当解决他们的就业、工资与福利问题；但如果工资加得过多，福利事业任意扩大，不管企业情况好坏，一律不准解雇的话，这对工人眼前利益固然有好处，而其结果，可能影响到企业倒闭，造成工人自己的失业，这就违背了工人的长远利益。在这种矛盾情况下，工会工作者的任务，就要确实了解企业的实际情况，根据企业的可能条件与大多数工人意见，适当解决就业与工资、福利问题，及其他工人当前生活上迫切需要解决的困难问题。不解决工人当前生活上迫切需要而又可能解决的问题，只空谈长远利益，空谈照顾，这样工人是不感兴趣的，也就难于去争取工人，说服工人。所以工会工作者，必须首先关心工人的当前生活问题，只要有可能，就应该用一切办法，解决工人生活上当前急待解决的困难问题，为工人做一些好事，这是团结工人，取得工人信赖的起码条件。工人是唯物论者，饿着肚子来谈政治、谈文化、谈照顾、谈将来的美满前途，这是唯心论者的想法，是行不通的。当然，在解决工

人当前生活问题时，要照顾到长远利益，要估计到该企业是否负担得起，是否会因此倒闭、失业，这种长远打算是必需的。如果工人要求过高，就要耐心去说服工人。但应该知道，这种长远打算，照顾将来，必须在真正用力而且已经着手去解决工人当前生活问题条件之下，才有意义，也才有可能。如果工会工作者对工人当前生活问题，急待解决又可能解决者，却把它置之度外，不加以适当解决，而专去空谈什么长远利益，什么照顾将来，照顾厂方，这样的工会工作者，决不能领导工人。因此，也就不能说服工人去照顾厂方，照顾将来。我们中南各地工会，在解放初期，一般对工人生活问题是注意的，也解决了一些问题。那时的毛病，就是只注意眼前利益，而缺乏对长远利益的照顾，或者照顾不够，因而一般工资加得过高，福利事业无条件保留与举办，对工人就业问题一律限制资方解雇，甚至无限度地要失业工人复工（如第一纱厂）。这在当时，对工人的眼前利益是有好处的，工会也取得了一部分工人信仰与拥护。但这样做的结果，就增加了后来工商业困难。加以今春以来，由于金融物价稳定与新旧经济重新改组所形成的工商业萧条倒闭现象，客观上就要求适当降低薪资福利，允许资方有条件解雇一部分冗员，组织上也不断号召这样做。因此，各地工会工作者便改变态度，由过去的加资变为说服工人的减薪运动，捐献年关双薪运动。更加上当时政府发行公债，工会鼓动工人带头购买，而工人中最迫切的失业问题，工会未能及时提出加以解决，因此便引起工人不满，因而加重了工会脱离群众的现象。现在我们过细来检查一下这个时期的工会工作，其主要缺点，就是只强调工人的长远利益，而忽视了工人的当前利益。有许多企业的困难可以用别的办法（如节省原料、燃料等）来解决，不一定硬要减少薪资，工会同志也同样号召工人减薪。有些单位，

由于员工的一时热情，减薪减得太低了，公债买得太多了，也未引起工会同志警惕。再加以工会同志命令主义的作风，就更容易招致工人不满与反对。当然，这种缺点不能只怪工会同志，组织上今年来也强调这方面，而对可能产生的偏向与缺点估计不足，预防不够，也要负一部分责任。但工会同志，不能以此来原谅自己，而应该从中得出经验教训。这个经验，就是要在确实解决了工人当前生活困难的基础上，再来说服工人照顾到长远利益。不能只顾眼前，不顾将来；更不能只顾将来，不顾眼前。在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上也是如此。要在照顾工人的局部利益之后，再去说服工人照顾整体利益。不能只顾局部，不顾整体；更不能丢开局部，专顾整体。因为眼前利益与局部利益，是容易为工人所看见的，而往往又是工人急待解决的实际困难。长远利益与整体利益则由于它不是当前实际问题，往往不容易为工人所理解，也就不容易说服工人去照顾。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在工人觉悟有了提高之后，才有可能。因此，工会工作者，必须处处反映与解决工人的当前利益与局部利益，以取得工人信任，并从而提高工人觉悟。在这个基础上再去说服工人照顾长远利益与整体利益，这就易收事半功倍之效。如果这样做，仍然不能说服工人，那只有依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照工人意见做去，等到做了之后发生了毛病，工人已经觉悟到自己的错误，再去说服工人加以改正。但就在这个时候，仍然要照顾工人的实际利益，考虑到工人的觉悟程度来适当处理，不能操之过急，矫枉过正，否则仍然会把事情弄坏。去年各地工资的过高增加，助长今年工商业困难与工人失业。这本来是提高工人觉悟、说服工人照顾企业、照顾长远利益的好机会，但我们同志不善于做说服工作，不善于根据工人的亲身体会来进行教育，不善于根据各企业的具体情形来分别处理，而

采取一般化的办法来一个减薪运动，不需要减的也减了，工人不愿意减的也勉强执行了。在公营企业中，工会和厂方一样高喊加紧生产，而在生产中如何适当照顾工人的劳动条件与薪资福利问题，则绝口不谈。在私营企业中，有些工会同志与资方站在一起，说服工人减薪，以克服困难，对工人利益亦很少照顾。这样当然使工人感到突然，感到工会同志的出尔反尔，感到工会同志改变了态度，站在厂方资方，而不代表工人利益了。这种痛苦的教训应引起我们的警醒。

三 关于工作方法与工作作风问题

所谓工作方法问题，就是走群众路线，还是走官僚主义路线？是依靠大多数群众自觉自愿来进行工作，还是依靠命令强迫、代替包办来进行工作呢？毫无疑问地，我们的工会工作者决不能走官僚主义路线，而应该走群众路线；决不能命令强迫，也不能包办代替，而应该依靠大多数群众的自觉自愿。任何有利工作，任何正确的方针决议，如果不走群众路线，如果不是出于工人的自觉自愿，而是靠命令、强迫，那不仅行不通，而且还要引起工人的不满，遭遇工人的反抗。比如救济失业。这样对工人有利的事情，如果不向工人说清楚，使他们明了政府的用意与救济办法，并吸收失业工人自己来主持救济工作，那么即使你拿出粮款，他也不愿意接受，或者不敢接受。救济工作尚且如此，其他工作可想而知。这是什么道理呢？道理很简单，就是人究竟是人，而不是物品，也不是牛马、物品任人摆布，牛马可以在主人鞭策之下耕田、挽车、推磨，人却不能如此。因为人是有思想的，人的一切行动，只听命于自己的思想。如果你不能打通他的思想，通过他

自己的思想去指挥他的行动，而由外力加以强迫命令，就会引起不满和抵抗。他自己思想未打通，自己不动手，而由外人代替包办。这样做得好，他就产生依赖心理；做得不好，他就埋怨你、反对你，结果是费了力而事情并没有办好。所以凡是要靠人来做的事，一定要走群众路线，而不能是官僚主义；一定要争取群众的自觉自愿，而不能靠命令强迫；一定要争取群众大多数，而不能只争取少数或次多数。只有这样，才能把事情办好，又能使群众觉悟提高一步工人是现社会最先进的阶级，更不能接受强迫命令与包办代替的官僚主义。因此工会工作，必须更充分的执行群众路线，必须坚持反对命令主义与官僚主义。工会工作同志，只要多少沾染上官僚主义与命令主义，就会脱离群众，使自己陷于孤立，并会使工会变成官办的、没有群众的、有名无实的工会。这点工会工作同志必须深刻了解与时时警惕。

如何才能贯彻群众路线呢？刘少奇同志在党章报告中说得很清楚，所谓群众路线，实质上就是毛主席所说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群众路线的全部内容都贯穿着这两句话。

工会工作如果要执行群众路线，首先就必须使自己的一切方针、一切决议，都是从群众中来，都是根据大多数工人群众的共同意见来决定，都符合于当时当地工人群众的实际要求与情绪，而不是少数工会同志坐在机关里空想出来的主观主义的东西。只有从群众中来的东西，才能到群众中去。凡不是从群众中来的东西，也就无法到群众中去。因此，工会工作者就必须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必须接近工人，深入群众，倾听群众的意见，反映群众的要求与情绪，然后把大多数群众意见收集起来，加以分析研究、归纳总结，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不正确的，哪些要先办，哪些要后办，而后才经过工人代表会议或工会委员会讨论通过，做

出决议，再通过群众去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如发现这个决议不大适合于大多数工人的实际要求与情绪，就应该再根据群众意见加以修改。只有这样，保证决议本身适合于当时当地工人的要求与情绪，才能保证决议的执行与贯彻。这一个时期，我们有些工会的口号和决议不符合于工人利益，不为工人所接受，其主要原因，就是由于这些决议，不是根据各单位的具体情况、工人的实际要求与工人的情绪来决定的，而是根据工会同志的主观要求与上级的一般号召来决定的。这样的决议，遭遇到工人的冷淡与抵抗是并不奇怪的。因为它不是从群众中来的东西。因此，保证工会一切决议从群众中来，保证决议本身符合于工人群众要求与情绪，这是走群众路线的第一步。

其次，必须善于说服工人与教育工人。工会要举办每一件事情，通过每一个决议，只能依靠说服教育去取得工人的同意，而不能采取其他任何办法，更不能强迫命令。如果说政府有些事情，可以命令行事，那么工会这种权力就很小。有些同志认为，工人中有许多落后分子，说不服，只能“我说你服”，“我发你动”，“我打你通”，只好用命令主义。这种想法，显然是一种民粹派观点与阿斗论思想：只有自己是英雄，群众只能跟着英雄走，只有自己是诸葛亮，群众都是阿斗。这种思想是与群众路线对抗的。这种思想不克服，他就没有资格来做工会工作，就应该从工会领导中把他撤销下来。还有些同志认为工人既是先进阶级，就应该“一说即服”。这种想法也是不对的。无论任何时候，任何一个地区，工人与其他群众一样，总存在着先进、中间、落后三种状态。而中间、落后状态一般总是占多数，先进分子是比较少数的。对先进分子可以一说即服，对中间、落后分子，则需要更多一些时间。因此，需要更耐心的说服工作，如果工会工作者不愿意做说

服工作，不能耐心说服工人，那只好让他自己离开工会，否则只好让他把工会工作搞坏，让他去破坏工会与工人联系。因为工会除了说服教育以外，是不可能用别的方法来领导工人的。

再次，要善于迁就群众，等待群众的觉悟。就是说，如果某些事情硬说不服工人群众，群众硬通不过，那么怎么办呢？是否可以用命令方式行事呢？不能，绝对不能。在这种情况下，只好把问题撂下来，让大家再考虑，等到以后工人觉悟了再说。有些问题群众通过了一种与领导人完全相反的意见，这又怎么办呢？是否能下命令要他取消呢？不能，绝对不能。如果这样做，就可能引起群众的反抗，至少是消极不干了。这是工会自绝于群众的最危险的办法。在这种情况下，工会同志应该依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按照多数人通过的决议办事（如果这个决议牵涉到行政范围，则可由行政方面用协商方式加以修改，但工会同志则无权把它修改）。另一方面，仍可以申明和保留自己的见解，以后等到在决议执行过程中发生了毛病，工人已经亲身体会到自己决议不对而相信工会同志见解正确的时候，才再去说服工人改变决议。这就是说，在工人没有觉悟的条件下，工会同志要善于等待工人的觉悟，并要能够适当地去迁就他，目的在仍然保持与工人联系，不致脱离工人。等到工人觉悟之后，再去说服工人。如果在上述情况下，你不去迁就工人，过于急躁，甚至与工人形成对抗，这样你就脱离了工人。以后工人虽然觉悟了，但也不来相信你了，这样你就失掉了领导作用。

第四，要善于争取多数，来建立工会自觉的纪律。工会可不可以强制会员执行决议？要不要建立起严格纪律呢？需要的，可以的。但应该知道，工会要行使强制执行权，只有在取得了大多数会员坚决拥护的条件之下，依靠大多数人的压力，才能对极少

数无理顽抗分子行使这种强制权。工会的严格纪律，也只有依靠大多数工人自觉自愿拥护的条件之下，才可以对少数违犯纪律分子，加以适当制裁。只有依靠多数，才能压服少数。否则，如果不能争取多数，那么什么强制权、什么纪律制裁，都会变成空话。如果你勉强执行，你就会脱离群众，而让那些违反决议、违反纪律分子取得了多数来与你对抗，最后形成工会的解体。这也是最危险的办法。我们有些同志犯了这个毛病，原因就是由于他们不知道工会的权力是从哪里来的。他们以为工会权力是政府给他的，或者上级给他的。这种莫明其妙的看法，根本不懂得民主集中制。工会是一个群众团体，在组织上有其自己的独立性。政府在工会内部问题上是不加干涉的。上级工会与下级工会的一切权力，不是来自外面，来自上头，而是来自多数会员的信任。工会的权力是会员授予的。经过会员大会、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选举了委员会，工会就在这样的形式下取得了代表大多数会员的地位，并依靠大多数会员来执行大家所通过的决议。如果工会在工作过程中违反了大多数会员的意见，因而丧失了多数，那么这个委员会即使未经改选，仍然霸占工会领导机关，但他的权力已经大大削弱，他的领导已经有名无实了，因为他已经丧失了大多数，不能取得大多数会员的拥护，这样，他的力量也就可想而知了。

上述各点，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就是工会工作的基本方法。为贯彻这个群众路线，工会工作者必须培养正确的工作作风。就是需要：

（一）面向群众，深入下层。工会工作者要保持过去艰苦朴素、深入农村的精神，把工作深入到工厂中去，深入到车间中去，和广大工人群众密切联系，时刻了解工人的生活要求与政治情绪，了解工人利害所在；要真正做到与工人打成一片，了解群众每一个

脉搏的跳动。这样才能使工会每一项工作、每一个决议，都符合于工人的要求与情绪。这里要克服高高在上，坐在机关里发指示、写命令的官僚主义作风。

（二）虚心学习，实事求是。有些同志因为自己不懂生产，不懂技术，因此怕到下层去，怕接触实际问题，怕问题提出来自己不能解决时丢面子。这种不老实的态度是不对的。任何一个领导者，都不会有全才。问题在于自己肯虚心学习，真正从实际出发，有做一个小学生的精神，对问题讨论多尊重工人、专家的意见，让人家多发言，把事实弄清楚，然后再综合各人意见，加以比较取舍，得出结论，再向上级报告请示。在执行过程中，又要随时研究改正。这样，生产是可以搞好的，不懂技术也可以领导得好的。这里问题在于自己有老老实实的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要强不知以为知；处处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就可以办好。

（三）认真负责、细心谨慎。上述的老实态度，也就是对国家、对人民认真负责的革命精神。如果缺乏这种精神，对国家事业、对工人利益不负责任，马虎敷衍，只顾自己的名誉、地位、风头、面子，片面主观，粗枝大叶，这样的工会工作者，就不可能有虚心学习、实事求是的老实态度，也就不会把生产搞好，更不会把工会办好。

（四）大胆放手，信任群众。工会工作者要能随时了解工人要求与情绪，单靠自己深入下面，接近群众是不够的，必须从工人中大批发现与培养积极分子、正派分子，经过工人代表会议，大胆把他们提拔到领导工作中来，（不能自己主观提拔，不要怕群众选错），采纳他们的意见，相信他们，放手让他们办事，使他们敢于负责，不怕犯错误。通过他们去深入群众，联系群众。这样，使工会有大批工人积极分子来主持，来领导，才能逐渐成为工人自

己的工会，成为工人自己的家庭，而不是少数外来干部、官僚的工会，这样工会工作才能办得好。这就是毛主席在领导方法中所说的“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相结合”^{〔1〕}的方针。这就需要工会工作者有大胆放手相信群众的作风。我们有些同志恰与此相反，做事束手束脚，患得患失，不相信工人、干部，怕人家把事情弄坏了，不相信群众，不让工人选举自己的代表与领导人，而由自己包办一切，主观提拔，工人不选举的，我们也偏要把他提拔起来，工人选举的，我们又偏不批准。甚至有些人说出这样的话来，他说“自己革命十多年才取得今天的地位，工人干部一来就提得这样快，过几年要爬在自己上头”。这种包办领导，把持领导，不相信群众，不敢放手提拔工人干部的作法，是不对的；怕后来居上的保守思想更是错误的，必须加以纠正。

这就是我对今后工会工作的几点意见，是否符合实际情况，是否符合于今后工作需要，望大家加以研究。

注 释

〔1〕 见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二版，第 899 页。

在农村组织合作社*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六日)

合作社工作，是当前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因为我们国家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要巩固我们的国家基础，必须巩固工农联盟。要巩固工农联盟，必须帮助农民解决问题。农民要求解决问题，有三个阶段的不同，我们帮助农民也应当解决三种不同的问题。

第一阶段的问题，是剿匪反霸、减租减息、实行土地改革。因为农民第一痛苦的，是受土匪恶霸压迫和封建地租的剥削；第一迫切要求的，是推翻封建势力的压迫，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共产党之所以能取得农民的拥护，就是由于我们真正帮助了农民，使农民翻了身，给了农民以实际利益。国民党反动派也有改革土地的条文和保护农民利益的宣传，为什么它不能得到农民的拥护呢？是因为它的阶级性限制了它。它是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集团，是农民阶级的敌人。它只是用宣传口号欺骗农民，不能真正帮助农民解决问题。我们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有些地主、资本家出身的革命工作人员，是克服了本身的缺点服从无产阶级利益的，否则就被淘汰），与农民的利益是一致的。农民必

* 这是邓子恢在中南各省市合作局长会议上的讲话。

须参加无产阶级的革命才能得到解放，我们也必须依靠农民，巩固工农联盟，才能得到胜利。如果没有广大人民的拥护，单靠几条枪杆子是不行的。国民党有反动军队八百万，武器优良，终于被我们打垮，就说明了它没有群众基础。我们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才有无穷的后备力量。

第二阶段的问题，是要从商业上去剪除农民所受的中间剥削。土改后，封建地租剥削、苛捐杂税虽没有了，但商业资本的中间剥削和高利贷的剥削，却还存在。这种商业资本剥削和高利贷剥削，在某种程度上不亚于封建地租的剥削。我们要继续巩固工农联盟，不能不在替农民解决了土地问题之后，接着就替农民剪除中间剥削。假使我们不能继续不断的帮助农民解决问题，农民就不会继续喊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农民参加革命就是为了实际利益，我们要继续不断地帮助农民，以满足农民的要求，才能巩固工农联盟。

第三阶段的问题，是大量供给耕种机器、化学肥料和各种科学生产技术，使农业机械化、集体化。因为农民才取得土地而又剪除中间剥削之后，就是要求改良生产、发展生产。如不采用机器耕种，不把农民组织起来，则农民将永远落后。只有采用机器耕种，组织集体农场，改良生产技术，提高生产力，才能逐渐走向社会主义。不过现在还没有到这一阶段。

在土改前，农民进行减租减息和剿匪反霸斗争，需要的组织形式是农民协会；在土改时，农民进行土地改革、分配土地的斗争，需要的组织形式也是农民协会。土改后，农民要求的重心，转到剪除中间剥削发展生产上去了，农民协会的组织形式，就会自行衰亡，从此，在政治上就只要农民代表会，在经济上就只要合作社。不仅是剪除中间剥削需要合作社，搞生产也是需要合作社。

的。农民对于合作社的要求，是有相当长的一个时期，要到共产主义时期，社会有了更新的制度，合作社才会完成它的历史任务，而渐渐衰亡。所以说农民的组织，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辩证发展的。

同时，我们还要知道，南方农民的要求，和北方农民的要求，略有不同。北方农村中，自然经济比重较大，商品经济比重较小，农民的生产除供俸地主而外，剩下一点只够供自己生活，少有出卖的。所需购买的，也只是食盐、火柴、黄烟等少数东西，其他所需都是自给。南方农村中，商品经济比重较大，农民的生产品多半要卖，消费品多半要买。因此，商业资本在农村中很活跃，农民受中间剥削也很厉害。所以在我们中南区各地农村，农民并不等待土改后才有商业的需要，没有土改以前也很需要商业。由于战争破坏，旧的商业网垮了，新的商业网还没有完整地建立起来，农民的土特产销不出去，要买的也买不到手，所以即使是私商下乡，农民都会欢迎。当然，农民欢迎私商下乡是不得已，倘若我们能够帮助农民组织合作社，配合国营贸易下乡，建立新的商业网，以剪除其中间剥削，是会更为农民所欢迎的。由于我们中南区各省都有很好的土特产，如许昌的烟叶，河南、湖北的棉花，江西、湖南的纸张、木材，都因农民没有自己的商业组织，吃亏很大。旧例常年的市场是“七死八活九翻身”^{〔1〕}，今年不同些，由于剿匪反霸、减租减息后，农民生活已初步改善，市场活跃要早一点。如各处火车、轮船往来，莫不是载运农产品和供给农民的物资，工人、商业、小贩、码头苦力，都莫不是靠农民吃饭，替农民做事。现在国营贸易的经济阵地不大，合作社还没有组织，有些地方虽已开始组织合作社，也只是开始而已。农民还是要受残酷的中间剥削。国营贸易下乡，固然可以剪除中间剥削，但单靠

国营贸易孤军作战，没有合作社做一个同盟者配合起来，也不能充分发挥力量。因为我们今天的政策，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还要允许私人资本经营工商业，不能立即废弃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但必须大力帮助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发展，以求逐渐走向社会主义。所以我们对合作社要给予种种优待和扶助，使它发展起来。

合作社，在农村是为农民所迫切需要的，在城市也是工人所迫切需要的。城市中的工人，买卖方便，好像没有组织合作社的必要，事实上城市工人也是受私商中间剥削的。工人所得的货币工资，一经转手，货币工资便要少于实际工资，而成为名义工资，实际上买不到所需的东西。只有组织合作社，剪除中间剥削，才能保障生活。

再从目前的形势来看，我们也必须大力发展合作社，以谋稳定物价，调剂供需，保障工农劳苦群众的生活，在经济战线上争取抗美援朝的胜利。

这次中南合作会议，适时地召开了，很切合当前的需要。根据大家汇报情况看来，有些成绩，有些经验，也有些问题。关于技术问题，大家去讨论，我今天只讲四个问题：

第一，先把架子搭起来。

我们进行合作社工作，先要把架子搭起来。搭架子就是建立机构；建立了机构，才能展开工作。明年要把各县的架子普遍搭起来，县是各种工作的基础，不从县里着手，一切计划都是空的。在已经土改或正在进行土改的县，应于明年三月以前把架子搭好，其他尚未土改却已进行剿匪反霸、减租减息的县，也要开始搭架子，并限期完成。开始的架子，可用筹备委员会的形式，请有关合作的机关、团体负责人做委员，使之共同负责计划并推进一县

的合作社工作。各位这次回去，一定要同省里的党政和省财委负责人说明这一个工作的重要性，把他们的思想打通，请他们特别注意领导起来。如果省里的党政负责人不积极领导这一工作，就会搞不好的。要搭架子展开工作，就得有干部。去年我们到江南来接管时，只有五万三千干部，东北进关时只抽调两万多干部，现在已发展到九十多万。只要把工作展开了，自然可在工作中培养干部的。像我们共产党一样，有许多地方开始一个党员都没有，也要成立县委，有了县委之后，就逐渐发展了党员。合作社的工作也是一样，应当第一步就把县的架子搭起来。县的架子搭好了，就可向区、乡、村展开工作，突破一点，扩至全面。干部的来源，是一挤二挖三培养。贸易部门应当多挤些、挖些干部出来做合作社工作；工会、农会、妇联等群众团体也应挤挖些干部做合作社工作；土改干部，也可以转移一部分办合作社。贸易干部有些业务经验，群团和土改干部有些群众工作经验，都是合作社工作所需要的。从各方面抽调的干部，都给以相当的合作业务训练，训练的时间不要长，二三星期就可以。训练的课程不要多，教几项必需的知识就行。主要的作用就是叫他们见见面，实际上转到合作社工作岗位上来。专区以上的干部到中南来受训，县以上的干部到省受训，基层社的干部到县受训。切莫拖延，要速战速决。

第二，订定发展的计划。

各省市应该发展多少基层合作社，多少社员，多少股金，以及业务上要做些什么，怎样做法，都要很好地订一个计划。订计划要慎重仔细，不要订得太高了，也不要订得太低了，计划一经订定出来，就要切实执行。有计划，就可以按照工作计划的要求调配干部，搭起架子，推动工作。有计划，也可以实行工作检查，以后开会大家可汇报工作的成绩，举行工作竞赛。谁按计划完成

百分之百，谁的工作超过计划，谁没有完成计划，都可以把计划作为检查工作的标准。没有计划，就只好检查工作。

第三，开始就搞好业务。

我们做合作社工作，要和唱戏一样。唱戏的在正戏出台之先，要响半天锣鼓。我们组成合作社，也应该是有了有一部分社员，收集了一部分股金，就开始经营业务，不必等到万事俱全后才开始营业。如同做土改工作一样，必须先行试点，使群众看到事实。因为群众是最现实的，不能在群众面前卖狗皮膏药。群众主要的要求是能买便宜东西，有便宜东西买就会参加合作社。所以办合作社不能开空头支票，要很快地兑现。一经有人入社缴股，就迅速地把业务搞起来，给他们买便宜东西，群众一见到合作社不是说空话的，确有便宜东西可买，没有入社的自然会踊跃入社，没有缴股的也自然踊跃缴股。像湖北黄冈高庙村组社的经验，就是这样。它在开始组织合作社的时候，群众并不踊跃，一到开始营业，群众见到有便宜盐买，又高价收购他们的花生、苕麻等土产，都自动地要求入社。湖北黄冈一个老太婆说：“只要准我入社，我可赌咒发誓改脾气，以后不再同人吵嘴打架”。就是很显然的事证。

合作社的业务，就是三件事：（一）供给社员必需品，使有便宜货可买；（二）推销社员生产品，使能卖到较合理的价格；（三）给予低利贷款，使能活动资金不受高利贷剥削。合作社要搞好这些事，非靠大老板帮助不行，贸易部和人民银行，都是大老板，应该大力帮助合作社。将来，合作社自己也会做大老板。到合作社自己能做大老板的一天，我们国家就好了。我们财委应当在如何把合作社快变成大老板一点上，多想办法。过去老区的合作社，办得不够好，就是没有大老板帮助。现在有了帮助合作社的大老板，事情就好办了。现在大老板帮助合作社的工作，还做

得不够。贸易部和人民银行，在上面是知道要大力帮助合作社的，没有问题；在下面的贸易部门和银行部门的工作人员，却还不免有些不懂政策，不了解帮助合作社的意义，没有很好地帮助合作社，甚至发生矛盾。今后贸易部和人民银行在领导上，应当好好地指导下面，务必大力帮助合作社，莫抱本位主义或赚钱思想。同时，贸易部门和银行部门的人员，对待合作社工作人员还应该特别尊重些，应接之时，言语态度要客气亲切；不要以为合作社工作人员是求你帮助的，你就在他们面前骄傲起来。要知道合作社是你们的同盟者，如同好兄弟一样。假使物价波动时，就必须银行、贸易和合作社结合起来干，才有办法。合作社搞不好，银行和贸易也搞不好。合作社搞得好，银行和贸易才搞得不好。我们有了合作社，就不怕物价波动，不怕奸商投机倒把扰乱市场，只要我们的人民银行、贸易公司和合作社很好地配合，就什么都有办法。

第四，要走群众路线。

合作社是群众性的组织，办合作社一定要走群众路线。所谓群众路线，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十个字。凡不是从群众中来的东西，就不能到群众中去；凡是从群众中来的东西，就自然能到群众中去。假使合作社的干部，不听取社员的意见，单凭个人主观主义，自我作主出主意，一定行不通。因为合作社的老板在下面，不在上面，社员群众就是合作社的老板，伙计做事不听老板的话，一定垮台。合作社与银行、贸易公司，不同的地方也就在这里。银行和贸易公司是国家机关，要受上面的指挥做事；合作社是工农群众组织，必须根据群众的需要经营业务。合作社如果搞得不好，脱离了群众，社员即使不退股金入社，但他们只要不同你做买卖，你就垮了。

同时，做合作社工作的人员，还要能与群众打成一片，生活要群众化，言语要通俗化。假使你的生活不群众化，群众望见你就跑开，你就没有办法接近群众；假使你讲话不通俗化，群众讲话你不懂，你讲话群众不懂，那你就与群众差了十万八千里。不能做事。像许昌于庄的群众说：“业务”二字大家不懂，不如改称“生意”；“会计”二字大家不懂，不如改称“帐务”。“业务”、“会计”两名词，文雅些；“生意”、“帐务”两名词，土俗些。文雅了，群众不懂，土俗些，群众易懂，又何必不通俗呢？

再就业务经营的技术说，如果合作社的干部不懂经营业务的技术，也会脱离群众。假使你不懂季节性，在六月天里买皮袍子；不懂货品规格和群众习惯，群众要粤盐你买浙盐，群众要浙盐而你买粤盐；或不懂市场情况变化，看得要跌价的东西，你偏偏大量买进，看得要涨价的东西，你偏偏大量卖出，那你就脱离了群众，非垮台不可。

所以我说：一个合作社里，至少要有三种人才：一个会做群众工作的，一个会办业务的，一个会记帐的。群众团体的干部和土改干部，都有群众工作经验，要转移一些办合作社；贸易系统的干部，有些业务经验，要多抽调一些办合作社业务工作；记帐的干部，也可以向银行方面抽调些，或培养些，如一时找不出许多能记洋帐的人，有能记土帐的人也可以找来。班子配好了，才好唱戏：

注 释

〔1〕 七死八活九翻身，指农村市场情况一般是，七月停滞，八月开始活跃，九月兴旺发达起来。

关于土地改革的几个基本问题*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现在各地土改运动正由试点阶段，逐步转入面的展开。我特就下列五个问题，作一次广播。

一 土改的政治意义

有些同志把土改认为只是简单的分配土地，把分配土地当作单纯技术工作，片面地了解土改仅仅是为发展生产的意义。这种看法是不对的。要知道土改是中国现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内容。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是反帝反封建。今天的抗美援朝是反帝，而土地改革则是消灭封建势力最后的而又是最激烈的一场有系统的阶级斗争。百年以来，封建势力一向成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主要帮凶。我们在土改中彻底消灭了封建势力，也就永远铲除了帝国主义利用中国内部敌人实施以华制华政策的阶级基础，因而也就更加强了中国人民抗美援朝反帝反侵略的雄厚力量。从此就可以看出，土改不仅是为了发展生产，而是中国人民完成革命任务，立国于现代世界的根本大计。大家知道，与帝国主义这

* 这是邓子恢在中南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讲话。

个大敌人结合在一起的封建势力、地主阶级，不是一个软弱无力的敌人，而是有着二千多年的统治历史，有着深厚的统治力量的。在军事力量上，他们不仅过去有全国性的国民党正规军与地区性的保安团和乡保队，而且有土匪、会门武装作外围，有流氓打手作爪牙，自己还有所谓“自卫”武装。在公开武装被我们消灭之后，许多地方还组织了地下军。在政治力量上，不仅过去有自上而下的国民党政权组织系统，而且有遍及每一个乡村、每一个角落的保甲制度。在保甲制度被我取消后，他们摇身一变，又利用其走狗或老实农民出来当村长，组织假农会，实际上仍然掌握乡村政权，保持他们在乡村的政治优势。这种乡村，就中南来说，现在仍然占相当大的比例。在经济力量上，他们占有一半以上的土地与财富，控制了广大农民赖以生存的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直到今天，大部分地区农民的生存，基本上仍然仰赖于地主。在组织力量上，不仅过去有国民党、三青团与特务组织，现在仍然用各种封建形式，如帮会、道门等，去组织农民受他们愚弄，他们还有一批坚决反革命人物，作为各种组织的骨干。在思想影响上，他们不仅有善于强词夺理，造谣欺骗，威胁恫吓，挑拨离间，拉拢收买伎俩，而且有由于他们长期统治所造成的，现在仍大量存在的农民落后性、地方性、迷信、愚昧心理、宗派观点等弱点为其所利用。自朝鲜战争发生以来，一般特务、恶霸分子，更善于利用农民中仍然存在的变天思想，大肆其“三次大战”，“蒋匪反攻”的威胁。

分析了上述各方面的力量，就可以知道要消灭地主阶级这个残酷而又顽强的敌人，并不是容易的事，而是需要经过有步骤、有系统的联系各方面的极其激烈的阶级斗争。我们过去，在与这个敌人作斗争的经验，一般是要在军事上先消灭其正规武装与地方

团队，再消灭其外围武装（即土匪武装，会门武装），以后再收缴其分散隐蔽的武器在政治上先摧毁其上层政权（即国民党中央与省、县政府），再摧毁其基层政权（即保甲制度），最后还要在每一个乡村、每一个角落，打倒其统治威风与政治优势，而确立农民对地主的革命专政。在组织上先解散其反动的政治组织（如党团特务等），再解散其一般的封建组织（经过一定时期宣布会道门及类似组织为非法），而最主要的是要在剿匪、反霸及镇压反革命中消灭其坚决反革命人物，以摧毁他们的组织基础。在思想上要不断揭穿其造谣欺骗，挑拨离间，拉拢收买的阴谋诡计，以启发农民觉悟。目前则要在农民中，开展抗美援朝运动，以揭穿其威胁恫吓的伎俩，而最主要的是要在不断斗争过程与诉苦运动中，提高农民的阶级觉悟，使广大农民分清敌我，在思想上完全摆脱地主阶级的影响，使地主无所施其伎。在经济上，则从削弱封建剥削到最后的消灭封建剥削，即从减租、退押^{〔1〕}、清债，一直到没收封建财产，分配土地，从经济上剥夺地主阶级的剥削工具，因而从根本上消灭封建剥削制度，消灭地主之为阶级。这就是反封建斗争的全部过程。只有这样从军事、政治、组织、思想、经济各方面彻底摧毁了地主阶级的力量，才算把这个有二千年统治历史的最顽强的敌人——封建势力打倒。而实行土改，没收封建财产分配土地，则是全部反封建斗争中最后的也是最激烈的，而且与各方面密切配合的斗争阶段。如果离开这一系列斗争，离开各方面斗争的配合，而把土地改革仅仅看作简单的分配土地，看作单纯的技术工作，这就要在原则上犯重大的政治错误，这就是各地产生和平土改的思想根源。这样的结果，是要把土改引导到失败的道路。各地之所以产生和平土改现象的另一个原因，是片面的了解土改仅仅在经济上发展生产的目的，而不了解在土改中从

政治上消灭封建打倒敌人，以建立农民的革命专政，正是为了大规模发展生产创造前提条件。只有彻底打倒了封建势力，使广大农民从封建制度束缚之下完全解放出来，中国的农业生产力才能大大提高，国家工业化才有可能。为了充分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封建势力，确立农民对地主的革命专政，即使在斗争中出了一些乱子，即使在土改后一个时期因土地分散而减低了一些生产力，也是在所不惜的。列宁在一九二〇年向共产国际报告土地问题提纲初稿中说：“无产阶级为了这个革命的胜利，决不能因为生产暂时下降而裹足不前”⁽²⁾。他说：“对资产者说来，重要的是为生产而生产，对被剥削劳动群众说来，最重要的是推翻剥削者，保证劳动者有条件为自己而不是为资本家工作。无产阶级的首要的基本的任务，就是保证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和巩固这一胜利”⁽³⁾。列宁这些话虽然是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土地改革而说的，而当时西欧各国正是处在领导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艰苦斗争过程，与我们今天革命已在全国胜利，国内战争基本上已经结束的情况有所不同，似乎我们不应强调政治作用，这种想法也是似是而非的。中国革命今天虽然已在全国胜利，国内战争基本已经结束，但应该承认新区人民政权，还是不大巩固的。我们只控制了上层政权，基层政权大部分仍在封建势力手里，匪患尚未肃清；在国际环境上，帝国主义正在积极准备与制造三次大战，虽然世界人民民主力量有强大力量来制止新战争爆发，但大战危险性仍然存在的，朝鲜的局部战争也尚未解决。这种国内外情况，就要求我们要强调在土改中，彻底消灭封建势力，确立农民专政，以巩固革命的胜利，保证劳动者确有为自已而生产的条件。离开了这个原则，片面的强调生产，甚至因害怕生产力暂时降低（实际上并不可能），而不敢在政治上充分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封建势力，这种作法是违反马

列主义的，是与人民革命利益不相符合的，也与发展生产的利益不相符合。显然，如果我们在土改中不能彻底打倒封建势力，不能充分发动群众，不能在每一个乡村，每一个角落，真正建立起农民的革命专政，那么万一战争爆发，那时封建势力到处骚动，影响到我们的后方治安与交通运输，影响到我们的兵源粮源，其结果将要影响到战争前途，影响到政权巩固，同时也必然要影响到生产不能发展，这是可以断言的。再就发展生产本身来说，也需要在土改中有充分的群众发动与彻底的打倒敌人，需要有真正的农民革命专政。没有取得这些条件，而想在封建势力残存，农民经济要求未能满足的情况下，提高农民的生产情绪与生产能力那是不可想象的。相反的，如果彻底打倒了封建势力，没收了他们的土地财产，解决了广大农民的经济要求，那么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与生产能力就自然会大大提高，农村生产力就要大大发展，这也是可以断言的。一切和平土改现象，及害怕群众运动会妨害生产，因而不敢放手发动群众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必须彻底加以克服和改正。这是贯彻中南土改的先决条件。

二 土改的基本内容

土改的基本内容是什么呢？可以用两句话来说明，就是“为了雇贫，依靠雇贫”。大家知道，中国土地制度之所以发生问题，所以需要改革，就是因为在旧的土地制度下，产生了大批无地少地的雇贫农。如果农村当中很少雇贫农，如果中国农民绝大部分都有土地，都是自耕农，那么我们的土改就是多余的了。所以我们土改的基本要求，就是要满足雇贫农的土地要求，并适当解决他们的生产资料，使他们普遍得到土地，由雇农、佃农、半自耕

农变成自耕农。而在分得土地后又能及时耕种，并进一步精耕细作，加工施肥，兴修水利，以大大发展农村生产力；在政治上则大大提高雇贫农的觉悟性与组织性，形成农村革命专政的中坚，从而彻底消灭封建，打倒敌人。这就是我们土改的主要目标。为了满足雇贫农的土地要求，并适当解决他们的生产资料，就必须彻底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财产，并征收富农的大量出租土地，与特殊地区及在农民坚决要求下的小量出租土地。不如此，就不能解决雇贫农问题。对开明地主及其他人们的照顾，必须在解决了雇贫农要求的条件之下，才是适宜的。如果抛开雇贫农要求不去解决，而只讲照顾这、照顾那，这不仅违反土改的基本政策，而且是立场上有问题的表现。近来有些地方干部，为法律条文所束缚，这也不敢动，那也不敢动，而地主反而利用条文来抵抗与破坏土改，因而引起农民不满与情绪消极。这种条文主义必须改变。须知土地改革法与各地补充法令，应作为农民向地主斗争的武器，而不应作为地主抵抗土改的工具。有许多事情，条文上是规定不了的，这就应该让大多数雇贫农提出意见，呈报政府去加以补充。有些条文可作各种解释的，就应该根据雇贫农的利益去加以解释，而不应该解释到对地主有利，而对雇贫农反而不利。有些地主财产的没收，在某些条文上是加以限制的（如不准追挖底财），但在另一些条文上，又准许农民用别的方式适当加以处理（如追索被分散转移的财产，赔偿破坏与清算退租退押等）。对守法地主，法令上允许其保留应没收以外的其他财产，但对反抗和破坏土改之顽固不法地主，法令上并未允许他同样保留。对一般地主与中小地主的财产，不应该全部没收，但对人人痛恨的恶霸地主与有反革命罪行的大地主，经过县政府批准为什么不可以全部没收？所有这些，都为了一个目的，就是要在土改中用各种办法去满足雇贫

农的土地要求，并适当解决他们的必要的生产资料。对这个问题解决得越好，土改就越有成绩，解决得不好，或者基本上没有解决，土改就没有成绩。因为这是土改的基本要求，否则，土改就成为形式的了。但这里应该告诉雇贫农，他们的要求，只能在反封建中，向地主的土地财产及富农出租土地中去解决，而不能在中农身上打主意，不能向工商业者打主意，也不能向富农自耕土地及富农其他财产打主意。地主财产有限，而雇贫农要求则难以完全满足，因此，雇贫农要求应约束在法令范围之内，不应发展到平均主义与破坏自己法令的行为。这样做，是对革命不利的，对社会经济不利的，对雇贫农的长远利益也是不利的。要放反封建之手，不能放反资本之手，要放合法斗争之手，不能放非法斗争之手，这个界线必须向干部说清楚，向雇贫农说清楚。绝不能再重复华北、山东土改末期那种到处挖底财，普遍侵犯工商业，无例外扫地出门的过左行动。

土改基本任务，既是为了适当满足雇贫农的要求，因此土改也就主要依靠雇贫农，并团结中农来进行，依靠雇贫农自己去解放自己，而不能单靠别的阶层来替雇贫农谋利益求解放。所谓土改总路线“依靠雇贫，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消灭地主”^{〔4〕}这四条方针，必须分清主次，区别先后。只有依靠雇贫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才能消灭地主，这是一个统一战线的看法；只有依靠雇贫农，团结中农，而后才能中立富农，消灭地主，这已是进一步的看法；但这种认识，还是不够的，必须再进一步认识，只有依靠雇贫农去团结中农，而不应是依靠中农去团结雇贫农。这就是说我们要依靠无产半无产阶级，去团结小资产阶级，达到中立资产阶级，消灭封建，而不能依靠小资产阶级来团结无产半无产阶级。也就是说我们要在土改中建立在我党领导下无产半无产阶级

的领导权，才能彻底消灭封建完成土改，并为土改后大大发展生产，将来再走向农业集体化打下阶级基础。这才是我们党胜利完成土改最正确的阶级路线，也才是我们在农村中大规模建党的正确的组织路线。各地试点经验证明：凡是正确执行这条路线充分发动雇贫农，而又能团结中农的，那里的土改就可以顺利进行，土改试验，就有成绩；相反的，凡是依靠中农领导，而不敢放手发动雇贫农的，那里就出现和平土改，就出现土改不彻底，就出现与地主妥协的现象，或者就无力克服村与村、族与族、房与房之间的宗派纠纷。这种不同做法，不同现象，并不足为怪，这是两条不同阶级路线的必然结果。这是马列主义与非马列主义领导的必然结果。

因此，各地在土改中必须特别强调依靠雇贫农。在尚没有农会组织的地区，必须先从组织雇贫农着手，组织到一定人数时，再去吸收中农参加。在农会领导机关中，必须保证雇贫农成分占三分之二，中农只占三分之一。在已有农会组织的地区，应单独召开雇贫农大会或雇贫农代表会议，凡事先由他们提议，然后再提到农会讨论与通过，以树立雇贫农核心领导作用。为保证雇贫农有经常组织而又不刺激中农，可由雇贫农大会或代表会议产生主席团，以为经常领导机关。在农会为中农所领导的地区，雇贫农代表会议，必须通过雇贫农积极分子，在斗争中提出自己的彻底主张与坚决行动，来取得大多数群众的拥护，并对妥协分子与妥协行为进行适当的批评，对破坏分子则应与之斗争，选择适当时机改造农会，以树立雇贫农领导。但决不可因此把所有中农分子，排斥于农会领导之外。各地应该有区别地运用过去华北华中的成功经验。过去华北某些地区所执行的雇贫农路线，其错误主要是抛去了中农，其中坚决依靠雇贫农，发动雇贫农，首先组织雇贫

农的作法，并不是错误的而是正确的。要知道中农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者，他在农村人口中占百分之二十至三十左右。谁抛去了中农，谁就要失败。团结中农，是我们党与人民政府的基本政策。但应该知道中农是软弱的，是有妥协性的，在土改中中农在经济上基本上是不进不出的，因此中农不能成为农民的领导者，尤其不能希望他来领导土改。但就旧社会经济地位来说，在农民运动中特别是在农运初期，中农又常常容易成为农民的领导者。现在各地农会中中农领导也可能占多数，而要雇贫农去领导中农又有许多困难，许多中农也常常存在着看不起雇贫农的观点，而不容易接受他的领导。因此，在农会领导机关中就必须确定雇贫农与中农三与一之比，以建立共同领导。而雇贫农要在土改中起领导作用，就必须依靠自己在斗争中的彻底主张与坚决行动，配合着对某些妥协分子与妥协行为进行适当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而不可简单地用行政命令去改造中农领导。只有依靠雇贫农的充分发动并对中农采取这种方针，才能达到团结中农的目的。明乎此，就可以知道依靠雇贫农，在整个土改过程中有着何等重大的意义。

三 土改的基本方法

土改的基本方法，也可以用两句话来说明。就是先改革政治而后改革经济。土改是要把二千年来统治中国农村经济的封建剥削制度，加以基本改变，而这个制度之所以保持到今天，不仅依靠于封建买办上层政权在中国的长期统治，而且依靠于地主阶级在每一个乡村、每一个角落，保持着绝对的政治统治，来压倒农民的反抗。因此，我们今天要彻底改变这种经济制度，就必须先改变维持这种制度的政治优势。当然今天在全国范围内，在大天

下里，人民力量已经占了绝对优势，但在不少农村，在那些小天下里，则阶级力量的对比，却存在着相反的情况。在这些地方，优势不是属于农民，而是地主阶级仍然占着优势，或者相对的优势。在这些地方，地主仍然保持着非法的武装（土匪与隐藏武装），或者控制着我们的民兵，乡村政权仍然为地主所公开把持或暗中操纵。在这些地方，恶霸尚未打倒，农民尚未起来，农会尚没有组织，或者组织得不健全、不纯洁。在这些地方，农民仍然受地主欺骗蒙蔽或者害怕他。总之，这样的地方，阶级力量的对比还没有显著变化，或者基本没有变化，因此经济制度也就无法改变，或者只是形式上改变。许多地方减租不彻底，或者明减暗不减，甚至根本没有减，就是明证。大家想想，在这样的地方，如果不从根本上发动群众，把土匪肃清、恶霸打倒、地主武装转移给农民，把地主所把持操纵的农会、民兵及乡村政权加以改造，使当地农民与地主的阶级力量对比，来一个根本改变，彻底打垮地主优势，而确立农民优势；如果没有一系列的斗争，没有这种政治上的基本改变，那么尽管我们在一省一县的大天下里占着优势，而在那个天下里却仍然无奈他何，也就没有办法去进行土改。如果你要勉强土改，那就会改得不彻底，或者明改暗不改，这是可以断言的。因此，在这样的地方，如果我们要实行土改，就必须首先从政治上改变当地的阶级力量对比，这就是说要首先消灭地主阶级武装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各种公开与暗藏力量，而建立起以雇贫农为中坚联合中农的武装力量、政治力量与组织力量，这样来达到彻底打垮地主优势，确立农民优势，真正建立起农民对地主阶级的革命专政。只有这样，地主才不敢反抗与破坏，才肯服服贴贴地接受农民的支配。这样我们才能顺利完成土改而达到经济制度的根本改变。

如何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当地阶级力量的对比？如何才能转变这种优势？从上而下的行政力量与军事力量的支持与援助是必要的。但主要还是依靠于当地雇、贫、中农与地主面对面的阶级斗争。离开当地农民内在的阶级斗争而想单纯依靠行政力量用外力来改变这种优势，官办土改，那是不可能的。因此，要完成土改，就必须依靠于当地雇、贫、中农的充分发动，就必须放手发动群众，而不是要束手束脚，顾虑太多。必须根据实际需要，满足雇贫农要求，而不要光讲照顾，致雇贫农感到所得不多，劲头不大。

在群众尚有顾虑的地方，就必须首先领导群众去除这种顾虑。如当地尚有土匪活动，就应该帮助群众肃清土匪；如地主手里尚有隐藏武器，就应领导群众加以收缴；如特务恶霸与反抗土改的不法地主尚未惩办，就应该发动群众与之斗争依法惩办；如农会、民兵及乡村政权中尚有他们走狗，就应该通过群众加以清洗和改造。

在群众觉悟不高，土地要求尚不十分迫切的地方，就应该先从解决当地群众最迫切的要求着手，如减租退押、清理旧债、调整公粮、治水救灾等，从解决这些最迫切要求的斗争中，去提高群众的觉悟，组织与整顿农会、民兵，树立雇贫农领导，而后再转入土改。

在群众已经相当发动起来，而尚需要从政治上打击地主的地方，就应该让群众显显威风、出出气，不要束缚与干涉群众的行动。即使有些过左行动，只要真是广大群众自己的反封建行动，也不该当场泼冷水，而应事后加以说服纠正。在地主及党内外人士大叫大喊的时候，领导者应保持冷静态度，具体分析情况，表扬优点，纠正偏差，使运动继续发展，不要为叫喊所吓倒而手忙脚乱，过早公开纠偏，致影响群运开展。但应该知道这不是不纠偏，

只要发现有偏向，就应该耐心说服教育。尤其是发现干部有过左行为，更应该及时纠正。这种过左行为，即使只是刚刚萌芽，也应该克服。否则，其结果会要脱离群众，会阻碍群众的发动。这不是放手，而是放任，而放错了手；不是放群众之手，而是放少数干部之手；不是放干部之手去发动群众，而是放干部之手去脱离群众。这个方针必须坚持，决不是一说放手，就可以无边无际的放，就可以乱放，不问放谁的手，放什么事情之手，而必须认清目的，看清对象，正确的放。要放雇贫农之手，而不能放流氓之手；放广大群众之手，而不能只放少数积极分子与干部之手；放干部去发动群众之手，而不能放强迫命令包办代替之手；放合法斗争之手，而不能放非法斗争之手；放反封建之手，而不能放反资本之手。这些界限，必须弄清，不能含糊。因此，运动一开始，领导者就要注意纠偏，注意防左，注意政策，而不是不纠偏，不防左，不要政策。只是纠偏方式要注意，不要去泼冷水，不要当地主面前去公开批评，而是要用说服检讨方法，在农民内部去进行教育，在农民多数拥护下，订出几条纪律，使大家遵守。对干部偏向问题，也要查明真相，说明利弊，去说服干部加以纠正，加以防止，而不要公开指名批评，戴大帽子。如非严重偏向，更不应当作主要偏向去反。

至于群众已经起来，敌人已经完全打倒，群众优势已经确实建立的地方，就应强调防左，强调策略，群众斗争应适可而止。对不同敌人，应分别对待，该照顾者应予照顾，该拉者应主动拉一下，该纠正的即予纠正，该批评的应适当批评，以便争取多数，分化敌人，巩固团结，巩固胜利。只有采取这些方针与步骤，才能充分发动群众，打倒敌人，消灭封建，完成土改。

四 土改运动发展的基本规律

土改运动的发展，仍然应该依照“由点到面，点面结合”的规律，不仅在一个县一个区应该从一个乡村做起，即在一个村庄中也须从几个积极分子开始，而后通过他们逐步介绍，慢慢发展起来，最后发展到全村、全乡。这是一切革命运动与群众运动正常发展的基本规律，不管你愿意不愿意这样做，只要你真正想把运动搞好，就非得这样做不可，这是我们党二十多年来各种运动经验的总结。为什么革命运动与群众运动必须由点到面，而又点面结合呢？我想有三个理由：第一就是革命发展不平衡。这一县与那一县，这一乡与那一乡，封建势力强弱不平衡，群众觉悟程度不平衡，群众斗争情绪与组织力量更是不平衡。因此，阶级力量对比也就不平衡。这种不平衡的程度在新区尤其显著，有时同在一个县内，这一区与那一区这一乡与那一乡，这种不平衡程度有如两个天下，常常这一乡已实现了农民革命专政，而另一个乡的群众却仍然受着封建势力或明或暗的支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改革运动又不能单靠外力与行政力量来包办代替，而必须依靠当地的群众发动，因此要使运动普遍开展，就不可能一下子把各乡各区全面铺开，而必须首先突破一个村一个乡，以后再依靠这个乡村作基点，来扩大影响，创造经验，并利用这个乡村积极分子的社会关系，向周围乡村一个一个去突破。这样依据各乡村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步骤，逐村作战，步步为营，慢慢改变这种不平衡状态，最后才能使运动发展到全区全县。如果不照顾这种不平衡情况，而想一下子在各乡动手，所谓村村放火，户户冒烟，要求齐头并进，平衡发展，那么运动不仅不能全面展开，有时连

一个点也突破不了。这就是运动要由点到面发展的第一个理由。第二，是干部条件不够，如果我们有很多干部，干部又有群众工作经验与土改经验，能正确掌握政策，每区每乡可以摆上一二个，那么我们便可以比较迅速比较普遍的开展土改运动，但是在革命迅速发展过程中，我们的干部条件，总是远远落后于客观形势的需要。特别在中南区，地区太大，干部太少，而真正有群众经验与土改经验能正确掌握政策的干部则更少。常常一县只有一二个，有的县甚至连一个都难找。因此，我们要把土改搞好，就不能过于性急，不能想一下子就全面进行，而只能根据具体的主客观条件，采取由点到面的办法，先集中力量搞一个乡或几个乡，调有经验的干部去领导，求得把一个乡做好，以取得经验，来教育所有土改干部与群众，并从该乡积极分子中挑选优秀分子培养成为新土改干部。如此做好一二个乡，便可以教育和培养十几几十个干部出来。第二步再分到别区、别乡去突破点，创造点。如此在一个县范围内，第一个月创造一二个基点，第二个月即可以创造六七个基点，第三四个月即可以创造十几个以至几十个基点，同时依靠这些基点又向四周推广。这样搞得好的，三四个月就可以普及全县。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这样一方面可以完成土改，一方面可以培养干部，另一方面又可以掌握政策，不致出大乱子，这就是第二个理由。第三，是要在实践中去发挥创造性，人是有创造性的。但一般是先有模仿性，而后再发挥创造性。小孩如此，大人也是如此。群众如此，干部也是如此。土改是一个新的工作，群众没有经验，绝大部分干部也没有经验。虽然有了各种法令文章与指示，但拿到乡村去执行，还要经过一个实践摸索的过程。只有把一个乡村真正搞好了，做出榜样来，以后别的干部才能仿照这个榜样，拿到别的乡村去办。这样开始是模仿，以后便能推陈

出新，发挥各人各地的创造性，而创造许多新的经验出来。因此，开头一个乡村榜样搞得与不好，关系非常重大。这就要求各地委各县委在布置基点的时候，要非常慎重，要根据当地客观情况与自己的干部条件，来决定基点之多少与快慢。原则是不要性急，宁少勿滥。而在一点突破之后，要布置新的基点时，必须从成功的基点中去抽调干部，不要单纯贪图数目，单靠训练班去培养干部，而忽视经验之选择，与本地干部之提拔。

运动在一点突破之后如何发展到面，通常采取两种方式。一种是波浪式发展，即由已经突破之基点村，向周围乡村推广。通常把一个基点村搞好，可以推动和帮助几个以至十几个村起来，而且可以产生大批干部。因此，在布置基点村时，可先将乡之范围大体划定，在基点突破后，即可以此基点村干部为中心，吸收别村干部成立乡级领导机构，再由他们去开展全乡工作。这是运动发展的一种方式。另一种方式是跳跃式发展。在一个基点开始突破之后，县区领导机关，即可根据当地具体情况，将突击此基点的干部抽调一部分往别乡别区再去开辟基点，以后又靠此新基点向周围推广。照一般经验，把一个基点做好，除留下少数干部就地深入巩固外，可以培养出三批干部去开辟三个基点。如此第一个月去搞开一个基点，第二个月（实际上第二次并不要一个月）便可搞开三个基点，第三个月即可搞开九个基点，第四个月即可搞开二十七个基点，而这些基点又同时向四周推广。如此开头虽慢一些，但以后就可以几何级数的速度迅速发展，而这些新基点又是依靠老基点成功的办法去进行，干部都有了一套经验，不致于犯大错误，因此这种发展方式又是最稳的办法。这就是波浪式与跳跃式发展交互结合的发展过程。在这种又稳又快的方式下发展起来的运动才算有基础，才经得起大风浪。这是一劳永逸的作法。

现在各地一般都采取这种方式依照这种规律去开展土改运动，这是很好的。但还有些地方过于性急，不遵照这种逐村作战步步为营的作法，而采取村村点火大轰大嗡的作法，有些地方甚至仿效部队在操场上下操的办法，在一县范围内规定第一个五天实行丈田，第二个五天划阶级，第三个五天分配土地。这种作法是十足的主观主义的作法。因为他忘记了我们依靠以进行土改的队伍，并不是那种吃公粮有组织有训练的队伍，他否认了革命发展不平衡的基本情况，否认了先摹仿而后创造的认识过程，他更看不见我们干部缺乏的具体困难，或者他不承认土改运动是要在党的领导之下去进行。总之这种作法是对群众运动一窍不通的作法，这样做不仅徒劳无功，而要把土改搞乱。希望各地同志坚决改变这种全面进行的作法，并防止过去已经失败的大轰大嗡的错误作法。

运动的发展除了上述由点到面以外，还要加上点面结合。这就是说不仅要靠点来推动面，还要以面来配合点，这需要县、区领导机关在布置工作时注意下列几点：

（一）在布置力量时应按照自己的干部条件，有重点次重点的配备。如果可以配备几个重点，则重点的选择应注意适当距离，以便将来易于配合与呼应。

（二）在开始布置工作时，就应将区乡范围缩小，大体划定，并分配基点村发展任务。

（三）在一点突破之后应迅速向全区全乡传播胜利消息，传播经验，扩大影响，以资推动，并有计划的动员邻区邻乡农民，派代表到基点村去参观，取得联络。

（四）在每一个重点突破之后，应注意抽调干部布置新基点工作，但要照顾到老基点之深入与巩固，不可一下子将干部调光。

（五）在工作开始或几个基点村已经突破的时候，应适时召开

全区全县农代会，讨论土改法，并介绍基点村工作经验。这个代表会的作用，主要是扩大宣传，交换经验，发现积极分子，便于突破基点时找到线索。

（六）应适时召开全区性的联合斗争大会（如反破坏），公审大会，示威游行，或祝捷大会等，以扩大影响，推动运动向全面展开。

（七）县区委适时总结基点村工作，要吸收全县全区土改负责干部参加，以便介绍经验，发扬优点，指出缺点，推进工作。

（八）此外县区委必须亲自抓紧以土改为中心，并使各方面工作围绕着这个中心来进行。如布置军队剿匪、公安部门镇压反革命、人民法庭惩治不法地主，财经机关加强税收，及时收购土产等，造成全面运动来配合土改。为了加强土改力量，可从各部门抽调一部分有经验干部参加突击，但不可抽调过多，致妨碍各部门的日常工作。这种过多抽调，不仅所调干部对土改帮助不大，而因此过分削弱了各部门的经常工作，一方面会使土改运动得不到各部门适时配合，另一方面还要使党委同志陷于日常事务之处理。这并不是加强中心工作，而是反而削弱了中心工作。

五 土改的基本步骤

土改既是整个反封建斗争过程中最后的而又最剧烈的一个重要阶段，因此就广义来说，土改是包括着剿匪反霸、减租退押，以至分配土地三个阶段。如就狭义来说，则除开剿匪反霸，减租退押两个阶段，单就分配土地这个阶段来说，按照目前各地具体情况，大体可以分作下述四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应以反破坏、反分散、反抵抗为中心，达到打

倒恶霸、镇压反动、发动群众、整顿队伍、培养干部（不仅要以此提高县区指导干部，而且要培养大批与地主冲锋陷阵的乡村本地干部），为划分阶级、分配土地做好更充分的准备工作。当然这只是主要口号。除此之外，各地应根据具体情况，提出其他口号，如肃清潜匪、特务，收缴地主武装，清算退租、退押等。在这些斗争中，政府应坚决撑腰，该抓者就抓，该罚者就罚，该杀者就杀，该管制者加以管制，务求在这个斗争中，把地主威风完全打落，群众优势确立，队伍组成，本地干部挑选好，以便于下一步农民能够顺利处理地主的土地财产，而不致遭受抵抗。

第二个步骤，是划分阶级。在第一个步骤完成之后，地主威风已完全打落，富农已不敢附和地主，雇贫农已敢于抬起头来，中农团结好，农会、民兵、政权已经整理过、改造过，领导核心已经形成，这个时候，就应转入划阶级，定成份，以便分清敌我，巩固阵营。在划阶级中其他成份都容易定，也不必斤斤计较，最难定而又最主要的是地主。因为划定地主之后，就要没收他的土地财产，这必然要引起地主的激烈斗争与抵抗。要战胜地主完成这一步，就需要依靠雇贫农的坚决斗争，需要紧紧团结中农，还需要争取富农守中立，因此就不是靠几个干部或少数积极分子强迫命令包办代替可以完事，而必须走群众路线，必须使大家明白阶级标准，必须让大家民主讨论，必须准许地主申诉，必须呈请上级批准。这就是所以要采取讲阶级、评阶级、通过阶级、批准阶级四个步骤的道理所在。

第三个步骤，是分配财产与分配土地。这是土改过程中斗争最剧烈最复杂的一个步骤。因为这是从经济上消灭地主之为阶级的具体实施，同时也是雇贫农是否实际得到利益及雇贫农与中农之间团结得好不好的关键，因此，这是土改搞得好与不好的主要

关头。负责土改的同志，必须用全力谨慎小心来处理这个问题。根据过去一般经验与今天的具体情况，处理这两个问题，应采取以下方针：

（一）对一般中小地主与守法地主财产之没收与分配应采取先留后分的原则，而对恶霸地主与不法大地主则应采取先查封没收后酌量给予的原则。

（二）对没收财产之分配，应采取缺啥补啥，缺多多补，缺少少补，不缺不补的原则。经过以雇贫农为中心加上中农组成之没收分配委员会，根据群众自报公议，多数通过的意见执行之。对没收财产之保管，须选举朴实可靠者负责，切忌干部多分，贪污舞弊与任意损坏和浪费。

（三）对地亩之调查，不要采取普遍丈田的方法，这是没有用的。而应该按自然村或某几个屋场，以雇贫农小组为中心，吸收中农、富农参加，分头开会，采用自报公议的办法登记之。有争执时，再派人实地查勘；争执不下时，才需要采取丈田办法（在土地上农民的眼光有时比之丈尺还准确些）。以后由农会出榜张贴。调查不实者，准农民控诉更改之。

（四）土地分配，必须依照以村为分配单位，乡为统筹调剂单位，在原耕基础上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分配手续，应经过三榜定案，采取极慎重的态度，因为这是农民对土改的基本要求，必须力求公平合理，决不能马虎了事。

此外，先分配财产还是先分配土地，应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与多数农民意见决定之，不能主观命令。

第四个步骤，是追契毁约，确定地权。在土地分配以前或分配完毕以后，必须追缴地主之田契借约及一切与土地有关之附件，由农会会同有关农民，共同清点，当众焚毁（不能不清点就烧）。

在农民看来，这是他们的卖身契，因此也是他们迫切要求焚毁的东西。但地主丧失这种契约，也就永无复辟之望。因此，追契毁约，便成为土改斗争的最后一场激战。农民坚决要求，而地主则多方抵赖，农会与人民政府必须赞助农民坚决追缴契约，严令地主限期缴交，过期不缴以违法论处，达到地主契约全部缴出，当众焚毁，以满足农民要求。同时在土地分定之后，要确定新分得地户的所有权。在中央人民政府未颁发新土地执照以前，可由县先印发土地证明书，以后土地执照发到后，再行交换。

这就是土改的几个基本步骤。

注 释

- 〔1〕退押即退还押租。押租是旧时土地、房屋或其他财物的租佃时租用者所支付的一种保证金。按租佃惯例，押租在解除租佃关系时应归还给租用者。但是地主阶级依仗权势，往往以种种借口不肯退还押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中，农民纷纷要求地主退押，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规定地主应将过去所收押租退还给农民。但在实行中可根据具体情况，采取全退、分期退、缓退、少退或不退等办法。
- 〔2〕〔3〕 见《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第 230 页。
- 〔4〕 参见《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第 43 页。

抓紧民主改革，充分发动工人阶级*

（一九五一年五月九日）

二月间中央政治局会议^①规定，各大行政区每年要开两次会研究城市工作。在中南这是第一次召集的城市工作会议，下半年还要开一次。我们党对于农村工作的规律性已经摸到了一套，而城市工作的规律性还需要摸一摸。一年来各地城市工作创造了不少经验，但这些经验还未能加以总结。这次会议就是要靠各大中城市以及工矿同志根据自己的经验，互相交换，并研究得出一些初步领会的规律。

城市建设的基本任务是发展生产。这一点毛主席在二中全会时已经明确提出来，他说“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只有发展生产，城市一切工作才会搞得好的。

两年来中南区对工矿管理是有成绩的。成绩主要表现于：第一，将全区的工矿企业，完整地接管保存了下来，这是中南经济建设的重要基础。第二，完成了生产任务，供应了广大人民需要和稳定了物价。第三，相对地减低了生产成本。第四，工厂管理有了初步经验，管理制度也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第五，在抗美

* 这是邓子恢在中南局召开的城市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援朝运动中，发动了爱国主义的生产竞赛，并且摸出了生产竞赛的某些基本规律，积累了一些自己的切身经验。

但不能否认，两年来的成绩还是不够的，生产竞赛还不普遍，工矿制度的改善很不彻底，经营和管理企业的经验还不丰富，特别是没有抓紧民主改革运动，充分发动工人群众，作为改革企业的先决条件，这是我们工业建设中最大的缺陷。因此，这次会议就要集中大家的经验，研究工人运动的规律，来指导今后的工业建设。

依靠工人，这是搞好工业建设的基本条件。毛主席在二中全会提出这个方针到今天已有两年多，从我们一年多的体会看来，这一正确的路线，还有不少的干部（特别是行政管理部门的干部），在认识上、实际工作上，是很不明确坚定的。因此，我今天就要着重讲这个问题。

第一，依靠工人在今天的意义

首先从整个革命领导来看，工人是领导阶级。二十多年来中国革命虽依靠农民，但工人是领导力量，中国农民运动一开始便由工人阶级领导，而不是由农民自己领导，更不是由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领导。工人阶级的领导是通过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党——共产党来体现。中国共产党是五四运动以后在工人运动的基础上，在马列主义指导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之后，党的工作重点转入农村领导农民运动，并依托农村包围城市。今天革命在全国取得了胜利，要搞好经济建设巩固胜利，并准备逐步转入社会主义社会，更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不但要依靠党的老骨干，而且要大量培养工人干部，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性与组织性，依靠工人阶级来加强对农民及小资产阶级的领导。

其次从经济建设的任务来看，建设的重点是工业，国家工业

化要依靠谁？当然依靠工人阶级。不确立依靠工人搞好生产的思想，便谈不上什么工业建设。

从工厂本身搞好生产来看，更非依靠工人不可。上面说的要提高劳动热情，要保护机器、改善机器，要提高生产技术，发挥生产效力等等。这些东西都在工人手里掌握着。离开工人，什么事也办不了。资本家搞生产，是依靠资本来支配工人，以失业解雇来威胁工人，依靠加重对工人剥削来减低成本。我们今天当然不能采取这种办法，我们只能依靠工人的阶级自觉，以企业主人翁及新的劳动态度来达到提高生产力的目的。

依靠工人搞好生产这个基本思想，不容含糊不清，每一个干部都应重新检查一下自己的思想，纠正某些错误观点，明确树立这个基本思想。

第二，依靠什么样的工人阶级

工人阶级按其觉悟程度与组织程度，可以分为自在的工人阶级与自为的工人阶级，我们所要依靠的和能依靠上的正是自为的工人阶级。当工人还处在自在阶级的这个阶段时，是难以依靠得上的。从整个中国工人阶级来讲，早已是自为的阶级了，但从各地工人群众的实际来看，工人的觉悟有好些地方还不高。所以我们必须大大开展工人工作，提高工人的觉悟，切实组织各地工人群众成为自为的、自觉的阶级力量，否则生产是搞不好的。在今天来说，我们对自为的工人阶级有什么要求呢？一方面，要有高度的阶级觉悟，为争取自己阶级的政治地位和经济生活的逐步改善，敢于和善于与阶级敌人作斗争，敢于起来克服与纠正官僚主义的作风，敢于和懂得在政治上领导各民主阶级，懂得拥护和运用人民国家政权；并以自己正确的劳动态度努力生产，协助厂矿行政办好自己的工厂。另一方面，要有组织性；要工人自觉自

愿地组织起来。要有领导核心，有民主生活制度，互相信赖，这样才能成为雄伟的阶级力量。只有高度觉悟并且组织起来了的自为的工人阶级，才是我们所能依靠的阶级力量，才能领导生产，把工厂搞好。

第三，如何才能提高工人的觉悟性与组织性

今天，为要进一步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程度，除必须进行一般的生产与教育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必须经过一番政治发动，使工人群众积极参加政治生活。

一年来，特别最近抗美援朝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展以来，我们体会到工人群众在某种程度上是和农民群众一样的，不经过一番有系统的政治运动，要想提高工人觉悟是很困难、很慢，甚至不可能的。在武汉各地结合镇压反革命，把工人发动一番，两个月来收获很大，城市各种工作也就突飞猛进，证明这条路子是走得对的。如果没有这种政治运动，即使把工人勉强组织起来亦多流于形式。只有经过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工人觉悟才会很快地提高。敌我界限划清了，工人队伍也会纯洁起来。

怎样发动工人运动？首先要领导工人，打倒直接压迫工人的一切压迫者。凡原封不动接管下来，又未经过彻底改革的厂矿中，皆或多或少地有一批官僚资本赖以统治工人的反动封建势力、旧势力（包括特务、把头、旧领班和帮会头子），现在工人要求清算的便是这批封建反动势力。武昌第一纱厂的例子很明显：把特务恶霸周三毛一抓，工人便发动起来了。码头工人，也是如此，五一大示威时，他们的情绪最高，就因为他们经过了面对面的斗争，把封建把头打倒了，把威胁他们生命、剥夺他们发言权和超经济剥削的把头制度打倒了。工人过去说：“上面解放了，下面没有解放。”发动工人打倒了这批家伙，工人说：“过去当家不作主，今

天我们才真正解放了！”由于这种阶级觉悟的提高，就自然会联系到对这些反动势力的后台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的认识与痛恨，而增长着反美反蒋的爱国主义情绪。因此，要发动工人，首先要把这批过去压迫工人的、现在还继续压迫工人的反动势力，坚决地、适当地加以清算（政治上、经济上）。然后依照具体情况，分别处理：该杀的杀，该关的关，该管的管，该向群众低头认罪的就低头认罪，该赔偿又赔得出的则限令赔偿。这样，不仅使工人扬眉吐气，同时，也保障了工人的经济利益，工人才不是“半解放”、“假解放”。

另外，对于资本家，要善于团结，也要敢于和他们的无理与非法行为作适当斗争。过去资本家损劳养资，打骂工人，剥夺工人民主权利等事件曾不断发生过，这说明私营企业中的工人仍处在资方压抑之下，政治地位并没有能和资方相抗衡。这次我们把工厂里的封建势力推翻，就是告诉资方要承认工人的民主权利。如果有些资本家还想用旧制度、旧势力来统治压迫工人，也要适当斗争，给他们看看工人的力量，使他们懂得团结工人、改善管理的必要和重要。

运动开展起来，如果牵涉到工厂行政管理的官僚主义，也要批判一下，但这是内部问题，要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办法来解决。对于一些过去曾压迫过工人，管理作风又不好的职员，也要放手让工人批评，吐一口气。我们固然不要去扩大职工之间的矛盾，但要善于把矛盾揭开，再从思想上求得解决。貌合神离的团结，并不是好的现象。

在各种斗争中，必须加强领导，分清敌、我、友三个界限，以便团结自己，分化敌人，扩大统一战线，才能取得斗争的彻底胜利。

第四，过去发动工人工作的检讨

根据现有材料，有三种类型厂矿：第一种是工人已充分发动，封建势力已不存在。这些厂矿一部分是由我们自己起家搞起来的军需军火工业；一部分是个别经过民主改革运动搞好的。这一类型厂矿，在目前还很少。第二种是群众初步发动，但发动不充分，民主改革不彻底，敌人没有完全清除，没有完全投降或只因镇反暂时收敛了一下，大部或一部分工人尚存有顾虑。这一类型厂矿，目前在中南占大多数。第三种是群众没有发动或很少发动的，但敌情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变，这类型厂矿的数目也相当多，需要重新发动。

过去为什么没有能够及时发现这些严重问题呢？原因有三：首先是对“农村观点”的误解。进城之后，我们曾反对了以农民对付地主的一套来对付资本家，以依靠贫雇农观点来依靠城市贫民、非产业性工人、码头工人的农村观点。但不少同志由于误解“农村观点”及怕犯“农村观点”，却将农民运动中摸出来的群众运动规律本可以在城市适当地加以运用的，也否定了。因而在工人运动中，就自己束缚了自己的手脚。其次是敌情不明，过去以为城市的封建统治，主要是在码头中存在，对工厂中的封建把头、旧领班、帮会头子和特务三位一体的反动统治的残余存在估计不够。第三是由于党和工会的工作未能真正深入工厂车间，接近群众，摸不清群众的喜怒哀乐；敌情不明，我情也不明，因此，发现不了问题。

但工人群众的彻底发动，在城市解放初期又是否可能呢？我们说去年的慎重还是对的。因为去年四月间，正逢经济改组的严重困难，工人当时最大的顾虑是失业危险，“明天我就要失业，今天我又何必得罪人？”其次工人对我们了解尚不深厚，和我们的关

系尚不密切，今天则已进了一步。当初这些封建残余分子统治力量尚大，工人对他们顾虑尚多，也难于发动，今天则相当下降了，而当时我们对于生产管理又很少经验，如果操之过急，是会搞坏的。

第五，民主改革运动的几个规律

根据东北经验，搞好厂矿生产必需有三个阶段：接管和民主改革，再由创造新纪录运动，达到定额管理与经济核算制。民主改革这一步一定要走，这是变旧企业为人民企业的基本环节，我们两年来的体验也是如此。今天民主改革已经搞好了的单位，须继续提高；没有搞的，非上这一课不可；搞得不彻底的，还要再补上一课。和土改一样，企业改革也要先政治后经济；没有政治上的改革，政治上的发动，工人的阶级觉悟不能提高，则经济上应有的改革，是不可能做好的。

现在要下决心，要党、政、工、团一体动员，在党委统一领导下放手发动工人群众，坚决贯彻这一运动。（一）不要怕某些行政管理人员和资方的抵抗和叫喊。（二）不要藉口怕乱，事实上只要领导上好好掌握，就不会乱。（三）不要藉口怕影响生产。根据武汉的经验，在民主改革运动中，生产并未因此下降，反而有所提高。即使暂时影响一点生产，但总的说来，一定能使今后生产更加提高，生产任务更好完成。（四）不要怕影响团结，须知只有暴露矛盾，才可能解决矛盾，才可能更好地团结改造职员。（五）不要怕降低领导威信，当然凡不愿改正错误的官僚主义分子，是一定要丧失威信的，至于能进行自我批评、改正缺点和错误的干部，那么他的威信不但不会降低，反而会更加提高的。总之，从现在起，必须坚决发动与领导这个为广大工人群众所迫切要求的民主改革运动，不要畏首畏尾，动动摇摇。也不要放任自流，不

敢领导，这两种倾向都是错误的。

民主改革运动大致可分三个步骤：第一步是酝酿发动阶段。结合当前镇反运动，大张旗鼓，先惩办一些工人最痛恨的首要反动头子，为工人撑腰，经过大会、小会、控诉、检讨，进行酝酿，推广运动；第二步是深入阶段，发动群众性的广泛检举，对于每一个压迫工人，工人群众有严重不满的，都应分别受到清算；第三步，清理阶段，按照情节轻重，工人群众痛恨的程度，分别加以处理，该解释的向工人群众加以解释。

民主改革完成以后，紧接着贯彻实行劳保登记，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上，团结工人、职员，以便充分有力地转入大生产竞赛运动，大大加强与提高企业管理，逐步实行经济核算制。应该明确，所有民主改革的一系列运动，都是为着发展生产服务的，应与生产密切相结合。在整个民主改革过程中不应停止生产竞赛，而应保持已有的生产竞赛基础，尽力维持现在水平不使降低。但不要因生产竞赛来妨碍民主改革运动的进行。

第六，工会组织问题

我们的经验很少，我们初步的体会是，要把农村中农民运动的某些规律适当应用到城市里面来，在城市中组织工人，也和在农村中组织农民一样，要经过访贫访苦、个别串连逐步发展的步骤。

为什么要组织？组织是为政治服务，组织起来才会有力量。怎样组织起来才会有力量呢？必须按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织起来。要达到这个要求，在组织工作上便要做到下列三点：

（一）要每个会员入会是真正自愿的而非强迫的，是自觉的而非盲目的，这样他才会自觉自愿地爱护他自己的组织，拿出他的力量，并在工会的组织领导之下去进行战斗。

部发生强迫命令现象，主要应由上面来负责，不能只怪下面。当然，在国家初建、经济改组过程中，而我们又要迅速建立国营经济领导，达到稳定市场目的，这种做法也是不可避免的。但长期如此，必将脱离群众，并在经济上起到破坏作用。

（乙）必须允许合作社自成一个经营系统，让它按自己业务需要与各地物资流通情况，建立自己的批发站，并允许它直接与各地国营工矿订货（当然更重要的是与各地手工业结合）。在这一点上，合作社与商业部长时期存在着不同意见。商业部同志主张单一的批发站制度，反对平行批发站制度；主张合作社不自成系统，不要建立批发站，而使基层社附属于县贸易公司，作为县贸易公司的零售网与收购站。他们认为，这样做可以加强对私商斗争，同时可减少一套批发站人力财力的浪费。但合作社同志则主张建立两套平行的批发站制度，认为合作社与国营贸易公司虽然是一家人，是互相依赖的，是共同对私商斗争的工具，但合作社与贸易公司所担负的具体任务往往不相同，至少是不完全相同。如取消合作社批发站，结果对合作社业务发展极为不利。东北松江省^[6]呼兰县一个基层社，目前濒于垮台状态，便是明证。他们认为，如果把批发站取消，使基层社附属于县贸易公司，势必使县以上的合作社成为单纯的政治领导机关，与基层社只有行政关系，而没有经济业务关系。这样，实际上就丧失了上级社对基层社的领导作用，等于放弃对几万万个体农民在供销方面的组织作用。他们说，合作社现在全国已建立起县以上批发站四千多处，人员十八万人，如果取消其批发业务，这十八万人只靠公家供养，实际上反而更浪费。据子华同志说，苏联、东德、波兰等国过去也发生过这种争执，而最后还是采取平行的批发站制。据说，苏联专家及粮食部、对外贸易部的负责干部，都主张平行批发站制。对这

个制度。前年在中南时，我也曾一度主张单一批发站制，但以后经过各方面考查研究，分析利弊，还是赞成平行批发站制。这是一个有关合作社存废的原则问题，我认为应该如此确定下来。

四、目前合作社发生危机的关键所在。目前实际上存在着两套批发站，据子华同志说，一直到现在，中商部都不准合作社批发站直接向国营工厂、地方公营工厂与中央各工业部门（如纺织部、轻工业部、森林工业部等）直接订货，定要县合作社向县贸易公司订货。而从调整商业及改变税制以来，县贸易公司批给零售商的价格与批给合作社的价格是一样的。由于批发与零售界限未分清，只规定批发起点，各地农民很多凑集钱款到县公司按批发价购货。而合作社买进之货，加上运费开销，比市价高，便无法出售，社员也不到合作社来买货。这是目前合作社发生危机的基本关键所在。要改变这个危机，当然要如上所述，从根本上改变合作社的业务方针，使更多与中小城市及当地手工业结合，但这不可能一下转变过来。据说，有些手工业也由贸易公司加工订货，合作社也订不了货。目前救急之道，就是要允许合作社各级批发站，向就近国营工厂、公营工厂直接进货，取消贸易公司对合作社的限制。除此，很难找到别的出路。但这一点，又与中商部的上解利润矛盾。中商部今年共担负八万五千亿元利润，如果合作社直接向工厂订货，中商部要少获多少利润呢？这点我过去不清楚。根据程子华同志与合作总社统计，今年合作社总零售额计划为六十八万亿，其中向中商部进货共三十三万亿；照中商部平均利润百分之三计算，约为一万亿元，合作社同志愿意分担这一万亿利润。我认为，如此问题便可以解决了，应允许合作社直接向工厂订货。至一波同志所提谁负责稳定市场问题，我想当然要中商部负责，合作社加以协助。但必须使合作社能活下去，否

则单靠中商部也很难完成此任务。

以上是我对合作社今后任务、方针、作法与当前救急问题的几点意见，是否妥当，望主席考虑。

注 释

- 〔1〕 一波，即薄一波，当时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
- 〔2〕 程子华，当时任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党组书记兼副主任。
- 〔3〕 张启龙，当时任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
- 〔4〕 一九五二年“三反”、“五反”中，市场发生停滞现象，后来虽有所改善，但未根本好转。中共中央决定调整商业，于十一月发出《关于调整商业的指示》，具体办法是合理调整价格，扩大批发零售差价、地区差价和季节差价；划分公私商业经营范围，国营商业主要从事批发业务，国营和合作社减少次要商品的经营；取消妨碍正当私商畅通城乡交流的各种不适当限制。
- 〔5〕 一九五三年一月一日，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颁布《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施日期的通告》和《商品流通税试行办法》，在全国实行。此次税制的修正，目的在于保证税收，简化纳税手续。但提出了“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原则，实行了“公重于私，工重于商”的政策，取消了对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各种优待和方便，受到了批评。
- 〔6〕 全国解放初期，曾一度将黑龙江省划分为松江、嫩江、黑龙江几省，松江省是其中之一。

农村工作的基本任务和中心环节*

(一九五三年四月二十三日)

农村工作的基本任务

我们农村工作的基本任务是什么呢？毫无疑问，一切为了发展农业生产。毛主席说过，恢复与发展生产是一切革命工作的终极目的^{〔1〕}。过去的土地改革是把封建制度打倒，使农民从封建制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发展农业生产。今天的互助合作，也是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将来的集体化，在国家工业化帮助之下，实现机械化，也是为了发展农业生产，使农业生产大大的发展。只有农业生产发展了，才能为国家工业化开辟道路。因为，工业化要解决几个问题：要开辟市场，没有销路，工业化不成；要供给原料，没有经济作物，没有原料，不能生产；要粮食供给城市人口，工人要吃饭，没有粮食不行；工业化还要有安定的环境，工农联盟不巩固，乡村动荡不安，化不下去。列宁所提出的苏联新经济政策^{〔2〕}，斯大林在一九二七年的总结中讲，新经济政策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六年五年之内，主要就是恢复农业生产。要发展工业先从

* 这是邓子恢在全国第一次农村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第二、第三、第四部分。会议于一九五三年四月三日至二十三日在北京举行。

恢复农业生产着手，先有农业发展，而后有工业发展。我们现在只有发展农业生产，才能为工业化开辟道路；也只有农业发展了，改善了农民的物质生活与文化生活，才能巩固工农联盟，才能把农民团结在工人阶级的周围。所以，在农村中一切的工作，一切的组织，一切的制度等等，都应该看它是否有利于生产。如果对生产不利，甚至相反还要使生产减少，就值得考虑，要研究毛病在哪里。

我们现在搞农业生产，首先要增产粮食。五年计划的农业增产任务，最主要的是粮食增产。随着城市的人口增加，人民生活改善，商品粮食一年年要加多。我们全国的粮食生产，根据一九五二年估计的数字，是三千二百多亿市斤左右原粮，全国人口约五亿八千万，粮食是不够的。在苏联，列宁曾提出粮食生产要增加到八十亿普特^{〔3〕}，按两亿人口计算，每人合一千多市斤。我们现在东北差不多，东北的人口四千多万产粮四百二十亿市斤，每人合一千多斤。关内各地便少了。在粮食增产上，我们也要有一个奋斗的目标，照我们中国的老口号，“大口小口，三石六斗”，合八百六十市斤原粮，按六亿人口计算下来，加上牲口吃的粮食和喂猪，共约需原粮五千六百到六千亿市斤。粮食增产要达到这个目标，大概要两个五年计划。过去在这方面很乐观，开始提出第一个五年计划^{〔4〕}粮食在一九五二年的基础上增产百分之五十，后来降到百分之四十五，降到百分之四十，又降到百分之三十五，仔细研究这个数目还是大的，最后确定增产百分之三十，约九百到一千亿市斤原粮，到一九五七年，达到年产四千二百亿市斤原粮。假如第二个五年计划^{〔5〕}再增产百分之三十，即一千二百亿市斤，则大体可达到五千四百亿市斤原粮。那时有拖拉机，可能增产多点，这就基本上解决了问题。一般规律是恢复到战前比较容易，从恢

复到发展就不很容易，增产率是逐年减小的。我们提出五年增产百分之三十，并设想第一年增产百分之七，第二年百分之六，以后三年每年百分之五，搞得不好，百分之三十可以完成或超过。超过一点好，不能完成大家泄气。五年计划算得少点，年度计划不妨超过点。经过国家计划委员会和中央的讨论，认为这样比较适当。五年达到增产百分之三十，当然全国是不平衡的，各大区的计划可以不同。

如何才能增产？发展生产决定于生产力。生产力的因素主要是劳动力、生产工具。我们现在的农业生产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上进行的？生产的队伍是什么？还是小农经济，小生产者占极大的优势，靠人力、畜力和旧式农具。马拉犁等新式农具有一点，还很少，绝大部分是旧式农具，不是机器经营。农田水利是人工灌溉，不是机器灌溉。肥料是人工肥料（绿肥、草肥、猪粪、狗粪），不是化学肥料。我们今天的农业生产就是靠这些。这种生产力，同国家工业化不相称。

今天国家的基本任务是工业化，五年建设、五年计划是工业为主，重工业为主，求得在十年至十五年内大体上打下国家工业化的基础。农业要和工业化相称。假如国家基本完成工业化了，而农业还是小生产者，工业发展了，农业跟不上，是跛脚的，解决不了工业原料的需要，粮食的需要，市场的需要，就要影响工业化的前进。因此，农业必须配合国家的工业化，逐步加以改变。现代化的工业，必须有现代化的农业，同时并进，要逐步改造农业。就是说，把现在小生产、小私有的农业改变成大规模的机械化的农业。生产力改变了，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也要改变。使用机器耕种了，农民的私人所有制就必须改变为集体所有制的集体农场，不然拖拉机用不上。这就是说，农业要社会主义化。

毛主席指示我们，农村工作部的基本任务就是要在十年至十五年或者更长一点时间内，在全国范围基本上完成乡村的社会主义改造，把现有的农民私人所有制，改造成为将来的集体所有制，把现在的个体农民改造成为将来的集体农民。为什么说基本上呢？因估计到工作有不平衡。有的地方或者更慢一些，如少数民族地区，但在全国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为什么说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因为社会主义的农业毕竟是机械化的农业，而农业机械化要看工业发展的速度，要靠工业化的帮助，没有拖拉机怎样机械化呢？要有大量的拖拉机、抽水机、化学肥料、农业机械，没有这些机械化是空话。因此，今天是农业为工业服务，将来倒过来，工业帮助农业发展。在农村中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农村工作的总方针、总路线，要把今天农民的私人所有制，改造成为将来的集体所有制。有了社会主义的工业，就要有社会主义的农业来配合它，这是中央的既定方针。

如何改造农村的小私有者？如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呢？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从下而上把约一亿户的农民经过互助合作，逐步地走向集体化的道路；另一方面，从上而下的逐步建立国营农场，拖拉机站、马拉犁站等等。两方面都要进行，互相配合，把广大小私有的农民经过互助合作，引导他们走向集体化的道路。这是一个最广大的群众运动，是艰苦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比土改还要艰难复杂。机耕的国营农场现有的数目少，耕地也较少，但它是大规模的，机械化的，全民财产的，完全社会主义的。这种国营农场要在集体化的过程中起示范作用，推动作用，要它做一个榜样来推动广大农民的集体化。经过这两方面，一方面自上而下，一方面自下而上，互相配合，最后达到农村的集体化，完成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

过渡时期农村工作的中心环节

目前农村情况正处在土地改革已经结束、集体化还未到来的过渡时期。经过土地改革，广大农民得到了土地，农村生产力已从封建制度束缚下解放出来，农业生产已经恢复和发展起来了。但农民绝大多数还是靠人畜经营，靠人工灌溉，而不是机器灌溉；用旧式步犁，而不是用新式机器；靠人工肥料，而不是化学肥料；是小生产小私有者的生产关系，即所谓小农经济，而不是集体化经济。已经组织起来互助合作的农民，也还是在小私有的基础之上组织起来的，也还是靠人畜经营，新式农具是很少的。正因如此，今天农业生产的发展，还有许多困难的条件下限制了它、约束了它，要在现有的基础上提高一步，就必须帮助农民解决以下三个问题：

一、必须帮助贫困农民解决生产资料的困难，主要的是牲畜、农具、肥料、种子等困难。

二、帮助农民减少自然灾害，如水灾、旱灾、虫灾等。

三、帮助农民逐步改进生产技术，如耕作法、施肥法等。

不帮助农民解决这三个问题，生产就不能发展。在目前情况下，用什么办法来帮助农民解决生产中的这些困难呢？当然，国家要大力帮助。几年来，国家确实用了很大的力量，如大批的贷款，兴修水利，供应新式农具、喷雾器、杀虫剂，有些地方还派了飞机去杀虫等等，但国家的帮助是有限度的，不可能全部解决农民生产中的困难。那么靠什么办法来解决呢？有两条道路、两种办法：一种是旧的办法，旧的道路，让个体农民向富农、高利贷者去借贷，去当雇工、出卖劳动力，廉价出卖农产品，结果就增加富农、高利贷者、投机商人的剥削对象，让农村资本主义泛

滥发展。这就是让少数人发财致富，多数人破产贫困。这是旧道路，是让农村资本主义漫无限制泛滥发展的道路。另一条道路是新道路，是领导农民组织起来，靠大家互助合作的力量，再加上国家帮助来解决生产中的困难。结果就是大家富裕比较平衡地上升，也限制了富农的发展。这就是组织起来大家富裕的道路，同时也就是缩小富农的剥削范围，又限制了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

毫无疑义，第一条道路，旧的道路是富农所欢喜的，是富农要走的道路，也是在小农经济中生长起来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势力所要走的道路，过去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条道路。而我们党的任务在于领导农民走新的道路，走组织起来的道路，走互助合作共同上升大家富裕的道路。组织起来互助合作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帮助农民运用国家帮助解决当前的问题，克服生产困难，减少自然灾害，促进生产；另一方面，也就在互助合作过程中为将来集体化准备了条件，为明天做准备。准备什么？

第一、准备群众。互助合作的结果。生产的困难解决了。生产提高一步，并逐步给农民以集体主义的教育，逐步培养起集体劳动的新思想、新道德、新习惯，这就为将来集体化准备了条件。没有这一条，将来的集体化是很困难的。

第二，准备经验。组织起来，互助合作，就需要实行集体经营的管理办法，管理大型经济的办法，如何组织劳动，如何记分，如何分配，如何订计划等等。大家在互助合作的发展过程中，就会摸出一套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方法和制度出来。积年累月慢慢摸索，由小到大，总可摸索出一套经验，这就为将来大规模集体化准备好经验。否则一旦实行大规模集体化，就会茫无头绪，一团糟。

第三、准备骨干。经过互助合作，培养出许多互助组的组长，合作社的主任、生产队长。他们今天是小的互助组、合作社的领导者，而将来的集体农场也就由这些人带领，他们就是集体农庄的领导核心。一切组织没有骨干是不行的，今天不培养好，将来组织那样大的集体农庄就会群龙无首。所以，互助合作既解决了今天的问题，又解决了明天的问题，既解决今天农民生产的困难，使生产提高一步，又为将来集体化准备好群众，准备好经验，准备好骨干。将来加上拖拉机，就可以搞机械化的集体农庄了。当然，到那时也还有困难，还要经过艰苦的组织工作，但准备工作做好了，将来就可水到渠成。

由此可见，互助合作和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之间的斗争，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是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互助合作是走向集体化的不可逾越的过渡形式，不能跳过这一关。

现在各地的互助合作运动中，有两种偏向存在：一种是自流等待，就是等待集体化到来，认为目前好像不必要搞互助合作，搞了好像没有什么意思，要等到将来拖拉机出来才搞。这种偏向的坏处，就在于让农村资本主义泛滥发展，不去教育农民，不去组织农民，不去进行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偏向之所以产生，就是忽视了互助合作在今天和将来的作用。另一种偏向就是急躁冒进，过左的偏向，计划贪多贪大，盲目要求高级形式，这种急躁冒进过左的偏向产生的思想根源有三：

一、过高估计互助组、合作社的性质。不了解互助组、合作社是具有两方面性质的，是过渡形式，而把它看作与社会主义完全一样。可能还有一部分人包含有单纯农业社会主义的观点，认为这样就可以完全社会主义化了，不了解合作社还是建立在私有基础之上的，实现社会主义还要有工业化的条件。

二、不了解工业化和集体化的前进过程。工业化并不那样快，拖拉机到一九五九年才能有一万多架，可是我们的同志急了，要五年就合作化。去年提出的五年计划高了一些，事实上办不到，主观、客观都办不到，结果压下来了。农业的集体化、机械化必须要靠工业的帮助，不只是拖拉机问题，有了拖拉机还得有汽油，有一系列的设备，有了拖拉机而无修理站还是不行的。忽视工业化的进程，而孤立地去搞农业集体化是不行的。所以毛主席说要十年到十五年甚至更多一些时间，完成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问题要跟县委书记、县长讲清楚，他了解了这个过程就不急了。

三、不了解互助合作是不可逾越的过渡形式。没有它就不可能过渡到社会主义集体化。

由于以上三种思想根源就产生了急躁冒进。急躁冒进和放任自流两种偏向今天都存在，一般说，新区容易产生放任自流，老区容易产生急躁冒进。但老区纠正了急躁冒进，反过来也会出现右的偏向。今天在全国范围来说，急躁冒进是主要的偏向，是主要的危险。

互助合作运动必须采取稳步前进的方针，绝不能操之过急。理由何在呢？

第一个理由，首先要认识到今天搞互助合作与战争动员不同。战争动员集中多少民兵、多少伕子、多少大车，非限期完成任务不可，不这样不行，一切服从战争。搞互助合作就不能也不需要这种办法。它是改造经济的斗争，只能采取稳步前进的办法。

其次和土改不同。土改是农民和地主的阶级斗争，是阶级斗争。互助合作是克服小农经济之自发的资本主义趋势的斗争，是对农民的教育问题。互助组、合作社的内部关系也是农民内部的相互关系的问题，主要是贫雇农和中农的关系问题，贫雇农在互

助合作中要揩中农的油，中农却要牲口、农具多分红、多占便宜。这不是对敌斗争，不是农民和地主的关系到，所以互助合作运动绝不能采取阶级斗争的方式。今天有些地方强迫命令，用威胁、限制、戴大帽子等办法强迫农民入组入社，这是完全错误的。必须采取教育说服的方式，根据自愿互利的原则，来对待互助合作运动。说不服怎么办？那就等待他的觉悟，一定要自觉自愿，照顾双方。

第二个理由，互助合作必须根据需与可能的条件去建立。

一、一切为了增加生产，根据生产的需要。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一再指出这一问题。由临时互助组到常年互助组到农业生产合作社，都必须根据生产的需要。农民在土改后，由于牲口农具不足，或者劳动力不足，要求互助，你帮我，我帮你，解决牲口、农具、劳力问题。等到这些问题解决了，就进一步要求再发展，再增产，就不仅要求季节互助，而且要求全年互助，不仅要求搞农业互助，而且要求搞副业互助，多搞点钱。生产要求提高了，组织形式就改变了，就自然进到常年互助。常年互助办好了，就自然要求更提高一步，要求劳动分工，土地合营，搞合作社。互助合作运动必须根据生产的需要，逐步前进。绝不能单纯凭主观要求，否则就不能达到增产的目的。

二、必须根据群众的觉悟。用群众的切身体验教育群众，这是群众运动的基本规律。要群众起来，不仅是靠我们宣传教育，还要靠大多数群众自己的切身体验。当然宣传教育是起一定的作用的，但不能完全靠宣传教育解决问题。群众经验过了，不仅听到而且看到，而且自己做了，确实有好处了，相信了，就会来了。我们搞互助合作，由低到高，都要根据群众的切身体验，不能只照我们的理想。

三、根据干部的领导能力。合作社不能一下子发展那么多、那么大，没有这么多干部。管理几百户几十户的农业生产，并不比管理几百人的工厂容易。现在我们有些合作社把区级干部、县级干部拖死了，干部一走合作社的问题就不能解决。办合作社，要看干部条件，要看干部的能力。干部没有这样多，干部能力弱，不能胜任就办不好，这是很自然的，不能从主观要求出发。

第三个理由，我们的前途是集体化，但现在是什么情况呢？我们要从现在的小私有、小生产者的现状出发。现在是个体农民占优势，互助组的组员合作社的社员也还是小私有者。小私有者有保守性，不能不照顾。如果急躁冒进，那就不仅单干农民不加入互助合作，而且还会影响互助组、合作社的巩固。参加互助合作是为了多生产、多收入，组员、社员都是小私有者，如果加入以后，生产不好，或者生产多分得少，他们就不来。虽然经过了土改，土改时农民是拥护共产党的，因为他们从共产党手中得到了土地。但土改后，互助合作搞不好，对他们不利，他们怕吃亏，当然就不来了。这不能怪他们。

今天的互助合作，对于农民小私有者，一方面要改造他们，一方面又要适应他们，适应就是为了便于改造，过急不行。

第四个理由，要从工业化的进度出发。不是像某些同志所想的那样快，一下就能把国家工业化，大约要三个五年计划才能打下我们国家工业化的基础。农业集体化速度须与之相配合，不能急，太急了，集体化搞不好，就要影响粮食生产，反而影响工业化的前进。

第五个理由，互助合作是一个群众运动，必须按照群众运动的发展规律办事，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由点到面，由低级到高级，发展一步巩固一步，有阵地地前进，绝不能一步迈进，一哄

而起。一哄而起者必将一哄而散。互助合作关系到农民的生产 and 生活的根本问题，必须慎重稳进。

从这几个理由来看，在互助合作运动中，均须切实防止急躁冒进。今年大体来说，是继续巩固的问题，当然有些地方还是要发展一些。但必须稳步前进，下面干部要看上级，上急下更急。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发展速度，中央已有指示，要从各方面加以约束。首先在数量上，原计划组织起来的五年数目达到总农户百分之八十，可能还多了一点。最好再约束一下，老区发展到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左右，新区发展到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六十左右，年度计划怎么定由各大区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合作社的发展，原来计划老区是百分之四十五，新区百分之十二，现在还要压缩一下，老区五年发展百分之三十到四十，新区百分之六到十，有些地区还可更低一些。合作社社员户数，也要稍加约束，大概是十五到二十五户，以不超过三十户为宜。根据群众今天的经验，生产工具和干部情况，都不能过大。现在也有一百多户而办得好的个别社，但要靠县级干部经常帮助，能有多少个县级干部呢？它既然办得好，有成绩，有条件，当然不要改了，大的当然比小的好。问题是群众觉悟程度，干部领导能力。按目前条件，一般是搞得过大了反而妨碍生产，有些过大的社维持不下去了，必须改变。有些合作社基本上办得好，但有些毛病，应当整顿一下。现有的合作社，不是一切都办坏了，如果认为一切都坏都要解散，那就是走极端的办法，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妨碍生产，群众有意见。总之，公式主义不分析具体条件，是要不得的。必须分别对待，分别处理。从数量上约束一下，做得好的，超过一点也不要紧。更重要的是从互助组合作社质量上加以约束，在内部的做法上加以约束。互助组合作社的内部问题，基本是贫农与中

农的关系问题。对中农要照顾，要克服贫农向中农揩油的思想，不能像土改时候那样。土改时要搞地主以满足贫雇农，那是对的；今天揩中农油以满足贫雇农，那就错了。今天的贫雇农将来也要成为中农的，今天要他揩中农的油，将来就会让别人来揩他的油。这就使贫雇农对上升增加顾虑，结果两头不讨好。另一方面也要防止有的中农、富裕中农企图把牲口、大农具估价过高，分红过多，使贫雇农吃亏。在对待组内、社内的关系问题上，要坚持等价互利的原则，但也不能那样理想化绝对化，必须认清主要是雇贫农与中农的关系问题，要双方兼顾，逐渐做到更加合理。合作社的公共财产是要随着生产发展而逐渐积累的，不要积累得过快，一下子搞得过多。因为公共财产积累得快了，就会影响社员收入，社员入社是为了多打粮食，多分红，多收入，改善生活。公共财产多了，收入少了，他的积极性就下降了，就很难持久。因此，合作社的公共财产要加以约束，要慢一点，稳一点，发展慢一点没有坏处。但不是说不要，公共财产是要的，要根据群众自愿，收入得多，在增产中抽出一部分积累公共财产是可以的。今天收入并不多，增产也不多，公共财产搞多了，必然脱离群众。

此外，合作社吃大锅饭必须反对。共同生产，共同消费是共产主义，今天办不到，硬要搞，一定搞坏。斯大林也批判过苏联的农业公社^{〔6〕}，苏联还行不通，我们更行不通。苏联现在还是共同生产，分开消费。我们的合作社必须是按土地、牲口、农具、劳力来分配。分到的粮食由个人自由支配，共同消费一定要纠正。

最后，有的地方提出：“时时互助，事事合作”的口号，这是不妥当的，行不通的。农村中有三种活：一种是一定要互助的，靠集体劳动才搞得好的；一种是可互助可不互助的；还有一种是单干较互助好的，如喂鸡、喂猪、种点蔬菜及其他家庭副业劳动。哪

些集体搞，要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根据农民的自愿而定。农民的劳动时间不要通通集体支配了。如果他自己连冬闲和农事闲隙时间也没有一点活动的自由，那是不行的，会使农民生活上极不方便，生产上也有妨碍，一定要遭到群众反对。

目前农村中某种紧张情况及安定团结的方针

目前农村中不少地区存在着程度不同的紧张情况，就是农民不安，怕共产，怕“社会”，怕露富，这种情况对我们是不利的。现在的方针是把农村安定下来，巩固我党在农村中已得的阵地。不安，基本是中农问题。从东北黑龙江的材料看，生产积极性高，扩大生产的占百分之二十四，缩小生产的百分之十三，而维持现状的占百分之六十三。百分之二十四是雇贫农，土改后仍未上升为中农。百分之十三是富裕中农、富农与土改前的地主之类。而问题的关键是那百分之六十三，他们是中农，他们多少有些顾虑，不敢放手经营，是现状维持派，也不缩小，也不发展。中农不安定，有顾虑，对我们政策不摸底，不了解什么是“共产”，什么时候共产。必须使他们安定下来，否则就不能巩固党在农村中已经得到的阵地。如何才能安定下来呢？我认为要解决五个问题：

第一，要照顾个体农民的积极性。中央互助合作决议⁽⁷⁾中指出，土改后农民有两种积极性，一种是个体农民的积极性，一种是互助合作的积极性，两种都要照顾。为此，在发展互助合作运动的同时，还必须：

一、尊重农民的土地财产所有权，保护农民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二、相对地固定负担。

三、限制富农剥削，允许富农存在。

这三个问题，毛主席指示了很多。所谓确保私有制是不对的。因为对农民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是要积极加以改造的，农民现在的这种私人所有制必须逐步由将来的集体所有制来代替，怎样“确保”呢？这是总方向，不能怀疑动摇。但不是明天就能一下子改变过来，而要十年十五年，甚至更长些时间才能完成。对农民的私有制这个问题，必须逐步去解决，不能过急。分了土地给他，就不能又随便剥夺了，必须依法保障这种所有权。机关修房子，占了农民的地，就一定要给农民适当的代价，要把他们安置好，解决他的生活问题，不能马马虎虎，造成农民的恐慌。有些地方处理得不好，就闹了许多乱子。如河南修飞机场、修水库，没有向农民很好地宣传，也没有给以安置，就插牌子，以致引起骚乱。

必须把逐步改造农民小私有制与保护农民土地财产所有权分清。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弄不清，就会造成群众恐慌。改造农民私有制是总方向，决不能动摇的，但不能说横竖将来要归公的，就随便去侵犯农民的土地及其他私有财产。

其次，负担问题。大家提的意见很多，问题大致上也解决了。公粮负担的任务去年是三百四十八亿斤。中央已决定不再增加，并因今年有灾荒，故按去年水平再行减免。

查田定产不搞了。没有查田定产的地方，如广东、广西可以结合土改采取简易方法，来核实田亩固定产量。过去查田定产偏高偏低的地方，要根据群众的反映，根据具体情况，作适当的调整，太高的可以适当减低一点，低的可以加一点，但不要加得太多。也不要再来普遍丈量。

税率问题。中央已同意东北、华北照旧实行比例税，不改累

进税。今年的事情很多，乡村干部也不强，不要再变了，经常变化工作不好办。富农的经济目前所占的比重并不很大，老区一般不过百分之一左右，也不必急于用累进税的办法去限制他。

解决公粮入仓问题。既要使国家调拨粮食方便，又要使农民交粮方便。不便于国家调拨是不行的，但是群众交粮的道路很远，交粮误工很多，人畜伤亡，使农民又加一层送粮的沉重负担那也是不对的。这两方面不可偏废，只照顾一方面是不对的。因此，设仓时要照顾两个条件：第一要看交通条件，而交通条件各地不同，故不能做一律的规定。第二要根据各地公粮的调拨情况，有多少要调出来，有多少要就地处理，这也是各地不同的。因此，中央给财政部的指示中说，不要规定全国统一的办法。如东北现在的办法既便于国家调拨，又便于农民交粮，就可以不变了。一般说来仓库有三种：一种叫大仓库，设在交通沿线，粮食便于集中，准备调运的。一种是中等仓库，按区设置，大区三个四个，小区设一个两个，目的在做到使农民交粮方便，一天来回，不要在那里过夜。区仓库收下来然后再向交通线调运。还有一种是偏僻的山区，那里粮食根本不易出来，可在乡设立小仓库。这三种仓库，由下面因地制宜，上面不要限制太死。除此之外，还需解决粮食储备和调运组织问题。耕牛保险，棉田保险，薄一波同志说，以后不搞了，过去搞的看群众意见，群众愿退就退，不愿退就续保。至于强迫推销书报等等，中央关于解决五多^⑧问题的指示里已讲得很清楚。这些东西有的是下面执行的毛病，下面干部太弱。也有的是上面各部门考虑不周的，有的本意是好的。这要加以分析，哪些停止，哪些可用。

再次，限制富农发展，允许富农存在。一条是组织起来，互助合作，过渡到集体化的道路；另一条是让富农泛滥发展的道路。

两条道路，走哪一条？我们走前一条，这是总路线。但今天的问题是既要限制富农发展，又要允许富农存在，不能说不允许富农存在，而且完全不让富农有一点发展也是不可能的，富农发展一点不要害怕。总的方针是限制富农发展，这个是决不能犹豫决不能动摇的。这个改变了，那么发展到社会主义就不可能，但又不能完全杜绝其某种程度的发展。这是矛盾的。在这方面掌握起来是要很艺术的。

下面讲讲所谓“四大自由”^[9]问题。笼统提出“四大自由”的口号是不妥当的，但关于雇佣、借贷、租佃和贸易四个问题则应有正确的处理：

一、雇佣问题。雇佣自由的口号可以提，是不是雇工会有增加呢？当然可能，但今天是有没有人敢雇工的问题，而不是雇工的人很多。对雇工的工资问题，雇工的各种待遇问题，当然不是允许像在资本主义国家那样自由，这个自由是有条件的。

二、借贷问题。今天要提倡自由借贷。农民要借钱，国家没有这些钱去帮助农民完全解决困难，他就要借贷。规定几分利是高利贷，几分利不是高利贷，用意是好的，但如没有国家的农业贷款之增加和信用合作事业之发展相配合，则其实际效果不大。因为他可以搞黑市，搞地下借贷。允许自由借贷是否就是让高利贷泛滥发展呢？不！我们要搞信用合作社，低利借贷，用经济斗争的办法慢慢战胜高利贷，减少高利贷，直到最后消灭高利贷。单纯用行政命令，高利贷是禁止不了的。

三、租佃问题。土地买卖和租佃的自由，土地法上规定了，今天还不能禁止。但这种自由的范围很小，实际上仅允许鳏寡孤独、烈军工属及没有劳动力从事耕种的人出租土地。将来是否要禁止土地买卖，什么时候采取什么措施去禁止土地买卖，中央还没有

考虑。今天土地买卖是可以的，但是否让随便买卖呢？不是的。我们要尽可能帮助贫困农民克服困难，要从各方面来帮助贫困农民，如贷款、互助合作等等，使他不卖地。卖去土地对他们很不利，卖了就更加贫困了。所以这个自由很有限度，并应尽量缩小这个自由的范围。

四、贸易问题。商业买卖自由是不禁止的，但要在国营贸易领导和节制下。所谓领导就是控制。贸易自由的范围也是有限度的，有控制的，不是让其泛滥发展。但是不是不让私人做买卖呢？不是的，我们包不了的。去年调整了商业后，私人商业有些发展，这是必然现象，不要怕，一方面其中有些偏向，有些过去考虑不周的地方，有些空子，所以贸易公司、合作社发生困难了。今天就要想法解决。但决不能恢复过去的情况，不准私商下乡，我们一切包下来。如木材过去是完全控制的，只准卖给木材公司，农民自己的木材砍下来做棺材，做房子都不行了，要经过批准，这怎么能行得通。但现在全国木材是否可让木商完全自由通行，那也不行，还要经过一定的市场管理，所以贸易自由是有控制的。

这样做就是对富农发展有所限制，总的是要限制，特别是互助合作，社会主义的比重加大，也就是限制富农发展。毛主席对这些问题说得很明确。我们通常的毛病就是，左右摇摆或者是总的方向发生动摇，如对农民的私有制度不加改造，让富农无边地发展，或者是限得太死。必须把当前政策和发展方向联系起来又区别开来，既稳定农民积极性，又有利于按总方向前进。

第二，必须切实把互助合作办好，作出好的榜样来。在互助合作运动发展过程当中，当然不可避免有些农民，特别是富裕中农和一部分中农会动摇的、恐慌的，完全要一个都不恐慌是不可能的。但如果我们急躁冒进，像现在某些地方的作法，引起相当

多的农民发生恐慌，不安心生产，则是不利的。我们说把群众的个体生产积极性稳定下来，绝不是说要把互助合作运动停止，而是如何把互助合作运动办好，在农民群众中真正起教育示范作用。当然要统统办得很好，一个都不办坏，也是不可能的。一个运动当然有参差不齐，我们应力求少出偏差，少出问题。有个别同志认为，好像目前这样紧张，似乎连两条道路的宣传都要不得了。这是错误的。必须宣传两条道路的对比，是大多数人破产好、还是大多数人富足好，这必须教育农民。我们是稳步前进，不是稳而不进，甚至连宣传都停止了。这样并不能稳定群众情绪。必须把互助合作办好，确实作出成绩来。走这条道路，确实多分红，多打粮食。中农是左右摇摆的，我们办得好，确实有利，多打粮食、多分红，生活有改善，中农就过来了，就不再恐慌了。互助合作对中农、贫雇农是好的，就是对富裕中农也没有什么不好，并没有损害他们的利益，不要再揩他们的油就是了。所以决不要因为目前农村中的某种紧张情况而停滞不前。但不要急躁冒进，要说通积极分子。有些合作社确实太大的，领导不下的，应该分开来，某些合作社不够条件的要改组。有些合作社是形式主义，根本没有合作，只是挂个牌子的干脆不要。基本上办得好，但有些毛病的，要帮助他巩固下来。有些办得好的就帮助它前进。这个工作搞得好的，就可以在农村中树立榜样。

第三，农村中新的建设工作要分轻重缓急，量力而行。我们有许多事情本来是好事，但办得太急了，要明天做的，今天来做就急了，不分轻重缓急，百废俱兴，结果使好事变成坏事，成为农民的负担，这就不是量力而行。农村要不要做建设工作呢？要的。水利是要兴修的，但盲目地打井，不该挖塘的地方要挖塘，就不好了。有些事情本来人民是欢迎的，如果要他们负担太多，任

务太大，负担不起，就不好了。我们应该从当时当地人民的需要与可能出发，量力而行。首先应该估计国家财力，量国家之力。有许多事情是要国家出钱的，那就要量国家之力。国家财政主要是搞工业，工业是重点建设，这样用在农村的钱，当然就不能那样多了。其次要估计农民的负担能力。在农村中有许多事情就是国家出钱也还要靠农民出力的，如兴修水利，要农民派工，按照受益户派工、派粮、派款，要动员农民来搞。因此，必须估计农民的负担能力。又比方林业部的造林，当然要动员农民来做，那就要估计农民的力量，估计农民究竟有多少时间、多少力量。不量农民之力，好事就会变成坏事，群众就会埋怨。再次要估计干部的能力。我们乡村干部很弱，县的干部也不强，什么事情都要他们来做，所以也要量干部之力而行。

第四，要设法增加农民生产资料，提高农业生产。各大区反映，牲畜及大农具尚未达到战前水平，只达到百分之八十，小农具增加了，大农具并没有恢复。这个问题很值得注意。增加农民的生产资料，第一步要求得恢复，第二步再求得上升。光靠劳动力，不从生产工具方面设法改善，生产水平的提高就是不稳固的。

生产资料主要是牲畜，南方的牛，北方的马、驴、骡。要想各种办法去繁殖牲口，改良畜种。其次是大农具，犁、耙、水车。还有肥料。必须奖励农民增加生产资料，添购耕牛，添置农具，增加肥料。目前新式农具不多，化学肥料、豆饼也不多，主要还是旧式农具，粪肥、草肥，当地的花生饼、菜籽饼、茶籽饼。各大区、各省、各县要想办法奖励农民增加和改善生产资料，并应在税收方面、贷款方面对供应农民生产资料的手工业多加照顾。因为解决目前农村所大量需要的生产资料，绝大部分还要靠手工业，就地取材，就地制造，就地供应。因此，对手工业的扶植，帮助

手工业发展，就成为很重要的问题。最近报纸上有一篇关于手工业问题的社论，又把湖北的手工业代表会议^{〔10〕}消息登了，代表会议所提出的几项建议也登了。这是毛主席亲自指示刊登的。中央对这问题也发了指示。必须积极扶助手工业，扶助农民所需要的手工业生产，否则农民需要的生产资料无人生产。手工业中有一部分是要垮台的，如迷信品制造业。但是制造农具、肥料的手工业，在十年之内是需要用很大的力量去发展的。要在各方面照顾它，发展它，帮助它们解决原料困难，推销它们的产品，给它们适当的贷款，税收方面也照顾一下。

各省、各专区、各县都有些地方工业，其中有大的，一般是小的。苏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当中，也是很注意小工业的。因为国家大工业是解决钢铁、汽油、大型机器，有许多东西，十年到二十年内，还是国家办不到的，不能不让给小工业。所以各县、各专区、各省、各大区应很好研究如何使地方小工业与当地生产结合，制造供应农民的生产资料。各省、各专区办的小工业都应面向本地推销。本省、本县的销路是靠得住的，为本省、本县的农民服务，市场是比较有把握的，原料也比较容易解决，不要盲目靠外销。各级党委的财委，必须领导地方小工业为当地农民生产服务，与当地生产结合。这一方针实现了，对增加农民的生产资料就有很大帮助。扶植手工业，使之存在发展，加上地方小工业为当地农民生产服务，这样就可逐步解决农民生产资料的困难。此外，由国家推销新式农具、农械、农药也还是要做的。过去新式步犁，虽然有一部分是“挂”犁，但也有一部分是适用的。过去的毛病是不顾当地具体情况，不管群众要不要，对下面分配任务，硬派，变为强迫命令了。过去推销的新式步犁，有些确是挂在那里，如果因为不懂用法，那就帮助他们学会使用。如果有些地方

就是根本不合用，不能用，就只好收回来。实事求是，根据具体情况办理。杀虫剂、喷雾器，也是如此。另外区里、县里要有技术指导站，有修理站。如没有修理站，新式农具、农械用坏了不能修，搁置起来，就是很大的浪费。还有农贷，十万亿低利贷款，数字很大，要好好使用。乡村里发展信用合作，有的地方先成立信贷小组，有的信贷小组与互助组结合起来，由信贷小组发展成信用合作社。国家银行和乡村中的信贷小组、信用合作社，结合在一起与高利贷作斗争，帮助农民解决生产资金的困难，帮助农业生产的发展。

第五，发展贸易合作，加速城乡物资的流转，对农村生产是很重要的。这次各大区同志反映说，过去转弯转得太急了。现在中财委正在考虑这一问题。只卖不收，怕积压，结果卖也卖不出去。有些产品需要收的还是要收。毛主席说可以“办短期仓库”，不是几年长期积压，推不出去，国家也负担不起。季节性的短期积压，还是应有的，合作社亦是如此。

有些土产，如桐油，固然是出口货，但可以开辟国内市场。在县与县之间、省与省之间，大区与大区之间，可以组织交流。这很重要。不把农民的土产推销出去，他的副业收入就少了，购买力就低了，生活也很难改善，也就会影响其再生产能力，影响农业生产。各地党委应注意对各地贸易公司以及合作社的领导。当然贸易公司、合作社有自己的系统，业务上有它的单独系统，党委不能过于干涉，但业务与方针政策是有联系的，不能离了方针政策光讲业务。过去各级党委事实上对贸易公司、合作社过问不多，一方面不懂，一方面亦没有过问，农村工作部要帮助各级党委注意研究对各地贸易与合作社的领导，研究价格政策。

贸易公司、合作社逐步推广与农民的合同关系，这是我们要

把千百万个体经济、个体农民、个体手工业吸引到国家计划经济的轨道中来的重要方法之一。过去所执行的预购政策，实际上就具有合同性质。但农业生产还是靠天吃饭的，合同订得多，老天爷不帮忙，收不到，合同就不能执行，所以这种合同要有一定的伸缩性。这方面经验很少，不可太急，要慢慢摸索，求得逐渐吸引农民到国家的计划经济轨道中来。

做好这五项工作，就可使各地存在着的各种不同程度的紧张情况安定下来。

注 释

- 〔1〕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二版，第1428页。
- 〔2〕 新经济政策是苏俄在一九二一年由国内战争转变到和平经济建设时所实行的经济政策。主要内容是：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农民缴税后的剩余粮食，可以自由出卖；发展商业，在一定限度内允许自由贸易和私商存在；在国营企业中实行经济核算制，并以租让、租赁等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把某些国营企业租给外国资本家或私人经营。
- 〔3〕 普特是俄国的重量单位，一普特等于十六点三八千克。
- 〔4〕 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九五三——一九五七）》。
- 〔5〕 第二个五年计划即《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八——一九六二）》。
- 〔6〕 指原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初期劳动农民生产结合的一种形式。在农业公社中，一切生产资料都归公有，社员没有个人经营的宅旁园地和家庭副业。社员共同劳动，收入平均分配。这种组织形式同当时的生产水平不相适应，后来改为农业劳动组合。
- 〔7〕 中央互助合作决议指中共中央于一九五一年九月在第一次农业互助合

作会议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该《决议(草案)》于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发各地党委试行。一九五三年二月，中共中央对该决议作了个别修改，通过为正式决议。

- 〔8〕 五多是对当时农村工作中存在的任务多，会议集训多，公文报告表册多，组织多，积极分子兼职多的概括说法。一九五三年三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级党委认真克服这种缺点。
- 〔9〕 “四大自由”是对雇佣自由、借贷自由、租佃自由和贸易自由的一种夸张提法。
- 〔10〕 一九五三年二月，湖北省人民政府举行全省手工业代表会议，了解全省手工业的状况，解决手工业中的劳资关系、师徒关系、公私关系以及手工业的发展方向等问题。中共中央认为湖北的做法很好，要各省仿行；同时，中央还发出了《关于应当重视手工业的指示》，《人民日报》也于四月二十三日发表了社论《必须重视手工业》。

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指导原则*

(一九五四年四月十八日)

合作化运动与其他运动一样，同样要走群众路线，是群众运动，不是运动群众；要善于将自下而上的群众发动和自上而下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要贯彻中央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有四个问题必须注意：

(一) 必须坚持自愿原则，禁止任何强迫命令。

这一点本来我们到会的同志都清楚，但还有着重说明的必要。为什么要坚持自愿原则，为什么不能强迫命令，这个问题必须从农民的本质上来认清楚。农民的本质是什么？农民是劳动者，他是靠自己的劳动为生，不是靠剥削别人为生。这就决定了农民是能走向社会主义的。但是还必须了解农民的另一方面，他是小私有者、小生产者，有自私心理。不了解这个特点，就不能领导农民。农民是小生产者，个体经济，因此养成了他单独经营的习惯。他自己单独经营很自由，早下地晚下地由他。他也有他的计划，有他的打算，但他是以自己家庭单位来打算的。农民对于社会主义往往容易误解，怕吃亏，有顾虑。他单独经营惯了，集体经营怕

* 这是邓子恢在全国第二次农村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第四部分，略有删节。会议于一九五四年四月二日至十八日在北京举行。

搞不好。他文化程度低，脑子比较简单一些，不轻易相信人家的话，你说什么先进经验，他不轻易相信。过去作过农村工作的同志都知道，从大革命时期到内战、到抗战，说服农民是多难。本地人说服农民还容易，外地人更难。你说的头头是道，但他心里总要看看。当然，农民中有一部分是比较先进的，比较容易接受，但是大部分是还是要看看。还有少数是极落后的，那要很久才能通。过去土地改革是这种情况，现在互助合作也是这种情况，并且这还是个新问题。过去土地改革是分田给他，他还那样，现在这样搞，他就更容易误解，更容易顾虑。农民这个弱点是他的经济情况养成的。

了解了农民的特点，那末应该怎么办呢？要使农民自愿参加，必须进行教育，没有别的方法。要完全使他消除顾虑，他才能自愿，一次说服不行，他不听你的，你只好等待。另外，要把先进的农民组织起来，作个样子给他看，用事实说服他，边讲边作，边作边讲，经过说服教育和示范，使他真正弄清楚，消除顾虑，自觉自愿参加。只能采取这样的办法。任何一次农民运动都是如此。假如对农民采取强迫手段，拿对付剥削阶级的手段对付他们，那完全违反了马列主义原则，是不应该的。农民可不可以强迫呢？可以强迫的，蒋介石不是强迫了他吗？要他当兵他就当兵，要他作什么他就作什么。我们可不可以强迫他呢？我们也可以强迫，今天政权在我们手里，给他戴个帽子，办他几个，但那有什么好处呢？这不仅是违反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而且还会闹出大乱子。农民闹翻了那可不得了啊！四万万七千万，他们都是身强力壮的。农民闹翻了，工农联盟破裂了。同农民发生了矛盾，就麻烦得很。蒋介石那样大的势力，农民都把他打下来了，你现在想对付农民？那末能不能说服呢？能。这必须适合他的利益。所以我们的章程，

各种办法都要强调互利，不互利就不能自愿，他自愿也是假的，最后他还是闹翻。无论合作社也好，互助组也好都是这样，要对他有利没害。他就是有顾虑，有一些误会，我们这样去作，慢慢地一次说不通两次，外面人说不通本地人说，他总会通的。为什么国民党不能争取农民呢？就是因为农民感觉上当。为什么农民拥护我们呢？就是因为我们给他好处，给他减租减息，帮助他打敌人，保卫他的家乡，分田给他，现在又搞互助合作，对他也有利。不仅说给他听，而且做给他看，确实有好处，他为什么不来？对他不利的事，那是不好办的。但是，这里也有一部分人，你做好了他还来不来。农民中间有各种关系，比如互相有点成见，他就不来了。真正落后的也有。对这些人只好耐心等待他，要有时间，最后他还是会来的。

贯彻自愿原则，防止强迫命令，必须：

(1) 在发动群众参加时，要将召开代表会议和个别串连相结合。光开代表会不行，农民运动只一般地讲一套不行，还要个别串连。我们现在发展互助合作也是如此。要搞互助组，你就要把比较积极的个体农民找来几个，然后一个串连几个，发展到十几个人。要搞合作社就要先找几个比较先进的互助组，先打通互助组长的思想，个别谈，个别串通，一个串通好，他再去谈。但也不是一说全组马上就来，也是先找几个进步分子谈，然后再谈其他的人。开始少数人通，慢慢地多数人通，最后全体都通。

(2) 规定互助组、合作社的章程、制度时，必须根据群众生产的需要与他们的政治觉悟的水平，由不合理到比较合理，再到完全合理。现在我们有一个合作社章程，这还只是一个草案，各个地方不能完全照这个章程去套，还要看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互助组更必须要适合大多数农民的要求，别的地方的经验只供参考。

自己要办好，必须根据自己组里社里群众的觉悟水平、具体情况来办，要合乎大多数人的要求，不合乎大多数人的要求，章程再好也是脱离群众的，执行不通。

(3) 在调处内部关系的时候，仅仅说服教育也不行，必须要将原则教育与调节经济利害关系相结合。一方面要说服教育；另一方面要照顾彼此利害，彼此有矛盾的时候，要顾此顾彼。光教育不解决利害关系是不行的。这也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这个问题必须使干部弄清楚。我们有些干部，开始他也是用宣传说服教育的方法，他说不服火就来了。你说他开始就强迫命令，那还是少数。他本事就那样大，两句话就说完了，人家不服，不听，他就急了，就采取强迫命令或是戴大帽子的办法。这个问题必须从思想上来解决。列宁说过，要改造小农，是几代工夫的事情。改造小农，健全小农的全部心理，就要有物质基础，要有技术，要在农业中大规模采用拖拉机和机器，大规模实行电气化。列宁的这些话完全合乎我们中国的情况。所以，改造小农，健全小农底全部心理，是需要几代的时间，要到我们的孙子。农民几千年就是这样的习惯，那里能那样容易地就把他改造过来。我们所有的干部要了解，和农民的合作是长期的事，如果你强迫他，他也可以服从，但长期下去要闹乱子，要葬送全部事业。

(二) 采取各种过渡形式，循序渐进。

开展合作化运动，要根据中央的指示，循序渐进，这也就是像列宁讲的，不要超过群众运动发展的水平，不要超过群众的觉悟水平、经验水平，而要从群众的经验中、斗争中去推进。

现在在全国来说，中心环节是搞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根据这几年来来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规律来看，一般都是由低级到高级，这是合乎群众的觉悟水平、经验水平的。开

始是临时互助，以后是季节互助，长年互助，最后是合作社，这是很自然的。因为还是临时互助、季节互助、长年互助，还是各管各的，合乎农民的私有心理、单独经营的习惯，使他顾虑不多。同时，把互助合作搞好了，使他确实生产增加，收入增加，慢慢从他自己的经验中感到这个不错，这个好，他的私有心理就慢慢改变了，参加了集体劳动之后，他的个体经营的习惯就慢慢改变了，他会觉得合作社合到一块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老区已经经过很多年了，新区当然不要这样多年，但也总要经过一个时期，经过这个阶段。一个地方连互助组都没有的，开始当然是搞好临时互助、长年互助，再办合作社，“循序而进”。一般说，现在在新区，对长年互助组要有很大注意，如果基础不搞好，秋后大规模地发展合作社就难办。还是通过这个基础比较稳，比较自然。在老区当然主要是合作社了。各个地区要看自己的情况。

在全国范围来说，第一个五年或是第二个五年的中心环节是农业生产合作社，半社会主义的，土地入股，统一经营，按土地、劳动分配。可不可以办高级社呢？可以办高级社（土地不分红），但是今天一般还是个别的试办，而且要有条件。不要随便把初级社转为高级社，转变要很慎重，要具备一定的条件。由互助组转到初级社都要有条件，何况由初级社转到高级社呢？各个地方由初级社转到高级社的经验可以研究。我个人想，初级社与高级社的不同点，就是高级社是土地不分红，完全按劳取酬。土地不分红好不好呢？好。劳动积极性可以更提高，生产更发展。但是问题就在于那些没有劳动力的，或者那些本来有劳动力，因为病或其他原因暂时丧失了劳动力的人，没有办法处理。另外，农民对土地有依赖心理。农民对土地是有感情的，因为他过去一直靠

土地为生，这种心理的改变也要有一个时期。当然，这个问题是次要的，主要的是如何安置这些没有劳动力、或暂时丧失了劳动力的人。这些人，土地分红，就可以依靠土地为生，虽然少，但总可以分到一点，你把土地分红取消了，他们怎么办呢？解决这个问题，我想主要的有两个条件：一是合作社生产大大提高，收入大大增加。合作社要多种经营，保证每个社员有事干，有做粗活的，有做细活的，老人带小孩、养鸡、养鸭，都有活干。有活干就可以得到报酬，就可以养活自己。比如，像我这样的人，参加了合作社，让我坐在那里就糟糕，下地我也不会，但是让我当个会计，或看看小孩，那还是可以的。要做到这样，就需要合作社的生产发展，如果生产不发展就不可能安置这些人，就没有活给他们干。在这种情况下，你把土地分红取消了，他一家几口靠什么为生呢？另外就是随着社的生产的发展，合作社的公益金逐渐增加，以公益金来补助社里暂时丧失劳动力的或永远丧失劳动力的人。到这时才可考虑土地不分红的问题。这是个基本条件，没有这一条就不行。二是提高社员的觉悟水平。这就靠我们教育了，要经常进行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逐渐改变和减少农民的自私心理，树立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思想。有了那样的经济条件，再加上这个思想条件，他的个人打算就会少一些。光有前面那一条，不进行教育，也不行。当然，一朝改变也不可能，要逐渐改变、逐渐减少土地报酬。所以，突然把土地分红取消，还是不容易的，必须采取逐步过渡的办法，就是在合作社生产发展过程中，把土地报酬与劳动报酬比例逐渐改变。比如，今年土地、劳动是对半分红，过了两年就变成四六分红，再过几年变成三七分红，逐渐缩小土地分红。我看由初级社转到高级社的条件、步骤大致上是这样。要照顾社员生活，使他能活下去，而且活的并

不坏，大家都满意。今天一般的都没有这种条件，所以今天不适宜去谈这个高级形式。当然个别的也有，但一般的不要过急地去转高级形式。

合作社在今天的主要特征，就是土地入股，其他生产资料是不是入股呢？要看情况。一般的不宜把所有的生产资料公有化了，还是首先把这个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入社共同使用，其他的如牲口、农具，在今天初办的时候，或是办了一两年，生产不那样高，原则上还是采取出租制度比较适当，个别的可以逐步的入股、折价。这些必须根据各地情况逐步的过渡，而不是采取那样突变的、迅速的、跃进的办法。这样是合理的。

公积金、公益金的积累问题。这个问题要有一个杠杠，或是百分之十或是百分之八，但各个地方执行的时候要看具体的情况。各省、各县、各区、各乡都不同，不能机械地完全按照章程办事。公积金、公益金积累多一些好不好？好，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公积金、公益金积累多嘛！就是要我们的公共财产多嘛！公有的东西慢慢的多了，什么事情都好办，生产也就有办法了。但问题是公积金、公益金积累的多少，决定于生产发展的多少。如果公积金、公益金积累太多了，分红就少了，那社员就不满意。农民加入合作社，第一指望增产，第二指望有我的。要使农民的收入每年有所增长，今年多分一点，明年多分一点，后年多分一点，他就高兴，这个社就很容易巩固。

关于大社、小社问题。一般规定是由小到大。每一个群众运动都是如此，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由点到面，由无到有。互助组、合作社也是如此，特别是合作社，开始办的时候不应太大，因为农民的能力有限，你也不能每个社都派区委书记、县委委员去领导，哪里来那么多干部？干部只好就地取材，各个社都要农民

自己来领导。农民过去都是个体经济。过去乡村里面一个富农雇五个长工的就很少，一个人领导五、六个人是不容易的。所以，由个体经济转到集体经济，一下就发展这么多，这么大，又要计划，又要团结大家，这个领导很难。所以要培养农民的领导力量，而这就需要有时间。当然，也有个别农民的本事大的，如耿长锁^{〔1〕}这样的人就很突出。一般的农民可以培养，但是要有时间。在各种生产制度的改变上也要逐渐地来。由互助组转到合作社，是会发生一些新问题的，这些问题如果小心处理，比较容易解决。是不是我们永远是小社会主义、搞小社呢？不是的，将来要发展到上百户、几百户。资本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基本法则就是大生产比小生产好，合算。所以，我们不是小社会主义，不是不喜欢大社，而是要有一个过程。

这里发生这样一个问题，是几个社合并呢？还是一个社逐步扩大呢？原则上应该是一个社逐渐扩大好。因为社与社合并矛盾很多，农民要打小算盘，我这个社里的牲口多一些呀，土地好一些呀，我这几年经营的很好呀，等等，这个账一算，就很难搞了。是不是完全照我们的理想呢？农民硬要办两个社，你不准他，那不合理。有些大村，你也不能说这个村就办一个社。所以，将来总是会有几个社合并的问题。几个小社合并为一个大社，中间是有矛盾的。但这个矛盾是可以解决的，解决的办法：一个是教育；一个是调节利害关系。这个问题我们现在的经验还不多，要研究一下。

互助组的内部关系也不能机械地解决，如人畜换工，评工记分等等，都要按照组员的觉悟水平，按照彼此互利的原则，采取各种过渡办法来解决，使之由不合理到比较合理，到完全合理，不能机械化、公式化。在互助组里头要贯彻互利精神，但互利并不

等于完全等价，有些还多少带点剥削。他有牲口，你就没有牲口，你把他的牲口价钱折的太低他就不干了。要基本上做到两不吃亏，基本上差不多。

（三）必须注意各个地区的特殊条件。

中国是一个大国，自然条件、政治经济条件，各个大区、各个省，甚至各县、各乡都不同，差别很大。发展历史也不同，比如华北有十几年的历史，东北有七八年的历史，有些地方只有几年的历史，有些地方土改刚刚结束，相差很多。工作上又有先进区、中等区和落后区的不同。在组织形式上，各个地区不同，这个地区是以这种形式为主，那个地区是另一种形式为主。在一个大区内，各个省有所不同，一省里头也有所不同，甚至一个县里头也有所不同。互助组、合作社的发展速度各个地区也不同，比如今年华北就是四万二千个社，西南只有一千多，相差几十倍。这不是说西南就不行，而是历史条件不同。所以，毛主席指示，发展互助组和合作社的计划不要勉强。毛主席说要赶上，但不要勉强迎头赶上。赶上要有时间，不要看到人家走得快，自己就急，不要平均主义，而是要根据自己地区群众的生产需要、觉悟水平、经验水平和各方面的条件来决定。上面的计划订得太大了，下面必然要冒进。现在许多干部单纯的任务观点还是有的，你的任务分配的大了，他就急。你也急，他也急，急了就冒进。另外，计划订的过小了也要被动，结果是天天增加计划。这就要根据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办事。现在在各个地方的计划我们都是同意的，到秋后还要看一下，各个地区有增加的，有减少的，你们自己订一下，报到中央批准。一般看来，如果秋收收的好，秋后是一个新的高潮，我们要作准备。在秋前就要作好计划，在政治上、组织上、技术上都要作好准备工作，免得到时候手忙脚乱。

（四）必须根据社会主义精神，正确处理社内外的关系。

刚才说了，社内社外是有矛盾的，社内新社员老社员的矛盾，劳动力多的与劳动力少的矛盾，出力多与出力少的矛盾，社外大社与小社的矛盾，这个社与那个社的矛盾，合作社与互助组的矛盾，等等。这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怎样处理这些矛盾呢？就是要用社会主义精神处理。我们同资本主义有本质的不同，资本主义的原则是利用自己的经济优势来剥夺那些落后的，把人家排挤与剥夺得越艰苦、越落后，他就越发财。社会主义则不是这样，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先进的帮助落后的，大的帮助小的，强的帮助弱的。我们要拿这种社会主义的精神教育社员，教育干部。互助组应该帮助个体农民，合作社应该帮助互助组，也应该帮助单干户，在技术上帮助他，在经验上帮助他，甚至在劳动上、经济上也要适当地帮助他。这才是社会主义的精神。如果你建了社，就利用自己的优势盛气凌人，抠人家，这就不是社会主义的原则，而是资本主义原则，是我们坚决反对的。我们帮助这些人有什么好处呢？第一，可以团结广大群众，不断扩大自己的阵地，互助组可以扩大，合作社也可以扩大。第二，可以限制资本主义的剥削范围，你帮助他，他的困难解决了，资本主义、富农就不能剥削他了，就限制了富农的发展。第三，可以提高整个的社会生产力，大家都增产了，当然整个的社会生产力发展了，大家都有好处。这次各地方的同志反映，各地方创造了不少合作社带动互助组、帮助单干农民发展生产的经验，这些经验我们认为很好。方式有各种各样，如开乡人民代表会议，互助合作代表会议，互助合作联席会议，技术会议，或者组织互助合作联合会，交流经验，解决问题，互相帮助，解决困难。我想这是有极大意义的创造。要推广和传播这种经验。我们只有靠这种精神，再加上经济关系上的

适当调整，才能解决社内外的矛盾。在社与社合并的时候，在吸收新社员的时候，老社员要帮助新社员，资本比较雄厚的、生产比较好的，应该多帮助生产比较低的。要多照顾人家，不能那样平均。如果不强调这个教育，矛盾永远无法解决，几个社也不能合并，新社员也不能进来，你有什么法子发展呢？这也是农民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问题。吸收了新社员，或者几个社合并，生产力提高了，把这个大帐一算，就容易了解了。

注 释

- 〔1〕 耿长锁，当时是河北省饶阳县五公村党支部书记、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全国劳动模范。

关于农业、林业、水利的五年计划*

(一九五四年七月十三日)

第一部分 发展农业的计划

(甲) 农业与工业的关系。

农业是工业的基础。农业的发展必须与工业的发展大体上平衡和适应，不然就将影响整个经济发展的部署和工农联盟。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头两年，农业生产的增长是不快的，很多农产品供不应求，去年特别感到粮食和油料的缺乏，所以有些农产品要实行统购统销，但根本的办法还在于增产。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农业方面的任务，除努力使农业生产与工业发展和人民需要大体相适应外，还应为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农业发展做好必要的准备工作。

(乙) 几种主要农产品的生产计划。

一、粮食生产。

我国战前（一九三六年）粮食总产量为二千八百多亿斤。一

* 这是邓子恢在国务院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会议上的发言。

九五二年粮食总产量（台湾省前后均未计入，下同）三千二百七十一亿斤，播种面积一十八亿三千万亩，亩产一百七十八斤。一九五七年计划总产量四千零六十七亿斤，比一九五二年增产百分之二十四，播种面积一十八亿七千万亩，亩产二百一十七斤，增产百分之二十一。

如果按人口平均，则一九五二年每人（以五亿八千万人计算）为五五〇斤，一九五七年（以六亿四千万人口计算）为六五〇斤。如按我国一般习惯，一般中等人家，大口小口，每人每年三石六斗大米，则每人每年要八五〇斤稻谷。如按此计算则全国粮食总需要量一九五七年应为五千五百亿斤，第二个五年计划结束时（一九六二年按七亿人口计算）应为六千亿斤，第三个五年计划结束时（一九六七年，按八亿人口计算）应为六千八百亿斤。如能达到这个标准便可以算做足食。

如以这个足食标准来衡量，那目前的供应量则还相差很远。

从几种主要粮种来分析，第一位是稻谷。一九五三年稻的播种面积占全国粮食播种面积的百分之二十二，产量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百分之四十一强，一九五七年稻的播种面积占全国粮食播种面积的百分之二十三点二，产量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百分之四十三点四。因此水稻生产在我国粮食生产中有极重要的意义。在粮食生产中占第二位的是杂粮（包括玉米、高粱、小米、绿豆）；再次是小麦；第四是薯类（四斤折一斤）；以下是

二、经济作物的生产。

经济作物的生产，最主要的是棉花。我国战前棉花最高（一九三五年）年产量为一千六百九十八万担。一九五二年棉花产量为二千五百八十万担，已远超过战前。一九五二年棉花播种面积为八千三百九十万亩，每亩产量为三〇点八斤。一九五七年棉花

生产量计划增至三千七百四十万担，播种面积达九千八百四十万亩，每亩平均产量三八斤。只要合作化搞得好，有肥料，棉花的增产计划是可以完成的。

在农产品中除粮、棉外，油料（包括花生、菜籽、芝麻三种）的供求关系目前也是紧张的。为解决食油问题，应大量养猪和发展山区油料作物，如核桃、茶籽、花椒、椰子、葵花籽等。

三、耕地面积分配

一九五二年全国耕地面积为一十六亿一千万亩，播种面积为二十亿六千八百万亩。一九五七年全国耕地面积将增至一十六亿四千万亩，播种面积增至二十一亿四千万亩。一九五七年播种面积较一九五二年增长百分之三点五。其中：

粮食播种面积，一九五二年为一十八亿三千万亩，占总播种的百分之九十一；一九五七年为一十八亿七千五百万亩，占播种面积的百分之八十八。

经济作物播种面积，一九五二年为一亿七千九百万亩，占总播种面积的百分之八点九；一九五七年为二亿四千五百万亩，占总播种面积的百分之十一点四。

其他农产品（包括蔬菜瓜果等）播种面积，一九五二年为五千二百万亩，一九五七年为六千二百万亩。

（丙）完成农业的生产计划，有其困难的条件，也有其有利的条件。

困难的条件：（1）自然灾害。今年的灾情就很重，而且都在高产区，受灾面积已达四千多万亩，并在增加中。（2）分散的小农经济，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很低。（3）生产设备落后，畜力耕种，旧式农具，自然肥料，人工灌溉（如按耕作技术来说，则我国有许多地区还不算落后）。（4）耕地面积不足。全国人口平均每人约

二点五亩，按农业人口计，每人约三点二亩。（5）调查统计资料不可靠。

实现计划的有利条件：（1）土改后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2）合作互助运动高涨，合作化上了轨道，许多县区干部有了经验。（3）耕作技术改革已有了相当的成功经验，如改良籽种、防治病虫害、推广新农具等，很多都收到了成效。关中推行的小麦新种碧蚂一号，非常成功，西北小麦今年成为历年来第一个丰收年。

（丁）实现农业生产计划的道路。

要提高农业生产量，不外扩大耕地面积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两个方面。

但大量地扩大耕地面积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才能解决的。据估计我国全部可耕荒地约十五亿亩，其中：东北二点五亿亩（主要的在黑龙江、松江两省），华北二点一亿亩（绥远^{〔1〕}就占二亿亩），西北八点二亿亩（青海二亿亩，新疆五亿亩），华东一千万亩，中南四千六百万亩，西南六千万亩（主要在西康^{〔2〕}）。全国可耕荒地中，经过重点调查的有四点二亿亩，其中：东北二点五亿亩，西北一亿亩，中南三千二百万亩，内蒙古二千八百万亩，华北八百七十万亩，华东四百四十万亩。

第一个五年计划，准备开荒三千万亩，勘察荒地一亿亩；第二个五年计划，准备开荒七千万到一亿亩；第三个五年计划，准备垦荒总面积要达到三亿亩至四亿亩。

开荒的方法：（1）合作社开荒。合作化后，一般有四分之一的剩余劳动力。合作社可以就地开荒，也可到远处开荒，这是五年内开荒的主要方法。（2）国营、劳改、军垦农场开荒。（3）个体农民移民垦荒。（4）另外，还可变相地扩大耕地面积，如扩大

灌溉面积，减少受灾面积，开发山区作物，如薯类、茶叶、果类、柞蚕等，使农业上山。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农业增产的最主要方法还是依靠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增加复播指数；这就必须实行合作化，并在合作化的基础上进行局部的技术改革。

今年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已发展到十万个，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好的。明年估计可以发展到五十万个以上。一九五七年计划发展到一百八十——二百万个。一九五七年，农业生产合作社将包括农户四千五百万户左右，占全国农户的百分之四十左右；耕地面积七亿亩左右，约占全国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四十五左右。

按地区来说，五年内合作社的发展主要是在东北及晋、冀、鲁、豫、淮北、苏北等地。在这些地区要达到百分之五十到六十的农户加入合作社，也即是基本上合作化了。南方新区可以做到百分之三十到三十五的农户加入合作社；但富庶的平原地区、高产区、经济作物区，则应使其先一步合作化。

合作社的优越性：（1）确保增产。可以因地种植，地尽其力，利于改进技术，并能够充分利用劳动力。（2）易于为农民所接受，而且可以逐步加以提高。（3）便于使小农经济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

到一九五七年除合作社外参加互助的农户计划发展到占全国农户的百分之四十五，耕地面积也将占全国耕地的百分之四十五。

农业的增产，首先是靠合作社，互助组。第二是个体农民，个体农民仍是农业生产中的一个重要力量。第三是国营农场。

现有农场（包括国营、劳改、军垦三种在内），共三千一百三十个，占有土地二千一百二十七万亩，已耕地七百零九万亩。到一九五七年播种面积将增至二千余万亩，若每亩产粮以二百六十

斤计，则三种农场将生产粮食五十二亿斤，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百分之一点三。

一九五七年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粮食播种面积将达八点五亿亩，如每亩以二百三十斤计，则共可产粮一千九百五十亿斤，占全国粮食产量的百分之四十七点五。

一九五七年，互助组的粮食播种面积也将达八点三亿亩，如每亩按二百一十斤计，则共可产粮一千七百四十亿斤，占全国粮食产量的百分之四十三点五。

一九五七年，个体农民的粮食播种面积只有一点七亿亩，如每亩按一百九十斤计，则共可产粮三百二十亿斤，占全国粮食产量的百分之七点七。

（戊）在合作化基础上的一系列的技术改革措施。

组织起农业生产合作社，实现农业技术改革的可能性增大；同时，技术改革又将促进合作化的发展。

（1）改良农具。五年内计划推广一百二十万到一百五十万架马拉犁。这是改良农具的最主要的部分。除马拉犁外，其他如新式步犁，收割机，播种机也可逐步推广。

逐步发展拖拉机站。现有拖拉机站四十九个，到一九五七年将增至二百至三百个。拥有一万二千台拖拉机（每台按十五匹马力计）。一台拖拉机的年工作量为一千五百亩，则全部拖拉机站共可耕种土地一千八百万亩。拖拉机站主要的是建立在北满^{〔3〕}劳力缺乏、农事季节短的地区和华北等地的经济作物区。

（2）兴修水利。合作化后，须紧跟着解决水利问题。

（3）肥料。合作化后，施肥量一般将增加百分之三十。一九五七年磷肥和化肥的产量仅一百万吨。第一个五年，饼肥总共生产一千四百五十万吨。这对我国农业肥料的需要量来说差得很远，

因此五年内主要的还是靠养猪、养羊、人粪、畜粪和农家造肥。

(4) 推广良种。五年内，计划在三点七亿亩土地上推广由国家供应的良种。另外群众就地选种的也可达八点二亿亩。

(5) 防治病虫害。几年来推广农药农械是有成绩的。有些杀虫药效果很大，农民也逐渐习惯使用。

(6) 其他方面农业技术上的改革，如精耕细作，合理密植等，均可推行。

五年内，由于合作化及一系列的技术改革措施，农业单位面积产量平均可提高二成（百分之二十），再加上由于耕地面积的扩大所增产的粮食（五年内计划扩大耕地面积三千万亩，播种面积增加三千八百万亩），共增加粮食八百八十亿斤；到一九五七年粮食总产量可达四千亿斤以上。

第二部分 发展畜牧业和水产业的计划

(甲)畜牧业。

一、大家畜（包括牛、驴、马、骡）。

畜牧业中主要的是发展大家畜。战前一九三六年，全国共有大家畜六千一百八十四万头。一九五二年为七千三百九十九万头，较战前增加百分之十九。其中：牛增加百分之三十六，马降低百分之七，骡降低百分之六十六，驴增加百分之十三。

一九五七年大家畜计划增至九千三百九十七万头，较一九五二年增加百分之二十七。其中：牛增加百分之四十，马增加百分之三十二，骡增加百分之十六，驴增加百分之十五。

二、小家畜（包括绵羊、山羊、猪）。

一九五七年较一九五二年，绵羊增长百分之八十五，山羊增

长百分之七十六，猪增长百分之三十四（一九五七年猪增至一万一千八百七十头）猪的生产量不能满足需要，应积极发展。喂猪主要是靠农户，同时也可提倡农业生产合作社来喂。如一个合作社除社员家里喂猪外，再喂十头猪，则一九五七年，二百万个合作社就可喂二千万头。而且合作社一般的要比个体农民喂得好。国营农场也应喂猪，并把农业与林、渔、牧业结合起来。此外，还可以利用城市的残羹剩饭，在城市周围设立养猪场。驻在城市郊外的机关部队亦可喂猪。

三、改良畜种。

要设种马站，有些地方可以试用人工授精的办法。

四、发展畜产品（包括羊毛、奶、油等）。

各种畜产品一九五七年较一九五二年将增加百分之三十。

（乙）水产。

一九五二年全国水产为一百七十三万吨，一九五七年计划增至二百七十万吨（争取达到三百万吨）。一九五七年全国水产产量较一九五二年提高百分之四十。

（丙）发展渔、牧业，也必须积极推行合作化。渔业合作社现已组织了不少，但畜牧业的合作社刚在试办，现在还没有一套经验。渔业中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对于这种企业可采用国家资本主义⁽⁴⁾形式来改造。牧畜业中有牧主，应如何处理，尚在研究。

国营牧场：一九五二年国营牧场共八十二个。一九五三年国营牧场八十五个，有马一万一千头，牛一万七千头，羊十二万只，猪三千只。一九五七年国营牧场将增至一百四十个，有马一万七千头，牛五万八千头，羊三十二万只，猪约为二万只，正在计划扩大。

国营水产企业：现共有十八个单位，其中：海洋捕捞九个，海

洋养殖两个，淡水捕鱼两个，淡水养鱼五个。另有水产运销公司七个，冷藏加工厂十一个，制鱼肝油厂四个，修船厂四个，制网厂两个。

全国现共有渔船：机轮二百九十一条，其中属国营的二百四十八条，共一十二万二千吨；机帆船十四条，其中属国营的九条；帆船三十八万四千多只，其中属国营的三百多只。水产增产主要靠造船，增加船只。

第三部分 发展林业的计划

一、木材生产。

五年内共计划采伐木材九千七百三十五万立方米，其中收购私有林的二千九百三十八万立方米，占百分之三十弱；国营采伐的占百分之七十强。

现有森林工业管理局六个，其下有五十一个单位，职工三十万人，其中干部三万多人，固定工人十五万八千人，临时职工十一万多人。

经营购销业务的木材公司，有三十六个单位，职工一万五六千人。

木材目前有“供过于求”的暂时现象。各地积压约八百五十万立方米。其原因：（1）经济核算后，各用材单位节约，有些订了合同的不要了。（2）合作社的木材经营没有赶上需要，农民要木材，但中间断了，木材下不去乡。（3）对私商完全强调限制而没有注意利用。（4）华东、中南的木材，主要的是私有林的木材，采伐量超过计划。这是因为总路线^{〔5〕}公布后，林农怕“社会”，从而大量砍伐。（5）木材的收购价格过高。虽已降低百分之十，但

有的地方下降不多，有的地方还是高，还应考虑再降。（6）由于改变了检尺制度，把旧的“两码”改为“立方米”，立方米与两码比例定得不适当，致农民多砍小树；因此，在私有林区木材收购工作中，应该重新改变立方米与两码的比例。

目前木材积压不过是一种假象。从全国来说，森林资源是不够的，木材的生产是赶不上需要的。关于我国木材的蓄积量，有两种估计，一说：二十七亿立方米；一说：三十八亿立方米，就使有三十八亿立方米也是不够的。由于我国木材资源缺乏，一方面应积极造林，另一方面应积极节约使用木材。苏联专家对我们使用木材是有意见的，认为我们大材小用，优材劣用。为了解决木材资源不足的问题，除大力造林外，应制定护林、采伐、用材等森林立法。

二、造林。

五年内，计划造林一亿零八百万亩，其中：经济林（包括用材林）七千一百万亩（主要在闽、湘、赣、两广等省），占总造林面积的百分之六十五；防护林和水源林（防沙林主要在东北、西北，水源林主要是淮河、黄河的上游）三千七百万亩，占总造林面积的三分之一强。

林场迹地更新：八百二十万亩。

造林的方式：主要靠合作造林。其次，个体农民造林。再次，国家造林。铁道、公路、矿山等企业可以就地造林，谁造的林，木材即归谁使用。此外应利用国家资本主义造林，即：采用租让制的办法，订下合同，多少年以后收回。这样一方面造了林，另一方面吸收了游资。为此，应起草一个承担荒山荒地造林的条例。

林木一般是多年生的，必须与当年收益的生产相结合，使林业生产与农业生产相结合，在插苗后的头几年要利用树苗之间的

隙地种植粮食或其他作物，造林是混合经济，造林的同时还要注意发展山区经济作物。

必须注意南方亚热带的开发。我国两广、海南、福建、云南等地有很多经济价值很高的作物，如咖啡、胡椒、菠萝、椰子、木棉、油梨、油棕等。目前应加强调查工作，开始试办和培育种子，准备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作更大的发展。

三、植胶。

原计划六年植胶八百万亩，现在看来是办不到的。因此，压缩为八年内植胶二百万亩，已完成七十万亩。现有职工七万多人。五年内总共需拨款四万六千亿。植胶亦应采用综合经济，不然就不易充分利用劳动力。过去由于这方面没有注意，现在植胶工人有很多闲工，劳动力不能发挥。今后必须加以改变。

四、林野调查。

今后三年的调查经费需四千亿。调查方法：一种是航空测量，一种是地面测量。

第四部分 水利建设计划

五年内水利建设的方针是：减少受灾面积并扩大灌溉面积，主要为农业服务，同时为工矿业服务。

五年内对水利部的拨款为十七万六千亿，其中重大的基本建设投资为十一万六千亿，限额以上的（三百到五百亿以上）工程项目共五十一个。五年内主要的水利工程是整治淮河，今后三年将继续完成三个水库。

黄河的整治方面已列入五年计划内者，主要是加强堤防。根治黄河的勘察工作正在开始进行。

五年内对长江的治理，同样也主要的是加固堤防。长江较黄河的利大，但为患亦大得多。为根治长江，需蓄洪八百至一千亿立方公尺。但如果能做到蓄洪三百亿至四百亿立方公尺，长江亦可不致发生大问题。长江中游蓄洪最大的地方为洞庭湖，如修好可蓄洪二百三十亿立方公尺。

农田水利：主要是群众性的中、小型水利。五年内，将打井六十四万口，增添水车六十八万架，这可增加灌溉面积一千三百万亩。

中型水利的兴修，可采用群众出工，公家出料的办法，完全靠群众投资办不起来，完全由国家投资也办不到，完全靠贷款，也是贷出去收不回来。

统计五年内，水利建设计划完成后（包括国家大型和群众性中、小型的水利建设工程），可减少受灾面积二千五百万亩，可扩大灌溉面积五千七百万亩。这样到一九五七年全国将有水田（包括水浇地）四亿九千万亩（现有约四亿三千万亩），其中属国营农场的有六百万亩。

第五部分 投资分配

五年内，对农、林、水、气四个部门的投资为四十七万亿元（新近决定增加的两万亿元未计在内）。

其中：

农业部十一万七千七百亿元，占百分之二十五；

林业部十六万七千五百亿元，（包括森林工业和植胶两项投资十二万四千亿元在内），占百分之三十五点六；

水利部十七万六千二百亿元，占百分之三十七点六；

气象局八千五百亿元（一九五三年的投资未计在内），占百分之一点八。

农业部的十一万七千七百亿元的投资，分配如下：国营机耕农场三万四千亿元，省、专、县农场一千七百亿，拖拉机站和马拉农具站九千三百亿元，畜牧兽医一万七千亿元，水产六千亿元，中等技术学校一万二千亿，技术推广站九千三百亿，植物保护六千四百亿。

林业部的十六万七千五百亿元的投资，分配如下：森林工业七万八千亿元，植胶四万六千六百亿元，木材公司四千亿元，造林、营林三万三千八百亿元。

水利部的十七万六千二百亿元的投资，分配如下：大工程基本建设投资十一万二千亿元，事业费（包括防洪）六万三千亿元。

此外，财委最近批准增加的两万亿元，主要将用做为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所需的干部训练费。预计到一九五七年，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将超过二百万个，可能达到三百万个。如果按三百万个社计算，就需要训练三百万个会计。如每一位会计所需的训练费用为二十万元，就需六千亿元。同时五年内，每年每个农业生产合作社至少要有三个干部（包括生产管理、政治工作等方面的）需加以训练，今后三年共约有一千五百万人。如每人以十万元计算，就需一万五千亿元。以上两项合计就在两万亿元以上。

另外未列入国家投资的，但五年内的必需支出还有：水利勘察费用四千亿元，林业调查费用四千亿元，农业调查费用二千亿元，共一万亿元。这些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为第二个五年计划必须进行的准备工作，而这笔经费还没有着落。因此，我们要求对第一个五年中农、林、水方面的投资再加考虑。

注 释

- 〔1〕 绥远原是一个省。一九五四年撤销，辖区划归内蒙古自治区。
- 〔2〕 西康原是一个省，一九五五年撤销，金沙江以东划归四川省，昌都地区划归西藏自治区。
- 〔3〕 北满指哈尔滨、牡丹江、佳木斯、北安等地区。
- 〔4〕 在我国，国家资本主义是国家能够加以限制并规定其活动范围的资本主义，是把民族资本主义经济逐步改造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过渡形式。
- 〔5〕 指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具体内容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农业合作化的步骤与大体计划*

(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关于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步骤，中央已规定分做两步走：第一步叫做社会革命，就是合作化；第二步叫做技术革命，就是机械化。合作化又分两步走：头一个五年计划，基本上是完成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中央要求在全国范围内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农户参加这种合作化；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再来逐步解决转高级社、小社并大社及消灭富农经济等问题。这种半社会主义的初级社，是农业集体化的主要过渡形式，通过这种初级社把农民组织起来，以后再逐步转变，这是必经的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段。斯大林在一九三〇年《答集体农庄庄员同志们》一文中说：“不容许跳过运动尚未完结的形式”。我们现在这种初级社正是目前合作化运动的主要形式，这种形式要到一九五七年或一九五九年才能终结，所以转到高级社是下一个五年计划的事情，现在不能跳跃。而且就在那时也是先先后后参差不齐地转，不是中央下一个命令，统一规定在哪一年取消土地分红。小社并大社及消灭富农经济等问题，也要看各地各社的具体情况，先先后后分别解决，而不是统

* 这是邓子恢在全国第四次互助合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第二部分。会议于一九五四年十月十日至三十日在北京举行

一规定在哪一年一下子解决。

关于合作化发展的大体计划。各省提出到明年春前发展到六十万个社（东北十万，华北十五万，华东二十万，中南十一万，西南三万五，西北两万七），这个数目中央已经批准。但中央要求我们，只许办好，不许办坏，不许出废品，不能滥竽充数。不是光把社建起来，不管办好办坏，把建社和办社分开来，只管建社，不管办社，这是不对的。

在一九五七年以前全国参加合作化的农户要求达到总农户的百分之五十以上，这是从全国范围来说的。新区老区还有不同。老区会超过百分之五十，有些地方甚至可以到百分之七十或者百分之七十以上；新区可能不到百分之五十，或者百分之四十。全国是一亿一千六百万农户，如百分之五十以上合作化，就是六千万户左右，从全国来说这就是基本上合作化了。

合作社的户数，如以每社平均三十五户左右计算，全国办三百万个社，就是一亿零五百万户，那就达到总农户的百分之九十，这就可以说将近到了顶点了。可能有些地方平均数超过三十五户，那总社数就不能办到三百万个，而只能办二百五十万个或者二百万个社。因此，各地对建社的个数要有大体估计。现在各社平均是二十户，到一九五七年可能增加到三十户，有些地方还可能达到四十户，甚至五十户，这要看各地区的具体情况，人口的比重，乡村分散与集中的程度，自然环境，工作好坏与群众觉悟的程度来决定。发展到多少就不发展了，各地要有这样的大体计划，做到心中有数。总之，全国办到二百五十万到三百万个社大体上已到顶点了。到第二个五年计划，一般不是再发展新社，而主要是老社扩大并解决小社并大社的问题，两三个社、三四个社合成一个大社，三百万个社合成一百五十万或一百万个社，最后甚至再

缩成几十万个社。这不是今天所能预定的，要看将来情况而定。但是不是今天一下子就办大社，只办百把万个社就不发展了呢？那不行，今天还要由小到大。社的个数现在由少到多，将来再由多到少。这是合理的。这就是我们合作化的大体计划。

合作化运动的曲折与经验*

(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一日)

(一) 目前过渡时期党在农村工作的根本任务是通过生产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及几种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①等措施,逐步实现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生产合作又是这种改造的中心环节。生产合作是改变生产关系,改变农业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为农民集体所有制,是最后消灭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基础,是农村最深刻的也是最后一次阶级革命。它要为我国大规模发展农林生产与水利建设创造新的经济基础;要在新的物质条件下最后巩固工农联盟。这样一个严重的革命斗争与伟大的历史任务,没有我们党坚定的积极的领导是不会成功的。加强党对合作化运动的领导,巩固工人与农民的联盟,是完成合作化运动的根本保证。合作化与广大劳动农民的利益是基本一致的,但它与农民是小私有者这一特点又是有矛盾的,因此,在合作化运动中必

* 这是邓子恢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发言第五个问题,原题为《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这次会议于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一日至三十一日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在会议上提出了要在大约几十年内在经济上赶上或者超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设想。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决议》、《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

须记住毛主席的话：“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2〕}。一定要十分慎重，既要积极领导，又要稳步前进。

这几年来，农业合作化运动是有成绩的，合作社已发展到六十万个。但运动的发展是经过了微小的曲折过程。一九五三年春局部地区发生急躁冒进，在中央及时指导下得到了纠正，这就为以后的大发展奠定了可靠的基础。中央农村工作部在执行中央关于纠正急躁冒进指示的时候，没有注意防止某些方面的放任自流倾向，以致党内某些干部对于社会主义改造这个总方向的认识模糊起来，部分地区出现了自流现象。这个缺点，在中央和毛主席及时的指导下，也很快得到改进，因而从一九五三年秋前的一万四千多个社，一九五四年春发展到十万多个社，这一段的运动是比较健康的。去年秋收以后又有了迅速的发展，在这几个月的大发展当中，大部地区工作也是正常的，在局部地区和某些时间内，曾一度滋长了盲目乐观，简单从事，不按政策办事的偏向。我们在指导上虽然也屡次提到稳步发展的方针，但对各地所提出的发展到六十万个社的计划，没有及时压缩；全国有了这么多的合作社也没有发布过像样的章程，因而助长了某些地方的强迫命令和政策混乱的错误。这种错误，又和粮食工作、农村私商改造工作中所引起的紧张凑在一起，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工农关系，影响到合作社今后的发展。好在中央又已及时发现，并指示放慢发展速度，加强整顿巩固工作。如果我们能按此指示切实执行，合作化运动的正常发展还是有把握的。

（二）正因为经历了这些曲折过程，便使我们更进一步体会到中央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并在工作中获得一些良好的经验。

中央早已指示，党在农村中的根本路线是：依靠贫农（包括全部上升为新中农的老贫农），巩固地团结中农，限制和逐步消灭

富农剥削，发展互助合作。合作社是贫农和中农的经济联盟，只有合作社办得好，贫农和中农团结好，才能使富农更加孤立，才有利于限制和逐步消灭富农剥削。贫农是工人阶级在农村中的支柱，工人阶级必须依靠贫农去进行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但必须同时又巩固地团结中农。必须明确指出，团结中农是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最主要的政策环节。因为，我国乡村经济经过土地改革和生产恢复工作，中农化的程度是很高的，估计包括新老中农在内，老区占农户百分之八十，新区也占百分之六十至七十，‘他们拥有农业生产力的最主要部分。作为资本主义的富农经济，在土改以前所占的比重就是很小的，土改中受到很大削弱，土改以后又受到了各种限制，现在的富农经济一般不是上升的，而是下降的。因此，在合作化运动中，我们“不需要发动一次像土地改革那样的特别运动来消灭富农”。消灭富农经济的关键问题在于逐步改变私有制，实质上也就是一个改造中农小私有经济问题。由于我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相距不远，大部分新中农的经济地位还是不稳固的，他们一直是农村中的积极分子，他们的经济背景是需要合作的。党在老中农中的政治影响也是强大的，他们也是可以争取的，其中部分下中农是更容易争取的。这就是中农可以被引收到合作化的经济政治条件。但这并不等于说中农的两重性不存在了，不是的。中农在社会主义革命中一般仍然是抱着摇摆态度的，直到今天为止，中农当中的多数还是抱着一种可合作可不合作的态度，就是明证。如果我们再估计到由于我国工业现有情况，短期内不能拿出大批农业机器和化学肥料去改造农业装备。合作社的生产还须依靠农民现有的（主要是中农的）牲畜农具去进行；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可以从富农手中没收大批牲畜农具去解决贫农生产资料不足的困难。估计到这些事实，那就

不难理解在合作化运动中依靠贫农去团结中农，巩固贫农与中农的联合，对我们的事业有多么重大的意义。由此就要求我们党必须对团结中农的工作特别重视，格外谨慎。团结中农工作进行得好坏，将决定合作化事业的成败。而团结中农工作的好坏，又将取决于以下几方面的政策能否贯彻执行：

第一，应肯定现阶段合作化运动的主要形式是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因为这种合作社易于为中农所接受，又可达到增加生产的要求。这种半社会主义合作社实行了统一经营，又保留了农民对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私有权，这就是对中农一个重要的让步。有了这种让步，才引起中农对合作化的兴趣，从而使合作社在贫中农联合的基础上得到迅速发展。所以说，半社会主义合作制是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个必经过程，是目前合作化运动中不可逾越的形式。先实行了部分集体所有制，实行了统一经营、集体劳动，通过这些向农民灌输社会主义思想，使他们有了精神准备和物质准备。以后国家工业对农业的技术支援也逐渐增加了，再顺其自然趋势，逐步解决私有制的问题，而后转到完全集体所有制，这是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正确步骤。

第二，既然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既然保留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私有，在统一使用这些土地和生产资料时，就应该给以应得的报酬。这种报酬多少就成为合作社内部贫农和中农利害关系的主要关键；也就是保证办好社，巩固社，和发展社的重要关键。这就要求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处理采取正确政策与慎重的态度。

关于入社土地的报酬。为了刺激劳动力的积极性，这种土地报酬应该低于劳动报酬；但也不能规定得过低，要使得土地较多较好，而劳动力较少，在社外并无多大剥削行为的中农，在入社

后能够适当增加收入，至少要不低于他入社以前的实际收入。土地报酬的数量或比例要在一定时期内固定下来，不加变化。这样做，一方面可以使得生产增长的成果转为公共积累和劳动奖励；另一方面，也可以稳定社内外中农的情绪，而有利于合作化较为迅速的发展。至于土地报酬的逐步降低直到取消，也就是土地在实质上逐步转化为公有，要在合作社经过几年确实有了相当大的增产，社员有了一定的觉悟，才能分别情况逐步实行。

关于土地以外生产资料的处理（主要是耕畜和车、船等大农具）。在初建社时一般以采取私有公用的办法为好，公用要给合理的报酬，不应使所有者吃亏。经过适当时期条件具备以后，再逐步转归合作社公有，但必须按正常市价给以补偿，而不能无偿归社。这些价款由社员按土地分摊一部、大部或全部，不足之数用公积金偿付。价款可以分期偿付，但期限不能太长。根据三年来许多地方的经验，中农是可以赞成这种付价收买和均摊价款办法的。如果采取无偿归公或作价太低，或长期不还的变相无偿归公的办法，势必引起中农出卖和宰杀耕畜、破坏农具的严重现象，其损失就难以在短期内弥补起来。这不仅对贫农不利，对整个社会生产也是极端不利的。

这两个问题是当前合作化运动中广大群众注意的中心，也是社内贫农中农相互争执的中心，必须公平处理。此外，合作社所需要的种子、肥料和其他生产资金的筹集，也必须公平合理摊派，不能使贫农负担过重，也不能完全由中农负担。这些问题处理不好，片面照顾一方而打击另一方，合作社就不能巩固，也不能发展，社会生产也要受极大损失。当然在合作社内发展变相的富农剥削，是必须反对的。但片面强调照顾贫农利益，而使中农吃亏，也是必须反对的。必须了解在处理合作社有关社员经济利益的问

题时，一定要公平合理，彼此互利。只有公平互利，合作社巩固了，合作化运动发展了，才是贫农的最大利益。请各级党委负责同志随时注意这个问题，对处理得好的加以表扬，处理出偏向的及时纠正。

第三，为了团结中农要始终坚持自愿原则。领导者不积极领导，不进行教育说服，而采取自流主义，那中农是不会自己改造自己的。但不尊重中农意见，不坚持自愿原则，不善于等待中农的觉悟，而采取强迫粗暴态度，就会犯冒险主义错误。两年多以来，在这两方面虽未出过大错误，但小错误则是常有的。从最近看来，不善于等待的倾向还是主要的。目前有一部分农民，主要是老中农，也包括一部分新中农，不添车买马，不扩大再生产。有些同志看到这种情况，便主张与其让中农在社外波动，生产消极，不如把他赶快拉进来，早点合作化。这种主张是很危险的。我认为，中农生产消极，正是他们不愿加入合作社的表现。当他们不自愿入社时勉强要他们入社，只会增加社内的动摇与不满成分，造成合作社的长期不稳定状态。有些人还会因此进行种种抵抗，由生产消极到积极破坏生产，如杀牛、卖马、砍树等，甚至可能被坏分子利用来反对我们。这对合作化运动是极其有害的。因此，无论如何必须贯彻自愿原则，必须依靠教育说服，采取思想感化政策，来达到自愿。对于不愿入社的农民必须善于等待，等到他们的觉悟提高而自己愿意时，再让他们参加。不仅对多数人应当等待，对少数人也应当等待，绝不能以多数来强迫少数，要遵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等到最后一个人。对个别顾虑较多的中农要有这样的决心，“等他一辈子”。总之无论如何，对中农、对所有劳动人民绝不应该采取强迫粗暴的态度，而必须坚持自愿原则，这才符合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这里还应当肯定，只要合作化运动

进行稳当，合作社各种政策执行得正确，加上其他商业政策、价格政策、税收政策等各方面都能正确配合，那么个体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还有继续发挥的可能，因为他们为了自己的生活也是需要发展生产的。而这样做对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将更有利得多。认为中农生产从此消极，毫无改变的可能，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

怎样能够加速农民（主要是中农）入社的自愿要求呢？从这几年看，最主要的一着是办好现有的合作社。一般的宣传教育是需要的，但农民是最现实的，他们是要看事实的，不轻易听信人言。说服农民多数的最有力工具还是把现有合作社办好，使之确实能起示范作用。

因此，合作社的发展，必须坚持“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的方针。必须发展一批，办好一批，在办好的基础上求发展。今已办的六十万个社，务请各级党委督促办社干部，踏踏实实地办好。发展过猛的地方今年应停止建社，全力转入巩固工作。这一批社会主义据点将是吸引贫中农战胜乡村资本主义的基本阵地。巩固这一阵地，打好基础，而后再稳步前进，就可收事半功倍之效。否则仍要走回头路，要快反慢。

为了保证已建立的社能认真办好，充分发挥它对单干农民的吸收作用，正确规定发展速度就成为极重要的问题。计划定得太小，领导落后于群众，群众要办社，强迫他们不办，这是错误的。但计划太大，超过群众的觉悟水平与干部的经验水平，势必助长下面的主观主义。去年计划六十万个社，分配下去，一般地方是适宜的，某些地方就显得大了一些，加上当时忙于购粮，领导力量不集中，宣传有偏差，群众有错觉，就出现了违反自愿原则的错误。

总结了这些经验，并遵照中央把合作化速度放慢的指示，我

们曾初步考虑了几年之内的部署，大体是：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六年组织农户百分之二十一，连原有六十万个社共办社约八十万个。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组织农户百分之三十五左右，共办社一百二十万个左右。在这个基础上争取一九六〇年达到组织农户百分之八十以上，实现全国范围内半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化。

在部署速度时还须注意适当掌握合作社规模的大小与社数的多寡。从个体经济到集体经济，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如果合作社办的过大，农民自己难以掌握，我们又不可能每个社都派干部去，结果社难以办好。但也不能办的过小，社太小势必使每个乡办社过多，这又会使支部领导发生很大困难。一般经验，大体上初办的社不宜过大，以二三十户为宜，以后再逐步扩大。这种扩大，也不应一次扩得很大，而应按主客观条件分年逐步增加。我们初步估算一下，到一九六〇年组织百分之八十以上，全国办二百万个社左右。各地可按照此总规划部署各省、各县、各乡发展的社数与社的大小，并适当加以控制。原来部署得当的可照原计划去办，原来发展计划不周到的，再加调整。但不可急躁从事。例如一乡办社小而多的，不必立即合并，办社过大的也不必立即拆散，防止引起新纠纷。这需要根据当地具体条件，采取具体措施与适当步骤，帮助他们解决困难问题，达到适当调整。

第四，必须紧紧依靠贫农。贫农是我党在乡村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支柱。贫农和中农不同，在两条道路斗争中，贫农从本身经济利益出发，是更倾向社会主义的。只有依靠住贫农，合作社才可以得到坚决支持的力量。只有依靠贫农，才能有力地团结中农，孤立富农。不依靠贫农，而指望中农去自己改造自己，那是行不通的，从而也是错误的。依靠贫农除强调依靠现有贫农外，还必须依靠土改后上升为新中农的老贫农。这一批老贫农中只有极

少数上升为带有剥削行为的富裕中农，是难于依靠的。一般的新中农包括经过互助合作上升的富裕中农在内，只要对他们做好教育工作，只要对他们的经济利益按对待老中农一样地予以照顾，他们就可以成为党的依靠对象。这样党在农村中的依靠力量，少则占农户的百分之六十，多则占百分之七十以上。这说明党在农村中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基础是很强大的。也说明党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依靠贫农，必须包括土改后上升为新中农的老贫农在内。目前这个问题一般说是解决了的。但较普遍的缺点是对依靠现有贫农这一点注意不够，这是由于基层党的领导成份，多数已由贫农上升为新中农，从而他们的阶级观念开始模糊起来了。这就需要结合实际工作，进行整党、建党，加强教育，使之有所改正。

依靠贫农干什么呢？最主要的任务是：团结中农，发展合作。前边已说过在合作社的内部政策，是要对中农做必要的让步的，因此在依靠贫农时，一方面要在政治上组织上树立贫农的优势，使贫农真正成为合作社的可靠支柱；另一方面必须说服贫农懂得自己的基本利益，是团结中农把合作社办好，是争取社会主义的前途，为此对中农的眼前利益应主动予以照顾。在一切互相有争执的问题上，都要根据双方互利的原则相互让步，用相互让步来换得合作社的巩固与发展。这就是“合则两利，离则两伤”的道理。这个道理必须反复向贫农讲清楚，并依靠他们去执行。当然也要注意贫农在合作化这个总利益总要求之下，还有他们所关心的各种利益与具体要求（如评产高低，土劳分红，牲口作价，股金多少等等）。要保证贫农参加合作社以后比入社前有利，而不会吃亏，否则同样会打击他们的合作积极性，甚至离开我们。如果这样，贫农便不可能成为我们的依靠。从此可见，在执行依靠贫农，团结

中农，正确处理贫、中农间相互关系的种种政策时，作为测量工作好坏的标准，就是要看工作的结果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合作化。有利就对，不利就不对。除此之外，决不能另有其他标准和界线。

（三）我党在农村中今天面临着这样一个复杂艰难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但又缺乏丰富的经验，怎样才能把事情办好呢？我想最要紧的应该强调以下三点：

第一，要强调走群众路线。工作力求深入，要实现书记动手，全党办社。要纠正那种空喊口号，不去解决具体问题、创造经验的作风。比如说大家都喊要自愿互利，但如何达到自愿互利，许多同志却拿不出具体办法。为什么拿不出呢？就是因为原来有群众工作经验的干部在领导岗位上只对任务作一般性的布置，深入不下去，取不到直接的经验，因而心中无数。下边一批新干部，只顾完成数字任务，不懂得群众路线如何进行，想模仿又没有个好榜样，结果只能靠行政命令办事，因而把事情办坏。办合作社是一个新的经济工作，我们的经验尚未积累起来。各地亟须有群众工作经验的人带头，办出个样子来，然后由点到面逐步推广，慢慢把全体干部带会。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地委、县委书记以身作则，深入乡村，亲自动手；即使不能下乡长住，一年住三两个月也好，一定要逐渐做到由外行变成内行。按照中央指示，省委也要指定一个书记或副书记负责管理互助合作，亲自钻研，成为内行。这一条不实现，那一切都将无从谈起。

第二，要注意发现与培养乡村积极分子，形成办社核心，扩大党与群众联系的桥梁。目前大部乡村已有了党的组织和其他群众组织，这是很值得宝贵的，但要注意的是许多工作到了乡里都落在三、五个干部身上。这些干部思想作风好的，因整天忙于完成任务，没有时间向群众做耐心的政治工作，日子久了也和群众

有所隔离。思想作风品质不好的，就称王称霸，把好事做成坏事，甚或故意做坏事。县区工作人员或者因本身工作不深入，发现不了这种情况，或者发现了也不敢改变。因为即使发现了坏人，但如果还未发现好人，未把好人组成领导核心，也怕投鼠忌器，不敢更动，更动了也可能引起新纠纷。既然上级都不敢动他，群众就连话也不敢说了。这种情况现在并不是个别现象，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事。将来全国要办二百万左右合作社，每个合作社至少要有三、五个骨干，就需要六百万至一千万人，那么即使现有的骨干都是好人也是不够的。这里就给我们提出一个迫切的任务，需要有系统地结合当前工作，结合整党建党工作，开展党内外群众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对老骨干，要加强教育，端正他们的立场和作风，分别加以提高或改造。除此之外，还要鼓励与帮助他们通过个别串连，去物色培养新的积极分子，培养出一批后备骨干。比如一个合作社如能够培养五、七个到十个好的积极分子，形成核心，那么这个社即使遇到意外困难，也不至于垮台。现在不少同志做工作只是一般号召，只注意开大会，不注意个别串连的深入工作，不注意在工作中培养积极分子，依靠他们去联系群众，这个毛病是必须改变的。过去任务紧张，没有时间改变这个毛病，不能只怪下级。今后粮食购销任务定下来，合作化步子放稳了，事情可能不是那样忙迫了，这个问题就有条件解决。也应该认真加以解决。

第三，要加强县、区组织。这几年来，由于县、区干部上调外调太多，县、区领导核心确实有点削弱了。现在调干任务业已大体完成，中央已通知要把地、县干部稳定一个时期，这是很必要的。乘机机会把合作化的基础打好，新干部才能逐渐生长出来。省以上机关还可作适当的压缩，派一些干部去充实下层。

区一级干部，不只是质量弱而且数量也少。现在好多地方，一个区只有三、五人可以办合作社，每人管三四十个，确实抓不起来。苏联发展集体化时，先派大批工人下乡，以后又设立拖拉机站政治部，以补地方组织力量之不足。我们只靠区，区干部又少而弱，现在合作社不多，还可以勉强应付，以后一年年多了，就显得捉襟见肘。各地同志建议，采取土改时期办法，组织一批工作队去办社。我认为，这是必要的。土改是阶级斗争，是分配土地，还派了那样多的工作队。合作社是经济建设工作，是改造小农经济，比之土改要更复杂、更艰苦得多，没有专职干部，确实难以办好。我们估计，全国除从县、区现有干部中抽调十万人办社外，再拨十万人编成工作队，分期派出，大体可以解决问题。这样所费是不会太大的。为了办好合作社，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又可以从此培养出一批新干部作为将来地方党政干部的后备，就是花点钱，我想也是值得的。因此，建议此次会议讨论一下，并提请中央加以考虑。

最后，为了发展合作化，必须改变落后乡工作。所谓落后乡主要是指土改不彻底、封建残余势力没有彻底摧毁的乡村而言。这种乡村各地都还有一些，情况是很严重的。据福建龙岩县委反映，该县适中区的一个落后乡，初步接触的结果，发现该乡恶霸隐藏步枪八十支、机关枪十余挺，并用两面政策掌握我们的基层政权，该恶霸与台湾、香港都保持经常的秘密联系。此类情况各地不会完全没有的。这样的落后乡如果不下决心，抽出时间加以改造，那么合作社就不可能发展与巩固，即使发展起来也不是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将来问题还要更加复杂化。因此，希望各省委、地委依照中央指示，作一次检查，并作出正式决议，部署一定力量，争取在一、二年内完成这个工作。进行这个工作时，必须限于反

封建补课的范围，不要和当前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混淆起来。同时也不能抛开当前任务，孤立地去进行。

注 释

- 〔1〕 统购统销是我国在建国以后陆续实行的对粮食、棉花、油料等主要农产品有计划统一收购和统一供应的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在当时有效地保障了城乡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基本生活的需要，保证了物价的稳定，促进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2〕 见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二版，第 1477 页。

目前合作化运动情况的分析 与今后的方针政策*

(一九五五年五月六日)

一 目前情况的分析

这一次大会发言，各地同志意见一般是一致的，没有什么分歧的地方，但有些地方也还要讲清楚。我想分这样几点来讲：

一、首先应该肯定，我们的成绩是主要的。从去年到今年（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五年）这一年度，我们的成绩是很大的。事实摆在那里，在那样短的时间，任务那样繁重，完成了计划，把决议变成了实际；虽然中间有些地方社发展多一些，有些地方出了一些毛病，但一般讲，运动发展是正常的，大部分是在互助组的基础上，特别是在办好十万个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今年六十几万个社大部分可以巩固的。这一点应该肯定。我在第一次讲话中也讲到了这一点，向中央报告也是这样讲的。不能说因为现在我们有些紧张，有些地方有些毛病，就把成绩否定了。或

* 这是邓子恢在全国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第六部分。会议于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一日至五月七日在北京举行。

者说缺点是主要的，成绩是次要的，不能这样说。我想这一点应该肯定下来。正是因为这一年我们发展了几十万个社，就是在农村当中建立了几十万个社会主义据点，是我们今后合作化很重要的依靠。把社办好了，我们就在农民当中扩大了党的影响。这是一般来说的，当然有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影响，但是总的说来是教育了农民，扩大了党的影响，从而又为今后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那么我们的成绩从哪里来的？我想来源是：有十万个合作社和过去几年的互助组的基础，十万个合作社办好是主要的；党的政策明确，依靠贫农，巩固团结中农；经过这几年来的工作，群众的觉悟提高了，有些地方是高涨；再加上各方面工作的配合，比如说统购统销也帮助我们，推动了合作化。还有其他各方面的配合，整党建党，宣传教育，青年团的工作，镇压反革命，没有这些部门配合，我们也搞不好的。此外，我们农村工作部门确实作了很艰苦的工作，有许多地方群众工作是做得好的，走群众路线。我想这是第一点，应该肯定的。

二、关于目前紧张形势的问题。是不是有紧张形势呢？显然是有的，当然，程度不同。比如西南就比较缓和一点，但也不是完全没有紧张。那一天云南的同志讲，他那里有一部分地方也紧张了，四川恐怕也有些地方紧张了。其他各省都有相当程度的紧张，只是程度不同。这一点我想应该承认的。不承认这一点，对我们工作没有好处，就不能引起我们的警惕。

这种农村紧张情况的本质是什么？本质是工农关系的紧张，中贫农关系的紧张。造成紧张的原因，许多同志发言是对的，应该分作两方面：一方面，这种紧张是农民小生产者对社会主义改造的抵触情绪的表现，也是农民小生产者两重性不可避免的过程。这个社会主义改造，不仅是合作化，而且包括统购统销，包括私商

改造，这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几个方面，当然以生产合作为中心了。生产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手工业合作、私商改造、统购统销，这一系列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措施，就改变了农民多少年来的习惯。习惯性的抵抗，是不可避免的。农民的本质是这样，你搞社会主义改造，他就感觉不习惯，他就有抵触情绪，就表现了紧张，这是客观事实的表现。另外加上我们宣传当中出了一些毛病，特别是“三年合作化”。这当然不怪下面，我们提出一九五七年百分之五十嘛！老区百分之七十以上嘛！这就是三年合作化了嘛！还有些不适当的宣传，比如“两条道路”，社会主义一条，台湾一条，这就增加了动摇、恐慌，促进了紧张。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在政策上、工作上有毛病。就是说，计划上有些地区大了一点，因此免不了出偏差。政策上，对互利、自愿政策贯彻不够，甚至违反互利政策和自愿政策。工作上行政命令作风，缺乏深入的群众工作，这是相当普遍的。客观上存在着农民小生产对社会主义改造的抵触情绪，加上我们工作上、政策上有毛病，就紧张起来了。

产生这些政策上、工作上的毛病，应当由我们上面负责。对于下面来说，确实这三点也是产生毛病的原因之一。黑龙江的同志讲得对，我们今天的组织形式与当前的革命任务不相称，组织形式还是民主革命时期的，而今天已经进入社会主义革命了，有些地方已经走得很远了，组织形式还是旧的。任务繁重，这个任务是硬家伙，又是新东西，从前没有搞过的。经验不足，大家都是如此。任务主要是三项：一个是合作化；一个是粮食统购统销；一个是私商改造。这三项都是社会主义革命，统购统销也好，私商改造也好，合作化也好，都是属于社会主义改造范畴的。三管齐下，都是新任务，这个任务就很重。当然应该承认，合作化是最根本的。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生产合作、供销合作、信用

合作、统购统销，是以生产合作为中心环节的，生产合作是改变生产关系主要的一环，这是最根本的。这一条如果大家不承认是不对的。我开始说私商改造、粮食统购是临时因素，我收回这个话。同志们的意见是对的。但是不能三条并排，合作化这一条对农村工作部门是很重要的。当前最突出的是粮食问题，但是最根本的还是合作化。就是说，我们必须把合作化搞好，必须慎重，必须稳步前进。这如果出乱子就是很大的乱子，比如杀牲口，砍树。南方林业合作，现有树木的生产合作还值得研究。荒山造林关系不大，现有树木合作起来，价格很难搞，就很容易使那些没有树木的人揩人家的油。放火烧山与这个可能有关系。在去年十二月以前，那时我也感到粮食问题压到我们身上，但去年十二月以后，今年一月以来，我越看越感到合作化是主要的。我们这里有好几个人回家的，没有合作化的那些地方的牲口都很好，没有什么乱子。那些地方也有统购统销，就是没有合作化，一个合作社也没有，所以那些地方有牲口的就不那样恐慌，这是很明白的。粮食是当前最突出的因素，这也是事实。特别有些省份，比如浙江、黑龙江、河北、山东、湖北、广东、广西，去年闹统购，今年闹统销，这当然是当前最突出的因素。但是最根本的还是合作化。合作化、统购统销、私商改造这三种都是属于社会主义改造这个范畴，都是造成紧张的带根本性的因素，但是合作化是最根本的，而粮食是当前最突出的因素。大家研究一下，这样讲是不是合乎事实，如果不对，再改变，没有关系，要把是非弄清楚，要合乎事实。

三、究竟有没有冒进现象呢？大家很怕“冒进”这两个字。当然“冒进”这个大帽子是难戴的。但是，我们现在要研究什么叫冒进，首先弄清这一点。毛主席在全国党代表会议^①闭幕时说，超过当前的情况，就是“左”，就是冒进。超过了干部的经验水平和

群众的觉悟水平，实际不能做这样多，你搞了这样多，超过了实际可能，这就是冒进。如果说这个定义对的话，那么我们应该说，冒进现象不是全国性的，比较多一点的是少数的省份，大部分省份并不是那样多。比如四川省有两万八千个社，还不多，因为它有六千万人口，十六个地委，一百多个县，它的干部可以控制。比如北京市合作社的户数很多，社有七百多户，当然，户数过了一点，但他们还可以管得了，因此他们也没有出什么大乱子。根据这个定义，今天应该这样讲，冒进现象不是全国性的，只是少数省份。这少数省份也是不平衡的，有些地方冒进，有些地方是正常的。比如浙江、山东、河北、安徽，这些地方比较多了。但是就是这些地方也不平衡，山东有两三个地委占了一半，其他有些地方还并不是那样多，干部还是可以控制得住的，所以还是比较正常的。其他省份虽然总的数目不大，但是也还有一些县份多了一点，如湖北××县，他们就感觉到多了一点。所以，某些省份，某些县份有冒进现象，就是超过了实际可能。我想另外还应该讲，有些县份，有些地方可能还有些自流，当然，一般的不多，但是也还有。这个分析大家看怎么样，是否合乎实际。冒进现象不是全国性的，是少数省份、少数县份，也有一些地方还有自流。但是我感觉干部中的冒进情绪是带普遍性的。这种冒进情绪如果不讲清楚，如果不克服，它将来还要冒进。今天不冒进，明天冒进，今年不冒进，明年冒进，而这个冒进对我们的工作只有损害，会造成我们将来的困难，新建的社长期不能巩固。

究竟为什么干部中的冒进现象比较多呢？我想就是这样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对农民社会主义觉悟估计过高，对农民小生产的本质认识不足。实际上农民对社会主义不是那样容易接受的。我

们总路线宣传以后，对农民，特别是对贫农和新中农是起了积极的作用，他们的觉悟提高了，这是确实的。有些地方农民觉悟是有高涨，比如社办得好的地方，老社有基础，互助组有基础，互助组办得比较多、比较好，社会主义旗帜在那个地方有个榜样，那个地方农民的觉悟当然就高涨了，这个不可否认。但是你说那样的普遍高涨。普遍的高潮，没有看到不平衡，这样看也是不对的。这只看到了他的表面，没有看到他的本质；只看到了表面现象，没有看到他的内心。把这个高潮估计过高，把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估计过高，这是主观主义的，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是实事求是的，而是为表面现象所迷惑。不从本质来看，就是不看究竟办好了多少社，互助组究竟办得怎样，合作社办得怎样，已经有多少合作社摆在那里，不是从这个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光看他的表面，高高兴兴，双手举起来，甚至哭哭啼啼地要求入社，你就认为他们是社会主义觉悟高了。这样看会使我们犯错误的，就助长了干部的冒进情绪。高是高呀，这是不是好呢？这是好的。是不是那样好呢？不一定。是不是所有地方都是那样好？也不一定。要看你的互助组办得怎样，合作社办得怎样，看你的工作基础如何，不从这些方面来看，光看表面形态，那是靠不住的。我们应该承认，群众觉悟是有高涨，特别是新中农、下中农、中中农，这个不能否认，否认是不符合事实的，不客观的，不是唯物论的。但是，空喊高涨，盲目的认为普遍高涨，到处高涨，这里高涨，那里高涨，这是没有好处的。这只有助长干部的冒进情绪，这是我们干部中有冒进情绪的主要原因。

第二个原因，对合作化是改变生产关系，是社会主义革命，是最深刻的阶级斗争这一点认识不足，因而对把合作社办好，对增产的艰巨性认识不足。这一点包括我个人在内。因为我们没有经

验，把办社看得容易一些，看到办得不错，看到农民硬是有这样的本事，把社办好了。事实上，办社并不是那样容易的，因为我们是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我们不是苏联，不是匈牙利，他们是工业化的国家（匈牙利工业占百分之七十），我们就没有这个条件，没有这个物质基础，我们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搞工业化。可以想见，真正使合作社增产，那是很费劲的。当然不是不可以增产，也不要悲观失望，但是过分乐观，认为合作社办起来自然就会增产，那除非老天爷保护它。认为只要插上社会主义旗帜就增产了，那就不是唯物论。要把合作社办好，真正增产，内部团结好，样样上轨道，样样制度化，不是那样容易的事情。当然，也不是那样难的了不起，像四川的道路一样“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是可以办好的。只要你摸，就可以积累经验，可以办好，中农也可以团结好，可以增产，社也可以巩固，这是肯定的。但是真正把社办好，把中农团结好，社又增产，这不是轻而易举的，不要把这个事情看得太轻易了，应该承认比土改难，而且也不是一、二年的事。而是长期的事。合作社不是办几年就不办了，而是要办到底，要办“万岁”。我想这是干部中产生冒进情绪的第二个原因。

这次各省的同志发言中都体会到了这两点，是很好的，要把这个道理在办社干部中间讲清楚，尤其是在派去办社的工作队中间和县、区干部中间讲清楚。这次会议把这两个弄清楚很重要，这就是说，这样我们的脑袋就清醒了一点，不至于为表面现象所迷惑。

二 今后的方针政策

一、要求一般停止发展。原来我们说今年秋天停止下来，以

后主席说，干脆就停止下来，到明年秋后再看，停止一年半。为什么要一般停止发展呢？就是说还有少数的省份，比如中南、西南数量还不大。像中南的河南就不行，已有四万多个社，这也就够数了，要把四万多个社整顿好。其他五省只有一万多社，还可以酌量发展一点。究竟发展多少，各省同志回去再慎重研究一下，现在并不忙，六、七月也可以，七、八月也可以。基本上要看今年的灾情如何，就是说基础要打稳。当然，部分发展的省份，秋前也要准备，不准备将来就被动了。现在是五月，回去研究一下，到七月或者八月，最好是七月以前把意见提出来，我们再来研究。原则上不要发展的太大了，开始时还是要由小到大，由少到多。另外，就是各省要控制区和乡，特别是控制落后区和落后乡，不要发展，改变过来以后再讲，没有改变过来以前不要发展。其他的空白区、空白乡可以发展一些，但是要遵守两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凡是没有办过社的地区，应该经过试办阶段，但不要试办的太多，一个乡试办一两个就行了。因为没有感性知识是不行的，做一个样子让干部看一看，让群众看一看，然后再推广。这个原则必须确定。

第二个原则，就是要发展一段，巩固一段，不要连爬带滚往前进。连爬带滚往前进，就是一下子擦屁股，越擦越多。现在我们不是跃进的扩大，不是两倍、三倍的扩大，而是每年增加农户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几。社户数的扩大也是以增加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为限，三十户的社再扩大七、八户，二十户的社再扩大五、六户，这样就容易消化。盲目增加的太多了，就不容易消化。这是一条方针，要一般的停止发展。停止发展是为了巩固，并不是停止不前，让它自流。停止发展是为了巩固现有的社，特别是发展比较多的省份，今年要停止下来。

二、立即抓生产，全力巩固。老社十万个，新社五十几个都要巩固。特别要巩固现在的新社，如果新社建社以后没有时间去整顿它，现在如果不把它巩固起来，那么将来社会主义的基点就不像样子，不成基点了，成了包袱了。所以，巩固现有的社，特别是巩固现有的新社，是打好社会主义的基点，是搞好一个榜样，是巩固前进的出发地，是打基础。是为了将来更好的前进。基础是必须打好的，把老社办好，那就可以抽出干部，所以，这也是培养新干部的来源。我们就可以培养中心社，中心社可以带动一般的社。我们党建设部队也是这样，发展一些就巩固一些，不是经常的发展，经常的扩大。根据地的建立也是一样的，都是发展一步，再巩固一步，巩固地向前发展。在扩大到一定范围的时候就停止下来，再发动群众，搞好工作。把根据地巩固了以后，力量就巩固起来，就生长起来，我们再往前发展。

大家都知道，今天这一批社的巩固是很重要的，这几十万个社如果不巩固好，将来就没有办法再前进，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是同志们要认识，巩固这一批社，是很不容易的事，要有干部，要有时间，特别是要抽调一批干部出来，集中力量才能做好。这里要特别提出的是，有些地方原来的老社就不是那么很好的社，是问题不少的社，如果再往前发展，再要巩固这些社就更难了，问题就更多了。

三、少数的省、县要适当的收缩。收缩是为了什么呢？不是消极不干了，如果这样，就是错误的。是为了抽出力量，做好合作社的巩固工作，丢掉一些包袱，不是消极的退却，是为了更好的前进，更好的巩固。正像给各地区已指出了的办法，要下决心，不要犹豫不决，告诉他们不要勉强巩固，不要顾面子，否则就长期不能巩固，就要长期地背包袱，年年都要擦屁股，那就没有办

法巩固了。该巩固的社、可以巩固的社都搞垮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收缩，那就不好了。将来我们还要发展更多的社，现在的问题，不是嫌太多了。问题是今天我们要丢掉一批，如果去巩固没有办法巩固的社，长期下去，那就被它们拖住了。这不仅是发展多的省份如此，其他的省份中个别的县、区也要注意。有些县发展的太多，更应该注意。究竟收缩多少，这也不是死板的规定，也不是平均摊派，这就要看各地自己的情况，无法巩固的就要收缩。

收缩是指那些确实没有办好的社，对他们已花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是没有办好，这些社就应该丢掉。这是指的无法巩固的社。凡是巩固的社，还是要加以巩固。有些入了社以后又不愿意的，就可以告诉他们，下年再来，让他们退社好了。问题很多的社，群众有意见的，只有少数愿意，大部分不愿意，那又何必要留下来呢，干脆退社好了。好来好去，不一定要拖到八月十五以后再散伙，在端午散伙也可以，好来好往，这样还不伤感情，和和气气的来，和和气气的走，不要打架。像这样的社不要留恋，不要可惜它。为了留恋它，结果给它花了三、四个月，还是不能巩固，这样一来，我们把可以巩固的社，也没有巩固起来。我前一次在开幕的时候讲了，一九四五年中央决定我们的军队，从江南撤出，新四军由江南撤到江北，东北放弃四平，收一收阵地，这正是为了加强力量，更好地前进，而不是消极地退却。当然，现在有困难，我的方针是提得迟了一些，再早上两、三个月，在二月能够提出来那就好了。

我们先把自愿互利政策与群众见面，像浙江一样，省、县出布告。要全面的讲，不自愿的就退，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不愿者不来，把互利政策讲清楚。没有办法巩固的社，就采取快刀斩乱麻的办法，使政策和群众见面。有些不是全县范围的也可以

不出布告。凡是有名无实的，问题很多将要瓦解的，实在没有办法巩固的，或者被坏分子把持的社，我们就可以宣布解散。这就要争取时间，不要拖下去，可以巩固的社就巩固下来。在巩固的过程中，还有一部分不能巩固的，以后再说。这少数不可以巩固的社，社员可以退社，不要勉强，不要用其他的方法把他们硬控制起来，那是没有好处的。固然，要做工作，不做工作那就不能巩固，做了工作，还没有办法巩固，就让他走好了，社办好了再来，和上面说的一样，采取好来好往的办法。有的社退出去了一部分社员，能力不足，我们就帮助他，或者几个小社合并。首先我们要向社员解释清楚，不要害怕退的多了，我们的自愿互利政策与群众见面后，群众要退就可以退。这样是不是说我们的大部分社都办的坏？那不是这样的。如果事前不把这个问题讲清楚，那就会发生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不要害怕讲，我们要设想到，如果今天我们没有一部分收缩，等到将来我们就被动啦，如果将来的工作被动，那就不好办了。今天我们主动收缩，只能说我们工作没有做好，等到将来被动了，那就会说我们合作化不好，那就便利于坏分子活动，给反革命分子造谣留下了空隙。

在收缩的时候，要打通干部的思想，要保护干部的积极性。思想不通的要打通，干部下不了台的，面子上不好看的，我们帮助他们解释一下，说责任在我们，不能怪他们，来帮助他们挑担子。当然，有些干部作风很坏，我们还应该批判，我们也不是统统把担子给他挑上。有些干部在工作中强迫命令，很坏，甚至贪污，那就不能给他挑担子，要批判，应该让他向群众作自我检讨，来挽救他在群众中的信仰。干部的作风不好，其中有些是坏分子，他硬用各种手段不适当地把社办起来，这就不是很好的社，收缩时应该对这些社加以慎重的处理，坏分子必须洗刷。目前正在生产，

是马上解决好，还是将来解决好，还可以研究，还可以灵活。总而言之，要慎重，收缩社时要慎重处理，不是一推了事。

四、把互助组办好，整顿好，照顾个体农民。这就是为了搞好生产，为了将来合作社的再发展。合作社经过互助组转过来的，合作社就比较巩固，也容易办好。为了当前的生产，也要把互助组办好，去帮助个体农民解决困难，使他们安下心来搞生产。把今年的生产搞好了，互助组也就办好了，明年就会再发展，这就给办合作社打好了基础。所以，今后的互助组应该分配一定的干部由专人负责，特别指定那些社，或者指定那些干部来专门负责。有些人讲社办的很多，把搞互助组的干部都调走了，搞得互助组乱七八糟。所以如果不整顿一下，就会影响我们当前的生产，影响将来合作社的发展，这些情况就值得注意。这就必须指定社来带动组，带动个体农民。

注 释

〔1〕 参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根治黄河，开发黄河*

（一九五五年七月十八日）

各位代表！

现在我代表国务院作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1〕}。因为这一规划所涉及的不止五年，它的第一期工程就需要到一九六七年才能完成，所以需要作为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外的单独的问题来讨论。

黄河问题是全国人民所关心的。黄河是我国第二大河，从青海的约古宗列渠发源，流经青海、甘肃、（包括原宁夏省）、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等省区，在山东利津以东入海，全长四千八百四十五公里。黄河流域的面积，按自然地理的观点计算（以地面的水是否流入黄河来划分流域的界限），是七十四万五千平方公里。我们在这里为着经济统计上的便利，仍按过去习惯，把黄河所经青海省、甘肃省、内蒙古自治区原绥远省部分、陕西省、山西省、河南省、山东省的全境，加上同黄河密切相关的河北省的全境，都算作黄河流域的范围。黄河流域是我国历史的发源地和文化的摇篮，在一个长时期内是全国政治和经济的中心。

* 这是邓子恢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第二次会议上的报告，原题为《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略有删节

黄河流域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资源，这就是黄河水系本身。根据近几十年的水文观测资料，黄河的多年平均水量约为四百七十亿公方（立方公尺），虽然只约有长江的多年平均水量的二十分之一，但是只要充分利用，却可以把灌溉区域扩大到一亿一千六百万亩土地，在这个灌溉区域内可以使粮食增产一百三十七亿斤，棉花增产十二亿斤。黄河的水力尤其宝贵。黄河河源比海平面高出四千二百六十八公尺，仅从青海贵德以下的水力就可以发电二千三百万千瓦，每年能发电一千一百亿度（千瓦时），对黄河流域的工业发展以至整个国家工业化和电气化事业有伟大的意义。黄河由于地形优越，大多数水电站的造价都比其他地方低廉，至于发电成本，可以低到等于目前我国水力发电成本的十分之一左右。

黄河是古今中外著名的一条灾害性的河流。它的灾害主要是水灾。黄河流域雨量很少，平均全年只降雨四百公厘，约为长江中游的地区平均全年雨量的三分之一，东南沿海地区平均全年雨量的四分之一。但是黄河流域每年降雨量的一半左右经常集中在夏季的七八两月，在这个时间有时一个地方一个月甚至可以下七八百公厘，并且夏季的雨多是暴雨，有时一个地方一天可以下一百五十公厘。这种夏季的集中的暴雨经常造成洪水暴涨，称为“伏汛”。黄河在陕西境内支流很多，如果夏季暴雨的面积较大，几个支流同时涨水，就会造成特大的洪水。如黄河在河南陕县的多年平均流量每秒只有一千三百公方，但在一九三三年夏季的最大洪水流量曾达到二万二千秒公方，在一八四三年（清道光二十三年）的最大洪水量据专家推算则达三万六千秒公方左右，因而都造成极严重的水灾。黄河的水灾大部分是这种夏季暴雨造成的。此外，有时九十月间也可能有大雨造成洪水，称为“秋汛”。三四月间，冰雪融化也常引起洪水，称为“桃汛”。黄河在甘肃、内蒙古

边境和山东境内是由南向北流的，在南部化冰的季节北部往往还在封冻，大量流冰在下游被阻，拥塞河道，也会造成河水暴涨，称为“凌汛”。

黄河的水灾之所以特别严重，不但是因为黄河流域的夏季暴雨，更重要的还是由于黄河下游（指由沁河口到海口的一段；由青海贵德到沁河口称为中游；贵德以上称为上游）的泥沙淤积。黄河所以叫黄河，就因为它是一条泥沙河；俗语说“跳下黄河洗不清”，就表现了它的这个特点。黄河的含沙量在世界各国的河流中占第一位。每公方水的多年平均含沙量在埃及尼罗河是一公斤，苏联阿姆河是四公斤，美国科罗拉多河是十公斤，而黄河在河南陕县却达到三十四公斤。根据水文资料计算，黄河每年经过陕县带到下游和海口的泥沙平均达到十三亿八千万吨。这样多泥沙，到了下游由于河道平缓，泥沙不能完全入海而大量沉积，河身就逐年淤浅，直至高出河堤两旁的地面，成为“地上河”。泥沙河在泥沙滩上行走，河槽当然很难固定。海口淤积的大量泥沙也逐年伸展，这不但使入海的水道本身变化无常，而且加重了整个黄河下游的危机。因此，遇到较大的洪水，河堤无法约束的时候，黄河下游就要发生泛滥、决口以至改道的严重灾害。

由于上述情况，黄河虽然在中游也有水灾，但严重的水灾却集中在下游。据历史记载，黄河下游在三千多年中发生泛滥、决口一千五百多次，重要的改道二十六次，其中大的改道九次。改道最北的经海河出大沽口，最南的经淮河入长江。因此，黄河的灾害一直波及海河流域、淮河流域和长江下游，威胁二十五万平方公里上八千余万人口的安全。黄河的每次泛滥、决口和改道都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惨重损失，常常有整个村镇甚至整个城市人口被大部分或全部淹没的惨事。一九三三年洪水造成决口五十余

处，受灾面积一万一千余平方公里。受灾人口三百六十四万余人，死亡一万八千余人，损失财产以当时银洋计约合二亿三千万元。一九三八年蒋介石政府在河南郑州附近掘开南岸花园口河堤^{〔2〕}，造成黄河大改道，受灾面积五万四千平方公里，受灾人口一千二百五十万人，死亡八十九万人。由此可见黄河灾害的严重程度。

黄河的灾害同反动统治阶级的罪恶是分不开的。黄河下游的命运在人民民主时代得到了显著的转变。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人民群众对黄河的灾害作了顽强的斗争。从一九四六年花园口复堤起，黄河两岸解放区人民政府就积极领导人民防治黄河的水害^{〔3〕}。在过去九年中，人民政府培修了黄河共一千八百公里（包括南北大堤、南北金堤和沁河堤），完成了土方一亿三千万公方，将原有保护堤坡的“坝埽”由秸料换成石料，共用了石料二百三十万公方；在大堤上用锥探的方法发现了八万个洞穴和裂缝，都已经加以填补。这样，就根本改变了原有河堤残破卑薄、百孔千疮的狼狈形象——这种形象正是反动统治阶级腐败无能和玩忽人命的象征。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每年黄河下游汛期都积极地领导当地人民从事护堤防汛工作，人民解放军也积极参加了这个斗争。在护堤防汛的斗争中涌现了很多勇敢勤劳、不怕困难危险的英雄模范。在一九四九年九月黄河洪水情况严重的时候，下游的居民和驻军四十万人曾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不分昼夜地轮流防守黄河大堤约一个月之久，终于胜利地渡过了危险。此外，由于山东河道窄狭，不能排泄大量洪水，人民政府在山东东平湖两侧建立了可以从黄河临时分出洪水约三千秒公方的滞洪区；又在河南长垣到山东寿张的黄河大堤和大堤北面的金堤之间建立了可以临时分出洪水五千秒公方的大型滞洪区，并在它的入口长垣石头庄地方建立了控制滞洪区的溢洪堰。为了减轻凌汛的威胁，除在凌汛期

间对冰块组织打冰、爆破、炮轰和飞机轰炸外，还在山东利津小街子地方建立了防凌溢洪堰。依靠了这一切努力，我们扭转了黄河近百年间几乎每年决口的险恶局面，保证了黄河下游九年来的安全。

黄河水害在历史上是不断严重化的。从一〇四八年（北宋中叶，仁宗庆历八年）黄河第五次大改道到一八五五年（清咸丰五年）的八百零七年中间，大改道就发生了三次，从一八五五到现在的一百年间决口就发生了二百次。这里主要的原因是黄河下游泥沙淤积的与日俱增。据近年的实际测量，黄河下游河身每年升高一公分至一公寸不等；有的地方，目前河滩竟比地面高出十公尺。海口淤积的泥沙作四十公里宽的扇面形推进，在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一年的三年间曾推进了十公里。泥沙淤积得这样快，单靠河堤加高加固是显然不能解决问题的；而且从一种意义上来说，河堤越是加高加固，河道内的泥沙因为不能向河堤两旁排泄，淤积也就越快。因此，在这种恶性循环的状况下，泛滥、决口、改道的危险仍然是完全存在的。

在黄河流域，除了严重的水灾以外，还有中游地区的水土流失的严重危害和整个流域的严重的旱灾。

在甘肃东部、陕西的大部、山西的大部以至河南西部的一部，每年都有大量土壤遭受损失。土壤的损失大部分是由于雨水特别是暴雨的冲刷，小部分是由于风力的剥蚀。据陕西绥德水土保持实验站的观测，绥德林家岭降雨十五分钟，雨量十六公厘，在观测区内平均冲刷土壤二点六公厘；同县万马沟降雨六分钟，雨量十六公厘，在观测区内平均冲刷土壤三点八公厘。在黄河中游土壤流失严重地区，每平方公里每年约损失土壤一万吨，地面每年平均约降低一公分。在整个黄河中游地区每年每平方公里土壤约

被冲刷三千七百万吨，比全世界每年每平方公里土壤被冲刷的平均数量一百三十四吨大二十六倍。据分析的结果，这些被冲刷的土壤每吨含氮素〇点八至一点五公斤，磷肥一点五公斤，钾肥二十公斤。由于这种严重的侵蚀，在甘肃、陕西、山西的大片肥沃的高原逐渐被冲成许多坡度很陡、深达两三百公尺的沟壑；然后，由于沟壑不断地增加和扩大，平地逐渐丧失，被割成无数长条形的“山梁”和圆顶形的“山峁”，成为“丘陵沟壑地带”；而在少数侵蚀最严重的地区，有些丘陵上的土壤也已经大部丧失，开始变为荒脊的石山。这种演变的过程多少年来不断地在上述区域进行着，使这一区域的宜耕面积逐渐缩小，土壤肥力逐渐减少，农作物产量低下，广大农民的生活条件不容易有大的改善。

黄河流域虽然受着暴雨造成的灾害，但是整个雨量是很不够的，有些地区由于雨量特少，如甘肃北部和内蒙古西南部，已成为沙漠区或半沙漠区。雨量不足使黄河的水量不足。特别在每年十一月到下年五、六月，河水低落，平均每月流量只占全年流量的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五。中游由于沟壑多、陡坡多，地面缺少森林和牧草来吸水，又缺少池塘湖泊来蓄水，所以雨水在地面流失很多，河水容易暴涨，也容易暴落，正是所谓“易涨易落山溪水”。此外，利用黄河进行灌溉虽然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开始（甘肃省原宁夏境内的秦渠、汉渠都还存在），但直到现在还很不发展。由于这些原因，黄河流域常常遭受旱灾。在清朝的二百六十八年中，黄河流域曾发生过旱灾二百零一次。一八七六年至一八七九年（清光绪二年至五年），山西、河北、山东、河南四省旱灾，死亡一千三百多万人。一九二〇年上述四省和陕西共有三百十七县大旱，灾民二千万人，死亡五十万人。一九二九年黄河流域又有大旱，灾民达三千四百万人。

黄河流域由于旱灾、水灾和水土流失，农业生产受到很大的损害。这些损害在解放以后，虽然有了减轻，但是由于人民政府在短期间还不可能对黄河流域实施大规模的有系统的改造自然条件的计划，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还是遭到一些特殊的困难。黄河流域的谷物播种面积虽约占全国的百分之三十八，却因为每亩粮食产量平均只有一百二十多斤，在水土流失严重的地区只有几十斤，所以粮食产量只占全国百分之二十八左右。消除黄河的各种灾害，增加黄河流域的谷物产量，是解决我国粮食问题所应采取的重要措施之一。

我们的任务就是不但要从根本上治理黄河的水害，而且要同时制止黄河流域的水土流失和消除黄河流域的旱灾；不但要消除黄河的水旱灾害，尤其要充分利用黄河的水利资源来进行灌溉、发电和通航，来促进农业、工业和运输业的发展。

我们应当采取什么方针和方法来达到这个目的呢？

在我国历史上，广大的人民曾经不断地同黄河的水害作过伟大的斗争，人民群众单只在河南、山东现在的黄河两岸就筑了一千八百公里的河堤。这个河堤至今还是我们同黄河水害作斗争的主要武器。历代的政府花了很多钱来修复河堤，并且常常设专门的官吏来管理治河的工作。这些官吏虽然许多是腐败和贪污的，但是也有一部分人是认真办事的，他们曾经用毕生的精力来求得黄河的安全。其中特出的如十六世纪后半期（明嘉靖到万历）的潘季驯^[4]，十七世纪后半期（清康熙）的靳辅、陈潢^[5]，对于黄河下游的修堤防汛工作，都曾有过重大的贡献。

但是一切过去时代治理黄河的人都没有能从根本上解决黄河问题。这是因为他们限于社会的条件和科学的、技术的条件，只是想办法在黄河下游送走水，送走泥沙。禹“凿龙门”“疏九河”

的神话，表示送走水、送走泥沙的想法和做法是很古老的。潘季驯提出的‘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著名口号，也仍然没有超出这个范围。当然，在不能根治黄河的条件下，在下游“束水”总比任水泛滥好，“攻沙”总比任沙淤积好。但是事实已经证明，水和泥沙是“送”不完的，送走水送走泥沙的方针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的。这是因为：第一，黄河下游的水灾和中游的水土流失以至中下游的旱灾是互相关联的，它们在根本上都是由于没有能够控制水和泥沙的结果。不解决水和泥沙的控制问题，就不能根本解决黄河的灾害问题。第二，只要我们能够控制黄河的水和泥沙，它们就不但不能成灾，而且能为我们造无穷的幸福。

大家知道，黄河下游因为河身抬高，除由沂蒙山区流入东平湖的汶河以外，就没有支流，所以黄河的洪水基本上是从中游来的。清朝初年的陈潢曾经解释说：“其挟沙而浊者，皆由经历既远，容纳无算，又遭西北沙松土散之区，于焉流愈疾，而水愈浊。”科学的观测证明，这个意见大致是正确的。黄河上游的水是清的，到兰州每公方多年平均含沙量也只有三公斤，到包头还只有六公斤，而到了陕西中部的龙门，每公方多年平均含沙量就增加到二十八公斤。到龙门以下注入汾河、北洛河、泾河、渭河，到河南陕县的时候，每公方多年平均含沙量又增加到三十四公斤，最大的含沙量则达到五百八十公斤。在陕县以下，虽然从南岸注入的支流伊河、洛河也还含有每公方多年平均六公斤的泥沙，黄河的含沙量却不再增加，而且由于逐段淤积而减少。根据测算，在陕县黄河的巨量泥沙中，来自河套的河口镇以上的只占百分之十点九。来自河口镇至龙门一段的占百分之四十九点一，来自龙门至陕县的占百分之四十。这就是说，黄河的泥沙几乎全部是中游来的，而且几乎十分之九是从甘肃、陕西，山西境内的支流来的。黄河下

游的“沙”其实并不是什么沙，而是极为宝贵的黄土。由此可见，造成黄河下游水灾的最根本的原因也就是甘肃、陕西、山西三省的水土流失。而水土流失也是黄河流域旱灾的重要原因之

既然黄河下游的洪水和泥沙基本上是从中游来的，而中游又极端需要这些水和泥沙，我们就应当在中游把水和泥沙控制起来。怎样才能控制它们呢？

为了在黄河的干流和支流内并在黄河流域的地面上控制水和泥沙。需要依靠两个方法：第一，在黄河的干流和支流上修建一系列的拦河坝和水库。第二，在黄河流域水土流失严重的地区，主要的是甘肃、陕西、山西三省，展开大规模的水土保持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后，很快就着手研究黄河问题。为了根治黄河水害，开发黄河水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主要是它所领导的黄河水利委员会）、燃料工业部、地质部和其他有关部门在过去几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准备工作的。历史的记载和近几十年我国水利学者和水利工作人员所积累的大量资料得到了有系统的整理和利用。各有关部门的大批工作人员在整个黄河流域进行了查勘、测量、地质调查、钻探、水文测验和经济调查的巨大工作，他们查勘了黄河干流和支流河道（包括河源）共达一万六千公里，测量了各种地形图八万五千余平方公里，在干流上选择了一百个“比较坝址”，在二十七处坝址上钻了三百四十四四个钻孔，并进行了一万一千平方公里的水库经济调查。

一九五二年，我国向苏联政府聘请专家综合组来我国帮助解决黄河规划的任务。由组长阿·阿·柯洛略夫和其他六位专家组成的这个苏联专家组在一九五四年一月到达北京。同年四月，以水利部和燃料工业部为主成立了黄河规划委员会，积极进行关于

黄河规划设计文件的编制工作，并在苏联专家组的全力指导帮助之下，在同年十一月完成了这一工作。黄河规划委员会所提出的黄河综合利用规划，就是按照上述根治水害、开发水利的方针和方法制定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审查了并且同意了这个规划，国务院和中共中央也研究了 this 规划。国务院和中共中央认为：这个规划虽然还只是一个轮廓，它的具体工程项目中的许多地点、数字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确定，但是它的原则和基本内容是完全正确的。

黄河综合利用规划包括远景计划和第一期计划两部分。远景计划的主要内容，首先就是所谓“黄河干流阶梯开发计划”，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在黄河干流上修建一系列的拦河坝，从而把黄河改造成成为“梯河”的计划。这一计划拟定由青海贵德上游龙羊峡起，到河南成皋桃花峪止，准备修建适应于不同条件不同任务的拦河坝四十四座。另外，在黄河下游也准备修建用于灌溉的拦河坝两座。共为四十六座。

根据详细的勘测和周密的研究，黄河干流阶梯开发计划选定在峡县三门峡地方修建一座最大和最重要的防洪、发电、灌溉的综合性工程。计划中的坝高九十公尺左右，被拦阻的河水由陕县上溯到潼关以北临晋和朝邑的黄河两岸，潼关以西临潼以下的渭河两岸和大荔以下的北洛河两岸，形成巨大的水库，它的容积达到三百六十亿公方。此外，在青海的龙羊峡、积石峡（黄南藏族自治州）和甘肃的刘家峡（永靖）、黑山峡（中卫）也将修建大型的综合性工程。其中刘家峡水库容积可达四十九亿公方。

为着配合黄河干流的阶梯开发计划，还要在黄河的重要支流修建不少的水库，其中的少数是综合性工程，多数是为着拦蓄支流的泥沙。

上述的黄河干流支流一系列的水坝修建成以后，黄河流域将发生如下的变化。

第一，黄河洪水的灾害可以完全避免。一座三门峡水库就可以把设想中的黄河最大的洪水流量由三万七千秒公方减至八千秒公方，而八千秒公方的流量是可以经过山东境内狭窄的河道安然入海的。万一三门峡和三门峡以下的黄河支流伊河、南洛河、沁河同时发生这种特大的洪水，那么，三门峡水库也可以关闭闸门，把三门峡以上的全部黄河洪水拦蓄四天之久。这样，加上伊河、洛河、沁河三个水库的拦蓄，黄河下游的流量就可以仍然减少到八千秒公方，下游的安全就仍然可以确保。而且由于黄河泥沙已被三门峡大水库和三门峡以上的一系列干流和支流的水库所拦截，下游河水将变为清水，河身将不断刷深，河槽将日趋稳定。因此，现在下游人民的各种防洪负担，将来都可以解除。至于河套以上，在刘家峡水库修成以后，就可以把最大的洪水流量八千三百三十秒公方减至五千秒公方，因而完全避免水灾。

第二，利用黄河干流上的四十六座拦河坝可以发电二千三百万千瓦，每年平均发电量达到一千一百亿度。

第三，龙羊峡、刘家峡、黑山峡、三门峡四处大型综合性水利工程都可以用于灌溉，从青铜峡到河口镇一段和桃花峪以下准备修建的拦河坝则将主要用于灌溉。此外，支流上的一部分水库也可以用于灌溉。在修建了这些水坝，整修和兴修了一系列的渠道和其他灌溉设备以后，灌溉土地的面积可以由现在的一千六百万亩扩大到一亿一千六百万亩，占黄河流域需要由黄河灌溉的全部土地面积百分之六十五强。

第四，在四十六座拦河坝修成并安装过船装置以后，黄河中下游的水量可以按照需要来调节，因此就可以全线通航。五百吨

拖船将能由海口航行到兰州。黄河流域的交通运输状况将得到很大的改善。

在实行上述的阶梯开发计划的时候，必须同时在甘肃、陕西、山西三省和其他黄土区域展开大规模的水土保持工作。这是因为黄河上的水库并不能减轻黄土区域的水土流失，而且相反地，如果不制止这种水土流失，那些水库还有陆续被泥沙淤满，因而丧失防洪能力的危险。计划中的黄河支流上的多数水库的主要任务就是拦蓄泥沙，这当然可以大大减少干流泥沙的来源。但是只有在黄土区域普遍做好水土保持工作，才能从根本上制止泥沙的下泻，否则，支流水库本身很快就会淤满，也就无法来延长干流水库的寿命了。

黄河综合利用规划要求，在黄河流域水土流失地区，按照当地具体情况选择采取以下的一系列措施：

（一）农业技术措施。

1、改良农业耕种技术措施——为了加强土壤吸收雨水能力，实行深耕和雨后中耕；为了加强土壤结构，实行增施肥料和作物轮换，等等。

2、水土保持耕作法——为了阻止雨水在坡地上向下流泻，实行把作物在横沟中种植，实行横坡耕作和在休闲地上犁“水平沟”等等。

3、改良土壤被复——实行密植，“等高带状间作”（如玉米、高粱和豆类在同一高度的横坡上成带形地间隔种植），种植“缓冲草带”；夏季休闲地种植绿肥，“草田轮作”，栽培牧草，管理放牧，等等。

（二）农业改良土壤措施。

1、田间工程——地修筑梯田，修地边埂和等高沟埂，修田间

集水沟和导水沟系统，修“水簸箕”（在坡面水流凹地中逐段修成阶梯状，一段像一个簸箕），等等。

2、停耕陡坡，改为在陡坡上植树种草。

（三）森林改良土壤措施。

1、在沟底和沟坡造林，在河岸和河滩造林，在水库岸边造林，在碱地造林。

2、营造“防风固沙护田林”。

3、封山育林，坡地和丘陵地造林。

（四）水利改良土壤措施。

1、在沟头和沟边修筑防止沟壑发展的土埂。

2、在沟内修筑谷坊、“淤地坝”（在坝内拦泥淤成农田）和大型土坝。

3、修“水漫地”，（将含泥的水流引入围好的滩地，泥淤积后排去清水）。

4、发展小型灌溉。

5、修筑拦蓄雨水和泥沙的涝池，修筑储蓄雨水的水窖。

有了黄河中游的水土保持工作，三门峡水库至少可以维持五十到七十年或更长的时间。到了那时，由于其他的一系列措施，黄河水害已经可以大大地减轻。至于三门峡水库淤浅后在发电、灌溉、航运方面发生的困难，都比较容易解决。

以上是黄河综合利用规划的远景计划的大概。很明显，完全实现这个远景计划需要几十年时间，例如完全实现水土保持的远景计划将需要五十年时间。为了首先解决黄河的防洪、发电、灌溉和其他方面最迫切的问题，黄河规划委员会提出以下的计划作为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即一九六七年以前实施的第一期计划。

第一期计划规定，首先在陕县下游的三门峡和兰州上游的刘

家峡修建综合性工程。三门峡水库的水位比坝下的水位可以高出七十公尺，可以装机一百万千瓦，平均每年发电四十六亿度，可以供给陕西、山西、河南等地相当时期内在工业上和其他方面的需要。三门峡水库在黄河缺水时期可以把下游的最低流量由一百九十七秒公方调节到五百秒公方，以便保证下游河南、河北、山东接近河岸地区的灌溉用水和航运所需要的水量。刘家峡水库“水头”一百零七公尺高，可以装机一百万千瓦，每年平均发电五十二亿三千万度，可以使甘肃新发展的工业区用电需要得到满足。刘家峡水库可以把河流最小流量由二百秒公方提高到四百六十五秒公方，从而保证了下游原宁夏、绥远省境灌溉和航运的需要。

河水既然被拦河坝拦蓄起来，形成巨大的水库，通常都不可避免地要淹没一些原有的居民区，因此，需要这些地方的居民为着大家的利益，也为着自己的长远利益，迁移到其他地方。刘家峡水库因为面积比较小，那里的人口也比较稀，只要迁移两万七千人。三门峡水库由于需要拦蓄的洪水流量特别大，在拦蓄的水位达到三百五十公尺的时候，就需要淹没耕地二百万亩，迁移居民六十万人。当然，这同黄河泛滥、决口所造成的损失，是完全不能比较的。毫无疑问，这些迁移的居民将受到被黄河灾害威胁的八千余万人民的最大的感激，而政府则将努力保证他们在迁移的时候不受损失，并且帮助他们在到达迁移地点后尽快走上安居乐业的道路。

为了拦阻三门峡以上各支流的泥沙，以保护三门峡的水库，需要在第一期工程中，首先在泾河、葫芦河、北洛河、无定河、延水的适当地方，修建五座水库，并在适当小支流上，修建五座小型水库。在第一期工程中，并将在汾河和灞河上修建综合性水库。

如上所说，三门峡工程因为处在伊河、南洛河、沁河的上游，

修成后还不能保证在这三条支流同时发生洪水的时候不造成下游的水灾。因此，在第一期工程中，也将在这些支流上选择一处或几处适当地点修建防洪水库。

三门峡水库和水电站，拟定在一九五七年开始施工，一九六一年完成。苏联政府已同意担负这一巨大工程的设计。协助我国进行黄河规划的苏联专家组组长柯洛略夫同志，仍将担任这一设计的负责人。

三门峡下游支流的水库，也拟定在一九六四年以前完成。但是为了防止在这些工程完成以前发生比一九三三年更大的洪水，还必须在下游采取一系列的临时防洪措施。因此，在今后几年内，需要继续加高加固下游的河堤，加强并扩大滞洪区的设施，并继续加强防汛工作。

第一期计划，在灌溉方面，规定修建青铜峡（甘肃金积）、渡口堂（内蒙古磴口）、桃花峪（河南成皋）三座干流水坝，并相应地在这些地区修建渠道工程。按照第一期计划，将扩大灌溉土地三千零二十五万亩。同时，将对原有灌溉区一千一百九十八万亩的灌溉状况加以改善。

为了实施黄河综合规划的第一期工程，初步估算需要投资五十三亿二千四百万元。其中：三门峡水库和水电站十二亿二千万（包括移民费用，下同），刘家峡水库和水电站四亿一千六百万；输电变电设备五亿元；南洛河、沁河、伊河防洪水库三亿零四百万元，下游临时防洪措施二千七百万；修建灌溉系统八亿零七百万，修建灌溉用的三座干流水库二亿八千一百万元，两座综合性的支流水库一亿五千六百万；保持水土设施七亿三千二百万元，支流拦泥水库六亿七千六百万；航运设备二亿零五百万。这是一笔很大的投资。但是这笔投资是完全值得的。

各位代表！由以上的说明可以看到，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同我们所正在讨论的整个社会主义建设计划的其他项目一样，确是一个伟大的计划，确是我们全国人民值得为它来艰苦奋斗的计划。黄河流域各省区的人民，将在这一计划实施的过程中作出最大的贡献。甘肃、陕西、山西三省农民，三省的省、县、乡各级人民委员会，三省的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各级地方组织的工作人员，对于水土保持计划的执行负有最重要的责任。我们相信，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本地方的利益和全国人民的利益，一定能把他们的责任充分地担负起来。

黄河规划的拟定，说明我国的水利事业正在迅速地前进。我们不但要根治和开发黄河，而且要根治和开发长江以及其他重要的河流。关于长江的规划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收集资料，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制定规划并逐步地着手实施。

在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一致支持下，在苏联的慷慨援助下，我们一定能够征服黄河、征服长江和其他河流，使它们为我国人民的利益服务，为我国人民的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国务院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提议，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采纳黄河规划的原则和基本内容，并通过决议要求政府各有关部门和全国人民，特别是黄河流域的人民，一致努力，保证它的一期工程按计划实现。

注 释

- 〔1〕《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报告》，于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第二次会议通过后，黄河开始了全面治理，规划中所选第一期工程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亦于一九五八年正式开工兴建。由于对黄河泥沙问题的认识不足和对黄土高原水

土保持进度和作用估计过快过高，因此，在一九六一年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投入使用后，库区发生严重淤积，对关中平原和西安市形成严重威胁。经过研究，决定对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进行改建，加大泄洪能力，降低泄洪孔口高程，减少库区淤积。改建工程于七十年代初发挥作用，库区淤积明显减缓，三门峡水库继续发挥防洪、防凌、发电、灌溉的综合作用。原规划中一些治黄原则和措施方案仍然起到了治黄工作的指导作用。

- 〔2〕 1938年5月，日本侵略军攻占徐州，随即沿陇海路西进。6月初，蒋介石下令炸开郑州以北花园口黄河大堤，企图以黄河之水阻止日军西犯。结果不仅未能阻住日军进攻，反而给人民造成空前灾难。河南、安徽、江苏三省四十余县被淹，数十万人溺死，一千多万人流离失所。大水过后，留下了一片连年灾荒的黄泛区。
- 〔3〕 1947年3月15日，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国民党当局竟在黄河下游堤坝尚有120余未修复的情况下，强行花园口堵口合龙，将黄河水全部放入故道，以遂其军事上隔断我解放区的目的，使花园口以下黄河故道中的居民陷于水患之中，沿黄河故道两岸民众则受到黄河水严重威胁。在中共中央的关怀下，冀鲁豫、渤海解放区紧急动员大批民工上堤。他们不顾蒋军飞机轰炸，昼夜抢修黄河堤坝，至7月23日胜利竣工，使凶猛的黄河水顺流入海。
- 〔4〕 潘季训（一五二一——一九九五），浙江乌程人。嘉靖末至万历中，四次任总理河道（简称总河），主持治理黄河、运河。明代前期，黄河下游水道紊乱，主流迁徙不定。朝廷把保证京杭运河畅通作为治河方针，采取了北堵南疏、分流杀势的治黄方略，河患日益严重。潘季训主持治河后，提出并实行了束水攻沙的一系列主张和措施，核心强调治沙，基本工程措施则是筑堤固槽，以堤治河，遥堤拦洪，缕堤攻沙，减水坝分泄特大洪水，改变了历代在治黄实践中只重治水，不重治沙的片面倾向，对稳定河势、减少河患，起到了一定作用。
- 〔5〕 靳辅（一六三三——一六九二），汉军镶黄旗人。康熙时期担任河道总

督，主持治理黄河、淮河、运河。陈潢（一六三七——一六八八），浙江钱塘人，为靳辅幕友。他们主张把黄、淮、运当作一盘棋，提出系统的治河建议。进行统一治理的步骤是：先疏下游，后浚上游，堵塞所有决口，坚筑两岸堤防，增建减水坝泄洪等。经过几年的大规模施工，康熙二十二年黄河复归故道。随后，主持开挖宿迁至清河的中运河，四年后竣工，从此运河只在清口以北穿黄。此后，黄河、运河出现了几十年较稳定的局面。

农田水利建设中的经验和问题*

(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四日)

总理:

现将一九五五年农田水利计划完成情况简报如下:

据水利部材料统计,截至六月底,全国共扩大灌溉面积一千四百三十六万亩,较原订计划一千四百万亩略有超出。

今年各地为保证棉量增产,首先抓水利,各级党政加强了对这一工作的领导,配备了一定的干部力量,在工程进行中又注意培养农民技术员,因而顺利完成了任务。但仍有部分地区存在着重大轻小和偏重单位工程的情绪,使群众性的水利陷于自流,也还有些省因堵口复堤任务大,开工晚,致完成任务差。

工作中的主要经验是:

一、正确贯彻中央农田水利方针政策,因地制宜地普遍开展民办公助的群众性农田水利,达到省工、省钱、质量好、收效快。例如,云南省玉溪县团结河工程是临河开渠、沿渠修塘,在不灌溉时期以渠引水灌塘,到灌溉时开塘补渠水之不足,因之将原灌溉一万亩的水源,扩大到四万七千多亩。四川抓住该省百分之六十以上为丘陵地区的特点,发动群众兴修一万七千余处山湾塘,均

* 这是邓子恢写给周恩来的工作简报。

可当年受益；加上其他工程的完成，共扩大灌溉面积二百九十余万亩。

二、在党政统一领导下，统一安排，使今年的农田水利兴修工作和中心工作紧密结合。不少地区在统购统销、建社等工作中结合兴修水利。例如，湖南有的地区提出：“坚决修好塘和坝，迎接农业合作化。”安徽滁县官山乡白天修塘，晚上建社，处理建社问题，做到建社修塘两不误。还由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带动，使广大群众积极的参加了兴修水利运动，湖南临湘县九区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兴修水利时，吸收互助组和个体农民四千四百人参加，很快完成一百多处工程。四川发动农业生产合作社积极兴修水利，要求把社建立在高产稳收的基础上，因而带动了互助组和个体农民积极兴修水利，使全省水利工作有了新的发展。

三、贯彻了“多受益多负担，少受益少负担，不受益不负担”的合理负担政策。今年有些地区采用按受益田亩摊工摊方，评工记分、工完清帐、以工换工、以方给资等办法，提高了群众兴修水利的积极性。

存在问题：从各省的统计数字来看，今年发展一千四百万亩的任务是超过了，但数字统计还不精确，将来还会有出入，如广东原报今年完成该省总任务的百分之一百三十一，最近又纠正为完成百分之九十。还由于对群众性小型水利缺乏技术指导，赶任务进行突击，因而有些工程质量不好，施工中还不断发生伤亡事故。同时对灌溉管理工作重视不够，机构不健全，无专人负责，不能充分发挥应有效益。据河南省估计，如果全省的水井水车要加强管理，即可扩大灌溉面积一百八十万亩。

今年有些地区在合作化运动中对互利政策贯彻的不好，部分省的群众反映：“基本建设没报酬，土地评产不合理”。在执行合

理负担政策上也有不合理的现象，如云南省有的干部向群众宣传：“受益多的多负担，受益少的少负担，不受益的团结互助。”发动不受益群众义务支援。山西省有的地区群众修了水利第二年就增加负担，这些都影响了群众兴修水利的积极性。

据各省了解，农田水利还有很大的发展前途。山东调查，还有三千万亩到五千万亩耕地可以利用地下水灌溉，贵州、四川、西康等省粗略估计，每个省也还有一千余万亩耕地可以发展灌溉。目前全国抽水机近二十万匹马力动力中，柴油机占百分之六十以上，灌溉耕地近四百万亩，今年各省反映购不到柴油。今后在发展抽水机时，这一问题须考虑解决。水利部为了检查总结一九五五年农田水利计划执行情况，研究一九五六年的任务，自六月下旬起已先后在长沙召集南方九省，在成都召集西南四省，在沈阳召集东北四省的农田水利会议，正准备召集华北四省和西北四省的会议，详情续报。

对农业科学工作者的要求*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四日)

这次大会已经规定了十五项任务，粮食技术作物方面、特产园艺方面、热带作物方面、植物保护方面、土壤耕作肥料方面、灌溉排水方面、畜牧方面、兽医方面、农产品加工方面、开垦荒地方面、农业机械化方面、气象方面、农业经营管理、整理祖国农业遗产、农业电气化、原子能的利用方面等，今天的、明天的、局部的、整体的、低级的、高级的都有了，各方面都有了，任务很完整。这样提，正是看清了今天的新情况。这里我再对你们提出几点要求：

第一，要完成你们自己决定的十五项任务。

第二，要完成这十五项，不外乎抓三方面：一是总结提高现有经验，用科学眼光、科学理论加以总结提高；其次引进介绍苏联的、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第三自己创造发明。这三方面同时并进，但以总结提高为主。我们中国农业历史悠久。尧舜时代恐怕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吧，转到农业大概是商朝，有了农业才能产生奴隶社会，殷朝是个奴隶社会。从殷朝算起到现在将近三千二百年，这期间农业发展的经验，逐渐积累，相当丰富。这方面

* 这是邓子恢在全国农业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第三部分。

我们要有民族的自尊心、自豪感。我们对中国的许多经验现在还没有用科学的方法把它总结起来，从感性知识提高到理性知识，这方面工作还做得不够。理论是经验的综合，把实践的经验用科学的眼光加以总结，加以提高，这就是理论。从感性知识提高到理性知识，加以分析，加以提取，加以综合，去掉那些不合理的部分，抽出合理的部分，加以分析评比，这就是理论，这就是科学。农民的耕作方法、栽培方法、施肥方法，它是不是科学？它是合乎科学的。你不能说农民没有科学，农民生产经验就是科学，但他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前几个月，我家里有个农民来，他们种地瓜用煤炭灰，压在地瓜根上，产量很高。煤炭灰里有什么成分，是不是有硫酸铵在里头？这个问题需要你们研究。诸如此类的事情多得很。中国农民的生产经验是合乎科学的，他靠这个使稻子、地瓜长起来，使各种作物长起来。他就靠这个吃饭。你说他不是科学吗？他讲不出科学的道理，只有感性知识，没有理论知识，他不能提高。农业科学工作者在这方面要负起责任来，把我们祖先几千年来的农业战线上的生产经验加以重视、加以总结、加以提高，再推广。

第三，推广与提高并重。科学工作者要提高，提高是为明天，也为了今天，但亦必须注意推广。推广与提高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相推动，不能把这两个东西分割开来。过去我们科学部门只管提高，不管推广，这不对。一个东西产生了，拿去推广，它在推广过程中，又会发现新的问题。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这样，有推广，有提高；有提高，有推广，互相推动。不能推广，就不能提高，不能提高，当然不能推广。因此我想，农业科学工作者的工作范围，不能限制在研究室和试验场里（当然现在不是这样）。你的重点、你的工作基础、你的研究点就在你的研究室、你的试

验场和试验站中，这当然毫无问题。但工作范围不要限制在这两个地方，一定要解放出来，跑到大田里去。这就是科学工作的群众路线。农民天天产生新东西，天天发现新问题。你帮助他解决，你也可以提高。你发现了新问题，也去和他研究，问题就会解决。这就是研究工作的群众路线，也就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有些新事物是在实验室和实验地中产生的，但大量的新事物是在大田里产生的。不要把自己的工作限制在小圈子里，否则，你的研究对象就少了，就抽象了。科学家的主要任务在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大量的问题是在大田里。大田里的问题是带一般性的问题。你在那里找到了问题，拿回研究室实验地去研究试验，成功了，再去推广。

另外一点，我想农业科学工作者和农业行政工作要分工合作。一般说来，农业科学工作者的任务是研究，发现新事物，研究新事物，解决新问题。推广一般是农业行政的工作，例如刚才说的根瘤菌是很好的东西，农业部门应该付出全部的精力把它推广出去。但是不是说我们科学工作者只管研究，只管试验，对推广可以一点不负责任，完全不管，袖手旁观。“我的试验已完成，你采不采纳，推不推广，是你农业部的事情”。可否这样讲呢？我想这样讲不对。我们研究工作同志看到行政部门不推广，就应提出建议，甚至提抗议。我抗议：“你对这个不执行，忽视科学创造，你对科学工作的推广消极怠工！”可以嘛！这样来达到把这个东西推广出去。行政部门有的是官僚主义，有的对这个问题不大清楚，引不起重视。结果呢，这个东西推广不出去，是我们的损失，是国家人民的损失，不是哪一个人的事情，就是把行政部门打屁股三百，也不能挽救这个损失。

第四，大量培养人才，扩大科学队伍。办训练班、办学校，每

个人带徒弟，徒弟带得越多越好。实习生拜老师，依靠老师教，传统就靠这样传。现在我们有许多老科学家，研究这项工作几十年，十分宝贵。我们应该重视许多老先生的经验，他们是我们的种子，将来要培养大批的科学技术人员。农业部门要培养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人，而今天只有一万多人。如以农业、林业、水利、气象四个部门来计算，共二万多人。现在队伍太小了，而我们的任务很大，怎么办？我们只有迅速扩大队伍，大量培养人才。办学校，农学院、专科学校，办训练班，个人带徒弟。要建成我们的科学网，农业科学研究所、试验站，农业科学院现在建立协调委员会。我提议，很快地建立农业科学院，准备在明年建成。农业科学院是司令部，建立这样一个司令部，对加强农业科学研究工作有很大作用。总而言之，必须要有人，要有队伍，没有这个，其他就是空谈。

第五，各地方农业科学工作者要用有效方法，取得地方党政的重视。地方党政的领导不重视，不加强领导，推广是难的，提高也是难的。现在全国各地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区委书记、乡支部书记都在亲自抓生产。只抓生产不抓科学是不行的，各级党委对这个问题重视不重视呢？你不去争取，就不一定。你不去争取，有时他不很清楚。所以农业科学工作者不要等待各级党委来抓，来重视我们，要争取他来重视我们。“你重视不重视是你的事情，你重视，我多干一些，你不重视，我少干一些”。这个态度不对，这是旁观态度。这样，你的科学工作就不能推广，你的科学工作不能大踏步前进，这有什么好处？对国家对人民都不利，对科学工作也是不利。应该采取这种态度，用各种有效办法争取党政的重视，争取党政负责同志的重视，争取他们对我们科学工作加强领导。他们重视了，他加强对你领导了，什么困难问

题他们都能给你解决了。采取什么办法呢？就是首先要把情况向他汇报，争取一年有几次。有可能时一个月一次，或者一季一次，至少一年汇报三次。我们提出办法，怎么推广，怎么提高，争取他参观，要求他约好一定时间召开会议，请有关部门一起来讨论，拟定推广计划。

我希望这次会议能使全国农业科学工作焕然一新，把队伍迅速地扩大，来适应我们已经到来的全国合作化高潮，适应将要到来的全国性的生产高潮。

巩固现有社，稳定新的生产关系*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日）

关于初级社升为高级社，小社扩大、合并为大社的问题，中央已有规定，各省是如何贯彻的问题。现在少奇同志指示要整顿巩固现有的社，也就是毛主席所讲的今后办社不是比数量而是比质量的问题。比谁的社办得好，办得巩固，像少奇同志所讲的稳定新建立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使之正常化，成为大家的习惯。这次会上，各省的同志虽然发言不多，但介绍的经验都很好，政策问题讲得也很好，对我们有很大启发，使我们学到了好多东西。现在我来讲一讲关于整顿巩固现有社的基本关键问题。

我把同志们的意见归纳一下，主要是做好三条：

第一条，搞好生产，保证增产增收，改善社员生活。这是巩固社的物质基础。不能增产那就是空话。要增产，打下巩固社的物质基础，这样社才能巩固，新的生产关系才能正常化。这一条做不到一切都空了。

第二条，政策上要补课，贯彻阶级路线。这一条不能盲目乐观。过去的社办得好、办得快，真是发展得又多又好又省又快，事实上就是五、六个月的时间，转高级社就是两个多月、三个月的

* 这是邓子恢在全国农村工作部长会议上的讲话第二部分。

时间，一下就轰上去了。这里除了生产上的需要以外，阶级路线我看是决定的关键，就是靠贫农、下中农的优势，靠巩固地团结中农，孤立分化地主、富农这个阶级路线。现在把社办起来了，是不是不要这条路线了呢？不是。这条阶级路线还要保持相当的时期，要正确执行，贯彻到底。这就为新的生产制度打下了阶级基础、政治基础。

第三条，要慎重挑选合作社干部，提高合作社干部。我想就是这样三条。现在分开来讲：

如何搞好生产呢？我认为要把以下三方面的事办好：

一、贯彻勤俭办社的方针。中央最近有个指示，要力求搞好现有的农业副业生产，不要放弃眼前的生产不抓，去贪图别的，而要把现有的生产搞好，保证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另外，要尽可能地减少非生产性的开支；基本建设也要分清轻重缓急，不要一步登天，不要想把十二年的事情两三年搞完。那个指示里讲，有些计划现在看来不可靠，是空话。那天宣传部的同志讲，有指标无措施，有计划无根据，靠国家不靠自己。假如是这样的话，那样的计划就应该改变，不要顾那些面子。比如地瓜五万斤，那就有相当的盲目性。如果上很多化肥，那也许可以，但化肥哪有那么多，那不是空的吗？所以有些明知道是不可能、不可靠的计划，应当适当修改，修改成合乎现实。我们也不提倡把生产计划定得小小的，一年增产百分之几，百分之三、百分之四，想争取政治上的主动。这也不对，是保守思想。但是，如果不从现实出发，具有盲目性，有计划无根据，有指标无措施，靠国家不靠自己，那样明知不可能的计划，那又何必定呢？另外，还要限制乱记工分。我想这就是搞好生产的头一条，贯彻勤俭办社的原则。把生产搞好，减少不必要的开支，保证今年增产增收。今年是合作化之后

的第一年，也是我们执行新的《四十条》^{〔1〕}的第一年，不要第一年就来个不太高兴，这是不好的。

二、要发挥群众的潜在力量，靠自己不要光靠国家。这里要克服对群众潜在力量估计不足的右倾保守思想。那天山东、河北几个省的同志都讲到这个问题，很好。我们应该认识到我国群众当中的潜在力量是很大的。那些把计划定得高高的，把希望寄托在化肥，寄托在国家援助方面，形式上表现是冒进，其本质是右倾保守，是对群众力量估计不足。国家当然要尽量援助，中央各部门要尽量援助，但作为社、县、省，你们不要等待，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国家方面，应该寄托在自力更生上，靠自己，靠群众。比如肥料问题，那天供销社的同志讲得很清楚，单靠化肥，就要失望。我们可以搞进六、七百万吨，但是你哪有钱呀？你有多少黄金美钞？你有多少物资出口？这是个实际问题。所以还是要把希望寄托在当地的土肥料，搞猪肥，搞绿肥，搞泥肥、渣肥。一个是尽量挖肥源，一个是合理使用肥料。我看的那几个合作社^{〔2〕}就没有靠化肥，而那三个合作社都是增产百分之七十以上，有一个是百分之七十五。我当时很怀疑，我问他们：一个劳动日分两块三角，有一个社劳动日是两块六角，有没有把握，靠得住吗？他们说有把握。主要一条是靠自己，不靠国家。肥料就是挖塘泥，一亩田上塘泥二百担，并且已经挑好了。合作化以前，贫农一担塘泥没有上，富裕中农上了二十担。去年初级社的时候上了九十八担，增产百分之四十五；而今年的高级社上了二百担，要增产百分之七十，凭这一条就有把握。这就是改良土壤。那么今年搞塘泥，明年呢？他们说，明年就没有这样多了，塘泥一般要过四年再挖，明年就是尽量养猪，一人一头猪。当然广东与北方不同，气候温和，饲料比较多，还不是靠水浮莲。前次，我向中央建议，原

来农业部准备十二年搞四亿头猪，我的意见，是搞五亿或者六亿头，淮河以南应该做到一人一猪。当然不一定今年做到，刚才我讲的那个社是特殊例子。现在是一户一猪或者一户一头半，将来在多少年之内或者四年、五年或者七年达到一人一猪。淮河以北、黄河以南，应该是做到三人两猪。黄河以北应该做到一户两猪，气候再冷一点的地方一户一猪。当然不光是户养，合作社也不例外。我想这是解决肥料的主要办法。当然再加上羊粪、马粪、牛粪，加上人粪尿，你看有多少！张郭庄那个社，一盆尿（三十斤）一毛五分钱，家家户户积肥很积极。我看，一个人一天一斤大粪，两斤尿有吧！全年就有一千一百斤，就打上一千斤。以广东那个劳动模范的经验，一头猪顶三个人。南方一头猪管二亩地，北方一头猪可以管三亩到四亩地，这样问题基本上就解决了嘛！你还靠什么化肥，根本就是靠这个东西。人粪尿加猪粪，北方加羊粪，南方还要加鸡、鸭、鹅粪，还要加兔粪。兔粪很值钱、很有用。北方的羊粪很好，马粪你能把它捡起来也很好。现在你可以利用这些，这就是潜在力量。你不在这里打主意，天天把希望寄托在化肥上，那是靠不住的。当然我们要争取外援，但不依靠外援。中国农村的许多东西，农民之间的许多经验是好的，各地要研究一下，成功的要推广。这是讲肥料问题。农具问题也应该是这样。那天张霖之同志^{〔3〕}讲得很清楚，农业有季节性，工业有均衡性。这中间有矛盾要解决，那就应该储备。供销社同志讲要储备，我说应该。供销社储备一部分，各地方储备一部分，另一部分给合作社。甘肃的同志说这是雨后送伞，我看总比雨后没伞还好些，这次雨打不到伞，下次雨就打到伞了，应该储备一部分。工业部门对双铧犁是费了最大的力气，他们的困难我们应该照顾。但双轮双铧犁在这一两年之内还不会占主要地位，还是靠原来的旧犁，靠各

地的改良犁。

农民有许多创造，现在就要发挥这些东西。不要把希望寄托在那些不可靠的，或者是今天不可靠的东西上。水利也是这样，不要总想向李葆华⁽⁴⁾这里伸手，搞大坝，当然也需要，但主要的还是就地想办法。有些地方打井，有些地方挖塘，有些地方挖深塘，有些地方挖平塘，有些用地下水，有些封江堵河，有的是办法。发挥群众的集体智慧，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种子也不要过分地依靠农业部，本地就有良种，要就地选育。外来的种子必须经过试验，不能完全依靠外来的种子。向国家要贷款是需要的，但你不能样样都要国家贷款，那天胡景云同志⁽⁵⁾讲得很清楚，就是那样多的钱，这也办，那也办，哪有那么多钱？钞票发多了要引起通货膨胀的。国家必须大量援助，但无论怎么帮助都是有限的。群众的源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改进农业生产技术，也要靠群众，群众中有很多有用的好技术应当推广。比如如何培养种猪，如何小株密植，如何单季改双季等等，要推广这些先进经验，在推广的基础上，再加以改进。这些方面都要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根据自己的可能，发挥群众的潜在力量，不要依靠国家，要靠自己。如果光靠国家不靠自己，对国家手伸得很长，那结果会落空，你埋怨国家也没有用的。我想要克服这方面的保守思想。如果这条做好了，计划就可靠，增产就有保证。将来订计划，一个要按照国家需要，一个要按照本地需要，一个要按照本社社员需要，三个需要。再一个是根据可能，是不是能种这么多，要通盘筹划。要把希望寄托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础上。

三、编好劳动组织。三固定也好，四固定⁽⁶⁾也好，要把它固定下来。劳动组织编好，规定一些制度，编好劳动定额，包工包产。这个东西不搞好，集体经营没有好的结果，没有希望搞好的。现

在已经搞起来了的，就应该检查，使之做得更好；没有搞的赶快搞。队没有编的赶快编，耕作区没有划的赶快划，应该调整的赶快调整。春耕已经到了。

我想搞好生产就是这样三条：第一条勤俭办社，贯彻中央勤俭办社的方针。第二条必须发挥群众的潜在力量，不要光依靠国家，主要靠自己，依靠本地、土办法、土材料，就地取材，就地推广，争取外援，不要依靠外援，克服保守思想。第三条就是把劳动定额、包工包产搞好，包工包产势在必行，高级社没有包工包产不行，无论如何不行，我想南方北方都要搞包工包产。

第二条讲到要发挥群众的潜在力量，并不是说不要新技术了，也不是说不要新工具了，不是这个意思。相反，我们要尽可能地采用新技术，采取新的机器工具。

现在讲巩固社的第二个关键，就是政策补课，贯彻阶级路线。这是保证新制度执行的社会基础，也就是政治基础。没有这个政治基础，新制度是个空的，虽然建立起来了，那些不满意的人，很容易受人挑拨的，所以必须贯彻阶级路线。政策补课，就是贯彻阶级路线，不要以为现在这方面没有问题了，比如有些上中农占优势的社里，问题就比较多，就要调整。这条阶级路线的主要方面，是树立贫农、下中农的优势。合作化运动半年发展这样快，就是因为有贫农、下中农的优势，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人都起来了，其他百分之二十左右的人就跟着来，百分之十的人就分化了。今天仍然要保持贫农、下中农的优势，巩固贫农、下中农优势，办法是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政策水平，使他们懂得如何团结中农，而又如何孤立、分化、改造争取地主和富农。对中农和地富的政策，是靠贫下中农来执行的，所以要保持他们领导上的优势。巩固贫下中农的优势要通过什么呢？要通过党支部，健全支部的领

导，党、团支部都要发挥自己的作用。通过党支部的集体领导来巩固贫下中农的优势。我看这是贯彻阶级路线的主要关键。

其次一点，就是对地主、富农的问题，确实目前应该提高警惕，克服麻痹思想。那种认为入社之后，大家是一家人了，从此天下太平了，是不对的。但总的说来，地主，富农大大分化了。允许他入社以后，欢天喜地，绝大部份分化了，各省都是如此。有些把过去的罪恶都讲出来了，隐藏在地下的财产也拿出来了，表示他进步了。总的方面是好的，但应该说其中还有少数是顽固的，敌视我们的，所以对这个阶级还是要保持警惕。要分类排队，区别对待，就是说两头小、中间大，还是应该执行中央指示的这个原则。当然各个社、各个地区不同，大概还是保持中间大两头小，看一、二年再说。入社的正式社员不要太多，正式社员少一点，管制的少一点，中间的候补社员多一些。参加合作社之后，并不等于改变阶级成分。改变阶级成分还是照过去国务院颁布的办法，党内讨论，社员通过，经过一定机关批准。不要轻易改变成分，当然也不是一个不改变，入社和改变成分是两回事。对地主、富农这一点还是要注意。

对防止侵犯中农的利益，这一点也要特别小心。毛主席几次讲过，无论如何，社会主义对自己劳动人民总是不侵犯他的。上中农（旧的上中农、新的上中农）是我们的基本群众，应该巩固地团结他们。不团结这部分人，贫农优势保不住，地主、富农就不会老实。如果今天在这方面贪小便宜，就会留下不和的种子，同时，给地主、富农一个钻空子的机会。所以各地在规定具体政策的时候，要特别小心。执行当中，假如过去搞过了头的，现在又发现还有某些问题的，就要做工作，防微杜渐。这是巩固社的第二个办法。通过政策补课，来贯彻我们的阶级路线。究竟需要多

少年呢？现在也不能说死。总而言之，还要相当时期就是了。是不是一辈子都这样？那当然不是的，但这几年内是不会变的，还是这种情况。

现在讲巩固社的第三个关键，挑选干部与提高干部的问题。这个工作，近几年特别是去年这半年做了很多，一般社干部的水平大有提高，无论是政策水平，经营管理能力，思想作风都大有进步。但解决这个问题，还要经过长期的努力，所以这也是巩固社的重要关键。首先要慎重挑选干部。假如有些干部不大适当的，就应该想办法适当改变。一个慎重挑选干部，一个确立社内民主制度、选举制度，确立社干之间、社员之间、社员与干部之间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制度。这个制度不建立，再好的干部过些时候就坏了，变质了，因为操握大权。我们应该认识到现在的干部权力相当大。现在合作社干部，特别是高级社的干部不比过去农民协会的干部，他的权力比乡长也大。他不仅有政治大权，而且有经济大权。人家生活资料都在他手里，饭碗端在他手里。所以挑选干部就要很慎重，必须要保证干部的品质好，有能力，大公无私，公道能干。光靠上级不行，光靠支部也不够。当然上级要审查。在检查工作当中要发现问题，主要是经过支部大会，经过社员大会或代表大会，建立监督、选举制度，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次苏联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就很清楚。你个人再天才，个人总是个人，如果没有集体领导，脱离了群众，什么天才还要犯大错误的。这件事值得我们警惕，个人崇拜，个人主义要不得，要靠集体。所以，挑选社内干部要很慎重，不适当的就应该撤掉。因为权力太大责任很大，选得不适当不行。其次，今天干部中的自满情绪，应该引起很大警惕。这半年太顺利了，胜利太大了。在这当中，不知不觉地要产生骄傲自满情绪，这是很自然的。当然

不是所有干部都如此，但是这个倾向必须要防止，已经发现了的，立即克服。骄傲自满必然慢慢脱离群众，他就特殊了。特殊化了，强迫命令，主观主义就来了。所以，现在要及时克服骄傲自满情绪和脱离群众的偏向。北京的同志提出，要抓住严重问题，追究责任，我想这是完全对的。你空空洞洞地讲一下不行，要找它一件严重事情，揭发它。他自己警惕，别人看到也就警惕了。再一个是训练，我们这半年来训练很多，大概每一个人都开一次会。地委每个月开一次三级干部会，县里头也经常开会、汇报、办训练班、派人检查等等。这样来达到提高干部的政策水平、文化水平，提高经营管理的能力，特别在思想上克服个人主义，建立深入的民主作风，防止命令主义。同时，要在干部当中提倡钻研技术。现在“万金油”干部不行了，硬是要有专家。当然不一定是专家，总要有专门技术，各人摸一行。我想经过这样几点来提高干部，使他们胜任工作，通过他们来团结社员，依靠群众的力量，把社办好。以上就是我要讲的关于整顿巩固现有社的问题。

注 释

- 〔1〕《四十条》指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纲要(草案)》规定：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在十二年内，粮食每亩平均产量，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地区，由二百零八斤增加到五百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由四百斤增加到八百斤。棉花（皮棉）每亩平均产量按照各地情况，由一九五五年的三十五斤（全国平均数）分别增加到六十、八十和一百斤。
- 〔2〕这里指一九五六年一、二月间，邓子恢在广东从化县疗养时特地视察的中联乡、邓村、温泉村三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 〔3〕 张霖之，当时任煤炭部部长。
- 〔4〕 李葆华，当时任水利部党组书记、副部长。
- 〔5〕 胡景云，当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 〔6〕 四固定指农业生产合作社把土地、劳力、牲畜、农具固定给生产队使用。

在社会主义基础上 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

（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我完全同意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和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我认为自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委员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完全正确的，这些报告系统地精辟地总结了我们党自七大以来的经验教训，正确地提出了今后建设国家建设党的方针、任务和准则。我现在仅就农民运动和工农联盟问题发表一些意见。

旧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落后的农业国家，又是一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的国家，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其中大部分又是贫农半无产者，具有高度的革命性，并有武装斗争的历史传统。在这种具体情况下，中国工人阶级和共产党要完成革命任务，就必须以农民为革命的主力。在革命胜利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农业又是工业发展的基础，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五亿农民仍然处于极端重要的地位，这就是中国革命最根本的特点。因此，正确地认识农民的伟大作用，正确地处理工农联盟问题，不仅是中国革命成功的根本保证，而且也是今后社会主义建设胜利

* 这是邓子恢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的根本保证。

在民主革命阶段，一切“左”、右倾机会主义者都在农民问题上犯了错误，他们不了解中国革命的特点，不了解中国农民伟大的革命作用，不愿意去依靠农民，不把农民当作革命的主力，这就是一切“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主要共同点，也就是他们在工农联盟问题上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基本分歧点。只有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领导，才真正认识了中国革命的特点，认识了农民的伟大的革命作用，确定了在党的领导下依靠农民进行革命的基本路线，从而正确处理了工农联盟问题。并且规定了中国革命不是走城市工人起义夺取政权的道路，而是依靠农民先在乡村建立革命根据地，来发展革命武装，壮大革命力量，造成乡村包围城市的形势，而后解放城市，解放全中国。这就正确地解决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具体道路问题。特别是经过一九四二年以来的整风学习和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从思想上彻底批判了“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提高了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水平。因而，在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各个革命根据地就更加充分地发动了农民群众，积蓄了巨大的革命力量，这就是我们所以能够迅速赢得解放战争胜利的一个最根本因素。

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党批判了安于小农经济现状的右的倾向，指出了农村阵地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必去占领的两条道路斗争的形势，指出了必须实现合作化才能够继续巩固工农联盟的道理。特别是一年以前，当合作化高潮即将到来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和党的七届六中全会对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思想做了系统的批判，从而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合作化运动的高潮，在短时期内基本上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并且推动了私人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进入高潮，这就使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

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经过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党在三十多年的农民运动中，在不断地巩固工农联盟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中最重要的，我认为有以下三点：

第一，必须坚决代表农民的根本利益，又必须善于适应农民当前的切身利益要求。

在民主革命阶段，农民的根本利益是获得土地。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地提出反封建的土地纲领，如果我们不认真地为实现这种纲领而奋斗，工人阶级就不可能和农民建立起革命联盟，我们也就不能够发动农民，依靠农民的积极支持，而赢得革命战争的胜利。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农民的根本要求是增加生产，增加收入，一步一步地改善自己的生活，而农民的这种要求，只有在实现合作化，坚决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因此，如果我们不及时地提出社会主义改造的总路线，如果我们不领导农民走上合作化的道路，我们就不能够引导农民永远摆脱剥削和贫困，也就不能够在新的历史时期巩固工农联盟。

但是，农民并不是一开始就都有决心为自己的根本利益而斗争的，我们必须抓住农民每一个时期的迫切要求，发动农民起来为当前利益而斗争，在斗争中经过农民自己的亲身体验，逐步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与胜利信心。这样，才能一步一步地由低到高地引导农民走向更高的斗争，而最后去实现他们的根本要求。正因为如此，所以在土地改革中我们并不是一开始就去没收和分配土地，而是抓住农民当时反对地主当权派的最迫切要求，先发动“剿匪反霸”斗争，紧接着又进行“减租减息”斗争，以后才转入没收和分配地主的土地财产的最后阶段。这不仅在全国解放以后是如此，就在内战时期的土地革命和日本投降后新解放区的土地

改革也同样经过了“反对苛捐杂税”、“打倒土豪劣绅”、“反奸清算”、“减租减息”等斗争过程。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我们也不是一下子就去组织高级合作社，而是采取了若干迂回曲折的过渡形式，先抓住农民在土地改革以后生产上尚有困难需要互助的迫切要求，发动农民组织各种类型的互助组。然后在农民亲眼看到了集体劳动的优越性，要求进一步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再组织土地统一经营，但仍然保持土地劳力比例分红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合作社。最后才转到完全按劳取酬的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合作社。这种逐步深入，逐步提高，逐步过渡办法，事实证明是完全符合于农民运动发展规律的，是完全必要的，也是非常成功的。

第二，必须坚决依靠贫农，巩固地团结中农。在农民中还存在着贫农和中农差别的时候，党就必须采取坚决依靠贫农，又巩固地团结中农的政策，只有如此，才能有真正巩固的工农联盟。在土地改革中如果我们不是坚决依靠贫农，不是先组织贫农而后组织中农，如果不去培养贫农成为运动的中坚，那中农就不会紧密地靠拢我们，敌人就不会屈服，运动也就会变得软弱无力，甚至于半途而废。经过了土地改革，有许多贫农上升为新中农，但是，他们当中除了少数上中农而外，经济上仍然是不稳定的，政治上是积极拥护我们党的，因此，他们仍然同贫农一样是可以依靠的力量。所以这个时期党的政策就是坚决依靠贫农和下中农，巩固地团结上中农，就是先吸收贫农、下中农入社，而后吸收上中农入社，就是要树立贫农和下中农的领导优势。在社会主义革命高潮前夕，我和一些农村工作同志所犯的右倾保守错误，其实质就是对贫农和下中农的合作积极性估计不足，被上中农的动摇所吓倒，而不敢坚决依靠贫农和下中农大踏步地继续前进。

但是，如果我们只注意依靠贫农，而不注意团结中农，如果

我们不在土地改革中严格保护中农的利益，不在合作化运动中坚持自愿互利政策，不是耐心地等待中农的觉悟而是加以强迫，不在经济上照顾中农利益而是加以侵犯，如果我们不注意吸收中农代表人物参加农会和合作社的领导，那么我们党和贫农就会陷于孤立的地位，也就不可能形成巩固的工农联盟。

党在农村中的阶级政策，除了坚决依靠贫农，巩固地团结中农之外，还必须对地主、富农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在土地改革中，对地主阶级的财产是无偿没收，但仍然留下他们应得的一份；对恶霸地主和抵抗破坏分子坚决打击，但对一般中小地主则采取比较宽大的态度。对小土地出租者则采取保护政策。对富农只征收其出租部分的土地，取消其高利贷，其他财产一律不动，争取富农在土地改革中守中立。在合作化运动初期，我们坚决禁止地主富农入社，但在合作化高潮到来之后，则又允许地主、富农分子分别入社为社员、候补社员，或参加社内劳动。现在看来，这种区别对待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也收到了显著的效果。那些不加区别，“一切皆斗”，“打倒一切”的“左”的办法，实际上不仅不能分化敌人，反而会脱离自己的群众，使群众感觉到我们做得太过火，反而同情敌人，从而增加敌人的抵抗。显然这种过左的作法是错误的，是违反党的政策的。

第三，必须自始至终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党是劳动人民的先锋队，也是劳动人民的勤务员，不是人民的上司，也不是慈善家，革命不是用命令或者施舍的方法可以实现的。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历来是依靠自己解放自己。党在农民运动中的任务就在于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使他们自己行动起来，掌握自己的命运，包办代替和恩赐观点，是会窒息农民的自觉性和自动性，是极端有害的。

我们党三十多年农民运动的历史经验证明，如果农民群众没有充分发动，不能自觉地组织起来和行动起来，不能在农村中确立自己的政治优势，依靠自己的力量去战胜敌人，解放自己，而是靠外来力量，用行政命令、包办代替或者恩赐施舍的做法。这样农民是不可能得到解放的。即使暂时得到了一些利益，也是靠不住的。在这种情况下建立起来的工农联盟只能是形式的，经不起风浪的，从而也就是不巩固的。

那么如何才能发动农民群众，使他们自觉自愿地行动起来，在农村中形成自己的优势呢？历史经验证明：必须结合农民实际的生活经验在农民中进行艰苦的深入的生动的思想工作，必须深入群众，用“扎根串连”的组织方法，去发现与培养雇农和贫农的积极分子，并通过他们去联系群众，带动群众；必须采取“由点到面”、“点面结合”的方法，去推进农民运动的发展；必须在纠正偏向中保护群众的积极性，依靠他们自己的觉悟去克服运动中所不可避免的缺点。历史经验证明，凡是这样做的，农民群众就一定可以充分发动起来，形成一个伟大的政治力量，从而形成巩固的工农联盟。如果采取相反的做法，不在农民中进行思想工作，或者采取脱离实际的空洞说教，不在农民中进行“扎根串连”的组织工作，而只采取开大会报名入会的组织方式；在运动发展步骤上不是“由点到面”、“点面结合”，而是采取所谓“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一轰而起”的做法；在纠偏中不是经过说服，经过群众自觉纠正，而是采取“泼冷水”的挫折群众积极性的办法；那么农民群众是肯定地发动不起来，就是发动起来也会“一哄而起”，“一哄而散”。这样，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农民运动，不可能有巩固的工农联盟，也就不可能在农民中树立党的领导威信。

目前农业合作化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工农联盟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根据新的情况来运用这些宝贵的历史经验，继续保持和加强党与农民的密切关系，对于在社会主义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在实现农业合作化以后，许多同志往往产生一种错觉，以为农民既然成了社会主义的集体农民，仿佛工农联盟问题就无足轻重了，农民的利益就可以不加重视了，就可以利用农民已经组织起来这个便利条件，采取行政命令的工作方法，而不必再用群众路线在农民中去进行工作了，这种种看法都是非常有害的。必须了解，尽管个体农民已经合作化，农村生产关系已发生了根本变化，旧的矛盾虽已解决，旧的问题已经过去，但新的矛盾又在产生，新的问题仍要出现。如果我们忽视这种情况，以为合作化以后万事大吉，以为农民利益可以忽视，群众生活可以不必那样关心了，从而在农民工作中发展了主观主义和命令主义，对群众生活漠不关心，这样，工农联盟就同样是不能巩固的，甚至有被破坏的危险。为了在新的条件下，进一步做好农民工作，在巩固现有合作社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我认为除了按照今年九月十二日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加强对农业合作社的生产领导和组织建设的指示贯彻执行外，还必须正确地处理以下五个问题：

第一，必须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保持工农业发展相适应。

在新的历史时期，随着工业化的发展，逐步实现农业的现代化，乃是工农联盟的新的经济基础。显然，如果没有重工业的发展，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造我们的农业技术，就不可能达到农业现代化，就不可能大大提高农业的生产力，也就不可能使农民富裕起来，永远摆脱贫困。如果没有轻工业的发展，也不能满足农民在生产、生活上对工业品日益增长的需要。从此可见，实现国

家工业化是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五亿农民的根本利益。不抓住这个基本环节，就不可能继续巩固工农联盟。

但是，工业的发展需要农业发展与之相适应。如果农业生产赶不上工业发展的要求，不能满足工业发展对于粮食、原料、资金积累和市场的需要，结果就只有使工业化的速度被迫降低，或者使工农联盟的关系紧张起来。我们可以回忆一下，由于一九五四年有了特大水灾，农业生产遭到了较大的损失，就影响了一九五五年工业发展的速度，而且在一九五五年春天还一度引起了粮食问题的紧张局势。因此，必须正确地拟定计划，付出相应的投资，并且作出巨大的努力，使比较落后的农业生产能够和工业保持相适应的发展。不抓住这一点，也就不能继续巩固工农联盟。

由此可见，保持工农业发展相适应，对于继续巩固工农联盟，具有决定的意义。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党中央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和周恩来同志的报告，都正确地处理了这个问题，我们应当遵循着这个正确方向继续前进。

第二，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大力发展农业生产。

发展农业生产不仅有利于工业化的利益，符合于农民的长远利益，也符合于农民当前的迫切要求。我们要能够帮助农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才能够巩固现有合作社，巩固工农联盟，才能够领导农民共同前进来完成社会主义建设。

由于我们的工业条件和国家的经济能力所限，在短时期内我们还不可能有大批的农业机械和化学肥料；不可能大规模垦荒来扩大耕地面积。因此，我们目前农业增产的主要途径，只能在现有土地上采取各种增产措施来扩大复种指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同时在可能条件下尽可能开垦一些荒地，以扩大耕地面积，这就是当前我们农业增产的基本方向。另一方面，我们有优厚的自然

条件，充沛的人力资源，精耕细作的传统经验，而又基本上实现了农业合作化。有了这些优越条件，我们就可以在合作化基础上依靠广大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利用优厚的自然条件，来充分挖掘现有土地的巨大的潜在力量。只要我们真正用大力去兴修水利，防止水患，开发肥源，改良土壤，并进行选用良种，推广新式农具，防治病虫害，改进耕作技术，改变耕作制度等增产措施，依靠这些措施我们也就一定能够在现有土地上增加复种指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来达到农业增产的目的。这在刘少奇、周恩来同志的报告中也已经明确地指出来了，我们应该按照这个方向采取积极的方针来推行这些措施，消极保守是不对的；但同时又必须因地制宜、采取稳进的步骤，而坚决克服主观主义和强迫命令的现象。根据几年来的经验，只要做好上述这些工作，我们是一定可以完成或超额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所要求的农业增产的任务的。

少奇、恩来同志报告中指出发展农业生产的另一方面，必须发展多种经营。我国农民历来都有多种经营的习惯，由于我国耕地不足，许多地方农民光靠耕田种地就不可能维持生活，从而也就不可能不从各方面找活路。因此，我们的农业生产必须以增产粮棉为重点，但同时必须因地制宜地发展畜牧业、林业、渔业、园艺业、运输业、手工业及其他副业生产。这些生产和农业生产都是互相依赖而互相支援的，只强调一面而忽视另一面都是不利的。此外，还必须妥善安排粮食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现在看来，粮食与经济作物争地和饲料不足的现象是值得注意的。我国粮食并不是很充裕的，某些地区如华北平原各省每人平均的粮食产量，在全国比较起来是最低的，而几种大宗经济作物如棉花、花生、大豆等又主要集中在这些地区。其他有些地区也有类似现象。要粮

食还是要经济作物，就成为这些地区农民中很突出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些地区的粮食问题，以便保证经济作物能按计划发展，除了采取上述措施加倍努力来增产粮食之外，我认为国家适当地增加一部分农业投资，以便在这些地区多发展一些水利建设，根治水害，扩大灌溉，并在可能条件下多开垦一些荒地，是十分必要的。

为了全面地发展农业和副业生产，还需要有正确的价格政策和做好农产品的收购工作来配合。价格合理，就会对农业和副业起刺激生产的作用，价格不合理，使农民无利可图，就会起不利于生产的反作用。目前一般农业和副业产品的收购价格是合理的，收购工作一般也是做得好的，但是仍然有某些产品的收购价格不合理，某些产品的收购手续过于繁琐，收购人员的态度不好，这对农业和副业生产是起了一定的反作用。为了发展农业和副业生产，就必须适当调整这些不合理价格，并简化收购手续，务使合作社和农民有利可图，购销方便，以便刺激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当然在调整价格时，也要注意使各种物价之间，保持一个合理比价，以免造成轮番提价的毛病。

第三，必须正确地处理国家和农民之间的关系，主要是正确处理国家资金积累和农民个人消费之间的关系。

为了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从农业方面取得一定的资金积累。这种积累，是为了给农民和所有劳动人民创造更大的幸福，这是符合农民的根本利益的。但是，如果这种资金积累得过多过快，使农民的生活水平不能随着生产发展而逐年有所提高，甚至反而降低了，那就会引起农民的不满，也就会妨碍工农联盟，妨碍国家建设事业的顺利前进。当然，国家资金积累也不能过少，否则就会推迟工业化，这也同样不利于工农联盟的巩固。

由此可见，正确处理这个关系，使国家积累和个人消费之间，有一个正确的比例，乃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巩固工农联盟的一个重要方面。为此，国家在农业和副业税收和工农业产品的价格方面，应该经常注意保持这种正确的比例，在征用农民土地和调用民工等方面，也要适当照顾农民的利益，片面的国家观念和片面的群众观点都是不对的。

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另一方面，还要正确处理国家对合作社的计划指导关系。这就是一方面要把合作社的主要生产纳入国家的计划指导之下，另一方面又要保持合作社经营的独立性。由于我们国家很大，农业和副业产品太多，受地域性与自然条件的限制又太大，因此，国家对农业生产计划不能订得太细太死，应该有一定的灵活性机动性。应该逐步改变现在由国家规定生产指标的制度过渡到将来国家只规定各省的调拨指标，各省、县只规定各社的征购指标，国家经济部门则同合作社订立采购合同。合作社在完成国家的征购指标和履行经济部门的合同义务以外，有权根据社员的需要和可能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来制定自己的生产计划。除了完成征购任务及履行合同义务以外的多余产品也可以自由支配，国家不要样样去干涉他们。这样做可以大大发挥农民的积极性，而对国家又并无害处。

第四，在农业合作社中，必须正确地处理社与社员个人之间的关系，以调动广大社员的积极性。

在实现了农业合作化，解决了小农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之间的基本矛盾以后，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关系，就成为合作社内部一个最突出的问题。正确处理这个问题，是巩固合作社的一个重要关键，也是巩固工农联盟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就要求：

在合作社的产品分配方面，要采取“少扣多分”的方针，就

是要“既保证集体生产需要、又照顾社员生活需要”的方针。中央指示^②，要把合作社总收入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分配给社员，争取百分之九十的社员能够增加收入，正是当前实现这条方针的具体的政策界限。经过今年夏收分配的实践，证明中央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今后在分配工作中，必须继续贯彻执行这个指示。随着生产一年年的增加，应该做到越来越多的社员都能够增加个人收入。

在合作社的生产经营方面，应该采取“大的集中、小的分散”的方针。在目前条件下，合作社应该集中力量搞好主要的农业生产和必须集中经营的大宗副业生产，而把其他利于分散经营的副业和家庭手工业都交给社员去分散经营。这样，一方面便于社员增加收入，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又便于合作社集中精力搞好主要生产。这种合理分工是符合于社和社员实际生产和生活的需要的。因此，在社员按计划完成社所规定的生产任务和规定的劳动日以外，应该允许社员有一定的劳动时间由他们自己支配，去经营家庭副业和自留地的生产，而不应该去限制他们。现在有些合作社限制社员搞副业，甚至限制社员种菜、喂猪、养鸡鸭，已引起社员不满，并造成了一定损失，这种错误应该迅速纠正。

在生产资料处理方面，应该采取“主要公有，次要私有”的办法。按照社章规定，社员的土地、耕畜与大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必须归社集体所有，社员经营家庭副业生产所需要的小农具、小工具、零星树木和家畜、家禽等都归社员私有。这种规定是合情合理的，对发展生产也是非常必要的。因为这样既可以帮助社员解决日常生产生活需要，而避免由于社不能满足他们日常需要而对社发生不满与埋怨情绪，从而有利于团结他们；对未入社的农

民，又可以解除他们的思想顾虑，吸引他们积极地参加到合作社中来。

在处理社员相互间的关系方面，必须采取“双方兼顾”的政策，就是“既照顾贫农社员利益，又照顾中农社员利益”的政策。农业合作化以后，建立在共同上升、共同富裕的基础上的贫农和中农之间的关系，是比过去更加团结了，而且随着主要生产资料的公有化，贫农和中农之间的界限，也将逐渐消失。但是在建社后的一定时期内，他们之间还将存在着若干不同的经济利益，思想上更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着一定的差别。因此，目前党在农村中的阶级政策，仍然应该贯彻执行依靠贫农巩固地团结中农的政策，在处理转社并社时所遗留下来的一些经济问题以及在收益分配、社务管理等方面，都应该既照顾贫农的意见，又照顾中农的意见，以便使他们更好地团结一致，把生产工作搞好。

在合作社组织领导方面，必须实行“民主与集中相结合”的原则，实现“民主办社”。能够实行集中，正是高级合作社的优越性之一。但是集中必须建立在发扬民主的基础之上，一切生产计划、增产措施、分配方案等决议，应该从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去。没有民主，集中就会变成主观主义、包办代替和独断专行。像合作社这样包括百把户几百户千把户的大型集体经济，如果不在社员中充分发扬民主，继续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以便发挥所有社员的积极性，依靠集体的智慧与力量来办社，而只是由少数社干部、技术员，或上级派来的驻社干部包办一切，那么社就一定办不好。在这方面，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集中太多，而民主太少，主观主义与命令主义并不是个别现象。许多同志只片面地利用集中的一面去进行工作，而不注意另一方面，发扬民主、动员群众来进行工作，这种情况必须迅速改变。

第五，必须继续加强党对农民的政治领导与思想工作。

农民参加合作社之后，就更便于党通过合作社去向农民进行政治工作和思想工作。同时，在合作化之后，也就更需要党加强对合作社的领导。因为：在个体经济时代，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是由他们自己负责安排的，在合作化之后，领导生产的责任重心就转移到合作社方面来了。为了使社干部真正负起这种责任，不辜负农民的希望，就需要党从政治、经济、组织等各方面去帮助合作社。应该了解：农民虽然已经参加了合作社，但是他们原来的思想观点和传统习惯在短时期内还不可能完全改变过来，为使这些思想观点和传统习惯不致损害集体事业，党就必须继续加强对他们的思想工作。特别要加强对干部和党员的思想教育，防止一切可能产生的贪污腐化和脱离群众的现象。为此，各级党委，还必须按照七届六中全会精神，继续加强对合作社的领导工作；尤其要加强基层党的组织工作，使支部真正成为领导合作社与团结广大社员的核心。目前有些地区由于撤区并乡，干部层层上调，削弱支部领导的现象必须加以克服。应该善于利用合作社这所社会主义的学校，从农民日常生产和生活中加强对农民的社会主义与集体主义教育，使农民从政治上、经济上和思想上进一步巩固同工人阶级的联盟，在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下，胜利前进。

注 释

〔1〕指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和周恩来所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

〔2〕指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的《关于加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领导和组织建设的指示》。

关于龙岩白土 撤区并乡试验情况简报*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八日)

我在漳州住了十二天，本月十一日从漳州到汕头又住了三天，昨日回到广州，月底可以回京。关于撤区并乡问题，龙岩已于十一月初在白土先试验，试验结果，地、县委都满意，区、乡干部与群众皆大欢喜。现将试验情况简报如下：

白土原名东肖社，现有人口一万二千多人，南北十华里，东西五华里，另有几个小村庄距白土街十几华里。从清雍正年间就划为一个社，八个甲，民国初年仍旧制，苏维埃时代划为一个区，十二个乡，一九三二年国民党占领龙岩后仍划为一个区，一九四三年国民党实行新县制，划为一个镇。因为历史上白土是一个行政单位，所以各乡人民就形成了相同的人情、风俗、方言、习惯，亲朋关系很密切，在经济上农田、水利、山林、手工业、商业、交通等也形成一个难以分割的整体，并有一个圩场，作为商业交流的中心。今年五月间，龙岩县委并区并乡时将白土区撤消，合并

* 这是邓子恢一九五六年十月初到一九五七年一月底在南方考察期间写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八个调查报告中的第五个调查报告。中央认为“这个报告是好的”，转发给了上海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于附城区(是五个小区合成的大区),而将原属七个乡并为三个乡,将原来较弱的乡干部调到县、区工作。乡的范围扩大了,任务加重了,但干部仍是三个人的饭四个人吃,天天忙于开会,接电话,填表册,打条子,根本无时间,也不可能深入下层,了解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而只能将上面分配的任务往各村合作社分派。乡干如此,区一级又是督导机关,管辖范围更大,同样也是承上转下,将县上交来的任务往下派。如果说正确的领导是“从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去”,那么现在这种区、乡机构则只能是“从上面来,往下面灌”。这种机构如不改变,主观主义和强迫命令是难以克服的。自并大乡后,党对农村领导实际上是削弱了,有些乡简直丧失了领导作用,工作陷于瘫痪,干部三头受气,情绪不高,体力降低,更谈不到吸引群众来管理政权,监督干部。这次改变乡制是经过了地、县、区委讨论,参考了县志,征求了乡干部意见,并经省委同意最后决定的。实施时,先将干部配备好,将原来大区区委书记、区长及工作组长调回县去,将原三个大乡干部十二人合组到一个乡,名称叫乡,实际上是区,干部相当强,可以独立工作。现编制是十八人,将来可减到十五人。改编之后一般反映有六大好处:

第一,是便于全面领导农业生产。因为白土原是一个经济整体,有一个圩场,有供销社,有银行营业所,有信用社,有技术推广站等,这样便可以从各方面来配合农业生产的发展。

第二,是便于发扬民主,便于吸引人民来管理政权。乡代表由各合作社选举,每社有一个代表团,推举一个代表组长,乡人委开会时吸收代表组长参加,开会方便。群众对本乡情况熟悉,对本乡干部也熟悉,便于发表意见和挑选干部。

第三,是便于领导合作社。白土共十六个合作社,乡干有四

个人，专门负责指导，分片包干，有一个副乡长负责领导，基本改变了过去乡干部的忙乱情况。

第四，是便于搞好乡财政。白土圩的摊子税、牙税、卖尿钱、店房租，以及各村鸭禁、公山、公产等收入每月达四、五百元。这种乡财政过去是由县府派人在三个乡分别组织乡财委管理的，每个乡财委有两人脱产，每人每月十八元。现划归乡人委直接管理，自行收支，县府采取抽肥补瘦办法加以调剂，既减少编制，又可以发挥乡的积极性。

第五，便于领导支部。过去四个乡干部中有一个总支书记领导村支部，实际上起不了作用，乡干部把总支叫作“上不沾天，下不着地”几个月来，支部陷于无人管状态。现在乡里成立党委，过去的区委书记任乡党委书记，对支部领导比之过去要好得多。

第六，便于减少层次，缩小编制。原来三级制现改为两级制，乡归县直接领导，乡之下就是合作社。在编制上撤区并乡后全县可以减少八十至一百人。

以上便是白土乡改制后的好处。现地、县委决定冬耕冬种后在全县推行，将全县划为一个城关镇、22个乡，并在离城九十里的白沙设一个县府办事处，管辖东北边六个乡。这二十二个乡一般都是按过去社的范围来划，其中有两个大社，分为四个乡，另有四个小社则并为两个乡。改制后除两个乡外，其余二十个乡都各有一个圩场。为了加强乡的领导，县委决定将全县干部重新加以调整，原则做到各乡干部回本乡，有些乡本地干部较弱者则将原来调到地、县委的干部调回去。并决定此次干部安排后三、五年不动，改变过去干部调动频繁的不正常现象。

龙岩这种乡改制，我沿途转告了龙溪、汕头、惠阳三个地委和所属各县委同志（正在开县委书记会议），大家一致认为，这种

小区制既可以加强基层组织，减少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又可以为精简编制找到出路。他们还主张，将现有小乡干部除一部分调到小区外，其余回到合作社去当社长或支部书记。由于山区农民收入不高，他们主张，这些回到社的干部一般不降低或少降低其待遇（如按原薪打九折），除他们从社取得工分补贴外，不足之数由县补足之，补到合作社能贴足他们的工薪为止。平原富裕地区合作社工分补贴较高的则不必另行补贴。我认为，这种办法可以采用。请中央考虑。

沿海较富裕地区社员 闹分社退社的情况报告*

(一九五七年一月六日)

兹将沿海较富裕地区社员闹分社退社情况报告如下：

一、这些地区今年粮食、水果都丰收，但社员闹分社退社的不少。主要有三种人：一种是上中农及部分中农、下中农；一种是劳力少子女多的贫困户；另一种是小商贩及手工业者。对小商贩及手工业者，可按中央去年九月十二日指示准他退社，按小商贩及手工业者办法改造，而准许其家属留在社内，或准许他们留在社内，编成专业小组，单独经营、自负盈亏。对缺劳力、子女多的贫困户，应适当予以补助，帮他们解决生活困难。广东有些地方规定，一个全劳力养两个小孩，一个半劳力养一个小孩，超过此限额，由社按小孩多少，每人每月补助 3 元或 4 元。七十岁以上的老人，照小孩计算。产妇四十天休假期，工分照给。这种办法群众十分赞成。我认为，这种办法可在全国推广，但一个劳力养老小几人，补助金多少，由各社按实际情况自定。

二、比较复杂的问题是上中农问题。这些人土地占有较之贫

* 这是邓子恢一九五六年十月初到一九五七年一月底在南方考察期间写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八个调查报告中的第八个调查报告。

农、下中农相差不太多，所以取消土地报酬，一般意见不多。但果树、鱼塘、蚕桑及山区之林木等则占有悬殊很大。如福建之龙溪及潮汕之普宁等县，柑桔占有量，贫农一户只有十几、二十枝，而中农、上中农则有五、六十枝、百余枝不等，有的多至五、六百枝，相差十倍、二十倍。柑桔产量差的树及老树，每枝年产几斤、几十斤，好树、壮年树每枝年产几百斤甚至上千斤。对这些果树作价，去年春间转高级社时，作价普遍偏低。如福建省委规定，每枝果树按一年至五年产值作价。下面实际作价是低于一年产值。如龙溪县九湖社柑桔今年每百斤平均收购价是十二元，但社作价是每百斤九元，这种比对待资本家还不如的果树作价，不仅上中农不满，就连中农、下中农也不满意。果树较多的富裕村吃亏就更大。如九湖社全社一千八百多户，分九个中队，其中第四中队，三百九十七户，占全社总户数百分之二十，粮田也占全社总粮田百分之二十，但柑桔产量则占全社总产量的百分之四十五，荔枝占百分之三十五，桃子占百分之二十五。据该队计算，今年水果收入全队要吃亏四万多元，每户平均要吃亏一百元以上。因此，该中队全体社干、社员都闹分社。该中队二十三个党员中，十七个坚决要分社，只有四个党员主张不分，两个党员可分可不分。二十三个团员也是如此。该中队闹分社的理由：一是果树吃亏太大；二是嫌社太大，经营管理不好。今年柑树已死百分之五，退化发黄的达百分之六十，他们说，再过几年柑树要死光了。这样严重的问题，县、区委有些同志还认为，这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思想问题。某些同志还说四中队闹分社是匈牙利事件，要通过整党整社予以解决。经过我们工作组住该社了解情况，并由我召开了该社正、副社长，四中队正、副队长，及地、县委书记参加的座谈会了解真相后，与地、县委初步研究改变果树作价方案。查

该社柑树种植三年每亩要付成本一百元，四、五、六年为初产期，每产百斤，按现价除工、肥外，可得纯利百分之二十左右，七、八、九、十年为盛产期，每产百斤，可得纯利百分之三十五，十、十一、十二年为衰产期，每产百斤，得纯利百分之二十左右，十三年以后不长柑桔或长得很少，要砍掉再栽。现规定幼树按所投成本作价，初产期和衰产期各按产值百分之十八作价，盛产期按产值百分之三十作价，老树按柴禾作价。这个方案尚未通过群众，但估计可能得到大多数群众同意。其他，荔枝、龙眼、桃子、香蕉、菠萝等根据不同情况另定方案解决。如照此方案，则偿还期限要分别延长，有些三、五年还清，有些可延长到十年、八年或十二、三年还清。我认为，这个方案是合理的，是解决果农退社分社的根本办法。福建省委已同意此方案。但社太大者还必须适当分开。如九湖社原系三个乡十七个社合起来的。户数达一千八百多户，八千多人，分九个中队，五十八个小队，另十三个副业队，地区纵横十里，又是丘陵地带，社干管理水平不高，不分开确难搞好。开始县委不愿分，后因群众说不服，天天打架，才决定用联社形式，下分为几个分社。各分社经济上单独经营，自负盈亏。我认为，这样分开是有利无害的。

三、解决果农纠纷另一个办法是比例分红制。潮汕各县采用此法。这些县果树，有的二、八分（即社得八、果农得二），有的是三、七分或四、六分；一部分作价入社，零星果树仍归私有，入社后果农仍有一定的自留树。但因为种柑桔技术性高，需要肥料也很多，当时各社因为农活多，缺资金，缺肥料，贫农干部又缺乏管理柑桔经验，原果农有资金、有肥料、有技术，又不愿拿出来。大家眼看柑桔有减产危险，个别果树有被破坏的现象，因此，普宁县委召开了一个柑农座谈会，要大家自由提意见。后来上中

农代表提议，将他入社的果树交还他自己管理，他每年将所得产值抽取百分之十、十五至百分之二十交社作为公积金、公益金及代交公粮之用。这个提议得到贫农代表同意，因此达成协议。这个办法，现在潮汕有好几个县推行。推行结果，柑农很积极，把所有肥料、资金、技术都用出来，今年柑桔大丰收，柑农收入增加，合作社收入也增加。这些果树交原主经营后，合作社则集中力量增产粮食及其他副业，并经营贫农、下中农较差的果园。另抽出劳力开辟新果园。广东另外一些县份则采取果树入社仍交还原主包耕包产，而把包产量定得低一些，超产部分归原主收益。这与普宁办法实质上是一样的，只是形式不同而已。这两种办法，既能够维持上中农原来较高的生产水平，以便团结果农，又能增加贫农社员收入，还可以逐年开辟新果园，发展集体经济，可谓一举三得。我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过渡办法。其他如鱼塘、蚕桑等也可采取类似办法作为过渡，等到社的生产水平赶上中农时再进行统一经营。

四、在山区则是杉、松、竹林及其他经济林木，如茶油、桐油、茶叶等入社问题。这些东西也是中农、贫农占有悬殊较大，容易引起纠纷的。如宁都茶油入社争吵很大。龙岩有些社则竹林争执较多。解决这些纠纷的原则，除零星林木仍归私有外，其他成片林木应该入社统一经营，每年收益一般以采取比例分红的过渡办法为好，俟情况完全摸清后再行作价，此次，我们工作组在白土隘头社（该社以经营竹器为主）解决了竹、杉、松入社作价之后停止了群众乱砍乱伐现象。竹子由群众民主评议，估算重量，按市价八折作价，群众很满意。但杉、松作价后，社干部嫌太高，怕将来社反背上包袱。由此可见，杉、松之类还是暂时不作价，采取比例分红办法为宜。宁都之油茶，因土改时系折合土地分配的，

故油茶少的农民反对作价，亦有道理，现改为对土改后茶油培养好者补贴工本。总之，这些占有悬殊的东西，应根据有利生产及不侵犯中农利益的原则慎重处理。这些问题处理得不好，不仅影响贫农、中农团结，而且影响生产，影响合作社的巩固。现在还有许多干部看不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而想采用压力办法，这不是“釜底抽薪”，而是“火上加油”。即使今年不发生问题，三、五年内问题仍然存在，终有一天要爆发起来的。这些干部需要很好加以教育。

五、沿海平原区另一问题是经济作物与粮食争地。因为粮价低，不种些经济作物，农民就要减少收入，但要种经济作物则无法完成粮食上调任务。如惠阳专区今年要扩大三百万亩经济作物，但粮食就要减收几亿斤，而省委上调任务又不能减少，使地委很作难。这是我们内部上下级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出路，应根据各地具体情况把一些低产田改种经济作物。如从化县今年抽出两万亩低产田（每亩只能产粮八十多斤）改种黄麻、花生、甘蔗等，结果粮食增产计划仍然完成，而农民收入又增加了。过去，我们有些地方硬性规定各地早改水、早改双、提早插秧等增产措施，不问各地水利、气候与劳力、肥料条件，要各地照办。结果粮产是增加了，但经济作物却减少了，造成社员收入减少。据从化调查，种粮一个劳动日分三毛七分，种花生可得四毛多，种甘蔗可得一点五元，种黄麻可得二元，而且浪费了许多并不必要的时间去抗旱，实是得不偿失。有些地区还造成粮食减产，甚至颗粒无收。如果不这样硬性规定，而让各社因地制宜，参照过去历史习惯与气候、水利、劳力等条件，把这些不利于种双季水稻的土地仍种旱作物，不要机械插早秧，则可以节省许多不必要的抗旱劳力，那对粮食及经济作物生产都有好处。由此可见，在增产

措施上不可硬性规定大计划，不应割断历史，不要否定农民经验，而应该强调因地制宜，研究历史习惯和老农经验，让下面有一定的独立性，才能收事半功倍之效。此外，因为粮价低，水果及经济作物价格高，不少社偷偷摸摸地扩大一些经济作物面积，而缩小粮田面积，这是很难控制的。因此，对水果及经济作物与粮食要有合理比价和税收上加以适当限制，才能制止这种趋势。这也是今后应当研究的问题。

论正确处理农村人民内部矛盾 和正确处理矛盾的方针办法*

（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日）

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又一个伟大创造。这个指示，对加强全国人民团结，巩固社会主义改造的成绩，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迅速发展，无疑地将起着重大作用。我们全体农村工作同志应该根据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很好地来研究农村人民内部所存在的矛盾，特别是当前农业生产合作社内部所存在的矛盾，找出正确的途径，适当地加以处理，从而使农业生产合作社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合作社内部有没有矛盾呢？矛盾也是有的。这表现在社与社员之间，社管理委员会与生产队之间，村与村、队与队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干部与群众之间。我现在就来谈这些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方针办法：

第一，合作社和社员之间的矛盾，这是社员的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矛盾。如在收益分配上，副业经营上，现金预支和处理自留地等问题都发生过矛盾。为什么会发

* 这是邓子恢为通俗读物出版社写的小册子第三部分。

生这些矛盾呢？这是由于社干部与社员所处地位不同，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也常有差异。干部多从合作社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而社员则容易偏重于个人利益与当前利益。比如在收益分配上，社干部往往主张“多扣少分”，而社员则要求“少扣多分”；在经营副业上，社干部容易强调集中经营，而社员则强调分散经营；在自留地问题上，社干部多主张少留甚至不留，而社员则要求多留。在这三个问题上，社干部与社员之间因为看问题的出发点不同，当然就发生了矛盾。处理这种矛盾的方针，是要在首先维护集体利益长远利益的前提下，适当照顾社员的个人利益和当前利益。社员之所以加入合作社，参加集体生产，其目的就是为了能够更好地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收入能够逐年增加，生活能够逐年改善。如果在这些问题上处理不适当，不注意在增加生产的基础上，使大多数社员逐渐增加收入，那么社员就很难自觉来维护集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但是如果只顾社员的个人利益和当前利益，把社的纯收入都分掉用掉，结果社就不能扩大再生产，就妨害了集体利益，从而也损害了社员的长远利益，使社员生活永远停留在现在的水平，达不到美好的远景，那么社员今天可能没有意见，而将来还是要埋怨我们的。因此，我们在处理这些矛盾的时候，就必须坚持社员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当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并使两者适当结合的方针。在处理的具体方法上，又必须根据各个社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来灵活规定，而不能过于机械。

比如关于收益分配问题，在扣留与分配给社员的比例方面，各地的农业社如遵照以下四条原则，就可以达到统筹兼顾的目的：

（一）留足下年度和下季度的生产费用；（二）保证国家公粮和统购需要，归还到期贷款和预购定金；（三）保持大多数社员增加收入，并留适当的公益金，以照顾五保户和困难户；（四）公积金和

基建投资多少则由各社看情况而定，在年景不好时只能少留，在一般年景和丰收年则应该尽量多留，以便扩大再生产、增加社的公共财富。

关于副业经营问题，去年春季各社不注意发展副业生产，以后注意了副业，有些社又统得过多；在纠正这一偏向后，又有些地区不分大小副业都由社员个人经营，这些都是不妥当的。中央对副业经营所指示的方针是：“必须集体经营的归社或队统一经营，宜于分散经营的尽可能鼓励并帮助社员各自经营”。各地各社要按此原则，划定社、队和社员家庭经营副业的范围，这样社与社员明确分工，分头经营，就可以减少彼此间的矛盾，而能够更好地团结一致进行生产。

关于自留地问题，社章规定是不超过社员平均所有土地的百分之五，今年四月间中央又通知可以超过百分之五，某些地区可以达到百分之十，这样既坚持了社对土地的统一经营的原则，又照顾了社员的实际需要，这是正确的。但有些地区还未完全执行，有的留得太少，有的甚至不留，这是不妥当的。

第二，是合作社管理委员会与生产队之间的矛盾，也就是社与队在经营管理上分工不明确所形成的矛盾。这是目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矛盾。管理委员会是合作社实行统一经营集中领导的机构，合作社是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组织，是必须实行统一经营和集体领导的。生产队则是合作社组织劳动管理生产的基本单位。队的工作如何，对生产好坏起有决定性的作用。去年许多合作社在生产管理上的缺点之一，是过多地把权力集中到社管理委员会，无论生产计划、技术措施、劳动定额、财务工作等都管得过细过死，生产队缺乏必要的机动权。因此，不能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也就不能发挥生产队和社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又助

长了某些社干部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由于把许多不应该归社管的事，都集中到社来管，社脱产干部的人数增加了，补贴工分增多了，这也是容易引起社员不满的。

这个矛盾如何解决呢？主要的办法是要建立和健全合作社从上到下的经营管理制度，这就是要“统一经营、分级管理、明确分工、个人负责”。管理委员会是合作社统一经营和指导全社日常工作的机构。凡属合作社的生产计划、生产资料使用、技术措施、基本建设、劳动调配、工分标准、资金筹划、分配方案、财务工作、全社的工作督导、检查等都应该由社管委会负责，统一经营，统一筹划，统一计算，统一分配，这是每一个生产企业必不可少的制度。但这些计划、方案定下来了，靠谁去执行管理呢？主要就是交给生产队、副业组去执行管理。合作社内要划分若干生产队和副业组来管理生产，在生产管理过程中，生产队又要按季节把某些地片的农活包给生产小组去做，有些田间管理的零活还可以包给户去做。副业组也要按各人所长，明确分工，按件计工，实行个人负责制。类似这样的一些制度与作法，也是每一个生产企业所必不可少的。拿纺纱厂来说吧，厂总部是统一经营、统一领导的机构。厂之下分为若干车间，如粗纱间、细纱间等，成为管理纺纱生产的基本组织单位。车间又要明确分工，把若干台纺纱机交给某一个工人去负责，把另几台纺纱机交给另一个工人去负责，然后照各个人所纺出来的纱按件计工，车间派人按厂方所定规格加以验收。一个工厂如此，一个集体经营的农业合作社也应该如此。如果一个合作社只有统一经营机构，而没有分级管理的生产队，或者有了生产队，而社不给予管理责任和一定权限，生产队样样事情都得请示社长，生产队等于虚设，这样农业生产就要发生混乱状态，而农业生产也就没有希望可以管理得好。过去

一年来有些合作社正是陷于这种混乱状态。社规模太大，生产队有的也太大，社管委会与生产队没有明确分工，没有建立责任制，包工包产制没有搞好，结果生产队无权处理生产中所发生的问题，事事请示社长，而社干部又忙于事务或者是官僚主义。因此，社与生产队之间的矛盾就产生了，而且发展了。生产队长和队员积极性不高，生产也搞得不好，这与管理制度没有建立好有很大关系。去冬今春以来，各地创造了“三包制度”、“两个指标”、“产包到队，工包到组，田间管理包到户”、“组包片，户包块，大活集体干，小活分开干”等制度。这一套完整的生产管理制度正是合作社“统一经营、分级管理、明确分工、个人负责”制的新创造。现在各地凡是这样做的社就出现了新气象，社员积极性大大发挥了，合理化建议大大增加了，不仅农副业生产上了轨道，而且创造了更适合于当地的技术措施。这就说明建立健全的适合于集体企业的生产管理制度，把生产队搞好，是农业合作社搞好生产的重要环节，也是解决社与队矛盾的基本出路。当然，在强调提出分级管理的同时，并不是说管理委员会本身的领导责任可以减轻了，对各个队的工作可以放任自流了。恰恰相反，管理委员会的集中领导的原则，决不能破坏。分级管理，正意味着一方面充分发挥了队的能动性、积极性，另一方面在减少了许多不必要的工作后，可以使管委会更加集中注意力去进行更重要的工作，并能够下去检查和发现问题。为了使各地同志更明了这一套管理制度，我想把各地方新创造的各种经验介绍如下：

关于“三包制度”，就是“包工、包产、包财务”（有些蔬菜合作社则是“包工分、包产值、包成本”）。合作社组成之后都要将社员按居住情况编成若干生产队（一般以二十户左右为适宜），将该队所有劳动力及所划的一定土地、耕畜、农具等归生产队负

责。这样划定之后，生产队按照社管委会所规定的全年生产计划负责耕种，有的社生产队还负责管理一定的副业生产。但是社与队之间在生产上彼此关系如何划分呢？在工分上是做多少算多少，还是包工制？在产量上是收多少交多少，还是包产制？在种子、肥料、农药农械、农具修理等费用上是实报实销，用多少报多少，还是包开支包财务呢？这些问题如果解决得不好，社与队之间就会天天吵闹不休，就会影响生产又影响团结。去年有些社队之间的矛盾就是由于这个问题没有处理好，现在各地实行的“三包制”就解决了这个问题。生产队把全年经营农业生产的工分、产量、开支、成本都向社包下来，工分多做了社不补，少做了也不扣；产量增加了超产提成，减少了扣工分（因灾减产例外）；开支多用了社不补，少用了有节余也不上缴。这种包干制就使得社与队之间的关系固定下来，社有社的权限，队也有一定机动权限，社作社的打算，队作队的打算。这既可以减少社干部的麻烦，又可以大大鼓励队干部与队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种制度已在许多地区推广，但仍有某些地方干部不赞成这种办法，而仍然仿照工厂的定额管理制度。这是由于某些干部没有充分认识农业生产的分散性、地区性、季节性太大的特点，没有认识农业生产与集中生产而又不受自然条件限制的工业生产完全不同。工厂可以采取定额管理制，而农业生产就需要采取三包制，这种观点必须向所有干部讲清楚。

关于“两个指标”，就是“计划指标”要略高于常年实际产量，以便推动生产发展，但“包产指标”则要略低于实际产量，以便有产可超，有成可提，以鼓励所有社员的积极性。去年有些地方只提一个指标，包产指标就是计划指标，而又高于实际产量，这样社员看到指标过高，无产可超，无成可提，大家积极性就不高

了。而社员积极性不高，生产就一定搞不好，所以一个指标的办法是不好的，应该改变。但有些地方干部对这个问题还没有想通，仍保持一个指标。有些地方又把计划指标也定低了，甚至低于实产量，这也是不对的，因为这样对队的生产就缺乏督促推进作用。那么包产指标究竟比实际产量应该低多少？超产提成以提多少为适宜呢？有些地方包产量是低于实产量百分之十至十五，有些地方则低百分之二十，我认为以低于百分之十至十五为宜。超产提成，河南是“二八分”，即二成归社，八成归队；江苏是“三七分”，即三成归社，七成归队；安徽有些地方则全部归队，全奖全赔。我认为，“二八分”较为适宜。除超产提成外，还要实行减产扣分的办法。在这方面，有些干部认为包产量低于实产量，而又提奖过多，会妨碍社的公共积累，实际上这种顾虑是不必要的。因为合作社与工厂不同，工厂是货币工资制，工资是固定的，如果定额过低，超产提成，就要影响厂方积累。我们合作社则是产品分配制，社员在队里分得多了，在社里所分就要相对地减少，因此社还是可以照章提取公积金，并抽调劳动力来进行基本建设。

关于“工包到组，田间管理包到户”，“组包片，户包块”（南方水田应该是“户包坵”），“大活集体干，小活分开干”，这些办法又是由队到组到个人实行明确分工，个人负责制的具体创造。生产队实行“三包制”，把本队的全年产量、工分、财务开支都包下来了，如果由生产队长个人包办，而不在队里面实行明确分工，也是搞不好的。现在各地一般都是将一定地片在一个季节的农活包给生产小组去干，并给予一定工分，这就叫做“工包到组”，“组包工”，也叫“组包片”。这些地片的农活包到组以后，也要按农活性质分别进行。比如北方旱地的犁耙、播种、灭虫、收割、打场，南方水田的犁耙、插秧、收割等，这些比较粗重的大活，应

该由小组集体来干,这就叫做“大活集体干”。另外一些零星小活,如北方旱地的锄草、追肥,南方水田的耘田锄草、上粪、看水、看管鸡鸭下田,棉花地里的间苗打杈等,这些小活就不一定要集体干,而可以把所有地块分别包到户,由各户中的老人、小孩、半劳力分开去干,由组给以一定工分,这就叫做“按田定额,包工到户”,叫做“户包块”,“户包坵”,也叫做“小活分开干”。由于实行“户包块”,有些地方就把这些地做为包块户的责任地,他不仅包了地上的小活和一些田间管理工作,而且负责对这些土地上生产工作的检查责任。在大农活做完验收的时候,要包块户协同小组长去验收,如果发现有些农活没有做或者做得粗糙的,包块户自然会向干活的人提意见,不合规格者要他返工重做。有些活也可以由包块户去补做,如田角上犁耙不到的地要用锄头去挖掘。这种“户包块”的制度如果普遍推行,而又做得好了,那么每块地都有专人负责看管和验收,这样争工分、耕作粗糙、马虎,甚至随便抛荒土地的现象就可以克服。“敲钟集合、等齐下地”,机械地仿照工厂机关的“上下班制度”就可以改变,“干活一窝蜂”的窝工浪费现象也就可以逐步消灭。同时,实行“户包块”、“小活分开干”的结果,那些劳力少子女多的户又可以在自己所包的地块上充分使用辅助劳力,并在早晚间多用全劳力,半劳力,而从所包地块上多挣得一些工分,以增加自己的收入。

第三,合作社内部矛盾还表现在队与队、村与村之间。一般社都按自然村编队,而自然村与自然村之间往往贫富不同,有些村土地多、土地好、产量高,或有林木果树收入,成为富村;有些村则土地少、产量低,又没有或者只有较少的林木果树,就成为穷村。建社时按村编队,就形成了富队和穷队。显然富村富队社员年终收入较多,而穷村穷队社员则收入较少。如果在分配时

不适当照顾这些情况，而把各队收入完全由社统一平均分配，就势必使穷村穷队的社员增加了收入，他们当然欢喜，但富村富队的社员就要减少收入，他们便会不高兴。这样队与队之间就要发生矛盾，闹分社退社，这是很自然的。我们怎样来处理这些矛盾呢？我想首先要弄清楚富村富队与穷村穷队是如何产生的，照一般富村富队的情况来说，它们之所以致富，一般不是由于剥削，而是由于多年勤劳，加上自然条件较好的结果。穷村穷队之所以穷，主要是由于自然条件较差，加上历史上受地主剥削，不能进行农田基本建设所致。如果这种情况分析不错，那么我们处理这些矛盾就应该采取“双方兼顾”的原则。在分配上，对富村富队的社员要保持较多的收入，在进行统一分配时，要照顾到富村富队的社员比过去不致减少收入，或少减一些不致吃大亏；对穷村穷队应该在平时生产上加以帮助，使之改善农田和水利设备，并逐年种植一些林木果树，以便能在一定时期内，生产赶上富村富队，在分配时对穷村穷队社员中的困难户也应该由社的公益金酌量加以照顾。这样做就可以达到“双方兼顾”，缓和队与队之间的矛盾。现在各地方实行的“三包制度”、“两个指标”，也是调节穷富队、穷富村之间矛盾的有效办法之一。总之，这个矛盾的解决，不能采用压富济贫，把富村富队社员的收入一下子拉下来，向穷村穷队看齐的办法，而应该采取照顾富村富队社员能大体维持现有收入，而在生产上帮助穷村穷队社员，使他们在若干年后迎头赶上，向富村富队看齐的办法。

第四，合作社内部矛盾还表现在社员与社员之间。有人说，在合作社实现高级化之后，社员原来所有的土地、牲口、农具及其他生产资料都入了社，作为全社集体所有，社的分配原则又是按劳取酬，任何社员都不可能再对别的社员进行剥削。这样社员与

社员之间还有什么矛盾呢？这种说法只看到问题的一面，而没有看到问题的另一面。首先就是我们的合作社大多数还只有一年多的历史，在这一年中有许多问题还来不及处理，而且有些问题又处理得不很好，比较突出的是对上中农和一般中农入社的生产资料还没有完全处理好，或者处理得不够好。一般上中农在入社以前所占有的土地、牲口、农具、副业工具及设备，比之贫农下中农要多一些好一些。此外，他们还有比较多的林木、果树、鱼塘、桑园等。当他们入社时，有些社对他们的牲口、农具、大车、副业工具及设备、林木、果树等作价偏低、价款不能按期归还，又不付利息，这样就引起他们很大的不满。从贫农与下中农来说，一般他们入社的生产资料很少，甚至没有，中农这些多余的入社生产资料（即股份基金^①以外的多余部分），实际上是由贫农来负担收买，因此在作价上，归还期限上，与中农往往立于相反的方面，而且有些社和社员在偿还这些价款上，暂时确有困难。这样，贫中农之间就形成一种矛盾。此外，还有劳力强与劳力弱、子女多与子女少、技术高与技术低、农业劳动与非农业劳动社员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并不是因为谁剥削了谁，而是因为合作社在劳动安排上不够全面，工分定额上不够合理，分配上缺乏分别照顾所致。去年有不少社在年终分配后一方面出现了不少增收户，但另一方面又出现了一部分减收户、超支户。这些减收户、超支户中不仅有上中农，也有不少贫农、下中农；在增收户中不仅有贫农下中农，也有少数上中农。从此可见，在实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由于原来生产关系的改变，每个社员的生活来源起了变化，在社员中必然要引起许多新问题、新矛盾，这需要我们在工作上加以深刻注意。如何来解决这些矛盾，这就需要从下列四个方面采取正确方针和灵活办法来加以解决。

首先，要在合作社的劳动分工上，贯彻统筹兼顾，逐户安排，用其所长，各得其所的方针。上述这些人都已入社了，除了极少数还要求退社者外，一般人并不要求退社，而是要求社在劳动分工上给以适当安排，使他们能得到一定工分，增加收入，或者不致减少收入。这种要求是合理的，我们应该予以解决，也是能够解决的。根据各省解决办法，有如下几种：

（一）对劳力少、子女多因而减少收入的困难户，应从“户包块”，多留自留地，或另把一定地块给他们包工包产，并在包产上给以照顾，使他们能把家中辅助劳力都用上，并使全劳力、半劳力能在早晚时间在自己地上格外多做些活，以增加他们的收入。

（二）对生产技术比较高，如赶大车、种果园、养鱼、养蚕桑等因工分不合理而减少收入的社员，应适当提高技术工分，并用其特长，将赶大车、犁地、耙地、喂养牲口等包给他们做，或将果园、鱼塘、桑园等包给他们，在包产上加以适当照顾，以增加其收入。

（三）有些非农业劳动者，如泥水匠、木匠、铁匠、裁缝、理发、渔民、肩挑小贩等，因为对农业劳动不熟练，挣工分不多，因而减少收入的社员，应尽可能恢复他们的本行业务，把他们组成手工业队或生产小组，把他们从农业生产中划出来单独经营。这些行业的工分定额也要另行制订，不要与农业工分混在一起。有些行业利润不大者，也可以考虑允许他们独自经营，自负盈亏。有些在城市做临时工的，可以允许他们将所得工资归自己收入，社只抽取其一定成数作为公积金。

总之，要在劳动分工上统筹兼顾，逐户安排，用其所长，各得其所，使所有社员都有工作，都有收入，尽可能做到不致减少收入以至增加收入，使这些人生活过得去。

其次，要在分配上做到公平合理。一方面要贯彻执行按劳取酬、多劳多得的原则，另一方面在执行按劳取酬原则的基础上，进行互助互济，分别照顾。在分配中公益金必须照章留足。必要时还可以从社的纯收入中另外抽出一部分，作为照顾五保户、困难户之用，对那些劳力少、子女多或者有疾病、死了人的困难户，除了从劳动分工上加以照顾后还不能解决问题的，亦可以从这部分款项中加以适当补助。

再次，要在处理入社遗留问题上根据互利政策，通过民主协商，做到双方满意，以达到贫中农团结的目的。由于大部分社是在去年高潮中组织起来并转到高级社的，时间这样短，任务这样重，许多遗留问题没有解决或者解决得不好，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应该认识这些遗留问题如不很好解决，是难以达到贫农、中农团结的。有些干部以为高级化已经完成，这些问题已经过去，可以不了了之。另有一些干部则以为贫农、下中农优势已经确立，上中农问题不大，今后可以不要团结上中农了。这两种认识都是错误的，要知道“依靠贫农、下中农去联合上中农”，这个方针在合作社没有完全巩固以前，仍是党在农村中的阶级路线。这个路线并没有改变，也不能改变。但要达到联合上中农，就必须继续贯彻执行互利政策。因此，对上中农及一般中农入社的生产资料遗留问题尚未解决或者解决得不适当的，必须做一次正确处理，决不能不了了之。根据各省经验，应该采取如下办法来处理这个问题：

（一）对所有社员入社的耕畜、农具、大车作价，如按当时价格确实偏低的，应适当提高；所作价款应按期归还；无力归还者，应补付利息；长期不可能归还者，应采取“保本付息”的办法，以安定人心。

（二）对林木、果树的入社，必须坚持零星果木不入社的原则，

已入社者应予退还。成片林木、果树入社，因作价很难准确，价款无法归还，而林木果树又与土地不同，易遭破坏，因此在十年之内，一般不要作价，以采取比例分红制为好。已作价入社的林木果树，如原主有意见的，亦可以改为比例分红办法。

（三）除上面所述办法加以照顾后，个别上中农或其他社员在经济上仍不上算，要求退社单干者，应允许其退社。这些人如果勉强留在社内，即使今年不闹，明年可能还要闹，这对社来说是一种麻烦。因此，个别允许退社不仅符合党的政策，而且对社来说，并无什么坏处。

在解决社员入社的各种经济遗留问题，和对上中农在经济上进行必要安排的同时，还必须对上中农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对他们中间在社内表现很好的，应该加以鼓励和表扬，对一些表现不好的，必须进行适当的批评教育工作，批判其资本主义思想。同时，在解决他们的各项经济问题时，也必须在不违反社集体利益和不损害贫农社员利益的前提下来进行，否则互利政策也不能真正体现。

最后，要在生产上做好经营管理工作，以调动所有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要贯彻优先发展粮食生产，同时开展农林渔牧相结合的多种经营，充分利用我国肥沃的土地资源与优越的自然条件，争取合作社的农副业生产在三、五年内赶上并超过当地上中农的生产水平。这是保证大多数社员增加收入，巩固社内团结的最基本因素。

上述四方面工作如能做好，问题得到正确解决，则社员与社员之间的矛盾便可以缓和下来。

第五，是社干部与社员群众的矛盾，这是合作社内部矛盾的集中表现，上面所述的社与社员矛盾、社与队矛盾、队与队矛盾、

社员与社员矛盾，甚至国家与合作社的矛盾，都与社干部有关，所以最后集中表现到社干部与社员群众之间的矛盾上来。因此着重研究这个矛盾，寻求解决矛盾的办法，就成为解决合作社内部矛盾和巩固合作社的最基本环节。

我们合作社干部，绝大多数本质上是很好的，他们任劳任怨，诚心诚意为农民办事。几年来，他们也确实做了很多好事，有了很大成绩，这是谁也不能抹杀的。但是也有不少干部缺乏民主作风，遇事不同群众商量，不向老农请教；许多有关社员切身利益的问题，不经全体社员或社员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往往由少数干部自作主张，要社员执行。有些重大问题，也只是形式上交大会通过，实际上还是少数干部决定的。有些社干部还有严重的强迫命令行为，对有意见的社员乱戴帽子，甚至乱扣工分。个别干部不能吃苦在先享受在后，补贴工分过多，不关心社员群众疾苦，不能大公无私地处理问题，帐目不公开，甚至还有违法乱纪、胡作非为、贪污舞弊等事情发生。这就造成不少社员群众对干部的不满情绪。这种不满情绪，有些社还是相当普遍的、严重的，有时为坏分子所利用，便形成闹社等混乱情况。这个矛盾，如不能很好解决，合作社就难以巩固。

解决这个矛盾，就要在干部中进行整风，把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整掉。要大胆地支持群众大鸣大放，让他们把心里的话说出来。在支持他们的前提下，引导他们全面地看问题，不只看到干部缺点一面，也要看到干部的优点一面，体谅干部的困难。既分清是非，又团结同志，既保护干部热情，又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对社干部所犯错误的性质，必须具体分析，适当处理。有许多错误是因为经验不足而产生的，只要说明情况，群众是会原谅的。有许多错误，是由于上级的主观主义而形成的，上级机关

要负起责任来，并切实改正，不要片面地去责备下层干部。有些则是自己胡作非为、违法乱纪，对这类干部就要严肃处理，给予应得的处分。

今年三月，党中央发出了民主办社的通知^{〔2〕}。这个通知是从积极方面解决干群矛盾的及时良药。民主办社就是要靠全体社员群众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来共同把社办好，不是只依靠少数干部来办社。群众的智慧是无穷无尽的，我们要善于听取社员群众的意见，把各个方面各个阶层的意见收集起来，加以分析、对比、去取，总结成为比较全面的意见。然后通过社员代表大会变成群众的意见，再通过干部领导群众贯彻下去。社和队决定问题都要同群众商量，例如，关于生产计划、技术措施和耕作制度的改变，良种的推广，社的基本建设，经营管理等等问题，都应该由干部与群众共同讨论。实行生产民主化，分配民主化，财务民主化，建立三大民主制度。社干部要争取大部分时间下田劳动，这不仅便于干部深入联系群众，及时了解问题、解决问题、克服官僚主义、搞好生产，同时干部参加生产，挣得工分，也可以减少工分补贴，减少群众负担，增加社员收入，改善干群关系。

解决干部与群众矛盾，除了培养社干部的民主精神与民主作风以外，还要有一套民主制度，即开好社员代表大会，聘请有经验的老农老圃当顾问，定期召开老农座谈会、专业座谈会，实行社队分权等制度。

要按照社章规定，召开社员代表大会以代行社员大会的职权，而成为合作社的最高权力机关。社员大会往往因为人数太多，不便深入研究与解决问题。因此，定期开好合作社的社员代表大会，就成为合作社最基本的民主制度。一切重要问题都要提交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代表人数不宜过多，一般以二十至四五十人为宜。代

表成员要有广泛的代表性，要有贫农与下中农，又要有上中农；要有男社员，也要有女社员；要有青壮年，又要有老年人；要有农业劳动者，也要有非农业劳动者。关于代表的选举，候选人可以先在各生产队社员中进行充分酝酿，由一定数量的社员联名提出；支部提名，可以通过党员以社员的资格在群众中活动，并按规定的程序提出。代表及社干选举时，采用无记名秘密投票或投放黄豆、黑豆等办法。代表大会开会的时间不宜太长，讨论问题不宜太多，开会时要让代表们充分发表意见，讲一次几次都可以，赞成的意见、反对的意见都可以说。对不正确的意见，干部要善于诱导、教育，不要正面顶回去。

关于社的规模大小问题，去年九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指示中已明确规定：“山区一百户左右、丘陵地区二百户左右、平原地区三百户左右”，现在看来，这种规定是符合于农业生产分散性特点和目前我们农业生产的技术水平、管理水平的，是完全正确的、合理的。一年来，许多省县都将过大的社改变为小社，或改变为由各村自负盈亏的联村社；生产队也相应划小到每队二十户左右。由于社划小了，社的领导层次也由过去的三级（社、大队、小队）四级（社、大队、中队、小队）改为两级制（即社管委会与生产队两级）。凡是这样做的，社员积极性就大大提高，社干部的事务主义、官僚主义就大大减少，社管委会脱产干部也大为减少，这对搞好农副业生产和对社内团结都大有好处。许多穷村富村都分了社，或成为自负盈亏的队。这样，队与队之间的矛盾也消除或者缓和下来了。一年来经验证明，把社和队的规模划小，把领导层次改为两级制，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但一直到今天，还有某些地区干部对这个问题思想不通，他们仍然主张大社、大队，主张多级制，而不愿将大社分开。他们仍然盲目地认

为大社好办，大社有优越性；害怕大社分了，社会主义旗帜就倒了。这种想法和作法显然是不对的。实际上合作社之所以成为社会主义制度，与社之大小并无关系，而在于基本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生产上的统一经营分级管理和分配上的按劳取酬原则。至于社的规模大小，则完全要根据当地的地理情况、交通情况、经营品种情况、生产技术和干部的管理水平来决定。一句话，也就是要根据有利生产、有利团结的原则来决定。一年来全国经验证明：社过大是不适合于农业生产分散性这个特点，也与我们目前农业生产的技术水平和干部的管理水平不相称的，从而对生产管理、对社内团结都是不利的。社太大，则生产队也跟着大，有些生产队多到七八十户上百户，劳动力多到一百多人二百人。像这样大的生产队，当队长的就很难当好，生产也很难管理得好。也有的地方大社未变，而只是将生产队划小，结果一个社下往往编成五六十个队。这样社管委会也难于领导，而不得不在中间加设一级大队，结果增加了领导层次，这对生产管理很不方便，对社内团结很不利。要知道我们的农业合作社是在没有机械化的条件下进行的，生产资料公有化了，但经营生产的方法仍然是“畜力耕耘、人工灌溉、自然肥料”。我们的办社干部绝大部分是贫中农，他们的管理水平、文化水平一般很低，工作经验还不多，即使有些知识分子当了社干部，但又往往不懂农业生产，也无管理经验。加上我们农业生产的分散性，许多地方农民住地分散、地形不同，而且往往有经营品种不同、富村穷村不同等复杂和困难情况。因此，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的社只能按照中央所规定的规模定下来，社太大的应该从早分开，队太大的也应该从早划小，使之适合于客观情况，有利生产，有利团结。社队规模划定之后，十年不变。即使将来有些地区实现了机械化，大社是否办，也要看

那时的具体情况来定，不需要现在就“未雨绸缪”，做那种不必要的准备。即以苏联的集体农庄的规模来说，全国近九万个，共有庄员一千八百多万户，每个农庄平均也不过二百户多一点，每个生产队也不过二十户左右，五六十个劳动力。苏联的农业生产已经可说是全盘机械化了，它的规模尚且如此，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就更值得注意了。

上述五点，便是合作社内部矛盾所在，要解决这些矛盾，主要是要贯彻执行中央所指示的民主办社方针。上面所提解决这些矛盾的各种办法，实际上是贯彻民主办社方针的具体化，只要干部真正走群众路线，真有“为社员服务”、“以平等待人”的民主精神，有“遇事与群众商量”、“向老农请教”的民主作风，而又真正建立起“社员代表大会”、“老农座谈会”、“财务按期公开”、无记名投票选举等民主制度，并“调整社队规模”，在经营管理上又实行“统一经营、分级管理、明确分工、个人负责”制，这样合作社内部矛盾就一定可以逐步缓和下来，以至于最后得到解决。

注 释

- 〔1〕股份基金是农业生产合作社为了准备种子、肥料、草料等生产开支，为了收买社员的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而向社员征集的股份基金。用作生产开支的，叫做生产费股份基金；用来收买社员的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的，叫做公有化股份基金。股份基金一般由社员按照入社的土地分摊，或者由社员按照土地和劳动力各占一定比例分摊。贫苦的社员确实不能交清股份基金的，可以向银行申请（自己申请或者由合作社代为申请）贫农合作基金来交清。
- 〔2〕指《中共中央关于民主办社几个事项的通知》（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五日）。

关于发展农业生产的几个问题*

(一九五七年九月二日)

现在我就如何发展农业生产方面,讲以下十个问题。

一 第二个五年计划发展农业的方向问题

从经济特点(不是指社会制度)上来说,世界上一些主要国家基本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苏联、美国、加拿大。这些国家的特点是地多人少,工业化的程度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也高,发展工农业生产需要实行全盘机械化。第二种是德国和日本。这些国家的特点是人多地少,工业化的程度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较低,发展工农业生产不强调全盘机械化。如日本的中、小型工业多分布在乡村,好处是就地取材,利用便宜的劳动力,克服动力资源不足的困难,并避免城市人口过分集中。第三种是中国和印度。特点是:(一)地少人多。我国总面积虽近一千万平方公里,但耕地面积仅占百分之十七,全国平均每人不到三亩地。同时,人口分布很不平衡,内蒙、青海、新疆、西藏、西康、云南等地区占全

* 这是邓子恢在全国第四次农村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会议于一九五七年九月二日至十五日在北京举行。

国总面积一半以上，但人口不到四千万；内地各省占全国总面积一半还少，人口五亿九千万。地少人穷，粮食产量比不上日本。

（二）工业落后，农业为主。（三）人民生活水平低。根据以上特点，我国发展工、农业生产，必须充分利用人口多，劳动力便宜这些优点，克服土地少，工业落后，动力资源缺乏的弱点，多兴办投资少、收效快的中、小型工业，不能强调实行全盘机械化。我们应该仿效日本工业下乡的做法，实行半机械化，使人的劳动力和机器动力都能充分发挥作用。

二 人口问题

我国人口的发展是个重大问题。按目前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二点五的速度发展下去，到第十个五年计划，我国的人口将增加到近二十亿。今天我们不能再盲目地提倡多生育，要提倡“节育”。中央计划建立一个专门机构，加强对节育工作的领导。农村工作干部要向农民宣传节育，指导农民逐步走向有计划的生育。这也是农民的迫切要求。

三 劳动就业的问题

劳动就业有两条道路：一条是低薪制，使就业的面宽一些；另一条是高薪制，就业的面就要窄一些。应该肯定走前一条路。现在全国有九千多万城市人口。按百分之二点五的增长率计算，每年增加人口二百多万。第二个五年计划，工厂、企业、机关基本上不可能招收新职工，城市本身增加的人口还安排不完。高薪制刺激农村人口向城市倒流，这条路不能走。今后国家对现行工资拟在一定时期

内基本冻结起来，个别调整；新招工人实行学徒制，以便逐步过渡到低薪制。国营农场职工每月的平均工资为四十二元，普通农牧工为三十六元这显然太高了，对农民刺激很大。将来农场归地方领导后，不要提倡高薪制，避免影响农场和群众的关系。

四 关于工农业生产发展相适应的问题

以往五年的经验证明：（一）农业发展是工业发展的基础。如果农民购买力没有适当的提高，农业不能充分供应轻工业生产所需的原料，我们不能从农村方面积累必要的资金，工业就很难发展。为了要实现以重工业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积极发展农业。（二）农业的投资必须和农业的发展相适应，否则就要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国家对农业的投资已由过去的百分之五点九，增加为百分之七点九，今后还要继续增加^①，支持农业生产的发展。

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很密切。轻工业的原料百分之七十来自农业，产品的百分之九十销路在农村。重工业的原料靠矿产，但是，产品是轻工业的装备，轻工业不发展，势必造成重工业产品的积压。同时，重工业的一部分产品如化肥、抽水机、水车等又直接用于农业生产。农业不发展，农业社买不起，也会影响重工业的发展。所以，必须经常保持工农业生产的互相适应。

五 农业生产发展的方向

方向有三：（一）主要的基本的方向是提高现有土地的单位面积产量。争取在今后十年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规定的粮

棉增产指标；（二）发展山区生产；（三）适当地开垦荒地，要量力而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全国国营农场和农业生产合作社共开荒地六千万亩，但同期全国征用土地二千五百万亩到三千万亩开荒成本大，收效慢。目前不能做为主要方向。此外，还应该因地制宜发展淡水养鱼业和化学纤维工业，以满足人民对农业生产日益增长的需要。

六 如何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第一是开发水利。晋、冀、鲁、豫、苏、皖等省，人口多（一亿七千万），土地少，产量低，粮食问题很紧张，应该成为目前水利的重点。水利工作要防洪、排涝、灌溉、水土保持相结合。发展水利要注意上下游兼顾，左右岸兼顾。要多办投资少、收效大、收效快的中小型水利。第二个五年计划打算扩大水利灌溉面积二点五亿亩，其中百分之九十是中小型水利。各省的水利规划应迅速报中央，方案可多提出几个，以便比较研究。

第二是肥料。化学肥料争取一九六二年生产五百万吨到七百万吨，一九六七年生产一千五百万吨。光靠化肥，是十分不够用的，而且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到手，目前十年或更多的时期内，还必须依靠大力发展自然肥料。

第三是逐步改进技术措施。农业部门主要要办好推广良种，农药，防治畜疫等几件事。推广良种要注意就地培育，就地推广。引进外来品种一定要经过当地试验。农药“六六六”、“一六〇五”，效果很大，应充分供应。防治畜疫，第一个五年计划消灭了牛瘟，第二个五年计划消灭猪瘟，并要大力发展畜牧业。

改进农业技术必须坚持群众路线，因地制宜、就地试验、就

地推广。改进耕作技术和改革耕作制度，不能割断历史。要避免从上而下主观制定千篇一律的技术改进计划。技术改进工作要通过典型示范和交流经验的办法，吸引农民自愿接受新技术。技术站要尊重老农的经验，尽量避免主观主义的错误。

七 山区生产问题

过去有人说，我国是“三山六水一分田”。现在看来实际上是“八山一水一分田”。但山区山多、树少、水缺，灾害多，产量低必须改变这种情况。改变的主要办法是搞好水土保持，植树造林，增加水源。山区生产的潜力很大，有条件发展多种经营，农、林、牧、副业综合发展，远景会超过平原区。

现在山区生产有个不大好的现象，就是人口向平原倒流，荒地略有增加。这对建设山区很不利。改变这种情况需要采取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如适当调整山区负担，普遍建立土特产采购网，合理调整土特产价格，修筑道路，发展交通等，都应该有个全面的长期的安排。

八 关于整社问题

有同志要求总结一下合作化的优越性，研究一下合作化运动是不是快了。去年全国遭受了严重灾情，但绝大多数合作社都增了产。怎么能说合作化快了呢？根据六十八万个社的统计（包括灾区）：增产社占百分之七十点二，平产社占百分之七点四，减产社占百分之二十二点四；社员户增收的占百分之六十四；平收的占百分之八点一，减收的占百分之二十七点九。另据十六个非灾

区省、市的统计：增产社占百分之七十九点一，平产社占百分之七点四，减产社占百分之十三点五；社员户增收的占百分之七十五，平收的占百分之八点九，减收的占百分之十六点一。这些数字充分说明了合作化的无比优越性。但合作化中也有缺点，如社的规模过大，互利政策贯彻得不够好等。这些缺点我们能克服，有的地方已经克服。我们决不可由于个别缺点和错误的存在，就得出合作化太快的结论。

整社问题很重要。毛主席指示今年整社是一个重大关键。今冬明春整社工作的主要内容有五项：

（一）整思想。主要是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从思想上、政治上开展两条道路的斗争。通过大鸣大放辩论，分清大是大非，提高农民的社会主义的觉悟。从思想上巩固社会主义制度。

（二）整作风。主要是整顿干部作风，在合作社内部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实行民主办社。

（三）整政策。中心是正确执行互利政策，贯彻阶级路线。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仍然是“依靠贫农，巩固地团结中农”。过去依靠贫农取得了土地改革和合作化的胜利，现在也必须依靠贫农来巩固合作社。

现在全国五百万知识分子。我们必须争取这五百万知识分子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才能建成社会主义，但他们中大多数是地富、资本家的子弟，必须经过改造，才能真正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今后的高等教育拟实行劳动教育制度，高中毕业生必须参加三年生产劳动才有资格投考大学。

目前反对合作社的主要阶层是一部分富裕中农。地主、富农多在背后策划和指挥。富裕中农对合作社的态度也有所不同，工作中要注意分别对待。据调查，富裕中农一般占农村总农户的百

分之二十左右。他们入社后，增收、平收和减收的约各占三分之一。他们对合作社的态度也是拥护、动摇、反对的各占三分之一。富裕中农反对合作社的导火线，有的是粮食问题，有的是减收问题，有的是生产资料入社遗留问题，有的是干部作风问题。但归根结底是个经济利益问题。要团结富裕中农首先必须巩固贫农、下中农在合作社内部的优势，加强对中农的思想领导，同时还必须正确贯彻执行互利政策。富裕中农有两重性，本质上他们是倾向资本主义的。但我们做好工作可以使他们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要他们走向社会主义，一方面要在思想上、政治上批判他们的资本主义倾向；另一方面要在经济上不损害他们的正当利益，使他们感到入社后正当收入不会减少，愿意和贫农、下中农一起巩固合作社。

（四）整组织。主要是实事求是地调整合作社和生产队的组织规模，使之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团结。

九 改善生产管理

农业社优越性的集中表现是增加生产。增加生产的关键之一在于做好生产管理工作，充分发挥社员的劳动积极性，提高劳动效能，有效地扩大再生产。

做好生产管理工作，必须研究农业生产的特点。主要特点有四个：（一）田间生产的分散性；（二）野外操作、受自然条件的限制，从而产生地区性大，季节性强；（三）手工操作；（四）地少人多，劳动力便宜，农民有丰富的生产经验和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

由于以上特点，生产管理工作必须掌握三个原则：（一）因地

制宜，因时制宜；（二）要研究当地农业生产发展历史，不要割断历史；（三）依靠农民积极性、创造性，科学技术要提倡但不要不看时间、条件、地点，生硬地搬运别人经验，造成欲速则不达的毛病

合作社和生产队的规模不能过大。过大了就不适合农业生产的分散性的特点，容易造成劳动力的窝工浪费，影响扩大再生产。

发挥社员的劳动积极性，首先必须要加强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同时又必须通过一定的经济制度，把合作社的集体利益和社员的个人利益正确地统一结合起来。结合的最好形式之一是“三包”制度。有的地方推行了“产包到队，工包到组，田间管理包到户”、“大活集体干，小活分开干”的分工协作制度。还通过包工对各类社员做到了统筹兼顾，逐户安排，用其所长，各得其所，群众反映很好。应该总结这一方面的经验，以改进劳动管理工作。

十 关于区乡体制问题

合作化在农村引起了很大的变化。合作化使五亿农民、一亿以上的单干农户组织成了七十八万个农业合作社。农村生产关系的根本变化，使得过去的小乡制已经不适合于合作化以后的新形势，因而必须改变区乡的体制，使其适合今后工作的需要。中央改变区乡体制的初步意见，是实行县、乡（等于小区）两级制，乡之下直接领导社。以大乡（小区）代替现在的小乡。大乡（小区）的编制相当过去的区，干部相当于原来的区级干部。今后乡（小区）的区划应按各地方的经济联系和参照历史情况来确定，人口和距离只能作为划乡的条件之一。区乡体制确定后，应该相当长期地不再变动，以免影响合作社的长期规划。

注 释

- 〔1〕指第二个五年计划农业投资为百分之十二点五，第三个五年计划为百分之十八。

重视山区建设，发展山区生产*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九日）

这次会议开得很好，收获很大。大家交流了经验，统一了认识，明确了方针，订出了初步规划，规定了初步措施。现根据大家的发言和党中央、朱副主席⁽¹⁾的指示，着重讲如下五个问题。

一 山区生产所处的重要地位

总的来说，我国山区生产是：地区辽阔；资源丰富；潜力无穷；前途无限；对全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关系非常重大。我国的山区面积很大，在大陆国土的总面积中约有百分之八十左右是山区和半山区。除西藏、新疆、青海、内蒙等少数民族地区外，据二十一个省统计，山区和半山区县有一千二百三十七个，占这些省总县数的百分之六十五。山区的土地面积占二十一个省区总面积的百分之六十二点四；耕地五亿六千万亩，占我国总耕地的百分之三十五，粮食也占全国粮食总产量三分之一左右。在这些广大的山区里，还有极丰富、宝贵的资源，其中有森林十亿二千二百万亩（包括新造林），占总面积的百分之十四点二。木材蓄积量

* 这是邓子恢在山区生产座谈会上的总结报告。

四十四亿二千五百多万立方米，加上内蒙则将近五十亿立方米。桐油现在年产十四万吨，已接近战前水平，而油茶仅只恢复一千六百万亩，不到战前的一半，其余的一半急需垦复，还应有计划地大力发展（很可能达到八千万亩或一亿亩）。乌桕二百万亩，产油四万五千吨。茶叶二百四十万担，还未恢复到战前产量。至于鲜果干果树种和其他特种经济林木，种类既繁多，数量也很大。竹林约有二千万亩，年产五百万吨，应加强管理，合理采伐，积极垦复和发展。此外，尚待开发利用的荒地和矿藏，则更是国家的巨大财富。

山区建设对平原生产的关系极为密切。山区生产搞不好，就有可能造成森林资源破坏和水土流失的严重现象，不仅影响山区本身的生产，还会影响各河流域平原地区的农业生产。这样对农业的发展和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实现，就会增加困难。农业是发展工业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基本条件，农业的发展如果跟不上，社会主义工业就要受到影响。从此可见，山区生产如果不全面发展，会影响到整个农业、工业、手工业出口、商业、交通、运输各方面，对于六亿人民的衣、食、住、行是不利的。因此，向山区进军，充分开发利用山区的各种资源，全面发展山区生产，不仅是我国发展农业的一个重要方面，并且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中，亦占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所以全国都要支援山区，山区也就能更有力地支援全国。各个部门不应孤立地而应全面地来看山区生产。

山区有许多地方是革命老根据地，对于我国革命事业有过巨大的贡献。全面地发展山区生产不仅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同时也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几年来山区生产的发展，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一般还较缓慢。一般干部对山区生产重要意义还认识不

足，不少山区工作还比较薄弱。这种现象，如不迅速纠正，不仅对经济建设不利，在政治上也将造成不利的影晌。

二 发展山区生产的方针

首先要说一下山区生产的主要特点：一是山区生产的多样性。农业、林业、牧业、副业、采矿等生产项项都有，较之平原更加丰富多彩。二是山区生产许多项目具有长期性。例如各种林木，一般的都要十年、二十年，有的甚至几十年才有收益。因此，山区生产的基本建设任务也较大较多。三是山区生产的商品性大。除粮食、油料等多属自给性以外，其他产品大部分属于商品性，都要卖出。四是山区生产的季节性、地区性比之平原更为突出。

其次，应该正确估计发展山区生产的有利条件，这就是：我国人口众多，勤劳勇敢，这是极可宝贵的，山区人民又有丰富的山区生产建设经验，这是建设山区最根本的依靠。山区的资源丰富，许多地区自然条件很好，宜于发展农林牧业生产，生产门路甚多，极有利于发展多种经营。许多山区是革命老根据地，群众的思想觉悟较高，有良好的政治条件。尤其重要的是，山区已实现了合作化，这是极有利的社会基础。当然山区生产目前也还存在着困难因素，这就是山区人口分布不均衡，特别是近年来，有些山区农民生产情绪不安定，想要下山进城，山区人口外流现象极为严重。由于山区多年遭受反动统治和战争破坏，创伤尚未完全恢复。交通不便，深远山区更为困难。这些困难条件，如不加以克服，当然会影响着山区生产建设的顺利发展。

建设山区是全党全民一项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标是要把现在在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山区，建设成经济上、文化上繁荣、进

步的社会主义的新山区。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根据前述关于山区具体情况分析，今后山区生产建设，应该采取这样的方针：要在做好水土保持，力争粮食、油料、肉类等自给有余的基础上，有计划地因地制宜地实行农业、林业、牧业、矿业、土特产等多种经营互相结合、全面发展的方针。更具体地说，可分为如下六条：

（一）山区生产，必须是多种经营，不能单一化。（二）要因地制宜，研究历史，不要割断历史，要反对一般化。（三）要力争粮食、油料、肉食自给有余，并要加强对平原、城市、工矿地区的支援。

（四）林业建设是山区生产的一个重点，必须大力植树造林。有林才能更好保持水土，有林才易于发展土特产。林木是长期性生产，不能孤立地造林，要和经营当年生作物相结合，使短期生产为长期生产服务。（五）一切生产，都要服从于水土保持。水土保持是发展山区生产的生命线。破坏了水土保持，就是破坏了山区生产的基础，其结果不仅影响山区生产，而且必然要影响到平原，影响到整个农业生产的发展。（六）要全面规划，不要顾此失彼。这样才能做到“地尽其利，物尽其用，人尽其材”，从而促进山区生产的全面发展。

三 发展山区生产的八大任务

为了贯彻执行前面说过的发展山区生产的方针，为了实现建设山区的长远目标，现特提出发展山区生产的八大任务：

第一，要充分挖掘山区现有耕地的潜在力量，在提高单位产量的基础上发展农业生产。首先是提高山区的粮食产量。除去石山区、高寒山区和无霜期很短的山区外，均应因地制宜，积极努力，争取如期分别达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规定的亩

产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的指标。并且在不同地区内，要有半年、一年、一年半的储备粮。其次要着重发展油料、糖料、麻类、蚕茧和果类等经济作物，以减轻平原地区粮、棉争地的负担，缓和耕地紧张的情况。

第二，要大力开展造林、营林、护林工作。最近几年来，森林已砍伐了一百二十万公顷，而更新的仅只十万公顷。森林情况正像毛主席说过的“大势不妙”，我们必须加倍努力，改变这种情况。首先要改变砍得多、造得少的不利局势，要做到砍一造二或造三、造四甚至更多。只有这样，才能满足将来建设的更大需要。也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保持水土，涵养水源，调节气候，保证农业生产顺利发展。因此，首先要抓紧造林工作。据二十一个省的统计，现有森林十亿多亩，占这些省区土地面积的百分之十四，还有宜林地约十亿多亩，如果再造十亿亩，森林面积可占到这些省区土地面积的百分之二十八。这样就可以达到保持水土，涵养水源，调节气候的作用。这次会议大家初步认为十年内可以造林八亿亩，这是很好的，应坚决争取努力完成。今后再用十年的时间在其他省区的边远山区大量造林，二十年，全国山区就可以基本上完成绿化的伟大历史任务。

第三，要充分利用山区水草资源，大力发展畜牧业。山区发展牲畜不仅要满足本身需要，还必须支援丘陵区、平原地区的耕畜和城市肉食的供应。为了发展山区的牲畜，必须注意改良畜种，加强防疫，改善流通工作。大牲畜发展的方向应该是社有社养，以社营为主，同时，可以允许社员养一定的头数；小牲畜则以私养公助为主，公有私养为辅（照中央指示有关规定办）。

第四，要因地制宜地发展土特产，以满足工业和出口的需要。土特产的生产，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而我国出口

商品中，据外贸部的统计，有百分之五十是山区生产出来的。为了发展山区各种土特产，增加山区人民收入，各省应定出发展计划，具体指标，和有关部门订立短期、长期的收购合同，以促进生产的发展。

第五，必须把水土保持工作做好。应该贯彻全面规划，综合治理，集中治理的原则，对水土流失较严重的地方，有计划地、分期、分批、分沟、分片地进行治理。在十年内，应在一切可能的地方，争取基本上控制水土流失。控制水土流失的主要方法，就是修梯田、造林、种草等等，采取综合性措施。同时应该注意发展山区水利，因为农业、林业、牧业以及副业都离不开水。河南省林县的例子很生动，“没有水群众就下山，有了水群众就上山。”大家要有甘肃武山县东梁社和山东营南县大山社引水上山那种不怕一切困难的精神，大力开展山区的水利建设，做好水土保持工作。

第六，要发展山区加工业、手工业，开发山区矿产。山区交通不便，要将原料都运到城市加工，既感困难，费用成本也高，如果就地生产就地加工，运出成品、半成品，那就方便和节省多了。因此，建议轻工业部门，将一些小型的或中型的加工厂分散到山区。例如，福建的福安十七个乡开设一个榨油厂，远的乡要跑八十里路来榨油，这种过分集中的加工业应当改变。各部应进一步考虑，将山区产品的加工业尽可能委托给山区合作社去办。山区已经合作化，大家都是社会主义，委托合作社加工，绝不会有发展资本主义的危险。

手工业也不要过分集中在城市，也要分散一些上山。就地取材，就地制造，就地供应，既降低成本，又节约运输。为农民修理农具家具等手工业更需分散上山。

第七，大力发展山区交通。这是发展山区生产的一个重要问题。这次会议，大家认为十年内要把经济要道修成简易公路，其余的要修成大车路，改良驿道或人行道，这是很对的。但交通的发展，只能是逐步提高，量力而行。要重视利用和改进水运，特别是出产木材的地区，要修整现有河道，加强水运。各地在制定山区生产全面规划时，应同时制定山区交通建设的规划和制定对现有运输工具技术改良及发展运输工具的规划。一般田间道路的开辟和改善由农业社制定规划；乡与乡之间的道路和几个农业社共同使用的田间道路，由乡综合规划；通往集镇和交通干线的道路、河道开发和架设桥梁等，由专、县负责。省负责制定通往工矿区 and 政治中心，联系铁路、水运的公路或简易公路交通网的规划。对于运输工具，在目前主要是解决肩挑、人背的问题。在牲畜较多、饲草有供应条件的山区，应发展畜力运输。在公路运输方面，发展代燃汽车问题，由交通部、一机部进一步研究后，在有条件的省（区）逐步推广。为了发展山区的交通运输，在交通投资上应对山区予以适当照顾。

第八，要发展山区文教卫生事业，以便逐步地提高山区人民的文化水平和消灭主要的地方病。这方面文教卫生部门讲得很好，望另拟文件发下。

四 发展山区生产的十项措施

为了实现上述方针和任务，必须从思想上、政策上、组织上、经济上采取有效的措施。

第一，要做好思想动员工作。统一认识，明确方向，树立信心，鼓起劲头，面向山区，向山区进军。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要

有“让高山低头，河水让路”的英雄气概去建设山区。要大力宣传山区生产的重要作用和方针政策，领导同志要经常深入山区以推动和提高干部和群众上山生产的积极性。各省、县要定期召开山区会议，经常听取山区干部和人民的意见，帮助他们解决工作中的困难，鼓励他们的工作信心。

第二，要做好山区生产规划。这是搞好山区生产的一个重要环节。山区经济是综合性的，因此，必须全面规划，各方面配合，统一安排。各有关部门不能各自为政，互不配合，片面主观。规划的制订，要走群众路线，先要自上而下地提出规划指标，而后再由下而上地经过群众充分讨论，以合作社为单位作出规划，再由乡、县、省逐级加以综合平衡，最后定案。在决定规划的指标时，应该充分挖掘潜力，充分相信群众的创造性和积极性，既要克服保守思想，又应防止不切实际的偏向，务必把规划放在积极而又可靠的基础之上。

第三，要切实解决山区劳力不足的问题。首先要采取有效措施，扭转山区人口外流趋势，使山区人民安心在山区，积极地发展山区生产。另外，还要动员城市和平原的多余劳动力上山，以开发山区。有些地方由合作社派出生产队深入山区建立新村；有的组织多余劳力与山区订立农忙季节互相支援的合同；还要倡导向山区移民，实行“自移公助”。所有上述办法，都可因地制宜地分别采用。

第四，要适当调整山区人民负担。在不变更征购总任务的前提下，各省县对比较穷困的山区和革命老根据地应多予以适当照顾。但不要单纯救济，主要是帮助山区人民发展生产。对于交通很不方便的山区，义务运输在里程上应该适当照顾。

第五，加强山区贸易工作，是促进山区生产发展的另一个重

要环节。山区的土特产种类繁多，商品性很大，因此，山区贸易工作必须作好。要大力地发展山区商业网，一方面为山区生产服务，同时又可以解决供应平原和城市的需要。在那些不能设立商业购销点的地区，国务院第五办公室和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已同意委托山区农业社代购代销，并给以一定的手续费。这样做的好处，首先是便利于生产；其次是便于收购；同时也更便于防止富裕中农的投机倒把，有效地和自发资本主义作斗争。另外，有的货物，应遵照朱副主席指示，尽可能组织产区销区直接见面，以减少流转环节，缩小地区差价。发展山区生产的重要问题之一是价格掌握问题。目前物价基本上已趋合理，但有些产品收购价格不完全适当的要予以调整，地区、品种、购销之间，也要有合理的差价。但在调整价格时，必须慎重，要参照历史和研究产品成本。为了促进山区生产，一般产品应规定最低保护价，保证生产者有利可图，至少不致亏本。山区价格调整还必须按照中央有关规定经过一定的批准程序。

第六，加强技术支援。山区许多生产都带有一定的技术性，必须在生产技术方面给予帮助，有关山区生产的科学研究机关应该到山区去，特别是林业、畜牧业、水土保持的研究机关要注意这样做。要有计划地培养农业社的技术力量，总结山区生产经验。有关山区生产的技术学校，应尽量接近山区深入山区实习。

第七，国家要给山区以必要的经济支援。发展山区经济，主要应依靠农民群众的力量，这是根本方针。但是国家在可能范围内在一部分国内外急需的产品上给予适当的专业贷款援助也还是必要的，特别是对于老根据地和贫瘠山区，应该多加注意。今后各地农贷资金，主要的是加强现有的资金周转，注意做好收贷工作，各省可以根据抽肥补瘦的精神，把富裕地区的农贷资金，适

当向山区调剂一部分。我们还必须看到群众由于生产日益增加，农民储蓄正在增多，农村信用合作社将有无穷无尽的力量。信用社存款现已由一九五六年的六亿元迅速增加到十亿元，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预计可以达到二十亿到三十亿元，这是完全有可能的。现在有些地区信用社在农业合作社内部设立了分社、服务站、代办站（是由信用社的理事或农业社干部兼办，不增设专职干部），这个办法既便利了群众，也有利于解决信用社业务和农业社的许多矛盾，可以大力推广。

第八，要重视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作好少数民族工作，加强对少数民族的团结。要注意在少数民族地区不可勉强移民。

第九，要动员干部上山。为了发展山区生产，加强山区领导，要动员大批优秀干部上山。上山生产的干部，要做到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而且还要担负起领导和组织生产的任务，这是一个既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江西准备动员一万名干部上山，其他省也正在这样做。这些干部上山，对于自己将会得到很大锻炼，对于发展山区生产，亦将起着重要作用。这是一件有巨大历史意义的创举，必须把它做好。

第十，统一和加强对山区的领导。各省要有一个书记或副省长（党员）负责领导山区工作，及时检查山区的政策执行情况，及时发现问题，帮助解决问题，并负责统一各有关部门的领导，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协作。

五 办好和巩固山区生产合作社

发展山区生产，必须也只能依靠农业合作社，巩固办好山区合作社，是做好山区生产的一个根本关键。山区实现了合作化，就

为发展山区生产打下了有利基础。今后，要重视加强对山区合作社社员的政治思想领导，因为山区生产多种多样，而且有的收入很大，山区经济开发起来，易于产生分散、自发情绪。这就有必要经常注意经过教育克服资本主义思想，加强集体主义的思想。

合作社的组织形式要适应山区的具体情况。社的规模大小，要因地制宜。一般地说，山区的社、队不宜太大。为了进行较大基本建设的需要，社与社可订立协定，联合起来进行修路造林兴修水利等。山区也可以试行联社办法。合作社的劳动组织和劳动分工，也要适合山区的特点，不要硬搬平原的一套。

劳动报酬要根据山区不同的生产技术和劳动条件等情况来决定，要照顾技术性较强的劳动。合作社的公共积累，山区与平原也应有所不同。经济富裕的地区，在保证社员收入逐年有所增加的条件下，可以多扣留一些公积金。收入特多的，还可酌留一部分储备金，以丰补歉，准备社员生活困难时之用。在林区林木收入大的社，可以另设森林建设基金，用以发展林业。在贫瘠山区，生产暂时还没有发展的社，积累就要少些。山区副业多，经营繁杂，应注意划清合作社生产队与社员的经营范围。凡大宗的利大的副业生产一般应由社集体经营；零散的允许生产队或社员个人经营。

总之，要按照山区的特点，来领导办好山区合作社，只有这样，才能担负起山区生产建设的伟大历史任务。

注 释

〔1〕 朱副主席即朱德，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牧区畜牧业生产要有个新发展*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八日)

牧区今后畜牧业生产的方针和任务

全国的畜牧业生产，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的地区，即：北方草原牧区；南方山地和亚热带牧区；广大的农区。现对北方草原牧区和南方山地和亚热带牧区畜牧业生产的方针和任务提出如下意见：

(一) 北方草原牧区，包括内蒙、新疆、青海、甘肃和四川省西北部等广大地区，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百分之三十八，大小牲畜占全国总头数的百分之三十三点二（不包括猪），是我国畜牧业的重要基地之一。它具有和农业区不同的特点：一、从事畜牧业生产的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少数民族，他们积累了多年经营畜牧业的经验。二、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地民主改革、社会主义改造的进度不同，情况复杂。三、畜牧业生产在目前还没有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技术改造的条件下，存在着脆弱性和不稳定性。

* 这是邓子恢在牧区畜牧业生产座谈会上的总结报告第三、第四、第五部分。

四、牧区生产单一化，商品性大。五、地广人稀、交通不便。六、青草期和枯草期各占一半，因而牲畜膘每年是“夏胖、秋肥、冬瘦、春干”。

根据北方草原牧区的特点，畜牧业生产的方针是：在积极稳步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畜牧业，逐步改游牧为定居，实行农牧业结合（首先是饲料生产），兼营畜产品加工业等副业生产，发展以牧业为中心的多种经营。

（二）南方山地和亚热带牧区，自然条件好，一年四季常青或三季绿色，是一个具有畜牧业大量发展良好条件的牧区。这些地区，畜牧业生产的方针是：在争取粮食自给有余的基础上，在不破坏水土保持的原则下，积极发展畜牧业，发展农、林、牧和副业相结合的多种经营。

（三）根据投资少、办事多、收效快的原则，有计划地在牧区发展国营农场，从技术、种畜和经营管理等方面支援牧区畜牧业生产，并起示范作用，以促进牧区的社会主义改造。

上述两类牧区的畜牧业生产，每年牲畜数量必须要有增长。北方草原牧区，在提高牲畜总增殖率的基础上，每年纯增率要求达到百分之八左右多至百分之十，除了满足当地人民生活生活的需要和畜产品收购计划以外，并应为广大农业提供畜力，供应华北、东北等地以役畜^{〔1〕}。至于各地区畜牧业生产发展的具体要求，由各省（市）区根据上述方针和任务自行制定。

牧区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关于牧区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已草拟了《关于在少数民族牧区逐步实现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

造》的指示。这次会议讨论了这个文件，大家一致同意指示的精神，将来经中央批准后发下去，这里不详细讲了。现在着重地讲如下几个问题：

（一）对牧区畜牧业改造必须坚持积极稳步的原则。牧业合作的优越性比之农业合作化更为显著，因此，合作化是发展牧区生产的总方向，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任务，是发展和繁荣牧区经济的决定性关键，所以必需坚持积极发展的态度。目前条件不足的，应为逐步实现合作化积极地创造条件。由于牲畜是一种有生命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牧民各人占有的牲畜数量悬殊较大，牧区的自然条件又较差，偶有不慎，畜牧业生产就会遭受自然和人为的损失和破坏，所以又必须稳步前进。但是决不能因稳步而迟迟不前，因积极而不准备必要的条件。至于合作发展的具体进度怎样，因为各地情况不一，由当地党委研究决定。

（二）牧区畜牧业合作化的阶级路线是：依靠劳动牧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是因为牧区的劳动牧民约占牧区总户数的百分之八十左右，他们对合作化是积极拥护的，是实现合作化的基本力量；富裕牧民约占总数的百分之十五，由于他们占有牲畜较多，有轻微的剥削，所以对社会主义改造是动摇的，但在大势所趋的情况下，只要我们正确贯彻执行互利政策，耐心说服教育，他们是仍然能够接受改造的。因为各地情况不同，在贯彻执行阶级路线中具体做法上允许有所不同。

（三）关于牲畜入社和收益分配的办法，应该因地制宜，创造经验。目前各地处理牲畜入社和收益分配大致有以下的四种办法：一、适龄母畜计头入社，按劳畜报酬比例分配成活的仔畜和畜产品。二、全部牲畜计头入社，有产值（包括畜产品和役用价值）的牲畜按年产值计股，按股计红，按劳畜比例分配收益；无产值的

牲畜由社统一经营，畜主向社交纳管理费用。三、把入社牲畜折合标准牲畜计股，按股计红，按劳畜比例分配收益。四、牲畜牧分类分等依市价计股入社，按劳畜比例分配收益。这四种办法都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基础上由社统一经营的初级形式，容易为广大牧民所接受，可以因地制宜分别采用。至于初级社转高级社的问题，有条件的可以个别试办，创造经验。也可考虑将来用逐步降低牲畜分红比例的办法过渡到高级社。

牧业生产合作社的公共积累，原则是保证社的牲畜和绝大多数社员的收入逐年有所增加的情况下，积极增加公共积累，进行必要的基本建设，以扩大再生产。

入社牲畜和自留牲畜的比例，因地、因社、因时制宜，不必统一规定，一般是入社牲畜应多于自留牲畜。

（四）牧主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牧主经济肯定要实行改造，这是不能动摇的。举办公私合营牧场^{〔2〕}是牧主经济改造的主要方式。签订合同，把牧主的牲畜交国营牧场、公私合营牧场或合作社代放，并租用其主要生产工具，这种办法可以作为到达社会主义的一种过渡形式试办。个别牧主（主要是小牧主）愿意服从合作社的经营管理制度的，可以吸收入社。牧主联营牧场允许个别试办，不要一般地提倡。

关于牧区的生产建设

在牧业区逐步提高牲畜的纯增殖率，是畜牧业扩大再生产的关键。要求牧区牲畜的年纯增殖率达到百分之八到百分之十，必须注意如下的几个方面：作好“四保”（保配、保胎、保生、保活），提高牲畜的增殖率；根据牲畜增殖淘汰的规律和满足当地群

众需要的原则，确定一定的外调比例，外调牲畜多了或少了，都对畜牧业生产不利；在牧民日常生活消费方面，提倡勤俭持家，减少牲畜的消耗；大力采取各种措施减少牲畜的因灾死亡率。

保证提高牲畜总增殖率和减少牲畜因灾死亡率应采取如下措施：

（一）大力兴修水利。有水就有草，水草是牧区的基本生产资料。全国约有三百万平方公里草原，其中尚有三分之一未被利用，已利用的草原载畜量也不高。改变这一状况的关键是兴修水利，解决水的问题。水利部门应把牧区水利建设当作重要任务，对草原进行勘测设计，了解地下水的情况，并给以物质上和技术上的支援。

（二）保护、培育和改良草原。发动群众进行防火、固沙、耕耙草原，去毒草，种植饲草，消灭兽、虫、鼠等害，请当地驻军协助群众打黄羊。同时，在合作化的基础上，逐步调整以至固定草原使用权，实行划区轮牧。

（三）逐步推行定居放牧。结合互助合作运动，逐步推广定居放牧，在具备条件的地区，组织牧民种植饲料作物和粮食作物，做到以牧为主的农牧结合。

（四）提高牲畜繁殖率和成活率。推行分群放牧，改进畜群构成，提高适龄母畜的比例，按期配种，减少空怀，相应地做好保胎、接羔、育幼工作。修盖圈棚贮草备料，以改进牲畜的饲养管理。

（五）改良畜种。着重选育当地良种，适当地引进外地优良畜种，实行分群放牧，避免乱交，开展良种牲畜的人工授精工作，以普遍提高和改良牲畜品质，建立良种基地。各地国营牧场应成为供给优良种畜的基地。

(六) 加强兽疫防治工作。根据改善饲养管理、加强家畜卫生、结合畜疫防治的原则，大力开展兽疫防治工作。继续贯彻执行对民间中兽医的“团结、使用、教育和提高”的方针，发挥其积极作用。

有的省、自治区要求农学院开设畜牧兽医系，举办中等畜牧学校和建立生物药品制造厂等问题，各地可进行规划，报请中央有关部门审批后进行。

牧区生产建设所需的资金，主要是依靠群众和合作社自筹。同时，国家给予一定的贷款投资。

注 释

- 〔1〕 役畜指从事生产劳动的牲畜。
- 〔2〕 公私合营牧场是对牧主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所采取的一种主要形式。主要内容是由国家委派干部担任牧场领导，草场实行公有，生产经营纳入国家计划轨道。它是具有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乡办工业的伟大意义*

(一九五八年五月)

自从毛主席和党中央提出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的方针，并号召“全党全民办工业”、“乡乡社社办工业”以来，地方办工业的积极性便大大提高。不仅省、专、县办工业，而且乡乡社社都在千方百计的办工业，土制化肥厂、农具修配制造厂、砖瓦厂、石灰厂、煤矿、制糖厂、榨油厂、发电厂、铁厂等中、小型企业，便如雨后春笋一般，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材料，今年全国各地已经动工兴建的这些中、小型企业约八十多万个。这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上将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

首先，应该认识社会经济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任何一个地方的社会经济都包括生产、流通、分配三个行程。在农村中当然主要任务是发展农业生产，但农业生产的发展必须取得工业、商业、手工业、交通运输、金融信贷等的积极支援和密切协作，离开这些协作而孤立地发展农业生产是不能想象的。过去相当长的

* 这是邓子恢为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主办的《农村工作通讯》一九五八年第十期写的文章。

时期内，我们过分强调条条作用，把这些本来是一个整体的行业各自割裂开来，影响这些行业对农业生产的密切协作。甚至连手工业也自成系统，农业社不能自己修理农具、家具，不能进行农产品加工，这对农业生产当然会发生不利的影响。现在中央提倡乡社办工业，并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内设供销部和信贷部。把这些原来是一个经济整体的机构统一起来。这对农业生产大跃进将起着极大的促进作用。如江苏省青浦县的嵩泽农业社，办了一个农具修配厂，还兼制农药。全社二千八百多亩土地所需的农具，已经作到自给自足；一般性的农药，也能自己配制。粗略估计一下，光今年春耕农具修添一项，就节省近千元的开支，而且不必进城上镇，往返跋涉，做到了自用自制，随坏随修，许多问题迎刃而解。又如河北省定县的韩家洼农业社，新建成了一个火力发电厂，他们的水利灌溉和农产品加工大体上就电气化了。他们算了一笔帐：全社全年可节省人工五万九千三百二十五个，畜工三万一千七百七十个，腾出的人力、畜力投入农业生产，可增产粮食三十七万二千斤。这仅仅是两个农业社去年办的两个工厂的情况，如果全国几十万农业社都办起工厂来，那么几百万个工厂所创造的价值，对于农业生产的跃进，将起着多么巨大的作用。

其次，乡社办工业对调节农业社收入，也将起很大作用。上述两个例子，一方面节省了支出，促进了生产，另一方面也就增加了农业社的收入。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机械地分工分业，单打一，搞生产的不能搞加工，搞农业的不能搞工业，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的比例也有大有小，从而形成地区与地区、社与社之间的收入悬殊太大。现在乡社办工业，实行就地生产，就地加工，自己用自己造，有些地区在粮食大增产以后还可以适当扩大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这些经济作物再经过社内加工，其生产

价值比之粮食价格当然更高，这样便可以使各地区、各农业社之间的收入得到适当调节。这对促进各地区各农业社生产的平衡发展，对加强各地各社农民之间的团结都是有好处的。

再次，乡社办工业对工业大跃进更有着巨大的作用。全国二千多个县几万个乡，几十万个社，如果大家都动手办起工厂来，它的产品、产量，它的创造发明将是不可限量的。“积少成多，集腋成裘”，这些因陋就简、用“土办法”办起来的中、小型企业，沿着由小到大的规律向前发展，到了一定程度，数变将转成质变。据各地预计，明年全国钢铁产量将由现在的五百万吨发展到二千多万吨，这种飞跃发展的速度，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属于这种中小型企业。因此，只要我们坚决贯彻执行“全民办工业”这条方针，将如刘少奇同志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的报告中所说：“……这样，前途必然是：一、加速国家工业化的进程；二、加速农业机械化的进程；三、加速缩小城乡差别的进程。”同时，在乡村办工业还可以减少原料成品和副产物的往返调运，大大节省社会运输力和运输费，从而降低产品成本，这对整个国民经济是最合算的。过去农产品加工大部分集中在城市，不让农业社就地加工，以至产生豆饼价格比黄豆价格还高的反常现象，这种反常现象几年来得不到解决，现在乡社办工业就可以把这些极不合理的反常现象一扫而光。

最后，乡社办工业，将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创造物质条件。列宁说过，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意思就是要在党与政府的领导下实现全国电气化，从而建设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和现代化的交通运输，这样使社会能最大限度生产物质财富，来满足人民的需要。城市如此，乡村也同样如此，实现乡村城市化，从逐渐缩小城乡差别到最后消灭城乡差别，那时候

每个人从事农业生产，又从事工业生产，参加劳动又学习文化，从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将逐渐缩小，最后消灭这种差别。

正由于乡社办工业有着这样伟大的作用，因此我们就必须：

第一，采取积极的态度，支持并帮助乡社办工业，而改变过去那种认为农业社只能办农业的旧观点。在乡社办工业以后，有些厂矿，中央与地方，国营与社营可能发生矛盾，应在统一规划下适当分工，以避免互相排挤互相牵扯的现象。如农产品加工业应尽量下放到乡社，现有国营加工业除一部分维持生产外，可以考虑改为其他企业。至于乡社工业的利润过大的，是否可通过价格税收等加以调整，而不要因噎废食，在经营上加以限制。

第二，乡社办工业必须坚持为当地农业生产服务为主，同时为国营工业服务的方针，防止片面的图利观点。只有坚持这个方针，促进了农业生产大跃进，才能自己解决原料、销路、资金、劳力等问题，而打下自力更生的基础。如果违反这条方针，存在单纯图利观点，那么乡社工业的发展总有一天要遇到原料、销路等困难，最后陷于不利的处境。

第三，根据上述方针，目前乡社办工业应该把重心放在农产品加工（如榨油、榨糖、轧花、腊肉、碾米、磨面等）、农具修理、肥料制造、水利利用、燃料开采、自用建筑材料制造以及为国营工业加工等方面，至于那些对国家并不太需要，自己也缺乏条件的工业，应该缓办或者根本不办。

第四，乡社办工业应本着就地取材，因陋就简的原则。在本乡本社现有材料，现有技术的基础上尽量发挥“土师傅”、“土办法”、“土材料”的作用。先易后难，先小后大，先土后洋，先低级后高级，有什么办什么，能办什么办什么，边建设边生产，力求投资少、收效快、收效大，力戒摆大摊子，摆阔气，等待买机

器等不现实的做法。在这方面，福建永春县利用各种水力办工业的经验，应该成为乡社办工业的最好榜样。

第五，要迅速推行三社合一（即农业社之下设供销部、信贷部）、或四社合一制（再把在农村的手工业社与农业社合并成为农业社的工厂作坊）。上面说过，社会经济本来是包括生产、流通、分配三个行程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农业社既然是一个集体经营的农业生产企业，将来又将成为共产主义社会经济体系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单位，那么在农业社之下设供销部、信贷部，经营自己所需要出售的产品，自己所需要的生产、生活资料，自己所需要的金融信贷事业，本来是很合理的。一年多来各地试验的结果，也证明了三社合一制有三种好处：（一）便于社员就近买卖借贷，减少赶集时间，从而增加生产劳动；（二）便于随时了解社与社员的供需情况，减少以致消灭货不对路，形成商品积压或脱销现象；（三）三社合一后合作社有自己的供销信贷机构，一方面便于合作社统一使用资金，出售产品，另一方面也便于合作社依靠集体力量，更有组织地与富裕中农和其他资本主义分子的商业投机、高利贷行为作斗争，而最后消灭农村资本主义活动。这种制度在社办工业以后就显得更加重要，显然合作社所办的工厂，不能每个厂都设置自己的推销采购机构，并各自与有关企业订立合同，而应该由社统一经营各工厂的推销采购业务。因此，在社办工业以后，就更加迫切需要迅速实现三社合一或四社合一制。有人认为，三社合一制是鼓励农业社做生意。其实并非如此。因为供销部与供销社或国营公司在经营统购物资方面并不是买卖关系，而是代购代销提取手续费的关系。供销部、信贷部经营范围又不超出本社以外，这样就可以保证农业社不会走上商业投机或高利盘剥的道路。

第六，合作社办工业以后，社内的分工分业，劳动安排，经济作物生产和社队规模大小，将随着情况的需要而作适当的改变。首先要有专业队和一定机构、一定干部来经营工厂、作坊。全社劳动力一年中多少用于工业生产，多少用于农、林、渔、牧业及其他副业生产，这些都要事前有全盘规划，统一安排。并在季节上加以适当调配。社办工业所需要的原料主要靠自己生产，因此，在保证粮食供应和本社自给有余的条件下，合作社可以适当扩大技术作物的播种面积，并向山上、地下、水里多方面去找原材料，以供应工业发展的需要。至于合作社和生产队规模大小，在目前农业生产大跃进，又加上社办工业，实际情况要求社队规模适当扩大。这方面中央已有明确指示，各地可根据自己的具体需要和可能定出并社计划，逐步加以实现。但并社中仍需全盘考虑，审慎行事，有些社一时合并条件尚不成熟的可经过联社形式，先把工业办起来，以后看情况再研究下一步的并社工作。

关于自留地问题 给毛泽东主席的一封信*

(一九五九年六月十六日)

主席：

刚才在游泳池谈到自留地问题，主席提出要允许各地因地制宜，并发一通知。我回来后查看一下中央指示，关于恢复自留地问题中有这样两段话：“自留地数量多少，仍按原高级社章程规定，以不超过每人分地百分之五，也不少于百分之五为原则。”“自留地质量可能将各社员原领的自留地发还。如土地已经过调整，不能发还原地的，也应给予相等于原来的土地，不应随便将远地坏地抵充。”根据上述两段话，我认为可以不必再由中央下通知。因为指示已经说明“以不超过百分之五，也不少于百分之五为原则”，各地可以根据这个原则加以伸缩，而且指示中并未提到食堂所留菜地应在百分之五以外，当然食堂所留菜地也可以包括在这个百分之五之内计算。在食堂吃饭的社员自留地也可以少于百分

* 1959年6月16日邓子恢去中南海游泳池游泳，恰逢毛泽东也在游泳池。上岸休息时，邓子恢向毛泽东反映了农业生产上的一些问题。毛泽东提出对自留地要允许各地因地制宜对此，邓子恢有不同意见，但没有当场提出，一回到家里，便即刻给毛泽东写信，陈述了自己对自留地的看法，建议中央对自留地问题不再改变。毛泽东接受了这个建议，自留地就此被保留了下来。

之五，这又是一种灵活规定。即使各地除食堂留菜地外，还给社以百分之五的自留地，也并无妨碍。因为这些自留地并不是荒废，反而可能种得比集体菜地要好，这对整个生产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何况社员自留地除了种菜之外，还可以种饲料、种小杂粮。所以即使各地按每人分地留百分之五，也并不算很多。至于谭震林同志所提浙江、福建、广东等地地少人多，每人分地只有一亩，甚至七、八分，似乎留百分之五会影响集体生产。我认为这不会有什么影响，因为自留地是按百分比规定，不是机械规定，每人或每户留几分地，分地少的地方，自留地当然也就少。比如我们家里每人只分一亩地，以五口之家计算，共分五亩，按百分之五计算，自留地只有二分五厘地，除了这二分五厘地外，尚有四亩七分五厘地归集体经营，这对集体生产影响并不大。再看这些地少的地方，社员是不是需要有二分五厘的自留地？根据革命以前我家庭的实际情况，我认为是有需要的。过去我家里大小六口人，每年种植菜园总是三分地左右，这三分地菜园经营得好，除了种蔬菜自给自足外，还可以种些地瓜、大薯、毛笋等作为养猪饲料用。所以我的经验，按每人分地百分之五留自留地是适当的。前年我部代中央起草的指示，把自留地扩大到百分之十，则是太多了。现在仍按原高级社章程规定的百分之五是恰当的。全国现有耕地十六亿亩，按百分之五留自留地计算，总共不过八千万亩。花这八千万亩地，可以解决五亿多农民的蔬菜供应，可以发展私人养猪、养鸡、养鸭。这样做的好处，至少可以使五亿多农民不再向市场来争购副食品，有的农民还可以挤出一些副食品来供应市场。我认为这是最合算不过的措施。只要把五亿多农民安顿好了，我们的市场就稳如泰山。近半年来，城市副食品供应紧张的中心关键，固然是由于粮食紧张、生产不足，及城市人口增加过多所致，但

与农民进城抢购副食品及城市人员购买副食品寄回农村供应其家属也有很大关系。同时，农民留一点自留地，由他自由支配，加上供给制部分分配到户，这样，农民就有可能自己支配自己的生活，不致全部生活来源都掌握在干部手里。这对防止强迫命令也有很大作用。因此，我主张自留地问题，中央不再改变，也不必再发通知。目前有抵触的也只是河南、湖南两省，已经用电话分别答复解决，不必再发全国性的通知。所见如此，是否有当，望主席考虑。

邓子恢 6月16日12时

关于龙岩调查*

(一九六一年五月十三日)

我于四月三日率个工作组到漳州，在龙溪做了一些调查工作。四月十五日才回到我的家乡龙岩，五月七日离开。在龙岩二十多天中，计参加了东肖（白土）、湖邦、曹溪、小池、城关各公社的座谈会，到会的有地、县委书记，各公社和各大队负责干部，个别小队长，并有七、八个老农。王录同志^②所率工作组则住在东肖社之中民大队、后田大队、龙泉大队，做了调查研究工作。此外，我还参加了我家龙泉大队座谈会和后田贫农团座谈会，并到几个乡村看了一下田、园、食堂、社员住宅，和群众讲了话，还找到十多个过去熟悉的老农个别谈话。现将我参加座谈、个别谈话和工作组下乡调查所反映的情况和问题分别报告如下：

一 关于食堂问题

这是包括城乡全体人民所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我一回到龙

* 这是邓子恢在参加了中共中央广州工作会议之后，立即到福建龙岩地区调查研究如何贯彻执行《农村人民公社^①工作条例(草案)》，写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报告。

岩边境就有许多群众反映这个问题。当时龙岩县委已宣传了《六十条》^{〔3〕}，并允许某些老年人、病人、小孩多的户回家自炊，但绝大部分农民还要在食堂吃饭。群众基本口粮从四月一日起，也比以前增加了一、二两到三、四两大米。但食堂实际上仍是干饭加工厂。群众从食堂领回干饭后，不仅要在家煮菜，还要自己加煮一点粮食（如大麦、地瓜之类）；有的还要把从食堂领回来的干饭和菜混在一起煮虚饭来吃。因此，群众认为办食堂害多利少，甚至有害无利。

首先，是办了食堂并未节省燃料，反而增加浪费。如龙岩城内城郊和我乡白土，家家户户都烧煤炭，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未停火。而食堂又烧一个大炉子，每天浪费煤炭很多。

其次，对人力也未节省，反而浪费。一般一百人的食堂要有六七个全半劳力为之服务，而每家三餐都还要一个人负责煮饭炒菜，并要到食堂去领取干饭，一天来回六趟，走了许多冤枉路。人数多的食堂则更不方便。湖邦区有些地方为了办食堂，过去还实行移民并村，把山上小村庄居民移住大乡村。

第三，增加了社员负担。一般食堂工作人员都由小队计工分，影响到本队劳动工分值减低，食堂煤炭也由社员分担；食堂种菜劳力也是从小队抽出的，种的菜并不好。城关区西门内食堂的工作人员则每人每月发工资二十元，此工资由提高米价款来支付，每百斤米原价是十点四元，现加到十四元，即提高了三点六元。如果五口之家，以每天每人口粮十两计算，则一个月要增加米价三点四元。

第四，是食堂工作人员和大小队干部普遍多吃多占。经过他们多吃多占，社员口粮普遍比定量要减少百分之十以上。社员说：“大官大贪，小官小贪”。这是群众最不满意的事。为什么食堂人

员克扣社员口粮？一是大家口粮定量很低，多吃多占一点，在所难免。二是他们怕粮食损耗，要扣留一点，以免亏垫。但所扣粮食到月终有余，并未分给社员，而由干部内中分肥，或做夜餐之用。

第五，食堂不仅克扣社员口粮，而且克扣其他副食品和日用品，如油、酱、酱油、盐、鱼、海带、糖、烟、火柴等。这些东西原由分销店供应，社员凭证凭票购买，办了食堂之后，取消了分销店，改由食堂供应。商业部门把这些物品按人口发给食堂，社员参加食堂者由食堂供应，实际上克扣了很多。不在食堂吃饭的则完全不供应，群众对此意见更多。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在目前粮食和副食品供应紧张的情况下，办食堂成为妨碍农民生产生活的最大障碍，所以群众纷纷要求“食堂下放”。大小队干部也赞成停办食堂，但他们不敢这样做。他们主要顾虑是怕犯右倾错误。他们说，郑州会议^[4]后，各地食堂曾经停办一个时期，但一九五九年冬反右倾^[5]又把食堂恢复起来了。他们说，此次《六十条》虽然提出了“自愿参加”的原则，但其中有一句“积极办好”，如果现在停办，将来上级就会抓这句话来责备你，说“你为什么只讲自愿，而不积极办好”？他们还说：“食堂是社会主义的重要制度”，如果不办好，岂不是反对社会主义吗？这些模糊思想，经过我向他们解释《六十条》精神，传达毛主席批转广东一个食堂要赶快停办的话，并由新到职的地、县委书记解释后，大部分食堂改为劳力食堂，即将口粮分到户，以后由各人按自己情况决定，有的自己煮饭，有的将米用钵子装好，送到食堂蒸熟后端回去吃。四月底，地、县委传达毛主席最近指示，“食堂自愿第一”，并传达柯老^[6]“口粮发到户”的电话指示后，食堂停办者才日益增多。如东肖之后田大队，原有六个食堂，现

在只剩下两个食堂。我家邓厝大队也由六个食堂减到两个食堂。这几个尚在办的食堂，参加户数也减少一半，有的减了五分之四。早晚饭则减得更多。

看来，在目前口粮紧、副食品缺少的地方，食堂应该全部停办。当然大忙季节要办农忙食堂，群众也有此要求，但也应采用由各户自己放米拿到食堂蒸煮的办法。至于单身汉和孤寡老人，平时也要办部分人食堂，但要重新改组，不能将现有食堂这批人马原封不动地留下来。菜地也应该转归小队所有，作为商品菜地。食堂帐目应该清算公布

二 关于粮食问题

龙岩过去的粮食管理制度，除了征购粮由部门负责保管外，人民公社所需种子、口粮、饲料等，都由大队统一管理，过秤入仓，小队分期领取，口粮则实行指标到户，粮食到食堂的制度。据干部和群众反映，这种制度执行起来，确有困难，而且毛病很多。

首先，大队范围很大，大的几百户，小的百多户。全大队收割粮食，少者几十万，多至百把万斤。这样多的粮食如果都要大队派人检收，过秤入仓，不仅大队干部忙不过来，而且在收割、晒场、车净到过秤入仓，这一系列过程中，往往因为大秤不多，人力不足，等待过秤，耽误时间，而发生偷窃、雨淋、霉烂、生芽等现象。这种种损失相当惊人。

其次，由于没有大仓库，大队只好按小队分点储存，但小队也没有这么大仓库，要临时修理，并添置存粮用具，花费很大。

第三，小队分点保存粮食，名义上实行两把锁制度，但有些地方大锁买不到，就是有两把锁的，也是普通用锁，容易找到钥

匙，甚至用铁丝一捅即开，粮食被偷无从知道。据说有一个存粮点，因仓库墙塌了一个洞，谷子向外流，群众偷，猪、鸡吃，但大队不知道，小队不负责，损失很大。

第四，是小队食堂按月向大队领取口粮，大队干部也确实负担很重。如东肖中民大队六百多户口粮，每月要发稻谷七万多斤，一个个食堂发完要上十天，结算记帐，填表，又要十天。前月刚发完，后月又开始，整天忙个不休。该大队支书懊恼地说：“生产抓不了，全被粮食缠住了。”

第五，大队统一保管粮食，帐目容易混乱。中民大队所管粮食分十几个点保存，每年出陈粮，补新粮，数目很大，难于盘点，秤头不太准，高进低出，有时形成帐面无粮，仓内有粮；有的仓库又遭虫蚀、鼠咬、霉烂，存粮少了很多。这些情况，大队主要干部往往不知道，有的任由保管人员、总务、会计等从中贪污舞弊。以致去年五月间，各食堂两次断炊十来天，造成社员大量生病甚至死亡。这种悲惨现象当然是由于大队干部“五风”^{〔7〕}严重，坏人从中舞弊，但与这种复杂麻烦的粮食制度也有很大关系。

第六，至于指标到户，粮食到食堂，群众意见最大，毛病也最多。龙泉群众说：“吃粮要过五道关”。后田群众说：“粮食有五偷”。所谓五偷、五关，就是“田里偷”，过一关；“大队集中偷”，过二关；“磨米加工偷”，过三关；“食堂放米偷”，过四关；“炊事员从饭钵里又偷”，过五关。中民大队群众说：“我们吃一粒谷子，从收割到吃到肚里，要过十次秤。田头过秤，进仓过秤，出仓过秤，晒场过秤，谷到加工厂过秤，把米挑回过秤，保管一秤，总务一秤，炊事员放米下锅再过秤。从大秤到小秤，经过一手少一手。”他们说：“那么多的人，发工资，补工分，干部又操心，社员米少吃，挑来挑去，进进出出，不知要浪费多少工，请问政府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从群众这些说话中可以看出，他们对经手人太多不信任，也可以看出“指标到户，粮食到食堂”这个制度的毛病所在。

那么，今后对粮食保管制度应该如何改进呢？东肖干部和群众的意见是：

首先，要把基本口粮发到户。他们决定从五月起，先发一个月口粮，今年夏收后则恢复高级社办法：田头分湿谷，收一季发一季。湿谷分到户后，由各户社员自己运、自己晒、自己保管、自己舂米加工。这样做的好处是：（1）粮食可以保存好，避免损耗，因为分开保管，各户粮食不多，大家都有缸、有罐、有木柜存放，自己又关心照顾，不致被鸡吃、鼠耗、人偷、虫蚀，也不致霉烂、生芽。（2）社员自己手里有了粮食，所谓“饭碗端在自己手里”，放了心，安心生产。（3）社员分到谷子自己加工，可以得到米糠，碎米，来增加食量，粗糠可以碾碎用来喂鸡鸭，也可以用来垫猪圈，增加肥源。（4）大、小队不管口粮，可以节约大批人力和仓库设备开支，干部也少操心了，可以腾出人力时间，来搞好生产。当然，口粮发到户，可能有一些流氓、懒汉和不会当家的人吃粮无计划，把口粮吃完后又来向干部耍赖皮。对这种人的口粮，大家的意见要委托小队干部代为保管，五天发一次，吃完不补，等到他确实改变过来之后，才逐渐加到十天一次，半月一次，一个月一次。

其次，种子必须由生产队负责保管，区别不同品种，分柜存放，避免种子混乱。

再次，饲料发到饲养户。如养牛和养公猪、种猪者，都按头数、按定量一次或分期发到户；养群鸭者，则交小队保管，按月发放。私人养猪则在收购后按定量发给；大、小队集体养猪的，则

发给专业组保管。

最后，超产粮和本队的余粮，应由小队保管，另定帐簿，按月按旬照社员所得劳动工分分配，逐月公布帐目。大队如有机动粮、储备粮，则由大队专仓保管，另立帐簿。

三 关于供给制^{〔8〕}问题

龙岩这两年农业大减产，除供给部分口粮外，几乎没有什么工资。群众普遍反映供给制有害无利：

首先，把工分值降低了。一般比一九五七年降低百分之五十到六十，甚至百分之七十到八十，大大影响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

其次，一般地区供给比例在百分之三十以内，这比之高级社公益金要高得多。但因供给面广了，供给量不多，实际上五保户、困难户仍然困难，超支户还是超支。

第三，地、富、反、坏、二流子得到好处（据我工作组在龙溪地区了解，这些人人口多，劳力少，劳力弱，劳动又不积极，但他的供给却占到百分之四十左右），雇贫农反而吃亏（特别是雇农，很多人士改后才成家，现在顶多三、四口人，劳力强，他们所得供给只有百分之二十五左右）。由于供给制对地富反坏一视同仁，他们占了便宜，基本群众不满意。他们说：“二九年分地主^{〔9〕}，五八年养地主”。

第四，出了一批懒汉，其中有些人是偷懒不劳动，有些人则是不满供给制而不出工。如后田大队贫农陈晋柏，过去是个好劳力，实行供给制后不但自己不出工，四个孩子也不让去出工。他说“供给制了，还出什么工！”

基于以上原因，大部分群众都不满供给制，但《六十条》有

规定，干部不敢公开讲，怕将来反右倾。我向他们说：“实行不了前一条，就实行后一条，即一包两照顾^{〔10〕}如何？”群众拍手称快，干部们才敢说心里话。他们认为实行一包两照顾，一般一九开即可解决问题，且有莫大好处：

首先，是应该照顾的五保户吃穿全包了，困难户的问题也能得到解决；

其次，是可以提高劳动积极性，工分值提高（后田干部保证实行一包两照顾，今年的工分值就能达到一九五七年水平），再加上劳动粮，就能充分调动广大社员的劳动积极性；

第三，是地富反坏要自食其力，二流子、懒汉无机可乘，干部和群众的阶级观点也会明确起来。

因此，我认为，在龙岩这样大减产的地区实行一包两照顾是适宜的。至于龙溪地区，地委规定以一九五七年工分值为标准，达到的就实行三七开，达不到的就实行一包两照顾，这种办法也是可行的，但要严加控制。包括蔬菜等供给计算在内不得超过百分之三十。即使如此，供给也应有条件：超龄学生不供给；子女读书多的户也要看情况分别对待；地、富、反、坏则要他出工才供给；有劳力不出工者一律不供给，其子女参加了工作的，应仿照大队对独立手工业者的办法，要他按月交一定现款，来买基本工分。群众是要求这些人回家劳动，“不然仍是农民养地主”！因为基本口粮价低。六口之家，每人每月按二十五斤谷计算，只要十点五元，外边每月寄二十至三十元，什么都有了，仍可不劳动。我认为，用这种办法来对付地、富、反、坏，并不算过分，不这样反而无法说服农民。

四 关于耕牛、农具归谁所有问题

我征求了几个社的大、小队干部和老农意见，他们一致赞成，现有耕牛、农具归小队所有。理由是使用权与所有权合一，更便于增加小队干部和社员对耕牛、农具的保管和养护。过去养护是一种责任，是为了怕受大队处分；现在的养护是一种权利，是为了增加小队利益。这种观念的变化，说明耕牛、农具归小队使用，又归小队所有，这种制度的极大优越性。特别对耕牛繁殖更为有利，过去繁殖小牛只是作价提奖，小队收益少，现在繁殖小牛完全归他所有，要用要卖由他支配，这样对促进繁殖当然好得多。在座谈中也有人提出，耕牛归小队所有好倒好，就是怕牛发瘟，如果死了几条牛，那小队自己担负不起，大队又不能调剂，恐怕影响到小队生产力长期下降。因此，他主张农具归小队所有，耕牛还是不要变动好。当时又有人说，耕牛不是可以保险吗？归小队所有之后，我们就到银行去保险不行吗？有国家、有人民银行保险还怕什么呢？因此，大家才一致赞成耕牛、农具统归小队所有。但最后又有人说，要耕牛发展，还希望商业部门改变对菜牛的收购办法。据他说，他队里前几天将一头牛，按规定送到商业采购部门去卖，采购部门将牛杀了之后，把牛皮、牛头、牛腿、牛骨、牛肚通通不算，只按所杀牛肉二百斤，每斤四点二角计价，得款八十四元，而该队买那头牛是花了一千二百多元，结果陪本一千一百多元。他说，这样的采购办法，不仅私人不愿意养牛，就连小队养牛的积极性也会受很大打击。我认为，这种收购制度确实不合理，这是违反社会主义等价交换原则的，是变相的共产风建议商业部门考虑改变这种制度，以促进耕牛的发展。

五 关于社员自留地与开荒问题

经过贯彻《十二条》^[11]和《六十条》宣传后，龙岩自留地已按百分之五分给社员了，社员很满意。但据群众反映，目前存在三个问题：一是地少人多的城关公社，每人平均只有三分八厘地，按百分之五计算，每个社员自留地不到二厘，四口之家只有七厘多，还不到一分地。这样的地区，自留地应允许超过百分之五，至少每户应有一分自留地。另一问题，是东肖、湖邦等公社，每人虽有五厘自留地，四口之家只有二分地，也已经分到社员手里，但因为晚稻要用烟叶作肥料，各大队要社员在自留地上替大队种一定数量的烟叶，收割后按斤计价给款。这实际上是侵犯社员的自留地。因此，东肖公社规定，今年向社员收购烟叶时，每斤除给价款外，还给四两粮食，明年要社员种烟，应该另拨土地，不要再侵犯自留地。再一个问题，是社员要求开荒问题。在自留地少而荒地又多的队（如城关），开荒可以多一些，社员要求比自留地多一倍到几倍。如自留地数量较大的队（如山区一人有一分以上），则开荒应加限制，限制到相当于现有自留地。但今年只要他不妨碍集体出工，可以没限制，允许谁种谁收，明年再来限制。

六 关于粮食包死产和三包一奖制问题

龙岩各地小队都迫切要求包死产，即实行三包、全奖、全赔。各小队按包产任务，照国家规定标准，留足口粮，按需要留下种子、饲料之外，国家需要征购多少，一次议定，以后增产不增购，减产不减购。这是目前各地（包括广东、福建、江西）农民最普

遍最迫切的要求。实行这种制度可以充分发挥农民生产积极性，这对农业增产将起极大作用，只要农民把粮食产出来，即使少卖给国家一点，他们也不至于大吃乱用，而会用于养猪、养三鸟^{〔12〕}，以增加肥源，同时增加副食品供应，这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是有好处的。我认为应该赞成农民这个要求。当然要照顾到各社队之间有丰有歉，及特大灾情。为此，大队一级在派购时可以增加一些机动粮（如 3—5% 左右），掌握在大队手里，以便照顾歉收队和国家必要时的增购任务。如本大队无歉收队，国家又不需要增购，则将此机动粮留作大队的储备。只要真正把包产落实，真正核定适当的口粮标准和必要的种子、饲料，而大队又控制一部分机动粮，我认为实行包死产办法是利多害少的。至于将来国家要向各大队增购机动粮，我建议，这种粮价应提高到比统购价加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一百，尽可能做到等价交换，以便鼓励农民对粮食生产的积极性。这在苏联已有先例。

至于三包一奖制，我过去是主张超产提成，七、八成归小队，二、三成归大队，以便调剂余缺。现在我赞成全奖全赔，因为如果超产提成归大队，那么无论提多少成，小队干部和社员必然会瞒产，而瞒产又属非法行为，反而增加各种顾虑，以至产生浪费。过去我还设想，实现了粮食过秤入仓之后，可以实行超产提成和增产增购制度，但此次下乡和干部、社员谈内心话之后，才知道粮食过秤入仓，各地并没有真正执行，也不可能真正做到（人力、时间、晒坪、大秤，都不够用）。据说，去年入仓数量，其中很大一部分还是估产数。这种情况不仅龙岩如此，龙溪和汕头专区都是如此。总之，农业生产是手工操作，是野外作业，农作物散处田野，从收割到入仓，中间手续繁多，时间也长，农民瞒产机会很多，办法很妙。这方面除了采取包产，别无出路。所以超产提

成改为全奖全赔，三包改为四包（包工、包产、包成本、再加上一条包上调）这是适合于农业生产特点，又适合于公私两利的一种先进制度。

七 关于供销合作社

我所到之处，干部和群众都希望尽快地恢复起来，即在公社以下和县一级都把供销社重新建设建立起来。

目前的情况是，在农村和城市里，商业部门除了布匹百货以外，一切副食品，如油、豆酱、酱油、咸鱼、海带和红白糖等，都成批地卖给食堂或生产队，再由食堂或生产队配售给社员。人们反映，原来作零售买卖的，现在搞批发，不作买卖的却被迫作买卖。食堂或生产队的好干部，时常因为不会配售，弄得自己赔帐，不好的人则从中揩油克扣，弊端百出，群众怨言很多。另外，商业部门又实行一种“现金责任制”，只需完成卖钱的现金任务，不管商品收付，不管真卖假卖，更不管卖给谁，因此许多市场上缺乏的物资，可以大开后门，私相授受，而一般农民、市民则很难买到。

干部和群众所以同意恢复供销合作社，就是希望改变这些“官商”、“官办”现象，加强群众监督，以便在目前物资缺少的情況下，农村商业能够更好地为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服务。

为了恢复供销合作社，这些地方的县、社领导同志，还希望把原来供销合作社的优秀骨干，尽量调回原来的工作岗位。这些骨干和群众有联系，群众观点比较好，为群众所信任。同时，也需要对现有商业部门的人员，进行必要的整顿，对那些历史不清或者一向有贪污多占行为的分子，应当清洗一批回乡参加农业劳

动。这样，也有利于改变目前农村商业部门机构庞大和人浮于事的现象。

供销社系统恢复后，必须建立严格的会计制度，建立“物品帐”和“现金帐”，改变“现金责任制”。上级社对下级社和代销处，不仅要查对现金出纳，而且要查对物品收付，因为目前国家牌价与市价相差很大，如果只查对现金，而不查对货物，其中贪污舞弊将很难查清。

八 关于农村手工业

也是干部和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一个问题。从龙岩各地看到，原来的许多手工业有的已成为社办工业，有的归县级工业或商业部门管理，但因缺乏原料，绝大部分已停止生产，因而到处喊叫农具缺乏。据了解，各种大小农具一般缺少百分之四十到六十左右，对生产有很大影响。有些同志反映，有些生产队现有的箩筐、晒席、谷桶、粪桶等大、小农具，还不如以前一户富裕中农的多。至于农民自用的小农具，如：锄头、镰刀、耘锄、斗笠、蓑衣等等，尤为缺少。

目前的情况是：一方面原来的手工业工人调动很大，许多农村铁、木、泥水匠，被调到矿山、工厂或建筑部门，急需归队。另外，原材料缺乏，旧有的货源断绝，急需重新恢复。如：龙岩东肖公社的铁业社，因缺乏烧铁木炭，而不能正常生产。烧炭的地方，因为近山木材砍光，无炭可烧，要到远山去烧，加上木炭收购价太低，口粮又紧，所以无人愿去烧炭。再一个原因，就是现有的手工业，没有建立适当的体制，没有专管机构，因而许多问题不能有组织、有系统、有计划地加以解决。

在手工业的体制方面，根据接触到的一些县、社和大队干部的意见，大体上是这样的，即：

1、在农村较大的市镇和县城以上，一律恢复手工业合作社，并在县一级设立专管机构，恢复原来的手工业生产秩序。

2、已经办成社办工业的，或队办小型手工业作坊，可以仍由公社或大队直接进行经营管理，不再单独组织手工业合作社。这样做的好处是，便于与农业生产相结合，便于就地取材，就地推销，在产品质量、价格等方面也易于控制。他们反映，在高级社时期，手工业合作社系统曾经向农村“下伸”，把许多农村匠人单独组织起来，因而和高级社发生许多纠葛和矛盾，到公社化时才统一起来。现在如果重新在农村中把手工业合作社恢复起来，原来的那些纠葛和矛盾，将更加难以解决。同时，这些手工业在变成社办工业以后，也或多或少地增加了一些设备和基本建设，如果重新分出去，不仅实际上有困难，并且对生产力也是一种破坏。此次整风退赔当中，一般都把这些比较定型的生产企业（主要是铁、木、竹等农具制造和修理业）保留了下来，干部和群众都希望不再变动，以利于稳定生产。

3、至于生产大队以下的零散手工业工人，现在为数极少。这些人历来是半农半工，农忙种田，农闲作工，替农民修修补补，随叫随到，便于生产，便于农民。因此，也不需重新集中组织手工业合作社。

4、但是，对于社办工业或队办小型手工业作坊，应另设专管部门，负责供应当地不能解决的原材料，负责进行某些产品的销工作，以便保证他们能够正常生产。

九 关于山林问题

我这次回家，一到适中^{〔13〕}边境，便沿途看到林木大量砍光，路旁堆积腐烂木材很多，火烧山很多。以后回到我家邓厝，后龙山也被砍个光。为什么这几年会造成这种严重局面呢？据社队干部和社员反映，主要原因：

首先，是林权不固定，山林无人管理。东肖公社的后田、龙泉等大队，在过去山林是由各族公堂所有，有专人看管，谁都不能侵犯。解放后按村分片，划界占有。高级社时族有山林转归社有，各社都有保护山林的具体规定。自从公社化以后，年年并社并队，体制经常变动，山林成为“大公家的，人人都有份”，谁砍归谁，发生火灾却没人救。

其次，是林木大平调。一九五八年东肖公社在后田建立了水电站，开设锯木厂，把原属后田所有的大片松林基本砍光。据该处林场同志说，每年采伐三百多立方米，二十个专业工人，工资都靠这片林木收入开支。去年贯彻《十二条》以后，上面说给山价，大队要几次，才给一百多元，以后如何，尚无下文。龙泉大队在一九五八年大炼钢铁时，被砍了松木二十二万四千株，其他基建零星用材更没有数。去年处理退赔，只按一株一角钱计算，退赔二万二千四百元，但现在才兑现二千五百元。乱砍伐，作价低，退赔少，这种共产风当然严重地破坏了山林所有制。

第三，是国家林业部门过分采伐。据叶飞^{〔14〕}同志说，去年林业部要福建采伐木材一百九十万立方米，本省自采一百一十立方米，今年又要他采伐三百万立方米，加上省用，要伐四百万立方米，这样大的任务，福建无论如何担负不了，但林业部门为了

完成国家计划，硬要他接受。现在还未议定。因为任务过大，当地劳力不足，林业部门就从北方和沿海调来工人，组织专业队自行伐木。这些专业队担负任务大，时间急，又无伐木经验，一进山林见树就砍，见笋就挖。进山之前也不和公社大队商量，也不找本地人指引。为了减少成本，到处都采用剃光头办法，不分大树小树，竹木、杂柴，通通砍光，小树不砍的也被大树压伤。因为采伐只负责采伐，无锯材设备，大树砍下来，不能锯，无法运，就放在山上，让他腐朽，浪费损失很大。

第四，由于山权不定，国家和公社乱砍，社员也就各自下手。龙泉大队干部在三月份到各户搜查了一次，搜出了一百多株杉木，大的碗口那样粗，小的只有一、二寸直径，社员在自留地里搭瓜架，插篱笆，都用小杉木，真是令人可惜。据说，社员私砍杉木一天可砍三至五株，到自由市场出卖，每株可得四至五元。在前时期生产队劳动管理制度松弛，社员不很好出工，伐木私卖现象很多。竹山更是大挖其笋，又吃又卖，只顾眼前，不顾后果。老农对我说：“这样下去，将来连做蒸笼的木材，编箩筐的竹子都会找不到了”，情况严重可以想见。

第五，由于近山林木砍光，社员副业门路断绝，给生产、生活带来困难。我家上邓厝四十多户人家，原先有二十多人专做犁柴（即犁的木架）、扁担等农具，现在只有六人在大队集体搞，其余因到深山采料有困难，不能再做犁柴，原来手艺等于报废。我家下邓厝，一向以上山砍柴、烧炭为副业，现在断了副业门路，只靠大队分配，每人一年不到三十元收入。此外在生产上缺少农具，也得不到修理添置。

如何改变这种严重情况？经征求干部和老农意见，大家认为，应迅速采取下列措施：

（一）林权要随公社体制调整，除国有林划归社管以外，原属高级社所有的山林，应立即归还大队所有。大队所有山林除远山外，应一概下放给小队长期负责管理，并规定山林产品分成办法，划分以后分片划界，各管各片，谁也不得侵犯。以前被砍竹木，一律清算，作价彻底赔退，作价过低者另行作价。

（二）国有山林和公社所有山林，除了大片远山群众不要的，可以考虑设林场专业队专管以外，其余大部分山林靠近乡村的都应划给小队长期经营。订立联营合同，规定以后山林出产提七、八成归小队收入，以为报酬。

（三）没有林木的荒地，以及被砍光了的山头，应分给各个生产队所有，由生产队根据需要，规划种植林木、油茶、水果、茶叶、竹林等，以后山林收益，全归小队。

（四）以后国家或公社要采伐木材，必须事先商得所有者同意，双方订立合同，议定山价，才准进山采伐。木材采伐应尽可能雇佣本地有经验的人，由小队负责采伐，如各小队劳力不足，需要用外来专业队采伐时，也须有本地有经验的人参加，并商定采伐规则。禁止剃光头的“皆伐”做法，违者以破坏山林论处。

（五）对柴山下放问题。因为东肖大队不大，一个大队多系聚族而居，共住一个村庄，下分若干小队，所以群众只要求柴山归大队所有，归小队管理。由社员照历来老例，进山砍柴自烧或出卖。当然那些小队自成一个村庄的则要求划一定柴山归他所有。至于社员自留山，群众则要求将靠近屋后的山林或荒山按人口划一定范围（如一人二、三分或一户一、二亩）给各户管理，由他们自己经营，种竹木、种水果都可以。

此外，还有果树问题。我此次到了岩城东门外，这是龙岩枇杷、红心李子的著名产区，但这次我所看到的果树，一个枇杷、李

子也不结，当时问了群众，才知道所有公私果树都收归大队所有，小队不能管，而大队又无专人管理。因此，所有果树都不结果。这种情况是极为严重的，以后我到城关公社开座谈会时，把问题提出来，大家一致赞成，将果树管理权分别下放，成片果树如系小队所有，则仍归还小队，如系大队所有，则归小队管理。社员屋后少数果树可交原主负责管理，不论小队管理也好私人管理也好，都采取长年三包办法（例如三、五年或五、六年包一次），包产指标可以低一些，并采取包死产办法，超产部分全部奖给管理单位，作为报酬。至于社员屋前屋后零星果树则照《六十条》规定，归还社员私有；作为自留树，数量多少，由小队社员民主评定。这个办法对水果生产有很大好处，我认为可以推广。

十 关于社队规模问题

龙岩是个山区县，全县人口二十万多一点，行政区分，从明朝嘉靖年间起，就划为六坊（即城关区）十八社，苏维埃时期按社设区，一九五七年撤区并乡时，划为二十六个大乡，一九五八年公社化时按原大乡成立二十六个人民公社，一九五九年并为十三个社，一九六〇年春又并为七个公社，特别是城郊公社将原七个公社，合并为一个公社，社员五万多人，大队规模也很大。这不仅大大增加了管理上的困难，而且把穷队富队勉强凑在一起，大大增长了平均主义，大刮共产风，破坏了三级所有制^[15]，打击了农民生产积极性。这是造成二年来龙岩农业大减产的重要原因。今年四月初，福建省委召开了三级干部会，传达《六十条》精神，龙岩县委拟定仍照一九五七年大乡规模，将全县划为二十六个公社。我回去后，找到县委商量，又将原来由漳平县划过来之中甲大队

（全大队在一九二九年以前是五、六百户，以后因为革命，受敌人摧残，人口大量死亡、外逃，现只一百五十八户，地区很广）划为一个公社，连前共划二十七个公社，这样划法，省、地、县委都同意。但公社何时划分？早划还是迟划？从上而下划，还是从下而上划？大队按什么标准划？小队范围多大？这些问题大家意见不一。因为当时正是春耕大忙季节，一般主张迟到春耕以后再划，我当时也无法说服他们，只得决心先下去了解情况以后再说。因此，我便于四月二十日回到东肖管理区，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当时到会的有管理区主任，各大队长和支书，有地、县委书记和城郊公社社长，另外有几个老农参加。

这次会议首先肯定了东肖应立即成立人民公社，因为东肖原是城郊公社一个管理区，把管理区改变为人民公社，只要把社长和党委书记人选决定，挂上一个招牌就行，这对春耕只有好处，并无坏处。这一条，地、县委书记和城郊公社社长都一致同意，便当场决定，第二天就由县委确定代理社长和党委书记人选，而宣布公社成立。

其次，讨论了大队如何划分，当时各大队干部都在宣传《六十条》时事先征求了小队长和群众的意见，一致认为原大队太大（全东肖只有十三个大队，有几个大队在五百户以上），主张按一九五七年原高级社队规模划为十九个大队。当时我建议将我家乡邓厝上下村合为一个大队（原系两个高级社），我把这个意见询问我村里几个老农，他们开始不吭声，以后我再问，他们说：“上级怎样决定就怎样办”，这句话显然是不同意合并的间接表示。后来，我另外找人谈话，才知道上邓土地多、劳力强，又有特殊副业收入；而下邓土地少、劳力弱，又无副业，要照顾的人比较多，这样的经济情况当然不能勉强合在一起。同时，各大队长都说《六

十条》规定大队干部不脱产，如果大队不划小，将来大队干部谁也当不好，因此这次会就初步确定东肖划为二十三个大队。

再次，是讨论大队何时划？各大队干部主张立即划开。他们说，过去把穷富队拉在一起，统一分配，社员积极性提不起来，干部也不好当，现在春耕正需要依靠社员的积极性，宣传了《六十条》，社员和干部都知道迟早要分，大家三心二意，工作不好办，因此迟划不如早划。他们一致要求马上划，并把过去办高级社有经验的社员所欢迎所信任的老干部从别乡调回来，说定三、五年不变。这些老干部是在一九五八年秋后出去的，一九六〇年初反瞒产又普遍把大小队干部彼此对调，叫做“回避本籍”。这些外调干部，身在异乡、人生地不熟，工作搞不好，加上工资低，家小在本乡照顾不到，因此“人在他乡心在家”，普遍不安心，现在也需要调整。因此，当时就决心在三五天内马上把大队划好，干部由各大队提出名单，报经县委批准到职。

最后，各大队干部和老农又提出插花地问题。这是公社化时将几个高级社并成大队以后，大队将原高级社彼此犬牙交错的插花地加以调整，在调整中有些队的好田被调走了，却调进了瘦田，现在又按原高级社划大队，因此他们便提议被调出的插花地仍归还原有高级社，以尊重土地所有权，彻底克服共产风。当时有几个老农说，土地是农民生存的根本，我们不比你们干部，你们有国家发工资，我们靠土地吃饭，把好地调走了，我们以后靠什么生活？这个提议大家马上同意，作了决定。但各大队又问这个决定何时执行？大家意见插花地等到秋后再动，现在应该仍归现耕队负责，不能调动，以免妨碍春耕生产，但需要立几条章程，防止现耕队秋耕时过分剥削土壤肥分，破坏地质。这几条章程：（一）是禁止水田下硫磺；（二）是限制水田下石灰数量；（三）是

规定割禾时留一定高度的禾头；（四）是留一定稻草回田。这四条也当场通过，大家很满意，认为这样办大队马上分开，对生产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东肖这个经验，以后也推广到其他公社。

关于大队规模问题，在湖邦也遇到同样情况。湖邦原是小池公社一个管理区，现划为一个公社，原有十四个大队，现在也按照一九五七年高级社规模划为二十四个大队。其中有一个上邦大队，系由石碑前、东洋、曹曹庵、刘坑四个高级社并成的共四百多户。石碑前（二百多户）、东洋（一百多户）是大村，其余两个小山村，曹曹庵只十八户、刘坑只十一户，实在太小。公社同志要他们仍合为一个大队，但两个小山村坚决不同意。原因是这两个村农民除粮食可以自给外，尚有手工业收入，每年可产三千多担土纸，前两年与那两个大乡合并为一个大队，所产土纸收入被大队统一分配，他们吃了大亏。以后他们就消极怠工，现在还有几千担沤好的竹麻未做成纸。这样经济情况穷富悬殊的村庄，当然应该从大乡村分离来。因此，我与县委同志同意他们分开。这两个山庄经济条件虽然一样，但各在一条山坑，距离很远，合为一个大队也不方便，因此又允许他们各自成立一个大队。这是目前龙岩最小的两个大队。但这样划是合理的，这对克服平均主义，对发展生产是有利的。划开之后，这两个山庄的社员，果然热情高涨，欢天喜地。据说，大部分社员当夜就搬回去，（一九五八年移民并村时被移到大乡村居住）整理竹麻，准备做土纸，这说明只要真正按《六十条》原则办事，群众生产积极性是可以很快调动起来的。

关于小队规模，各地干部和社员意见都要求划小。小队之所以要小，是因为农业生产的分散性、野外作业、畜力耕耘、手工操作这几个特点决定的。小队又是管理农业生产的基层单位，农

民说，如果小队太大，耕地面积太广，一来干部管理水平跟不上，二来人畜下地，来回走路，费时吃力，粪肥挑送，稻草搬运，也浪费时间。因此，小队一般以二十户左右为宜，地少人多的队可以编到三十户左右。一般小村庄一村一队，大村庄一村数队，有些小山庄六、七户人家也可以划为一队，至于遥远山庄只一、二户居民者则可采取包产到户的办法。

一个大队之下编几个小队比较适宜？各地大队干部的意见，首先要看大队规模大小和村庄远近来决定。但他们一致认为，以后大队干部不脱产，而大队与公社不同，大队是基本核算单位，对小队领导要具体、细致，又要及时。因此，他们主张一个大队最好划为五、六个或者六、七个小队，较便于领导，最多也不要超过十个小队。

以上报告，所提观点、做法，是否妥当？望指示！

注 释

〔1〕 一九五八年三月成都会议后，农村中出现把小型农业合作社并为大社的热潮，受到毛泽东的肯定和支持，并于八月被定名为人民公社。同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人民公社未经试验就迅速在全国普遍建立起来。人民公社以“一大二公”为特点，实行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原则，一般为一乡一社，个别的一县一社。公社内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管理，贫富拉平，平均分配，无代价上调下属生产队以至社员个人财产，导致“共产风”严重泛滥。一九五八年冬以后，特别是一九六一年春以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曾经为人民公社制定了一系列政策界限，陆续纠正了一些错误，但未从根本上解决人民公社所存在的过分集中与平均主义的问题，农民积极性和农村生产力仍然受到束缚。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民公社原有的体制在农村经济体制改

革中逐步改变。一九八三年十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设立乡政府的规定，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至一九八四年底全国基本完成这项工作。至此，农村人民公社制度不复存在。

- 〔2〕 王录，当时任中央农村工作部二处处长。
- 〔3〕 《六十条》指一九六一年三月中共中央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全文共六十条。条例草案针对人民公社内部严重存在的队与队、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在纠正社、队规模偏大，公社对下级管得太多太死，民主制度和经营管理制度不健全等方面，作了比较系统的规定。同年五六月间，中共中央又对这个草案作了修改，制定了供讨论和试用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进一步规定取消分配上的供给制部分，停办公共食堂。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人民公社六十条的贯彻执行，对恢复农村经济起了重要的作用。
- 〔4〕 郑州会议指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中共中央在郑州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会议规定了十四句话作为当时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
- 〔5〕 指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错误地批判彭德怀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反右倾运动”。
- 〔6〕 柯老即柯庆施，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
- 〔7〕 “五风”指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期间猖獗一时的“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特殊化风、强迫命令风。
- 〔8〕 供给制指农村人民公社成立初期在分配方面对社员群众实行的主要是免费供给口粮或伙食的制度。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党的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规定：农村人民公社“在分配给社员个人消费部分，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由于

实际上生产并没有很大增长，供给部分在分配中所占的比例很大，工资部分所占的比例很小，不能体现按劳分配原则，所以这种在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严重挫伤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中共中央在一九六一年五六月间制订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中，取消了供给制。

- 〔9〕指苏维埃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
- 〔10〕一包两照顾，即包五保户，照顾人多劳少的困难户和劳力有病伤的困难户。
- 〔11〕十二条指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三日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共十二条。指示信指出，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严重地破坏农业生产必须坚决反对，彻底纠正。指示信规定：农村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里的队是指当时的生产队，一九六一年起改称生产大队，原来的生产小队改称生产队；一九六二年二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把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大队改为生产队）；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和认真执行劳逸结合等。指示信对纠正“共产”风，扭转农村局势，起了积极作用。
- 〔12〕养三鸟指鸡、鸭、鹅。
- 〔13〕适中即龙岩市南部的适中镇。
- 〔14〕叶飞，当时任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
- 〔15〕三级所有制，指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三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中规定，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至少七年不变。三级指公社、大队、生产队。

关于林业工作的几个问题*

(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二日)

一九五七年以前我是经常抓林业工作的，但未到过林区做调查研究。而从一九五八年以来又一直患肝炎，三年多来工作不大清楚了。因此，今天只能讲些一般性问题。

一 林业工作的重要地位和基本任务

林业工作在国家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处的地位很重要。首先是因为木材是国家建设不可缺少的重要物资，同时，也是人民生活、生活不可缺少的重要物资。没有木材供应，或者供应不足，将影响国家基本建设，也影响人民的生产生活。

其次是，森林面积比重的大小，是决定每个国家气候好坏和农业生产丰歉的重要关键。一般说来，森林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百分之三十以上，这个国家的气候就比较正常，灾害也较少，因此，农业就能够获得丰收。否则气候就不正常，农业生产就会经常遇到灾害。据一般调查，我国的森林资源面积只占国土总面积的百分之七点六，不到百分之十。因此，我国经常发生灾害，不

* 这是邓子恢在东北、内蒙古林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是旱灾涝灾就是风暴灾害，农业经常歉收。从我国各地区来说也是这样，东北的森林面积比较大，以黑龙江来说，森林面积比重占百分之二十八，所以灾害不是那么厉害，旱灾少。可是，华北、西北地区就不行了，年年遭灾，特别是旱灾厉害，而下雨多了一点又是洪灾涝灾，这是因为没有森林。华北、西北由于几千年战争的关系把森林破坏了，现在未恢复，到处是荒山，不能涵养水源，稍不下雨就旱，稍一下雨就洪水成灾。

再次，还要看到，现有森林资源的开发，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资金积累的重要来源，也是农民生产生活的重要来源。所谓靠山吃山，山林搞好了是个万宝山。像东北这样的山林富得很，不光有木材，还有其他许多东西。

从以上几方面看来，可以知道，林业工作在个国家建设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因此，关于林业工作，我认为应提出三大任务：

第一是大力护林、造林、育林，来保护和培养森林资源，以便保持水土，涵养水源，调节气候，以保证农业丰收，促进社会主义建设大发展。林业不同于农业，农业是当年生产当年收效，林业是几十年、百年才能成材。因此，林业头一个任务是造林、护林，培育森林资源。这是国家建设的根本大计，是子孙万代之业。

第二是木材采伐。林业部门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木材采伐，不仅要满足国家建设用材，还要尽可能满足民间用材的需要，因为所有的人民生产、生活都离不开木材。

第三是林业部门今后还要担负起吸引人民上山，全面开发山区的任务。我国农业最大的缺点是耕地不足，现在全国耕地不到十六亿亩。按全国人口计算，平均每人只有二点二亩地，按农业人口计算也不足三亩地。但山区却有极其丰富的资源，不仅有大量木材，而且还有大量土地可耕，山上还有很多木本粮食，木本

油料，野生纤维，药材土特产等。此外，还可以经营畜牧业。因此，要发展农业生产，除了种好现有耕地以外，还必须动员农民上山，全面开发山区资源。最近中央提出号召人们上山，不仅要城市人口下乡，还要动员人民上山。我们这几年来相反，是山上人下乡，乡下人进城，这是一种逆流，是个错误方向。今后的方向应该是城市人口下乡，乡下农民上山。这几年人口增加得很多，粮食、副食品供应都很紧张，一九五七年全国人口是六点五亿，农民是五点五，城市人口将近一亿。那时候是五个半农业人口供应一个城市人口，加上一九五七年农业比较丰收，所以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五八年上半年的情况比较好，供应比较正常，不那么紧张。到一九六〇年底，全国人口是六点七亿，农民五点三亿，城市人口近一点三亿，包括集镇人口一点四亿。这就是说，不到四个农业人口供应一个城市人口，再加上几年农业受灾减产，问题就突出了，供应异常紧张。现在出路何在？中央工作会议^{〔1〕}决定，要压缩城市人口，城市人口下乡，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但这还不够，还必须加一个上山，开发山区。这是我国发展农业生产的一条出路。开发山区的意义大得很，不仅是现在，还要从长远着想。我国人口繁殖率高，关内冀、鲁、豫等省人口密度太大，必须适当移民。东北这个地区，有广阔的山区和平原，又没有民族问题，我想，东北现在有五千多万人口，将来发展到一亿人口毫无问题（黑龙江四千万，辽宁、吉林各三千万）。帝国主义说，中国人口是个大问题，要找出路，他们肯定中国要向外发展，要向东南亚发展。当然，这是故意造谣，我们不需要向外发展。但，我们人口多也是个问题，除了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以外，还要开发山区，开发东北，这个地方可以安置很多人，可以使关内人口不至于太多。因此，我认为，林业部门应该担负起这个光荣任务，吸引人们上

山，开发山区资源。一方面便于林场建设，另一方面又帮助国家解决移民问题。因此，应该把这个任务列为林业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

二 关于轮伐区制度问题

这个问题，早几年曾经有过设想，但没有实行。这次会上讨论得很好，不仅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肯定了这条方针，同时也提出了实现这一制度的若干措施。这是我们林业工作转折的关键。过去我们感到最头痛的，一是国家需要用材尽量砍伐；二是更新跟不上。这样，很容易把森林破坏，也破坏了水土保持，这是非常危险的，当前利益不能很好地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如果轮伐区制度真正建立起来，这个矛盾就可以解决。首先我们可以把木材采伐与造林工作结合起来，可以砍一造二、造三。这样就不致破坏水土保持，既照顾了当前利益，又照顾了长远利益。过去几年来，没有实行轮伐制，林业部天天挨骂，说林业部不做好事，把树林砍掉不更生，破坏了水土保持，造成农、林矛盾。如果把把这个制度建立起来，这个矛盾就可以解决。其次，建立轮伐区制度，可以把林场固定下来，林业工人定居后就便于农、林、牧、副相结合。现在的情况是，林场把这块林采完了就搬家，刚刚建立好，又得搬家。这样林业工人苦恼，林业干部也苦恼，同时，对国家经济建设来说也是浪费的。如果轮伐制度定下来，林场固定下来，一方面可以搞木材综合利用，提高木材利用率；另一方面还可以搞农业、牧业和许许多多的副业。同时，还可以贯彻经济核算，这就做到了合理地利用森林资源。再次，实行轮伐制后，职工在山上定居了，又吸引了农民上山，这样护林防火问题也比较容易解

决。山上有人，就可以护林防火，不管职工也好，农民也好，职工家属也好，只要有人就好办。当然今后还要进行护林防火的基本建设，比如购置直升飞机，建立防火队伍等。也还需要部队和空军的帮助。但如果我们山里有人，山区真正开发起来，就会将临时调人的现象慢慢减少。因此，开发山区对护林防火将起到很大作用。

如何实现轮伐区制度呢？首先要确定规模，是以林场为单位，还是以林业局为单位？同志们的意见是以林场为单位，我个人的看法，这样是比较合适的。究竟怎样搞法，这是一个新的工作，可以先搞个典型试验，然后再把它定下来。我认为，尽可能在今冬明春把轮伐区划好。怎样划？我想，要因场制宜，划一条极限线，按照国家需要和实际可能，确定轮伐期的年采伐量。在国家特殊需要时，最高可以采伐多少？规定最高采伐限度还得考虑两点：一个是采伐多少立方米；一个是采伐多大面积。规定了采伐面积就是要使更新跟上采伐，天然更新难于把握，人工更新还是要跟上的。如果不这样做，将来必然把大面积森林破坏，必然影响水土保持。有了这条规定，每年就可以安排采伐多少公顷，更新多少公顷。当然不是完全一比一，但也要保持一定的比例。

有了极限线，大家就要保护这个极限线，上边要保护，下边也要保护。这不仅是保护森林资源，同时也是保护农业。采伐过量，造成水土流失，不能起到涵养水源调节气候和保持水土的作用。这次我经过吉林的时候，吴德同志⁽²⁾讲，小丰满水电站的水库蓄水量减少，影响了发电；可是到了雨季，洪水的到达时间比过去快了。这和长白山林区采伐过量有关系。完全归罪于它不行，但总有点关系。李范五同志⁽³⁾说，他过去在哈尔滨念书的时候，松花江水是绿的，现在是黄的，有点象黄河的味道。当然没有黄河那

样严重。黄河为什么黄，就是因为没有森林，没有保持住水土。这个问题要引起我们大家警惕啊！如果长期这样搞下去，将来再过一、二百年，我们的子孙后代要骂我们的。为了子孙后代着想，我们一定要实行轮伐区制度，要保卫划定的极限线。当然，这与国家当前任务有矛盾，去年全国生产木材四千多万立方米，东北、内蒙地区是二千多万立方米。今年原计划三千九百万立方米，现在压到二千二百万立方米，东北、内蒙地区是一千二百万立方米。从这些数字看来，木材不能满足需要，虽然今年的任务减下来了，三年内还是要逐年增加一点的。因此，各林业局、林场，趁这三年任务比较少的机会，尽可能安排些基本建设，开发新林区。我们要求不是采伐量减少，而是要求把采伐区扩大。这样，政策和任务的矛盾就可以逐步解决了。既完成了国家的木材生产任务，又能实行按轮伐期进行生产，合理经营利用森林资源。

三 关于提高木材利用率问题

这个问题是林业工作的重要问题。一九五七年前，各方面都反映木材浪费，有的地方木材利用率在百分之六十以下，而苏联是在百分之八十以上，据说瑞典、挪威木材利用率在百分之九十以上。我们还不到百分之六十，有的还在百分之五十以下，这是森林资源的最大浪费。当然，这不能完全怪林业部门，国家要的多，基本建设跟不上，结果大木材运下来了，小材丢在山上。但大大提高木材利用率，这个问题是必须解决的，这是林业部门很重要的一项任务。任何一国家的木材利用率高，是衡量森林工业工作好坏的标准。我们的森林资源不足，如果不提高木材利用率，就不能解决国家当前需要与长远利益的矛盾。

如何提高木材利用率？首先，就是要大材小材，优材劣材，都利用起来，做到“物尽其利，材尽其用”。枝桠、梢头木、小径木都不能丢在山上，都要利用起来。其次，把采伐与加工结合起来。在山场上把一些不便运输的木材加工成半成品，既可提高木材利用率，又能节省运输力。再就是在山场搞胶合板、纸浆等加工。现在很多地方造纸用好木材、大木材，这是大浪费。在山区里用枝桠造纸浆，运下山造纸，可以大大提高木材利用率。此外，要同城市手工业结合起来，订合同，订规格，充分利用小材。再次，把采伐与锯材结合起来，不要机械地分工。我在福建看到山上丢掉很多木材，特别是大木材运不下来，霉烂了很可惜。如果在山上锯成板子，就便于往山下运了。要提高木材利用率，必须解决运输问题。因为生产了小材，运不下来还是不能利用，因此，要解决木材采伐与运输的矛盾。这是提高木材利用率的一个重要关键。

四 关于森林更新问题

关于森林更新问题，这次刘少奇同志指示得很明确，他亲自作了调查研究，看了许多林场。森林更新是林业工作最根本的任务。只砍不育，总有一天会把森林砍光了，破坏了水土保持。因此，要提出这样的口号：一切为了更新，采伐必须要服从更新。采伐时一定要注意不损坏小树，不破坏水土保持。采伐要服从更新，采伐要与更新相结合。过去采伐的多更新的少，实行轮伐制以后，采和育两个任务放在一起了，这对更新有好处。今后要建立采伐与更新结合的制度，采伐要处处为更新创造条件。

森林更新工作要采取人工更新与天然更新“两条腿走路”的方法。人工更新要有个条件，应该是交通便利，土质好的地方，选

择优良树种，进行人工更新。天然更新要与封山育林相结合。解放以来，封山育林有很大成绩，现在有些新生长起来的大片林子，就是解放后执行封山育林政策的结果。所以天然更新必须加上人工促进，封山育林就是人工促进的一种。封山育林再加上抚育，林子就长起来了。过去封山育林的毛病，是只有封山，没有开山，没有因时制宜。应该是在一定季节封山，在一定季节开山。哪些林子该封，哪些林子不该封？哪些树可采，哪些树不准采？这样做封山育林的成绩就会更大。

采伐要服从更新，采伐方式也要注意。现在一般是采用带状皆伐的方式。不论皆伐或择伐，采用哪一种方式都必须注意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经济核算，但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是要服从水土保持，从便于更新出发。核算是当前利益，水土保持、森林更新是长远利益，不能顾了当前利益，违背了长远利益。

五 关于工资政策问题

这个问题，刘少奇同志指示得很明确。采伐工资要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大径木和小径木、远地和近地、易砍和难砍，在工资定额上都应有所不同，应采取“几包、几定”的包工制。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伐木要有一定规格和标准，按标准办事，不准乱砍。采伐后要进行验收，不合理的要受批评，甚至处罚。

关于造林工资问题，林业工作条例中规定得不清楚。我认为，造林与农场差不多，都是手工操作，野外作业，受自然界影响很大，这与工业生产不同。工业是机械操作，室内作业，工业可以采用计时工资，等级工资制。造林则应该仿照现在正在改正中的农场工资制度，即采取计件工资制，并与超产奖励相结合。最好

造林不采用工资制，而采用包工制，即划定造林地段，由承包人包栽、包活、包成林，议定给总报酬多少，分几年发给。在幼林期间准许承包人在林中间种农作物，收获归己，将来成林后再给一些奖励金。

谁来造林呢？我想：第一种力量是林场职工；第二种力量是职工家属；第三种力量是进山的农民。划一片山地包给他们造林，包栽、包活、包成林无论是职工、职工家属，或者农民包造林，都应该签订合同，一片一片地包给他们，林子长起来后，仍由他们经营保护。

六 关于木材价格政策问题

砍下木材利用不合理，大材小用和优材劣用的现象很普遍。造房子、盖工厂，都要红松，不管做什么用，都用好木材。今后要在木材价格上限制木材使用的浪费。当然价格不是林业部门确定的，但你们可以提意见，请国家价格委员会决定。大材和小材，好材和次材、劣材，价格都要有所区别，价格高低之差距要放大一些。调拨价与市场价也要分开。同时，要建立木材公司与行栈制度。一九五七年以前有木材公司，一九五八年撤销了，现在要恢复起来。过去木材公司归林业部门管，今后还要归林业部门领导。木材的分配，一部分通过调拨来供应各国营企业的需要，同时也要有相当一部分木材，通过买卖的形式来分配。买卖有三种形式：第一是木材公司，按国家规定的牌价出售。第二是行栈（南方叫木行，北方叫栈）。这是一种远距离交易的形式，木行代买代卖，在买主与卖主之间起媒介作用。通过行栈买木材，不按国家牌价，可由买卖双方议价。这种行栈是大批交易，不是零星买卖。最近

商业部门向中央汇报，在天津、武汉、上海等城市又建立起行栈，有的叫交易所，有的叫信托公司，有的叫货栈。可否考虑，在这几个省（区）也建立这种交易形式，出售木材。第三是自由市场。群众自己生产的木材或木制品，拿到自由市场上去卖。过去北方不多，南方很多，群众自己生产的木制品、竹制品，拿到市场上去卖，这对满足群众的需要起很大的作用。

七 关于山区粮食自给问题

山区的粮食自给，这是当前和长远的基本方针。山里人靠山外供应粮食，势必增加和扩大了工人和农民之间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扩大山区人口，吸引人民上山，必须从现在起力争粮食自给。当然，这不是今年或明年就能办到的事，但要有这样一个方向。有的地方可能在一、二年内达到粮食自给，有的地方可能需要三年，或者更长些时间，但总要争取达到自给。同时，蔬菜肉食等副食品也要达到自给，不用山外供应。这样可以减轻国家的负担，缓和工农之间的矛盾。因此，今天要吸引人民上山，就是要减少国家的粮食供应，缓和工农之间的矛盾，巩固工农联盟。这是国家的根本大计。所以，要提出山区实现粮食自给，无论如何要确定这个方针，今天要下大决心，不下决心你们将来就会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

可不可能做到呢？我认为，是完全可能的。首先，山区有可耕之地，同时，在林地里还可以实行林粮兼作，种苞米、高粱、大豆。此外，山里还有很多木本粮食，木本油料，如橡子、榛子、核桃等。关内还有板栗、柿饼，很好吃，营养价值很高。山里有许多东西可以作代食品。还有野生纤维，不仅有吃的，还有穿的。山

里还可以发展畜牧业，饲养羊、牛、鸡、兔等；还可以狩猎，打黄羊、狍子、野猪等；有些地方还可以捕鱼。山区资源很丰富，自己生产比靠外地供应好得多。其次，林场有机械，可以用拖拉机开些地，给职工家属们耕种，以后还有农民进山，劳力是可以解决的。因此说，有充分可能达到粮食和副食品自给。只要努力，三年后完全可以达到。当然也会有些困难，但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用什么生产方式达到自给？主要是刘少奇同志所指示的，全民、集体、个体三种所有制相互结合。林场可以办小农场，也可以搞小集体生产和个体生产。林场用拖拉机给职工家属和进山农民开荒，地种了归小集体所有，按劳分配，国家不派公粮，不派统购，由他们自给自足。另一种是个体的，让家属和农民种自留地，开点荒。平原地区每人三分自留地，林区可以给五分，或更多一些。我想，只要大家有计划，真正下决心去搞，不一定用三年，一、两年就可以达到自给。

八 如何吸引人民上山

如何吸引人民上山呢？是采用移民方式，还是让他们自己投亲靠友来好？根据全国各地经验，还是让他们自己来好。实行轮伐制度后，林场定居下来，职工先接家属，安好家，以后再找亲朋来，这样亲串亲、邻串邻容易巩固。他们来了之后，要帮助他们盖点房子。林区有木头，可以送给他，或者廉价卖给他们。另外还要用拖拉机帮助他们开荒，并给些农业贷款，可以不要利息。

要吸引人民上山，开发山区，同样要有三种所有制。因为山区居住分散，有二十到三十户居民，就可以让他们成立一个生产

大队，独立核算；如只有三到五户人家，可让他们先搞个体，或者包产到户，自负盈亏，以后人多了再搞集体生产。另外，有一部分还可以参加林场搞更新造林，林场把林地划给他，包栽、包活、包成林，造林工资分期支付。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多种多样，这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在全民所有制领导下，搞些小集体、小私有，对社会主义经济，只会起巩固作用，不会起破坏作用。国家对这些上山的农民，要采取一系列的优待政策，比如不征公粮，不派统购，帮助修建房子等。就是将来生产多了要派购也要多留少购。根据这样的方针，以林场为基础，山区慢慢就会发展起来。明年春天就可以开始，有条件的地方现在也可以。这样，在几年之内，把山区大大发展起来，对国家建设有很大好处，对林场也有很大好处。

今天我讲的，不一定对，只供同志们研究参考。

注 释

- 〔1〕中央工作会议指中共中央于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一日至六月十二日在北京举行的工作会议。会议除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外，还制定了《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售的九条办法》，规定在一九六〇年底一亿二千九百万城镇人口的基础上，三年内减少城镇人口二千万以上。
- 〔2〕吴德，当时任中共吉林省委书记。
- 〔3〕李范五，当时任中共黑龙江省委副书记。

关于农村人民公社 基本核算单位试点情况的调查报告*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我于十月二十四日离京南下，二十八日晚安抵龙岩，经过郑州、南昌时听取了各该省委农村工作部关于基本核算单位试点情况的汇报，到岩后又派工作组在白土、后田、邓厝、孟头诸大队及连城新泉北村大队试点，现试点已大体结束，发现了许多问题，取得了不少经验。兹将试点中所发现问题和处理办法报告如下：

一、对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各级干部和群众一致拥护。认为这对克服平均主义、官僚主义，贯彻民主办社，勤俭办社，调动社员积极性，发展农副业生产都有极大好处。但也有少数大队干部感到权力受到限制，思想上有抵触；小队干部和群众也有一部分过去在大队统一分配中占了便宜的人，主张维持现状不再改变。这些人经过说服，经过大多数群众通过，也只好赞成。

二、在体制下放后，对小队规模一般都作了调整。除了原来

* 这是邓子恢对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调查、试点后，写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调查报告。中央认为“邓子恢同志这个报告很好”，批转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要求各地“认真调查研究，对具体问题作出具体分析，而不是抽象的主观主义的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并建议“各省委第一书记带若干工作组，采取邓子恢同志的方法，下乡去，做十天左右的调查研究工作”。

规模很小的大队（如三十——四十户）不再分小队外，一般大队所属小队都比前增多了。如后田大队由原来七个队划为十个队，邓厝大队由四个队划为五个队，新泉北村大队则由十个队划为二十七队。这是按照一九五六年初级社规模划的。一般是二十户到三十户左右，也有十几户的，群众认为这样划合理。而体制下放后的大队，多管辖一些小队，在领导上也并无多大困难。但也有许多群众存在越小越好的偏向，这些人认为队小了生产好管理。有些人则因为对现有小队干部不信任，因而要求分队另选别人。也有一部分人企图把小队划小后将来可以进一步实现单干。因此，今后我们对小队划分便定了几条原则：首先，确定现有小队基本不动，个别调整。其次，有些小队范围太大，需要划分者，规定小乡村一村一队，大乡村一村数队，但小队以三十户左右为宜，最少不得少于二十户。再次，应授权公社，各小队划分应经过公社批准，未批准前不得擅自划分，以免引起混乱。

三、小队改划以后，土地调整也有几种情况：如河南密县、福建连城之新泉北村大队，原来各小队所领土地一般都按照初级社时期未大变动。因此，这些队的土地可以基本不动，个别调整。但龙岩各公社从公社化以来各队土地都按劳动力多少重新搭配，劳力多的队，搭配土地多，征购任务大，劳力少的队，搭配土地少，征购任务也小，但各队所留口粮却多少一样。因此，过去各队都不要土地，对集体土地也未好好经营，劳力肥料多用于自留地、开荒地上，这是平均主义的必然恶果。现在改由小队分配，各队群众都争要土地，这样土地就不能基本不动，而要重新调整。调整办法，后田大队是以百分之六十的土地按人口搭配，百分之四十按劳力搭配；邓厝、孟头等大队则按照初级社时代各队所有土地归还原建制，队与队之间的插花地则根据自愿互利对等交换原则

加以调整。这样虽然麻烦一些，但不这样群众争吵不休，很难调解。至于耕畜则随土地多少适当调整，叫做“牛随田走”，大中型农具如犁、耙等，则跟牛转移，新式农具仍归大队所有。

四、关于新三包，即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上交问题。各队情况不同，上交多少也不一样。后田大队因为今年晚稻不好，各小队又要添置一些农具，因此，规定公积金只抽百分之三，而以三分之一上交大队，三分之二留给小队使用。新泉大队则大小队各抽一半。公益金，后田大队因五保户多（全队共二十五户）困难户也多（共四十户），决定抽百分之四，而以三分之二上交大队，包五保户开支，三分之一留各小队，负责照顾困难户、受灾户。新泉大队全队只有一个五保户，困难户也少，决定公益金只抽百分之一，全交大队，由大队统一照顾。管理费都按百分之二留足，大小队各半分用。

五、体制下放后，小队会计问题，一般都可以一队一个，有些小队无会计人选，则两个队共一个会计，有些大队会计也可以兼一二个小队会计。但需要迅速健全人民公社会计辅导员制度，迅速开办会计训练班。关于过去债务，即超支户^①欠款、分空户^②存款，一般仍由大队负责，暂不下放小队，俟小队划分、冬耕生产结束后再分别清理，叫做“新账从新起、旧账以后算”。

六、体制下放后大队有什么权力，做些什么工作？除按照河北所提大队九权之外，大家认为，今后大队应负担四个方面工作：第一，是属于政权方面的工作，如分派征购，户口登记，调解纠纷，抚恤，救济，民兵，治保，小学教育等；第二，是党与政治工作，如发展党员，开好支部会小组会，干部训练，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对小队干部工作检查等；第三，是联村社工作，如水利建设，护林防火，封山育林，修桥补路，供应种苗，办好供销社，

做好物资配售，处理公益金、五保户等；第四，是办好大队企业，如石灰窑、粉坊、磨坊、油坊、烤坊，采伐木材、水力发电等。

七、关于粮食分配，大家很重视这个问题，一致同意河北基本口粮与劳动粮相结合的办法。认为这是当前提高社员出勤率的主要关键。在河南密县、江西丰城县试办体制下放时，由于尚未提到粮食分配问题，据说小队干部与群众兴趣不大。而白土、新泉各队讨论这个问题时，群众却异常兴奋。目前各队对粮食分配有两种办法：后田大队采取基本口粮与劳动粮各半分配办法，即以全队可分粮食之半数按人头分配，另一半按社员工分分配（工分包括出工工分，积肥工分，干部补贴工分，军烈属困难户照顾工分等在内）。新泉北村大队则采取基本口粮、劳动粮、照顾粮相结合办法，即无劳力者每月每人二十斤或二十五斤谷子作为基本口粮；有劳力者不发基本口粮，而按各人实做工分分劳动粮；另以一部分作照顾粮，照顾人多劳力少、军烈属、老革命、外出干部、病人、产妇之用；对有劳力不出工者一律不照顾。据新泉工作组计算，实行这种制度后，有些队每个劳动日可得到四——五斤干谷。我认为，新泉这种分配办法比后田对半分办法好，既简便合理，更便于提高社员出勤率，拟广泛推行。某些大队今秋分配就打算扩大劳动粮比例，以便更好调动社员积极性。

八、关于山林问题。后田大队决定，凡有林木的山一律归大队所有，划片分给小队管理。山林收获按山林远近，大队提二、三、四成，其余全归小队。这种有林木的山不应划归小队所有，以免群众因林权不相信而大量采伐。至于荒山则应完全划归小队所有，并发证立界，以确定所有权。靠近乡村的荒山可以分给社员作为自留山，每户三分五分都可以。

以上简报是否有当，望指示。

注 释

- 〔1〕 超支户指向生产队预借款数额超过其年终分配所得的农户。
- 〔2〕 分空户指分配不能兑现的农户。

国营农场的现状和改进意见*

(一九六二年二月十八日)

中央、主席：

我从去年六月间开始注意研究国营农场问题，曾经两次听取了农垦部党组汇报农场情况，以后又带工作组视察了北京市南郊农场、牡丹江农垦局几个农场及黑龙江省属宁安农场，听取农垦局及农场干部汇报，召开了几个生产队座谈会，并由工作组帮助虎林农场新乐生产队及牡丹江种马场几个生产队订立了总承包合同。八月底经过哈尔滨、沈阳又向黑龙江省委及东北局农办汇报了视察情况及改进农场经营管理意见。九月初回京后又召集农村工作部、农垦部、农业部干部做了报告，并由他们起草了《国营农场试行工作条例》(草案)。这个草案经谭震林同志^{〔1〕}同意曾印发各地重点农场进行试点。十一月间东北局、西北局农办召集各农场干部会议时又讨论这个草案，做了一些修改。兹将我对农场了解情况和改进意见分别报告如下：

一、自大跃进^{〔2〕}以来，农场已有很大发展。全国农场耕地面积从一九五七年的一千五百万亩发展到现在的六千一百五十万亩

* 这是邓子恢向中共中央报送《国营农场试行工作条例》时，写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

（划给劳改农场四百万亩，给军队二百万亩，从公社合进来的五百万亩在外），其中农垦部直属三大垦区（牡丹江、合江、新疆）共有二千万亩，橡胶种植场二百五十七万亩。现有农场职工二百七十四万人，拖拉机三万多标准台，载重汽车六千辆，大牲畜一百五十四万头，猪、羊七百八十三万头。一九六一年总播种面积五千三百八十一万亩，生产粮豆四十九亿斤，棉花三十八万担；上交国家商品粮豆十一点五亿斤，棉花三十四万担，鱼、肉类四万吨，橡胶四千万吨，牛奶五点三万吨，鹿茸四点二万两，人参十九点二万两。农场的经营管理也积累了一些经验，培养了一批骨干。因此，应该肯定农场成绩是巨大的。

二、农场也存在不少问题，集中表现在劳动生产率低与农产品的商品率低两个方面。统计一九六一年农场粮食播种面积占全国粮田总播种面积百分之二点三，但粮食产量只占百分之一点七。一九六一年粮食亩产平均只有一百一十七斤，而全国人民公社平均亩产是一百七十斤左右。一般机械化农场一个职工一年平均生产粮食三千五百斤左右，虽然略高于人民公社畜力手工生产的水平，但商品率仅百分之二十三，而人民公社商品率则在百分之三十以上，这和农场的技术装备、农业机械化水平是不相称的。同时，也说明农场的生产潜力很大，说明农场的优越性还没有得到发挥。以粮食生产为例，今后三五年内农场耕地面积可能达到七千八千万亩，如以百分之七十左右即五千多万亩来生产粮食作物，再增加必要的机器和化肥，亩产平均达到二百五十斤至二百八十斤（这并不算太高），那么粮豆总产量即可达到一百二十五亿至一百四十亿斤左右，商品率如提高到百分之六十以上，每年即可为国家提供七十亿至一百亿斤商品粮，等于今年或去年全部进口粮食。这对促进工农业发展，巩固工农联盟将有极大意义。而完成

上述要求，在今后五年内是应该达到也是可能达到的。因此，我认为，今后考核农场成绩大小，应以农场劳动生产率与产品的商品率高低为主要标准。但要达到此目标，必须找出造成目前农场生产率低、商品率低的根源，并逐步采取适当措施加以改进。

三、目前农场劳动生产率低有物的因素，又有人的因素。所谓物的因素，就是农机具损坏率大，机件不配套，维修能力差，耕作机械、收获机械与运输灌排机械配合不齐全，特别是整个耕作过程尚未系统机械化。耕耙播机械化了，而中耕、收割、运输还是手工操作多。这就造成已垦土地重新抛荒，粮食收不回来。加上耕畜配备少，遇到雨季，机械不能下地，往往粮食成熟后收不上来，或者收割后打不了场，招致霉坏损失。所谓人的因素，就是农场在生产管理上还存在一些不合理制度，从而阻碍了职工生产积极性的发挥。这些不合理制度，首先，是生产资料（包括耕地、机器、劳力、耕畜、农具等）不固定，经常变动。其次，是农场对生产队（基层核算单位）没有建立明确的生产责任制，没有实行严格的包产奖罚制度；实行了的也是时常变动，赏罚不明。第三，是未建立分级管理制度，各级职权不明，上级权力统得过多过死，甚至农作物的种植品种、播种面积、耕播和收割时间都由上面机械规定，造成瞎指挥，生产队不能因地因时制宜，影响增产。第四，是工资制度长期实行按时计算的等级工资制，职工多劳不能多得，少劳也不少得，同工不能同酬。这是一种平均主义、不适合于农业生产的工资制度。由于实行这种工资制度，造成职工出勤率低，有些农场职工出勤率低到百分之四十。

为改正上述缺点，我们起草农场工作条例时，着重调整农场内部人与人的关系，以调动职工的积极性。这个草案规定：（一）农场对各生产队应坚决实行四固定，把耕地、耕畜、人力、农具

等固定下来，不要经常调动；至于拖拉机，多的农场可固定给队使用，少的由农场统一调配使用。（二）农场对生产队应实行总承包、超产奖励制度，把总产量、总产值、总投资、工资总额等，都订在合同内，实行上死下活办法。（三）生产队在生产上应有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之权，上级不得瞎指挥。（四）采用五种工资形式，即行政管理干部、技术人员和机务工人仍实行等级工资制；普通农工采用按活计工、按工付酬或评工记分制度，有些手工作业则实行按件计工制；转业军人及老工人原工资比较高的采取差额补贴制度；为便于鼓励农工增产，对生产队职工采取超产提成的奖励工资制度，并给予超产提成百分之十左右的实物奖励。这些规定，在某些农场进行过试点，效果很好。关于机器问题，另作处理，但提出机、马、牛相结合的方针，即在目前条件下，农场不能完全靠机械化，而必须配备一定的牛、马，实行两条腿走路。

四、至于农场商品率不高，除了劳动生产率低这一重要原因外，还由于：第一，地方政权与企业合一。如牡丹江农垦局同时又是虎饶县人委，把地方行政机构及为社会服务行业人员，均列入农场编制，由农场负责粮食与副食品供应。第二，场社合并。这几年有些农场把人民公社一些大队，甚至整个公社合并起来，工资供应由农场包起来，产品归农场调配，这比之公社单独经营，按征购上交农产品还少，实际上得不偿失。第三，从事农业生产第一线职工比重太小。如牡丹江农垦局职工总数十四万，在生产队从事农业生产的工人不到七万人，其他人员却超过了七万人。第四，农场机构重叠，层次太多，非生产人员比重大。如牡丹江农垦局下辖十四个总场，一百三十一个分场，七百二十个生产队，生产队之下又分几个排（等于生产小队），实际上成了五级制。这样当然增多了机关脱产人员，有些场达到总人数的百分之三十。因此，

我们在农场条例中便规定了几条：（一）农场与地方政权分开。

（二）合进来的人民公社除少数插花地外应根据群众意见退出去，独立经营。（三）确立农场体制，缩小层次，一般农场实行两级管理、两级核算体制（即农场、生产队），少数较大农场也可实行三级管理三级核算制（即农场、分场、生产队），并规定一个农场或分场可以管辖十个以上生产队，以减少机关干部和服务人员。

（四）确定农场规模，不宜过大。机械化谷物农场的生产队负担耕地一万亩左右，至多一万五千亩；半机械化及人畜经营的生产队，应在五千亩以下或相当于人民公社的生产大队。农场规模原则以拥有十万亩左右为宜，最多不超过二十万亩。（五）对现有工业企业进行调整，裁撤一些对农业生产无关而主客观条件又不具备的工业企业，尽量减少非农业生产人员，把这些人下放生产队，充实农业生产第一线；条例规定在生产队从事农牧业生产人员应占到职工总数的百分之七十至百分之八十。（六）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原则。规定一个农场只有一个上级，避免多头领导，不允许非直属上级任意调用农场的人员、机具、耕地和物资，化大公为小公。

五、由于农场职工家属一年年增加，这些家属有些人可以参加农场劳动，有些人则不适宜。因此，条例中规定，对职工和其家属可拨小量土地作为他们的自留地，种植一些蔬菜、粮食，饲养家禽家畜，并搞一些家庭副业。有些人愿意自己盖宿舍，亦允许归他们私有。在超产奖励部分，除大部分按劳分配外，并允许留一部分在生产队作为生产队积累，扩大再生产，并解决职工集体福利所需和以丰补歉之用。因此，国营农场在全民所有制基础上，便存在着一些小集体、小自由。我认为，这对全民所有制经济是一种补充，它对全民所有制将要起巩固作用，而不会起破坏

作用。这与刘少奇同志对东北林业会议指示精神是相符合的。有些同志怀疑这种作法会削弱全民所有制，怀疑超产分成会妨碍产品归国家调配这个原则，这种顾虑是不必要的，因为超产分成是农场工资的一种补充形式（农场正式工资可以低一些）。由于农业生产周期性比较长，目前人工操作比重还相当大，又是野外作业，难于管理等特点，这种超产分成制度，是调动职工劳动积极性和提高劳动效能的必要措施。而且这种分成又只给百分之十左右的实物奖励，包产以内及分成外的产品完全归国家调配，这对全民所有制并没有削弱。当然机械化程度比较高的农场分成比例可以低一些，半机械化农场比例可以高一些，这在条例上已作了明确的规定。但超产提成奖励从农场来说，则是不可缺少的合理的制度。

六、鉴于农场人数一年年增多，农场离城镇较远，商业部门在农场很少甚至没有供应点，物资供应不正常，农场上交国家农产品又没有实物奖售规定，这对职工生活影响很大。有许多农场不仅没有布匹供应，甚至连针线、火柴、月经纸都买不到。因此，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农场应组织职工消费合作社，在生产队设分社，切实解决职工日常生活的经常供应。职工自产的农畜产品和其他副业产品需要出售时可由消费社组织收购。第二十条又规定：农场完成国家计划调拨任务以外的产品，在满足农场本身需要后，属于统购物资的必须出售给国家规定的收购部门，不属于统购物资的可以出售给国营商业部门，也可以售给消费合作社。

以上报告和国营农场试行工作条例（随函附上）是否妥当，请审查指示！

注 释

- 〔1〕 谭震林，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
- 〔2〕 一九五八年五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之后，轻率发动了“大跃进”运动，要求工业、农业和文教卫生等事业都要大跃进，并且提出很多难以实现的高指标。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使得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的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打乱了正常的经济建设秩序，浪费了巨大的人力资源，造成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人民生活受到很大影响。

渔业生产存在的问题和解决办法*

(一九六二年三月)

我国水产资源丰富，水产品又是全国人民的重要生活资料，特别在目前副食品供应紧张的情况下，发展水产，以增加人民肉食、改善营养，这比之发展畜牧业和油料作物收效更快、更加经济但这几年来水产也与农业生产一样，受到“五风”的破坏，影响到产量逐年减少，生产力下降，而中央去年颁布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对渔业生产又未作详细规定。因此，我部从去年六、七月以后便注意研究水产工作，曾先后几次听取了水产部党组汇报情况，并和水产部先后两次组织了几个工作组到浙江、江苏、广东、福建、江西、山东、辽宁等省进行调查研究，起草了一个关于渔业生产若干政策的规定草案。兹将半年来所了解的渔业情况，改进意见和草案内容扼要报告如下：

一、我国渔业生产，经过了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和互助合作、公社化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现在海洋捕捞面积已达二十六点四万平方里，占全国海洋捕捞面积四十三点六万平方里的百分之

* 这是邓子恢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央书记处三二一次会议同意报告内容，文中所提《关于渔业人民公社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草案》，于同年五月由中共中央批复下达执行

六十。内陆江、河、湖、泊约三亿亩水面，已有三分之二的地区进行捕捞。海洋可养殖的水面三千余万亩，已利用二百一十三万亩。内陆江、河、湖、泊可养殖水面约一亿亩，现已利用四千万亩。在渔船方面也有很大的发展，在一九五〇年只有船只二十二点八万只，但到一九五九年底统计，有机动船和风帆船四十四万余只，比一九五〇年增长了百分之九十一。其中机动渔船发展更为突出，截止一九五七年底，已发展到一千四百八十五只，共十四万匹马力，比一九五〇年增长了六点七倍。一九五八年以来到目前止，拥有机动渔船五千二百只，其中机帆船四千五百只，渔轮七百二十只，共有四十万马力，又比一九五七年增长了两倍多。从水产产量情况看，一九五七年总产量达到三百一十一万吨，比战前最高年产量增加一倍。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总产曾达到三百八十万吨，其中国营水产公司百分之十七，人民公社占百分之八十三。

但从一九五九年以后产量便逐年下降，特别是一九六〇年生产，只完成年度计划的百分之八十，计总产二百二十万吨，比一九五七年下降百分之三十。收购一百一十万吨。渔业生产力也显著下降，渔船、网具等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据了解，各种渔船减少约九万只，有些地区船网甚至损失一半以上。海洋和淡水的养殖水面都有减少，海洋由二百一十三万亩，减到一百五十万亩。

二、这几年渔业产量逐年下降，据各地调查情况看来，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是渔业管理体制不合理，渔业生产是以船为作业单位，在内河内海，一条船就可以单独捕捞；在外海大湖，较大的船（少者七至八人，多者十至二十人），也可以单独作业；有的要两条船联合作业。在鱼汛季节，远洋捕捞需要几十条船合作，但所

获鱼产品仍按船只大小分配。所以渔业生产应以船为基层管理单位，大船一条船编为一个生产队。小的可以几条、十几条编为一个生产队。船网、渔具等生产资料归他们所有，产品归他们分配。这才适合于我们今天渔业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但几年来，许多地方不分大船小船，一直是把几条、几十条船合编为一个生产队。生产队之上又有生产大队，生产大队与农业一样是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产品归大队统一分配。这就产生队与队之间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从而损害了渔民生产积极性，影响到渔业产量逐年减少。

其次，是三包制度不合理。渔业生产不同于农业生产，农业生产周期性比较长，一般农作物从播种到收获，少者两三个月，长者达五六个月，水产养殖业也要几个月，但捕捞业却是张网捕鱼，当时见效。农业上采取三包一奖制已很繁琐，但老农对包产指标还有一定把握。渔业生产的包产指标则老手也难于确定，有时一网打下去，收获很多，有时却空无所有。因此，渔业生产除养殖业外，一般应该实行按产计工，或见产分成，而不应采用三包一奖制度。但过去许多社队都沿用了农业上的三包一奖制，这就造成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加上评工记分一般化，船老大与一般船员，技术高与技术低，底分差距不大，又形成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这也是影响渔民生产积极性造成减产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是水面所有权、使用权未明确划定。有些江、河、湖、泊，水产公司或商业部门盲目控制水面资源，自己不利用，又禁止渔民捕捞。有些湖面，社队之间界限未划定，致彼此都不能打鱼。

第四，是渔、农矛盾未合理解决。一般地区，渔民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专业渔民；另一种是渔、农结合，有些以农为主、以

渔为副，有些则以渔为主、以农为副。现在有许多地方把这两类渔民都编为渔业队，而每户渔民都分到自留地。这样，一面把农民耕地分给渔民，使农民收入减少；另一方面，由于渔业产值较农业高，而渔业队收入又由全大队统一分配给农民，致渔民收入减少，从而造成渔民生产消极，渔产下降。

第五，是渔区供销与收购不统一。一般渔业队都是粮食统销区，粮食由粮食部门负责供应，其他生产、生活物资，如布、糖、烟、酒及渔需物资等则由商业部门供应，这些物资都按国营牌价供应，而且都是按人定量。因此，渔民认为只要持有人民币国家就应该供应。而鱼产收购则由水产部门负责，水产部门并未掌握物资，只按牌价付给人民币。这在过去币值稳定时期问题不大，但在现时币值不稳定的情况下，就使渔民感觉到把鱼货卖给国家吃了大亏，因而不愿交售，或把少量次货顶替，而把更多更好的鱼货拿到集市去卖。这是近年鱼货收购量急剧下降的主要原因。有些社队为了完成收购任务，机械规定禁止渔民赶集，但又出现另一种现象，渔民装病不下海，即使下海也是磨洋工，或把所得好鱼藏在石洞里，到了假日再拿出来上市。这也是近年来渔业减产的重要原因。

三、至于渔业生产力下降，船网渔具损坏，更是造成渔业减产的物质因素。

其原因：首先，是由于渔业生产资料所有权与管理权有矛盾，所有船、网、渔具，都掌握在生产队手里，由生产队管理使用，但所有权却属于生产大队，船、网坏了，渔具丢了，要大队修理添置，生产队不负责任，这样当然就要受大损失。

其次，是船、网、渔具缺乏严格的使用、保管制度，谁使用，谁保管，使用年限多久，丢失损坏应负什么责任，这些制度许多

地方规定不明确，执行也不严格。甚至船、网、渔具损坏丢失无人过问。

第三，是瞎指挥。这几年渔业生产同样有严重的瞎指挥风^{〔1〕}。不应该出海硬要出海，不应该连续作业硬要连续作业，甚至要船只“轻伤不下火线”。这样船、网、渔具当然要遭受不应有的损坏。

第四，是渔需物资供应不上。许多修置船网的材料，如木材、黄麻、桐油、猪血、铁钉等都无法供应或供应不足，这样船、网、渔具就只能逐年减少。

第五，是渔港码头建设太差。渔港码头是渔船的后方基地，渔船出海从渔港出发，返航向码头靠岸，卸渔货、修船网、取补给，都要靠码头。特别是渔汛季节，渔船靠岸往往卸货后几个钟头又要出发。所以渔港码头好坏对渔船作业和往返安全，关系很大。但现在我们各地渔港码头设备不齐全，有些港口太窄，往往渔船进出互相碰撞，如遇大风，损坏则更甚。这也是造成渔船损坏率大的一个客观原因。

四、根据上述情况分析，我们认为，今后要促进渔业增产，逐步恢复和发展渔业生产力，必须采取如下政策措施，切实解决占全国渔产百分之八十三的渔业人民公社内部的生产关系，以达到充分调动渔民积极性的目的。

首先，要贯彻中央指示，以生产队作为渔业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这是搞好渔业生产的根本性政策。为便于四权统一，克服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和生产资料无人负责状态，草案第六条规定：“船、网、工具一般应归生产队所有，机帆船可以归大队所有，固定给生产队使用，某些小型渔具归社员个人所有。”

其次，要调整社、队编制。草案第三条规定：“渔业人民公社大致相当于原来的渔民乡(镇)。”“渔业大队可根据港口码头、居

民点等自然条件来确定，一般应相当于原渔业高级社的规模。”

“渔业生产队则应根据不同的作业方式，船只大小，作业场所及居住远近而定”。草案特别规定：“捕捞队一般以一个作业单位（即一条船）为一个生产队，如作业单位过小（即小船，一、二个劳力），也可以若干作业单位（即几条十几条船）编为一个生产队”。至于养殖生产队的规模，“应该根据养殖的品种、养殖水面的大小，并参照居住远近而定，一般可以三十个劳力左右编成一个生产队”。

第三，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后，生产大队主要成为各生产队的联合组织。其主要任务是为各生产队的生产服务。草案第九条规定：“大队的主要任务有五：（一）办好修船补网、鱼产加工等企业。（二）修建港口码头、船只等基建工作。（三）组织生产队之间在等价交换原则下的、互助合作。（四）与渔货收购部门统一订购销合同。（五）合理使用公共积累，办好公共事业。”为便于大队完成上述任务，为各生产队生产服务，草案第十二条规定：“各生产队应将所留公积金百分之四十，上交给大队统一保管，统筹安排，但大队应分别给各生产队记账”。为了保证船只和大型网具、工具的更新、维修，草案十三条还规定：“各生产队应向大队提交折旧费和维修费用，大队按各生产队分别立账”。这就是说，所提折旧费、维修费仍归各生产队所有，自负盈亏，大队只是代修代购，必要时可以对各队通融调剂使用。这样规定，一方面大队统一代办，免得各队自办，致浪费人力物力，另一方面，又保持各队所有，自负盈亏，便于鼓励社员爱护船网渔具，节约成本。

第四，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后，三包一奖制应予废除。以后生产队对大队上交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和船网折旧费，应采用按产提成办法。一个生产队之内，社员与社员之间也要贯彻按劳

分配原则，制定合理的劳动定额，公平地评工记分，并按技术高低、体力强弱、劳动态度等认真评定社员的劳动底分。船老大（广东叫做大工，技术很高，对渔业生产好坏关系很大）与一般船员应有合理的差距，克服人与人之间在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以调动船老大和船员的积极性。至于几个作业单位（小船）合编的生产队，草案规定，“应采用各船按产记工的分配办法”。这样既有利于调动社员积极性，又可以保证全队统一分配，有利于社员的集体利益。

第五，要妥善解决渔、农矛盾。据我们工作组在福建同安县和江西都昌县两个渔业大队的调查，群众一致要求渔、农分开编队，把专业渔民编成渔业队，一般渔、农兼业的农民则编入农业队。原属农民的耕地，除留少数自留地给专业渔民外，全部收归农业队经营。渔、农分队后，双方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各不相犯。至于渔业专业队的口粮则由收购鱼货的供销社根据购销合同，负责供应。这样渔业队收入要比农业队高，这是合理现象，要说服农业队社员不要眼红。当然渔业收入多，他所摊的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也应该比农业队高一些。至于农业队兼营渔业的，其渔业收入也可以按产计工，或者采用农业工分与渔业工分分别计算的办法。为了调剂渔农季节忙闲，渔业队农业队社员，可以相互出工，所做工分按出工所在队规定计算报酬。

五、为了搞好渔业生产，除了解决渔业社内部生产关系以外，还应该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要统一对渔区的供销与收购工作。这是调整国家与渔民关系的基本环节。据福建同安县某大队调查，国家每年供应该大队的生产、生活物资比该大队交售给国家的鱼货要多一半以上，但该大队渔民反说吃了大亏。原因主要是购销机构不统一，和供

销上按人定量的平均主义。这种购销办法，只有懒汉和不参加渔业劳动的农民得到好处，而渔民则确实吃亏。为改变这种不合理的被动局面，同安县已仿照江浙采取购销结合合同办法，即在该大队设立渔业供销社，鱼货归供销社统一收购，国家卖给该大队的粮、布、油、糖、烟、酒以及渔需物资也归供销社统一供应，双方都按牌价计算，等价交换。这样渔民多交鱼货，即可多得生活生产物资。但出售鱼货所换来的物资要改变过去按人定量的供应办法，除一部分供应无劳力者外，大部分物资应实行按劳分配，使等价交换与按劳分配两个原则结合起来，这样才能真正调动渔民出海的积极性。我们认为，这个办法，可以而且应该在各地推广。只要渔民积极出海，就靠现有生产资料，也可以起到促进渔业增产的作用。

其次，要合理解决水面纠纷。草案第四条规定：“江、河、湖、泊、港湾、滩涂和国家兴办的水库，属国家所有，除国家经营部分外，应根据有利生产、有利团结的原则，参照历史习惯，固定给有关社队共同使用”。“过去统得过多过死的水面，妨碍群众利益的应一律开放”。至于“跨省、跨县、跨社的水面，应参照历史习惯在有利生产和团结的原则下，民主协商，共同使用”。

第三，要多方设法供应渔业生产资料。目前特别应注意供应他们一些木材、桐油、麻、猪血、铁钉等，把现有的船网工具迅速修补起来，用于捕捞作业，以增加鱼产。至于机帆船、渔轮等则视可能条件逐步加以发展。

第四，对渔港、码头、防浪堤等基本建设要选择最急需的加以修建扩大，以利于渔船进出安全，避免碰撞损坏。这也是渔业生产中不可缺少的基本建设。

此报告和政策规定，只着重于集体所有制，至于国营水产公

司内部生产关系和经营管理制度等草案尚未涉及，有待于以后的调查研究。

兹将代中央起草的“关于渔业人民公社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草案随函附上，请中央审查改正，如认为可行，望批转各省、区研究试行。

关于龙胜县的包产到户问题*

(一九六二年四月十一日)

解决包产到户的问题，要从有利生产、有利团结出发，实事求是地解决。

龙胜的小队不一定划那么大，干脆一村一队。不在一起住的，民族间不和的，不要勉强凑在一块。两个民族在一个村庄的，愿意合就合，不愿合就分开，拉倒。七、八户的村庄就可以编一个小队，自负盈亏，不要几个村庄合起来。三、五户的可以单独编小组，包产到组。单庄独户、离村庄远的就包产到户，或者让他们单干吧。这样有好处，不要有顾虑，怕说单干，怕说右倾，什么事都要实事求是。这样零星居住的，干脆向群众宣布，包产到户。单干就单干，有什么不好，等几年后，有条件合起来了，再组织起来。

插秧季节到了，不应包产到组、包产到户而现在已经到组、到户的，就马马虎虎，睁个眼闭个眼算了，秋收以后再慢慢搞，不要影响生产（按：当时地委汇报，如硬扭，社员可能把水粪不担到稻田而担到自己开的旱地）。

* 这是邓子恢到广西桂林地区检查工作，听取地委负责人关于龙胜县包产到户问题的汇报后的谈话，根据记录整理。

三、两户人家靠近别的村的，可以和旁边的村合起来。但是不能远了，一里路以内，不愿意合的就拉倒。

这样一个大队内的小队可能多一些，小队是分配单位吧，又不要你大队瞎指挥，多一点也可以管得来。

群众运动要自愿互利，还要有几个核心人物。不自愿就要垮下去，这是群众运动，不能运动群众。组织起来，天长地久，不能强迫命令。群众不自愿的东西就不要搞，没有互利就不能自愿，不自愿就不能结成组织。你们不要背包袱，不要害怕，三、五户的允许包产到组，孤庄独户允许包产到户，这个中央有文件，已经规定了的。平原地区三两户，或者三几个人愿意上山的，可以允许他们上山单干。

集中居住的小队包产到组到户的，已经扭过来了，群众同意的就行了；还没有扭过来，群众不同意的就睁个眼，闭个眼算了。现在硬扭，他不好好生产，像搞“维持会”一样应付你，生产搞不好。现在生产正在刀口上，不要耽误了生产。

集体的优越性表现在哪里？有的同志不甚了解。集体生产可以多用劳动力。一九五五年有调查，搞单干的时候，每年出工一百八、九十天就完了，想搞别的门路个人力所不及，组织起来后，可以出到二百五、六十天，因为开辟了新的门路。劳动创造财富。这叫“英雄有用武之地”。可是你要组织不好，窝工浪费，优越性就没有了。这几年就是工效低，无效劳动多，就没有优越性了。单干不好，在一定的范围内，在一定的条件下有它的优越性。它自负盈亏，不用你调动积极性。但是发展下去，就是资本主义道路，现在也不能抗拒天灾人祸，要两级分化，再就是它扩大再生产能力差。所以我们要走集体化的道路。生产关系的改变要争取群众大多数，现在有些问题是因为只争取到少数，这不好。当然，不

能在思想上认为就是单干好，单干万岁。但是，不能说单干一文不值，人家不信服。人家有这个思想，要耐心教育说服，不要斗争、处分。

一般说一个小队二十户，二十几到三十个劳动力比较合适。农民说要能够组成一个劳动班子。唱戏有一班人，什么角色都有，种田也一样，要有熟悉各种农活的人，才能搞好生产。二、三十个劳动力，可以分几个作业组，临时的，小段包工。

现在春耕到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什么坏处呢？你有什么别的办法？像龙胜那样，现在要把少数坚持集体的队办好，慢慢显示优越性，树立旗帜。实在不愿意的让他们试试看，逐步搞过来。

生产队长最好四十岁左右，到五十岁。青年人冲锋可以，老年人当参谋。

关于当前农村人民公社 若干政策问题的意见*

（一九六二年五月二十四日）

近年来,经过各地贯彻了中央颁布的《十二条》、《六十条》和基本核算单位下放之后,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农业生产开始好转,从而人民公社制度也基本上趋于稳定。但由于这些政策在许多地方尚未完全贯彻,加上连年灾荒,征购任务过重,留粮偏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尚未充分发挥,经营管理多数未上轨道,集体生产尚未真正搞好。因此,全国各地社队陆续发生不同形式的单干现象。据已有材料统计约占百分之二十左右,有些县甚至达到总户数百分之六十以上。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今冬明春单干现象可能还要发展,甚至会影响到人民公社制度的巩固。这是应该引起我们十分警惕的。一年来,我带了工作组在福建、黑龙江、广西、湖南、河南等省进行了调查研究,召开了干群座谈会,并听取了十几个省、地委关于农村情况的汇报。我认为,要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制度,必须迅速采取有效措施,解决如下几个根本政策问题。

* 这是邓子恢写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

一 关于所有制问题

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主要内容。集体所有制是农民生产、生活的基本依靠，也是巩固工农联盟的经济基础。前几年，各地大刮“共产风”、“瞎指挥风”，引起农民消极不满，就是不重视集体所有制所引起来的结果。经过贯彻中央十二条、六十条政策以后，集体所有制和社员小私有基本上已有保证。但目前仍存在很多混乱现象，这表现在：（一）机关、企业、部队、农场、学校一九五八年以来占用社队的土地，许多尚未归还。许多基建单位征而未用或未用完的土地也未退还。（二）公社与公社、大队与大队之间平调^{〔1〕}的土地也未完全清理退还。（三）不少地方基本核算单位已下放给生产队，但土地耕畜仍归大队所有。（四）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土地，大部分是按照人民公社化以后调整四固定的基础上基本不动、个别调整，而当时调整原则是强调“土劳平衡，划片调整”，这与合作化时期按土改基础调整的四固定有很大不同，从而造成队与队之间在耕地数量上、质量上，比之过去都有很大差别。有的队原来耕地多的好的现在地少了、坏了，有些队原来耕地少的坏的，现在又变多了好了。这在过去社员不计较，但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之后，特别是宣布三十年不变之后，队与队之间争地纠纷就日趋剧烈。（五）林权更是普遍未定，林木果树被人砍伐采摘不受处分。国营伐木场进山不分国有社有林木也随便采伐，因此造成山林的严重破坏。

以上这些混乱情况，说明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还没有完全稳定下来，还没有成为一种固定制度。这就引起广大农民不相信党的政策，不相信小队核算三十年不变，从而也就不安心生产，只

顾眼前，不作长期打算，对造林护林、修建房屋等长期建设更谈不上。有些地方社员只搞自留地、小开荒，集体生产搞不好，甚至发生单干现象，也与此有关。总之所有制不确定，对农民生产生活是极为不利的。

为什么经过贯彻《十二条》、《六十条》、小队核算之后还存在这种现象呢？其原因：

首先，是各级干部思想上仍然存在着不断革命论，而不认识革命发展阶段论，对三十年不变，一般认为只是一时权宜之计。干部思想另一个毛病就是平均主义根子未完全挖掉，总想在生产资料特别在土地上，把穷队富队的经济基础适当拉平，以便于以后实行过渡，而不了解生产资料的平调比之产品平调是更厉害的平均主义，是对农民生产积极性的重大打击，是对农业生产力的更大破坏。有些干部也承认穷富队有差别，但只承认调整后的差别，而不承认调整前的原有差别。他们不了解农业生产关系在没有变为全民所有制以前，村与村、队与队之间的贫富不齐将是长期存在的。一个村庄，一个队由穷到富主要依靠于本村本队农民的发奋图强积极生产，而绝不能依靠外援。

其次，是《六十条》和小队核算指示^{〔2〕}虽然确定集体所有制并允许个人小私有，但国家尚无法律保证。司法机关在处理山林、土地、房屋纠纷时无法可守，有时还不敢受理，在处理时判刑轻重也没有根据。

再次，是队与队的土地山林、个人与个人之间的自留地、自留山、果树林木、房屋等，只是口头划定，尚未标明四至，发给执照，这对所有制的保证也减少作用。

鉴于以上情况和分析，我建议中央采取如下措施，以稳定当前人民公社的各种所有制：

（一）根据《六十条》和小队核算制，订立一种法律，在三十年之内，大家共同遵守，侵犯所有制的，按法律作处理。

（二）在法律未制订以前，仿照河南省人委布告，先由各省市人委用布告形式把各种所有制明确规定予以保护，不许侵犯。

（三）再一次明令各级机关、企业、学校、部队、农场限期把占用社队土地一律退还，基建部门征而未用或未用完的土地，退还还原社队所有。

（四）明确规定凡是以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耕地、牲畜及大中型农具一律归生产队所有，不许大队再保留土地耕畜的所有权。只有新式大中型农具为各生产队所共同使用的才可以归大队所有。

（五）要确认土改时期分配给农民的土地是人民公社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法律根据，同时也是比较合理的。因此，大队与大队、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土地调整，如果原因固定合理，群众确无意见的，可以基本不动、个别调整。但如果彼此有纠纷，群众要求调整的，必须坚决按照土改时期分配的基础加以调整。

（六）林权必须迅速划定。划分原则是，原来属于村公有或高级社所有的成林的山，仍归大队所有，长期固定分给生产队保管，以后林木收益大队与生产队按对半或四六、三七比例分成。只有零星小树的荒山则永远划归生产队所有，收益归生产队分配。靠近村庄的荒山永远划归社员作为自留山，收益归个人支配。

（七）所有权划定后，由县人委制发土地、山林、房屋等执照给社队和社员个人。

二 关于按劳分配政策

当前人民公社的分配政策，主要是要在口粮分配上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目前全国存在五种口粮分配办法：

第一种是，口粮按人分等定量。这是一种极端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违背了按劳分配原则。但在口粮过低的重灾区，又不能不实行这种办法。

第二种是，基本口粮与劳动粮相结合。这比前一种办法已进了一步，对调动社员积极性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所有人口都给予基本口粮，基本口粮占了可分配粮食的绝大部分。因此，劳动粮便寥寥无几，这对调动积极性作用不大。

第三种是，完全按劳分配加照顾。这对调动社员积极性起了很大作用，但有些地区照顾标准不明确，或对照顾粮定得过低，结果引起工属、军属、干属、小学教师及人多劳少者的不满和恐慌，有些地区这些人已要求把自己的土地收回自耕。

第四种是，基本口粮、劳动粮、照顾粮三结合的办法。即凡是无劳力的老人、小孩、病人等都给予基本口粮；凡是有劳动力的（评有劳动底分的），都不给基本口粮，一律按各人所做工分分取劳动粮。此外，五保户、军烈属、病人、孕妇、劳动底分不足三分，以及人多劳少的户，除基本口粮外，经过社员评议，还给予一定的照顾粮。这种制度，有些地方试点，基本口粮约占全部可分配粮食的百分之三十五，劳动粮约占百分之六十，照顾粮占百分之五左右，这样每个工作日可得劳动粮三、四斤至五、六斤不等。

第五种，也是完全按劳分配加照顾。但照顾标准定得比较合

理，即规定每个劳力担负两个无劳力的口粮，半劳力担负一个无劳力的口粮，无劳力超过此负担限额的，超过的人给予基本口粮。

现在看来，前三种口粮分配办法毛病比较多，后两种办法比较合情合理，既便于调动社员积极性，又照顾了老少及无劳力的人，既贯彻了按劳分配，又保证了口粮上的社会保险。因此，除了特重灾区口粮特别低的地方外，一般应采用后两种办法，而废除第二种第三种办法。

除口粮外，其他实物，如秸秆、稻草、蔬菜、瓜果等，除了完成派购任务外，余下的也应该大部分按劳分配，并以一部分照顾无劳力的人。这样做，不仅便于进一步巩固集体所有制，而且也有利于压缩城市人口回乡。从理论上说，一切农作物生产固然是社员当年辛勤劳动的结果，但现有耕地也是农作物生长的必要条件。我们集体所有的耕地是社员自愿入社的，因此，对无劳力的社员给予基本口粮供应，也应该当做按劳分配的一个合理因素。

三 关于干部特殊化问题

干部是党与群众联系的桥梁，干部必须有群众观点，必须生活群众化，而不能特殊化，不能脱离群众。自从贯彻反“五风”，实现《十二条》、《六十条》政策以来，一般干部特殊化作风已有很大改变。但目前大小队干部补贴工分过多，多占多吃的现象还没有完全改变过来。据我们在几个地方调查，大小队干部的补贴工分都超过了全大队社员出勤总劳动日数的百分之十四。有些大队干部一年补贴工分达六百个劳日之多，其中误工补贴制度漏洞最多，群众意见也最大。除工分补贴外，干部还从队办企业、机动粮、事业粮中随便开支，多吃多占。这种现象便形成干部生活

特殊化，其结果，一方面引起群众不满，影响集体经济不能巩固；另一方面也造成一批特权人物，这些人开始脱离群众，最后则形成与群众对立，甚至利用权力控制群众，成为党与群众联系的障碍。这是妨碍集体经济巩固发展的一个极其危险的因素。关于克服这种现象的措施：

首先，要引起各级党委注意这种现象的危险性，克服县社干部对大小队干部的姑息之爱。他们认为，基层干部任务大，工作忙，需要在生活上加以照顾，而没有了解过分照顾会增加群众负担，会影响社员收入，会使干部脱离群众。这种姑息之爱，实际上是害了干部，最后可能断送干部。因此，各级党委今后对基层干部必须加强政治教育，帮助他们改变各种特殊化的现象。

其次，各县社要严格规定大小队干部的补贴人数和补贴限额。一般说来，百户以下的大队只允许一个人补贴，一百户到二百户的两个人补贴，二百户以上的三个人补贴，五百户以上的四个人补贴。小队干部补贴人数应控制在两个到三个人以内。大队干部补贴工分每人每年可补贴一百二十到一百五十个劳动日，小队干部二十到三十个劳动日。除了这种工分补贴外，应禁止临时误工补贴制度。总之干部补贴加上办公杂支等管理费，以不超过全大队可分配部分的百分之二点五为原则，超过此限度者必须取缔。

第三，要限制大队所办企业。在最近十年内最好公社和大队两级不要举办企业，把这两级的任务暂时限于区乡政权和区乡党委的作用，而缩小其经济职权。社队现有企业便于生产队经营的下放到生产队，一个队不能单独经营的可交几个队联合经营；便于个体经营的下放给社员独自经营。至于大队提取机动粮亦应限制在百分之五以内。这种机动粮只许用作以丰补歉，应付国家增购任务及储备之用，不准社队擅自开支，每年收付帐目应向各生

产队公布。至于小队储备粮则应仿照历史上义仓积谷的旧例，由社员另选储粮小组专职管理。这种储备粮只许在青黄不接时借给缺粮户渡荒，并且有借有还，收取小量利息，其余任何人不得侵用。

第四，要贯彻民主办社原则，建立一系列民主制度。如按月召开生产队社员大会，按月公布社员工分帐、粮食收支帐，实行民主排工制度，由社员自报公议，防止派工上的徇私舞弊现象。对队干部（包括会计）选举，必须采用投放黑黄豆办法，不得用举手表决等公开选举办法。

第五，要建立监察制度。在生产队成立监察小组，树立对立面。监察小组要与贫下中农积极分子或贫农团小组联系，对队管理委员会实行监督，公社和大队两级的监察机构也要定期召集监察组长开会反映情况，起积极的监察作用。

四 关于社员小自由问题

自从贯彻《十二条》、《六十条》以来，各地社员经营自留地、自留山、饲养家禽家畜和经营其他家庭副业的积极性已逐步恢复起来，这方面的成绩是显著的，生产效果也很大。一般地区自留地生产还比集体生产搞得好。这说明，在农业生产力还处于以人畜力经营为主的当前阶段，这种小自由小私有，是最能调动农民劳动积极性和责任心的。个体生产的危险在于以个体经济作为主要社会制度，从而产生剥削，产生阶级分化，而最后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如果我们能保持集体经济作为农村社会制度的主体，加上政权在我们手里，国民经济的骨干，如工业、交通运输、金融贸易企业等都是全民所有制，在这种条件下允许社员在一定范围

内经营一些小自由小私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可惜这种想法尚未被全体干部所完全理解，他们不适当地把农民依靠自己劳动、自产自销的经济看作资本主义，而又过于害怕它对社会主义会起破坏作用。正因为这种不适当的看法和想法，从而在不少地区对自留地留得不够、自留地太远太坏，有的还把自留地生产抵口粮，自留地普遍未划定。也有些地区对养猪以私养为主、公私并举的方针不敢宣传贯彻，不敢让社员养大牲畜等。这些现象对发展农业生产与团结社员都起了不利影响。因此，我建议中央采用如下措施，鼓励社员在一定限度内发展小自由，以加速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首先，要稳定社员自留地，并适当加以扩大。如社员自留地除依照《六十条》规定按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七拨足之外，是否可以考虑在每人平均二亩地以下的地区准予按百分之十拨给自留地。为了发展养猪业，以增加肥料，我完全同意陈伯达同志^③意见，给每户另拨一定数量的饲料地。有些地区还可以给社员借地^④种红薯、油料、棉、麻等。这种借地可以借一季，在灾区和集体生产未搞好地区也可以借一年或三五年。这些小自由土地包括自留地、饲料地、借地、小开荒等在内只要控制在当地耕地总面积百分之二十左右，我想是没有危险的，是应该允许的。有些人顾虑小自由土地扩大会妨碍征购任务与集体生产，这是不必要的，只要征购任务逐步定下来，并实行等价交换，自留地扩大一些对征购并无妨碍。至于社员对集体生产积极性大小，主要决定于分配政策是否贯彻按劳分配和经营管理上劳动定额评工记分是否合理，与小自由大小也无关系。过去几年，各地把自留地全部收回，社员普遍磨洋工，集体生产反而搞得更坏，可见取缩小自由并无助于集体生产。同样的道理，适当扩大小自由，使社员生产好，收

入多，情绪高，反而会增进社员对集体生产的积极性。

其次，要鼓励和帮助社员繁殖大牲畜。这是在一个长时期内的重要政策措施。现在看来像牲畜这一类活的东西，鼓励私人喂养是有利的。我国的大牲畜——一九五五年发展到最高峰，全国共有大牲畜（包括牧区在内）八千七百七十三万头，一九五六年就开始下降，一九五八年以后大幅度下降，现在只剩下五千多万头。如从农区来看，则是一九五四年最多，一九五五年就开始下降（如冀、鲁、豫等省），主要原因是当时合作社要社员牲口入社，作价偏低，因而发生社员将牲口出卖、宰杀甚至搞死。在社员牲口入社后又机械地集中喂养，草料不足，这也是造成牲畜大量死亡的重要原因。现在回头来看，如果当时不急于要社员牲口入社，而允许社员的牲畜私有公用、给予合理报酬，那今天情况就可能要好一些。因此，中央允许社员养一两头大牲畜的规定是非常明智的。但这种规定现在还有许多干部未真正理解，而不敢大胆让社员私养大牲畜。现有公畜也有许多未确定归小队所有，分户喂养办法也不大胆。因此，我主张，中央要再一次明确规定：（一）所有耕畜役畜，一律归生产队所有（大队核算的例外）。（二）队有牲畜凡是集体喂养有完善设备，喂养又好的可以维持不变，否则应该一律交社员分户分犏喂养，实行养用合一，并规定饲养使用责任制和合理报酬。（三）公有牲畜归社员喂养的，其所生幼畜，公私对半分成，教会役畜者，也要有合理报酬。凡是草料有办法的社员，允许一户养一头至两头大牲畜，养畜收入完全归社员私有，私有牲畜为集体使用的，要给以合理报酬。所生幼畜允许自由买卖，不派统购。（四）繁殖猪、羊仍坚持私养为主、公私并举的方针，各地不得加以限制。（五）小农具完全由社员私有，自修自用。大中型旧式农具如大车、板车、独轮车、水车、犁耙、风

车、谷桶等也允许社员私有、私用，公用时要给予合理报酬。

（六）自留山要迅速划定，立界给执照。社员宅基地、房前屋后、坟上及自留地、自留山上的零星果树归社员私有，不得侵犯。有养蚕习惯地区，允许社员留一些自留桑树，从事养蚕，作为家庭副业。

五 关于征购派购与等价交换问题

等价交换与按劳分配同是社会主义的经济法则。这两条法则是互相联系互为因果的，不实行等价交换，就不可能按劳分配。目前由于人民币价值不稳定，国家向农民统购派购农产品，实际上，类似苏联内战时期的余粮征集制和以后的义务交售制度，成为农民对国家的一种负担。农民不同于工人，工人靠工资为生，农民则靠集体所有制生存。如国家征购派购过重，而又未能等价交换，那不仅要影响农民扩大再生产，而且要影响农民的当前生活和简单再生产，这对巩固集体所有制和工农联盟都是不利的。因此，目前中央似应重新考虑我们的征购派购办法。我认为，办法有两条：一条是把统购派购任务定低定死，几年不变；另一条办法，是实行综合换购，基本上贯彻等价交换。我的意见，像猪、禽、蛋这类产品，可以采取两广办法，如按每个小队派购一头猪或每十五个农户派购一头猪（北方不养猪的可将羊折合顶替），鸡子、鸡蛋也按队或农户适当派购，这种小量的派购国家可以只给人民币，不给其他实物。但派购量要定死，而且三五年不变。如果国家需要再多购，则通过供销社采用议价收购、等价交换的办法来达到。我想只要任务轻，几年不变，又给农民拨足自留地、饲料地，加以充分的政治工作，农民是会愿意的。至于粮、棉、油的统购，我

的意见，应该把全国征购任务定死（如粮食定在七百亿斤左右），三、五年不变。如不可能，至少对四百多个县商品粮棉高产区其统购任务接近饱和点的应先定下来，超过饱和点的还应适当降低。对以林为主的山区县，因其购粮数量小，影响不大的也先定下来（这些山区可以十年二十年不变），使农民能够多产多吃，能作长期打算。这对农业生产，对商品粮棉产区、对林区生产的恢复将起决定作用。对粮、棉、油统购应坚决实行“低对低”综合换购办法，除公粮不给代价外，其余价款应保持给实物（包括工业品、手工业品及一部分返销粮）百分之八十以上。如果这两三年国家手里可供应的实物不多，宁可把公粮部分适当提高一下（如恢复到二百四十亿斤左右），其余部分应尽可能做到基本上等价交换。除了这个统购任务定死之外，有些丰产区还可以通过供销社用自愿议价收购办法多购一部分。总之要农民尽义务或半尽义务的东西必须把任务定轻定死，要多购的东西必须实行等价交换，绝不能重复余粮征集制和无限度的义务交售制，否则集体所有制与工农联盟是不可能巩固的。

此外，关于集市贸易问题，两年来的实践证明，在多种所有制同时并存的现阶段，集市贸易是不能关死的。现在有两种地区：两广的集市贸易比较灵活，小杂粮熟食业允许自由上市；另一些地区则控制较严，杂粮完全禁止上市。据我看前一种地区比较好，对农业生产起促进作用，对城市人民生活也比较方便。后一种地区则相反，实际上后一种地区粮食还是有私人买卖，只是不敢公开，而转入黑市交易，可见这是一种不能用人为办法加以改变的客观规律。望各地同志再加以研究。

最后，还必须加强生产队的经营管理工作。要着重做好劳动定额、评工记分，以调动社员出勤积极性，着重建立生产责任制，

实行明确的分工合作，以提高社员干活的责任心，提高农活质量，这是今后搞好集体生产、巩固集体所有制的根本环节。这方面我们已收集了一些资料和经验教训，拟在适当时机召开一次农村工作会议，加以研究，作出具体决定后，再向中央报告。

注 释

- 〔1〕 平调是一九五八年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初期发生的“共产”风的主要内容。“平”，指搞平均主义，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否认按劳分配原则。“调”，主要指县、社两级无偿调拨生产队（包括社员个人）的财物和劳力，否认等价交换原则。一平二调严重地破坏了农村生产力。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彻底退赔的规定》。
- 〔2〕 小队核算指示指一九六一年十月七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
- 〔3〕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
- 〔4〕 借地是在六十年代初农村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农民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在集体经济的领导下进行的生产自救措施。有的地区由生产队借给农民少量土地、农具和种籽。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一九六二年以后，借地逐渐收归集体。

鼓励专家发挥专长*

(一九六二年六月八日)

一 气象工作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处于重要地位

气象工作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有很重要的地位，首先是国防需要，海空军离不开你们，空军虽有自己的一套，没有全国的气象工作也不行，假如发生了战争，更需要了。现在的国际形势，全世界的规模战争有打或不打两种可能，局部战争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就没断，不是可能不可能，天天存在。因此，气象工作今天首先是为国防服务，满足国防需要。

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农业不发展，不仅解决不了吃饭问题，棉花、油料以及其他副食品也都解决不了。几年来的经验证明了，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没有发达的农业，就没有现代化的工业。这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贡献。因此，气象工作为经济建设服务主要是为农业服务，减少自然灾害给农业生产带来的损失。交通运输也离不开气象。将来宇宙航行也需要气象。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气象工作不是可有可无的，是很重要的工作。

* 这是邓子恢在中央气象局党员处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二 几年来气象工作的成绩

建国以来，气象工作的成绩是主要的，表现：

（一）预报准确率比一九五七年前有所提高。对农业、防汛、航行起了很大作用，这几年因预报不准而出事故比过去大大减少了。

（二）气象台站网的密度比过去增加了。新疆、西藏的台站很重要，将来要起更大的作用。气象工作的基本建设比过去加强了，这也是决定今天预报准确率提高的关键。

（三）气象技术提高了，自己培养了气象队伍，壮大了，也提高了。

（四）一九五八年群众创造的补充预报是很大的成绩，是中国人民智慧的创造。补充预报的总结与推广，对地区性预报准确性有很大的好处，是群众路线的结果，是对气象科学的重大补充。

（五）气象工作以服务为纲，以农业为主的思想是明确的，不是为气象而气象，为科学而科学，改变了过去的观念。

三 几年来气象工作有缺点，甚至有的是错误

（一）台站网下放是个错误。人家下放，我们也下放，造成下边很分散。我认为，气象工作完全没有下放的必要。气象工作是高度集中的，现在分散了，工作受损害。这是个损失。政治思想工作应由地方管，技术方面他们不懂，要收回。二十四小时工作的技术人员应该很好照顾。你们应该研究、考虑，人不是铁打的，不吃不能工作，不是特殊，而是需要，不然不能持续工作，损失

很大。

（二）一九五七年以来，几次运动，特别是整风伤害了大批干部，影响了团结及工作积极性。这不能怪气象局。近几年整个干部的情绪是左的，我们总是反右。在全国反右的思想指导下，气象局也出了一些乱子，伤害了感情，影响了团结，影响了工作，造成人人自危，心情不舒畅。责任不全在气象局，我们帮助不够。中央工作会议^{〔1〕}上，少奇和小平同志都作了检讨，主席也作了自我批评。气象局领导也有毛病，应检查，不能推给中央。

（三）民主生活不正常。全国是这样，气象局也如此。不敢讲真话。毛主席讲：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形式上的民主，实际上是分散。

（四）对专家了解帮助不够。气象工作是尖端技术性工作，不是一般性工作。党的工作就是要充分发挥专家的作用，鼓励和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使他们发挥专长，使他们敢想、敢说、敢干，创造条件给他们钻研技术，发挥特长。少奇同志曾指示张劲夫同志^{〔2〕}说：不是靠你去工作，主要是靠科学家，你的任务就是鼓励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特长，使他们敢说、敢做、给他们创造有利条件，帮助他们在政治上进步。与此同时，自己也要好好钻研，最后使自己也变成专家。我们的领导同志亦应这样。技术部门的工作主要靠专家。学校主要靠老师，校长是为老师创造条件，帮助老师，发挥他们的专长。气象部门的主体是专家，领导工作就是要使他们敢想、敢说，鼓励他们积极钻研，最后再和群众结合。

（五）气象工作走群众路线是否都够了呢？我不太清楚，恐怕还未做好。补充预报还必须和群众结合才能做好。对气象工作群众路线体会不深，贯彻不够。今后怎样做好工作，当前国家正处

在困难时期，还可能发生局部战争。少奇同志在最近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共产党员在太平时期能克服困难，在最困难时期，要正视困难，认识困难，有勇气克服困难，这样才是共产党员。气象工作同样要认识当前国家经济困难，认识发生局部战争的可能性，做好工作。为了加强集中统一，充分发扬民主，建议将气象台站网收回来，给中央写个报告。鼓励专家和技术人员发挥他们的专长，培养更多的专家，组成队伍。涂长望⁽³⁾有功，首先是第一功。要他安心休养，并代我向他问候。要有一定的台站网，加上专家和技术人员再和群众结合，工作就能做好。

外行领导内行问题。所有机关、学校，外行都能领导内行，主要是怎样领导法。首先，是鼓励他们，帮助他们发挥专长。他们肯不肯拿出专长来，主要靠我们政治思想工作是否做得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使其心情舒畅，这是基本的。其次，给他们创造方便条件，以利他们工作。再次，是从政治上帮助他们提高。专家技术人员钻研业务时间多，学政治时间少，我们要帮助他们提高政治觉悟。帮助不能要求过高，要因人施教。对技术人员要求又红又专，政治认识逐步提高。钻研业务不能叫白色专家或资产阶级思想。钻研业务技术有成就，对国家有好处，不能说是个人主义。在科学上不能什么都说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不能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了，那会阻塞言路，不敢讲心里话。政治上让他们进步提高，懂点马列主义，但不是要他们作政治委员。我们也不能永远作外行，不懂要学，慢慢地学，逐步懂，不能做一辈子的外行。不懂就是不懂，不能装懂。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能指手划脚，瞎指挥。这样外行才能领导内行。

注 释

- 〔1〕 中央工作会议指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通称七千人大会）。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加强民主集中制，切实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以迅速扭转国民经济困难的局面。
- 〔2〕 张劲夫，当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国家科委副主任。
- 〔3〕 涂长望，当时任中央气象局局长。

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 及人民公社、总路线问题*

（一九六二年七月十一日）

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

要调动社员的积极性，必须要有严格的责任制，要分工合作。

如何调动社员的积极性？要贯彻按劳分配，要规定合理明确的劳动定额，评工记分加上政治工作。还要有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工业也好、手工业也好，都要有责任制，没有责任制不行。农业方面也要有责任制，首先要包工，一个生产队下面分几个作业组，这是临时的，不是长期的，按照季节包工。人数多少要看情况，你包这一片，他包那一片，把地界划清，分工明确，责任清楚，不要马虎。作业组包工下来，也不是所有的活都一齐干，大的农活集体干，比如犁田、耙田可以几个人搞，插秧两个人就不行，起码是两个人插秧两个人拔秧、一个人挑秧。适宜个人干的，比如耘田、锄草、看水等完全可以包到户，为什么一定要一大堆人一起干呢？需要三个人干的就三个人干，需要五个人干的就五个人

* 这是邓子恢在中央党校所作关于农业问题报告第二部分中的第三个问题和第四部分中的第一个问题。

干，需要一个人干的就一个人干，这不是个人单干，是集体分工合作。有的按季节包的，但有的活要长期包。比如种菜，和粮食作物不一样，技术性很强，比如浇水，太阳出来时不能浇，要在下午太阳落的时候才能浇。长到什么程度要拔，哪一种蔬菜上什么肥，要多少水，多少时间浇一次，这都有很高的技术性。这要包到户，这一块菜地包给你，包四季。有一些技术活要包几年，比如茶叶树。福建有的茶树归小组包产七年，妇女自由结合为一个组，包一块，七年的时间。这棵茶树一年应该采多少，其中春天采多少，秋天采多少，采多了明年就没有了。所以不能包一年，包一年今天都采完，明年就没有了。水果为什么减产？就是没有专人管理。老百姓说，有的果树一年四季有四十二道工序。老农捉虫是很有本事的，是钻心虫，他在晚上十二点坐在树上，听到虫叫，然后拿钩子一钩就有。所以必须要长期专人管理，不能马马虎虎你来一下我来一下。福建龙溪是大的包到组，小的包到户，包多少产，超产归他，减产他赔，或者是按产记工。所以茶叶、水果、核桃都要这样，不能和种粮食作物一样。要按照作物的特点来规定包的办法，有的包到组，有的包到户，有的包一年，有的包几年，造林就要包几十年。总之要根据作物的特性，分别规定管理的办法。

要做到这一步，要有有经验的、负责的队伍来负责。我过去研究过一下，河北、东北的经营地主、富农，有的雇两个长工，有的雇十几个长工，有雇二十个长工的。他有一个大把头，是地主的狗腿子，对种地很有经验。大把头下面有十几个长工就有一个二把头。二把头下是长工。他边管边教，你做得不行，他就教，不听就骂，你再不听，他回去报告就开除你。他们领导生产有经验、有技术，我们要向他们学习。当然，他不好的东西不学。我

们要有队长，像过去的“大把头”，队长下面有作业组长，像“二把头”。队长、组长、自己要懂得，自己不懂，怎么教人家呢？你不会，人家会做，你管不了他。可以派老农当组长，边管边教。山西有一个小队搞得很好，老农带小伙子，边管边教。和船老大一样，组长的工分要高一些。我们这几年老农倒了霉，他作活仔细，结果工分低，青年小伙子打冲锋，工分多。这是不公平的，光顾数量不顾质量不合理。老农当生产组长，要有职有权，有管理的责任，有权限，不听话可以批评，这样就能把青年小伙子的技术带高了。

要有严格的验收制度。比如插秧怎么验收？当天不验收，第二天、第三天也不验收，第四天验收，插得不好就死了，死了的要补。就要你来补，你为什么这样插，扣你的工分。耘田、锄草也是过三天验收，锄得不好禾苗就倒了。这些不要天天验收。割稻子要天天验收，看你割干净没有，谷粒掉下来多少，掉多了不行，扣工分，他就不敢马虎了。现在对犁田、耙田怎么验收，还没有想出办法来。什么人来参加验收？队长不一定参加，或者是找个把老农当顾问。现在有的生产队聘请二、三个老农当顾问。也可以联合验收，你犁田、耙田，我插秧的来验收，上一道工序由下一道工序来验收。你这里犁得马虎，那里没有犁，他来插秧就插不好，所以他认真了。还有一种是田间管理包到户，由包的户来验收，这一片是包给我的，因此，你在这块田里犁田、耙田、插秧、割稻我都参加验收，你搞得不好，我就提意见。

要有明确的奖惩制度，不但是看数量，首先是看质量。质量好的，应该奖你工分。比如广东有一个地方，一亩地是十分，八个工分是数量，二个工分是质量，质量不好就扣你二分。农活主要是讲质量，质量不好就不能增产。田间管理包到户要有超产奖

励，比如一亩田正常年景可以打五百斤，打了六百斤，超产部分归他，或者是二八开，这样他的积极性就来了，耘田、锄草三次，肥也多了，鸡、鸭下田也管了。过去看见鸡、鸭下田，他就说：队长，鸡、鸭吃你的庄稼了。有的根本不讲。农活生产责任制不和产量结合是很难包的。因此，有的地方田间管理包产到户，搞得很好，全家人起早摸黑都下地了，农民的私有心理是突出的，凡是包产到户的，自留地和大田一样，没有区别，因为包产到户了超产是他的，责任心强，肥料也多。没有包产到户的自留地搞得特别好，而大田就不行。不能把作为田间管理责任制的包产到户认为是单干，虽然没有统一搞，但土地、生产资料是集体所有，不是个体经济，作为田间管理包到户，超产奖励这是允许的。但是，要领导好，领导不好可能走到个体。

劳动上因材施教使用，分工合作，首先是小队长要有长计划和短安排，比如明年一年种什么，种多少，然后再短安排，按照季节，农忙时搞什么，农闲时搞什么，没有短安排不行。计划定了以后，要由小组包工，不能由队长派工。因材施教，因人派活，因活派工。什么是因人派活呢？你能做什么派什么，民主派工，自报公议，会犁田的犁田，会插秧的插秧，各尽所能，不能光靠队长一个人派工。五天一派工，死任务活时间，比如规定五天插完秧，你三天插完也可以，二天插完也可以，上午出工也行，下午出工也行，时间是活的。这是广东一个山区的大队队长创造的，他说，我一九五五年当队长的时候，天一亮就起来敲钟，八九点钟大家才集合下地，十一点钟就回来了。他认为，这样不行，就改进了一步，规定每人一定要劳动八小时，不劳动八小时就扣工分。第二阶段是死时间，因此，大家在地里磨洋工，磨八小时算了，工效很低，很多是无效劳动，八小时不如过去三小时干的活。他一看

这样不行，就来了一个第三阶段，死任务，活时间，你活干完就行，不敲钟，八小时也行，三小时也行。五天一派工，不是天天派，这样搞得不错。现在又是一个新的阶段，就是质量不高，大家抢工分，因此又提出数量完成了给八个工分，质量算二个工分，你质量不好，那二个工分就不给你，这样一来，质量也高了。这样既分工又合作，改变了一窝蜂的现象，不是军队操练式的，那是开玩笑。

牲口、农具的管理。牲口一定要分户喂，前几年，牲口死得多，和大槽喂养有关。大牲口、小牲口合在一起喂，大的吃得快就吃得饱，牲口有高有低，小牲口低吃不着，大牲口踢小牲口，小牲口又吃不饱。分槽喂养要有条件，一个牲口一个槽，并且要有好的有经验的饲养员才行。现在没有这个条件的，一定要分户喂养。过去黑龙江一定要大槽喂养，结果牲口死了很多，现在改为分户喂养。分户喂养给他工分，草料多，喂得好，以后下了小马、小牛和他对半分，今年下了一头归你，明年下了一头归队，这样他就照顾得好，很精心管理。最好是分户喂养，养用合一，现在是你养我用，我就拼命用，本来一个牲口一天犁四亩，我犁八亩，结果牲口累坏了。

农具应该个人管理，定出奖惩办法。如规定用一年的农具，不到一个礼拜就坏了，要罚。应该是三年修理的，你用了四年不必修，就奖励。南方的船，北方的车，都要有专人管理，给他规定几包几定。

财务要公开，工分帐、粮食帐要公布。

关于人民公社与总路线问题

（一）人民公社问题。

有些同志提出人民公社是否办早了？我认为，不是办早不办早的问题，而是办什么样的公社，是办现在这样的公社，以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现在就应该办；如果办像从前那样以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公社，再过三十年也不行，恐怕要到五十年以后。

有的同志说，现在的公社究竟是不是名存实亡，究竟是什么性质？我认为，不能说是名存实亡。中央决定，人民公社的基础是生产队，人民公社、大队是经济联合组织。去年冬天，中央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生产大队是生产队的经济联合组织。假如当时在初级社转高级社时期……不是由高级社统一分配，而是作为联合社，那就很好了，没有平均主义，问题就不会多，情况还要好。毛病在哪里呢？就是把初级社的所有制都统上来，就不是联合社了。对联合经济组织来说，现在生产队是老板，大队是管帐先生。但是大队和社干部对这一点不明确，他们不认为自己是管帐先生，而是上级、下级。既然是联合社，有什么上级、下级？联合社是老板，你是老板聘请的，你不好好干，就把你换了。现在公社真正的老板是生产队，但公社、大队不接受，要瞎指挥，晚上开会吃夜餐，有鱼吃，有鸡吃，生产队没有权。这样非把生产队搞垮了不可。办联社就是把大队和公社的职权取消了，生产队自愿联合。比如农产品加工，制造农具等，一个生产队办不了，三个、五个，十个、八个生产队联合起来搞，赚了钱大家分，这样才叫联合社。大队举办的企业，一个生产队办不了，联合起来办，愿意参加就参加，不愿意参加就退出，完全是自愿、互利。在

政治上要少数服从多数，经济上不能。我吃亏，不干，可以不参加。不要按照行政计划办，真正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结合，可分可合。在经济事业里不要搞运动，运动一来就有声势，声势来了怕右，不愿意也愿意了。对敌斗争要搞声势，而且要搞超过敌人的声势，办经济事业搞这样的声势就不对。完全是采用经济法，完全互利。互利才能自愿，不自愿，不要强迫命令，强迫命令是不能长久的。

初级社、高级社是好的，是需要的。但现在看的很清楚，那时一开始就有问题，初级社时是土地入社，耕畜、农具不入社，高级社时是耕畜、农具都入社。现在看，如果采取耕畜、农具不入社，公用合理报酬，这样牲口不会死的这么多，农具也不会坏的这么多。土地是死的，牲口就不行，这是活的，有生命的东西，饲料里面放上一个钉子，第二天就死了。高级社主要的毛病在于不是联合社的办法，而是把初级社的所有制都统上来，平均主义。现在有人说，初级社转到高级社取消了土地报酬，如果分配固定了比较好一些。初级社开始是对半分，比如产量是五百斤，其中二百五十斤按劳分配，二百五十斤作为土地报酬，如果过了二年由对半分改为四六分，三七分，逐渐降低土地报酬的比重，情况将有不同。这样讲也有些道理，但这还不是主要的毛病。高级社主要的毛病是把所有制统上来了。现在要下放，如果不统上来，现在就用不着下放了。

人民公社如果是经济联合社，它有优越性，它可以为生产队的需要服务，比如农产品加工，农具制造，修水利。农业机械化靠一个生产队不行，给你一个拖拉机站，生产队就不行，要靠联合。这么大的统一生产，大队可以搞，可以为生产队的生产需要服务。这样联合起来可以抽一些公积金，从生产队积累中抽百分

之十给联合社，几个百分之十合起来就多了，产业也就大了。能够办联合企业的就办联合企业，比如榨糖、榨油，办水电站就可以几个生产队联合起来办，这样比较好。

过去说，人民公社是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现在不讲了，现在没有条件，将来还是可以的。有了大规模多种经营，公共积累大了，有了机械化，就可以逐步过渡。将来大队的公积金多了，资金大了，办的企业都赚钱，把所有生产队的工资完全包起来，投资包起来，生产队包上交产品、包上交利润，超产部分归你，这样生产队就喜欢了，因为他不吃亏。正如毛主席所说，过去公社、大队是共人家的产，将来是生产队共大队、公社的产，小队就欢喜了。大队包小队，变成了大队所有制，将来公社包大队，这样变成了大集体。进一步全国机械化了，资金多了，群众的觉悟程度也不同了，国家是向公社包工资、包投资，公社向国家包上交利润，这样就变成国营农场了。这样大家不吃亏，过去是你是一个“空军司令”，不能发工资，把人家的钱抓来发工资，这怎么行呢！

现在虽然走错了一些，但是把路走出来了。少奇同志说：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失败了，现在公社变成实际可行的东西了。将来还会发展到共产主义。这要经过很长的时期，生产大发展了，物资非常丰富了，人民的思想也改变了，劳动成为愉快的事情。所以应该说中国走社会主义这一条路是对的。就是经过集体化，经过联合事业，逐步发展，现在是生产队核算，将来是大队核算，然后是公社核算，最后全民所有。名称不一定叫人民公社，但总是要走联合社这个形式。

对包产到户的看法*

(一九六二年八月十日)

昨天晚上，我看到西南组的简报，谈到我对下放干部讲话^{〔1〕}的问题。当时在讲话中并没有提倡包产到户，而是谈贯彻《六十条》以来，增产还不是很快的原因：一是所有制还不固定；二是干部特殊化，农民负担过重；三是征购任务没有定下来；四是经营管理问题还没有解决好。

关于经营管理，一九五七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搞了三个文件^{〔2〕}，总结了高级社的经验。这三个文件都经中央批准，但是到一九五八年以后被打乱了。现在的经营管理还是一九五七年那一套，主要问题是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加强生产责任制；各尽所能，分工合作。任何企业都要建立责任制，没有责任制，生产搞不好。在农村，一九五七年有一条经验，就是按季包工、小段包工，避免天天派工；有些技术性较强的作物，如南方的茶叶，东北的柞蚕等，也可以包产到户。责任制联系产量，只要不涉及所有制，是可行的。

在讲话以前，我已经看了陶铸同志^{〔3〕}等在广西调查的那个文件^{〔4〕}，讲话中也讲了集体经济区别于单干的“四条界限”。我认为，

* 这是邓子恢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华东组的发言。

分田到户、包产到户、井田制、包上缴等，事实上是单干；但有些地方，责任制联系产量就不一定是单干。因为生产资料主要部分是集体所有的，劳动力是统一调配的，生产是统一规划的，产品是统一分配的。因此，要具体分析，不要笼统都说是单干。单干没有那“四条”，有“四条”就不是单干。

在这个问题上，我的思想也有一个过程，原来对包产到户是不赞成的。后来看了一些有关包产到户的材料，听了一些干部的反映，部里派了几个工作组去安徽回来汇报，说安徽有些地方“责任田”“五统一”^{〔5〕}统起来了，大农活统一干，小农活包到户。我认为，决定关键是大农活统一干，只要有“四条界限”就不能说是单干。我现在对“责任田”还是这种看法，要作具体分析，安徽的“责任田”也有搞好了“五统一”的。

注 释

- 〔1〕 指邓子恢一九六二年六月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下放干部会上的讲话。讲话内容参见本书《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及人民公社、总路线问题》一文。
- 〔2〕 指一九五七年九月全国第四次农村工作会议制定，经中共中央批准的《中共中央关于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做好农业合作社生产管理工作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关于在合作社内部贯彻执行互利政策的指示》。在合作社的管理方面，文件规定：“合作社必须在有利于巩固统一领导、发展生产的前提下，建立‘统一经营，分级管理，的制度。”“必须普遍推行‘包工、包产、包财务，的‘三包制度’并实行超产提成奖励、减产扣分的办法。”“生产队在管理生产中，必须切实建立集体的和个人的生产责任制，按照各地具体条件，可以分别推行‘包工到组，，‘田间零活包到户’的办法。”合作社必须坚持集体劳动的根本原则，既要明确分工，又要互相协作，并要合理

使用劳力。”“必须充分利用社员的一切劳动力,合理分配社员的工作,切实执行统筹兼顾、逐步安排的方针。”另外,文件还规定合作社规模的大小,一般应以百户以上的村为单位,实行一村一社。过小的自然村可以几村一社。过大的自然村可以一村数社,生产队的规模以二十户左右为宜。合作社的技术措施和耕作措施,必须强调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等。

- 〔3〕 陶铸,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
- 〔4〕 那个文件指一九六二年六月陶铸等在调查了广西龙胜县农村包产到户情况后向中共中央等的《座谈记录》,提出“划清集体经济与单干的界限”,受到毛泽东主席的好评,认为“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之后所提出的意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
- 〔5〕 五统一指主要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生产统一计划,劳力统一调配,大农活统一安排,生产收入统一分配。

信用合作社在我国现阶段的历史使命*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

信用合作社的基本任务

建国以来，党和政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不同时期，对于农村信用合作社的任务，都曾作过明确的指示。从党和政府历次的指示中可以看到，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基本任务，是在国家银行的领导下，依靠贫农、下中农，联合中农，开展存款、放款的信贷活动，帮助有困难的社员解决生产和生活困难，向高利贷作斗争，同时支援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党对农村信用合作社所提出的这些基本要求，不仅在过去是适用的，而且在今后一个很长时期内仍然是适用的。

高利贷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产物。在旧社会里，地主、资本家的残酷剥削，迫使广大劳动农民陷于贫穷破产的境地，而高利贷如同马克思所指出的，它像寄生虫一样吸吮着农民的血汗，而又使他们牢牢地依附在地主的土地上。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高利贷对农民的剥削更为残酷。它是劳动农民穷困和遭受灾

* 这是邓子恢为《红旗》杂志一九六三年第二十三期写的文章第二、四、五、六部分。

难的重要原因之一。消灭高利贷的根本途径在于，打倒反动阶级的统治，消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并进一步引导农民由集体化的道路，走向共同富裕。我国的情况正是这样的。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取得全国胜利以后，经过土地改革，以及通过互助组、初级农业社和高级农业社等一系列的步骤，引导农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而后又建立了人民公社。这是消灭高利贷剥削的根本保障。但是，由于我国当前的农业生产水平还很低，还不能在更大程度上摆脱自然灾害的威胁，农民的收入水平还不高；由于现阶段的农村人民公社仍是实行等价交换、按劳分配的原则，社员之间劳力多少、强弱和收入不尽相同，这就仍然存在着一部分人资金不足而需要借贷，另一部分人资金有余的情况。这样，群众之间互通有无的利息不高的借贷，当然允许合法存在。但是，非法的高利贷活动，也就有可能伺机而起。

正因为上述情况，我们防止高利贷活动的根本问题在于，巩固农村人民公社，发展农业生产，并在逐步实现农业技术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增加农民收入，为农村人民公社向高级阶段发展和农民进一步共同富裕创造物质条件，从而也就从根本上消除了高利贷产生的可能。但是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实现上述的宏伟目标需要有一个很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尤其是在遇到灾荒歉收的情况下，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队和贫农、下中农社员，在生产和生活上难免还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这就要求农村信用合作社在国家银行的领导下，能够帮助有困难的社员解决生产和生活上的资金需要，并多方面帮助生产队克服困难，有力地支援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

总之，既要巩固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为最终消灭高利贷创造物质基础，同时又要办好农村信用合作社，防

止高利贷活动，以支援社员生产生活，支援农业集体经济。这两方面的工作要很好地统一起来，不能有所偏废。

综上所述，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基本任务，应该是：

第一，依靠贫农、下中农，联系中农，开展信贷活动，积极帮助有困难的社员解决生产、生活上的资金困难，防止高利贷活动，直至最后消灭高利贷。农村信用社的资金运用计划，要注意与国家银行的贷款计划密切配合，互相衔接。应该尽先把信用合作社的资金，用于帮助有困难的贫农、下中农社员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困难。信用合作社资金不足的，银行应给予支持；信用合作社资金有余的，也可按照国家规定的贷款政策，直接对生产队发放贷款。但是，信用合作社直接办理生产队的贷款业务时，注意不要使生产队占用信用合作社的资金过多，以免影响对社员生产和生活贷款的主要业务。

第二，办理农村储蓄，吸收农村闲散资金，调节农村货币流通。

第三，积极配合国家银行，用好、管好国家支援农业生产的各项资金，协助国家银行做好对生产队的贷款工作，以支援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

信用合作社的组织形式

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组织形式，应根据群众性组织的特点和它所担负的基本任务，从便于接近群众，便于群众存款取款，便于群众贷款还款，便于群众监督的原则出发，因地制宜地设置，多种形式并存，不必强求一致。就各地的经验看来，大致可以有以下几种形式：

第一种，是按公社设立信用合作社，按大队或几个大队联合设立信用分社或信用服务站，生产队设立信用社社员小组。这种组织形式适合于按原来大乡范围设立的公社，实行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制的地区。它的优点是便于公社党委的领导，便于与农业生产等各项工作密切配合，同时由于社区范围大，业务量较大，费用开支比较节省。缺点是中间环节多，领导不方便。如果不设立中间环节机构，群众存款取款又不方便，会影响业务开展，并且不便于群众监督和实行民主管理。

第二种，是按大队或几个大队联合设立信用合作社，在生产队设立信用合作社社员小组，在公社一级设立联社。这样设立的信用合作社，它的社区范围大致相当于公社化前按小乡设立的信用合作社。这种组织形式的优点是社的辖区较小，存款取款方便，便于群众监督和实行民主管理。问题是占用脱离生产的干部较多些，并有一部分信用合作社的费用开支有困难。一般地说，费用开支的问题经过改善经营管理，积极开展业务，是可以解决的。

第三种，在某些地区公社范围很小，公社以下不设大队的，则可以按公社设立信用合作社，在生产队设立信用合作社社员小组。公社所属生产队比较多的，可由信用合作社干部分片包干，经常到小组去办理存放款。

第四种，是在渔区、牧区、少数民族集中居住地区，以及少数与全民所有制农场合并在一起经营管理的公社，信用合作社的组织形式，也可以适应地区的特殊情况，与一般农业地区有所不同。

总之，农村信用合作社组织形式的研究和确定，必须注意以下两个原则：

第一，农村信用合作组织的设立，既要便于领导，又要便利

群众；既要注意到便利存放款业务的开展，又要注意到与供销社、粮食等财贸部门的工作配合；既要注意现行的行政区划，又要考虑到自然地理条件、传统的经济联系和信用合作社的原有基础。一般地说，应该更多地考虑做到便利群众，便于开展存款放款业务。

第二，确定信用合作社的组织形式，应认真贯彻群众路线，听取群众意见，不能由少数干部自行决定。信用合作社是群众性的资金互助组织，究竟如何设立，应集中群众意见，提出几个方案，说明利弊，让群众反复讨论，互相比较，然后再提交社员代表大会讨论通过。这是关系到是否认真贯彻执行民主办社方针的重大原则问题，不能忽视。

信用合作社的组织领导 及其与国家银行的关系

农村信用合作社是群众性的资金互助合作组织，它应当按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由社员当家作主，实行民主办社。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信用合作社的最高权力机关是社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由社员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

第二，信用合作社章程由社员代表大会民主讨论通过。

第三，信用合作社的组织机构、人员编制、贷款限额、信贷计划、利息标准、干部福利待遇等重大问题，都要经由社员代表大会讨论决定。

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实行民主办社，是尊重集体所有制经济的财权、人权、经营管理权，从而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办好农

村信用合作社的保证。经验证明，信用合作社凡是能认真贯彻执行这项原则的，就能够做到群众拥护，组织健全，业务开展，否则就会脱离群众，组织涣散，业务停顿。

现阶段，我国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只有单独核算的基层组织，而没有其上级联社机构。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银行作为国家的金融管理机关，要负责指导农村信用合作社的业务活动。信用合作社业务上的重大事项，诸如确定贷款政策、制定资金运用计划，调整存放款利率等，都要提交社员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后，报银行审查批准。银行还要协同地方党委，做好信用合作社干部的配备、训练等组织工作和思想工作。

银行和信用社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两种不同形式。一个是全民所有制经济，一个是集体所有制经济。国家银行是领导力量。两者既要相互支援，共同发展，以巩固社会主义的农村金融战线，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繁荣，又要承认两种所有制的差别，划清界限，正确处理两者的关系。银行要从资金上、人力上积极支援信用合作社，成为信用合作社强大的后盾，信用合作社要在国家银行的领导下，充分发挥开展农村信贷业务，防止高利贷活动的助手作用。国家银行应该从政策上、业务上加强对信用合作社的领导和帮助，但又不能包办代替，要注意从经营管理、资金运用、干部人选等方面，帮助信用合作社贯彻执行民主办社原则，尊重群众意见。银行在与信用合作社的经济往来中，应该按照互利原则，存款计算利息或付给手续费，以发挥信用合作社独立自主经营的积极性，维护集体所有制经济的正当利益。信用合作社在经营上，则应依靠群众，勤俭办社，力求做到自力更生，不依赖国家。事实证明，凡是办得好的信用合作社，都能做到开支自给或基本上自给。同时，也有不少信用合作社还提留了为数可观的公共积累，当

然必须看到，国家的援助也是不可少的。在信用合作社遇到农业生产因灾减产，资金周转不灵，或经济条件较差，存款来源较少，暂时不能维持开支等困难情况下，国家银行应该给予以适当支持，满怀热情地帮助信用合作社克服困难。

信用合作社的整顿巩固工作

农村信用合作社要经常不断地整顿和巩固，这是信用合作社健康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目前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经营管理情况大多数是好的或基本上是好的。但是还有相当一部分信用合作社办得不大好或者很不好。各地农业银行应该在当地党委的领导下，抓紧时间，经过调查摸底，分类排队，制定规划，分期分批地进行整社工作。

为了做好整社工作，首先，要引起各级党、政领导和银行的重视，使大家深刻认识到，农村信用合作社是农村金融战线上国家银行的有力助手，是贫农、下中农生产生活上的资金互助组织，是防止高利贷活动的一支劲旅。只有明确认识，引起重视，信用合作社的整顿工作才有可能逐步开展起来。

其次要建立整社的领导机构，组成整社队伍。目前农业银行已经成立，各地党委应迅速把各级银行，特别是县支行的信用合作部门配备起来，以此作为整顿信用合作社的县领导机构，并调配得力干部作为整社队伍，在党委领导下经过试点，逐步推广，分期分批地整顿全县的信用合作社。

第三，必须保障信用合作社的资金所有权。农村信用合作社的资金为信用合作社的全体社员所有，任何机关、企业和个人不得抽调。凡是违反政策规定抽调了信用合作社的股金、公积金、存

款等各项资金的，应区别情况认真加以处理；凡是国家各部门动了信用合作社资金的，应由有关国家部门负责清理归还；凡是国家银行放出的贷款，则转作信用合作社贷款的，应如数冲转银行，并退回所占信用合作社的资金；凡是国营商业、粮食等部门与社队发生的债务关系而转作信用合作社贷款的，应由有关部门负责清理，并退回所占用的信用合作社的资金。必须强调，任何机关团体企业，都不得违反政策和制度的规定，随意抽调、动用信用合作社的资金，以切实保障信用合作社集体经济的所有权。

第四，要彻底清理帐目，收回挪用资金，建立和健全资金管理制度。要根据中央规定的政策，采取群众路线的方法，依靠贫农、下中农，在信用合作社组织中认真进行清理帐目，清理债权债务，清理资金的“三清”工作。对于不正当占用的资金和拖欠的贷款，应立即清理收回，暂时无力归还的，应定出还款计划，限期收回。对于贫农、下中农的困难户，确实因生活困难较大，无力归还到期贷款的，经过清理后应主动照顾，缓期收回。经过“三清”后，要建立和健全资金管理制度，任何单位、任何个人，不得违反制度，随意挪用信用合作社的资金。信用合作社的干部，有权拒绝那些违反制度动用库款和贷款的要求。此外，在一部分老灾区、经济贫瘠地区和困难较大地区的信用合作社，经过“三清”整顿后资金仍甚困难，国家银行应该积极地设法给予支持，使其在业务上逐步活动起来。

第五，整顿信用合作社组织，纯洁干部队伍，健全民主管理制度。凡是信用合作社缺乏专职干部，或虽有专职干部但长期调做其他工作的，应迅速调回原干部或另配干部加以充实；凡是信用合作社人选不当的，应适当调整。信用合作社的领导权一定要掌握在贫农、下中农的手里，社员代表会、理事会、监事会应该

树立贫农、下中农的政治优势。对于信用合作社的干部，要挑选政治可靠、热心信用合作事业，在群众中有威信的人来担任。同时，要建立和健全社内的各项管理制度，加强群众对社务、业务和财务的监督。

第六，要解决某些信用合作社干部生活的实际困难，适当调整干部工资等待遇。农村信用合作社与供销合作社同是集体经济组织，其干部的工资、福利等待遇，原则上应该与农村基层供销社干部的待遇一致起来。

第七，要结合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启发广大群众的阶级觉悟，发动贫农、下中农群众经常进行防止和打击高利贷活动的斗争，积极地树立信用合作社在群众中的威信。为加强信用合作社的资金力量，在群众自愿的基础上，适当扩大股金是必要的。存款是信用合作社资金的主要源泉，股金积累是巩固信用合作社必要的物质条件，两者都不应该忽视，通过整顿，凡是有条件的信用合作社，都应该按社章规定给社员分红，以昭信守。信用合作社应积极举办储蓄，吸收存款，以回笼货币，这是农村金融战线上的一项很重要的工作。

关于农村集体固定资产 折旧存放款工作试点的报告*

(一九六四年九月十八日)

我今年八月间带了两个工作组到旅大，一是人民银行总行工作组，在大连市总结了几年来商业信贷工作，肯定了该市近年来改进商业信贷的作法。另一个是农业银行总行工作组，在金县大孤山公社举办了固定资产折旧存放款的试点工作。该公社共有十六个农业大队，一百一十生产队，四个渔业大队，另三个渔业生产队，全社四千三百多户，二万一千多人，三万亩耕地。工作组先在魏家大队、二道河子大队及另一个渔业大队(大孤山捕捞场)试点，开始时经过贫农协会和层层干群会议动员解释，但干部和社员思想上都有抵触，怕提折旧后影响社员分配，怕折旧存款抵还农贷，怕将来并队时吃亏等等。因此，工作组改变了工作步骤。

第一步，先从清理固定资产入手。将各生产队所有的牲口、农具、大车、装粪箱及渔船、网具等进行清查登记，估价对帐。清理结果，二道河子大队全部固定资产总值只有九点七万元，但却负债九点八万元，产债相抵后尚亏空一千元；魏家大队资产总值十四点五

* 这是邓子恢写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并报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报告。

万元,负债十三点七万元,产债相抵后只存八千多元;大孤山捕捞场固定资产二十六万多元,负债十八点六万元,产债相抵后只余下七点四万元。经过清理对帐之后,干、群大吃一惊。大家说:原来以为年年提积累,队里还有大骡大马、大胶车,家底不错,现在才知道这是“拉别人的被,盖自己的脚”。接着分析亏损的原因,除了贪污、浪费和前几年大队下放债务外,主要是集体固定资产管理不善,没有建立财产管理责任制;其次是没有提留折旧,耕畜、农具每年消耗部分得不到补偿,到了更新时就要举债。大孤山捕捞场的木帆船虽然提留基本折旧,但未提留大修理折旧,到大修理时仍然要举债;最后是机械地执行少扣多分原则,荒年少扣多分,丰年也少扣多分。有些队则存在着分光吃光思想,有时把原积累也分掉了。

第二步是建立固定财产管理责任制。把各队现有的牲口、农具、大车、粪箱以及渔船、网具等,都逐件登记,编号造册,建立卡片制度,并订立严格的管理责任制,按各类性质,分集中保管(指仓库)作业组保管和个人保管三种,逐件实行五定、六定、七定责任制。如大车五定(定专人、定车、定载重量、定使用年限、定奖惩),船只六定(定人员、定船网、定年修理费用、定消耗、定年限、定奖惩),牲口七定(定人、定耕作面积、定草料、定粪肥、定工分、定使用年限、定奖惩)。

第三步便是实行折旧制。办法是按各牲口、农具当前的中等价格,除去将来更换时可能保留的残值,再按正常使用年限,分年摊提折旧金,存入银行,到了死亡报损需要更新的时候,可以从银行提取折旧存款重新购置;折旧存款不足,可以按折旧额向银行申请贷款,专款专用。他们规定:

一、骡子,现值二千元,除去残值五十元,按二十年摊,每年应交折旧金九十七点五元,更新时银行贷款一千九百五十元。

二、马,现值一千六百元,除去残值五十元,按十八年摊,每年交折旧金八十一元,更新时银行贷款一千五百五十元。

三、牛,现值三百五十元,除去残值七十元,按十二年摊,每年交折旧金二十三元,更新时银行贷款二百八十元。

四、驴,现值一百元,除去残值三十元,按十四年摊,每年交折旧金五元,更新时银行贷款七十元。

五、牲口倒换,如以公换母,以弱换强,以牛驴换骡马,银行只按原公畜、骡畜及牛驴原折旧额发放贷款,其增值部分由生产队用公积金补足。在更换老畜时,如生产队用自己繁殖的幼畜补充,也可以向银行照例领取贷款,所领之款转为公积金,仍然转存银行,或作为归还农贷之用,有些穷队也可以作为畜牧业收入,用于分配。

六、大胶车,现值八百元,使用年限十年,但十年中要大修三次,共需六百元,因此,每年要交基本折旧八十元,大修理折旧六十元,共交一百四十元,更新时贷款八百元,大修时贷款二百元。

七、大粪箱,现值一百八十元,按十年摊,每年交折旧金十八元,更新时银行贷款一百八十元。

八、木帆船,现值五千元,使用年限三十年,五年大修一次,共需费一千五百元,每年应交基本折旧一百六十七元,大修理折旧三百元,共交四百六十七元。更新或修理时由银行贷款。

第四步,建立固定财产管理机构。公社一级设财产管理委员会,由公社推选一个副社长兼主任,营业所所长兼副主任,大队设领导小组,生产队设管理小组,指定一个副队长兼组长专职管理,其任务:(甲)定期清查登记各种固定资产;(乙)检查督促固定财产管理责任制的贯彻执行,严格奖惩制度;(丙)动员和监督折旧金的提存和使用;(丁)统一制定本社队耕畜、农具、船网、渔具的更新和

修理计划，调剂各队耕畜进出补充，及材料购置等。

在两个农业大队、一个渔业大队试点结束以后，便在全公社铺开。据统计，全公社农业队固定资产总产值区一百零四万元，而负债却达八十二万元，相抵之外，现有资产只存二十二万元，今年应提折旧金七点九万多元。现在一百零四个生产队都与银行营业所订立了折旧存放款合同，银行则从明年起，按合同规定发放贷款。据他们估算，存贷相抵，每年多存一至二万元，只到了第六年要多贷九万多元。这样银行在资金上可以调剂得来。今后属于设备更新方面可以不要长期贷款了。至于渔业大队，因为去年省市下发了十几艘机船，价值偏高，耗油量多，收入少，亏损大，大家不愿意要，因此，提了折旧之后银行只存不贷，不愿意实行存贷结合办法。这个问题要在处理了机船之后再定。

以上便是大孤山公社固定财产实行折旧制的试点情况。在这次试点中发现以下几个新问题、新制度，值得重视。

一、关于固定财产清理问题。现在看来，凡属集体所有的固定财产，包括耕地、经济林木、渔塘、牲畜、农具、农船、渔船、网具、小型机器、仓库、温室、晒场、房屋等都应该仿照工业系统的“清产核资”办法，来一次全面清理。在各基本核算单位范围内，把所有固定资产逐一清查登记，编号造册，并按现值估价得出总产值，除去债务，看自有资产多少；过若干年再清理一次，看这些资产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以此作为考核经营管理的好坏与成绩大小的标志之一。固定财产的全面清理，特别在追查亏损原因时，更便于揭露四不清^{〔1〕}现象和根源，因此，应把它作为“四清”^{〔2〕}工作的一部分，并与“四清”工作结合起来进行。

二、关于建立固定财产管理责任制。现在看来，集体财产与个体不同，个体农民对自己的东西爱护无微不至。对集体财产管理，

除了加强政治工作，提高社员自觉外，还必须有一套严格的管理责任制。因此，应该肯定，凡是集体所有的固定财产，无论集中保管的，作业组保管的，或个人保管的，都必须按各类特点，分别规定“几定保管责任制”，并建立“卡片制度”，由财产管理机构负责，定期检查评比，严格执行奖惩制度，以便结合政治工作，彻底克服目前不少地方存在财产管理的混乱状态。

三、关于折旧制度，应该肯定，凡属集体所有多年消耗的生产资料(固定财产之一部)，必须按年提留折旧金，存入银行，实行存贷结合办法。这样才能保证现有资产保本保值，不再亏损；才能保证以后更新的资金有可靠来源；也才能认真核实成本，建立经济核算制度。过去个体农民没有留折旧，往往因为死了耕畜，便借贷负债，以致破产困穷，集体经济应以此为鉴。现在全国已有十一个省、市，三十五个县进行折旧存放款试点，北京门头沟永定公社也已改为存贷结合办法。事实证明，折旧制是办好企业经营管理必不可少的根本制度之一。全国农区现有耕畜役畜四千万头左右，按每头每年平均提留折旧金五十元计算，即达二十亿元，加上大中型农具、船只、小型机器、果树、温室等，估计每年折旧金将近三十亿元。如果再不提折旧，等于每年从农业集体经济中抽出三十亿元给社员分掉，这对集体经济的巩固发展是很不利的。到了这些财产更新时，势必要国家发放长期农贷，这不仅增加国家负担，而且还可能要逐年增加农贷的呆帐、烂帐，这对农贷制度的改革也是不利的。有些同志想以牲畜繁殖来代替牲畜折旧。我认为，繁殖牲畜是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环节，但不能以此来代替牲畜折旧。因为各队所有牲畜与各畜种的繁殖力不平衡，有的队母畜多、繁殖力强，有的队母畜少或者没有母畜、牛驴马有繁殖力，而骡子则不能繁殖。同时牲畜留折旧，可以保证自力更新，而自己繁殖的幼畜，到了出卖或

参加使役时又可以得到现金，增加牧业收入，两者并无矛盾。因此，牲畜折旧应该普遍举办，不能以繁殖来代替。

四、关于分配原则。我在大孤山公社召开座谈会时，发现社队干部对少扣多分这条原则也有些机械了解。大孤山公社在辽宁省是属于中等偏上的社队，一九六一年以来，按社员人口平均计算，每年每人分得七十元左右(家庭其他收入不算)，今年年成不差，他们还想增加分配额。如魏家大队去年分配六十八元，今年除提留折旧外，还拟分配七十二元。该大队长说：“过去我们只怕社员分配少了，大队长不好当，因此，总想提高劳动日值，别队分一元，我们就要超过一元以上，结果是分了固定财产，使家底越来越空”。从此可见社队干部在分配上的思想情况，他们从社员眼前利益着想多，而从长远利益扩大集体财产着想少，有的甚至把积累也分掉了，重个人轻集体，这实际上也反映了两条道路的斗争。因此，在座谈会上，我向他们建议，是否可以把社员分配在六十八元上稳定几年，不再增加，而将多余的款子存入银行，作为盈利。这种存款除以一部份还债外，不准移作别用，只作为将来歉收时以丰补歉之用，在正常年景还可将此款取出来，作为社员按季预支之用，待秋收分配后再归存银行。大家对这个建议表示赞成，准备秋后试办。我到沈阳后向省委汇报时，他们也准备通知各县社分三种情况处理：分配在七十元左右者作为中等队，分配额稳定几年不加；百元以上者为上等等队，可以少分一些钱，作为盈利存入银行，作以丰补歉之用；四十元以下者为下等等队，力求逐年有所增加。我认为，这种分配原则可加以推广。丰收年不多分，歉收年就可以逐步做到不少分，以求社员收入在一定水平上稳定下来。经过一个时期，这种盈利存款多了，不仅可以建立按季或按月预支制度，而且将来还可以进一步建立基本工资加奖励的办法，这对巩固和提高集体经济都有好处。

五、关于社队自有资金管理问题。此次座谈会上，大家提到要把下年生产费现金部分存入银行，专款专用。这个公社每年都没有留下年生产费，而把当年社员分配款扣留百分之二十，叫做“压支”，移作下年生产费之用，不足之数则靠短期农贷和预购定金补充。这是很不正常的，社员也不满意“压支”制度。因此，今年秋收分配后，他们拟将下年生产费现金部分留足，并把它存入银行。各队公积金虽然年年提留，但多被挪作别用，有名无实。因此，今年公积金也拟存入银行，只限于扩大再生产之用。如果这些打算实现了，把生产费、折旧金、公积金以及上述盈利款都存入银行，委托银行，按照社队的使用计划和各种资金的不同用途，监督使用，另一方面，社队的公益金及社员分配款又在秋后分配给社员，那么留在社队自己手里的现金就只有管理费和下年副业收入两项款了，这样社队自有资金就基本上由银行管理起来了。这不仅可以保证社队资金的合理使用，防止贪污浪费，而且可以认真地贯彻奖金上自力更生为主，国家支援为辅的方针，对银行控制货币投放也有很大作用。

六、关于两行营业所设置问题。在座谈会中，大孤山营业所同志提出编制不够用问题。他说，现在营业所只四个人，要管两个公社，二百多个生产单位，如实行折旧制，工作更忙不过来，要求解决困难。我当时除要他把信用社干部（四个干部）总合使用以外，着重提出两行营业所合并问题。据调查，金县共有十八个人民公社，农行营业所十三个；干部五十六人；人行八个营业所，干部四十四人。金县集镇不大，人行在乡间业务不多，尽可以不必单独设立，把这四十多个人交给农业银行营业所，一个机构办两家的事情，既可以统一使用力量，又可以调剂季节闲忙。如果这样办，两行营业所共有干部一百人，便可以按社设所，每所五个半干部，再加上信用社干

部配合，完全可以解决。因此，建议两行迅速解决这个问题。此外，每个公社尚有一个会计辅导员，据说现在多数由公社调作其他工作，前次先念、震林同志指示，把会计辅导员划归农业银行建制，会计辅导业务也归农行负责，这点也望能迅速决定，以利工作。

以上报告和所提建议，如无不当，望批转各省县党委及农业银行分、支行参照试行，如能转发“四清”干部研究，以便结合“四清”运动同时进行则更好。

注 释

- 〔1〕“四不清”，开始是指人民公社生产队中的帐目、库存、财物、工分混乱不清现象；后来扩大为基层组织中政治、经济、组织、思想混乱不清现象。
- 〔2〕“四清”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九六三年五月至一九六六年五月先后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工矿企业和学校等单位开展的一次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运动。这次运动，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在一九六四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一九六五年一月，中共中央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共二十三条。这个文件虽然对“四清”运动中某些“左”的偏差作了纠正，但又错误地提出了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参观两个公社后 给周恩来总理的一封信*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

周总理：

我于十月三十日奉命乘飞机南下，当天下午三时安抵南宁。本拟转往桂林，因腰痛加剧（在京时治疗未愈），在三〇三医院治疗了两个疗程，已有好转，准备休息几天后再去治疗一个疗程。因此，去桂林时间可能推迟到新年之后。

近来，我参观了两个公社。一是武鸣县双桥公社平稳大队，一是南宁郊区心圩公社可利生产队。这两个公社都是粮食高产区，全公社平均亩产从一九六六年的六百斤上升到今年的八百多斤（薯类不算），平稳大队达一千一百斤；可利生产队平均亩产一千斤，最高产量达到一千六百斤，部分第三季稻可收一千六百斤，这就广西来说确是一个大跃进。

这些高产的获得，主要是在广大农民群众提高了毛泽东思想水平的基础上实现了水利化、化学化、机械化、电气化的结果。据

* 这是邓子恢一生中最后一份调查报告。他当时被以“战备”为名“疏散”到广西，不顾年迈多病，仍十分关心广大农民的生产生活，深入调查研究，提出改进工作的意见。

双桥公社革委会韦主任介绍，该公社二十个大队，二百六十八个生产队，五万多人。八万多亩地中，就有八个大水库（该社地处平原），自流灌溉的水稻田就占六万亩。全公社现有中型拖拉机十七部、手扶拖拉机二部、插秧机一百零三部（每天可插秧四十亩），打谷机一百三十三部（每天可打谷二万斤），粉碎机十七部，水轮泵六部，碾米机二十九部，差不多全部田地都用机耕，牛马则大部分用来拉车。在肥料方面，除了大量养猪（接近每人一头猪，每头二百至三百斤）、养鸡鸭、种绿肥外，每亩还下氮肥十斤。该公社还设有变电站（由西津水电站供电），家家户户有电灯照明，许多机器（如打谷机、碾米机、粉碎机等）都用电力发动。

在粮食高产的情况下，他们对国家的贡献很大。两个公社除了每人给国家提供公购粮八百斤（包括超购粮），社员基本口粮五百斤外，家家队队还有储备粮，增强了备战备荒力量。此外，还出产许多糖蔗、水果等供国家制糖和出口之用。

由于机械化、电气化，劳动力增多，农村副业也大发展起来。除大量养猪、养鱼、养鸡鸭、造田造地外，还扩种了许多果树、林木、糖蔗、薯类、瓜类、豆类等。双桥公社的柑桔、西瓜，心圩公社的糖蔗，都是新品种，产量大，质量好，价格也高。如心圩公社的糖蔗（在畚地上种植）平均亩产达万斤，每吨价值三十元，粮食价格也由以前每百斤六元提高到现在的九点五元。山区平原一个价。两个公社宅旁路旁山上都种上竹木、果树，一方面增加了用材，另一方面又可减低地碱，改良土壤。

在这种农业增产、购价提高了的情况下，社员生活大为改善。每个劳动日年终分配，双桥公社平均零点八八元，高的队达到一点二元。心圩公社平均零点九五元，最高一点二元，最低零点六元。这样社员五口之家平均以一个半劳动力每年出工四百日工计

算，每户可得三百二十元至三百八十元，高者可达四百八十元；按人口计算，平均每人每年可得六十四元至七十六元、高者达九十元以上。不仅逐步缩小工农差别与城乡差别，也缩小了山区与平原的差别。这就证明了一九五四年中央决定“农产品价格逐渐提高，最后消除地区差价，只存品种差价”这个政策的正确性。

上述两个公社所有机器，绝大部分是广西自己制造的。据十月间广西工业展览馆统计，广西今年工业总产值比一九五二年增长了九倍，机械工业总产值增长了六十六倍，机器设备增加了十四倍。广西工业建设都是采取了小型为主、面向农村的方针，如小农机厂、小化肥厂、小水电站、小水泥厂等都设到县，从资金设备到原材料都是依靠各县自己的力量，因陋就简、就地解决，克服了“贪大求洋，眼睛向上”的错误思想。这种就地取材，就地制造，就地使用，使工业生产面向农村，为农业增产服务的情况，更证明了毛主席关于“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依靠群众自力更生”这条伟大方针的无比正确。

在参观座谈中，公社同志也提出了一些问题。他们目前主要是机器维修有困难。他们说，现在机器大修理要送到县城或南宁市去修理。这不仅往返运输浪费，而且往往要排队拖延时间。他们自己有资金，想购买车床，在公社建立机修厂，但就是买不到。他们要求城市能将小机械修理厂进一步下放到公社，并就地训练一批技术人员，将来做到大修不出县，小修不出大队。这是他们当前的迫切要求。其他化肥、水泥、水电等等也要做到每县有自己的小厂。纺织厂榨糖厂也要逐步下放农村，以适应就地取材就地使用的方便。我认为，这是我们将来农村发展工业建设的大方向（国防工业例外）。

另一个问题，公社同志说，他们资金很多，这是好现象。但

这两个公社有机器都没有收折旧金，不仅未收基本折旧费，连大修理折旧费也未留。至于生产队的耕畜、农具等折旧制则更谈不上。这实际上是年年吃老本。现时资金较多，等到将来机械维修或添置时，就会感到资金困难，甚至转而负债了。在社队三级建立机器、耕畜、农具折旧制，就成为当前急待解决的问题，望中央对此予以考虑。去年一月我写信给先念同志并转毛主席，建议在公社三级建立耕畜、农机具折旧制，今年国庆节后又将原信重抄一份送毛主席审阅，不知看到没有？

以上简报有何指示，来信望寄南宁市东方红饭店。

《邓子恢文集》编辑委员会

主任 陈丕显
副主任 项南 吴亦侠 林开钦 韩培信
委员 江一真 杜润生 李友九 郑重
伍洪祥 毛祥瑞 孙瑞鸾 沈正乐

《邓子恢传》编写组

组长 柯克明
副组长 李智 叶绪昌 刘蓬勃 边入群
成员 许人俊 王丰 张怀珍 殷平
蒋伯英 邱林忠 杨卫东 欧阳松
张连福 邬大千 章瑞珍 胡莹

出 版 说 明

《邓子恢文集》是根据中共中央批示，在农业部党组、福建省委、江苏省委的关怀下编辑而成的。全书共收入邓子恢同志一九二五年至一九六九年的重要文章、报告、讲话、书信六十六篇。多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邓子恢同志的这些著作，集中反映了他一生许多动人的经历，也反映了他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对农村工作做出的巨大贡献。他的这些思想，对学习研究党的历史有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其中一些有创造性的思想，对今天我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尤其是对农村建设和改革，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本文集是由《邓子恢传》编写组具体负责编辑的。在编辑过程中，对有些文稿作了少量的文字订正，并有所删节。为了便于读者理解这些著作，做了题解和注释。

《邓子恢文集》编辑委员会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

序

邓子恢同志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卓越的农民运动和农村工作专家。他一生经历了辛亥革命以来风云变幻的漫长岁月，不仅是历次伟大社会变革的目击者和参加者，而且在许多重要历史时期是某一地区以至于全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人之一。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邓子恢同志从青年时代起就投身革命。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下，他以惊人的毅力和胆识与张鼎丞等同志组织了闽西农民暴动，创建了闽西革命根据地。红军长征后，他冲破千难万险，回到闽西南坚持斗争，是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领导人之一。在各个历史时期，邓子恢同志都担负着党、政、军的重要职务。他善于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他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的实际紧密结合。他在根据地建设、武装斗争、军队政治工作、财经工作、土地改革和党的建设等方面的建树和开拓精神，曾得到党中央的高度评价。

建国后，邓子恢同志主持中南局的工作，领导中南地区出色地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和人民政权巩固的艰巨任务。他在这一时期的光辉业绩，特别是在农村和群众工作方面的独特创造，受到了党中央的充分肯定。不久，邓子恢同志即调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协助毛泽东同志领导农村工作。他为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的发展道路倾注了毕生精力。

作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子恢同志始终坚持党的实事求是原则和群众路线。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提出“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抗战胜利后，他在华中解放区推行“中间不动两头平”的分地方针。在五十年代指导农业合作化的运动中，他实事求是地提出要“从小农经济的现状出发”，也就是从中国农村贫穷落后的现状出发，坚定地实行党中央肯定的自愿互利、稳步前进的方针。在随后纠正人民公社运动中“左”的偏差时，他提出了一系列调整经营体制的意见，主张建立包括包产到户在内的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然而这些正确主张，在当时“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却一再被斥为“右倾”、“小脚女人走路”、“刮单干风”，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出于一个共产党人的责任感，他始终以巨大的政治勇气继续深入调查研究，向党组织直抒己见，从不考虑个人得失。

历史已经证明，过去对邓子恢同志的批判是错误的。邓子恢同志关于农村体制和经济改革的主张，就是当前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先导。他将作为中国农村改革的先驱，连同他的历史功绩载入史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为邓子恢同志平反昭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邓子恢等同志提出了农业中要实行生产责任制的观点……在当时和以后都有重大的意义。”这是对邓子恢同志的公正和崇高的历史评价。

邓子恢同志具有坚强的革命意志和高尚的道德情操。他处顺境而不骄矜，处逆境而不消沉，处困境而思奋进。他“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革命征途中的艰难险阻，更加磨练了他刚直不阿的性格，增强了他对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念。

邓子恢同志平易近人，经常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在群众之中，一生都与人民保持着血肉相连的关系。他虚怀若谷，从善如流，在制定方针政策时，总是从农民摆脱贫困，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要求出发；他光明磊落，坚持真理，从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他艰苦朴素，严于律己，从不向党伸手，更不追求享受。当全党全民沿着邓小平同志指引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今天，我们特别需要提倡这种精神。“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邓子恢同志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作为我党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子恢同志在实践中形成了许多重要论著，这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党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的一部分。这部文集连同《邓子恢传》、《回忆邓子恢》反映了邓子恢同志一生的许多感人经历和思想观点，也反映了中国革命和建设历史画卷的许多生动场面，是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的好教材。这三部书的问世，对于我们学习和研究邓子恢同志，学习和研究我们党的历史和毛泽东思想都是很有意义的。

杨尚昆

一九九六年四月